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杜鲁门传

(下)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 杜鲁门传（下）

## 第四部 总统先生

### 十一、责任止于此

且看小小杜鲁门  
鼻青脸肿一身泥——可不是吗！

——《芝加哥论坛报》

#### 1

杜鲁门在 1945 年初秋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为能得到点儿什么，大家都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谁也不为别人着想。”

10 月的某一天，白宫外树木的叶子已开始变黄，杜鲁门坐在办公桌前，又给母亲和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华盛顿社会生活中每平方英尺内唱主角的人比有史以来所有歌剧团里的主唱加起来还要多。

某日，杜鲁门参加了美国军团在密苏里州卡拉瑟斯维尔举行的一次集会。站在彩旗飘舞的主席台上，他提醒国人每场战争结束后都必然会出现衰退，困难将随之而来。“不遇困难一事无成”。失误在所难免，想有所建树就不能指望避免失误，只有什么事都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在肯塔基州吉尔伯特维尔大坝落成典礼上，杜鲁门号召全体美国人团结合作，大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心协力”，杜鲁门已不再是个战时总统，他发现和平时期的工作远比想象的难做，也更令人伤脑筋。7 月份在柏林一个用大卵石铺成的广场举行的小型军事仪式上，他还曾信心十足地说：“战争时期做得到的，和平时期也一定能做到。只要我们倾全力...为和平而奋斗，便有望迎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然而，在人们都不愿再合作的今天，这一切又怎么是可能的呢？

在停泊在东京湾内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仪式后不几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他战后的第一篇咨文，他的麻烦也就开始随之而来。该咨文于 9 月 6 日送抵国会山，长约 1.6 万字（是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最长的一篇咨文），其中提出了一项 21 点国内计划，内容包括增加失业救济补助金；即刻提高最低工资；常设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实行税收改革；为农场主提供收成保险；将战时权力与经济稳定法延长整整一年，意思是保持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设立联邦住房救济金，以便每年新建 100 万栋新的住房。

我们必须做下去，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我们应当考虑对城市中大片的破败不堪的贫民区进行重建，以真正的美国方式改变目前这些地区只有低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的状况，将其改造成为适宜各收入阶层家庭居住的地方……

这篇咨文透彻地阐述了革新思想，是一项内容广泛的行动纲领。在乘“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自波茨坦回国途中，杜鲁门便已着手起草这篇咨文。他将自己的想法口授给萨姆·罗森曼，并用了整整 10 天的时间集中精力对草稿进行补充、编辑和修改。他不愿等到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提出自己的内政纲领，也不打算将它零打碎敲地提交给国会。他需要的是一大篇从一开始就将其内

政纲领引向自由派道路的咨文，时间将会证明其意义之重大。罗森曼对杜鲁门说，在参议院中跟随本党领袖投票赞同这样一项计划是一回事，而自己作为党的领袖去推荐和争取支持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一直在兴冲冲地断言，新政已寿终正寝，“罗斯福愚蠢的计划”终于结束了，因为他们“了解”哈里·杜鲁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猛然的醒悟。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乔·马丁抱怨说，即使罗斯福也从未“开一次会”就要求那么多。杜鲁门在国会的同党中有许多人也同样对此担忧而不愿附和他。由共和党人和南方的民主党人组成的保守派联盟从1937年起便一直在为难罗斯福，这一次也准备好了要使他的继任者受阻。包括14位民主党人和10位共和党人的众议院赋税委员会投票决定拒绝考虑失业救济补助金的建议，并暂缓考虑进一步向失业者提供救济。正如报上所说，杜鲁门所期望的长达6个月的“与国会共舞”的时期在开始前便已结束了。

劳工领袖们要求取消工资管制，但限制物价。工商界领导人的要求则恰好相反。谁都不愿再看到由战争引起的那种物价飞涨。然而，尽管大多数日用品供应短缺，却几乎人人都有钱可花——人们手中的战时公债和银行储蓄已达数十亿美元。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仓促地解除了大笔的战时合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解除的合同额已达150亿美元。波音飞机公司解雇了2.1万名工人，福特汽车公司则解雇了5万人，而此时，成千上万的军人正陆续回归故里，指望找到一份工作。穿制服的男男女女足有1200万之多，他们都希望能尽快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有关经济将面临厄运的预言已成为老生常谈。此时，杜鲁门仍对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营男子服饰用品而受挫的教训记忆犹新，在向国会介绍当时国家的境遇时，他提醒道：“我们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它后来以1920年和1921年的大崩溃告终。我们必须确保这次不再犯同样惨痛的错误。”其实，大萧条比这严重得多，也更容易记起，直到1939年战火在欧洲燃起时都未真正结束。假如战争的结束真的意味着回到战前的“正常”状态，那么前景的确是够严酷的了。

众所周知，美国靠这场战争繁荣了起来。1945年美国商品和劳务总产量是1939年时的两倍多。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约30%，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也翻了一番，失业率也低于2%，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农业收入是杜鲁门在格兰德维厄经营农场时的5倍。美国人还从不知道有这样的繁荣。然而，人们也都普遍认为困难时刻肯定会再度出现，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在整整一代美国人的脑海里，对于再次发生大萧条的恐惧永远都不会逝去。父亲们在饭桌上告诫家人：“危机肯定会发生，而且下次情况糟得会使你毛骨悚然。”那些所谓专家的看法也同样悲观。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10月19日一次内阁会议上呈给总统的报告中估计，在未来数月内国民生产总值将下降400亿美元，工资总额将减少200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到来年春天将会有700万至800万人失业，1939年的情形又将重演了。

即使当时有时间筹划和准备，即使当时有可能对“让士兵们回家”的呼声置之不理，使复员工作以较为缓慢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进行，恢复期的问题依旧会十分棘手。实际上，突如其来的和平几乎同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样，使整个国家措手不及。1941年以来，由于“打仗”，民众们已心甘情愿忍受

物品短缺和生活不便之苦，对设定工资最高限额和住房供给不足也已习以为常。但现在，他们似乎急于要补偿失去的时间，各种要求一下子都冒了出来。

到10月份时，全国都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房荒。据报道，仅在芝加哥市，就有10万名复员军人无家可归（芝加哥市准备不久将出售废弃电车供改装为住所之用）。各方来信雪片似地飞往白宫，其中有一封寄自住在洛杉矶的一位男子，信中讲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中士军医，妻子已有身孕，还有一个幼小的孩子，他看这家人无处栖身，便留他们在自己家里住了一夜。在信中他恳求总统：“办点实事吧。”

工会组织已不再受战时不罢工承诺的约束，提出了“递升式”增加工资的要求。一时间，几乎所有行业都发生罢工。纽约州有1.5万名电梯操作员罢工，其他州则有2.7万名石油工人和6万名伐木工人甩手不干了。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新政派人士正大批地退出政府。

所有这一切对杜鲁门来说实在是难以理解。他对经济学知之甚少，而重建的经济学又是如此纷繁复杂。他怎么都不能理解，一个在战争时期表现出极大的奉献精神 and 顽强毅力的民族竟会突然间变得这样极端自私，对公益这样漠不关心。他告诉母亲：“国会碍手碍脚，劳方荒唐透顶，资方也近乎发疯般地自私。”母亲住在格兰德维厄的一幢小木板房里，杜鲁门遇事总少不了征询她的意见。杜鲁门始终相信古代共和主义者公民权的理想，在他的心目中，辛辛纳特斯这位在拯救祖国后解甲归田的传奇式的罗马勇士一直是位英雄。他总喜欢告诉来客，他已把办公桌上的大炮模型换成了一台亮晶晶的模型犁。

他所能做的就是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在他看来，日程安排得更满更忙一些，动作更快一些，接见的人更多一些，外出更频繁一些，似乎至少可以为大家作出表率。在非常典型的一天上午，两小时内他便接见了十好几位来客，其中有来自田纳西州的众议员艾伯特·戈尔，给他带来一瓶杰克·丹尼尔斯酒；参议员惠勒；他在杜鲁门委员会里的前助理马克斯·洛文撒尔；维尔京群岛总督；另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帕特·坎农，来谈飓风造成的损失问题；明尼阿波利斯市年轻的民主党人市长休伯特·汉弗莱夫妇；一群倡议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妇女（最后一批来客告辞后杜鲁门在约见单上写道：“平等权利，一派胡言乱语。”）。他工作起来“风风火火”，一篇报道中称他这种坚决果断的工作方式现已被公认为“典型的杜鲁门风格”。他作出改变时总是“急匆匆地”大笔一挥，其实极少有事关重要之处，只是“凡事必快”而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5分钟的时间都用来宣布一批决定，包括改组劳工部、将经济稳定局转归约翰·斯奈德领导下的战时动员及恢复局、任命来自圣路易斯市的斯图尔特·赛明顿为新成立的剩余资产管理局局长、接受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辞呈并任命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接任、提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哈罗德·H·伯顿为最高法院法官。宣布结束后，一位记者不禁问道：“总统先生，还有吗？”全场哗然大笑。

这种时候总是令他十分得意。他喜欢用具有声望与权力的重要职位奖赏给像斯奈德这样的忠实的老朋友。这是这位成功的政治家一生中的主要乐趣之一，更不消说他是人们心目中的一位出色的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他事无巨细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他实在不愿解除埃迪·麦金的职务，便在农村财政委员会中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他的海军助理贾克·瓦达曼由于开始越权行事得罪了包括贝丝·杜鲁门在内的白宫里一大批人，因此，得把他悄悄打

发出去，于是杜鲁门把他安排到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而瓦达曼任此职务显然是不适合的。即使是像密苏里州参议员贝内特·克拉克这样多年来一直给杜鲁门出难题的人也没有被遗忘。9月12日，杜鲁门任命克拉克为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上诉法院陪审法官。不久以后，克拉克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小镇贝里维尔举行再婚典礼，杜鲁门又站在他身边作男宾相，这对杜鲁门来说也是破天荒的。

那年秋天，有两场正式仪式使杜鲁门深为感动，也尤为难忘。

9月21日亨利·史汀生退休那天，阳光明媚，一个小型仪式在玫瑰园举行，杜鲁门极为庄重地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这位年迈的陆军部长。他的部下这时才意识到，只有在这种场合，杜鲁门才显得出类拔萃。他对于小范围交往得心应手，这时，他变得易于接近，无拘无束，但同时他又十分清楚这种场合的意义之所在。那天是史汀生的78岁生日，也是他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天。杜鲁门在给已回到独立城的贝丝的信中写道：“假如政府中有人有资格获得一枚（勋章），那便是那个好人。”

11月，在五角大楼大院里，又举行了一场同样令人感动的欢送仪式，这次是为马歇尔将军。杜鲁门也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授予了他，这是将军唯一的一次接受美国战时军功章（马歇尔曾多次拒绝接受任何这类荣誉，认为战士们正在国外战死沙场，给他这种荣誉是不合适的）。在杜鲁门看来，马歇尔在赢得战争胜利中的功劳无人可及，因此他称马歇尔为两任总统的中流砥柱。杜鲁门曾发自内心地赞叹道：“马歇尔是有史以来伟大的指挥官中最为出色的一位。”后来，杜鲁门又说过多大的勋章都不足以表彰马歇尔将军。

然而，这种场合毕竟不多见。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有近乎绝望的感觉，要做的事情太多，自己真正的发言权又太少，也从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集中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他有些不堪重负了。他告诉母亲：“这儿的压力太大，我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他周游全国进行巡回演讲，想以此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人民，却常常收到相反的效果，使人觉得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目的。在密苏里州卡拉瑟斯维尔的那次美国军团集会上，他大谈将要面临的“困难”，并有创见地郑重谈到了原子弹问题。他已要求国会成立一个新的由文官而不是由军人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认为“原子能的释放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其划时代意义之重大难以在旧思想体系中把握”。他告诉与会者，要想在世界上和睦相处，就必须遵循《新约》中的“为人准则”，这听起来幼稚得活像《史密斯先生进京》中的史密斯先生。

再也经不起另一场全球战争了，我们不能再打了，除非是总体战，而总体战则意味着我们的现代文明的终结，我们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要接受那“为人准则”，并准备在前进道路上面对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命运。

瑟斯维尔位于密苏里州东南部的“鞋跟”处，盛产棉花。杜鲁门来此开会期间曾在一天早晨散步时停下来朝密西西比河里吐了一口痰——他对惊呆了的记者们解释说，这是当地的一项传统习俗。他也曾在旅馆的小餐厅里弹了一会儿钢琴，在一家杂货店举行了公开招待会，还参加了赛马会，并在餐巾和空白帐单上为大家签名，甚至还在一辆机车模型上与美国军团成员们合

影，也敲过钟。《华盛顿邮报》说：“他除了没有把自己从炮口里射出来以外，什么都做了。”

数百名民主党参众议员参加了在切萨皮克湾杰弗逊岛上一个俱乐部内举行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杜鲁门让大家叫他哈里，还在走廊上同大家一起玩“沙蟹”牌。事后，某位不知其名的参议员回忆说，哈里·杜鲁门“牌技非常娴熟”，另一位在场人（同样不知其名）则说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吃的东西应有尽有，大家喝得畅快淋漓——只有两个人醉了”。

人们在提到总统的朋友和同事时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密友”一词。哈里·沃恩显然也被自己出人意料的得势冲昏了头，开始自己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演说。沃恩还大言不惭地吹嘘他在波茨坦将一块价值 55 美元的手表以 500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俄国人。另一次，他在弗吉尼亚州向一群基督教长老会的妇女发表讲话时，为了企图说明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区别，竟说在吃厌了鱼子酱之后，国家准备换吃火腿蛋了。

总统班子中的一些人对白宫内的混乱状态越来越感到担忧。预算署长哈罗德·史密斯认为杜鲁门头脑敏锐，才思敏捷，但遗憾的是缺乏条理。在 10 月中旬举行的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杜鲁门自己也承认对于情况的发展感到“意气消沉”，表示要减少约见，取消一部分旅行计划。助理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写道，这一决定已使大家“欣喜不已”，因为他早就在为哈里·沃恩和有关扑克牌游戏、酗酒的传闻感到担心，认为长此以往迟早会带来麻烦。艾尔斯并无出众之处，说起话来柔声细语，被白宫里的记者们称为“咕啾先生”，他一直暗中坚持记日记，这些日记有朝一日会成为记载杜鲁门时代“内幕”的宝贵资料。

从外表看，杜鲁门并无太大变化。记者们称他“精力充沛”、“和蔼可亲”、“温文尔雅”、且看上去“镇定自若、充满活力、生气勃勃”。专栏作家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则写道，“他从来都是衣冠楚楚，像是老妈妈刚刚为他打扮整齐，梳头后要去参加草莓聚餐会那样。”他依旧甚得人心，称许率一直保持在 80% 左右。

若国会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提出更多的要求。一位总统的要求受到国会的回绝并不少见，但一位总统在多次被回绝之后，仍不肯改变战术，实为罕见。

他要求通过扣薪办法实行国民强制健康保险。按这个计划，全国公民，无论其支付能力如何，都能够享受到医疗及住院服务。当复员呼声高涨时，他却是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号召实行普通军训，尽管这一想法不可能获得通过，但他本人仍坚信不疑。“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和平必须建立在实力、良好的愿望及优良的品行的基础上”，国家再也不能指望长年累月地武装自己。因此，他希望在 18—20 岁的青年男子中实行一年的强制军训制度，使他们成为训练有素、遇紧急情况时召之能战的后备军人，而非武装部队。

某天早上，杜鲁门站在办公桌旁，向记者们展示了一面新的总统用旗帜，他让哈里·沃恩将旗举高些，好让大家看得清楚些。他解释道：“新旗帜上的鹰朝向旗杆，这样在行军时它始终向前看，同时也使它看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而不是象征战争的箭……”。总统的旗帜和印章都重新进行了设计，这自威尔逊时代以来还是第一次。杜鲁门想通过改变鹰的注视方向来象征美国正在前进，并致力于和平。

10 月 26 日，杜鲁门到纽约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主持了新建造的富兰克

林·D·罗斯福号巨型航空母舰编入现役的典礼。稍后，他在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上检阅了哈得逊河中 50 艘的一排军舰，1200 架海军飞机在天空翱翔。鹰的爪从未抓过这样的箭。这种国家力量的公开展示也是任何一位最高统帅都未曾看到过的。但是，这一切都在迅速消失。倘若杜鲁门在 1945 年末就试图停止正在忙乱进行的复员工作，保持美国战斗力量的完整，他可能早就被弹劾了，因为全国上下都热切渴望在战争胜利、敌人被消灭后让青年男女回来。过后，杜鲁门说，这哪里是复员，“简直是解体”。

在乘车前往中央公园去发表海军节演说的路上（这是第一次由电视转播的总统讲话），费尔雷洛·拉瓜迪亚市长告诉杜鲁门和李海海军上将，街道两旁欢呼的群众至少有三五百万之多。杜鲁门等在敞篷车中向沿途群众挥手致意。这一场面对李海来说是没有哪一位罗马皇帝会梦想得到的凯旋仪式。

尽管如此，新闻界对杜鲁门的评价一直是政绩平平。记者们批评他处理重大问题时“小家子气”，常常“胡乱应付”，凡事总是依赖于“一种显然不由自主而又时常挂在嘴边的坚定信念，即所有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解决”。

劳工状况持续恶化，纠察线成为这一时期的既定标志。杜鲁门也开始变得举棋不定。他呼吁通过集体谈判合理地增加工资，表面看来似乎是支持劳方。但随后，由于受到来自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两方面的要求对工会采取强硬政策的压力，他提请国会禁止全国性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直至 30 天后事实调查委员会对形势作出评判为止，这一想法使劳方、资方、国会三方都不满意。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公司的 17.5 万名员工和 19 个州的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这场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月。

杜鲁门对作家约翰·根室抱怨说，他的工作吃力不讨好。根室自杜鲁门就任副总统后就一直没同他见过面，这次见面后不禁大为感慨，事后他写道：“他的嘴边已有丝丝皱纹，满脸的疲惫、茫然和烦忧。”

另一日，罗伯特·奥本海默来进行私人拜访，交谈中他显然忧心忡忡地说，由于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席话使杜鲁门极为不快，特别是奥本海默自怜自哀、牢骚满腹的态度更是令人生厌。杜鲁门告诉奥本海默：“是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就由我来操心吧。”过后，杜鲁门表示他希望再也不会见到那人了。

11 月，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杰·赫尔利回国述职，突然宣布他要辞去大使职务，理由是国务院同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边。他是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透露这一消息的，而就在一小时前他还跟杜鲁门说中国形势已恢复正常，他不久便会回到中国去。数年之后，杜鲁门写道：“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 180 度的大转弯，我始终想不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当时他的态度比较直截了当。他从白宫自动收报机上扯下黄色的新闻稿，怒气冲冲地闯到内阁会议上，大叫道：“看这个狗杂种是怎么对我的！”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建议总统立即提名马歇尔将军为新任驻华特使，以便将报界的注意力从赫尔利身上转开。这是一项御用建议。杜鲁门随即在红厅给正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家中的马歇尔挂了电话。

“将军，我想让您为我到中国去。”杜鲁门说道。

“遵命，总统先生。”马歇尔说罢便挂上了电话。

杜鲁门实在不愿打这个电话。当时马歇尔总共才退休 6 天。后来马歇尔解释他所以匆忙挂电话是因为他的太太走了进来，他想亲自向她解释，而不是让她无意中听到电话上的谈话内容。



12月,在橄榄球场俱乐部举行的晚宴上,杜鲁门半开玩笑地宣布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要告诉大家,我发现和平是地狱……”

杜鲁门的医疗保险计划亦无进展。在杜鲁门认为同样重要的另一篇咨文中,他提出将武装部队统一划归国防部长一人指挥之下。这一主张遭到了海军的强烈反对,鲍勃·汉尼根则认为这样做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并说发动一场自己可能会输掉的不必要的战斗愚蠢之至。但杜鲁门仍固执己见,他的意图是要削弱西点军校和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派系的权力,使武装部队更为民主。这一崇高的抱负尽管得到了他周围许多人的赞同,但他们都认为不可能实现。杜鲁门则认为提出这篇咨文是他的责任,因为它代表了他的信念。

萨姆·罗森曼越来越欣赏杜鲁门这个人了。在他看来,杜鲁门同罗斯福的主要差别在于杜鲁门“更少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对他重新当选的机会产生什么影响……杜鲁门做的许多事罗斯福可能永远都做不到,因为罗斯福知道那样做会有什么后果”。

在许多人看来,总统同国会议员的亲密关系——议员们谈到的好老兄哈里等等——已表明为一个不利条件。假若他的纲领彻头彻尾地保持罗斯福的传统,议员们可能会像在战前对待罗斯福一样地顽固不化。只是现在没有了这样的担心,即杜鲁门会像罗斯福那样将问题提交全国人民并产生强烈的效果。杜鲁门无法使“他们感到敬畏”,正如有人所说,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敬畏”常比同志情谊更能获得良好的结果。

就在此时,杜鲁门个人觉得吉米·贝尔纳斯向他通气不够。贝尔纳斯当时正在莫斯科出席外长会议。杜鲁门也曾向亨利·华莱士谈起他担心和平时期对原子能的利用会大大缩短工作日,因而人们会“胡闹起来”。在12月份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华莱士婉转而又尖锐地训斥杜鲁门怎么会不知道现存原子弹总共有多少枚,也训斥他还说确实不想知道有多少枚,华莱士坚决认为:“总统先生,你应当知道。”事后,华莱士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先是窘迫地规避说他想他应当知道,后又掩饰道:‘我大体上还是知道的。’”

杜鲁门从贝尔纳斯和华莱士那里获得的一个明确的印象是他们俩都认为自己的见解远比总统的高明。

在许多从罗斯福时代留任下来的官员和别处著名的自由派人士看来,现政府似乎在支离破碎。《下午报》是在纽约出版的一家言辞尖刻的自由派报纸,专栏作家马克斯·勒纳在该报撰文刻薄地评价杜鲁门总统,称他为历史上“失控的事故”之一。勒纳写道,过去也有一些领袖的伟大是环境造就的,但从未有人在接任崇高职位时如此忐忑不安。勒纳曾到过密苏里州,自认为了解杜鲁门的长处和不足。杜鲁门总统的“首要品质”是对人诚实,对朋友忠诚,工作也勤恳。依勒纳看来,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总统的“中产阶级心态”:

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转而依靠个人品德和私人关系;在遇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表现为更加害怕工会、罢工。害怕工会的政治力量胜于害怕任何其他东西;在遇到危机时,有中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努力清高地超脱于当时的重大问题之外,试图漠视真正的社会分歧和斗争。

这些斗争不能靠某个人呼吁合作来调和,人们最终还应决定自己的立场并按照自己的立场进行斗争。最后,杜鲁门总统的基本弱

点在于他未能运用充分的想象力来理解他所担任职务的实质及重要性。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贝丝、玛格丽特和马奇·华莱士便回独立城去了。杜鲁门则一直在白宫里呆到圣诞节那天上午，尽管天公不作美，他还是决定飞回家去。两星期前，华盛顿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12月19日，一场暴风雪又席卷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积雪达5英寸之厚。圣诞节那天早上，杜鲁门一觉醒来，发现窗外风声大作，雨雪交加。人们告诉他国家机场已被冰雪覆盖，所有营业性航班都已取消。在同他的飞行员汉克·迈尔斯中校商议后，杜鲁门决定还是要飞回去。当“圣牛”号专机终于飞出堪萨斯市上空的云端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1个多小时。报界和广播评论员均认为此次飞行愚蠢之至，《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位国家元首‘所作的最为危险和‘感情用事的旅行’之一”。若有人知道他在抵达北特拉华大街自己的大灰宅院时家人迎接他的那种情况，这次旅行就显得更无必要，他的境况也更加可怜了。贝丝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人，因此对杜鲁门此举并不赞成。三天后，杜鲁门回到华盛顿，他坐在办公桌前，写了他一生中最为心灰意懒的一封信：亲爱的贝丝：

我已回到了白宫这座充满抱负和名望的巨大白色坟墓。我觉得自己好像去年筑起的鸟巢在经历第二年的风吹雨打。我并不经常承认自己状态不好，我想这样可能会惹你生气，就像其他许多我做过的或妄想去做的事情一样让你生气。但我的本意并非如此……

你决不会意识到这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天晚上，我在做完我并不想做的一大堆事情后回到家中，却发现有个个人在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神情就仿佛我是猫拖进来的什么东西，而这世上我唯一珍视的就是这个人的嘉许和有益意见。这个人还对我说我之所以终于回家了是因为我找不出任何呆在外面的理由了。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呢？

我的脑袋应当再大一些，匀称一些，里面的脑力应当再多一些，再多一些自我的才能或其他什么能使我知道世界上确实能够有第1号人物的东西。我并不想做头号人物，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相反意见，《生活》和《时代》杂志都说我是头号人物（那周他作为“本年度风云人物”而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如果真是这样，你、马吉和其他能影响我行动的人都必须给我帮助和支持；因为没有人像我现在这样亟需帮助和支持。倘使我能利用全国最佳的智囊人物并得到我所敬慕的家人的一点点帮助，便会大功告成……

吻我的宝贝，我永远爱你。

哈里

1945年12月28日

考虑再三，他没有将这封信寄出去，而是把它连同未用过的信封塞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天气依旧未见好转，杜鲁门则在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此时主要困扰他的是国务卿的表现。

在从独立城回去之前，杜鲁门便从查利·罗斯那儿得知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项公报，却未事先向总统做任何简要的汇报。更糟糕的是，贝尔纳斯在回国途中竟通知罗斯给他在所有广播网上安排广播时间，以便他在去见总统之前先向全国通报这件事情。显然，贝尔纳斯已经忘乎所以了。

范登堡参议员对贝尔纳斯对俄国人过于安抚感到不安，便急匆匆地冲入白宫，要求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是12月28日。星期五，也就是杜鲁门给贝丝写那封充满哀怨的信的当天。后来，他又一次不顾恶劣的天气，登上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沿波托马克河顺流而下。第二天29日，星期六，贝尔纳斯刚刚飞抵华盛顿，杜鲁门发来的一封电报正在等着他：“建议你于今日或明日来汇报任务执行情况……届时我们除其他事情外也可讨论你发表广播讲话的可取性问题……”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融洽过，也并非完全是坦诚的。贝尔纳斯确实认为自己比杜鲁门更有资格和能力成为总统，而他又不总能很好地掩饰这一想法。尽管杜鲁门认为贝尔纳斯聪明绝顶，在政治方面的经验也是无与伦比的，但却总觉得不能完全信任他。杜鲁门在前往波茨坦途中所记的日记里称贝尔纳斯为他的“能干而又诡秘的”国务卿。杜鲁门写道：“天哪，但他头脑敏捷，又很诚实。可是国内所有的政客都是一样的，他们确信所有其他的政客在为人处事方面都是拐弯抹角的。”

贝尔纳斯乘专机匆匆赶到弗吉尼亚州匡蒂科，他登上“威廉斯堡”号游艇，在杜鲁门的大舱间里与杜鲁门进行了私下会谈。此时，河上正飘着冷雨，外面的一切阴沉险恶。

根据杜鲁门时隔多日后的记述，当时他关上舱门，狠狠训斥了贝尔纳斯一顿：

我告诉他，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情况，他使我茫然无所知，这种做法我很不喜欢。我对他说，作为总统，我想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在外交谈判中我们做了些什么。我说，一个宣布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动态的公报在华盛顿发表之前，我竟一无所知，这使我非常震惊。我说，我今后不会容忍这类行为的再次出现。

然而，贝尔纳斯坚持说谈话十分愉快。据当时在游艇上的人称，与其说是杜鲁门，倒不如说是李海海军上将着实让贝尔纳斯不好受了一番（众所周知李海曾称贝尔纳斯为“脓包”）。迪安·艾奇逊当时虽不在场，但凭着他对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两人的了解，后来推断这二人的印象都是真实的。因为杜鲁门在回忆此类事件时，往往夸大他的“吠叫声”，而实际上，他几乎从来都是特别照顾他人的情绪；而贝尔纳斯是南卡罗来纳州政坛老手，自然决不会把杜鲁门提出的凡事通气的要求当作对他个人的批评。

不管怎样，这次会面后两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没有出现公开决裂，但杜鲁门对其国务卿的信任已不同以往。6天后依旧暴跳如雷的杜鲁门给“我亲爱的吉姆”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他愿意给予其内阁阁员以充分的职权，但他并无意放松总统的职权或“放弃总统作最后决定的特权”。他极为关注俄国，说已厌倦“娇纵”俄国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语言，否则另一次大战就正在酝酿中。他们所了解的就只有一种语言——‘你有多

少个师？’ ”

按照杜鲁门多年后对此事的记述，当时他把贝尔纳斯叫到他办公室并把信大声念给他听。然而，贝尔纳斯再次声称决无此事，还说若真有此事，他当即便会辞职。但是，杜鲁门当时在信上亲笔写下了这句供记录在案用的话：“向国务卿宣读并讨论此信——既不要打字亦不要邮出。”后来，杜鲁门在同埃本·艾尔斯谈话时表示他的的确确把信念给贝尔纳斯听了，“当时就在这个办公室内，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我告诉他我不会把信交给他，而是要把信念给他听”。据杜鲁门讲，贝尔纳斯的脸涨得“通红”。

这种信在杜鲁门任期内并不少见，他把这些信件称为他的“手写痉挛”。的确，这些信显得有些突如其来而又不由自主，好像是为了满足某种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他发泄怒气的一种方式，而很少是为了写给人看的。这些信为他消除了紧张情绪，写完信后他马上就会觉得好受了许多，而同时，由于这些信没有发出，因而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但这些信的内容和语气同杜鲁门平时与人交往时竟很少有甚至毫无相似之处。正如迪安·艾奇逊所写：“我从未听他说过或听到他对任何人讲过一个难听、尖刻、挖苦的话，不管人们怎么冒犯他或者有什么疏忽。”

## 2

新年临近，既无时间忧伤，又无充足的时间去做成任何一件事。钢铁工人随时有罢工的可能，对整个经济构成威胁。紧急会议一个接一个，官员们的车辆不时来往于白宫的车道上。杜鲁门在一篇广播演说中对全国人民说：“1946年是我们作出抉择的一年，我们要在这一年为我们的经济结构打下基础，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菲尔·默里领导的钢铁工人工会要求将每小时工资提高19.5美分，而以美国钢铁公司的本杰明·费尔勒斯为代表的钢铁公司则提出只愿增加15美分。1月12日，在白宫的一次漫长而又艰苦的会议结束时，杜鲁门终于宣布默里已同意将罢工推迟一个星期。在17日的另一次会议上，双方仍未达成协议，杜鲁门提议钢铁公司答应将工资提高18.5美分。双方都要求给点时间来考虑一下，最后截止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

默里接受了总统的提议，但费尔勒斯拒不接受。1946年1月19日，全国1000多家钢铁厂的80万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开始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罢工。

整个国家都已被罢工所控制。大约20万名肉类加工工人已经罢工，玻璃工人、电话公司工人、棺材厂工人纷纷开始罢工。通用电气公司也发生了大规模罢工。在匹兹堡，3500名电力公司雇员罢工，使多家工厂关闭，波及其他工人达10万人之多，电车停运，办公大楼关闭。匹兹堡市市长戴维·劳伦斯在广播讲话中称“这是一场灾难”，并呼吁罢工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去。而劳伦斯市长这位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劳工的一个可靠的朋友。

在下一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敦促杜鲁门对钢铁工人罢工表态，他答复说：“我个人觉得两边的权力都过大，因此我认为政府有必要站出来维护这样一个事实，即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但政府怎样来维护这一事实呢？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杜鲁门答道，但这并不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希望。一周后，他也只是说：“我们一直在对此事进行研究。”

杜鲁门事后写道，没有当过总统的人是绝对不会理解当总统的滋味的，即使是最亲密的助手或家人也不能。“责任的锁链紧紧捆住了他”，永无止境，“决不容许他有一刻忘记自己是总统”。五花八门的问题和决策最终都集中到他的办公桌上，批评和指摘亦是如此。那年秋天，弗雷德·坎菲尔给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道“责任止于此”。坎菲尔曾在俄克拉何马州埃尔雷诺一家联邦管教所的所长办公室里看到过一块像这样的牌子，他问典狱长能否为他的朋友即总统复制一块，于是便有了杜鲁门办公桌上的那块牌子。虽然这块牌子只在杜鲁门办公桌上放了很短一段时间，但那上面的话却永远铭记在杜鲁门的脑海里。

杜鲁门曾经说过，支持他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性中善多于恶。但此时甚至这一点也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国会和工会太令他失望了。罗斯福夫人跟朋友们说杜鲁门周围的人选错了，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也持相同的观点。李普曼写道：“实际情况是最接近总统的那些人没有头脑，实际上没有源自经验和修养的智慧来辅佐他当总统。”极端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则发表了一幅漫画，将总统描绘成被一群名为“劳方”、“资方”、“党内激进派”、“党内保守派”和“外交”的粗鲁街头顽童侮辱和粗暴对待的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并配诗道：

杜鲁门方特勒罗伊小爵爷

“模范小子”真豪杰

做事总以善为本

哥们儿义气记真切

曾是班上小霸主

好景不长——呜呼耶

且看小小杜鲁门

鼻青脸肿一身泥——可不是吗！

遭殃全在信错人

学的全是乖孩子

放学回家胡同中

什么金箴都没用

自称代表美国中产阶级观点和价值的《星期六晚邮报》认为杜鲁门政府上台 10 个月以来的表现“充其量”也只能归入“平平庸庸”之列。有些驻华盛顿的记者既钦佩总统天生的气量和决断力，也为他感到可惜。理查德·罗维尔写道：“让生手在这时掌权够难为他的。”

由担任过罗斯福总统演说辞撰稿人的罗伯特·舍伍德编剧的新电影《黄金时代》曾轰动一时，后来还获得了 9 项奥斯卡金像奖。该片的三位主人公均为战后归国的退伍军人，弗雷德里克·马奇饰演其中的一位，在片中他忿忿不平地说，“去年只想着如何消灭小日本，今年却要想怎么赚钱。”而在另一天他十几岁的儿子在言语中竟也流露出对未来的恐惧——害怕原子弹，

害怕导弹，害怕“一切的一切”。

杜鲁门在信中告诉母亲，人们的头脑已经混乱，需要暂时停下来放松一下神经，还说他自己在此情况下撂挑子罢工也未尝不可。而实际上，他此时也正准备去佛罗里达度假。

他正式任命 35 岁的军医华莱士·H·格雷厄姆上校为新的白宫医生，格雷厄姆的父亲也是位医生，在独立城照料杜鲁门妈妈。格雷厄姆看到总统十分辛苦，非常担忧，便力劝他去休假。遵照格雷厄姆的嘱咐，杜鲁门已经开始在每天早餐前疾走两至三英里。杜鲁门后来告诉查利·罗斯说，散步有助于他的睡眠。

他提名罗伯特·帕特森接替亨利·史汀生出任陆军部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接替乔治·马歇尔出任陆军参谋长。这两人都被认为是极好的人选。但是，他选中的新任海军部副部长却突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提名的人选是埃德·波利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石油商。作为民主党的经费筹集人，波利曾帮助策划提名杜鲁门为副总统。最近，他一直忙于在欧洲和日本处理赔偿方面的事务。杜鲁门很看中波利，认为他强硬、正直，能把事情做好。他的打算是让波利最终接替福雷斯特，并成为国防部设立后的首任部长（后来，杜鲁门曾说：“我需要的是我能找到的最坚硬、最出色的家伙。”）。他也知道罗斯福早就有让波利出任海军部副部长的想法，而且福雷斯特也同意了。然而，波利的生意和政治背景使白宫里其他人一眼就看出，选用他是不明智的。埃本·艾尔斯曾私下表示：“一个石油商不应成为对保护国家石油资源极为关注的部门的首脑，一名政客也不应担任海军的最高领导。”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被传唤到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作证时，麻烦就随之而来了。在参加完罗斯福的葬礼乘火车返回的路上，伊克斯透露波利曾厚着脸皮向他询问潮淹区的石油政策——波利显然是在暗示如若加州对潮淹区的管辖权并不受到争议，大笔竞选捐款就会源源而来。杜鲁门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因为就在伊克斯去作证前他还见过伊克斯，并告诉他尽管必须对委员会讲实话，但同时也希望他对波利“客气些”。

杜鲁门有被背叛的感觉，伊克斯则认为当时除了说出他所知道的情况外，别无选择。记者们问杜鲁门是否会撤回对波利的任命，杜鲁门答道不会。当被问及他同伊克斯的关系有无变化时，他说谁都有被误解的时候，伊克斯也不例外。

2月13日，伊克斯辞职。在他自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称自己“不能因为党的利益而去作伪证”，而且他不可能再担任内阁职务同时又保持他的自尊心。他还说，他反对“任人唯亲地治理国家”，他的这一措辞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鉴于伊克斯已暗示是总统让他去作伪证的，杜鲁门极为气愤，他不仅接受了辞呈，还告诉伊克斯三天之内离职。

尽管波利发誓否认他曾向伊克斯提出过任何这样的建议，但对他的任命却注定要遭受厄运。当委员会同意证实波利为人正直后，应波利要求马上撤回了对他的任命。

这一事件自始至终都极为令人不快，它使许多人联想起哈定政府及其茶壶丘（怀俄明州一油田所在的地名——译者注）石油丑闻。伊克斯曾被誉为“诚实的哈罗德”、“老守财奴”，极难打交道，这一点人人皆知，但他却曾是一位杰出的内政部长，也是出任此职时间最长的人。伊克斯是杜鲁门内

阁中除亨利·华莱士之外的最后一位新政派人士。他的离任以及离任时尖刻的言词尤其被自由派们视作另一个极其令人沮丧的征兆。《纽约邮报》写道：“人们有一种感觉，阵容越来越弱，却在拼死应付一个越编越大的情节。”

数年之后，杜鲁门在回忆伊克斯时把他描述为“辞职”成瘾。

他使我想起了林肯内阁中的财政部长老萨蒙·P·蔡斯，这位蔡斯总觉得应该成为总统，而且会比林肯做得更出色。他总是辞职，想必辞了十几次……

林肯曾在某地说过除非他不高兴，老蔡斯是不会高兴起来的，而伊克斯的情形正也大致如此。我知道在罗斯福当总统时他就曾几次提出辞呈……

整个这件事情……颇为遗憾之处在于他当时确曾是一位出色的人材。

佛罗里达之行被取消了。杜鲁门跟手下人说，他每个星期都在想也许下星期就不会那么忙乱了，但实际上下个星期从来都是比前一星期更为忙乱。总是有迫在眉睫的危急情况等着他去处理。华盛顿有许多人都怀疑这是否会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在出现问题时匆忙应付，而不去努力实现重大和明确的目标。

他的声望急速下降。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杜鲁门的支持率从罗斯福去世后几个月内创纪录的87%的高度降到了2月份的63%。

但与此同时杜鲁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有所建树。首先是新成立了中央情报组，该小组是个脱离军队和国务院的文职机构，负责为总统搜集和分析情报资料；其次是指派了赫伯特·胡佛去调查世界粮食危机的情况；另外，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这也是杜鲁门政府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并未像杜鲁门所希望的那样规定充分就业，但这一法案确实授权联邦政府“运用一切切实可行的手段”来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机会”，还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一新的机构来对经济形势及政府计划对经济的影响进行评估。

除此以外，杜鲁门也是建议给予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州的地位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他任命朱利叶斯·克鲁格接替伊克斯的空缺，出任内政部长。克鲁格年富力强，广受尊敬。杜鲁门私下曾略带痛苦若有所思地说，也许他应该再增加几位新的厨房内阁部长，包括：一位通货膨胀部部长，负责说服大家价格无论多高或多低都没关系；一位复古部部长，负责废除使用飞机，重新起用牛车和帆船；一位专栏作家部部长，负责阅读所有专栏文章，并向总统报告如何治理国家；以及一位语义学部部长，负责提供大字眼，并告诉总统何时保持沉默。

据说，总统的麻烦不是因为他过于经常和过于坦率地谈他的见解，而是因为他太想讨人喜欢。太想与所有人都和睦相处，与所有人达成共识。这种做法在参议院或许还能起些作用，但在行政部门则行不通。肯尼思·G·克劳福德在《美国信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白宫里的诸君》的文章，认为杜鲁门是“人人都能成为总统”这一伟大美国神话的证明，但同时也让人大为失望，他“实质上是优柔寡断……实质上是摇摆不定”，太容易照顾到每次争论中的双方。

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劳工纷争期间比平常有更多机会见到杜鲁门，他写道：“杜鲁门实在是太容易同意此时此刻跟他在一起的人的观点，不管那人是谁。”华莱士当时最大的忧虑是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他私下曾向杜鲁门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必须尽一切努力与苏联人和睦相处，华莱士发现杜鲁门居然总是同意他的意见。然而华莱士当时了解到总统也从哈里曼和李海等人那里听到过相反的意见，并且确信杜鲁门在私下也同意这些人的意见。

就李海而言，他认为贝尔纳斯和国务院里的其他人都太爱迁就俄国人。他担心“绥靖姑息”会像当年在慕尼黑一样导致战争。李海在他2月末的一篇日记中记道：“总统似乎认为有必要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来对抗苏联的扩张计划……”

事实上，杜鲁门本人在对苏联人问题上的立场同华盛顿官方或全国上下的立场一样都不尽一致。他确实真心希望与俄国人和睦相处，在这一点上，他同华莱士看法相同，但同时，他也同李海一样坚定地反对绥靖姑息。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应该认为这两种态度是互相矛盾的，他既没有明确的政策，又缺乏长远的目标。他只是在问题发生时去应付，尽量做到耐心、谨慎并保持平衡。但心底里他既不想好战成性，也不想做事软弱。

随后，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篇难得的公开讲演，声称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他号召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增加生产，以“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应付任何不测事件”。根据这一计划，国防物资产量将增至目前的3倍，斯大林还提出“消费品的生产须让位于改进军队装备”。根据他的预测，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对抗将于20世纪50年代爆发，那时美国将会处在另一场萧条的深渊之中。

华盛顿被惊呆了。就连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都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自斯大林决定将军事实力列为其主要目标之日起，美国就只有如法炮制，别无选择。

红军依然驻扎在满洲。俄国守备军不顾已达成的在德国投降后6个月之内撤出的协议，仍驻守在伊朗最北部的省份阿塞拜疆。斯大林发表演讲一周后，即2月16日，从渥太华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个间谍网被侦破，并被指控试图为俄国人窃取原子弹情报，间谍网中还有一名加拿大议员。

1946年3月的第一周，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一篇演说，围绕这篇演说发生的一些事件使杜鲁门在对苏关系上的矛盾心理暴露无遗。尽管杜鲁门后来曾做过一番解释，但当时确实是他支持丘吉尔发表这篇演说的，他事先对演讲的内容也有所了解并且持赞成的态度。

富尔顿小镇位于杰弗逊市以北20英里伸展起伏的农田中，小巧玲珑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即坐落于此。它是一所长老会男子学校，哈里·沃恩在此读书时曾担任校橄榄球队中锋。请丘吉尔到该校发表演说是校长弗兰克·L·麦克鲁尔博士的主意。麦克鲁尔曾专程到华盛顿去找沃恩，沃恩带他见了“老板”。杜鲁门得知此想法后颇感兴趣，立即亲笔在邀请信的下方附了一笔：“这是一所在我的老家密苏里州的很不错的学校，希望你能来发表演讲，我会把你介绍给大家的。顺致问候。”

丘吉尔则在回信中说：“有你的支持，无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听……”

2月，正在佛罗里达度假的丘吉尔飞抵华盛顿与杜鲁门商讨演说的事。根据李海海军上将的记录称：“主题……就是英国同美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进行全面军事合作的必要性。”3月3日，丘吉尔再次从佛罗里达飞抵华盛顿，



同李海在英国大使馆进一步交换了意见。当时，丘吉尔斜躺在床上，抽着一支大雪茄，还不时将烟灰弹在散摊在身边的手稿上。李海没有在演说稿中找到“什么毛病”。

第二天，3月4日，星期一，杜鲁门和丘吉尔由李海、沃恩、查利·罗斯、格雷厄姆上校及其他五六位白宫工作人员陪同乘专列火车赴密苏里州，两位领导人坐在罗斯福的装甲车厢“费迪南·麦哲伦”号内，随行的还有43位记者和摄影师。杜鲁门的高昂情绪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高兴这次旅行有这么多人陪同，还把全世界最有名的演说家丘吉尔请到他老家所在的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院去演讲。他的情绪感染了大家，丘吉尔背诵了惠蒂埃的《巴尔巴拉·弗里奇》，还在晚饭前喝了五大杯威士忌。

稍后，丘吉尔在牌桌上问杜鲁门：“总统先生，我想打牌时我可以叫你哈里吧？”

杜鲁门答道：“可以，温斯顿。”

夜色越来越深，丘吉尔装出一副不会打牌的样子，问道：“哈里，同花顺有什么用？”“哈里，我想我要在这两三张钩（“J”牌）上赌一个先令。”令大家好不开心。

他像个孩子似地喜欢打牌（查利·罗斯写道），他好像还没掌握用百搭牌代替爱司（“A”牌），作五张顺子或同花的要领。因此在他建议之下我们把百搭牌变成了全百搭打法，我们还玩了五张顺子牌。总统和我们本想再玩一些百搭的牌，但首相认为这样会搞得太乱。格雷厄姆是当晚最大的赢家。

次日凌晨两点半许，一手牌刚打到一半，丘吉尔放下手中的牌，神往地说，希望下辈子能生活在美国，虽然他对美国的一些习惯感到叹惜，有人问他是什么习惯，他答道：“你们吃饭时不喝酒。”

次日即3月5日星期二上午，火车正沿密苏里河畔全速行驶，丘吉尔对他的演说词做了最后的几处改动，随后便油印出来散发给了车上的人。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演说。杜鲁门在读完演说词复本后告诉丘吉尔说他这次演说会“大有益处”，而且肯定会“引起轰动”。

杜鲁门指着车厢墙壁上的总统印记对丘吉尔解释说，他已把鹰的头部转向橄榄枝一边，丘吉尔则说他觉得鹰的头部应当放在一门旋转炮上。

富尔顿小镇的环境氛围和欢迎场面，一如杜鲁门所期望的。那天阳光灿烂，气温在华氏60多度，整个小镇装扮一新，全然是他心目中的密苏里州的样子。这才是他最为熟悉的美国，也是他想让丘吉尔看到的美国。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许多是从周围地区赶来的，他们站在红砖大道两旁向徐徐驶过的车队欢呼致意。在学院附近的街角处，一群足蹬老式高筒鞋的老先生拄着拐杖站在侧石上，挥动彩色气球向车队致意，他们身后是几名身着制服的水兵。

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校园也同整个小镇一样挂满了英国和美国国旗。在麦克鲁尔院长家用过午餐之后，学究气十足的一队人马出发前往学校体育馆，丘吉尔身着鲜红色礼袍，头戴黑色长毛绒牛津方帽，在队伍中尤其引人注目。

在开场白中，杜鲁门说他是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才结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自那时起，他对这二人越来越喜欢。他称丘吉尔为当今最杰出的人士之一，

随后说道：“我知道他会向世界发表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丘吉尔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一位以私人身份进行访问的人能够被美国总统引见给学术界的听众实属荣幸，也是几乎不多见的。

总统不顾公务繁忙、责任繁重、事务繁多——这些都是不经请求而来的，但他从不畏缩——不远千里来参加今天的聚会，给我们增添了不少尊严和光彩，也使我有机会向我们的同宗以及我在大洋彼岸的同胞，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发表演说。

总统刚才说我有充分的自由把我在当前这个充满焦虑和困惑的年代中自己的真实想法如实地告诉大家，这是他的希望，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希望。因此，我一定会利用这一自由权利……

他说，他对俄国人民和他战时的同志斯大林元帅怀有崇高的敬意。“我们欢迎俄国获得它成为世界首要国家一员的合法地位。我们欢迎它的旗帜在海上飘扬。我们尤其欢迎俄国人民同我们大西洋两岸人民间的接触更加频繁不断，日益增加。”丘吉尔又说，然而，他有责任列举“一些事实”。于是，他开始进入他演说的另一部分，这就是后来引起轰动的那段话，丘吉尔在这段话中以其特有的鲜明的戏剧性的方式强调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一道“铁幕”已笼罩在东欧。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已笼罩了整个大陆。铁幕的后面是中欧和东欧所有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及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周围的人口都处于我所必须称的苏联范围之内，它们都在不同的形式上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来自莫斯科的非常强大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程度越来越厉害的控制……

苏联人并不希望战争，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和他们的势力和信条的无限扩张。需要作出的回应是，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讲英语的英国和美国结成联盟。因为丘吉尔了解俄国人，俄国人最为崇尚的莫过于力量，最不怎么尊敬的莫过于软弱，尤其是军事上的软弱。

从杜鲁门脸上的表情和他好几次的鼓掌当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是赞同丘吉尔的观点的，台下的听众亦是如此。

然而，美国上下对此的直接反应却是强烈反对。一篇篇社论指责丘吉尔破坏了美苏之间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不需要同任何其他国家结盟。《民族》周刊称杜鲁门老是把自己与这件事联系起来是愚蠢之至。沃尔特·李普曼则把丘吉尔的这次演说称为“几乎是灾难性的大错”。在莫斯科，斯大林抨击这是对苏联的“宣战”。

面对如此众多的批评，杜鲁门惊呆了。回到华盛顿后，他立即开始开脱责任。他对记者们说他从未得知丘吉尔要讲什么，还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度，丘吉尔完全有权利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讲。在亨利·华莱士看来，杜鲁门也同样不够诚实，因为他坚持说事先并未看到过演说稿，还称丘吉尔使他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当记者们追问他对丘吉尔演说的看法时，他本有时间思考

一下，却笨拙地答道：“无可置评。”

为了安抚斯大林，杜鲁门还专门写信给斯大林，提出他可以用“密苏里”号把斯大林接到美国来，并许诺将陪同他前往密苏里大学，这样斯大林就可以像丘吉尔一样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斯大林谢绝了这一邀请。

这段时期杜鲁门日子很不好过。新闻界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觉得他头脑混乱，态度暧昧，不能制订明确积极的对苏政策。政府中那些被认为是了解内情的人对局势也同样不甚明了。但同时，杜鲁门一面对丘吉尔的演说拒绝承担责任，一面还对埃夫里尔·哈里曼说，苏联人拒绝从伊朗撤军可能意味着战争。哈里曼已辞去驻苏大使职务，现在在杜鲁门的恳求下即将担任驻英大使。他对丘吉尔的讲话极为赞同，在这一点上他同李海、福雷斯特、迪安·艾奇逊等人不谋而合。而这些人则同哈里曼一样满心希望能得到总统强有力的赞同，并责怪贝尔纳斯，认为他在同苏联人打交道方面是个过于妥协的政客。

美国驻苏使馆代办、具学者风度的乔治·凯南发回一封 8000 字的电报，也就是不久以后人们所称的“长篇电报”。凯南在电报中力图打消政府可能会有的同斯大林政权进行公平交往的任何念头。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的看法是神经质的，其核心是俄国人世代以来的不安全感。因此，苏联当局“狂热地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从长远观点看，不可能与美国“和平共处”，而且“对它来说值得想望和必须做的是瓦解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威”。凯南接着写道，剥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遮羞布”后，苏联人只是站在历史面前的“一长串残酷成性、挥霍无度的俄国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代。这些俄国统治者为了保证其国内脆弱政权的外部安全，冷酷无情地迫使自己的国家不断扩增军力。

他强调，然而苏联政权对“武力的逻辑”极为敏感，因此在遇到强大力量时通常会退避三舍。

国务院在丘吉尔演说的两个星期前的 2 月份就收到了这封电报。哈里曼也给福雷斯特抄送了一份，福雷斯特看后觉得凯南的论点十分重要，便将电报油印出来，散发给政府中所有的人，几乎每个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人员都有一份，杜鲁门也看到了。但是，这份电报虽然将会产生重大的长远影响，却不是人们有时描绘的——不是白宫里所说的那种能立刻激励人心的文件。特别是对杜鲁门本人来说，这份电报似乎并未产生深刻的或直接的影响，原因很可能是哈里曼已经跟他讲了不少这方面的事，包括一年前他们初次见面时哈里曼就曾谈到过“对欧洲的野蛮入侵”。不管怎样，无论是听了谁的话，杜鲁门都没有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

在 3 月 22 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杜鲁门说他得知海军邀请了约 60 位国会议员去观看不久将在太平洋上小小的比基尼环礁岛进行的一系列原子弹试验，感到非常吃惊。杜鲁门表示，7 月 1 日之后有多少人去参观他不管，而在此之前国会还有公务需要处理。贝尔纳斯则怀疑进行这些试验是否明智，把它们称为“此时极不明智之举”，并警告说这会损害同苏联人的关系。负责这次行动的海军中将军威廉·布兰迪汇报说已经指派了 3.7 万人参加此次试验。杜鲁门认为“此时此地”需要作出决断，话音未落，贝尔纳斯表示他个人倾向于不进行试验；如非进行不可的话也是越晚越好。华莱士表示赞同。杜鲁门提出如果取消这些试验就会浪费 1 亿美元。他决定将试验推迟至夏天。

第二天晚上，查利·罗斯来到了总统在白宫的住所，与杜鲁门商议宣布推迟试验声明的事。罗斯后来写道：“他当时正在书房工作……杜鲁门夫人不在，他在等着玛格丽特进来。我们一起喝了一杯酒，他好像很孤独。”杜鲁门很信任地对罗斯说，他对俄国的担心不像多数其他人那样厉害。

当记者们问及杜鲁门是否同意哈里曼的俄国威胁论的观点时，杜鲁门答道：“我对此无可奉告。”他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那种亲密无间的轻松气氛已被更为谨慎和紧张的氛围所代替。杜鲁门的姐姐玛丽·简前一年来白宫小住时曾参加过几次他的记者招待会，并以此为乐。她描绘说当时记者们“连珠炮似地”提出问题，而杜鲁门又能迅速给予答复，使她感到非常精彩，“我总觉得他们好像根本没有给他留出什么时间，而且他们全部从中得到很大的刺激”。大家似乎一直很开心。她记得：“他们偶尔还会向他提出带有几分自作聪明的问题，但……（他）也总能作出同样自作聪明的答复。”然而现在，他却在极力避免给予自作聪明的答复。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越来越多地听从罗斯和其他手下人的劝告而答之以“无可奉告”、“你的猜测跟我的差不多”或“船到桥头自然直”。

4月1日愚人节那天，联合矿工工会的约翰·L·刘易斯号召举行全国性的煤矿工人罢工。对于数十万矿工来说，刘易斯简直是一位过去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领袖。有一次，刘易斯对矿工们说：“我为你们的案子辩护时的声调绝不是那种乞丐请求施舍时的颤抖之音，而是一支强大军队的指挥官雷鸣般的怒吼，我们要求的是自由人应当得到的权利。”不难理解，矿工们对他的忠诚是坚定不渝的。他号召他们罢工，他们就罢工。在以后的几周里，正值杜鲁门就任总统一周年的时候，报章杂志上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称赞杜鲁门作为当今总统的表现。而杜鲁门每天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浏览四至五份早报，平常也经常阅读五六种杂志，想必这些文章他都看到了。

《星期六晚邮报》宽厚地指出，也许每位总统都要经历惨痛的过程（杜鲁门可能还会加上一句，这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学习任何事情的必要之路）。伯特·安德鲁斯和杰克·斯梯尔这两位记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总统的职能能否不断地扩大。“新政派依旧心情不畅，保守派吹毛求疵，中间派则摇摆不定。他们都发现很难确定杜鲁门前进的方向。”

诺埃尔·F·布希在《生活》杂志上撰文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经常不断地发现总统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品质。杜鲁门在向来宾介绍总统游艇时，总会一一指出艇内的休息室、游廊和客房，然后说道，“这一间是总统的套房”，就好像总统不在船上，他自己只是一名助手或导游而已。

这些话（布希写道）可被视为老练或谦恭的表现，也许两者兼有。若将其同杜鲁门许多其他言行特点联系起来看的话，它们也表明他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不愿甚至不能把自己当总统看待的奇特品质。

而对于《生活》杂志的姊妹刊物、更明显地持共和党观点的《时代》周刊的编辑们来说，现在已十分清楚，杜鲁门是一个平庸之人，总统的职位对他来说太大了。

当时华盛顿流行的一句俏皮话就是“我对哈里没脾气。”还有一则笑话，

称杜鲁门是皮尔斯以来最软弱的总统，听的人该问：“皮尔斯做过什么了？”讲笑话的人则会喊道：“对啦，这就是要害！”

俄亥俄州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的妻子更是创造了这样一句名言，“犯错误杜鲁门难免。”

然而，也有一些观察家并不急于摒弃他。《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阿瑟·克罗克写道：“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惊人的领导力，很少称得上学识，也并无深邃之处，然而却很出色、很有人情味和勇气，其判断力是出众的……”

### 3

即便没有煤矿工人罢工，这段时期也早已被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代价最为惨重的工潮所围困。有一段时间，罢工人数达到了100多万。尽管在钢铁工业界使经济受到至今最大削弱的停工此时已经平息，但解决的办法却不仅是同意增加工资，还要提高钢材价格，这一切无疑都会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对钢铁工人罢工的解决办法也丝毫未能改善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杜鲁门甚至未等听取自己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的汇报就提出将钢铁工人的小时工资提高18.5美分。这样一来，增加18.5美分就成了各行各业工人的要求。

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拖长了。自约翰·L·刘易斯将自己的工人从煤矿撤出那天起，各大工业都受了影响。没有煤，钢铁厂再次封炉，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被迫关闭。货物运输量减少了75%。在芝加哥市，电力的使用量奉命减少了一半。

刘易斯此次的问题是建议设立矿工福利基金，其资金来源为每生产一吨煤抽取5%的矿区使用费。但是杜鲁门十分讨厌个子高大笨拙的刘易斯，对其在杜鲁门委员会面前的喧嚣和傲慢以及在战争期间发动罢工一事记忆犹新。杜鲁门在私下里曾想若是罗斯福把刘易斯当作卖国贼枪毙了都会是名正言顺的。当杜鲁门表明他为拟议中的福利基金的合法性担忧时，刘易斯答道：“杜鲁门懂得什么叫合法性吗？”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日益加剧的全国铁路工人罢工的威胁，似乎无人能正视或防止这一灾难，一旦发生，将把杜鲁门暴露得比其整个总统任期内除少数几个事件外的全部事件所暴露的还要淋漓尽致。

杜鲁门发表的几篇公开声明都极为克制。表面上，他十分克制，毫无惊慌失措之感，全然一副和蔼可亲、兴高采烈的样子，双排扣西装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步伐轻快有力，厚厚的镜片后透出的是充满警觉活力的目光。他仍有时间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他称之为“顾客”，也总是有时间称赞或感谢比起往常来此时需要加班加点的部下。他很少忘记午饭后半小时的小睡，很少推掉指望他能加的各种礼节性活动，而且不管是什么场合，他总是显得很快乐，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压在他的心上。5月初的《时代》周刊称他面对接连不断的危机浪潮，就像一位在激浪中“轻快”浮动的游泳者。“在适逢他62岁生日的那一周内显然没有什么事能让他烦心。”

只是偶尔才见得到他发一阵与以往有几分不同的脾气。一位白宫常驻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问，为什么他们没有事先得到要召开内阁会议的通知，杜鲁门厉声说：“我想什么时候举行内阁会议就什么时候举行，没必要

告诉你……”在他每日约见单上的随笔中现在也开始出现对所有人的尖刻毁损之词，其中也包括他在参议院的老朋友们，如他将伯顿·惠勒归为“没骨气的自由派”一类，还将他最近选定的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伯纳德·巴鲁克描述为想“统治世界、月球或许还有木星”的人。

在心灵深处，杜鲁门极端沮丧，一肚子怨气和愤怒。他已被各种批评指责弄得很不愉快，那些并非由他造成的危机，那些他认为不为国家着想只关心自己私利的人也使他极其厌倦。不久前，他在给母亲的信中称“大富豪和大工会的权力都太大了——他们都将招致失败，因为哪一边我都不喜欢。”自那时起，他的心情却变得越来越糟了。

煤矿工人罢工后紧接着发生了铁路工人罢工，这意味着难以想象的灾难，使全国各地陷于瘫痪。铁路资方同 20 个不同铁路工会间的谈判已持续了数月，劳工部长施威尔伦巴赫作为杜鲁门指派的调解人在其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尽管有约翰·R·斯蒂尔曼的协助。斯蒂尔曼是白宫工作人员中的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新成员，劳工问题专家，当过经济学教授。他身材魁梧，好交朋友，嘴里总是嚼着口香糖。工会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杜鲁门求助于规定有 6 天调解期的铁路劳工法案，下令推迟罢工。4 月，谈判破裂，劳方定于 5 月 18 日举行罢工。随即又举行了多轮谈判，斯蒂尔曼现在接替了施威尔伦巴赫成为杜鲁门的主要代表参加了谈判，并显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在 20 个卷入罢工的工会中，除 2 个工会外，其余都愿达成和解。

但问题在于这两个拒不合作者正是两个主要的工会。令杜鲁门十分恼火的是这两个工会的领导人皆为他旧时的伙伴，一位是铁路乘务员兄弟会主席 A·F·惠特尼，另一位是机车司机兄弟会主席阿万利·约翰斯顿。正是这两个人在 1940 年杜鲁门竞选参议员时在他“最需帮助的时刻”，在没有人愿意支持他时支持了他，为他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最大部分的资金。此外，1944 年在芝加哥他们曾为使杜鲁门成为罗斯福的竞选伙伴而积极工作过。

惠特尼和约翰斯顿这两位经验丰富的斗士都已年过七旬，满头白发，其中的惠特尼杜鲁门最为了解和赏识，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因为他代表了全国 1145 个“分会”的 20 多万名乘务员。约翰斯顿看上去活像漫画家画的工会头子，腰围大得使他西装上衣的扣子都难以扣上，他代表 8 万名机车司机讲话。只要他们二人一齐行动，他们就能使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每一条铁路——全国的客运和货运——都陷于瘫痪，而且似乎谁都对此无能为力。

煤矿工人罢工仍在继续。约翰·I·刘易斯这位身材魁梧、表情夸张的家伙在一顶宽边黑色软呢帽下的总是一幅阴沉的脸，此时，他经常出入千白宫的西侧楼，每次进出时他为了让记者们拍照总是故意放慢脚步，缓然而行，他心里很明白自己现在是大家关注的中心。5 月 13 日，刘易斯同意暂停罢 112 天，但数日后煤矿劳资谈判破裂，杜鲁门向记者们读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宣称国家已真正处于“危急关头”。

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杜鲁门向大家征求处理罢工问题的建设性意见，竟没有人能够提出任何建议。

5 月 17 日，也就是离计划中的铁路工人罢工仅剩 7 天的时候，杜鲁门把惠特尼和约翰斯顿召唤到他的办公室，惠特尼说他们不得不进行罢工，“这是我们的人的要求”。

杜鲁门在椅子上向前挪动了一下，答道：“那好吧，我要加快速度了。”

说罢，他在这两人注视着的情况下签发了一项行政命令，决定由政府收回并经营铁路，该命令自次日起生效。

18日星期六，该命令颁布后不到24小时，这两位工会领袖表示同意再将罢工推迟五天。

星期日，各方的忧虑感都在不断加剧，杜鲁门却飞往堪萨斯城，据称是前去接受名不见经传的位于靠近密苏里州自由城的威廉·朱厄尔学院授予的荣誉学位，同时他也是想去看望一下他的母亲。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和维维安终于把他在蓝岭上的故居从县里买了回来，他的母亲十分钟爱这片农场，纵然由于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她不可能搬回去住（她和玛丽·简继续住在格兰德维厄的一幢黄色小木板房里，1940年后她们一直住在那儿）。

杜鲁门在与密苏里的好友们交谈中总是将华盛顿嘲笑为“那个地方”，在向威廉·朱厄尔学院毕业班学生讲话时杜鲁门称，没有拥护者，领袖一钱不值。他在这次没有讲稿的讲话中还说，国家需要的是愿意工作的人。

我们的社会组织严密，一旦其中一个轮牙停转，整个结构便会松动。我现在呼吁大家：同心协力，到队伍中来，做一点事情；努力使美国从今开始成为：和平时期的世界领袖，就如同它曾是战争时期的世界领袖一样。我强烈要求你们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作者。

驻白宫记者中有一位在此次旅行中随杜鲁门同行，他就是《纽约时报》的小费利克斯·贝莱尔。他问杜鲁门的医生格雷厄姆上校总统是不是工作太辛苦了，格雷厄姆点头称是，并强调对此谁也无能为力。格雷厄姆说：“他就是这样。我曾想用一点实用心理学帮他一下，但你知道总统本人心理学学得很好。他对工作尽心尽力，他也知道既然这样担心也没用。”

但是杜鲁门在独立城的两位老朋友却不这么看。一位是罗杰·塞尔蒙市长，另一位是杜鲁门的邻居、绸缎呢绒织物商亨利·邦休。他们让贝莱尔注意总统的脾气。他可能是一位“随和的人”，但他同时也不容人们小视他。贝莱尔同塞尔蒙和邦休进行了交谈，这二人都说他们宁愿与三四个普通人为敌也不愿与一个像哈里这样的人为敌。贝莱尔后来写道：“当哈里·杜鲁门体内流淌的肯塔基祖先好斗的血液占上风时，他是个碰不得的人。”

在贝莱尔看来，总统已变得越发魅力无穷，并不像他以前认为的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一点有些人早就了解了而且津津乐道。40年后，杜鲁门的侄子、维维安的次子J·C·杜鲁门在独立城被一位游客问及除了众所周知的事情外他将如何描述他的哈里伯伯时，他想了好半天说：“复杂！”

铁路罢工五天推迟期的第三天，即星期二，布朗克斯区的埃德·弗林飞往华盛顿，为的是想知道他是否能促使惠特尼和约翰斯顿改变主意，但没有成功。似乎一切都无济于事，看来不会再有妥协。星期三，杜鲁门下令收回煤矿，并提议将铁路工人的小时工资增加18.5美分——这一次又高于他的紧急事实调查委员会所建议的幅度——但惠特尼和约翰斯顿仍“对此建议持反对意见”。到5月23日星期四罢工计划于华盛顿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那一天，白宫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这两位工会领袖被再次召见，同时被召见的还有代表资方的官员。他们

被安排到不同的房间继续进行讨价还价，约翰·斯蒂尔曼则在他们中间来回穿梭。当惠特尼和约翰斯顿再次拒绝杜鲁门的提议时，斯蒂尔曼告诉他们根本不能对总统说不，坚持说这样就是行不通的。他们的回答则是不管怎样谁也不会在意这位总统的。

埃本·艾尔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铁路工人罢工推迟后的第五天……它成了战后白宫最为混乱的日子中的一天。”

门厅里挤满了新闻记者，气氛紧张而又激动。总统依旧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并不时与斯蒂尔曼、约翰·斯奈德和施威尔伦巴赫等人会面……全天都是如此。下午早些时候，总统下令让负责公务餐厅的黑人差使约翰·皮耶去准备一些三明治，……这些三明治全都送给了谈判铁路罢工的人。我没出去吃午饭，我的秘书们也没有。

那天，贝尔纳斯国务卿还偷偷到我办公室来过一次，所以新闻记者们不知道他的来访。他说他同惠特尼和约翰斯顿争论了一番，并向他们指出了在这一时刻举行铁路总罢工给我们的国际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

下午约4点钟，离罢工开始仅剩一个小时了。杜鲁门走出办公室到南草坪为近900名正在沃尔特·里德和附近其他几所军队医院疗养的退伍军人举行招待会，这些人当中有的已被截肢，有的伤残过重，只能拄着拐杖、坐着轮椅在被接见行列中缓缓前行，身旁还有穿着浆硬白色制服的护士照料。这种为住院退伍军人举行的花园聚会自1919年以来每年5月都在白宫举行一次，已成为一个传统，只是在战时中断过。几周前，杜鲁门要求恢复这一传统。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阳光明媚，天空湛蓝，鲜花盛开，气候怕人。参加聚会的还有几位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夫人，以及尼米兹海军上将和布莱德雷将军。海军军乐队奏乐助兴，侍者端上了草莓冰淇淋和柠檬香甜混合饮料。杜鲁门在1个多小时的聚会中不时热情地向他的客人致意，客人们都身穿制服，佩戴着他们的战役勋表。

每次见到受伤的退伍军人，杜鲁门都会感动不已。这次，他更为目睹这一场景和鲜明的对比所震撼。眼前是这些为自己的国家做出重大牺牲的可爱的年轻人，他们对能受到总统接见是那么高兴，而此时白宫里却坐着两位好争论的老工会头子。杜鲁门不断地微笑着，同退伍军人们聊天，拍着他们的肩膀，问他们老家是什么地方，他想尽一切努力让他们玩得开心些。

只有一次人们看到他回头朝内阁会议室的方向瞥了一眼，柱廊下会议室的长条落地窗还开着。人们传播着关于谈判进展的传闻，一位坐在轮椅里的战士说：“把所有的罢工者都征集去当兵——全部都去。”另一位则称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总统。杜鲁门喝了一杯香甜混合饮料，此时，乐队开始演奏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他走到乐队旁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用脚打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打拍子，同时吃了满满一盘冰淇淋。此时已大大超过5点钟，罢工已经开始了。

在此之前，还从未发生过铁路工人全体罢工的事情。顷刻间，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处于停顿状态。平时投入运营的2.4万列货车中继续行驶的不到



300列，17.5万列客车中只有100列还在运行。在纽约和芝加哥，高峰时刻搭乘往来于郊区和市区的短途列车上下班的旅客被滞留在车站。在西部，横贯全美国的“流线型火车”纷纷停驶，把乘客们撂在了沙漠中央的一个个小站上。

到处都是令人心碎的景象（《新闻周刊》报道说）：一位芝加哥妇女未能前往明尼苏达州父亲的临终床前；一位13岁的亚利桑那州男孩被困在了去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紧急脑部手术的路上；一位妇女守护丈夫的遗体到克利夫兰举行葬礼，被困在了路上。还有一些不太痛苦的场景：开往旧金山的费城交响乐团专列被乘务人员丢下不管；各种球类俱乐部旺季征战赛事遇到了阻碍；马戏团本计划去费城演出，却被迫在波士顿进行了一次额外的人间最大的演出。全国各地都有被滞留的旅客，其中有些人不愿睡在旅馆地下室或军工厂内支起的应急行军床上，而纷纷改乘公共汽车、飞机、出租车，有的则搭别人的便车。华盛顿的出租车大发其财：乘车到波士顿一趟他们收费150美元，到亚特兰大收100美元。

新闻摄影记者们纷纷拍下这样一些镜头：成百上千的货车一动不动地停在调车场内，一望无际，满载煤炭的列车闲置一旁，各大城市火车站内行李堆了一人多高。

有些报道称堪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生菜和水果时运不济，正在腐烂。华盛顿官员称在欧洲如果粮食装运停顿两周，数十万人就会挨饿。全国各地爆发了抢购食品和汽油的恐慌风潮。所有的人、所有的社区无不深受其害。

一封封电报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往白宫，且都直言不讳：

纽约开出的各次列车均已取消，现在又会发生什么事？……

孵化场（在密苏里州亨利县）每周孵化小鸡数以百万计，若不  
在孵化后随即由铁路运出，损失惨重……

若此罢工持续下去农业区（加州科宁）将毁于一旦……

总统先生，紧急关头已到。谁将统治我们的国家？是合法组成的  
当局抑或各个单独的国内集团？

请始终忘掉自私的政治，而记住工会领袖之外的其他人需要生  
存，需要吃饭。他们也投票……

现任总统是否对铁路罢工无能为力？若是，他应辞职……

民族危机当头，你为何不继续前进并采取行动？你是我们的领  
导人……

只有立即采取行动才能解救我们的国家……

少说多做……

别玩政治游戏了……

是强硬的时候了……

恭请起而应付这一态势……

杜鲁门已忍无可忍。他独自坐在白宫楼上他的办公桌前，在一个小学生

用的那种廉价小横格本上开始写起来。他正在起草一篇讲话，他并不想要发表讲话，而是他极需将心中的烦恼一吐为快。这是他的又一次“手写痉挛”，而且是最糟糕的一次。

他写了整整7页，把过去几周压抑在心头的怒火、被南草坪上受伤士兵唤起的情绪、受到老朋友惠特尼和约翰斯顿背叛的感觉——他感觉到他们藐视最高当局，更不用说小看他个人了——以及他所有的顽固的自尊心，都一股脑儿地倾注于笔端，成为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所曾写过的最为放肆的文件之一。就好像在他平常公正、自制、天生热心肠的深处某个地方始终存在着一种粗鄙的、丑陋的、古老的天生的气质，如同被处以私刑的边疆暴民的哀鸣一样，必须要发泄出来。或许他是在那天深夜精疲力竭的状态下写就这篇讲话的，也有可能是威士忌起了一部分作用，不得而知。这篇“讲话”也有可能是在第二天早晨的冷光写成的，若真如此，就更令人震惊了。

在讲话一开始，他写道，根据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他要号召志愿军来维护宪法。然后他又以几页的篇幅对宪法和美国在赢得战争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大加赞扬一番，接着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在国内，我们这些胸怀国家安康的人没日没夜地工作，但有些人白天黑夜都不做事，有些人还试图全盘破坏为战争付出的辛劳。我比谁都清楚这一点。约翰·刘易斯在战时为满足他的自我发起了两次罢工，这两次罢工比从背后射向我们战士的子弹还要恶劣，他是把枪口对准了政府的脑袋。铁路行业的那些工会也干了同样的勾当。他们这些人得到的报酬是面对敌人炮火的前线战士的4倍至40倍，而那些无能的工会领袖们的收入相当于你们总统净薪金的5倍到10倍。

正是这些工会领袖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对你们的总统说他们会百分之百地同他合作，使国家恢复到和平时期的生产。他们全对他撒了谎。

首先来的是似将发生的汽车工人罢工，你们的总统求助于立法机关对形势进行评估，使之平息下来。但缺乏决断力的国会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去通过这一议案。

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们来了个歇斯底里大发作，国会得了工会恐慌症。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随后便有了电业工人罢工，钢铁工人罢工，煤矿工人罢工，现在又有铁路瘫痪。每一位罢工者和他们蛊惑人心的领袖们都一直过着豪华的生活，在他们高兴工作时才工作……

政府遭到的蔑视、诋毁和歪曲已使我非常厌倦。现在我要求你们，我的战友们，就像我25年前一样曾为挽救国家而英勇奋战的人们，同我一道消灭刘易斯们、惠特尼们、约翰斯顿们以及共产党人布里奇们（海员工会领袖）、俄裔参众议员们，使我们的政府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我不考虑刘易斯和惠特尼，也不考虑华尔街那一伙人。

让我们把国家交还给人民，让我们重新恢复交通和生产，绞死一小撮卖国贼，使我们自己的国家因民主而得以稳定，告诉俄国人何处该悬崖勒马，使联合国起到应有的作用。来吧，小伙子们，让

我们干起来吧。

文中充满了狂热的爱国主义，其不确实之处更是荒唐可笑。铁路工人的工资并不是一名战士军饷的40倍，工会领袖们的工资也比杜鲁门每年拿到的7.5万美元要少，而不是更多，将惠特尼、约翰斯顿、约翰·L·刘易斯等称为“无能之辈”更是让人笑掉大牙。他在计算自他1918年参战至今的时间时甚至连算术都不会了。

然而，这篇讲话却十分准确地反映出他强烈的怒气和拨乱反正的决心。

5月24日，星期五，上午召开了二次内阁特别会议，杜鲁门踏步走进会场时脸上的表情白宫记者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镜片后蓝灰色的眼睛闪着怒火，嘴角“紧闭成一条细线”，腰板挺得像钢筋一样笔直。《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回忆说：“他以林肯颁布《解放宣言》式的姿态把他们召来不是为了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告诉他们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们以前从未见过杜鲁门这样，但他的手下人当中有些对此了如指掌并极为欣赏。

哈里·沃恩后来说：“他是个强硬的家伙。”这是理解哈里·杜鲁门的关键。

内阁们围坐在桌旁，杜鲁门问他们有无铁路运营方面的建议，没有一个人吭声。

他告诉他们，他第二天将把问题提交国会审议，但在此之前，当天晚上他要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已决定将罢工的铁路工人征召入伍。

随后是一阵发愣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问总统是否超越了宪法允许的范围。杜鲁门对哲学不感兴趣，罢工必须停止。据称他当时答道：“我们先征他们入伍，以后再考虑法律的事。”

他的长达7页的讲话草稿传到了查利·罗斯手里，罗斯读过后以老朋友的身份告诉杜鲁门说这样不行。派人把萨姆·罗森曼找来后又开始起草一篇新的讲话稿。尽管罗森曼、罗斯、约翰·斯奈德及杜鲁门本人都出了力，但主要工作是在杜鲁门的请求下由白宫里正在升起的一颗新星克拉克·克利福德海军上校完成的。克利福德在前一年夏天曾任贾克·瓦达曼的临时助手，后来瓦达曼被解职后他随即成为总统的海军助理。克利福德时年39岁，6英尺多高，宽肩细腰，一头金色鬃发，嗓音男中音般圆润，英俊得活像一位电影明星。他穿上海军制服光彩照人，使人不敢相信他是真的海军；但他遇事冷静，头脑清醒，像职业外交官一样处世圆滑。杜鲁门一眼就认定他才力过人。的确，克利福德在总统班子中一次近乎偶然的露面后来被证明是杜鲁门任内最为侥幸的转机之一。

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我以前从未到过白宫，也从未想过会呆在白宫里。啊，简直是太激动人心了！（起初）做海军助理，并无太多事可做，只是像一株盆栽植物……我第一次到那儿时，头一天，瓦达曼便将我引见给总统，他说：‘杜鲁门总统，这是等级较低的克利福德海军中尉，他来照料我的办公室。’杜鲁门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好大的块儿头啊！’”

克利福德是在圣路易斯市西端高级住宅区内长大的。他父亲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级职员，母亲是位讲师，著有多部儿童读物。以其名字命名的舅舅克拉克·麦克亚当斯曾是《圣路易斯邮报》一位出色的社论版编辑。

克利福德曾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获法学学位。战前，他曾是圣路易斯市一位非常成功的出庭律师，那时，他刚三十出头。

数年之后克利福德谈及他对总统的印象时说：“我觉得他确实对来自那个地区并在那个地区受教育的人有亲近之感，而且说的和做的几乎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不能确定他是否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确是如此。”但是，克利福德同杜鲁门周围的其他密苏里人并无类似之处。他是新一代的人，即使对政府批评得最尖锐的人都承认，他办事方式截然不同。华盛顿记者罗伯特·S·阿伦和威廉·V·香农写了一本名为《杜鲁门旋转木马》的十分苛求的书，书中称“克利福德在杜鲁门周围的人中一枝独秀，他具有佼佼者所应具备的头脑、个人活力和在某一行业中水平最高者所需要的处世手腕。”他们断定克利福德“确实是白宫级的人物”。

克利福德在来到白宫之前，对杜鲁门一无所知，也无特别兴趣，但当他来到白宫后即刻发现自己已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被这个人所深深打动，并愿意为之效劳。他写信给母亲说：“总统才智过人，为人直率，通情达理。我对他的好感越来越深，越来越持久，我希望并且相信我能对他有一点点的帮助……”

24日傍晚，克利福德全身心地投入交派给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他一个人坐在内阁会议室内擦得锃亮的长桌旁，开始了他今后将经常做的工作，靠一枝软铅笔和一本黄色标准拍纸簿“划拉出东西来”。尽管克利福德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强的能力，但他写起东西来远不如萨姆·罗森曼那样流畅，那么充满灵感。他自己也承认，笔头不好。但他认认真真地工作，写呀擦呀，一句话写了一遍又一遍，努力地往下写。他是5点钟开始写的，8点钟草稿完成。这时，总统办公室内已有十几个人等着参加对草稿的修改。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修改都还在进行之中。当杜鲁门开始广播发表讲话时，他的秘书罗斯·康韦仍在打讲话稿的最后几页。

同时，杜鲁门自己写在横格便纸条上的观点已被克利福德收藏进他的档案，直到20年后才予公开。

杜鲁门在东部时间10点开始发表全国讲话。那天，玛格丽特到纽约与她的朋友、约翰·斯奈德的女儿德露西·斯奈德一起去看戏，由于铁路工人罢工，她不得不借了一辆车开回华盛顿，一路上交通十分拥挤，等她到达白宫时，刚好是她父亲的广播讲话即将开始的时候。事后她回忆说，父亲当时看起来同她一样疲惫。

杜鲁门说道：“今晚，我在这紧要危机的关头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珍珠港的危机是外国敌人的行动造成的，而现在我们面临的危机则是由国内一小撮人引起的，他们将自己的私人利益置于国族福祉之上。”

他声音坚定、极为严肃地说现在是“开诚布公的时候了”，劳资双方并无争夺，正在进行的是两个固执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的争夺。

我是劳工的朋友……（但）在我们民主国家中某两个人竟然处于能够完全扼杀我们的经济乃至最终毁坏我们国家的地位则是不可思议的。

他呼吁正在罢工的铁路工人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去履行对自己国家的义务，并警告说，若在次日下午4时前没有足够数量的人返回工作岗位，他将

调集军队采取其他一切必要措施中止罢工。

他并没有提及将罢工者征召入伍的事，此事将留待他第二天下午向国会讲话中提出。

那天夜里，萨姆·罗森曼在彻夜未眠地准备向国会发表的讲话，他反对将铁路工人征召入伍这一主张。司法部长克拉克此时也将其忧虑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征兵法不允许征召职业群体入伍，因此，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中是否包括为国家的目的而征召个人入伍值得怀疑。”吉米·贝尔纳斯也强烈反对这一主张。然而，杜鲁门丝毫不为所动。

有关向国会讲话的会议星期六上午在杜鲁门的办公室里举行。与此同时，约翰·斯蒂尔曼急匆匆地赶往斯塔特勒饭店惠特尼和约翰斯顿的套房，决意要做最后一次努力。杜鲁门定于下午4点向国会发表讲话。

3点钟，讲话稿已基本修改完毕，这时，斯蒂尔曼从饭店中打电话来说他取得了进展，罢工问题有可能在一小时之内解决。

罗森曼和克利福德来到内阁会议室又写了三四页备用稿。3点35分，斯蒂尔曼又打电话来，告知形势依然未得到解决，此时杜鲁门已在前往国会大厦的路上。克利福德赶忙拿起手中的备用稿，一路小跑去追赶总统的汽车。

那天又是天晴日丽，暖如夏季，众议院会议厅内坐满了人，虽然开着空调，许多议员仍在座位上擦着额头的汗。人们可以看到贝丝和玛格丽特在廊台里静静地等候着。

4点钟刚过几分钟，杜鲁门走了进来，表情严厉，全场响起了他当总统以来所受到的最热烈的鼓掌欢呼声。在隔壁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里，克利福德正在电话上再次与斯蒂尔曼发狂般地通话，斯蒂尔曼说问题的解决已“近在咫尺”，他手上有一份手写的书面协议，还需打字和签名。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他说他们已口头同意他们拿到的书面内容，但尚不知他们最终会否签字。”克利福德告诉斯蒂尔曼他将在电话旁听信。

杜鲁门站在讲坛上说：“过去两天来全国一直在被铁路工人罢工控制着，它威胁将使我们的工业、农业、商业及社会生活陷于瘫痪……在这场灾难中我们将无一能够幸免。”针对政府的罢工必须停止，美国的国会和总统必须同心协力——“我们必须加速工作。”

在他身后的记者席上，记者们正紧张地写着新闻稿。《新共和》周刊的理查德·斯特罗特写道：“聚光灯闪烁，照相机噼啪作响，他略带密苏里口音的声音响遍整个美国。”

杜鲁门说，他要求通过“临时紧急”法律来“授权总统将所有参与针对政府的罢工的工人征入美国武装力量”。台下响起了一片赞同声。

就在这时，参议院秘书长莱斯·比弗勒急匆匆地跑进会议厅，将一张红纸条递给杜鲁门，是克利福德写来的。杜鲁门瞟了一眼纸条，又抬起头来。

他说道：“刚刚收到消息，铁路工人罢工问题已在总统所提条件下获得解决！”

全体国会议员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鼓掌，过道两旁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比弗勒的突然进来打断讲话、杜鲁门手中的红纸条、宣布内容的出人意料简直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在场的人中有人怀疑这整个场面都是为追求效果而事先策划好的，实际上不是）。然而，杜鲁门并不想做出戏剧性的行径，他脸上的严峻表情依然如故，并接上他已讲到的地方，继续讲完讲话稿的其余部分，就像不管怎样他都会这么做一样。

总统最近以来似乎经常是不知所措，力不胜任，但此次在情况危急时刻他证明了自己是强硬的和有决断力的，国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反应都是异口同声的赞同。他的“大胆行动”得到了新闻界和两党领袖的称赞。《亚特兰大宪法报》说，他的“民族精神境界提高了”。费城《记录报》称，他已“出色地经受了有史以来美国总统所经历的最严峻的一次勇气的考验”。费利克斯·贝莱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杜鲁门显示了

他可以做到强硬——足够的强硬——只要形势需要。他与乘坐电车的“普通人”……或星期天开车带全家出去的“一般人”并无二致，正如他一直被描述的那样。但现在他也是一位能挺身应付困难的人。

众议院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当晚在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辩论之后，以 306 票对 13 票通过了将罢工者征召入伍的法案。

然而，参议院并不想突然一边倒，主要是因为塔夫脱参议员的坚决要求，他对此议案极为恼怒，并确信它违反了美国法律体系中的每一条准则。民主党这边的自由派对此也有所担忧。克劳德·佩珀说他宁愿放弃参议院的席位也不愿支持这样一项措施。

A·F·惠特尼宣称杜鲁门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纽约麦迪逊广场公园举行的一次欢呼雀跃的劳工集会上叫嚷道：“不可能把得过勋章的职员培养成总统。”人群中打出的标语牌上写着：“打倒杜鲁门”、“与杜鲁门决裂”。他被指责为全国头号罢工破坏者、法西斯、工会运动的叛徒。后来，惠特尼发誓要报仇，宣称假如杜鲁门胆敢在 1948 年出来竞选连任的话，他将不惜动用铁路乘务员兄弟会的所有经费来打败他。

著名自由派人士也对此大为吃惊。西德尼·希尔曼临终时一改他先前的立场，明确表示反对杜鲁门。理查德·斯特劳特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将和平时期罢工的人征召入伍！这是俄国还是德国？”罗斯福夫人也写信给杜鲁门，委婉地说：“千万不能由于我们和平时期形势的困难而滑向军人的思维方式。”

征召罢工者的提议在参议院最终以 70 票对 13 票被否决。塔夫脱和佩珀最初的呼声已发展成为合唱。

但罢工结束了，火车又开始运行了。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杜鲁门展示出了他们期望一位总统恰恰应该具有的骨气。大部分人都觉得他当时别无选择，只是做了自己不得不做的事，并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仍有人在负责。

后来，杜鲁门本人说：“我是美国 1.5 亿人民的公仆，即使毁掉我的政治生涯，我也不得不干。”他没有后悔。

几天后，煤矿工人罢工也结束了。5 月 29 日，约翰·L·刘易斯在白宫与煤矿经营者们见面并签署了新的合同。他为煤矿工人所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小时工资增加 18.5 美分，100 美元的假期补助、每周 5 天工作日的保证以及把每开采一吨煤抽取 5% 的矿区占用费用作福利基金，他似乎不再是引起麻烦的人了。果然，在其他工会领袖继续对杜鲁门大吵大闹时，平素夸夸其谈的刘易斯却令人惊讶地保持了沉默。

对杜鲁门本人来说，这场危机最终为他提供了一个坚守阵地的机会，甚至是采取了攻势，这丝毫也没有损伤他的锐气。还有一点重要的是，这场危

机标志着克拉克·克利福德的崭露头角。几星期后，克利福德出任萨姆·罗森曼曾担任过的总统法律顾问，并几乎一直呆在杜鲁门身边。

4

铁路和煤矿工人罢工问题的解决带给杜鲁门的鼓舞并未持久，不管他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美国人民的什么信任，他似乎都不能把它保持住。6月很快过去了，夏季将尽，新闻界的批评，国会山上的不满仍在继续。很少有顺心的事，贝丝和玛格丽特在酷热的几个月内回独立城去了，杜鲁门发现自己又被孤独所困扰。8月，国会开始了自战前以来第一个真正的休会期，而杜鲁门自己也打算去休假，形势就开始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并最终的风潮结束。随后，9月，他又介入与亨利·华莱士无聊的纠纷之中，使他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位败事有余的人。多年之后，乔治·埃尔西评说道：“华莱士事件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做得妥当，自始至终都处理得极为糟糕。”

6月6日，杜鲁门未经事先通知就宣布了两项重要任命，还满心期望能获得广泛的赞同。他选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接替4月去世的哈伦·斯通出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又任命约翰·斯奈德接替文森。他觉得这两位都才气过人，并无保留地信任他们。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二人是十分不明智的选择，且任命得过于匆忙。人们之所以产生这种印象只能怪杜鲁门自己。宣布任命那天当被问及他何时决定文森的任命时，他厉声道：“大概一个半小时以前。”

文森作为财政部长似乎极为恰当——他为人可靠，知识渊博，且对政府机器有广泛的了解。杜鲁门在参议院时并不十分了解文森，但自那时起，他对文森的敬佩之心大为增加，正如杜鲁门所写：“他是一位忠诚的感情不外露的爱国者，而华盛顿高层人士中很少有人具有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忠诚感。”但人们熟知的更多的是文森的政治洞察力，”而不是他在司法部门的杰出表现。让缺乏个性的斯奈德接替文森只会加强人们对“任人唯亲”的指责。新闻界称斯奈德为“闷闷不乐的圣路易斯小银行家”，似乎很难胜任内阁中的第二最高职务。尤其在自由派和以前的新政派的眼里，选择斯奈德尤为可悲。不赞赏他的记者们将他描绘成“受压抑”的人，“满脸的苦恼和不快活”，还不时毫无顾忌地喝上一大杯波旁威士忌酒，讲上一两个黄色故事。财政保守派们则认为斯奈德充其量可以被称作做事谨慎。事实上，他是十分谨慎和保守，是个每周7天都长时间“苦干的人”。与他外表给人的印象相反，他也是一个充满个人热情的人，虽然他缺乏想象力，但他也同文森一样判断力极强——这也是杜鲁门经常在许多更出色更有魅力的人身上找不到的东西。他的钱包里整整齐齐叠放着丁尼生的诗《洛克斯雷大厅》，其中有一句断言说，“多数人的判断力”——普通众生的判断力——最终会使“烦躁的王国感到敬畏”。

7月在巴黎召开了另一次冗长乏味、言词尖刻的外长理事会会议，贝尔纳斯国务卿同莫洛托夫未能在和平条约谈判中取得很大进展。4月，贝尔纳斯同总统的关系还十分紧张的时候，就私下里告诉杜鲁门他想辞职，理由是健康问题，但杜鲁门青求他至少留任到年底。与此同时，杜鲁门通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秘密通知正在中国的乔治·马歇尔，他想让他在贝尔纳斯离任后出任国务卿一职。

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会巴黎参加会议的范登堡参议员回国后汇报说在德

国问题上“分歧惊人”。俄国同西方之间“疑心甚重”。“俄罗斯问题上有烦恼事，欧洲问题上有烦恼事，中国问题上也有烦恼事。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正逐渐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毛泽东的红军在同蒋介石大元帅的国民党政府军的斗争中正取得节节胜利。杜鲁门在办公室非正式会见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群编辑和行政官员时承认同中国的纠葛“非常、非常糟糕”。

他甚至在他的家乡杰克逊县也有了麻烦。众议院议事规则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人罗杰·C·斯劳特是来自杜鲁门自己选区的一位国会议员，他一直在妨碍公平就业法案问题上的进展，杜鲁门对他十分恼怒，决定不再支持他竞选连任，还虚张声势地把吉姆·彭德格斯特叫到白宫商谈此事。他告诉记者们“如果斯劳特先生是对的话，那我就错了”。他授意彭德格斯特在初选中转而支持另一位候选人伊诺斯·阿克斯特尔，结果使老堪萨斯城组织的一些成员开始采取其惯用的手法，在《堪萨斯市明星报》上引起了一场对于严重违法行为的风暴。8月份第一周，杜鲁门回独立城参加初选投票时发现，《明星报》派一位记者用望远镜对北特拉华大街219号进行监视，以记录下他的一举一动。第二天一早，杜鲁门看到那位记者时，便一五一十地向他详细讲述了他当天早晨到那时为止所做过的事，包括他在浴室中的某些举动。

阿克斯特尔在初选中的胜利被鲍勃·汉尼根欢呼为对总统的信任票。然而，堪萨斯城的记者们发现了投票中作弊的证据，虽然后来经三位联邦法官判定，在选举中只有三处轻微的违规情况，但杜鲁门与此事的牵连显得总不是一件好事，这使人又想起他同彭德格斯特核心组织过去有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人们对他行为是否得当的怀疑了。

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时称那段时间为“沉迷的”夏天。甚至连总统的幢康状况都在下降，他患了耳部感染，已经多年没有犯过的胃痛也复发了，据华莱士·格雷厄姆讲，这是“神经紧张不安状态”所造成的。

查利·罗斯在日记中写道：“显然，他需要从他所处的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尽管他看上去仍很健康。”

杜鲁门在7月31日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写道：“星期二是我有过的最糟糕的一天，每15分钟就要见一个人，商讨一个不同的话题，主持了内阁午餐会，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而毫无结果。今天几乎同样糟糕但又不完全是那样，我去游了泳，这是2月份以来的第一次。”

他对母亲越来越差的健康状况深感忧虑。他写信给贝丝说：“她将不久于人世了，没有办法了……她是对玛丽的一次考验，而那也是没有办法了。”他希望贝丝能对她们二人更耐心些。

贝丝和玛格丽特仍留在独立城，贝丝照顾着自己的母亲，玛格丽特则和一位来自堪萨斯城的声乐教师一起工作。她在一封闲聊家常般的充满深情的信的最后劝她父亲说：“愉快些，强硬些。”

杜鲁门在8月10日写给贝丝的信中说，“我眼前仍有数份迫在眉睫的议案。”

贝尔纳斯今天早上从巴黎打电话来求我不要否决国务院改组的议案，而我早就对克拉克·克利福德说过我确信这是那帮过于注重形式的家伙们要把国务卿撇在一边的议案。吉米跟我说不是那样，但我心里仍无把握。



我也正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即恢复军需部门一位上尉的民事和军事权利。他在 1926 年根据陆军法规第 93 条和 96 条以七八项罪名在巴拿马受到军法审判。迪克·邓肯（密苏里州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曾任众议员）对此十分热衷，因为那个家伙的老家在圣乔。邓肯曾将这一议案提交众议院审议，我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曾把它提请参议院审议，但都被罗斯福否决了。

我读过此案的记录后对罗斯福是否不正确并无太大把握！所处地位不同，人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多么的令人惊叹呀！我将所有的材料都交给克利福德，并嘱他写出一份冷静的报告。

还有一项议案却着实令人讨厌。黑顿（参议员卡尔·黑顿），我的好朋友，和（众议员塞西尔·罗兹·）全都要求我签署这一法案。（克林顿·）安德森则要求否决它，而看来安德森是对的。当总统真是受罪。

杜鲁门十分渴望去度假，急于离开华盛顿和独立城，他首先想到的是去阿拉斯加——他一直都想去看一看——但后来却决定在 8 月改乘“威廉斯堡”号巡游到新英格兰去，他还邀请了老朋友、他的男傥相特德·马克斯去参加全是男子的聚会，参加聚会的还有斯奈德、罗斯、克利福德、沃恩、乔治·艾伦、马特·康内利及格雷厄姆上校，人数足以打八个人玩的扑克牌。

杜鲁门非常钟情于“威廉斯堡”号，他常对船长唐纳德·J·麦克唐纳称赞说：“这只船太棒了，坐上它 10 分钟就可使我忘却一切烦恼。”他喜欢乘船在宁静的河面上巡游，岸边掠过的是弗吉尼亚州郁郁葱葱的景象，还有其他各种船只不时从身边驶过。

杜鲁门总统在不睡觉或不玩牌的时候（麦克唐纳几年后回忆道），总喜欢到我们的驾驶台上来，有时也坐在甲板上。河中的小船会靠过来，船上的人们纷纷向他挥手致意，似乎使他非常开心。船工们见到他时也异常兴奋。这是不同的时刻，没人会去胡乱指摘他。事实上，我觉得特工处最喜欢他到“威廉斯堡”号上床，因为那时我负责他的安全，他们只是一起来兜风。我常想起这件事……

最初几天，杜鲁门胡子都顾不上刮，一头扎进小阿瑟·施莱辛格的《杰克逊时代》中去了。但是，打扑克牌和重叙同志情谊显然如同往常那样是他最喜欢做也最需要的事情。克利福德回忆说：“同老朋友在一起令他非常舒服，也恰是他最大的娱乐。”

瞧，他没有架子，也从不装腔作势。跟他们在一起他十分放松，他不必对他们存有戒心。若他想喝几杯（酒），虽没人喝得过量，却觉得十分愉快……这正是消遣的一部分。船上讲的一些笑话是在白宫听不到的那种，都十分好笑，有时还会有一两个密苏里的乡间笑话，这会使他开怀大笑，乐不可支。

（在“威廉斯堡”号上的那段时间）非常重要——比多数人可能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他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压力。但他总是装

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噢，我夜里睡得很香。”

一次，有位记者问杜鲁门对扑克牌的看法，他两眼一亮，答道：“扑克牌？我会打的牌只有一种——叫什么来着？——我不知道它的名称，只知道你把一张牌面朝下放在桌上，另外四张则面朝上，然后你开始下注。”

他从打扑克牌中得到的乐趣主要来自它提供的同志情谊。他被认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牌手，但决不出色。

他是人们所称的那种“散漫的”牌手，很少打完一局牌，经常随意下注，还不时以大赌注吓跑对手。在牌桌上，他“总爱捣乱”。他用左手发牌，总喜欢逗弄需要某一张牌的人。有时，他在计算出他人想要的牌之后，却发了另外一种牌。他喜欢打带百搭的牌，特别是一种他称为“文森爸爸”的普通沙蟹牌的变体，这一名称源自弗雷德·文森，他是一位牌技娴熟的高手。

特德·马克斯回忆说：“我要说，他总是打不分胜负的牌。你能看得出何时他要赢了，因为他脸上浮现一种微笑……”杜鲁门本人也承认，扑克牌是迄今为止他最喜爱的消遣活动，是“我最喜欢的文书工作形式”。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使杜鲁门暂时忘却一切，赌注是五分还是一角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他自己的输赢对他打牌的乐趣也没有明显的影响。华莱士·格雷厄姆则认为总统打牌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打牌本身的乐趣，而且也因为它可展示牌桌上其他人的真实情况。例如，文森是位打扑克牌高手，与杜鲁门十分器重文森两者之间就有着并非偶然的联系。

克利福德在来白宫之前很少打牌，但后来他买了一本打牌的书“勤奋”研读。他回忆说，在这次和其他几次游艇旅途中，除吃饭外，扑克牌占去了多数日子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同时每天的午饭往往都要花两个小时或更多，因为谈话占去了很多时间。杜鲁门显然一直都很开心，该说的和不该说的他都说了。“我敢打赌光他在芝加哥被选定为罗斯福竞选伙伴一事他就说了不止40遍……（所有的）细枝末节都谈到了。”

总统饮酒十分节制，而并不像广泛的传言中所说的那样。有几天上午，他站在甲板上，眯起眼睛注视着天空，会说现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可能已是中午了，并要了一杯波旁酒。有时，他也会由于已有几杯酒下肚而显出其作用，他在表达自己的心情时，如克利福德后来所写的那样“用的是一种在其他情况下少见的更潇洒、更生动的语言”，这种情况在他经历了烦乱不堪的一周后尤为常见。但有时，他也会守着一杯酒谈一晚上的天或打一晚上的扑克。

麦克唐纳回忆说：“‘威廉斯堡’号作为现役舰只本不应供应烈性酒。”但杜鲁门作为三军统帅“当然”有权在他想喝酒的时候在船上喝。“我对此毫无异议……他最喜欢喝的是老祖父酒。”

当船行驶至罗德岛内的纳拉甘西特湾时，遇到了冷风、大雨和浓雾。杜鲁门当即决定改变计划。他们调转船头，朝南边的百慕大驶去，杜鲁门知道那儿曾是伍德罗·威尔逊最中意的疗养地。在百慕大的那几天，气候宜人，杜鲁门尽情享受了那里的宁静和无遮无拦的阳光。8月23日他写信给玛格丽特说：“这儿简直是你梦寐以求而又难以见到的天堂。”

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船刚行至汉普顿锚地就立刻遇到了风暴。“威廉斯堡”号建造于1930年，长244英尺，最初是一艘私人游艇，战争爆发时被海军收购过来。它的航海能力一直就不是特别好，后来为增加船的稳定性还在船艏中放下了数百吨生铁，但仍无济于事。事后杜鲁门告诉他母亲，“威

廉斯堡”号“丑态百出”，使杜鲁门非常不舒服，想呕吐，便躺到了床上。他后来跟贝丝描述说：“家具横七竖八地倒下，人若想不跌交只有卧床。”他的房舱里乱七八糟，“纸张、书籍、椅子、衣物，你的、玛格丽特的和妈妈的照片与《时代》、《新闻周刊》、《读者文摘》、《煤矿工人报》、《星期六晚邮报》、行李、枕头夹杂在一起，像是永远也整理不好了。”

华盛顿的酷夏仍未结束，他还得一个人呆在这座他开始称为白色大监狱的白宫中。有些仆人不断给他讲述多年来亚伯拉罕·林肯显灵的事，他开始相信白宫闹鬼确有其事：

前天夜里（他跟贝丝说），9点钟我关上房门上床睡觉。凌晨4点钟，我被卧室门上三声清楚的敲门声惊醒，我从床上跳起来，穿上睡衣，打开房门，没有人。于是我走出卧室，站在客厅里四处巡视，又到你的房间和马奇的房间看了看，还是没有人。我又回到卧室，锁上房门，重新上床睡觉。这时我听到你房间里有脚步声，我没有关你房间的门。我又从床上跳起来，去看看，还是没找到任何人！这该死的地方真的闹鬼了。第二天特工处的人告诉我当时那里连一个守夜人都没有。

他越来越不喜欢住在白宫了。他想，最好将白宫改为博物馆，给总统发一笔房租补贴。他告诉贝丝，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搬回康涅狄格大街的公寓中去了，他知道贝丝肯定欢迎这个主意。

玛格丽特建议他：“你最好把卧室门锁上，在门背后挡几把椅子。下次听到有人敲门别吱声。说不定将是A·杰克逊亲自来敲门。”

他还更换了白宫内一部镶有橡木板的小型电梯，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那天下午，他正是坐着那部电梯到楼上去的（那部旧电梯是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安装的，杜鲁门觉得它的速度太慢，有一次它出了故障，杜鲁门被困在两楼层之间，他不得不使劲儿按呼叫铃，等候修理工赶到地下室去把电梯摆弄到恢复正常运行状态，才算解了他的围）。屋里安装了新的枝形吊灯，给浴缸配备了玻璃淋浴分隔间。但他仍对这所旧房子没有什么信心。

股票市场在狂跌，西海岸的海员已经开始罢工，并迅速蔓延。他想下一步就应该是白宫屋顶坍塌了吧。

9月的第二周，也就是华莱士惨败的前夜，他悲哀地写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总是被夹在中间。”

9月12日，星期四下午，杜鲁门在总统办公室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有位记者问他对商务部长当晚即将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次政治集会上发表的演说有何看法，新闻界已得到了这份演说稿。杜鲁门称他不能回答有关一篇尚未发表的演说的问题，对此查利·罗斯和站在一旁的其他官员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罗斯事后写道：“要是总统就此打住该多好啊！”

提问的这位记者是考尔斯报业集团的威廉·迈兰德，他紧迫不舍，接着又问道，华莱士在演说中说他事先向总统本人请教过，因此他才提这个问题。会场内笑声四起，杜鲁门却和蔼地说既是如此。他倒想听是什么问题。

迈兰德手里拿着一份演说稿，宣称其中有句话说总统已“看过这些话”，而且这些话代表了政府的政策。

杜鲁门答道，对，是这样。

那么他是赞同某一段话还是演说全文？

杜鲁门轻松地答道，他赞同演说的全文。记者们听罢此话面面相觑。

《圣路易斯邮报》的记者雷蒙德·布兰特追问：“总统先生，您是否认为华莱士的演说背离了贝尔纳斯的政策……”

还没等布兰特的话说完，杜鲁门就厉声喝阻道：“我认为不是这样。”

“……对俄国的政策？”

杜鲁门答道：“他们完全一致。”那神情活像是在说这个问题毫无意义，简直不值一提，他希望记者们能提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他并没有全文阅读这篇演说——或者说华莱士和他一起审阅该稿时，他并未十分重视——此后他对这篇演说也没有再思考过。正如查利·罗斯在日记中所写的，总统现在是被他自己的和蔼可亲出卖了。

据华莱士的日记记载，他曾和杜鲁门一起“逐页”对演说稿过目，杜鲁门对其中的所有内容都表示赞同。华莱士写道：“他未对演说稿提出任何一处改动。”克拉克·克利福德也记得华莱士确曾把演说全文读给总统听。但杜鲁门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却说，当时他只能给华莱士10到15分钟的时间，而其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谈论别的事情。杜鲁门写道，他曾想将演说词浏览一遍，还设想华莱士会在政府政策的所有方面都抱合作态度，包括外交政策在内。“我看到了一段话，讲我们对俄国、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均无特别的友谊可言，我们想看到全世界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相处。我说我们当然希望如此。”据杜鲁门说，他正是仅仅根据这一段话才对演说词表示赞同的，“我相信亨利会对我以诚相待。”在与查利·罗斯私下交谈时他也承认，他只看过演说稿的一部分，而华莱士又向他保证过其余部分都没有问题，他也就相信了。

的确，演说稿中的一大部分内容是与政府政策相“一致”的。在演说中，华莱士强烈要求对联合国给予支持，同时增加国际贸易，加强在国际范围内对原子武器的控制。但他也谴责英国“帝国主义”，似乎在提倡美国和俄国在世界上应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这一主张正是贝尔纳斯强烈反对的。华莱士说，美国“无权插手东欧的政治事务，就像俄国无权插手拉丁美洲的政治事务一样……”任何“强硬”的政策都是鲁莽的。“‘强硬’从来都不会带来任何真正、持久的好处——不管是校园内恃强欺弱的学生，还是商人或世界强国都是如此。”华莱士认为“我们越强硬，俄国人也会越强硬”。

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华莱士离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告诉台下2万名听众——其中一部分是大叫大嚷的亲苏分子——“我发现战争的危险更多的是来自帝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

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詹姆斯·赖斯顿的文章，称看来华盛顿只有杜鲁门一人未能看出华莱士所说的同他自己的政策或他的正在巴黎的国务卿的政策之间的差别。据称，国务卿也极为愤慨。阿瑟·范登堡更是怒不可遏，宣称每次只能有一位国务卿。

14日，星期六，杜鲁门将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桌前，对犯下如此严重的“大错”而公开自责。在当天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宣读了一篇事先精心准备的声明，并且这次不允许记者提问。杜鲁门说，人们一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误解”，他对迈兰德问题的答复并未表达出他的本意，他坚持说，他当时只是想表示他赞同华莱士部长发表演说的权利，而不是赞同演说词本身。

由于麻烦缠身，他显然是在笨拙地信口胡言，孤注一掷地想使自己脱身，也让正在巴黎的贝尔纳斯“摆脱困境”。他还说：“我国既定的外交政策没有变化。”这虽是实情却也于事无补。协助起草这份声明的罗斯后来写道：“批评意见仍是越来越多。”

来自巴黎的消息……表明贝尔纳斯及其代表团认为需要做更多的事。他们确实是对的。现在的问题依然是能否允许华莱士继续公开攻击贝尔纳斯在巴黎确定的外交政策方针。新闻秘书越来越陷入了困境，我也只能答复记者们说总统未与贝尔纳斯保持联系。

“华莱士插曲”沸沸扬扬了数天。在华莱士继续对记者们说他坚持自己在演说中的观点时，杜鲁门的日程依然十分轻松，也未进一步发表意见。

但随后，罗斯也犯了一个弥天大错。他听说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手中有一份华莱士两个月前写给杜鲁门的私人长信——这封信显然是国务院的某个人“泄漏”出去的——于是，他未经杜鲁门同意，便与华莱士商定将此信向新闻界公布，以便阻止皮尔逊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罗斯后来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总统，杜鲁门听后让他立即把华莱士找来，并停止公布此信，但为时已晚，那封信早就弄出去了。

那封信上的日期是7月23日，不隔行地打满了整整12页。这封信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语气比华莱士的演说还要激烈。华莱士在信中极力提倡对苏联采取新的态度，并指责美国军方某些未提及名字的主管人员积极主张在苏联有时间开发出原子弹以前发动一场“防御性战争”。

9月18日，星期三，杜鲁门悲痛地向母亲吐露道：“我现在仍被华莱士的问题所困扰，而且情况越来越糟。”过会儿华莱士会到白宫来，“我想今天他会辞职，而我不会为他的辞职感到难过，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过，一部分是我自己造成的。但当我犯错误时这就成了一件好事。”

杜鲁门对华莱士也说自己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大部分责任。自从芝加哥会议以来他还从未有过这么多个不眠之夜。

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单独会谈，华莱士并没有打算辞职的迹象，他说，他的邮件中支持他在纽约的演说的达到5比1。华莱士告诉杜鲁门：“人们担心‘对俄强硬’政策将把我们引向战争，你哈里·杜鲁门本人也确实相信我的演说的。”他劝杜鲁门在国会休会期间应大大地倾向于左；然后在国会复会时再转向右，他说这是罗斯福的手段，罗斯福从未让其右手得知左手在干什么。杜鲁门事后告诉贝丝：“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亨利告诉我作为总统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只要能确保大权在握，做任何事都是有道理的。”华莱士则认为，只要杜鲁门朝他的方向稍稍倾斜一点，这就可能意味着民主党人在11月份的国会选举中获胜，杜鲁门告诉他，他觉得不管怎样共和党人都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他请求华莱士不要再发表外交政策演说了——“要不就同意我负责制订的政策。”但华莱士没有同意。

虽然如此，杜鲁门仍不愿解除华莱士的职务。实际上，他是不敢得罪他。华莱士作为内阁中最后一位还活着的新政派人士，其象征意义十分重大——华莱士对此一清二楚，也知道杜鲁门对此一清二楚。在无数个自由派民主党人中，华莱士仍是罗斯福的合法继承者，而杜鲁门只是个篡权者。对杜鲁门

来说，若与华莱士公开决裂，就像在伊克斯事件中一样，在政治上就可能是灾难性的。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讨论，他们最后只是同意至少在贝尔纳斯回国前华莱士不会再对外交政策品头论足。

事后，华莱士走到大厅，记者们问是否一切都已解决，他答道：“一切都很好。”

杜鲁门告诉母亲说：“亨利是我平生接触过的最古怪的人。”在他日记中，他说得更为明确，说华莱士是位智力不健全的、“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

他想解散我们的武装力量，将我们的原子弹秘密拱手交给俄国。他信任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内的一小撮冒险分子。我无法理解像这样的“梦想家”……赤色分子、装腔作势的人和“崇尚空谈的左倾分子”似乎正纠集在一起，对我们的国家构成了威胁。

我担心他们是为约·斯大林大叔进行破坏活动的头面人物，他们并不觉得俄国拥有450万军队并劫掠波兰、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满洲有什么不对。他们也并不认为俄国仰仗被占领国的给养来支援其军事占领有什么不对。

在杜鲁门的请求下，帕特森和福雷斯特尔两位部长在五角大楼发表联合声明，否认他们听说过有哪位陆军或海军的负责官员曾主张乃至建议过进攻俄国的政策或计划。

贝尔纳斯从巴黎给杜鲁门发来一封理由充分篇幅很长的电报，请求立即解除自己的职务：

当政府内对其外交政策意见不一时，不能指望让世界相信美国人民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我并不想要您做任何可能把华莱士先生逐出内阁的事。然而，我觉得任何自称忠于您的人都不会如此严重地破坏您的威信和政府在世界各国中的威信……您和我用了15个月的时间才制订出一个为两党所拥护的政策，我们也曾出色地让全世界相信这是一项他们可以信赖的永久性政策。华莱士却将这一切毁于一旦。

9月20日星期五，上午9点30分，杜鲁门给华莱士打了电话，解除了他的职务。杜鲁门事后曾向贝丝吐露，华莱士“对此表现得这样有教养，以致我差一点要收回成命”，接着他又说：“我就是不理解这个人，他也不理解我。”

华莱士还提出要把杜鲁门前一天晚上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亲笔信还给杜鲁门，他称那封信“虽不是谩骂式的，但也是……低水平的”。他对杜鲁门说：“你不想把这封信公布出去吧。”杜鲁门令人愉快地表示同意。杜鲁门非常乐意收回这封信。过了一会儿，华莱士走出他的办公室来到街对面，让摄影师为他拍摄他平静地坐在公园长凳上读着漫画报纸的照片。

杜鲁门在他办公室里匆匆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办公室里人头拥挤。杜鲁门宣布了他的决定后，听见记者中有人倒抽冷气和一声低长的口哨声。招待会结束后，杜鲁门坐在办公桌前转身对站在一旁的罗斯说：“好了，木

已成舟了。”

罗斯告诉他，他表现得宁愿当个正当的人而不愿当总统。杜鲁门说：“我宁愿当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总统。”

以前，杜鲁门曾给玛格丽特写信说：“思维正常的人绝不会主动来这儿（白宫）的。”现在，为了希望像以往一样不使他在她眼中的光彩有丝毫减弱，他为处理华莱士一事找借口说他没有口是心非的才能，他告诉她说，一位好总统应当是马基雅弗利、法国国王路易十一、西塞里·博尔吉亚和塔列兰的结合体，应当是“惯于说谎的人、骗子、虚情假意的教士（黎塞留）、英雄和难以归类的人”，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谢天谢地”。

他越来越多地对历史和自己的一生进行认真的思考。9月26日，是1918年阿尔贡攻势开始的周年纪念日。他在日记中对中间插入的这些年做了回顾，并称自己只不过是“我认识的一名军人”。前段时间铁路罢工“演说”中的满腔怒气现在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几许忧郁和失望以及内心对正视他必将面临的一切的决心：

1918年9月26日凌晨4点差几分时，我认识的一名军人在阿尔贡森林右侧名叫纳维里的小镇上站在法国第75炮兵连的后面，协约国阵线上的所有大炮将从比利时一齐向瑞士边境进行弹幕射击。

凌晨4点，弹幕开始了，5点，在我认识的那名军人所在的炮兵连前面的步兵冲了过去，8点，包括75炮兵连在内的所有炮兵接到前进的命令，这一前进直至1918年11月11日才告结束。

我认识的军人荣归故里，受到刚刚减轻战争压力的家乡父老们的盛情款待和欢宴，这也是他们款待归国战士的通常做法。

家乡父老们忘却了战争。两年后，驱逐了曾经成功地指挥我方战争的政府，又退回到以前的状态。

他们开始大谈裁军之事。他们确实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到了无力御敌的程度。他们胖起来了，也富起来了，国内特权猖獗，国家开始走下坡路。1932年一位伟大领袖站了出来把国家从混乱中拯救出来，恢复了人民对自己的政府和制度的信心。

然后欧洲又爆发了战争。我们曾力图像从前一样置身于它之外，并拒绝相信我们会卷入战争。这位伟大领袖告诫全国会有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有人诋毁他、诽谤他，对他进行歪曲，但他的勇气丝毫未减。我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被迫卷入了战争，全国觉醒了——虽为时已晚，但已觉醒并在伟大领袖领导下制订出有史以来最为伟大的战时生产计划。

我国为俄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和所有的同盟国提供了数量空前的大炮、坦克、飞机和食物，建造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军，并配备了最优秀的人员，进行了最出色的战斗。我们创建了人们所曾听到过的最有实力和效率最高的空军，装备了850万陆军，在彼此相隔12000英里、离本国基地3000英里到7000英里的两条战线上英勇作战。我们还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大的商船队伍，以便供养那两个战场。

自由之敌几乎同时崩溃，5月在东部战场，8月在西部战场。

不幸的是，带领全国人民度过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非常时刻的

伟大领袖却在德国投降前仅一个月去世了。在经历了 12 年最艰苦辛劳的岁月、其中三年半是所有战争中最为可怕的战争后，他的去世实为憾事。

1918 年 9 月 26 日指挥第 75 炮兵连的那名我认识的军人接任了这一职务。

家乡父老们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充满了兴高采烈的心情。

他们十分高兴战斗能结束，他们可以不再为当兵的儿女们担忧了。

随后，反动思潮日益盛行，自私、贪婪、嫉妒在他们丑恶的头脑中滋长。战时的鼓励手段已不足以控制他们。劳工开始用一切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大捞特捞，农场主们开始在黑市上出售粮食，工业企业开始囤积居奇。又是那一帮和平主义者开始大谈解除武装了。

但我认识的军人努力对付各种形势，到现在为止他还对付得了。但他能继续无畏地面对那些蛊惑人心的人、骗子和各种猜忌吗？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人这种动物及其感情在各个时代变化并不大。他现在必须作出改变，否则将会面临完全彻底的毁灭，继之而来的也许会是昆虫时代或者一个没有大气层的行星。

## 5

哈罗德·伊克斯认为杜鲁门“呆头呆脑”。《时代》周刊则指出，如果这个世界不得不依靠杜鲁门及其政府来使自己摆脱麻烦，那么世界倒真有许多可担忧的事了。80 年来，从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时算起，还没有哪一位总统被这样毁谤过。他那美国中部特有的行为举止、他在密苏里的伙伴们、那现已出了名的对母亲的忠诚，都成为人们取笑他的话柄。人们在说到他的“白宫里每天都是母亲节”这句话时还带着一丝窃笑。1946 年秋华盛顿最新流传的笑话之一说，杜鲁门有次参加内阁会议时迟到了，因为他醒来时感到关节疼痛，后来才发现是他想把脚放到嘴里所致。另外一则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笑话则讲若罗斯福在世会如何处理国家的问题，然后以一句这样的话结束：“我不知道如果杜鲁门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芝加哥太阳报》上登出一幅漫画，后被广为转载，漫画中的杜鲁门两眼鼓出，喝得烂醉，一只手放在疼痛的脑门上，问道：“还要什么？”在波士顿，亨利·M·弗罗斯特广告公司为共和党人杜撰了一句颇具灵感的两个字的竞选口号：“够了？”

杜鲁门的声望一落千丈。10 月第一周，国会选举前一个月，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只有 40% 的人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

犹太教赎罪日前夕，他呼吁允许 10 万名犹太难民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保护地，许多人认为这是赤裸裸地争取纽约犹太人选票的把戏。但事实上他在几个月前就曾发表过同样的声明，而正在竞选连任纽约州州长的共和党人托马斯·E·杜威现在通过要求允许数十万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使自己在争取犹太人支持方面所出的价很快就超过了他。

数周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地位已下降至 32%，几乎比一年前减少了 50 个百分点。



大家所担心的萧条没有到来。尽管发生了这么多次罢工，就业率仍很高。银根充足，工商业繁荣。但自 1945 年底以来，生活费用也上涨了 6.5 个百分点，人们急需的住房、汽车、冰箱、尼龙袜、食糖、咖啡仍面临严重的供应不足。肉类供应更是日趋紧缺。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担心民主党在选举中溃败，向朋友抱怨道：“这将是一次该死的‘牛排选举’！”由于 11 月已经临近，肉类短缺也更为严重，共和党人就利用了这个定做好了的问题。养牛人开始罢工，拒绝将牛送到市场上去。10 月 10 日记者们问杜鲁门：“有关肉类的情况没什么可说的吗，总统先生？”他答道：“没什么可说的。”

民主党主席鲍勃·汉尼根告诫杜鲁门说，若不取消肉类限价，他将会面临共和党的压倒性胜利。杜鲁门则告诉他手下的人说，他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指责。如果他取消限价，人们会指责他是屈服于压力；若维持现状，人们会继续认为他是所有麻烦的罪魁祸首。

人们开始大肆谈论他在彭德格斯特一事中的牵连，因为共和党人加紧了这一攻势。他再次成为来自落后的密苏里州举止机械的小仆从。纽约的演出主持人比利·罗斯曾建议 W·C·菲尔兹参加 1948 年的总统竞选，他说：“如果我们在白宫中要一位喜剧演员的话，得要个好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田纳西州的众议员卡罗尔·里斯宣称，民主党内只剩下令下厌恶的三部分人：南方种族主义者，大城市老板和一心要使国家“苏联化”的激进分子。

对肉类供应短缺的不满是一回事，而对共产主义的影响及渗透的担心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从长远来看要重要得多。一场红色恐慌显然正在增长。

《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T·弗利尔德发现他所到之处“无不蔓延着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共和党人指责杜鲁门执行的是对外安抚俄国人、对内扶植共产主义的政策。参议员塔夫脱指责说：“民主党内共产主义和美国主义分化严重，因而其外交政策只能是无效的和自相矛盾的，使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笑柄。”来自纽约州奥本的共和党众议员约翰·塔伯尔的嗓音很像一种手提式电子扩音器，他提醒大家要警惕共产主义在大学甚至在军队中的渗透。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另一位众议员的候选人、年轻的理查德·M·尼克松则严厉批评高级官员“有意无意地担当非美国分子的后援。”

然而这些攻击之词在精神实质上与杜鲁门自己所担忧的“赤色分子”和“崇尚空谈的左倾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谁都不敢保证，在渥太华间谍网被破获后，就没有理由提高警觉了。当年夏天，在司法部长克拉克的压力之下，杜鲁门曾暗中同意继续对事关国家防务的各类场合实行电子监视，这是罗斯福制定的一项政策。虽然克拉克由于疏忽没有告诉杜鲁门，罗斯福于 1940 年最初核准这一做法时只是限于异己分子。联邦调查局 J·埃德加·胡佛在旧金山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在全国逍遥法外的共产党人不下 10 万。

《时代》周刊写道：“对总统的尖刻毁谤之辞仍在回响，一个像哈里·杜鲁门这样性情温和的人对他同胞们的脾气可能会感到十分惊讶。”

民主党人处于极度绝望之中。鲍勃·汉尼根劝杜鲁门最好不要在竞选活动中露面，也不要发表政治性演说，杜鲁门接受了他的意见，一直留在白宫中。一连几天，杜鲁门坐在查利·罗斯的办公室里摆好姿势让英国画家弗兰克·O·索尔兹伯里给他画像，罗斯的办公室有三面窗户可采到充足的北面来的光线，索尔兹伯里也曾给罗斯福画过像。有一天下午，最高法院依照传统要前来拜见总统，而他此时正在收听 1946 年系列世界比赛决赛的实况转播——圣路易斯的风头鸟队对波士顿红袜队。一位助手告诉他法官们穿着正规的

服装很快就要来到了。杜鲁门赶忙跑上楼去，换上条纹裤和燕尾服，但当他接见法官们时才发现只有他一个人穿得衣冠楚楚。

甚至连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也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到总统的名字了。在有些竞选国会议员的场合中，民主党候选人采取播放罗斯福演说的旧的录音磁带的办法来增加他们当选的机会。参议员哈利·基尔格是杜鲁门的一位热心的朋友和崇拜者，他在西弗吉尼亚州竞选连任，在向矿坑和煤田中的矿工们发表演说时发现只要他一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就会引起一片唏嘘尖叫的讥笑反对之声。基尔格回忆说：“这个人实际上工作得很出色，但你们尽最大的力量去做的却是用西方沙龙的旧的口头禅以幽默的方式来为他辩护：‘别打死我们的钢琴手，他正在尽力而为。’”

一位政治家，一位像杜鲁门这样的职业政治家的一个首要条件就是要能在遇到麻烦时保持微笑，杜鲁门深谙此道，以前在困难时期中也经常是这样做的，他现在也未表现出任何愤怒和沮丧的迹象。他从不抱怨，从不装做垂头丧气，也不责怪他人；并始终表现得愉快和乐观，对别人很关心，愿意看到他们并和他们呆在一起。阿朗索·菲尔兹与他朝夕相处，像一个男管家所能做到那样的接近他。阿朗索后来写道：“杜鲁门好像从来都没有难事。”有时他也会被烦恼事所困扰，“我敢说家中无人能够说出他是在什么时候感到苦恼的”。

10月14日，也就是选举前三周，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他勉强取消了肉类限价。10月23日，他飞往纽约参加在弗拉兴草场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说。他在一篇十分合乎情理的演说中说：“历史的进程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国家之一，因而使我们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去保存我们的实力并在我们当今互相依存的世界中正确地使用它。”甚至俄国人也赞美了他。

杜鲁门在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后来）我们到了沃尔多夫，你妈妈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我们往下走到舞厅中去参加招待会；在正好一小时的时间里同835个人握了手。”

他仍对政治保持沉默。在乘火车前往独立城老家参加投票的途中，他在杰斐逊市受到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的欢迎，他们还编了小调唱道：“做一次两小时的演说；过一个完美的假日。”但是杜鲁门听罢，满脸笑容，只是挥了挥手，摇了摇头，然后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嘴上。

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大萧条前以来第一次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许多人觉得大萧条是十分久远以前的时代的事情，就像是另一个世界那样。众院选举结果为共和党246票对民主党188票，参院选举结果为51票对45票。共和党人在州长职务的选举中也取得了多数，包括纽约州，托马斯·E·杜威以空前的遥遥领先的票数再次当选为该州州长。民主党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的核心组织均纷纷被击败，如芝加哥、底特律、泽西市及纽约。在堪萨斯城，杜鲁门亲自挑选的竞选国会职务的候选人伊诺斯·阿克斯特尔以6000票之差败给了他的共和党对手，玛格丽特·杜鲁门回忆说这一惨败使她爸爸“很丢面子”。

《芝加哥论坛报》欢呼共和党的胜利为美国自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以来最伟大的一次胜利。罗斯福新政终于被赶跑了，民主党人在华盛顿的控制终于被打破了。哈里·杜鲁门这位“偶然的”总统现在成了“少数党”总统。来自阿肯色州的年轻民主党众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对共和党大获全胜感到

十分痛苦，他担心华盛顿将出现两年的僵持状态，便提议杜鲁门任命阿瑟·范登堡为国务卿，然后辞职，这样范登堡就会成为总统——这一主张使杜鲁门此后称富布赖特为“半个聪明人”。

杜鲁门和他的家人未等投票结束便在选举日当天启程回华盛顿。然而，通过安排，每行走 100 来英里就会有选举结果报告传送到专列上去。

当夜，查利·罗斯走过一节节车厢去邀请几位华盛顿记者到总统的私人车厢中去打扑克。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回忆说：“牌打得既激烈又兴奋，一直打到凌晨 2 点左右。自晚上 9 点钟开始，选举结果报告就接连不断地传来，而杜鲁门一次也没有看它们一眼，也没有提到过选举的事。”

有一个时刻，玛格丽特走进总统车厢打断大家说，独立城的选举结果已经传来。杜鲁门朝纸条瞟了一眼，摇了摇头，抬起头来对着玛格丽特微笑。

他说：“何必为这种事费心呢？别为我担心——我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一切都会好的。”

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也许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比哈里·杜鲁门在 1946 年 11 月那个阴冷的、有雾的早晨几乎是不被注意地回到华盛顿时更加彻底地失去了名声和领导能力。”车开到联邦车站，杜鲁门悄悄地从他的车厢中走出来，但面带微笑，腋下还夹着一本书。

## 十二、转折点

我们踏上的是——一条形势严重的道路……

——杜鲁门致国会，1947年

1

哈里·杜鲁门是一个被稀里糊涂地推上总统宝座的普通美国乡下人，还是一个超出一般水平，甚至具有特殊的才能和性格，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堪萨斯城明星报》的罗伊·罗伯茨在杜鲁门上任的第一天就曾写道：“这是对民主制能否成功的一个重大考验！”现在，将近两年后，沃尔特·李普曼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相信这项检验未获成功。对于被认为是当时最富有思想、最具有权威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来说，杜鲁门是个令人尴尬的人物。李普曼认为，他的虚张声势和迅速的决策不过是对内心充满了焦虑而本质上却动摇的人的一种掩饰。国家大事怎么能由一位既失去了本党的支持、又不能再能控制其政府的总统来指导呢？

在农场的那些年中，杜鲁门在追求贝丝时（他的第一次“竞选”），曾亲口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他能够允诺她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但是，他也写道：每一个农民都“认为他像总统一样出色，或许比总统还好一点儿，”这说明他已经根据老杰斐逊的信念，从中生长出了这样的思想：普通的来自底层的美国人与最杰出的美国人一样出色。

一次，一位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使自己从常人的水平上提高。杜鲁门拒绝回答这个奇特的问题，反问道：“噢，做一个常人有什么错吗？”

1945年以来，很多人评价他是各种类型的人但却不是常人。在波茨坦，丘吉尔立即就察觉出这位新总统是“一个判断力极强的人”。1947年那个关系命运的春季，丘吉尔在位于伦敦南部查特韦尔的家中忙于写回忆录，从那里他还写信告诉“我亲爱的哈里”，他是多么钦佩“你为世界和平和自由所做的一切……”对丘吉尔来说，哈里·杜鲁门的总统任期成了世界有希望的一个根由。

迪安·艾奇逊在评价他认为与自己地位不同的人时也许极为苛刻，甚至带有轻蔑。罗斯福死后，他把杜鲁门描述为坦率、果断、诚实，如果说经验不足、却敏于好学的人。1946年11月杜鲁门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当时他的政治声望空前低落）的那天早晨，在所有等在月台上欢迎他的政府官员中，艾奇逊独自做出了一个令杜鲁门终生难忘的举动。他望着杜鲁门，就像是望着——一位领袖，并且称杜鲁门为“有着非凡心胸的首领”。

华盛顿记者团中第一流的记者、《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是另一个在许多政治评论家准备毁掉总统的时候对这位不惹人喜欢的总统身上看到了某些“非常杰出、通情达理和勇敢”的东西存在的人。《时代》周刊驻白宫记者费利克斯·贝莱尔则断定，尽管杜鲁门看起来也许永远都像是“有轨电车上的平庸之辈”，可他却是一个对紧急形势应付裕如的人。

甚至在1947年大转折来临之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有关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总统、排除他将是错误的类似判断就已经很充分了。

戴维·E·利连撒尔是杜鲁门上台之初重新任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局长。他40多岁，长着一副漂亮而又慈祥的面孔，是犹太人的后代、德保大

学和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并且仍被人们看作是标准的新政派人士。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建造了水坝，创造了湖泊、森林、新的工业和新的耕作方法，给大约 70 万用户送去了电力，并且在战争期间为位于橡树岭的巨大核工厂补充了燃料。而利连撒尔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成功所做的努力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多。

罗斯福死后，那么多的新政派人士都辞去了职务，就像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如此之快地竞相”离开了政府。利连撒尔不像他们，他选择了留下，不是一次，而是两次。10 月份，他辞去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长的职务，以便成为杜鲁门指派的（尽管尚未经参院批准）新的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杜鲁门坚持认为该委员会应由文职官员来控制。这个职位也许比战后华盛顿设置的几乎所有职位都更重要，利连撒尔感到自己尚未充分具备担当此任的资格。然而，当时除了他，谁还具备这种资格？在利连撒尔经历着灵魂反省的那些日子里，总统一直在极力劝导，同时耐心地等待着。

利连撒尔工作勤奋、善于表达，是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人，如果按某些人的标准来衡量，有点儿过多的自由派色彩。他在政府中任职，就像贝尔纳斯、马歇尔、哈里曼（他已从伦敦回国，接替亨利·华莱士担任的商务部长职务）、艾奇逊、波伦和克拉克·克利福德在政府中任职一样，是与那种说杜鲁门完全被密苏里的傻瓜和庸才们包围着的整个想象不相符的。

利连撒尔并不完全赞同此前杜鲁门的一切做法。作为自由派人士，他曾对杜鲁门要求将罢工的铁路工人强征入伍的做法感到震惊，以至从广播中听到杜鲁门的讲话后，他走出在田纳西的家门，走进花园，站在瓢泼大雨中，希望雨水能够冲走他内心的痛苦。不过，利连撒尔仍对杜鲁门心存信任，他信任他，是因为杜鲁门已经显示出对他有同样的信任，而且也是因为他从杜鲁门身上看到了一个政治家少有的勇气和坦诚。确实，利连撒尔说过，他觉得为杜鲁门政府工作比为罗斯福政府工作的感觉更好，因为现在他能够得到直接的答复了。

进入 11 月以来，利连撒尔一直特别担心国会中期选举中一次使人蒙羞的失败，怕它会影响杜鲁门的自信，并影响他的计划。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利连撒尔本人的任命，一旦国会山的批准程序开始，就注定会遇到麻烦；因为曾经极力反对他再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并一直蔑视他的田纳西州年迈而又好骂人的国会参议员麦凯勒，刚刚重新当选下一任期的参议员。

在中期选举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利连撒尔实际上都没有见过杜鲁门，后来也仅是偶然碰到。12 月初的一个下午，大约 5 点钟，利连撒尔和克利福德正在内阁会议室安静地工作。天已经晚了，外面逐渐地暗下来，克利福德用时轻轻地推了推他，示意他向那扇连接主楼通道的打开着的法式大门望去。总统正站在草坪的另一端望着他们，微笑着。利连撒尔不知所措，站起身来笨拙地点头作答。杜鲁门挥挥手，仍然微笑着，然后快步走远了，身后半步处，紧跟着一个秘密保镖。

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整个相遇只用了几秒钟，但对利连撒尔来说，这却是值得记在日记中的一个令他鼓舞的时刻。几天后，他又记下了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衷心欢迎他的情景：当时，利连撒尔带着新的原子能委员会的 4 名其他官员去做工作进展汇报。杜鲁门警告说，陆军不会放松对原子能的控制，他们不可能会避开。“我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他们不是被训练去投降的。我了解他们，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说罢，又笑起来。

汇报结束时，他们祝总统走运，杜鲁门表示感谢，回答说最近他的运气好起来了。这是指最近与约翰·L·刘易斯在意志较量上的一场考验。不过，使利连撒尔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语调和举止中的那种不屈的快乐……”。

总统的变化在这些日子里越发明显。11月选举刚过，他就与约翰·刘易斯“摊牌”。在克拉克·克利福德的敦促下，杜鲁门对仍可能来临的另一场煤矿罢工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这一次，正如杜鲁门所说，将要“斗争到底”。克利福德记录道：“啊，上帝，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恰当，要强硬，没有人能比美国总统更强有力。’一切迹象都确定无疑，”它显示出刘易斯已经践踏了法律……罗斯福曾一再地奉承他。可如今他却把总统推向了错误的道路。他曾说过：‘好了，我们打算干下去！’”

行政当局把这个强有力的劳工领袖送上了法庭，指控他违反了史密斯—康纳利法，该法禁止不利于政府控制的设备的各种罢工，而煤矿在法律上仍处于政府的掌握之下。法庭发出了一项禁止罢工的禁令，当刘易斯让罢工在11月20日开始时，一位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命令他到庭接受蔑视法庭罪的审判，刘易斯拒绝了。12月4日，这位法官以300万美元的罚款击得煤矿工人联合会晕倒，同时对刘易斯个人罚款1万美元。与此同时，杜鲁门却到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基地度了几天假，并返回了华盛顿。12月7日，刘易斯屈服了，命令工人回到煤矿，此前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1947年3月，最高法院坚持蔑视罪的裁决，尽管后来对工会的罚款被减少了）。

这是行政当局的一次大捷，也使克利福德获得了又一次提升。他现在坐进了萨姆·罗森曼原来的办公室里，这是白宫西侧第二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办公室。如今他距总统的办公桌仅20步之遥，每天能看见总统六七次。他们经常一起在一楼的快餐厅用餐。

杜鲁门对刘易斯的惨败喜出望外。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受到了新闻界的赞扬，《新闻周刊》称，“哈里·杜鲁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迁就刘易斯的地方迅速转为强硬”，这当然也使杜鲁门极为得意。不过，在他的老友查利·罗斯等人看来，真正的变化是随同国会中期选举而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共和党的这次大胜使杜鲁门得以新生，使他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这一点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作到。他现在不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了。他在进行管理时是自由的，是他自己，并且显示出在他不得不做的时候他所能做到的事情。他再次获得了自主，就像1940年在参院的经历一样，当时汤姆·彭德格斯特被淘汰出局，并被罗斯福所抛弃；或者就像他在农场时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样；也像1918年在法国那样，当时，他佩戴着新的上尉军衔，独自站在新指挥官面前瑟瑟发抖，说不出话。罗斯曾给他姐姐写信说，总统“现在是一个自由的人，并且可以写一份很杰出的记录”。他告诉白宫的记者们：“真正的杜鲁门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后开始了。”

杜鲁门显然同意这种说法。在从基韦斯特写给贝丝的一封信中，他发誓说：“在未来的两年中，我将爱（他妈的）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他们所有的人都见鬼去吧！”

对于作为一个“少数党”，总统的新角色，他绝非萎靡不振或踌躇不决，从佛罗里达回来后，他晒黑了，睡好了，急切地盼望行动。他从内心里接受了人民的裁决，他说：“所有的好公民都接受任何公平选举的结果。”国会的变化并未改变国家的内政或外交问题，特别是在外交事务中，它必须是“一个国家的而非一个党派的纲领”。当然，在一个共和党的国会和一个民主党

的总统之间会有斗争，那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哈里·杜鲁门，将由一个简单的观念来指导：“全力以赴去做……不顾及政治上的考虑，看来，对我来说，重要的就是为了我国全体人民的幸福……”

在新的第八十届国会中，乔·马丁将接替萨姆·雷伯恩任众院议长。在参议院中，塔夫脱和范登堡将接替艾尔本·巴克利来掌握权力，不言而喻，塔夫脱将关注国内事务，而范登堡则作为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监管外交事务。

杜鲁门认识这3名共和党领袖已多年。范登堡是3人中他最熟悉也最喜欢的一个。自杜鲁门进入参院的第一天起，范登堡就成了他的朋友。杜鲁门认为他有能力，也值得信任。作为来自大急流域的一名前报纸编辑，范登堡直到战前一直是一位毫无保留的孤立主义者，不过，他总喜欢说，对一切现实主义来说，珍珠港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孤立主义（在伦敦时，有一次当德国飞弹来袭，范登堡对一位朋友说：“在人类能够发明出这种武器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幸免或孤立呢？”）。这个转变产生了广泛的结果。范登堡不仅是参院核心圈中的一名成员，而且他在共和党人中对外交事务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作为共和党的代言人，他具有令人生畏的力量。他心胸宽广而热诚，具有那么点儿浮华的戏剧性参议员的独特格：叼着雪茄，满口华丽的辞藻，还多少有点爱虚荣，喜欢精心地把那几缕灰白的长发从鬓角梳过他的秃顶。在参院全体会议上论证自己的观点时，他喜欢使用明显的手势：用力地挥动着一只胳膊划出一个很大的弧形。他的声望超出了国界，并且像杜鲁门在参院的那些年中一样，他没有任何敌人。

范登堡是一个马具匠的儿子，而乔·马丁则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们两人的背景杜鲁门可以认同；但他却无法认同罗伯特·塔夫脱的特权社会，塔夫脱的父亲便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马丁来自麻省波士顿南部的一个工业城市北阿特尔伯勒，首次进入国会是在1925年，当时他的朋友卡尔文·柯立芝正在担任总统。42年中，马丁的观点基本上与柯立芝的观点一样。没有任何一项重要立法挂在他的名下，他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使人难忘的政治哲学宣言，但他却是一个杰出的私下会谈的组织者，以可靠和公正而著称，或者如他选区的选民所言：“正直得像一根绳子。”他身材矮小而宽阔，总穿着三件套的海军蓝西服和像盒子一样的黑色警用皮鞋。即使是在家乡向一小群人发表演说，他也必须站在椅子上好让别人能看见他。右前额上垂下的一绺黑发成了他的一个标记。

正如他的民主党对手萨姆·雷伯恩一样，马丁也是一个单身汉。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除了政治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没有多少兴趣，他家乡的报纸、北阿特尔伯勒《纪事报》归他拥有。乔·马丁坚持认为，对他的选区有益的事情对国家也“极为有益”。

元旦那天，杜鲁门忙于给他的内阁成员打电话祝贺新年，他决定给范登堡和马丁也打一个电话，结果很令人鼓舞。范登堡“非常高兴”；马丁则有过之，向总统保证说：在他的心目中合作是至高无上的。杜鲁门记录中说：“他告诉我，在任何时候与我讨论任何问题都将是他的最大的幸福。我倾向于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杜鲁门在元旦那天没有打电话问候塔夫脱，后者是一个冷漠、专顾自己的人，在很多人眼中，他是一个“冷血动物”（他妻子曾解释说：“鲍伯并非冷峻，他只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塔夫脱比杜鲁门小5岁，出

生并生活在辛辛那提的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环境中。在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他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尽管自 1938 年以来就任职于参议院，但他看起来更像一个银行家，而不像政治家。他戴着无框眼镜，并且像杜鲁门一样，总爱把帽子戴在头顶上。他那无缘无故的傻笑是出了名的。

塔夫脱经常不老练、甚至习惯于粗鲁地对待理解力不如他的人，是一个糟糕的“交际家”、一个糟糕的公共演说家。他很难记住别人的名字。不过，他工作勤奋和坚持原则的名声、知识的丰富以及切中问题要害的能力却被认为是参院中无人能及的。他是一名“共和党先生”，不易屈服，极端保守，而且不像范登堡那样，是一个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可是，在倡导联邦资助教育、医疗和住房这类自由主义计划时，他又能够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这一点激怒了他那个党的老保守派。缅因州的华莱士·怀特参议员，一个不显眼的、没有特色的人物，将成为共和党多数派的领袖，但仅是名义上的；塔夫脱则将是操纵事务的实际领袖。

塔夫脱、范登堡和马丁都决心恢复国会在罗斯福时代失去的声望和权威。马丁在他作为众院议长的首次演讲中坚持称：“我们美国人的政府观念有赖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会这种观念的支撑。”此外，所有这 3 个人都被认为具有当选 1948 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特别是塔夫脱。他决心要步父亲的后尘，并且已经为争取 1940 年共和党总统提名做过尝试。如今，由于哈里·杜鲁门在任，他的机会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大。

关键的是，塔夫脱对与行政当局合作也没有兴趣。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反对党的目的就是要反对”。不像范登堡和马丁，他看不起杜鲁门。对塔夫脱来说，杜鲁门确是一个普通人，家庭背景和教育微不足道，对于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来说，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缺乏训练，此外，还太容易受那些自由派的坏主意的影响。

在第八十届国会共和党队伍的新面孔中，有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理查德·尼克松众议员、马萨诸塞州的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议员、以及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在新当选的相对较少的民主党人中，有来自马萨诸塞州的约翰·肯尼迪众议员，即乔·肯尼迪的 29 岁的儿子。

尽管去年有劳工斗争，但正如杜鲁门在其 1947 年 1 月 6 日的国情咨文中所说，国家正处于它从未有过的繁荣之中。食品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民收入高于以往任何和平时期。他满意地指出：“我们实际上达到了充分就业。”

他看起来像是发表这篇咨文的最合适的人，身体健壮而又意志坚强。那天早晨 7 点钟，他从白宫步行到联邦车站去接载着贝丝和玛格丽特的来自密苏里的列车，现在她们正坐在议院的边座上听他演讲。

他要求广泛地改进劳资关系，加强反托拉斯法，制定一个包括支持精神医疗、幼儿照管和医院建设在内的全国医疗保险计划。他想让农场主得到一个“公平的回报”，退伍军人得到补助，房屋建筑得到一个“进取的”计划。他允诺在公民权方面将有新的进展。

这个演讲绝非是从 1945 年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国内纲领上后退，不过语调不同，显得更理智、更乐观。他提倡平衡预算，精简军事编制，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他的演讲以后来被认为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一项计划，即与全世界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作为结束。

此外，这一次引人注目的遗漏是根本就没有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



这篇讲话主要是由克拉克·克利福德在乔治·埃尔西的协助下草拟的，埃尔西也像克利福德一样，是脱去了海军军服从政的，不过是充当克利福德的助手。演讲成功地提高了杜鲁门在国会面前的地位。不过，更大的成功是杜鲁门第二天晚间在白宫的宣告所引起的震惊效果：乔治·马歇尔将成为新的国务卿。吉米·贝尔纳斯已辞职，马歇尔已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

马歇尔的任命是杜鲁门总统任期中最明智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像杜鲁门晚年的感慨那样，人们也会感叹：在当时世界事务处于特殊时刻的当口，如果马歇尔谢绝出任国务卿，那么历史将会呈现出怎样的不同啊！来自各方的反应是迅速的，事实上一致表示赞同。亨利·史汀生在写信给马歇尔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说话：“你被任命为国务卿使我对我国所关心的安全问题充满了巨大的安全感。杜鲁门先生提出了一项英明而又十分精明的任命。”

在国会山，阿瑟·范登堡推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没有举行听证、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就通过了这项提名，接着，他又要求暂停应用程序规则，使提名在同一天就获得了参院的一致批准。在某些共和党人看来，这项任命可能产生的一个阴影就是它可能给马歇尔提供了成为未来总统候选人的机会，这种担心在马歇尔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早晨就由他自己亲手消除了。他说，他永远不会作为任何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作为马歇尔，他信守自己的诺言。

当天（1947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在首席大法官文森的主持下，他在白宫宣誓就职。当喜气洋洋的杜鲁门握着他的手说自己是多么感激他愿意接受“这副重担”时，马歇尔仅简单地答道，他将尽全力去干。

在66岁的年纪上，乔治·马歇尔是第一个成为国务卿的职业军人。他于1880年的最后一天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南面的尤宁敦，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从做生意人的父亲那里，他多次听到过自己那些杰出的弗吉尼亚先祖，包括那位远房亲戚、伟大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事迹。他后来曾说：“我觉得不断地叨唠约翰·马歇尔的名字是一种无聊，该是其他的什么人为这个家族浮出水面的时候了。”1901年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他被任命为陆军少尉，此后便稳步提升，先后服务于菲律宾、俄克拉何马准州、莱文沃思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潘兴的副官，指挥美军前进到阿戈纳地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曾在中国服务三年。1939年，罗斯福任命他为参谋长。

他身高将近6英尺，沙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浅蓝，长着宽上唇的长型脸上具有一种朴实的慈父般的气质，在镇定自若中经常显得很悲伤。由于上了年纪，双肩已经开始轻微地向前俯曲。正如迪安·艾奇逊所描述的，他身上没有什么军事魅力，也没有矫揉造作，但却有一种看不见的辉光在影响着人。他常把自己与乔治·华盛顿相比较。像华盛顿一样，马歇尔是一个具有无瑕的正直和自制的人，他既使人产生敬畏，也让人难以形容。丘吉尔称他是“最高贵的罗马人”。杜鲁门顾问班子中的比尔·哈西特则谈及对马歇尔产生的“崇敬”。他在压力下泰然自若（乔治·凯南称之为“一种问心无愧的沉着”），并且永远是那么谦恭，没有一丝的浮华或损人利己的野心。

正如国务院中他的一位属下后来所写，马歇尔并不具有艾奇逊等人那样的智慧异彩，也不具备雄辩的天赋，然而他却能够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种判断力赋予了他无限的价值。

艾奇逊晚年常回忆说，当马歇尔进入一间屋子时，人们就会感觉到他的

存在。“这是一种惊人的统帅的力量。他的形象强烈地向外扩散，他的声音低沉、断续而有穿透力，在回荡中不断增加。它迫使别人尊重。它传播着一种权威感和镇定感。”在五角大楼，一些低级军官知道要倒退着走出马歇尔的办公室；而任何军阶的军官、甚至总统都不能叫他“乔治”，而只能称他“马歇尔将军”。艾奇逊说，这个头衔很适合他，就好像他是以此命名似的。据说，有一次罗斯福叫他“乔治”，他答道：“我是马歇尔将军，总统先生。”

杜鲁门把马歇尔描述为“精明”、“深奥”，做听者多于做说者的人。杜鲁门曾愉快地回忆说：“他从不对你发表任何长篇大论。有时他会面无表情地坐上一个小时，听够了以后，就提出自己的见解，这见解绝对会切中讨论中的那个问题的要害。”不过，使杜鲁门格外赞赏的则是马歇尔那坚韧不拔的责任感，及其无私和正直。“他是那种你在任何方面都能指望其诚实的人。一旦你发现了这样的人，你就必须紧紧地抓住他。”

杜鲁门也高度评价他作为政治家的作用，马歇尔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享有的威望之高几乎无人能比，尽管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曾与他们最不喜欢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系如此密切，正是马歇尔使得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征兵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也是马歇尔向国会领袖们透露了原子弹的秘密，他相信他们会保守这个秘密。

对于马歇尔来说，不久前出使中国的使命一直使他感到极其失望。他试图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之间调停出一个和平，结果得到的仅是一个暂时的停火。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厌恶失败。”然而，失败却是他在离开中国前夕不得不宣布的事情。他报告说：“一方面，政府的领袖们强烈地反对一个共产主义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则直率地申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打算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形式的政府而奋斗……”他为国民党所做的努力根本无效。这是一个充满了腐败的政府，被数量太多的将军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讲话，但我必须对军界的这种支配性的影响力表示悲叹。”而共产党人鼓励的只是混乱和激烈的反美宣传，由于100多万人已经武装起来，他们的力量正在增强。

马歇尔使华失败了，却无人为此而责备他，这是因为这项使命的难度和他本人的声望都很高的缘故。人们都把对他的新任命看作是处于困境中的杜鲁门政府向前迈进的一大步，而不看成是别的什么东西。

马歇尔立即承担起了他的新职责，而人们也立即感到了变化。吉米·贝尔纳斯是一个勤奋的国务卿，其工作比人们通常所知道的、或者杜鲁门后来在反思中所描写的更有效。但是，贝尔纳斯具有疯狂的独立性，喜欢由自己来决定一切事情，并且逐渐发展得越来越不好整治。在任国务卿的546天中，贝尔纳斯有241天不在办公室，显示出对国务院本身没有什么兴趣。在马歇尔的领导下，这种状况整个改变了。波伦回忆说：“他给了人们一种目标感和方向感。他的个性感染了整个外交部门。在行动中有了……比我以前所见过的都要多的明确性……马歇尔从未忘记，而贝尔纳斯有时就忘记，杜鲁门是总统。”

经杜鲁门批准，一个以被从莫斯科召回的才华横溢的乔治·凯南为首的政策计划班子建立起来，使得整个机构更有序，也更有效。当各部门首脑在马歇尔面前陷入争执的时候，他总是对他们说：“先生们，不要争论问题，而要解决问题！”

艾奇逊曾希望辞职回到私人生活中，但被说服留下来再任 6 个月的副国务卿。戴维·利连撒尔在参加了艾奇逊在乔治敦的家中举行的一次宴会后曾写道：艾奇逊发现与马歇尔将军一道工作是如此快乐，以至他在宴会上除了此事外“几乎就没有再谈其他的事情”。马歇尔像杜鲁门一样，非常果断。当艾奇逊告诉马歇尔，白宫旁边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旧建筑已经容不下不断增员的国务院了，而在福吉鲍特姆区波托马克河附近有一座现成的新楼时，马歇尔答道：“搬！”

马歇尔的出任使杜鲁门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更受鼓舞，也更放心。杜鲁门在马歇尔宣誓就职后不久曾写道：“我与他见面交谈的次数越多，就越确信他是当代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还有一次他私下评论说：“马歇尔是一望便知的中流砥柱。”这种钦佩是杜鲁门对他所认识的其他知名人士所未有过的，包括对罗斯福、丘吉尔以及其他任何人。对于用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做他的国务卿，他是毫不犹豫、也毫不忧虑的；毕竟，马歇尔、哈里曼、帕特森、福雷斯特、利连撒尔、艾森豪威尔，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的人。人们也许会想象，杜鲁门可能对诸如马歇尔那样享有巨大声誉的某个人地位太突出以至压过了他自己而感到担心，或者对人们认为马歇尔比他更适于当总统的看法而感到痛苦。其实，杜鲁门既不妒忌、也不担心。他生就不是这种人。他写道：“拥有他的友谊和支持，我确实感到非常幸运。”此言非虚。

到 1947 年 2 月初，白宫的记者们已经在谈论总统日见增多的轻松和安闲的心情了。约瑟夫·艾尔索普给一个朋友写信说：“他不再对每一个来访者悲叹说我不想承担这份工作了，并且再也没有悲叹过。”前重量级拳击冠军吉恩·滕尼对总统做了一次社交拜访后，说道：他从未见到过比总统更为健壮的公民了。“他的眼睛明亮，结实得就像一堵墙。他的脸型四方，腹部就像个运动员似的那么平展。”

在民意测验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歇尔的上任，杜鲁门的支持率回升到了 48%。

整个气氛都变了。在战时对除官方来访者之外的游客关闭了 6 年的白宫，被杜鲁门重新向观光者开放。他和贝丝自 1941 年以来第一次恢复了正式的招待会和国宴，而这正式的社交生活与杜鲁门夫妇在白宫居住区举行的“家宴”之间的悬殊差别是惊人的。

由于总统的历史感，他想要白宫的招待会按照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过（除了战争时期）的惯例去做，并且“分毫不差”。招待员助理领班 J·B·韦斯特赞许地回忆说：“他们恢复了我们的昔日所有的、而我们已经忘记了应该怎样去做的一切壮观、礼仪和华丽。”

我们（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制定出各种细节，以便使总统及其夫人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内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上。例如一场招待会，他们要下楼来到蓝厅接见宾客，然后再回到楼上。但是在幕后，我们要花费几个星期来准备，为“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的每一个细节做出安排。

第一次招待会是 12 月 10 日招待最高法院，出席者达到 1333 人。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身着白领结礼服进行了表演。杜鲁门在 2 月 9 日写信告诉他母亲说，“今天的报纸说贝丝和我在这个季度里已经与 7000 个人握过手。”在

国宴厅为参议员范登堡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使用了金餐具。在举行外交招待会的那个夜晚，出席的人数又超过了 1000（战前，驻华盛顿大使馆和公使馆的外交人员总数也不过约有 500 人）。有一次，杜鲁门邀请音乐会钢琴家尤金·利斯特为“顾客们”表演，利斯特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再次演奏了总统喜欢的肖邦 A 小调华尔兹，不过，这一次却没有总统来帮助翻乐谱。

整个招待会期间我都有些紧张（杜鲁门告诉他母亲），因为招待员克里姆先生和（特工处的）吉米·罗利走来告诉我说，工程人员发现悬挂的中心枝形吊灯的铁链松了……我让表演继续进行，命令第二天再来处理这件事。如果吊灯掉下来，我可真要陷入困境了……

杜鲁门告诉母亲，他很乐意看到大斋期到来，以使这类招待会有个结束。他对于“向我不喜欢的人装出笑脸”感到厌倦。2 月 19 日，在另一封给格兰德维厄的信中，他写道，“这个季节”过去了，“感谢上帝”。然而，真实情况是，每一次宴会他都很开心。J·B·韦斯特回忆说：“尽管他对外界否认，但我们能够看出，总统喜爱宴会。他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一个友善的人，他喜欢交际。”

与此同时，对利连撒尔的任命所举行的听证会正在引起轰动，同为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坚持认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而戴维·利连撒尔有些可疑。这位参议员认为，是格罗夫斯将军发现了裂变原子的秘密；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格罗夫斯不能因此而留下来统帅他自己的发现物呢？

这位参议员从他的座位上俯视着利连撒尔，请问利连撒尔父母出生于何地。当利连撒尔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时，麦凯勒似乎像是赢得了重要的一分。几天后，他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一次，利连撒尔说，他所能确定的仅仅是父母出生于奥匈帝国普雷斯堡附近的某个地方，该地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麦凯勒再次向听众微笑，似乎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设想发展，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然而，当他转过身来出其不意地要求利连撒尔解释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看法时，利连撒尔的回答则使全体听众入了迷。他双手交叉放在面前的桌子上，眼睛既不看麦凯勒，也不看主持听证的委员会，而是盯着双手上方的某一点，几乎就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讲了好几分钟。他感到了内心埋藏着的一种积郁，他后来写道，这“远非愤恨或者怒气，而是某种相当不同的感情上的涌动，是绝对的激动”。当他讲话时，他不断地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要克制；要坚定地讲。”

我相信（他说）并且抱有这样的信念：合众国宪法，正如宗教一样，是支撑于个人的完整这个基本前提之上的；一切政府和一切私人机构必须被设计来促进、保护和保卫个人的这种完整和尊严……

因此，任何形式的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机构，只要它把人本身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服务的目的，只要它把国家或任何其他机构置于人的价值之上，把对人的任意处置权作为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那它就与这种观念相对立；因此，我也就由衷地反对它……共产主义

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即是目的本身，因此国家对个人行使的权力便没有任何限制它们的道德标准。对此我深表怀疑。

简单地说一个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很容易。当然，即使我的履历就在这里，我仍有必要非常肯定地申明这一点，然而，这使我感到极为沮丧。谈论反对共产主义是很容易的。相信那些提供了满意而有效选择的东西则同样重要。民主制便是令人满意的选择。

它在世界上的希望在于它是一种肯定的信仰，而不是一种简单地反对其他东西的信仰……

我深信民主制有能力战胜任何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考验，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它的话。

在我们必须实践的事情中包括这样一项，即在我们炽热地寻求探查出我国的颠覆势力和反民主势力的同时，不要通过歇斯底里或使用含沙射影、冷嘲热讽及其他不幸的手法来玷污我们信仰的事业，不要用纯粹的攻击、对某些人的忠诚进行的纯粹的不实的攻击来造成人民的分裂，导致一些人或一个人去憎恨另一些人……

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在正义的法庭中没有位置。如果保护个人及其名誉免受流害和传闻的损害这样的原则不能在立法机关的调查活动中获得支持，那将是民主制观念的一个失败。接着，他停顿了一下，把交叉着的双手放开，说道：“这就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一时间，屋子里静悄悄的。然后，几乎是猛然间地，委员会的成员和听众席上的人们开始拥上去围住利连撒尔，赞扬他所说的话。

杜鲁门从白宫使利连撒尔得知，他不仅坚持这项提名，而且要倾其全力来进行这场斗争，“即使它持续 150 年”。

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种反犹主义情绪在反对这项任命的势力中逐渐明显起来。接着，在没有任何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参议员塔夫脱不等委员会的报告送达参院便宣布：他反对这项提名，因为利连撒尔不仅是个“典型的渴望权力的官僚”，“情绪易冲动而不适宜”担任领导原子能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表现软弱”。在此之前，一直是麦凯勒在表演，因此这基本上还是属于个人问题并且在意料之中（以前这位参议员在反人头说法案背后也曾看出过有共产党人）。但是现在由于“共和党先生”卷入，它变成了一个明显的党派问题，并且如人们所说，成了一场严重的国会危机。“对共产主义软弱”这一用语立即流行开来。

利连撒尔看不到在共和党多数议员集合起来反对他的情况下自己如何能够赢。塔夫脱的讲话是“一个意外而激烈的打击”。批准程序还要持续多久？付出多大代价？谁也说不清。

“勇气：它是什么？”利连撒尔在日记中问道，“难道不就是坚持下去的能力吗？”

在 2 月份的一封信中，杜鲁门告诉他妹妹：几天来他一直试图找出时间来给她写信。

他比平日更希望保持接触。母亲最近跌了一跤，摔裂了髌骨。杜鲁门曾

飞回家去看望她，并且一直对她的状况特别担忧，而且也关心压在玛丽·简身上的照顾母亲的负担。“玛丽，别太累着。”如果她需要帮助，将会得到。

“这儿的一切都进展得很快，”他告诉她。外交事务是最主要的。马歇尔一个多星期后要去莫斯科参加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外长会议。他本人则要在3天后飞往墨西哥，进行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对墨西哥的首次访问。“我现在每天都和马歇尔一起研究政策，并希望我们能获得最终的和平。目前，情况看来并不妙。”

写这封信的日子是1947年2月27日。6天前，即21日，也就是马歇尔接任国务卿正满1个月的那一天，由英国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发出的一份紧急的正式咨文，即所谓的“蓝皮书”，被递交到国务院。马歇尔因到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纪念会上去发表演说而不在市内。因此是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当天下午打电话通知杜鲁门的。英国由于财政状况恶化，不能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个代价太高了。艾德礼政府将从希腊撤出4万军队，所有的经济援助到3月31日时将停止。美国被指望来承担这项责任。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也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英国已经陷入绝境。整个欧洲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寒冬的袭击。在法国，严寒摧毁了数百万英亩的冬小麦，巴黎多年来第一次降下了大雪。在柏林，气温一直徘徊在零度左右，人们正挣扎在严寒之中。从波罗的海通往北海的基尔运河被坚冰所封。到处都缺乏食品和燃料。在布拉格，每天停电3个小时。而英国遭受的打击最重，实际上全国都被大雪封盖。工厂和学校关闭了。巨大的雪堆阻断了公路和铁路，封闭了煤矿，使数百座小城镇与外界隔绝。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在一条主要的海岸公路上行驶的一辆公共汽车开进了一个10英尺的大雪堆里，一辆扫雪车赶去营救，结果连这辆扫雪车也被埋进了雪堆。2月6日《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标题写道：“天气威胁着煤炭供应。”为了节约电力，伦敦的各办公室中点上了蜡烛。暴风雪持续不断；2月21日，即英弗查佩尔勋爵发出咨文的当天，它又袭击了英国大部分地区。

在此期间，英国政府于1月20日发表了经济《白皮书》，把英国的状况描述为“极端严重”。英国不久将被迫裁减武装部队，在海外承担的义务不言自明。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这种形势将“震动世界，并使我们的地位极度脆弱而陷入危险的孤立之中”。

具体的警告几个星期前就已到达了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早在2月3日，美国驻雅典大使林肯·麦克维就报告说，谣传英国正在从希腊脱身。1945年以来，他们的军队和金钱已经帮助那里的保皇党政府在与共产党游击队的激烈内战中得以维持。2月12日，另一封发自麦克维的急件敦促立即考虑向希腊提供美援。几天后，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商、时任联合国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的马克·埃思里奇从雅典发回电报，称希腊是准备落入苏联之手的一个“成熟的李子”。

有关土耳其问题的警告甚至来得更早。接替艾夫里尔·哈里曼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发回的电报中称，土耳其已“没有什么独立幸存的希望了，除非它确信能获得可靠的长期的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此外，杜鲁门本人也已经明确地向希腊政府（即使还没有向美国人民）表达了他对希腊未来的关注。1946年秋天，杜鲁门通过麦克维大使已经告知希腊政府，希腊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并且答应提供充足的援助以维持它

的独立，只要希腊政府能够显示出将在本国保持民主制。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因为希腊政府正如杜鲁门所知和后来所写道的，“似乎在鼓励不负责任的极右翼集团”。

不过，尽管希腊和土耳其的危机并非没有预先警告便到来，但英国撤退的正式宣布确实如杜鲁门所说，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要早”，而且它那种极其正式的外交礼仪也使得它似乎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不安。

2月21日是星期五。杜鲁门要求艾奇逊在下星期一提出一份报告。艾奇逊、波伦和其他人整个周末都在国务院的旧办公楼中工作；因为准备向福吉鲍特姆区搬迁，旧办公楼的走廊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捆好的箱子。星期一那天，马歇尔和艾奇逊会见总统，敦促“立即行动”，向希腊提供援助，同时也向土耳其提供规模小一些的援助。马歇尔认为，英国宣布从希腊撤退就等于是它从整个中东地区撤退。他也认为这种形势是极端严重的。单是1947年剩余的时间里，希腊所需的援助数额就达2.5亿美元。

杜鲁门表示同意。希腊急需迅速而大量的援助。

不过，对希腊的援助仅是问题的一面。自凯南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发表以来，已有一年的时间了。某些事情比一个简单的援助法案更亟待解决。在这上面，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克利福德，实际上所有在决策上有发言权的人都是看法一致的。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约瑟夫·琼斯敦促马歇尔国务卿，而不是总统，走在国会的前面去唤醒这个国家以面对危机的现实；因为（正如琼斯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所写的）马歇尔是“政府中唯一具有能给这个国家造成深刻印象的这种威望的人”。

事情确实正像杜鲁门告诉她妹妹的那样，“发展得很快”。27日上午，他与国会领袖在他的办公室举行紧急会见。他们首先听取了马歇尔的报告。马歇尔以慎重的语调告诉他们：“如果说我们正面临着的一系列可能扩展苏联对欧洲、中东和亚洲的统治的危机中的第一个危机的话，这并非是危言耸听。”选择在于“精力充沛地采取行动或因放弃承担义务而认输”之间。

艾奇逊认为马歇尔未能讲出问题的真正实质，因此要求发言。他说，已经没有时间来作字斟句酌的评价了。希腊是一个会感染整桶苹果腐烂的苹果。“苏联正在以最小的代价进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它无需赢得全部的预期价值。”艾奇逊讲完后（根据后来他自己的描述），范登堡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总统，如果他到国会去以同样的方式讲同样话，那么他范登堡将会表示支持，而国会山的大多数议员也会支持。他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杜鲁门把国会吓得必须采取行动，那么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就能得到。不过，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尽管他十分尊重艾奇逊，却根本没有提及艾奇逊所描述的那些艾奇逊本人的话及范登堡的答复。杜鲁门只是说，马歇尔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选择在于行动或因放弃义务而认输之间，“而我表示完全同意这种看法”。

会见在中午结束。会见时的谈话内容未向外界披露。

墨西哥城的市民是杜鲁门从未遇到过的那种市民。成千上万的人涌入街道，首次目睹并向一位美国总统欢呼。这段行程是杜鲁门的主意，而欢呼的场面也确实激动人心。他回报着人群中“万岁”的欢呼声（一位妇女高喊：“万岁，密苏里！”），几次越过墨西哥警卫和秘密保安人员的警戒线去与群众握手。他告诉墨西哥议会，“我一生中从未受到过如此的欢迎”，并向它保证要重新实行罗斯福的睦邻政策。后来他又对一群美国公民说，希望他

们记住：他们也都是大使。

第二天上午，他突然宣布希望在墨西哥城历史上有名的查普特佩克城堡做一次未经安排的访问，这个访问使得他仅用了这样一种简单的、未经事先通报的姿态，便为改善墨—美关系而做了比一个世纪中任何美国总统所做的都要多的事情。几个小时内，随着这个消息的传开，他已经变成了一位英雄。

长长的汽车行列驶入一片古树的阴凉中，杜鲁门迈出他乘坐的黑色“林肯”车，走向镌刻着“少年英雄”名字的石质纪念碑。这些英雄是6名10多岁的军校学员，在1847年美—墨战争中美军对这座城堡发动的猛烈攻击中阵亡。根据传说，其中的5人用刺刀自尽，而第六个人则从城墙上跳下殉难，宁死不降。杜鲁门走近纪念碑时，一队身着蓝制服的墨西哥军校学员立正致敬。当他把花圈放在纪念碑脚下，几名军校学员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杜鲁门低头静默了几分钟，然后返身回到轿车的行列，此时，墨西哥的司机们已经在与他们的美国客人们握手。

这件事立即在墨西哥城引起轰动，各报的报道都使用了占8栏宽的头号大字标题。一家报纸的标题是“向1847年的英雄致敬，杜鲁门永远地抚平了旧的民族伤痛”。另一家报纸则写道：“友谊从今开始。”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告诉一个美国记者说，“想到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会来道歉”，他都想哭。一位著名的墨西哥工程师写道：“100年来的误解和痛苦被一个人在一分钟之内一扫而光。这就是最好的睦邻政策。”

墨西哥总统米格尔·阿莱曼宣称，杜鲁门总统是“美洲各共和国之间团结和谅解的新的倡导者”。

在被美国记者问及为什么要去这座纪念碑时，杜鲁门干脆地答道：“勇敢者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我尊重勇敢，无论我在哪里见到它。”

3天旋风般的访问结束于3月6日，当天破晓前，总统一行乘《圣牛》号专机启程回国。杜鲁门向舱外望去，月光还映照在机翼上。尽管时间很早，晨风尚寒，却有1000人来到机场向他道别。

半年多以前的1946年7月，仅有几个人意识到苏联问题的重要性，但杜鲁门却已经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准备出一份对美苏关系的综合分析，这是这类报告中的第一份。

这个项目立即就开始进行，虽然它一直由克利福德负责，并且最后成稿中的许多调子和重点是经他修改加入的，但真正的工作，即研究和撰写，却是由他的助手乔治·埃尔西完成的，也是埃尔西首先建议搞这个项目的。埃尔西后来解释说，他感到杜鲁门判断俄国问题的“基础过于狭窄”，他的忧虑经常局限于俄国是否会履行它所签订的协议上。

1946年9月，埃尔西完成撰写时，这个报告竟达近10万字。它极为详细，并且显然受到了凯南“长电报”的影响。不过，它的大部分内容是来自与行政机构内部（包括国务院和陆军部）十几名关键人物的交谈或他们撰写的各类报告，总之，它是一份远比“长电报”更令人惊恐的正式文件，即便如埃尔西本人后来所说，它的大部分材料已经在以前由贝尔纳斯、福雷斯特、哈里曼、李海，甚至早至1945年4月由哈里·霍普金斯提请杜鲁门注意。

它的标题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开篇便声称这种关系提出了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苏联领导人看来正走在“一条谋求使苏联最终能统治世界的扩张道路上”。

苏联“一贯地反对”英美达成世界和平协议的努力，因为和平协议拖延



得越久，红军部队就能够越长时间“合法地”留驻在“敌对的”国家中。此外，苏联人正在其卫星国中保持着超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他们已经控制了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奥地利，仅仅是由于英国、法国和美国占领部队的存在才避免了苏联的接管。

共产党正在法国和意大利发展。在虚弱和分裂的中国，苏联正处于一种“能施加比任何其他国家所作的都要大的影响的地位上”。苏联人正在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而在朝鲜，他们已经表示赞成这个国家的统一，只要能保证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

最为不祥的是苏联的军事力量：

斯大林大元帅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支持建立一支比任何潜在的外国联盟的军队都更强大的武装部队，他们在尽速地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他们正抓住一切机会扩张地盘，使之直接或间接地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以便为苏联的关键地区提供额外的保护。

威胁正在增长。俄国正在加速发展“核武器、导弹、生物战设备、战略空军、远航程潜艇……”这份不祥的报告继续写道，苏联也在积极地指挥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

由于“军事实力的语言”是俄国人唯一懂得的语言，因此，美国必须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限制”苏联的影响。同时，美国也必须准备进行核战争和生物战争。“做好了准备这个事实也许是对苏联侵略行动唯一的强有力的威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和平的唯一有效的保证。”

在回顾了中东的形势后，报告指出，苏联人希望武装部队从希腊撤退以在那里建立他们的另一个“友好”政府。他们希望土耳其成为一个傀儡国家，以作为他们控制东地中海的一个跳板。

最后，报告总结道，美国除了保持它的军事力量外，“应该支持和援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苏联威胁或危害的一切民主国家”。

在报告草本接近完成的时候曾请乔治·凯南过目，他评价说：“非常出色。”杜鲁门是在一天夜里读到报告的定稿的，他非常兴奋，凌晨便在家中给克利福德打电话，问有多少副本。10本，克利福德回答说。杜鲁门要他立即把其他9本“妥善地锁藏好”。他告诉克利福德，这份报告太“敏感”，一旦泄露，对他和平地解决东西方争端的努力将产生“非常不幸”的影响。

它对杜鲁门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很难评估。杜鲁门也从未讲过。克利福德在讲述杜鲁门时代时，会强调它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埃尔西则要有节制得多。埃尔西推测说：“它产生的所有效果合在一起，可能对总统造成了某些影响。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准确地说出帮助他决策的所有影响究竟是什么，你决不可能知道，而总统或其他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说，在杜鲁门从墨西哥回国后，是克利福德和埃尔西为他将在国会发展的有关希腊形势的历史性演说作了最后的润色，而这个演说中的大部分内容直接来自这份报告。

在3月7日即杜鲁门从墨西哥回国后的第一天所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艾奇逊说，距希腊的彻底崩溃只有几个星期了。“如果我们卷入，我们不能保证会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获得成功。如果我们不卷入，那么这个地区

必将会出现崩溃。”当然，还存在着“军事冒险”的可能性。

杜鲁门感到自己面对着比以往任何总统所遇到的都要困难的决策。给希腊的金钱仅仅是一个开始。“它意味着美国正在卷入欧洲的政治……”总统班子的成员都把这次讲话看成可能是杜鲁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演讲。

演说的第一个草稿已由国务院准备好，但杜鲁门觉得它太冗长，也太技术性了，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它更像是一份投资说明书。他也想要加进一个对美国政策的强有力的声明。艾奇逊对草稿进行了删改，修改了几个段落，包括一个关键的句子，这句话基本上重复了克利福德—埃尔西报告中关于帮助处于危难中的国家摆脱苏联威胁的话，只是在这里没有提及苏联的名字。

演说原稿中写道：“美国的政策是支持正在反抗由武装的少数集团或由外来压力企图进行的征服的各国自由人民。”艾奇逊将它改为：“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

克利福德认为，是采取一种反苏立场的时候了，是在一场唤醒美国人民的战役中“鸣枪”的时候了。正如他敦促总统决不向约翰·刘易斯让步一样，现在克利福德敦促对斯大林作出强硬反应。

另一方面，乔治·凯南则认为这个演讲走得太远了；而在巴黎，马歇尔与陪同他去莫斯科的奇普·波伦一起审阅了这篇演讲稿，都觉得它“词藻过于浮华了”。

当伯纳德·巴鲁克（他在政府中没有正式职位）表示希望对此问题也有一份发言权时，杜鲁门拒绝了。“如果你采纳他的建议，”杜鲁门说，“那么他就会时时在你身边唠叨，而这就成了他的政策。我才不打算这样做呢。是我们要做决策，而我们将做出决策。”

（戴维·利连撒尔后来从克利福德那里听说了这事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的这个评价使我很感兴趣，因为它是如此地具有常人的特性：一个总统所能享受到其中乐趣的少有的几件事情之一，竟是决定他将征询谁的意见。”）

杜鲁门让克利福德和埃尔西按照他的意思完成了最后的草稿。他不是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能够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向国会发表演说的前夜坐在打字机旁打出自己的演讲稿。不过，杜鲁门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不想要任何模棱两可的话……它必须明确，毫不吞吐，毫不含糊。”

在答复马歇尔关于“词藻浮华”的忧虑时，马歇尔被告知说：根据行政部门、包括总统的意见，如果不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参院将不会批准这项新政策。也许这是对的。

几年后，在一次采访中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你知道，在人们处理问题时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表现得过于理智。”

那些坚持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的人往往不能在需要把握住的地方下决心。

但对杜鲁门来说，这从不成其为问题，这样说毫无贬义。在他下决心之前，他想要知道所有他能够知道的事实。不过，如果在允许的范围内他只能得到80%的事实，那么他不会让那尚未得到的20%的事实来束缚他、使他犹豫不决。他相信，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根本做不出决定要好。当他下决心时就是如此……

我们已经经历了全世界都卷入了的最大的战争……这是 1947 年。那场战争结束于 1945 年 8 月。但哈里·杜鲁门有充分的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他一直在担心它，考虑它……我记得自己当时认为：如果苏联军队愿意的话，简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们直接向西挺进到英吉利海峡……然而他决定必须阻止它……哈里·杜鲁门考虑着这个问题，并且逐步地去解决它。

那个提出了后来成为人们熟知的“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是 1947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三，于众议院会议厅面对国会两院的议员发表的。演说开始于 1 点过几分。它是一个持续了 18 分钟的坦率的宣言式的声明。希腊处于极端的危险中，形势十分紧急。希腊现政府已不健全，而美国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谴责右的或左的极端主义的措施。尽管土耳其不像希腊那样，已经免于崩溃和战争的苦难，但土耳其也需要美国的援助。

杜鲁门说，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创造能使我们和其他国家在其中建立一种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环境”。这是与德国、日本和那些试图“把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国家作战的一个根本争端。

他身着黑西服，颈系黑领带，拿着一本打开着的笔记本，沉稳而有力地读着。听众们静静地洗耳恭听，很少有人走动。在第一排座位上，约翰·斯奈德不住地点着头。在他旁边，穿着入时的艾奇逊双手交叉放在膝上，笔直地坐在那里，好像是出席一个纪念活动。再旁边，塔夫脱参议员正下意识地摆弄着自己的眼镜，用它摩擦着脸，接着又打了个哈欠。在杜鲁门身后的高主席台上，马丁议长和范登堡参议员正跟随着演说在逐行地浏览手中的讲稿印刷副本。

在世界历史的当前时刻，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这类选择却往往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

一种生活方式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并且以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为特征。

第二种生活方式以被强加于多数人的少数人意志为基础。它依赖于恐怖和压迫、受到控制的报纸和广播、预先安排好结果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正在反抗由武装的少数集团或由外来压力企图进行的征服的各国自由人民。

我认为，我们必须援助各国自由人民使之能以自己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认为，我们的帮助应首先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方式，这种方式对达到经济稳定和有序的政治进展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决定命运的时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其影响不论是对西方还是对东方来说，都将是深远的。

我们必须采取迅即而果敢的行动……

对于正在国会大厅里和从广播中聆听演讲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

奇特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危机时刻。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已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想象的繁荣程度。生产在增长，收入在增长，很少有罢工，买新汽车不必再等待，也不再肉类短缺。白衬衣、尼龙袜、钓鱼杆和高尔夫球又重新出现在货架上。由于“士兵权利法案”的通过，400多万退伍军人进入了大学，如果在别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然而，这个演说似乎搅乱了一切，像是在号召准备战斗。“好了，我告诉我老婆去准备好我的军服。”一个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录取的复员兵对记者说。

赢得那场战争的代价是3410亿美元，现在希腊和土耳其需要4亿美元。“我们踏上的是一条形势严重的道路，”杜鲁门最后讲道，而他的表情也确实严峻的，“另一种选择如果不是更严重得多的话，我不会建议这样做……如果我们在领导方面犹豫不决，我们就可能使世界和平受到危害，而且我们也肯定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

整个大厅爆发出掌声，不过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写的，它更多的是对一个勇敢者的称颂，而不是对其政策的一致接受。杜鲁门合上写有演说稿的笔记本，双手拿起它放在胸前，数次向来自左右方向的掌声点头致谢，但却一直没有笑。

各报社论的反应是支持者呈压倒之势。《纽约时报》将这个演说与门罗主义相提并论。《时代》和《生活》杂志的编者认为它终于出色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生活》杂志写道：“这篇演说就像一道闪电，穿透了混乱的国际空气。”《科里尔》杂志说：总统“获得了名望上的最大成功”。不过，支持也不时地伴随着忧虑的保留一同表达出来。旧金山《考察家报》就问道：“我们是否准备继承19世纪英帝国主义的衣钵？”而一些自由主义的报刊则被激怒。《下午报》指责杜鲁门毁灭了罗斯福的整个对苏政策。

沃尔特·李普曼的反对是最有分量的，虽然他赞成援助希腊，但却不同意总统的论调。李普曼警告说：“一项模糊不清的全球政策，它听起来像是意识形态的十字军讨伐的警报，是没有限制的。它无法控制，其效果也无法预言。”

对于这篇演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似乎无人表示怀疑。《新闻周刊》写道：“如果言辞可以塑造国家的未来，那么这些言辞无疑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它们显然已使美国置于强权政治之中并留驻在那里。”

在国会山，范登堡参议员很快就强调说，他并不把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看作是一种“普通的模式”，而只是把它看成是“适应一种特定环境”的某种政策。艾奇逊也告诉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这项法案并不打算为未来建立一种模式。他强调指出，美国“当然”会“根据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环境”去采取行动。

国会中的反对既来自自由派，也来自保守派。佩珀参议员确信这样一种政策将摧毁对苏和解的一切希望。比尔德和麦凯勒参议员主要是因为费用问题而持反对态度。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哈罗德·克努森说：“我猜想那些空想的社会改良家直到使我们大家都破产了才会感到舒服。”

杜鲁门发表完演说后几分钟，便已踏上了去机场的路，准备再次飞往佛罗里达。华莱士·格雷厄姆解释说，总统“最近工作相当辛苦”，需要休息。的确，总统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从基韦斯特写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说，没

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他被“这个可怕的决定”搞得是如何的“疲惫不堪”。他告诉她：不过，共产主义的警察国家与纳粹的警察国家没有任何不同。这一点，从波茨坦会议以来他就很清楚。

从杜鲁门在国会戏剧性地发表演说到最终投票赞成援助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参院在利连撒尔的提名问题上的斗争越发激烈和出格。反对者几乎都是共和党人。俄亥俄州的国会参议员、1944年杜威的竞选伙伴约翰·布里克警告说，这也许是使原子能委员会摆脱左翼分子控制的最后机会。印第安纳州的凯普哈特说：特别是现在，考虑到希腊和土耳其的形势，对原子能的控制应该交还给陆军。这个主意也得到了塔夫脱参议员的赞同。曾服务于杜鲁门委员会的缅因州的布鲁斯特声称，利连撒尔对共产主义的中性立场使他感到了一种如同利连撒尔就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一样的威胁。

杜鲁门私下写道：“如果利连撒尔先生是共产党人，那么我也是。”杜鲁门发誓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让这些无聊的政客毁灭了一个好人……”杜鲁门认为，塔夫脱正在成功地使他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蠢才。

几名共和党人——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马萨诸塞州的索顿斯托尔、佛蒙特州的艾肯——宣布支持这项提名。不过，决定性的时刻是4月3日下午，在一次紧张的会议上，范登堡发表了讲话，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最出色的一次演说。

范登堡说，“无论别人怎么想入非非”，利连撒尔也“绝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范登堡要求批准利连撒尔的任命时，边座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参院对这项批准任命的议案做了一些修正，并举行了一次预备性表决。当时利连撒尔正与杜鲁门一起在白宫里，查利·罗斯从门外探进头来报告了表决结果。他们以14票的多数获胜，这个票数比任何人能够估计到的都要多。杜鲁门克制着感情，深沉地说道，原子能是“现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你必须取得它的允准，”他指着墙角处的一个地球仪说，“否则我们将会把那玩艺儿整个炸成碎片。”

参院最后的正式表决是在4月9日，当时总共有20名共和党人公然蔑视塔夫脱而投票支持利连撒尔。在南部民主党人中，除麦凯勒外仅有4人投票反对他。提名以50票比31票获得批准。这是杜鲁门与新国会较量的首次考验，也是他获得的一次漂亮的胜利。

然而，忠诚的问题——用塔夫脱的话来说，即谁对共产主义温和或谁不温和的问题——却绝没有结束。共和党领袖在秋季的选举中已经使共产主义问题成了一个主题并获得如此的成功，他们在调查中将会继续提出这种要求；而杜鲁门为阻止两党中保守派的这种进攻，此时已接受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以及司法部长克拉克和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的——观点：有必要实行一项忠诚审查计划。这整个观念都使他心烦意乱。克拉克·克利福德1947年5月与总统进行了一次谈话后，在笔记中写道：“（他具有）极强的反联邦调查局情绪……想要确实地牵制联邦调查局，担心（它成为）‘盖世太保’。”

此外，杜鲁门认为，大量的事情正在过分地被制造成“共产主义的鬼怪”，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乔治·厄尔的一封信中他也是这样写的。这个国家“只要关注共产主义就会格外安全——我们的这种稳健的人简直是太多了”。

然而，政治压力却非常沉重。司法部长克拉克承认政府中不忠诚的雇员人数也许很少，但却争辩说，即使有一个这样的人也会构成严重的威胁。埃德加·胡佛想要得到从公共机构中清除其观点在政治上可疑的任何人的权力。他警告说，这种人可能会以一种“偏袒其意识形态上选择的那个外国”的方式来深刻地影响对外政策。像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人一样，胡佛也把国务院看作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乔·马丁在他作为众院新议长的首次演说中已经宣布：“在美国政府中没有任何选择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人的位置。”关于新政被共产党人所迷惑的指责被不断地重复，并被广为相信，然而却找不出证据。马丁新近才记起来：“民主党长期的执政已经毒化了我们共和党人呼吸的空气。对政府被共产党渗透的担心是一种可怕的新现象。对国务院的怀疑是普遍的。我们被苏联的新实力所打扰、所困惑。”

杜鲁门特别担心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可能会在其脾气暴躁而使杜鲁门鄙视的共和党主席、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 J·帕内尔·托马斯的领导下走向极端。杜鲁门希望在忠诚问题上抢先采取行动以阻止托马斯。更重要的是，他想要在国内避免关于行政当局对共产主义温和的指责，就像他正在要求在国外对共产主义采取一种新的强硬立场一样。

1947年3月21日，星期五，即他向国会发表演说后的第九天，杜鲁门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公布了一项精心设计的《联邦雇员忠诚和安全计划》。他做这件事时心里感到很担忧。

1942年，罗斯福曾授权文职机构在“有理由怀疑其忠诚”的情况下取消任何雇员在政府中工作的资格，根据罗斯福后来签署的行政命令，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审查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状况。不过，那是在战时。迄今为止，在和平时期还从未采取过这样的步骤。

杜鲁门后来写道，他的目的是双重的：既防范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不忠诚雇员，又保护清白的政府工作人员使其免受不实的指责。为了证明他不打算在这个计划中玩弄政治手腕，他任命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名叫塞思·理查森的华盛顿著名律师来掌管该计划的审查委员会。

所有的联邦雇员，不论其承担什么工作，都要接受忠诚调查。联邦调查局和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档案将被调用。任何人只要被发现不忠诚，就不再能从事政府工作。解雇的原因可以仅仅是“有合理的根据相信此人不忠诚”；然而，从未对“不忠诚”一词下过定义。更有甚者，那些受到指控的人不能与指控他们的人对质，甚至不知道指控他们的人是谁，具体的指控是什么。此外，司法部长受权开列一张颠覆组织的名单。

利连撒尔很清楚那些自称“共产党人的搜寻者”可能给忠诚的政府雇员所带来的折磨，他认为那整个计划都是不样的。在政府中工作的任何人都可能会被任何一个恶毒的指控者来任意摆布。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任何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被看作是清白的这条惯例已经被颠倒了。”然而，利连撒尔也承认，某些这类事情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连《纽约邮报》这样的自由原则的坚定支持者也把这项计划称作是对颠覆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回答。在随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很少或根本就没有被问及这件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他给宾夕法尼亚州前州长的信。他真的如此不担心“共产主义的鬼怪”吗？

杜鲁门答道：“我不担心共产党会接管美国政府，不过，我反对一个不是对美国表示忠诚的人担任政府的工作。”当时，这似乎是任何人都能

够要求得到的答复。

几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联邦雇员名单上的 200 万人逐一进行“个人甄别”，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又耗费钱财的任务。到 1951 年的 4 年多时间里，经文官委员会调查并结案的联邦雇员有 300 万人，联邦调查局也审查了 1.4 万人。数千人辞去了联邦职务，仅有 212 人因忠诚有问题而被解雇。无人被起诉，也没有发现任何间谍活动的证据。

几年后，克拉克·克利福德沮丧地说，整个计划是“对这个时代的趋势的一种反应”，他看不出杜鲁门除了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不过，在与新闻记者卡尔·伯恩斯坦的谈话中，克利福德却要率直得多：

（克利福德告诉伯恩斯坦）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杜鲁门正在准备 1948 年的大选，而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我个人的感觉是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我认为整个事件都是虚构的。我们从未对真正的忠诚问题进行过一次认真的讨论……总统并未把基本的注意力放在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恐慌上。他认为这大都是些胡扯。不过，政治压力摆在那儿，他不得不承认它……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存在着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被虚构出来的……

（对伯恩斯坦来说，这可是一个让人感到格外心寒的披露，因为他自己的父母就属于忠诚计划的牺牲者之列）。

从政治方面来看，第 9835 号行政命令的效果的确是明显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正像《时代》周刊驻国会记者弗兰克·麦克诺顿在给该杂志编者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所言：

共和党人现正严肃地看待杜鲁门……他的关于从政府雇员中搜寻颠覆分子的命令引起了国会的一致注意，而且还进一步地从他的政治诋毁者的脚下抽走了地毯。关于“政府中有共产党人”以及政府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指责，这个反对派最得意的话题，将完全不再能成立……共和党人开始认识到，杜鲁门绝非是个能够轻易被击败的对手。

杜鲁门对埃德加·胡佛的担心一直在困扰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能够阻止（这事情），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秘密警察）或盖世太保。”他在写给贝丝的私人信件中说，“埃德加·胡佛的组织将会给一种公民间谍系统的建立开一个好头。这绝对不行……”

多年后，当忠诚计划的有害影响清楚地显露出来时，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能以站不住脚的理由辩护说，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了“在当时舆论气候下”的公正。然而，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他承认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的，它太可怕了。”他说。

1947 年 4 月 22 日，参院以 67 票对 23 票的压倒多数同意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5 月 9 日，众院像参院一样，以将近 3 比 1 的票数、即 287 票比 107 票通过了这项法案。5 月 22 日，在格兰德维厄探望他母亲期间，杜鲁门坐在她小客厅中那张教会家具式的橡木桌旁，签署了这 4 亿美元的一揽子

援助法案。“杜鲁门主义”获得了认可。

尽管它当时似乎是这样，并且在后来的报道中也经常被说成是这样，但是，杜鲁门主义并非美国政策中的一个突然的激烈的转折，它不过是一个原则的宣言。它是自波茨坦会议以来一项持续变化的政策的继续，其精髓可以在凯南的“长电文”及比之更为有力的克利福德—埃尔西报告中找到。甚至可以说，它起源于波茨坦会议以前艾夫里尔·哈里曼与杜鲁门的首次会晤。

不过，即便如此，杜鲁门主义将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论其效果是好是坏，也不管艾奇逊和范登堡曾做出过何种保证说这并非是它的意图。

### 3

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时曾说，不可能有比这更激动人心或更重要的时期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之一。在那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鲁门和美国拯救了自由世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国务院中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在经历了长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生涯后，也反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当时完成的工作所给予他的那种愉快。迪安·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他写道，他们“参与了创世”。

他们的振奋部分地是来自当时极度紧急的状况。形势发展得很快。杜鲁门回忆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时间却很少。”计划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构想并阐明，运用想象力，做出决策也是如此，而且还总是要在现实与政策的无法估量的效果之间权衡轻重。压力始终不减。乔治·埃尔西在回答日后的批评时说：“你无法坐下来，占用时间来仔细思考，令人作呕地辩论所有要点。你没有时间。后来的某些人可以坐下来几天、几个星期，并讨论出怎样能把事情做得不同。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却与当时的情况相距甚远。”

由于期限的压力以及长期的紧张，人们的情绪通常总是很激动。围绕起草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初报告的斗争是乔治·凯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次心智上的煎熬”。凯南与同僚们的一场紧张的辩论形成了他在国务院所经历的一个受难之夜，以至他不得不离开房间走到屋外，绕着整幢大楼踱步、哭泣。

此外，他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与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正在开拓，世界的形势，正如艾奇逊所说，“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处理它的人的经验来说，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响每一个人的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总统在观点上的变化，至今这个问题仍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描写“新”杜鲁门的文章大量出现，因为这种变化确实引人注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情绪高涨”，整个“华盛顿的政治局面已经改观”。奥尔登·哈奇在《自由》杂志上写道：总统如今已“完全不同”，“镇静而有力”。“哈里·杜鲁门最近的变化被各种评论归因于他的新顾问们，或者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变化。事实上，这不是变化，而是成长。”《柯里尔》杂志写道：他的声音、他的举止有了一种“新的权威”。他不再是罗斯福的“替身”。《时代》杂



志注意到杜鲁门的公众支持率猛增到 60%，称赞他对“他的职权的尊严所具有的新意识”。《时代》杂志写道：总统已经有了“一种新的信心和一个新的公式：顺其自然”。

4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美国报刊编辑协会的几百名成员聚集到杜鲁门的办公室，听他发表即席讲话。杜鲁门像往常与这种团体接触一样使人印象深刻——轻松、自信，确信能以一种惊喜来打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说，杜鲁门主义绝非政策上的一种“突然”转变，他回顾了从他两年前在这同一个房间中第一次与莫洛托夫会面以来的对苏关系的历史。他确信能够找到解决与苏联之间问题的办法，相信一个长期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我相信这，就像我正站在这里一样的那么真诚。”“支持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信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与苏联人的谈判极其艰苦。“他们天天都在讨价还价，昨天达成的协议可以对今天或明天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约束。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政策是什么。”

他告诉他们，他刚与一位在 68 小时内做完环球飞行的飞行员谈过话。“从道义上和国际上讲，我们必须赶上这机器的时代。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创造世界和平的方式来赶上它，否则它将摧毁我们以及其他每一个人。这种后果是我们不堪设想的。”

他的属下都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演说，与一年前在记者招待会上那种笨拙的表现相比大不相同。

白宫班子的士气从未有这么高。杜鲁门骄傲地谈起他们，并深情地称之为他的“团队”。他们也献身于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越来越了解他，就像那些曾与他一起在陆军中服过兵役的人们一样。他们喜爱他，把他看作是一个男子汉，并且像对待领导人一样格外尊重他，钦佩他的勇敢、果断和那发自内心的正直。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他们天天见到的哈里·杜鲁门，几乎完全不同于那个刻板的哈里·杜鲁门、那个趾高气扬、满嘴脏话、“喜欢激动的小伙子”了。他成了一个沉默寡言、性情温和、具有非同寻常的仁慈之心的人，他对他属下的官员们的尊重，不仅使他们越来越欣赏他，而且使他们越来越欣赏自己所担负的职责。

数年后，乔治·埃尔西告诉一个记者说：“肯定你也知道，他是一个极富思想、谦恭有礼、善于体贴别人的人。为他工作是一种乐趣……他极为和善……从未因为忙而无暇考虑自己班子里的成员……他对总统制有着一种特殊的崇拜和尊重。他时时刻刻都要求尊重美国的总统……”

威廉·霍普金斯，一位在白宫服务了近 40 年的行政雇员后来在谈到杜鲁门时说，在他的经历中还没有一位总统“创立过一种能与之相比的风气”。他强调指出，杜鲁门“热爱人民、信任人民，而反过来他也在自己的班子中间引起了一种绝对忠诚和献身的情感”。

衡量杜鲁门的举止及其观点的一个尺度是他主持与白宫班子成员上午举行的例会的方式。这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务之一，这不仅是由于会议上所提供的信息和它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而且也由于它的整个气氛。整个班子的成员有 13 人，比罗斯福时代多了 2 人，而杜鲁门是这个班子的首领。这种会议是非正式的，但却很规范，有点像商业会议。9 点钟杜鲁门准时地打开他办公室的门，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鱼贯而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全体成员围着他的办公桌坐成一个

半圆形，当天的大多数事务都会被详细地讨论（霍普金斯回忆道）。他通常让马特·康内利首先讲，康内利提出有关总统约会的安排，哪些是在当天的日程上，哪些是即将要举行的约会。他也提请总统注意全国各地要总统演讲的各种邀请，并得到总统的答复和（对某些邀请的）同意。然后，总统再让查利·罗斯发言，看看当天与新闻界的交往中会有什么问题。关于如何回答新闻界的问题及如何处理某些问题等许多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当然，斯蒂尔曼博士也在场，还有克拉克·克利福德……他们会提出他们负责的领域内的问题。这是一个聆听总统的哲学、并得到他对当天事务的指示的机会。

杜鲁门总统是个惊人的读者，每天晚上他都要把一个通常有6至8英寸厚的公文包带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便读完了所有那些文件，并采取所需要的行动。他有一个多层的办公桌，抽屉上贴着的标签写着每一位班子成员的名字，在这种白宫班子的会议上，他会根据每人负责的领域，拿出有关文件给他们，或是希望他们就此提出有关的意见或建议，或是他想要提出问题让各个部门和机构来考虑。以这样一种方式，班子中的每一个成员基本上都能知道其他人正在做什么，总统又交给了哪些人什么样的责任——是否需要就某个请求作出答复，还是继续为起草一个行政命令、一份讲稿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做准备。

杜鲁门的办公桌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整洁。霍普金斯回忆说：“文件的流转状况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出色的。”作为一个行政雇员，他的工作是把需要总统注意或签字的大量文件提交给总统并做记录，这些文件包括：国会通过的法案、各种行政命令、声明、缓刑令、条约、对各部门的指令、联邦官员的提名、任命、给国会的咨文，外加从来信中挑选出来的“搜集物”。所有这些文件每天两次固定地要递送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一次是在早晨，另一次是午餐后。

霍普金斯本人就极其守时，他也由衷钦佩地提到杜鲁门：“他去吃午餐时，如果留下话说他下午2点回来，那么他绝不违约，回来的时间不是2点零5分，也不是1点1刻，而是正好2点。”他在职的时间越长，就越感到杜鲁门的严格守时。现在，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总共有4个时钟，外加办公室的一个钟和他自己手腕上的一块表。

罗斯、克利福德、埃尔西，每一个人都能讲述他自己经历过的有关杜鲁门分外勤勉的故事，他一直长时间地工作，像他们一样勤奋，或许比他们中的任何人更勤奋。克利福德回忆说：“许多次晚上我留在那儿（白宫），他坐在楼上的房间里，正好是椭圆形办公室的楼上，戴着老式的绿眼罩，就像是帐房先生戴的那种，他坐在那阅读所有这些材料……我们一起交谈，他非常、非常看重这种谈话。那种工作是极其紧张的。”

“他实际上花费了除睡觉之外的一切时间来从事总统的工作。”1947年新加入白宫班子任克利福德的助手的查尔斯·墨菲说。总统职务所要求的这种持久的艰苦努力也传播给了总统班子中的每一个人，墨菲将这种紧张的工作比作是每天都要死记硬背并应付一场考试，而且年复一年，从未松懈。

墨菲特别佩服杜鲁门简化事务的能力。“他不仅能够简化复杂的事务，

也能够使简单的事情保持其简单性。”

总统班子的成员经常对总统的有关这个国家的知识感到大为惊奇，他的这些知识得自于多年来乘汽车的旅行以及杜鲁门委员会调查时期所走过的地区。查利·罗斯称杜鲁门在乘坐的飞机上几乎是任何时候向外看一眼，就能够准确地说出他正在飞越的地区的名字。

他们也喜欢他的幽默感。他告诉他们：“经济学家所佩戴的表链，一端刻有（美国名牌大学）联谊会的标志，另一端却什么都没有。”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钦佩他的历史感，认为那是他所具有的最强大的性格力量之一。杜鲁门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中的时候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了解了曾坐在这张办公桌前的其他人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么他应付同样的经历时就要容易些。正是忽视，导致了最大的错误。坐在这儿的人至少应该懂得他的美国的历史。”当杜鲁门谈及过去的总统——杰克逊、波尔克、林肯时，就好像他认识他们似的。他曾说，如果真的“与以前发生的一切彻底割断联系”，那么，结果必将是混乱。

那年春天，在沿波托马克河做短暂航行的“威廉斯堡”号上，杜鲁门和通讯秘书比尔·哈西特在午餐时开始谈论起内战问题。其他人在餐桌旁静听，谈话涉及到几次战役和数名联邦与联盟将军们的能力及缺点的评价，像以往常有的情形那样，杜鲁门再次以他读过和记住的丰富历史知识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鲁门说，他很愿意做一名历史教员。

“以讲授历史来代替创造历史吗？”克利福德问道。

“对，我想是这样，”杜鲁门回答说，“这样就可能不会那么麻烦。”

克利福德对杜鲁门来说，已经越来越显得格外重要了，这很像哈里·霍普金斯对罗斯福所具有的那种重要意义。他们两人都知道：克利福德理解杜鲁门，而他正在努力从事的事情就是完成这项长期的任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杜鲁门曾说，他不想要一个罗斯福那样的行政当局。他认为，罗斯福周围的那些人中，“古怪的人”太多。“我想要脚踏实地。除非我知道我要走向何处，否则我不会感到舒服。我不想进行任何实验。美国人民已经经历了许多实验，他们不想再要实验，而想要休息。”他不喜欢“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词，他想要的是“向前看的计划”。一个“向前看的计划”，这就是一切。

也许杜鲁门还不知道，他们都高度评价他们对他们的尊重。查尔斯·墨菲是个腼腆的人，只有在别人主动与他谈话时才讲话，后来他评论说：“在许多方面杜鲁门总统确实很粗暴，但对待他的私人班子，他却格外温和……而他的班子也以一种超常的努力工作、自愿加班和全身心的、一心一意的奉献来回报他的友善。”

以后来总统班子的标准来看，这个班子并不大，不像某些后来的总统的白宫班子，为杜鲁门服务的那些人从不参与决策。据乔治·埃尔西回忆，杜鲁门班子中没有任何人梦想过为基本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制定政策或做出决定。

这一点必须要不断地强调（多年后埃尔西在一次采访中说道）。白宫不存在对外政策的庞大机构。白宫不存在任何事务上的庞大决策机构……（也没有任何人试图）通过僭越……通过以国务

卿无法接受的方式……通过向总统证明、或试图向总统证明他们（比国务卿）更精明、更有才华、他们的主意更好的这类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声望……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存在的。如果白宫中有人想要以这种方式来行事，那么在 30 秒钟之内他肯定就会被赶出去。

杜鲁门身边的那些人的忠诚是绝对的，从未动摇过。在后来的年代中，杜鲁门白宫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尖刻地谈论过或描述过他，也没有人以任何其他方式贬损过他。那些与他最亲密并为他工作过的人也从未写过“内幕”著作和文章来为这位总统辩护。他们都考虑的是哈里·杜鲁门当时以及他们后来所处的这个世界，如果有机会为总统辩护，他们是欢迎的。

对于查利·罗斯这个班子中年纪较大、与杜鲁门相识最久——比行政当局中任何人都久——的人来说，与他共事尽管工作紧张，并因此而意味着收入大幅度减少，但正如罗斯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即 1947 年圣诞节写给杜鲁门的私人信件中所说，这是他一生中的荣幸：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友谊更能使人心满意足了，而拥有你的友谊确实是一种少有的满足。

两年半以前，就像你所说，你“让我跳进火坑”。我很高兴你这样做了。这是我一生中得益最多的年代。你对我的信任、你慷慨地表示出来的友谊、与你周围那些杰出的人——你出色的“团队”——的协作，所有这些都令人鼓舞。

不过，总统先生，最令人鼓舞的是你——作为总统、作为常人的你——的性格。也许我最想说的心理话就是告诉你，我对你的钦佩以及对你的深深的喜爱自从你把信任给予我的那天起，就一直在稳步增长。

杜鲁门很少接到过像这样一封对他来说是如此意味深长的信。

对迪安·艾奇逊来说，杜鲁门的“活力、内在的生命力这种无价的礼物”，总是能在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最强大、最能使他振奋的力量。艾奇逊写道，总统的生命力和高昂情绪的供应似乎是永不枯竭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从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引述了描写阿金库尔战役前夜的句子：

……那些可怜虫，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一看到他，就从他那儿得到了鼓舞……

他的眼光毫不吝惜地把温暖分送给每个人……

那一夜，在精神上与哈里有了一些接触。

正是这“与哈里的一些接触”，“使得我们所有的人不断前进，”艾奇逊回忆道。

此外，还有马歇尔将军，他把信任给予了每一个人，而且提高了国务院乃至整个行政当局的士气。马歇尔曾对那些与他共事的人说：“先生们，也许有理由要求军人注意士气问题，但却没有理由要求文官们注意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国务院工作的所有官员都注意自己的士气。现在就没有有人在注意我

的士气。”士气稳步地提高了。

这正如艾奇逊所强调的，他与国务院的其他人都感到，他们正被两个杰出的人、总统和国务卿领导着。在国会山，萨姆·雷伯恩在其支持杜鲁门主义的发言中曾说道，这个国家“又一次有了要求采取某种行动的领袖们”，他用复数来强调领袖一词并非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杜鲁门曾写道：“马歇尔的完整个性激发了人们的信心。”认为是人创造了历史，这正是杜鲁门长期坚持的信念。1947年春天，随着马歇尔计划紧接杜鲁门主义而出台，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显然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相对来说很少的一小撮人，几乎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的。

1947年4月26日，星期六，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马歇尔国务卿焦急万分、心烦意乱。他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已经成了一种日益拖延、看不到目标的痛苦折磨。莫洛托夫的行动始终就像是时间和西方联盟的挫折对他来说无所谓似的。马歇尔想在有关德国的前途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他考虑直接与斯大林谈判也许会更有效，因此他到克里姆林宫做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然而，斯大林却问道，如果达不成协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下一次再达成协议，如果下一次不行，就再下一次。”斯大林边说，边用红铅笔漫不经心地胡乱画着狼头。

斯大林的冷漠给马歇尔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苏联人似乎很愿意看到不稳定和混乱充斥于欧洲。让事情放任自流符合他们的目标。他们尤其不希望德国恢复秩序和稳定，更不要说在那里恢复繁荣了。马歇尔原来认为可以与俄国人协商，但是在莫斯科，他发现自己错了。

返回华盛顿之前，他接到了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的一份紧急备忘录，警告说西欧的形势比人们一般理解的还要严重。在往返莫斯科的途中，马歇尔在巴黎和柏林停靠时，对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在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谈论的话题是为拯救西欧所能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

马歇尔向杜鲁门强调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在4月2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告诉全国：“当医生还在商议时，病人却日益濒临死亡。”

第二天，马歇尔召见乔治·凯南，指示他“立即”组建一个特别班子，“毫不拖延”地就为拯救欧洲应做些什么事情的问题提出报告。凯南后来回忆说，马歇尔的建议仅有一句话：“避免繁琐。”

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的思想已经在杜鲁门的头脑中酝酿了一段时间。两年前的椭圆形办公室与亨利·史汀生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史汀生已经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一个经济上强大的、产品丰富的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看法杜鲁门很快就接受了。在1月份的国情咨文中，杜鲁门已经谈到与饱受战争创伤的民族分享美国的补助金的问题，并把这作为传播自由和民主“信仰”的一种方式。3月6日，甚至在发表“杜鲁门主义”之前，他在贝勒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是经济世界中的巨人。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形式依赖于我们。”

5月初，杜鲁门派迪安·艾奇逊到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克利夫兰的边远小镇、即州立德尔塔师范学院的所在地去发表外交政策演讲。凯南和他的特别班子一直在准备他们的报告，而杜鲁门根据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后所谈的情况，已经决定必须尽快地救助欧洲。艾奇逊的演讲是杜鲁门对外界反应进

行试探的警钟。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急需一切，但却买不起任何东西。艾奇逊强调说，财政援助是绝对必要的，但目的却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复兴。欧洲自身复兴的余地如此狭窄，以至刚刚过去的那个严酷的冬天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如果想要拯救欧洲，必须提供大量资金。“这对保存我们自己的自由……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作为人类的荣幸。”

欧洲目前成了什么？温斯顿·丘吉尔在5月14日于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反问道：“它成了一堆废墟，一所停尸房，一张瘟疫和仇恨的温床。”

5月25日，凯南的报告《从美国的观点看欧洲复兴的几方面问题》提交给马歇尔。报告称，美国对世界问题的回答必须超出对共产主义压力的防御性反应。美国对欧援助的努力“不应因此以同共产主义的战斗为目标，而应致力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经济健康及其活力”。两天后，刚刚完成了对欧巡访的副国务卿克莱顿送上了另一份紧急备忘录。形势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糟。数百万人正经历着慢性饥荒。欧洲的崩溃将意味着革命，也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混乱。

国务院和总统的办公桌边相继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根据杜鲁门的批准，马歇尔决定在哈佛大学发表一个演说，他应邀在6月5日、星期四去参加那里的毕业典礼并接受荣誉学位。艾奇逊反对这个主意，理由是没有人会去听毕业典礼演讲。当演说的时刻到来时，马歇尔登上哈佛校园中阳光照耀下的演讲台，在7000名听众面前用温和的语调读起他的讲稿，他低着头，似乎并不特别在意人们是否在听。

讲稿是由波伦在大约两天前起草的，主要内容大都取自凯南的报告。杜鲁门事先是否看过它的副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马歇尔特别注意与总统保持联系这一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讨论过这件事。

根据马歇尔的愿望，演说稿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也没有任何刺耳的反共语言。

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要反对饥饿、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

演说中有两个观念是新的和特别的。他号召欧洲团结起来，在美国的帮助下，制定出自己的计划。同时，从逻辑上看，他也为苏联及其卫星国加入这项计划留了后路。

由美国政府承担起单方面地拟定一项给予欧洲经济自立的计划的责任，这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倡议必须来自欧洲。美国的任务应该是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项计划应是一项共同的计划，即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得到许多国家的同意。

接着，马歇尔直接对美国人民说：仅仅依靠阅读文章和观看照片来把握

欧洲形势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整个世界的未来有赖于正确的判断，有赖于美国人民认识到最好能做些什么，或必须做些什么。”

这个演讲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都使得几乎每一个人大吃一惊。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是最先看到马歇尔演说中所包含的重大意义的第一人，他说：“我们用双手紧紧地抓住这条救命绳。”

第二天在国务院举行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马歇尔问凯南和波伦，苏联是否会接受参加这项计划的邀请。这两位俄国问题专家回答说，他们认为不会，但建议他与苏联人“直接联系”，不要排除任何国家。这是一场预先算出结果的赌博——因为国会是不会支持任何包括苏联在内的援助计划的——但却是一场马歇尔愿意参加、而杜鲁门也表示支持的赌博。

凯南后来曾写道，这项计划的创作权问题曾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波伦、艾奇逊和克莱顿不过是曾参加过它的起草的十几个人中的几个人。马歇尔特别赞赏凯南在其中的作用。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强调艾奇逊的影响。但克利福德本人也参加了起草的每个阶段的工作。公正地说，它应该被称作艾奇逊—克利福德—马歇尔计划。

杜鲁门总是对马歇尔给予充分的信任。当克利福德极力主张把它称作杜鲁门计划时，杜鲁门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说，它应被称为马歇尔计划。

在他的总统任期中，人们记得杜鲁门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人们不在意谁获得了信任那该有多好啊，那就能完成许多的工作。不过，在这个事例中，他坚持认为马歇尔是最应获得荣誉的人，因为马歇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多。

他也曾现实地评论说：“以我的名义送到参院和众院去的任何东西都将稍亮即逝。”

但是，杜鲁门是总统，因此，马歇尔计划不论成败与否，最终将是他的责任。他对马歇尔的信任无关宏旨，甚或会给行政当局带来尴尬和麻烦。一项失败的马歇尔计划肯定会变成杜鲁门计划。

政策计划班子的一位成员路易斯·哈利后来谈到杜鲁门的时候说，他拥有马歇尔这样一个具有最高声望的军人；有艾奇逊这样一个既能运用智谋又具有强烈的正直个性的人，像杜鲁门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他宁愿以自己的前程去冒险，也不愿放弃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东西；还有凯南这样一个具有莎士比亚一样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的人。在杜鲁门本人的品质中，最突出的则是“他评价这些人的能力，以及正如这些人支持他那样去支持他们的能力”。

共和党人决心削减税收和开支，战争结束以来，在对外救济方面已经花费了30亿美元。在1946年的一次拨款中，美国就贷给了英国32.5亿美元的款项，而如今，这笔款项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据威尔·克莱顿的估算，在未来的二三年内欧洲人需要60至70亿美元。当阿瑟·范登堡从《纽约时报》上詹姆斯·赖斯顿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读到这个消息时，打电话给赖斯顿说他的消息来源肯定有误。范登堡说，国会从未批准这个数字，也不准备拯救任何人。

正如所有卷入了这项计划的人所意识到的，要想使人民和国会相信这项计划，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并且必须同时向美国的利他主义和美国的自身利益这两个方面发出呼吁——从一开始这两个方面就同样是促进这项计划的两个驱动因素。当杜鲁门召萨姆·雷伯恩到白宫向他简要地通报可能的费用问题时，雷伯恩像范登堡一样表示不相信，并坚持说这将会使国家破产。杜鲁门说，如果事情不能防止的话，简直无法估计欧洲将会有多少人会饿死，

这种情况绝不能发生。他说，他还确信，如果欧洲在一次危机中“破产”的话，美国将会步其后尘。“你我都经历过一次经济危机，我们不想再经历另一次，是不是，萨姆？”

由英国的贝文牵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匆匆忙忙的会议，苏联人派去了一个由莫洛托夫率领的庞大的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临时政府已表示希望被包括在这项计划中。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也对这项计划显示出兴趣。但是，会议进入第五天时，在接到了莫斯科的一份电报后，莫洛托夫从桌旁站起来，打断了会议议程，宣布苏联将退出会议。他说，马歇尔计划“不过是美国用美元来买通进入欧洲事务的道路的一项险恶的计划”。

斯大林发现美国提出的特别条件中有两项是无法接受的：一是为重建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而将苏联的资金包括在内的资金联营；另一个是建立美国资金如何使用的公开帐目制度。最后，17个国家参加了这项计划；而在苏联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及其他东欧卫星国均未参加。

由于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斯大林实际上保证了这项计划的成功。现在，不论会有多少抱怨，国会的支持早晚都会到来。

这项计划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RP），所需的总款额的确非常庞大，为170亿美元。波伦、凯南及国务院的其他人被指派去把这项计划“兜售”给国会，同时，由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负责起草具体的计划草案。阿瑟·范登堡在参院再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马歇尔本人最终做了一次全国性的演说旅行，以说服企业界和公民团体，使他们相信尽管这项计划很大胆，但他提出这项计划时经过深思熟虑、绝非心血来潮，结果，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总的事务的压力并未减轻。当年6月，“为了抑制大的劳工组织的权力”，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很大的优势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该法将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封闭性工厂制”宣布为非法，并要工会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还禁止工会的政治性捐款，要求工会提交财政报告，要求工会领袖宣誓保证自己不是共产党人。6月20日，星期五，经过两周的考虑，杜鲁门否决了这项法案，称它是对劳工的进攻，尽管除施韦伦巴赫和汉纳根之外的所有内阁成员，包括他在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约翰·斯奈德都敦促他签署该法案。不过，克拉克·克利福德却把这看作是表明立场的另一次机会。克利福德想要杜鲁门在大多数事务上再向左迈进一些，就像他后来所说，“朝着一个新高地前进”。克利福德回忆说：“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都在敦促杜鲁门先生缓缓地转向距保守主义更近一些的路线。他们把鲍勃·塔夫脱的形象摆在他面前当作怪物来吓唬他。”成千上万封信件涌入白宫支持总统的否决，而杜鲁门也确实认为那是一个坏的法案，他也知道一项否决将成功地把劳工拉回到民主党的政治中。他女儿玛格丽特在回忆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时曾写道：“他要对得起他作为总统的良心，同时我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做一个政治家。二者绝非不能共存。”

国会投票使总统的否决无效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在众议院，投票反对总统的民主党议员比支持他的人还要多。

7月25日，国会通过了杜鲁门的内容丰富的《国家安全法》，这项法案是杜鲁门在2月份送到国会的，它意味着华盛顿整个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把武装力量统一在单一的国防部和单一的国防部长的领导



之下，这是杜鲁门上任以来一直之奋斗的一个目标。该法也建立了空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并建立了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还给了中央情报局以正式的权力。

4

杜鲁门始终支持他那可爱的女儿玛格丽特实现她的雄心壮志，尽管他感到在作为音乐会歌手进行专业性的首场演出前她仍需要更多的训练。她的姨妈玛丽·简也支持她；杜鲁门的妈妈是最热心的，嘱咐她“竭尽全力去干”。不过，贝丝却不愿意；姥姥华莱士也宣称、对一位女士来说舞台是没有生命力的。

杜鲁门曾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妹妹说：“如果她想成为一名歌手，又有这种天赋，并且愿意为达到她的目标而进行必要的艰苦努力，那么，我想我不会反对。”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她们：“她是一个好姑娘，我非常高兴她最终没有变得像艾丽丝·罗斯福和威尔逊的那两个女儿那样。”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写道：要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就要“工作、工作、再工作”，“就像你爸爸所证明的那样”。

有一个时期她以玛格丽特·华莱士的名字来评论歌唱艺术，为的是不让人感到是在利用父亲的地位。但杜鲁门的母亲却极不高兴，她无法理解用其他人的姓氏来替换杜鲁门的姓氏的做法。

年初以来，玛格丽特一直住在俯瞰着纽约中央公园的一套小公寓房间里，与她在堪萨斯市的教师托马斯·斯特里克勒夫人一起工作，后者是作为她的陪伴人留住在这套房间中的。杜鲁门对于她不在身边深感不安。这就像他母亲2月份跌倒后所造成的那种危险状况一样，使他有一种难以面对的空虚感。在他紧张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职责的时候，时间在流逝，生活却被忽视。

对于他这样一个把一生中如此多的时间花费在军事和政治等男人占统治地位的职业上的人来说，在所认识和与之共事的男人中，他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没有真正的知心人，无论是现在还是童年时期都是如此。在他的生活中，有4个女人是最重要的：贝丝、母亲、玛丽·简和玛格丽特，她们的陪伴和支持是他最可宝贵、也最需要的。如今，她们中的两个、即母亲和玛格丽特，似乎正在抛弃他。

“玛格丽特昨天去了纽约，给这儿留下了一所空房子。”1947年1月他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说，“不过，我想，离别的时刻必然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3月初，她的首演在即，她接到了他的一封便笺：

这是一点儿钱，以便你去某些意想不到的城市买火车票用。

现在，不要害怕，你能唱好！如果有人说你不行我就要狠揍他的脸。

1947年3月16日，玛格丽特·杜鲁门作为福特汽车公司赞助的“星期天晚间一小时”节目的特邀花腔女高音嘉宾，与卡尔·克鲁格指挥的底特律交响乐团合作，在底特律举行了她的广播首演。正如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历

史上也许还从未有过任何一位声乐演员在首次出场时面临如此大的压力，面对如此多的听众和如此多的评论。广播是由 ABC 电台向全国播发的，报道说听众达 1500 万人，从而使之成为同类演出中广播听众人数最多的一次。《纽约时报》评论说：“她不会不认识到，不仅是广大的听众，而且……每一个歌唱家、每一个声乐教师和每一个走近收音机的声乐系学生都将对她的声音和她的表演作出严格的评价。”此外，由一个交响乐团伴奏对她来说也是一次新的经历。

根据原来的安排，这个节目应该在一个星期以前播出，但在最后一分钟时她不得不放弃，因为她突然感到嗓子和胸痛，华莱士·格雷厄姆的诊断是患了支气管肺炎。

广播播出的当天晚上，杜鲁门正在基韦斯特，他向国会发表了 3 月 12 日的演讲后仍在那里休养。他在收音机旁坐了半小时，等待着转播玛格丽特演唱的节目来临。他后来说，这半个小时比他记忆中的任何半小时都要长。她事后也曾写道：“他那十足的天真也许会帮我渡过难关。”她是历史上第一位试图走上自己的专业生涯的总统千金。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正盯在基韦斯特海军司令部的收音机旁；母亲在白宫收听广播；奶奶正在格兰德维厄的病床旁收听；而华莱士姥姥虽不太喜欢舞台，却也会在独立城边收听、边评论。我不能让任何人感到失望。

她演唱了 3 首选曲，第一首是西班牙民歌“塞林特·林达”，接着是选自菲利西安·大卫的《巴西的珍珠》中的一首咏叹调，最后是“夏日最后的玫瑰”，这是根据她父亲的要求演唱的。

交响乐队获得的自发的掌声显示了其演出的成功，尽管《底特律时报》说她唱得并不比一个具有真正天赋的学生更好，但评论总的来看是好的，她后来承认，比她应该得到的还要好。《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诺埃尔·斯特劳斯说她的声音使人很“感兴趣”，并且说，考虑到她所受到的压力，她显示出了惊人的镇静和自控能力。她的短句唱得很讲究，整个乐章的连接也很平稳。这位评论家的结束断语使她的父亲极为高兴：“自始至终，杜鲁门小姐的演唱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所带来的魅力，以及一种处理上的自然的清纯。”

在堪萨斯市老家，为了取悦于她的父亲，《明星报》赞扬了她的勇气，并称演唱会是一次“极其令人愉快的”事情。白宫的电话总机室被赞扬的电话所淹没，以至不得不暂时关闭。

杜鲁门对聚集在基韦斯特的记者们说，他认为她唱得“棒极了”，并且在返回华盛顿后的几周里，显然没有任何事情比来访者提到他们在广播中听到并欣赏玛格丽特的演唱更能使他高兴了。

另一次演出安排在 5 月份的匹兹堡，这次是一场完整的音乐会。杜鲁门仅仅是想让玛格丽特获得成功，而决不想让她成为一名音乐会的主要女歌手。

我希望自己能继续前进并平静地处理所有不顺心事，然而我做不到，在人生中，你应该学会克服障碍而不发脾气。永远要善待那

些不能与你顶嘴的人。我不能忍受一个人为了使自己的自负得到满足而对下属大声咆哮。

不过，匹兹堡的音乐会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延期，因为消息传来：杜鲁门的母亲患了中风，生机无望。

杜鲁门立即从华盛顿乘机飞回。自母亲第一次跌倒并折断髌骨以来，这是他第五次飞回家。罗斯、华莱士·格雷厄姆和整个总统随从班子都跟随着他，并在米勒贝克饭店的第十一层建立了指挥部。母亲的病况似乎有些好转，知道他在身边；他在米勒贝克饭店逗留了近两个星期，每天都从堪萨斯市驱车前往格兰德维厄。天气很糟，不仅寒冷而且总下雨，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正如报纸所说，“全世界的眼睛”每天都在注视着院墙中的小黄房子。杜鲁门就在客厅中的那张教会式的橡木桌旁工作（正是在那个时期，他签署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法案）。他告诉记者们：“她只要一醒过来，就想要和我谈话。我要呆在那儿。”

不过，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吃惊的是，她后来竟然恢复过来，杜鲁门便返回了华盛顿。此后，他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并在6月中旬又回去了一次；他也定期给玛丽·简写信，后者会把这些信大声地读给母亲听。他在信中总是谈到政治，因为他知道她喜欢这样。他写道：“我已得出结论：塔夫脱不好，哈特利更坏。”他也预先告诉她，他准备发表一个她不喜欢的演讲。这是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准备的。他说，他将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讲话。

6月29日，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他向一万听众发表了这个演说，这是林肯时代以来人们从华盛顿听到的有关民权问题最强有力的声明，也是迄今为止一位总统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表的第一个演说。杜鲁门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得到并保证享有充分的民权和自由，此时，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领袖沃尔特·怀特就站在他身边。

当我说所有的美国人时，我的意思是指一切美国人。

我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仍在遭受着蔑视的侮辱、偏狭的威胁恐吓、以及，我很遗憾地说，人身的威胁和暴徒们暴力的威胁。这些邪恶植根于其中的成见和偏执依然存在。我们民族的道德心以及执法机构尚不能保证每一个公民享有不受恐吓的充分自由。

我们不能等待下一个10年或下一代再来治愈这些邪恶。我们现在就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医治它们。

他呼吁州和联邦采取行动来反对私刑和人头税，结束教育和雇工制度中的不平等，结束以种族和肤色为基础的全部等级制度。一个来自密苏里西部的人站在“伟大的解放者”的圣殿前讲出这样的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沃尔特·怀特边听边想到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他后来曾写道：“我并不认为杜鲁门的演讲具有林肯演说中的那种文学色彩。不过，从某些方面看，它更具勇气：它具体地谴责了以种族偏见为基础的邪恶……并呼吁立即对它们采取行动。”

1946年底，在怀特和其他人的敦促下，杜鲁门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第一流的民权委员会，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怀特相信，杜鲁门已将自己的政治命运押在了这

条战线上。怀特写道：“不论是来自南方还是来自北方的杜鲁门先生的政治顾问们，几乎是毫无例外地确信，他授权调查民权这个爆炸性的问题简直就是在进行政治自杀……杜鲁门先生则坚定地坚持这样做。”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到10月份才能准备好。

演讲完毕，杜鲁门回到座位上对怀特说：他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算数的——我打算证明我说的话的确算数”。

对他的母亲，杜鲁门说，他宁愿没有被迫去发表这个演讲。“不过我相信我所说的话，”他告诉她，“我希望我们能履行它。”

他向她描述了白宫“院子里草坪上”正在开放的鲜花。他想知道在那么潮湿的天气里，维维安的孩子能否收获干草作物。

他比往常更多地想到了过去的时光。7月26日早晨，在给独立城的贝丝写信时，他发现自己追忆起了哈里森叔叔和他们在高中的同班同学塔斯克·泰勒，后者于毕业后淹死在密苏里河中。他告诉贝丝，7月26日一直是密苏里农民的“萝卜节”，即种萝卜的日子。1901年是一个特别干旱的年份，那年有一天，哈里森叔叔走进种子店，说他需要6蒲式耳的萝卜种子。别人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哈里森叔叔说，他知道萝卜90%是水分，如果他把整个农场的地都种上萝卜，也许干旱就会停止了。

不过，他肯定不会沉湎于过去。“你知道，年龄不饶人。妈妈已经94岁半了，因为她从不生活在过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玛丽·简从格兰德维厄打来电话，说妈妈中风，可能活不过今天了。杜鲁门命令把他的飞机备好，但事情耽搁了他。他要签署《国家安全法》，还要在国会休会前提名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出任新的国防部长。还有几个国会的文件也需要签署。在机场上，他推迟起飞，在飞机旁等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法案送到。几分钟后，飞机离开了地面。

大约在俄亥俄的上空，他正在机舱中的吊床上打盹儿，梦见母亲走过来说：“再见了，哈里。做个好孩子。”他后来写道：“当格雷厄姆大夫走进我在《圣牛》号的舱房时，我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

她是当天上午11时30分去世的。“啊，现在她不必再忍受任何痛苦了。”杜鲁门说。在剩下的航程中，他坐在机舱的窗户旁，望着地面上纵横交错的图景，一言不发。

马莎·埃伦·扬·杜鲁门生于1852年，当时米勒德·菲尔莫尔正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还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巡回律师；她崇拜的罗伯特·李在西点军校任督察官，负责监督来自北方和南方的年轻人的教育。她见过马拉火车在圣菲铁路上往复行走。她经历过内战，从《第十一号令》中幸存下来，经历过蝗灾、洪水、干旱、丈夫的失败和死亡、30年代经济大危机以及从自己的家中被驱逐，但都活过来了。她活着见到了电话、电灯、汽车、飞机、收音机、电影、电视、超短裙、世界大战，以及她最宠爱的大儿子作为美国总统坐在白宫的办公桌旁。正如几年后玛格丽特在回忆她的“家乡祖母”时所写道的：“她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但杜鲁门奶奶却从未改变……她的哲学很单纯。你从错误中认识到正确的东西并且按照正确的去做，你就总能尽力地做得最好。仅此而已。”

在格兰德维厄的家中举行的葬礼很简单，也未公开。她被埋在福雷斯特惠尔公墓的山脚下、她丈夫的墓旁。

几天后在华盛顿，杜鲁门请查利·罗斯把白宫记者团带进椭圆形办公室。

当他们到齐后，杜鲁门语气平静地说：“这周我不能举行记者招待会，但我想私下对你们讲一二件事情，这些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不好讲，所以我请查利请你们来。

“我想向你们全体，向你们的编辑和发行人就上周你们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

“我尤其想要告诉摄影记者们，他们对我、对我的家庭是多么的友善，我不知道除了把你们召集来告诉你们这些话的这种方式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能表达。

“我没有新闻要告诉你们，也没有其他的事要说，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以外；我觉得我好像欠了你们东西。

“在整个事情期间你们一直对我极其友善，我希望你们相信我说的话，相信我说这话是发自内心的。”

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他写道：“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孤儿，就像你爸爸现在这样。”后来，在她外出旅行时，他又告诉她：

每当你到达一个城市后，就应该给你妈妈和爸爸打电话……某一天你也许（？）会明白，担心这世上值得担心的人所带来的折磨是什么滋味儿。如今你应该知道，你爸爸只有3个这样的人：你妈妈、你和你的姨妈玛丽。

8月24日，玛格丽特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演唱，观众达1.9万人。《洛杉矶时报》说她的表演“差强人意”，但观众却要求她谢了7次幕。10月17日，她返回匹兹堡在巨大而古老的叙利亚清真寺会堂举行了她首次全场音乐会演出，在听众爆满的会堂中也有她的母亲，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她演唱。杜鲁门未出席，因为他想让玛格丽特享有观众的全部注意。

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歌手来说，她的舞台表现和与观众的交流再次获得显著的成功。观众喜爱她，她谢幕9次，重唱了3次。《匹兹堡新闻邮报》的音乐编辑唐纳德·斯坦弗斯特写道，每一个人，甚至包括引座员和记者们，似乎都在为她鼓劲儿。“你能感受到给予这位镇定自若地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姑娘的友好感情的浪潮。你会觉得，这位放弃了白宫生活的大部分享乐（如果有这些享乐的话）而选择了音乐生涯的年轻姑娘，将会实现她的生活志向。”

她身着遮脚露肩的粉红色塔夫绸长裙，金色的头发烫着软卷，像在底特律和洛杉矶时一样地演唱着，似乎每一刻都很投入。然而，这一次，评论界却显然不那么友善：

显而易见的是（斯坦弗斯特写道），无论是从昨晚的表演来看，还是以通常对年轻歌手及首演的标准来衡量，杜鲁门小姐都不是一位伟大的歌唱家；事实上，在她音乐生涯的这个阶段上，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好的歌手。她是一位颇具个人魅力的年轻女郎，具有相当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演唱的基本功显然也还可以，但从公认的标准来看，她称不上是一位艺术家。

其他的评论说她步入歌唱生涯太早，尚未准备成熟，正如她父亲所担心

的那样。《匹兹堡新闻报》的评论认为她的训练“极不完善”。

她回忆说：“那场音乐会后我给爸爸打电话，他似乎很满意。可我却不能说自己也很满意。”

巡回演出继续着。她在沃斯堡、阿马里洛、俄克拉何马市、什里夫波特和塔尔萨等地演出，并且越唱越好。“玛格丽特似乎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杜鲁门向玛丽·简报告说。在沃斯堡，演出票销售一空。在阿马里洛也是如此。但他还是希望她回来留在家中。

和朋友们一起休闲时，杜鲁门有时喜欢说他和他的新家已经有幸成了一个歌剧团。玛格丽特演唱，他弹钢琴，而贝丝则当演出经理。然后他会朝贝丝一笑，贝丝则以一种怀疑的表情作答。这已经成了一个家庭玩笑。

熟悉贝丝的人都知道，经理的角色她是当之无愧的，尤其对她丈夫而言更是如此。玛格丽特在谈到她母亲时称她是家庭的“中流砥柱”。杜鲁门本人也多次说过，他很少不征询这位“老板”的意见就作出决定。

她对在公众中露面一直不感兴趣，除了做妻子和母亲外，也不想扮演任何其他角色。

来自独立城的老朋友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她的白宫内部班子的成员都热情地谈到她的友善及其“喜欢嬉戏的幽默感”。白宫的一位侍者利莲·帕克斯回忆说，她笑得特别厉害，浑身都会跟着颤动，“好像她发明了笑声似的”。

在记忆中，还没有一位第一夫人如此关注侍者们的福利，特别是在夏季的那几个月中，在白宫有空调之前。她总说：“太热了，没法工作。”利莲·帕克斯回忆说：“如果天气不热，她会说：‘你工作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停止工作。’她是那种憎恶忙乱无序、喜欢干净整洁和把一切都放置得井然有序的第一夫人，但是她不想让自己的侍者总是工作，而是命令，是的，命令他们休息。”

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女士”，这个词以前经常用来描写她的母亲。堪萨斯市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说：“她是我所知道的在圣诞贺卡中写感谢你的话的唯一女士，她写这些话用的是非常漂亮的手写体。”《圣路易斯邮报》的马奎斯·蔡尔兹称她是完美的密苏里女士。有一次，蔡尔兹及其夫人在他们位于华盛顿的家中为一位诗人、也是他们的老朋友举行宴会，邀请了杜鲁门夫妇。蔡尔兹回忆说：“杜鲁门夫人来到后，为她丈夫……无法离开工作来出席宴会而表示深深的歉意。那位诗人的妻子酒喝得太多，不得被脱去外衣，放到了床上。杜鲁门夫人非常有礼貌，对此事没有丝毫抱怨。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人。我认为她的全部生活就是哈里·杜鲁门……”

她的秘书雷切尔·奥德姆回忆说她是属于“白手套类型”的人。安详、害羞和执拗是常用来描述她的另一些词。

加利福尼亚州国会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及夫人出席了他们的首次白宫招待会，对总统和杜鲁门夫人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的方式印象深刻。尼克松写道：“他们两人都具有高贵的气质却毫不摆架子。新闻界习惯于把杜鲁门夫人描写为平易近人的人。但最使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她非常真诚。”

人们越是了解她，就越是赞赏她那种安详的力量和本领。在最钦佩她的人中间有罗伯特·洛维特及其夫人。洛维特于1947年6月底接替迪安·艾奇逊出任副国务卿，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纽约投资银行家、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像哈里曼和艾奇逊一样也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洛维特认为，

贝丝·杜鲁门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他回忆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并且“毫无疑问”，她给了杜鲁门“无数的”帮助。“我妻子和我都绝对地喜爱她。她简直是超级的……”

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称她是“她丈夫力量的支柱”，并且赞扬她“对他丈夫身边那些人的品质和忠诚有着比他丈夫更深刻的洞察力”。

但是，如果说杜鲁门依赖于她，就像他本人也承认的那样，那么，她显然也绝对地依赖于杜鲁门。多年后，当一位朋友问道她认为自己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方面是什么时，贝丝立即回答说：“哈里和我一直真心相爱，结婚40多年——不论我在哪儿，只要我伸出手去，哈里的手就能在那儿抓住它。”

贝丝·杜鲁门身高5英尺4英寸，矮胖，站在那里活像行进军乐队的指挥，头高昂着，肩宽宽的。她衣着朴素而保守。从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装模作样（据乔纳森·丹尼尔说，在华盛顿生活的年代里，对某些官员夫人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造作，她根本就不去注意）。她完全就像往常一样，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因自己成了第一夫人而去改变它。到白宫去的某些客人发现她如此纯朴而不引人注目，以至他们不得不提醒自己注意这个正在与之谈话的人。《时代》周刊说，她那整洁卷曲的灰发及毫不引人注目的服饰，屈就点儿说的话，可以把她与一家A&P公司里的人群很合适地混同在一起。

有一次，记者们问及杜鲁门对她的衣着外表的看法时，杜鲁门答称，他认为她看上去完全就像是她那种年纪的女士应有的那种样子。

许多人在第一次见到贝丝·杜鲁门时，都对她比照片上显得年轻得多、也更具吸引力得多而感到惊讶，在照片上，她的表情通常很阴郁，甚至显得不易接近。在公开场合她似乎很不自然，特别是当摄影师对准她按动快门的时候。在迎宾队列里她总是显得不耐烦，甚至很痛苦，好像她的脚站酸了似的——这则，她就成了与朋友们所熟悉的那个人完全不同的人了。路易斯安那州一位国会议员的妻子林迪·博格斯还记得这位第一夫人在安排一次接待的有关事务时是如何的轻松愉快，在幕后她是怎样的一个使人快乐的伙伴。

“然后……当门打开，所有的宾客开始进来时，她就僵住了，看起来像是尊旧的石像。她不再是先前那个开朗、热情和可爱的女士了，人一多就使她有点缩了回去。”

埃莉诺·罗斯福曾承担了她在公众场合的角色，并与他丈夫的角色相互补充，而贝丝则坚持留在幕后。迪安·艾奇逊的夫人爱丽丝·艾奇逊回忆说：“得体对她的生活比对罗斯福夫人的生活有着更强的影响力。”许多人知道贝丝喜欢打牌——1946年春天，她在独立城的桥牌俱乐部曾访问华盛顿，并在白宫住了几天，这成为报界极为关注的一个主题——她和玛格丽特也都是电影迷，而不像总统那样。贝丝也喜欢读侦探小说，还对棒球很“狂热”，只要时间能安排得开，就去观看参议员们的比赛。不过，她却没有记者们感兴趣的嗜好供他们去写，既没有招人喜爱的宠物，也没有倡导什么社会事业或者是希望公开发表对某些问题的评论。她不愿意惹人注意是大家明白的，很多人很喜欢她这一点。她多次拒绝发表演讲或接受私人采访或举行记者招待会，不论记者们如何抗议。她告诉雷瑟尔·奥德姆：“只保持微笑，什么也不告诉‘他们’。”玛格丽特回忆说：“她不愿意议论她的生活。”

以前有两次在公共场合的露面曾使她陷入尴尬。一次是她应邀参加一种军用飞机的命名典礼，此前尚无人因摔香槟酒瓶而遇到麻烦，因为它很容易打碎。她把酒瓶荡起来朝这架飞机砸去，可酒瓶却没有打碎，接着她一次又

一次地试着做，脸色涨得通红。人群中爆发出笑声，直到最后一位机械师走上来帮她打碎了这只酒瓶。当报道这次典礼活动的新闻片在电影院上映时，杜鲁门像全国公众一样被逗得大笑，但贝丝却没有笑，据说她后来对他说：她很遗憾没能把这只酒瓶砸在他头上。

另一件事情是关于 1945 年秋天她决定接受“美国革命女儿”组织的邀请，赴宪法大礼堂出席茶话会，这个决定引起了脾气火爆的黑人国会议员、纽约哈莱姆区阿比西尼亚浸礼会牧师亚当·克莱顿·鲍威尔的强烈抗议，因为他的妻子、钢琴家黑兹尔·斯科特曾因其种族问题而被拒绝进入宪法大礼堂演奏。然而，贝丝却拒绝改变主意。她写给鲍威尔的信中说，这个邀请发生在“那次不幸的争论”之前，她接受这个殷勤的邀请“与那件事情的是非曲直无关”。她说，她对任何因种族偏见而拒绝艺术家表演的行动感到悲哀。她不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但也不是社会改革运动的斗士。对此，鲍威尔的答复是公开地称她为“这块土地上的最后夫人”，这导致了杜鲁门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怒骂“这个该死的黑鬼传教士”，而且像克莱尔·布思·卢斯一样，鲍威尔从未被邀请到白宫。

1947 年秋，贝丝终于同意回答记者们的书面提问，她的回答独特而明确，并使人难忘：

她认为什么样的品质才是一位总统夫人的最大财富？

好的身体和强烈的幽默感。

她认为美国会有一位女总统吗？

不会。

她想成为总统吗？

不想。

她想要玛格丽特成为一位第一夫人吗？

不。

如果她有个儿子，她想把他培养成总统吗？

不。

如果让她自由选择，她会首先选择进入白宫吗？

绝对不会。

她如何看待音乐界对玛格丽特演唱上的批评？

无可奉告。

对她扮演第一夫人的要求中，有些是否使她感到怯场？

无可奉告。

当你丈夫不再是总统时，你想做什么？想让他做什么？

回独立城。

一位华盛顿的出租汽车司机说：“她似乎认为哈里应该去管理国家，而不是她。”许多人认为，并且乔纳森·丹尼尔斯也这样看，杜鲁门“很愿意与她共谋”来保护她的私生活。

有一次她被问到是否对白宫历史上的某个特定阶段感兴趣，贝丝答称门罗年代——这个有趣的回答被新闻界忽视了。詹姆斯·门罗的夫人、另一个伊丽莎白——伊丽莎白·科特赖特·门罗——是继爱好社交活动的多莉·麦迪逊后的第一夫人，而多莉·麦迪逊像埃莉诺·罗斯福一样，是她那个年代



引人注目的中心人物。伊丽莎白·门罗是个文静的有贵族派头的人，她与一位酷爱饮酒的政治家结婚，而且婚姻很美满。在白宫里，她坚持保持自己生活的私人性质。

作为家庭开销的管理人，贝丝极其节俭。她削减了白宫班子的规模。多年来负责罗斯福餐桌上那沉闷的食品的老年女管家内斯比特被解雇，结果，烹饪和管理都得到了改进。以往最令人厌恶的食品是又冷又硬的餐卷以及一大堆白宫日常食品，它们对于任何一个像贝丝这样吃传统的南方热饼——用“瓦格纳一盖茨”牌的“食用面粉皇后”烤制的软饼——成长起来的人来说，都是难以下咽的。BBC电台的美国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写道：“正是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她的食谱被转达给厨师长，杜鲁门夫妇又回到了父辈们进餐的方式上去。”

J·B·韦斯特写道：“杜鲁门夫人并不比前任第一夫人更罗嗦……这不是因为她养成了以家政为荣的观念。”韦斯特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食品的开销，在她的账簿中，“用一把细梳”把所有的第一家庭的帐单都理了一遍，并记下了她经手的每一张支票。

根据韦斯特和莉莲·帕克斯的说法（她们俩后来都撰写了有关她们在白宫服务年代的书籍），白宫服务人员觉得杜鲁门夫妇比其他任何一个总统及其夫人都更亲近，考虑到其中某些服务人员受雇的年限很长，她们的这种说法就显得格外有份量。约翰·梅斯是一位门房，他每两周还为杜鲁门理一次发，自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就一直在白宫当差。韦斯特回忆说，杜鲁门在白宫的生活方式“也许与在独立城的生活方式一样。就日常生活而言，没有什么不同”。针对总统有关不喜欢白宫生活的所有言论，韦斯特说：“他喜欢那儿的生活，胜于喜欢在独立城岳母家的生活。”

杜鲁门在参院任职后期的薪金，加上贝丝的收入，为14500美元。任副总统时，薪金是2万美元；任总统时，薪金为7.5万美元。不过，这些收入中有近半数要作为税款缴纳，虽然政府要付给白宫服务人员薪水，但贝丝则须为他们的食品付费，还须为家庭和宾客们的餐饮付费。在罗斯福时代，有时一个月的食品费用达7000美元。贝丝已成功地把它削减到约2000美元。在白宫的12年中，罗斯福从未只靠总统薪金来生活，但杜鲁门夫妇却没有家产可依靠。玛格丽特后来曾把母亲描写为一个情势逼迫下的长期的吝啬人。即便如此，多年来她能够积蓄下来的钱也很有限。据报道，在7.5万美元的薪金经支出和纳税后，总统剩下的钱仅有约4200美元。

一天，贝丝与约翰·斯奈德夫人一起去逛华盛顿的一家时髦服装店，她和颜悦色但却语气坚定地告诉售货员，让她试任何服装都没有用，因为她承担不起这些服装的价格。

J·B·韦斯特说，贝丝把她的隐私作为珍宝一样来保护，而在私下她所起到的作用远远超出一般人（除了几个人外）的猜想。她确实向杜鲁门提出决策建议。“而他也听她的。”

玛格丽特后来曾写道，她父亲上任之初，贝丝感到被关在了他的生活之外，“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特别是在得知他没有与她讨论他对原子弹的决策之后。玛格丽特写道，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与贝丝最初对杜鲁门成为总统所抱的反对态度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无异于感情隔阂的积郁的愤怒”，这也许能解释她长期不在华盛顿的某些原因。此外，玛格丽特也强调了母亲对父亲的影响，说他经常与贝丝商量事情，总是按她说的去做。他“非常

非常在意”她的看法，需要她的批准。玛格丽特曾对当时的一位记者提醒道：“当我父亲和母亲一起出现在任何公共场合时，不知你注意到父亲没有？他总是想捕捉她的目光，看看她是否同意他所说的或所做的事情。”

30多年来，她一直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

在家庭和老友中间，他毫不隐讳“利齐小姐”给他的生活进程带来的变化。他从白宫写信给埃塞尔·诺兰，回忆着很久以前的那些旧情敌：“如果利齐小姐与扬先生、朱利安·哈维先生或哈里斯先生结婚，结果将会怎样？我是指对哈里会是怎样。他也许会成为杰克逊县的一位出色的农夫，或是常备军中的一位少将……”

从1947年秋天他写给贝丝（当时她在独立城与母亲住在一起）的那些信件来看，他的确想让她知道他的想法以及“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他所面临的问题的详细情况。

他脑子里想的都是马歇尔计划所需的巨额规划费用：

马歇尔和洛维特昨天来过，和我一起从头到尾地讨论了欧洲的形势。如果把这些制定成计划，它将在4年的时间里花费我们约160亿美元……这160亿的数字正好是富兰克林执政时整个国家债务的总额。他使这个数字增加到400多亿，接着战争来临，这个数字又达到2570亿，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些数字。

几天后，9月30日，他继续告诉她更多的情况：

昨天是最乱哄哄的日子之一……我无法肯定自己一生中是否还有什么日子比这更糟。但目前的形势充满了可怕的后果。例如，假定意大利崩溃，铁托进入波河流域。那么法国的整个地中海沿岸将无法抵御苏联的占领，铁幕就会到达波尔多、加来、安特卫普和海牙。我们撤出希腊和土耳其，并准备战争，这种情况决不能发生。可是在这里，我却面对着一个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国会，它的各个委员会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都生活在1890年，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国家的思想的代表。然而我却有一项工作必须要完成——或者获胜、或者失败、或者打成平手。

我已写信给泰伯、布里奇斯、范登堡和伊顿，要求他们尽快召集他们的委员会。在召集了我的食品委员会后，我将在星期天发表一个广播讲话。今冬，养活法国和意大利将花费5.8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的费用为165亿美元。但是你知道，1945年10月和11月间，我取消了630亿美元拨款——550亿美元是在一瞬间取消的。那一年我们的战争费用达到1050亿美元。这165亿是用于4年的时间，而且是为了和平。一次俄国人的战争将消耗我们4000亿美元和无数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我本不应把这些东西写信告诉你，但你应该了解我所面对的情况……我尚未开始我的行动，但一二天内就将开始。要看的東西太多了。布莱德雷将军今天向我提交了一份有关他欧洲之行的报告，他提醒我必须做出比以前任何其他总统都要多的重大决策。他是对的，我希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对的……

那年秋天，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 22 封信。他像以往一样崇拜她，也是他写这些信的原因之一。第二年 6 月，他们结婚纪念日之际，他写道：

亲爱的贝丝：

29 年！它就像是 29 天。

底特律，休伦港，农场拍卖，“黑石”饭店，衬衫店。县法官，失败，玛吉，汽车俱乐部成员招募人，首席法官，国会参议员，副总统，现在！

你就像 1890 年在立日学校的日子一样，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可真是老痴情呵！

除了贝丝、玛格丽特以及他的秘书罗斯·康韦外，没有什么女人有机会从他身边或私下来观察杜鲁门。在他的班子中，除了秘书外没有任何女士，而女秘书中也无人能够参加内部会议，或与他一道工作，或跟随他外出白宫。不过，在 1947 年这个重要的年代，一位名叫格里塔·肯普顿的奥地利出生的年轻画家来到白宫西楼，在两名秘密保安人员的帮助下把她那沉重的木制画架支在了内阁会议室中。她是应邀前来画总统肖像——即后来画出的挂在白宫中的那幅杜鲁门的正式肖像——的第一位女士，以前从未见过这位总统。画像过程中，杜鲁门总共去过 5 次，坐在那里供她临摹。

“我对他印象深刻，”她回忆说，“他走进来，我请他坐下。他带着些文件，但我告诉他不能看文件。‘噢，不行！’我说，‘这是我工作的时间。你应该放松。’”

她不知道那两个帮她支画架的人是秘密保安人员，回过头对他们说，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他们无须留在那儿。杜鲁门被逗乐了，冲他俩点点头，他们便走了。

他坐下来……我能看到的完全是一位非凡的人物和一幅非凡的肖像。我不得不换下画布，它必须更大一些……

人的地位越低，就越是反对给他摆姿势，也越容易觉得他是在帮助你。杜鲁门先生却不是这样……他从未显示出恼怒、生气……也从未显示出不耐烦。他安坐在那里……（整个房间）似乎都处在一种庄严而宁静的气氛中。我感到了异常的鼓舞……他总是那么合作。他想让最终完成的肖像达到我所能画出的最好水平。

他坐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变得对这项工作（我的工作——绘画技巧、画布）感兴趣。他显示出一种浓厚的兴趣……

一开始她就告诉他，在肖像完成之前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看它。不过在一次休息时，他决定绕着那张巨大的内阁会议桌“散散步”，她回忆说，他“小心翼翼地朝画布走去”。她意识到他究竟想干什么之后，再次告诉他不能偷看。

“你是说我连自己的肖像都不能看一眼吗？”他说。

她告诉他不能，而他又欣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当她完成了作品后问他是否想看一下时，他在画架前站了数分钟。“啊，我绝对地喜爱它，”他说，“不过，当然啦，我并不真正懂画。我必须得问问老板。”

他打电话给贝丝，贝丝马上就来了，看着这幅肖像，由衷地赞赏着。她说，这跟她见到他本人一模一样。

背景是灰暗的天空，他坚定地坐在那里，没有笑容，嘴部紧闭，双手自然地放在一张木椅的扶手上——副有力而果决的样子，身着黑色双排扣西服，白衬衣，黑条纹领带，那块熟悉的手帕很适宜地搭配在适当的位置上，西服翻领上别着饰针，在远方，是国会大厦的拱顶。

格里塔·肯普顿回忆说，在坐着画像期间，他不时地显出有点急切的样子。“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对自己充满信心，好像在说‘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此外，他还比较谦恭……我觉得他的性情非常平和。”

1947年夏，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引进了“遏制”的观念，这个表述如今已被国务院使用。凯南建议采取“一种坚定的遏制（俄国的）政策……在俄国人显示出侵犯迹象的每一点上运用坚定不移的对抗力量”——直到苏联“温和起来”或崩溃。这篇文章的署名仅为“X”，但很快它的真实作者是谁已广为人知。几个月后，沃尔特·李普曼在一本名为《冷战》的书中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反驳，“冷战”的表述是伯纳德·巴鲁克在以前的一次演说中所使用过的，但是现在，这个同像“铁幕”一样，成了战后词汇表中的组成部分。

冷战何时以及为什么开始——是开始于杜鲁门主义的发表，还是更早，即杜鲁门首次与莫洛托夫当面对抗，或是开始于国会最后批准马歇尔计划之时——成了以后的年代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但是，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的对苏政策演变到目前这个样子，其间最明显的分隔点则是乔治·马歇尔从莫斯科返回之时。变化出现于1947年4月26日，当时，在所有的人中间，是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了后者私下已得出了结论的东西，即外交努力已不再奏效，无法与俄国人达成妥协，他们想要的只是欧洲的放任自流、混乱和崩溃，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奇普·波伦是众多事件——莫洛托夫首次在椭圆形办公室拜访杜鲁门、波茨坦会议、马歇尔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的关键性会晤——的见证人，他说，冷战其实可以追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那时，即30年前，它就已经开始了。

杜鲁门在回顾他上任的最初几年及其间所做的决策时，对于他未能停止战争结束后的全面复员感到特别遗憾。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冷战的表述是他从未认真关注过也很少使用过的。他把它称为“神经战”。

后来，他受到指责，说他作为一个新总统，缺乏经验和判断力，对俄国人采取了过于冲动和匆忙的行动，作出了仓促的决断。然而，就职还不到一个月时，他曾写信给埃莉诺·罗斯福说：“我认为，如果我们想要享有世界和平，那么，耐心就必须成为我们的格言。”事实上，形成一项对苏政策已经花费了两年的时间。他行动得很慢，也许太慢了，而且一直在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依靠的同样的那些人、特别是乔治·马歇尔进行密切的磋商。

9月份，杜鲁门接到了丘吉尔的一封手书，上面写道：“我如此地赞赏你引导你伟大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并且由衷地感谢你为拯救这个世界免受

饥荒和战争所做的一切。”

在一封感谢信中，杜鲁门写道，没有任何人能够独自地承担起总统职位的重任并把它圆满地履行好，不过，现在他身边有一批有能力的人。

10月中旬，在他办公室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报纸编辑人员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晤中，他花费了大部分时间来阐述马歇尔计划的绝对必要性。会晤结束前，他被问道：美国是否“因将这些东西送给欧洲……而得到了任何赞扬”？

杜鲁门答道：“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赞扬。我之所以做它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我做它是因为这件事必须要做，如果我们想要使自己幸免于难的话。”

1948年4月，马歇尔计划由国会表决通过，这几乎是在马歇尔哈佛演讲一年之后，而且是在两院中均以压倒多数而通过的。阿瑟·克罗克写道，这是行政当局的一次独一无二的重大胜利，“是杜鲁门总统所做的众多伟大而富于成果的决策中心的瑰宝”。的确，正如几乎所有的人最终所看到的那样，它将成为本世纪美国伟大的成就之一。

在这项计划最终通过的几天后，杜鲁门私下曾写道：“在整个世界历史中，我们是第一个养活并资助被征服者的伟大国家。我们是第一个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古巴和菲律宾，创建独立的共和国的伟大国家。我们的邻国并不害怕我们。在他们的边界上没有要塞，没有士兵，没有坦克，也没有成排的大炮。”

美国在世界上想要和平，美国准备“在麻烦来临时对付它”。

### 十三、厨房里的高温

如果你忍受不了高温，最好离开厨房。

——杜鲁门爱说的一句话

1

杜鲁门究竟是何时下决心竞选连任的尚不清楚。1947年他曾数次表示不愿再面对在白宫这个“金鱼缸”中的另一个4年，而且他还考虑过艾森豪威尔作为民主党理想的候选人的主意。杜鲁门私下说过，他将“推荐”这位将军来继承他。但是，当他在1947年初再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时，艾森豪威尔也再次谢绝了，说他根本没有政治野心——而不是说他不是民主党人。

据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说，杜鲁门甚至提出，如果艾森豪威尔愿意的话，他将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与艾森豪威尔搭伙参选。罗亚尔后来解释说：“杜鲁门先生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时地在怀疑自己能否赢得1948年大选。”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最孚众望的人。民意测验显示，他只要点点头，总统便非他莫属。

杜鲁门告诉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说，除了“服务的报酬”外，他发现当总统没有什么让人高兴的。贝丝宁愿“放弃一切”，也要出白宫，而他和贝丝都对缩小了玛格丽特的生活圈而感到极大的遗憾。杜鲁门在1947年11月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如果知道总统需要承担的责任的话，任何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希望去当总统。

除了那些使人无法忍受的行政负担外，他还必须忍受着来自说谎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们的各种辱骂……人们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总统不使用他那想象中的巨大权力来使他们老实点儿。噢，原因就在于，总统是一种被美化了的公关人，他花费时间去奉承、亲吻和激励人民，使他们去做那些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

约翰·斯蒂尔曼后来曾强调说：“杜鲁门总统不想参加1948年大选。”而对于那些同样与其朝夕相处的人来说，很显然，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很适合于他；他们都肯定地认为，他从未想放弃它。他的全部生活方式就是一连串难度不断增加的考验，以证明他有能力完成那些看来他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成功地经受了最后的和最严峻的考验。罗斯福死后一直困扰着他的那种能力不足的感觉，如今已经消逝了。他喜欢处在主管的地位上。这一点从他的脸上和他塑造自己的方式中都能显示出来。

他身体健康、气色很好，体重175磅，血压80至120或128之间，被认为是状况极佳。他仍在坚持每天散步，并且仍保持着服役时每分钟120步的步幅，虽然近来由于事务的压力，他经常在晚间而不是清晨散步。

他虽然时常抱怨总统职务中的那些“无聊的东西”，但毫无疑问，他对这项职务的权力及其标志——高级轿车、游艇、飞机、火车专列——是很欣赏的，就像任何有血性、有雄心的男子汉一样。他向他妹妹所抱怨的“辱骂”，是很久以前他就学会了与之相处的东西。《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

回忆说，杜鲁门“有幸具有一张厚脸皮和一颗坚不可摧的道德心，使他能够经受住反复的冲击……每当他走进公共生活，对于纷纷涌来的奉承和顺从，他表现出明确而十足的欣喜”。他确实很看重总统职位的“服务报酬”，也很看重自步入公共生涯以来他所担任过的每一个职位的报酬。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他已达到了他职业的顶峰，如果说过去是命运把他安排在这里的，那么现在则有更多的理由来依靠自己的功绩去赢得它。据克拉克·克利福德说：“哈里·杜鲁门最大的志向就是要凭自己的本事当选。”

在1946年中期选举中，他保持着沉默和不很有特性的超然态度，结果只是使得他的党和他本人蒙羞。如今，杜鲁门正如他自己所说，乐于在一场预期中的公开的全方位的冠军战中与共和党人较量。他压根儿就是一个党派政治家，这场战斗他简直不能轻易取胜，他有大量的事情仍希望自己能够去完成。而且他明白，他自己的计划和新政的计划、以及16年的自由主义的成果会迅速地被一个共和党总统和一个共和党国会毁灭掉。他感到，“投入战斗，帮助阻挡反动的潮流”是自己的责任，正如他后来所写道的：“他们（共和党人）不理解工人、农民、普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真诚地相信，繁荣实际上已从顶端开始，并且在适当的时候会慢慢地流下来，惠及到所有的人。”

他把自己从事的战斗看作是杰斐逊反对联邦党人的战斗，或是杰克逊发动的“反他反动势力”的革命。在曾经占据过白宫的一长串共和党人中，他只钦佩两个人——林肯，因为他关心普通人；西奥多·罗斯福，因为他的进步主义政策。对杜鲁门来说，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本世纪的两巨巨人；他感到，除了为保卫已经传给他的民主党遗产而战之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从个人角度看，我为了自己的舒适和利益要想做些什么并不重要，我能为国家的福利贡献些什么才是重要的。我必须参加1948年的总统竞选。”

这样，到1947年深秋时，在官方范围内，他要参加竞选已广为人知；到新年初，华盛顿的几乎所有人都得出结论：他准备参选，因此，从他的国情演说开始，他所做的和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是考虑到了竞选这个因素的。

这篇演说毫不妥协地重申了他的自由主义的计划，于1948年1月7日星期三在国会发表，没有引起什么掌声，事后也没有引来什么称赞。共和党人如预料的那样，根本就不喜欢它，南方民主党人也一样。在国会大厅中的近1个小时里，杜鲁门再次要求通过一个全国医疗保险计划，一个庞大的住房计划，增加教育经费，增加对农民的援助，保护自然资源，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0美分提高为75美分。作为对物价上涨的补偿，他提出了一个“穷人的”减税计划，即允许每一个纳税人从其最后的税务清单中为他自己及其每位需赡养者扣除40美元（众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哈罗德·克努森惊呼：“汤姆·彭德格斯特曾为每一张选票支付2美元，而现在杜鲁门建议支付40美元。”）。此外，杜鲁门宣布他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民权的特别咨文。他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充分保证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南方民主党人中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3周后，1948年2月2日，在没有与他的国会领袖们协商的情况下，他提交了民权咨文。这个咨文是以他自己的民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为基础写就的，是迄今为止一位总统提出的这类计划中最强有力的一个。的确，到这时为止，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有关民权的特别咨文。

这篇咨文开始便写道，并非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免于暴力的威胁。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生活和工作，或者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并非所有的团体都能享受到充分的公民权利……

联邦政府负有明确的责任来监督宪法对个人自由及受法律平等保护的保证，在合众国任何地区内都不会被拒绝执行或不会被剥夺。这项责任由政府的所有 3 个部门来分担，但是，只有国会能够承担起制定现代的、综合性的民权法律的责任，以适应今天的需要，并表明我们对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持续信念。

杜鲁门要求制定一项反对“私刑的罪行，反对那些我无论怎样说也不为过分的罪行”的联邦法律。他想要在这个国家的一切地区对选举权提供更有利的法律保护，想要一项反对在南方 7 州中风行的人头税的法律，想要建立一个拥有权力禁止雇主和工会等组织进行歧视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想要结束在乘坐火车、公共汽车和飞机进行州际旅行方面存在的种族歧视。他还宣布，已命令国防部长调查军队中的种族歧视状况并监督使其尽快停止。

在最后一项要求中，他敦请国会根据日裔美国人的要求采取行动，在战争期间，他们曾“仅仅由于自己的种族渊源”而被迫离家并被关押起来——这些要求要在 45 年后才能满足。

这是一个勇敢的革命性的宣言，如果考虑到近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部美国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流行的看法的话，就更是如此。在南方，黑人公民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在半个多世纪中毫无改善。无疑，杜鲁门是相信这份咨文的精神和具体措施的正确性的。几天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起草这份咨文的背景是什么，他回答说，宪法和权利法案。

在 1948 年时，这份咨文究竟是好政见还是坏政见，这是个看法不同的问题。克拉克·克利福德确信，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总统都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对于布朗克斯的埃德·弗林首领（他像 1944 年一样，担心丧失纽约黑人的选票）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消息。然而，国会山上的愤怒呐喊显示出如果杜鲁门所说的话就是他的本意，那么他在南方就完蛋了，因而在 11 月份的大选中也就完蛋了。南方国会议员们的破口大骂通常是粗鲁得无法见诸文字。据说，哈莱姆区对这届政府的影响力比所有南部白人的影响力还要大。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是杜鲁门在参院中的一位老盟友，他把这份咨文称作是对宪法施加的一次私刑，并发誓说南方绝不会“对此屈服”。南卡罗来纳州的奥林·约翰斯顿参议员抵制了杜鲁门作为贵宾出席的在斯塔特勒饭店举行一年一度的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招待会，约翰斯顿对记者解释说，因为他和他夫人可能会被安排在一个“黑鬼”的旁边就座（的确，出席招待会的 3 名黑人民主党人在后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就座）。

当几名南方民主党人在私下与总统的会晤中提出，如果他“软化”他的观点，那么一切就会好转时，杜鲁门在书面的答复中说，他本人的先祖是南方联盟的支持者，而他则来自密苏里州“种族歧视”仍在风行的一个地区。

但是，当我听说刚从海外归来的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州被扔出军用卡车并遭到毒打时，我对此感到万分厌恶。



不论我作为密苏里人应表现的倾向是什么，作为总统，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我应该为结束这类罪恶而斗争。

在种族问题上，杜鲁门并未完全超越他的背景环境。正如他的某些助手和秘密保安人员后来所证实的，他的旧的偏见和旧的语言习惯仍持续着，并偶然在非正式场合显现出来。私下里，他仍可能说出“黑鬼”的用语，似乎这才是他提到黑人的自然方式。他妹妹告诉乔纳森·丹尼尔斯，哈里在这个问题上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丹尼尔斯是到密苏里去搜集撰写总统传记的材料的，他在笔记中写道，一天早上当玛丽·简驱车带他从独立城南下格兰德维厄时，回头对他说：“哈里对黑人平等问题的看法和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作为一个南方人，丹尼尔斯对这个声明感到了放心。

但是，玛丽·简像其他人一样，并不明白杜鲁门现在已经懂得（如果其他人还不懂得的话），作为总统他不能再面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而坐视不管了。他的民权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都写入了一份名叫《保障这些权利》的里程碑式的报告，揭露的事情是令人震惊的。当一位朋友从“国外”向作为南方老乡的杜鲁门发出呼吁，写信建议他在民权问题上慎重行事时，杜鲁门从容地以私人方式详细地复信说：

南部的主要难题在于它们的生活方式落后于这个时代 80 年，它们从中走出来得越早，对这个国家和它们本身就越有利。我并未要求社会平等，因为这类东西并不存在，我要求的是对所有的人的机会的平等，并且，只要我处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把这个斗争继续下去。当暴徒团伙能够把 4 个人揪出来从背后朝他们开枪，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谁开的枪却无人就此作证，那么，从执法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就是处在一种相当糟糕的困境之中。

在南卡罗来纳州，当一位市长和一位市警察局长可以把一名黑人军士从公共汽车上拉下来加以痛打，并挖出他的一只眼睛，而该州权力机关对此却置若罔闻，那么，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出了毛病。

在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州铁路上，当烧煤机车被使用时，这工作就是黑人司炉的事情，因为它是一项使人筋疲力尽的繁重而又肮脏的工作。一旦这些机车变为使用柴油作燃料，人们射杀黑人司炉也就成了惯例，许多黑人司炉被谋杀，因为人们认为这项工作现在已成为一项白领工作，应该由白人承担。我不能赞成这种状况继续，我永远也不会赞成，只要我在这儿……我就要设法纠正它，如果其结果是以我不能重新当选的失败而告终，那么这将是一场正义事业的失败……

这封信中提及的 4 名黑人被暴徒枪杀的事情发生在 1946 年 7 月佐治亚州的门罗市。两名黑人及他们的妻子被从一辆小汽车中拽出来残暴地枪杀掉，他们的尸体都很难辨认。杜鲁门从他的民权委员会的报告中得知，其中的一名受害者是新近回国的老兵，这件事与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州被扔出卡车，以及年轻的黑人军士艾萨克·伍德沃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贝茨堡被拽下公共汽车，惨遭警察的毒打并被弄瞎眼睛的事件一样，给杜鲁门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促使他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很久以后，克拉克·克利福德反映说：“这些年中，最惊人最奇妙的进展就是哈里·杜鲁门成长的能力。”

在所有的总统助手和内阁成员中，没有人比克利福德在推动对民权问题采取强硬立场方面做得更多了，用克利福德的话来说，这是面对共和党国会而“力争夺取新高地”的一项更大的努力中的一部分。这是一项以不亚于道义说服力的慎重研究为基础的战略，因为克利福德在没有周密的准备和计划的情况下是绝不会采取行动的（在高尔夫球场上人们都知道，只要有取胜的希望，他是绝不会落后的，因为在每打出一杆之前他都要来回挥动着空杆试打许多次）。一份以“1948年的政治”为题的特别的秘密报告已经准备好，这份长达32页单行打字纸的文件是由一个名叫小詹姆斯·A·罗的华盛顿年轻律师、罗斯福总统的前助手起草的，他与劳工领袖、职业政治家以及报纸编辑人员都进行过谈话。这是一份政情预测，并附有罗所强调的仅仅是在对“需要做的在政治上有利的事情”的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的各项建议。由于罗是托马斯·科科伦的法律合伙人，而这位有影响的“瓶塞子汤米”又是杜鲁门极不喜欢的人，所以，克利福德决定不告诉杜鲁门罗在这份报告中所起的作用，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的报告提交上去。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做了些编辑和润色后，这份报告就被看成不说是1948年民主党人的行动纲领，也是一个航行的指南。

罗的著作权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被漠视，但罗对此却不感到什么悲伤。在这种制度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多年后他写给一位政治学者的信中说：“正如你知道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大家都认可的白宫班子的技巧，在我任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的年代，我也遵循这种技巧。”谁获得荣誉并不重要。他们都是在为总统服务。罗斯福还尤其喜欢那些具有“匿名爱好”的人来为他工作。

乔治·埃尔西回忆说，在罗斯福和杜鲁门年代，“工作班子就是工作班子。”

罗预言，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将是杜威，而杜威是一个“足智多谋”、“极其危险”的候选人，会比1944年更难击败。为了取胜，民主党必须获得西部和农民的选票。必须“引诱、迎合和教育”劳工，这并非由于劳工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而是因为劳工可能在选举日那天“呆在家里”。另一方面，必须用理想主义来“满足”自由派。其时，自由派人数并不多，但如共和党队伍中的制造业者和金融家一样影响极大：“企业家有影响是因为他们能捐款。自由派有影响是因为他们具有发言权。”

黑人的选票是决定性的。罗报告说：“许多职业政治家的一个理论是，如今北部黑人的选票控制着总统选举中的力量平衡，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算术道理，即黑人的选票不仅数量大，而且在地域上也集中于关键的、大的和争夺激烈的选举州中，如纽约、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密歇根。”罗坚持认为，黑人的选票已经丧失，除非行政当局发动一场有决定意义的运动来帮助黑人。

自1876年以来，除了伍德罗·威尔逊在1916年之外，还没有哪一位候选人不拥有纽约州的选票而赢得总统职位的。而纽约州中，与黑人选票同样关键的是集中于纽约市的犹太人的选票。但是，除非行政当局“大胆而令人满意地控制住”巴勒斯坦问题，否则犹太人的选票肯定会投给“机灵的”杜威，或投给亨利·华莱士。

住房和居高不下的物价将是主要的国内问题。无疑，对外政策方面争论的问题将是美苏关系，罗认为，在与克里姆林宫的斗争方面，行政当局拥有“可观的政治优势”。冷战造就了有利的选举年政治。

在危机时代，美国公民倾向于支持他们的总统。在对苏政策问题上，杜鲁门总统相对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英明地任命了马歇尔将军，而马歇尔已然使公众相信：作为国务卿，他是非党派的，并且超然于政治之上。

在一场与外交政策相联系的侧翼攻击中，共和党人会试图把行政当局与国内的共产党人等同起来。总统通过发起对他自己的政府雇员进行的忠诚调查程序而抢先讲出了他们想要说的话，比较直率的共和党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随着大选的迫近，他们将会增强这方面的努力……

民主党的领导层死气沉沉，甚至更糟。它长期当政，以至成了“臃肿、疲惫，甚至有点老态龙钟”的机构。旧的党魁管理机构已经一团糟。

总统看来好像受到美国人民的喜爱。“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真诚而谦恭的人，经常能够听到人们说，他是一个‘尽力要把事情做好’的人。”问题在于人民基本上仍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来看待，而这类政治家是不可能在美国英雄的行列中名列第一的。不幸的是，总统的“公众形象未能充分地多样化”。人民想要一个总统表现出更多的东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建议杜鲁门应少出现在与政治家的交往中，而更多地与著名的科学家和畅销书作家这类有趣人物接触。此外，总统还应尽快地清除自己身上的“密苏里帮”的任何残余。罗（以及后来参加这份报告定稿工作的克利福德）提议，杜鲁门邀请艾尔伯特·爱因斯坦到白宫共进午餐；并且作为一项固定日程，杜鲁门每周应与不少于2名的有趣、受人尊敬、非党派人物会面，并要被人们见到和拍照。

最重要的是，总统必须更经常地让人们见到。他必须走出华盛顿，去周游全国。

因为他是总统，在七月大会举行前不能在政治上表现活跃……所以，一个同时也是候选人的总统就必须寻求各种手段——因为他不能保持沉默。他必须引人注目。他必须……寻求1940年大选中罗斯福使之出了名的那种旅行——“视察旅行”。无论反对派报纸如何指责这类旅行的政治含义，人民却很少注意这一点，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国家元首正在履行他的职责。

这份报告在几个方面明显地犯了错误。例如，它设想杜鲁门会同意像邀请爱因斯坦共进午餐这类主意。可杜鲁门却无法忍受这种公关的鬼把戏。他告诉克利福德，这是虚伪的，与其性格不符，因此他不会去做。他也不会解除哈里·沃恩或华莱士·格雷厄姆的职务以增强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最明显的错误是罗相信可靠的南部各州会继续忠于民主党。他说，行政当局制定的任何政策，不论其自由主义倾向多么强，都不会使南部疏远；认为南部会在一个选举年中反叛是不可想象的。“像以往一样，南部可以被认

为是安全的民主党的势力范围。在规划全国政策时，它可以被放心地忽略掉。”

由于共和党人控制了国会，而那些一再地与共和党人站在一起的南方民主党人也不会改变态度，因此，没有必要去试图安抚任何一派。

罗后来回忆说：“我们告诉总统：‘你在国会山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所以，实际上你要把你送上去的所有立法都送到那儿，然后就他们没有对此做任何事情这一点攻击他们，使他们难受……’”

这份备忘录究竟对杜鲁门产生了多大的实际影响，这是无法确定的。也许相对来说它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影响比后来人们所说的要小。据罗说——是詹姆斯·韦布告诉他的——杜鲁门把它放在办公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里，“偶尔地”读一读。但其他人则坚持认为这份备忘录如果说给杜鲁门造成了什么印象，那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中的绝大部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回忆说：“对于哈里·杜鲁门这样一个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来说，这份‘著名的政治备忘录’不过是一份初级读物。”无论如何，杜鲁门都会根据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政治直觉，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参加竞选。

随着形势的发展，约翰斯顿参议员对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招待会的抵制仅仅成了南部愤怒的温和的前奏。国会 52 名南方民主党人发誓要与民主党纲领中的任何民权计划斗争到底，言外之意，也就是要与倡导这种可恶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任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斗争到底。还有威胁说要举行南方白人向华盛顿的进军，而且南卡罗来纳州长 J·斯特罗姆·瑟蒙德代表一个南部州长委员会发表讲话，发誓要捍卫白人至上的理论，并警告民主党领导层：南方不再是“十拿九稳”的了。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委员会说，它将退出全国代表大会，除非“反南方的法律”被拒绝。

对于所有这些情况，杜鲁门表现得极其平静。然后，3月8日，在没有热闹的喇叭声的情况下，接替鲍勃·汉纳根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 J·霍华德·麦格拉思正式宣布，总统参加竞选连任，并且补充说，总统在民权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

亚拉巴马州的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两位南方的国会参议员并国会中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两位议员，也是哈里·杜鲁门的两位老友，他们立即要求他退出竞选，并且宣布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不会支持他。显然，一个包括了大部分人在内的南方反叛已经开始。

与此同时，一种性质全然不同的麻烦也在困扰着杜鲁门，虽然这些麻烦并不大，甚至微不足道，但却同样引人注目和耗费时日。

当他宣布计划在白宫南面门廊上加一个新阳台，与他楼上的椭圆形书房相连，以便他和他的家庭能够享受点儿不受外界打扰的室外“呼吸空间”时，反对和奚落——报界的义愤、笑话、漫画——所汇成的巨大骚动爆发了。它意味着自安德鲁·杰克逊时代（当时增加了北阳台）以来这座官邸的首次大变化。

这个阳台计划是杜鲁门本人的主意，也使他感到格外烦恼，它不仅遭到美术委员会的立即反对，而且也遭到大部分报纸的反对。他被称作“后门廊哈里”，并被指责为乱摆弄一座既不属于他、又不大可能让他再居住下去的建筑物。共和党人喜出望外，因为“杜鲁门阳台”一夜之间成了一条引起轰动的新闻。杜鲁门来了脾气，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争辩说杰斐逊本人在其位

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带圆柱的建筑物中就是使用了这种楼上眺台或阳台的(《华盛顿明星晚报》表示感谢说,幸亏总统从未见过泰姬陵和缅甸毛淡棉的古塔,否则,他会产生甚至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想法)。杜鲁门坚持认为,这个阳台会使白宫“显得更完善”。有了它就不再需要在夏天用那些不雅观的遮篷来遮挡这座官邸南部楼下房间的阳光了。“你会记得,这些遮篷被连接在那些漂亮柱子的上半部,看起来总好像是它们已经把这个城市的污垢和灰尘都吸纳过来了似的。”他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每年还必须(花780美元来)更新,一年的维修保养费是2000美元。在8年中,遮篷的费用就够付这个门廊的费用了,而且从南面看,白宫也会显得更得体。”在清晨散步时,每当走近白宫南面,他都憎恶看到那些肮脏的遮篷及其“与那漂亮的廊柱极不相称的”安置方式。因此,他将坚持他的阳台计划,没什么可说的。

白宫侍者总管豪厄尔·克里姆慎重地告诉他,白宫二楼正处于坍塌的紧急危险中,这加重了他对这所旧房子的担心。经过仔细检查,一位工程师告诉杜鲁门:大宴会厅的天花板之所以没掉下来,主要是由于“惯态的力量”的缘故。

由于哈里·沃恩坚持自己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的做法,查利·罗斯对此极为愤怒。这位说话温柔、很有思想的新闻秘书和那位福斯泰夫式的军事助手之间已经越来越相互厌恶。埃本·艾尔斯记载说,罗斯“极度地心烦意乱”,警告说不得不最后摊牌,“有沃恩就没有我”。

总统的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被指责说,在总统已经谴责农产品投机是促动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的关键时刻仍参与谷物期货的赌博,这项指责的潜台词是格雷厄姆依靠内部消息获利。虽然开始时格雷厄姆坚持说他在市场上已经“损失了自己的存款”,但最后他承认用5700美元的投资赢得了6000美元的利润。然而,像哈里·沃恩一样,他仍留在了白宫的岗位上,新闻界越是悲叹他们的存在,杜鲁门就越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罗斯沮丧地对艾尔斯说:“你能躲过敌人的阴谋,却防不住朋友的愚蠢。”

与此同时,亨利·华莱士却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征讨,并吸引了大批群众。他的追随者中包括热情的年轻自由派人士、工人、黑人,更引人注目的是,还有美共党员。华莱士抨击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腐败”,提议把美国的核武器转交给联合国,并要求实行一项由美国资助的大规模的苏联重建计划。他否定马歇尔计划的权威性,说它是一个元帅的计划。他谈到使这个国家的煤矿和铁路国有化。杜鲁门的政治战略顾问们担心华莱士运动对民主党忠诚分子所造成的效果可能会比南方的反叛更具危害性。

不过,比所有这些问题更使杜鲁门感到困扰的是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这个紧急问题。很久以后,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回忆她父亲的白宫岁月时曾把这个问题称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中最难对付的一个。

## 2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令人迷惑、也牵动感情,如杜鲁门所说,“具有爆炸性”,并且在选举年的热烈气氛中也格外敏感。它在人道方面的后果——对犹太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以及对中东关系的影响——显然是重大的、极其深远的。

杜鲁门感到受到了几个不同方向的拉力。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想要做那些对于成千上万的欧洲犹太人有益的事情，他们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曾经历过那种难以想象的恐怖。他对他们的同情是发自内心而且由来已久的。任参议员时，在1943年芝加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曾说必须尽一切“人可能做出”的努力来为纳粹罪行下的犹太人幸存者提供一个天堂。作为参议员，他私下经常向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保证，他会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家园而斗争。任总统后，1945年夏季被派去调查欧洲难民营状况并了解犹太人幸存者情况的一位密使所写的报告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印象。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前美国移民局局长厄尔·G·哈里森曾向杜鲁门提供了一份描述这种悲惨状况的极其令人感动的文件，正如杜鲁门所说，这种状况“不能被允许继续下去”。这份文件也增强了他自己的信念：巴勒斯坦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哈里森报告说，巴勒斯坦是欧洲犹太人幸存者“肯定而又出色”的选择。只有在巴勒斯坦，“他们才会受到欢迎，找到和平与安宁，并获得生存与工作的机会。因此，从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地方经历过集中营恐怖的犹太人的观点来看，没有其他任何问题像处理巴勒斯坦问题这样重要”。

在白宫班子中，两位犹太人事业的热情支持者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杜鲁门的少数民族事务特别助理戴维·K·奈尔斯。奈尔斯是罗斯福班子中留任的人员，本人也是犹太人，他从杜鲁门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在罗斯福身上从未感受到的对犹太人困境的根本同情。奈尔斯后来说，如果罗斯福活着，事情就不会是后来这样的结果。

奈尔斯身材矮小、皮肤浅黑、圆脸、近视，前顶正在谢发——外表不如克利福德那么引人注目——是一个极其精明、老成的解决政治麻烦的能手，与全国各地的犹太人领袖均保持着长期的联系。对白宫记者以及白宫班子的其他成员来说，他似乎有点古怪、不易接近，甚至神秘，总爱在纽约和戏剧界人士一起、或在家乡波士顿度过长长的周末。这是奈尔斯自己培养起来的名声。他对“匿名的爱好”近乎于一种狂热。他平静地坚持说：“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在隔壁旧国务院办公楼的二层楼上他那狭小而拥挤不堪的办公室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电话上。奈尔斯和克利福德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保持使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知道华盛顿和白宫内部正在做什么事情。

两人都极想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相协调，尽管克利福德当时和后来都断然拒绝任何如下的指责：11月选举是这个问题的真正核心；它是获得犹太人选票的“正确策略”。

当然，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是1948年的一项极好的策略，在诸如宾夕法尼亚或伊利诺伊这样的大州中，特别是在拥有250万犹太人的纽约州中，它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贫穷的民主党来说，比犹太人选票甚至更重要的也许是犹太人的竞选捐款。毫无疑问，共和党人也准备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尽其所能去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不过，除了所谓的“犹太人选票”之外，公众对建立犹太人家园的支持是占压倒多数的。有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对犹太人的新国家这种前景感到激动的并非只是美国的犹太人，而且包括大多数美国人。

政治、人道主义的考虑以及对外政策都紧密而无法改变地纠缠在一起。而对杜鲁门来说，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是占第一位的。他的同情

自然是在受迫害者一边，此外，对古代历史终生的喜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本人对“肥沃新月”全部复杂的编年史有着令人惊异的了解。对杜鲁门来说，巴勒斯坦决不仅仅是地图上的某个地方。

他本人对古代史和《圣经》的见解使得他成了一个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这种思想的支持者（克利福德回忆说），即使在其他同情犹太人遭遇的人们谈论把他们送往诸如巴西这样的地区时，他仍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无须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服。事实上，他不得不努力避免造成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压力的印象……我记得有一次他谈到难民问题。他说：“任何被从其国家驱逐的其他人都有地方可去，但犹太人却无处可去。”

对杜鲁门来说，正如他自己所写，这是“一个基本的人道问题”。当国防部长福雷斯特提醒他，一旦爆发战争，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需求将是决定性的；杜鲁门回答说，他处理这个问题所依据的是正义的原则，而不是石油。

福雷斯特及国务院的官员们暗示说他有点儿看不出此中包含着的复杂性，对此杜鲁门极为不满。作为总统，他不可能看不到急剧增长的中东石油储备对美国 and 欧洲所具有的战略和经济意义。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对阿拉伯人及其文化的了解相对较少，但同时他却不希望损害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对于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所存的敌意似乎很难平息。迄今为止，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直很好，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像福雷斯特一样担心爆发一场“缺乏石油”的战争，因此极力强调保持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对阿拉伯人来说，他们似乎正被迫为希特勒的罪行付出代价。

在巴勒斯坦，大量的流血冲突已经发生。阿拉伯人的组织攻击了犹太人定居点。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则袭击了英国军队。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被投进监狱。1946年夏天，犹太恐怖主义组织伊尔贡爆炸那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炸死91人。而杜鲁门仍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要求保持着同情，并且知道已有60多万犹太人居住在那里，他也知道阿拉伯人在人数上占有的压倒优势。他多次说过，他不希望派美国军队去保护这个新犹太国家的生存，尽管他所得到的建议说这正是需要做的事情。

他还发现，犹太人组织对他施加的日益增强的压力使他非常恼火。他是一个很好的听众，自上任之初以来，一直在倾听他们的请求和论点，当时，拉比斯蒂芬·怀斯首次拜访他，如今他不仅对所有这些言论感到厌倦，而且对巴勒斯坦的政治越来越怀疑，越来越不满。1947年底，白宫收到了10万多封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信件和电报。

在一封来自布鲁克林的信中他谈到：“总统先生，对你和其他美国人民的领袖来说，应该给世界的其他地区树立一个榜样……把你的支持给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像前总统罗斯福所做的那样。”来自美国犹太人大会费城妇女分会的一份电报写道：

我们的政府在道义上应受它的意愿和诺言约束，必须保持对人道主义的信念。我们必须对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提供自己的领导和力量。

杜鲁门被这种犹太人的“宣传”浪潮所激怒，他告诉克劳德·佩珀参议员，他接到一大堆这类信件，都“把它付之一炬”——这个说法也许表达了他的真实愿望，但似乎没有事实根据（他的秘书罗斯·康韦后来告诉作家罗伯特·多诺万说：“我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件事。”）。

在一封后来他并未发出的给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复信中，杜鲁门写道：“我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是创造一个使犹太人感到安全的世界。因此，我不想巴勒斯坦进行战争。”在给已被他任命为驻联合国代表的罗斯福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某些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动最终将造成对所有反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事情的人的损害。我非常担心，犹太人像所有的受害者一样。当他们处于上层时，他们是那么偏狭、那么残忍，就像在他们处于下层时对待他们的那些人一样。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的同情一直是在他们一边。”

当来自纽约的一个国会代表团来拜访他，并与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不耐烦地坐在办公桌旁翻弄着文件，并且说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拜访他，与他讨论国家的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在另一次会见中，据说他曾这样讲：“我不是纽约人，这些人都在要求一种特殊的利益。我是一个美国人。”他憎恶任何种类的特殊利益，然而某些人却开始在这方面激怒他。

特别使杜鲁门感到冒犯的是克利夫兰的拉比阿巴·希勒尔·西尔弗的态度，西尔弗与斯蒂芬·怀斯同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理事会的联合主席。西尔弗拉比是一名共和党人，参议员塔夫脱的亲密盟友，曾帮助撰写了1944年共和党纲领中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要点。在杜鲁门办公室中的一次会见时，西尔弗捶着杜鲁门的办公桌对他大喊大叫。后来杜鲁门曾说：“恐怖和西尔弗是我们遇到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麻烦的原因。”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据说他对犹太人问题感到如此愤怒，以致怒气冲冲地说：“耶稣基督在世时都无法使他们高兴，所以别人怎么能指望我会有幸能够做到呢？”

在给他妹妹玛丽·简的信中，他写道：“我太累了，被折磨得无法合乎礼仪地去对待别人。”

当奉召从中东回国向他提出建议的几名美国外交官在表达完阿拉伯人的观点时，杜鲁门的评论是，在他的选民中缺少大批的阿拉伯人。

福雷斯特尔认真、反复地申明阿拉伯石油的重要性，并顽强地反对美国采取任何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行动，这些也开始作用于杜鲁门的神经。就福雷斯特尔来说，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觉得总统像是个愿意向廉价的政治权术屈服的人。

不过，杜鲁门尚未完全断绝与犹太复国主义代言人的联系，特别是与他的老友、前生意合伙人埃迪·雅各布森的联系。像许多美国犹太人一样，雅各布森并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他指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能解决犹太难民问题，并陪同小型团体到白宫去解释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以此来尝试着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这样做既是为了难民，也是为了犹太人家园的事业（在1946年的一次这类访问中，他陪同纽约的阿瑟·J·莱利维尔德拉比和一家衬衣公司的副总经理查尔斯·卡普兰去见总统，事后他对记者妙语连珠地说：“卡普兰卖衬衣，我卖服饰，而拉比则兜售见解。”）。

杜鲁门仍像以往一样喜欢雅各布森。他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



个有爱国心的美国人，并且绝对地信任他，而这也必然使得雅各布森在幕后扮演了一种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迄今为止，雅各布森从未向杜鲁门请求帮助，也从未放肆地去占用他的时间。杜鲁门后来曾写道：“当那一天来临时，雅各布森被说服打消了他那自然的不愿向我提出请求的念头。而来向我谈有关犹太人的困境……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杜鲁门说，的确，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雅各布森的贡献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的，这一点在当时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要求开始于 19 世纪末，这项事业的美国支持者中，最杰出的就是杜鲁门以前的朋友、大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他曾帮助使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获得了伍德罗·威尔逊的认可。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同年，在人们后来称之为《贝尔福宣言》的文件中，英国政府正式同意了未来犹太人家园在巴勒斯坦这一观念，它是古代以色列王国的所在地，在地图上是一个狭长条，位于地中海东端，总面积 1 万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西西里岛或佛蒙特州的规模。

战争结束后，英国从国际联盟那里获得了对巴勒斯坦的特别委任统治权，同时附加了一项谅解，即应该很快地使该地区独立。但是，英国的委任统治持续下来了。只是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是在 1947 年，才有了艾德礼政府宣布从巴勒斯坦撤退（就像从希腊撤退那样），并把这棘手的整个问题转交给了联合国。

所以，事实上，巴勒斯坦和欧洲流离失所的犹太人的命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后果——如原子弹以及红军在东欧的存在——中的另一个，它们都被留给了杜鲁门来对付。

总的说来，美国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立即独立，然后将它分为、或者说“分隔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一个是犹太人国家，一个是阿拉伯人国家，但却同在一个经济联盟中。美国也支持犹太人大规模地向新家园移居的计划。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赞成分治。阿拉伯国家则激烈地反对。英国人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尽管温斯顿·丘吉尔在其权力的顶峰时曾支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他虽在 1944 年开罗的一个集会上高吼道：“我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艾德礼政府却反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在英国人看来，哈里·杜鲁门似乎是个“漫不经心的亲犹太复国主义者”。当 1946 年杜鲁门要求允许 10 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时，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把这归因于一种想得纽约州选票的赤裸裸的企求，并且暗示说杜鲁门不希望看到更多的犹太人去美国，这番议论使杜鲁门极为气恼。

对这个问题关注得越多，它造成的分裂也就越大：它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裂，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分裂，并且华盛顿越来越多的凶兆显示，白宫与国务院正在分裂，后者强烈地感到，阿拉伯人决不会接受分离，除非使用武力，而且阿拉伯人会顺理成章地转而向苏联人求助——这个转向可能导致苏联人在维持和平的借口下进入中东。

像英国人一样，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支持由联合国托管巴勒斯坦，直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争端以某种方式解决为止。乔治·凯南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在当时是难以解决的。更为直言不讳的一个人是近东事务处处长洛伊·W·亨德森，他是个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具有很强的责任感的职业外交

家，他相信巴勒斯坦的分治绝无成功的机会。亨德森担心如果阿拉伯的石油供应被切断，将对马歇尔计划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欧洲 80% 的石油是依赖于阿拉伯国家。他向马歇尔强调说，在这个特殊时刻一个新的犹太国家的建立对于美国的长远利益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国务院与杜鲁门班子中诸如克利福德和奈尔斯这样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紧张。乔纳森·丹尼尔斯不指名地写道：“某些白宫的人仍然相信，职业外交家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许多立场都是基于反犹主义，而不是基于外交。而国务院的许多人则相信，总统班子中的某些人显然更关心美国政治问题中的犹太人，而不是美国安全问题中的犹太人。”如果说克利福德不愿强调其中所包含的国内政治方面的利害关系，奈尔斯却不然。亨德森记得有一次奈尔斯回过头来对他尖声说道：“请注意，洛伊，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支持总统连任。”

根据当时任马歇尔手下负责掌管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的说法，关系紧张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方面有任何偏离目标之处，而在于总统自己心目中的“目标互相矛盾”。“这一点在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到。由于马歇尔和国务院致力于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把没有 1000% 地支持犹太复国事业的一切都贴上了背叛总统的标签。”

克利福德依然肯定，国务院“追随着一个人”，正在做一切可能阻止总统意图的事情；他把这种看法告诉了杜鲁门。杜鲁门认为克利福德过分担心了。“我知道马歇尔怎么想，他也知道我怎么想。”杜鲁门说，意思是只要知道马歇尔和他站在一起，这就足够了。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暴力和恐怖主义仍在持续。

1947 年末，11 月 29 日星期六，感恩节的周末，联合国在一次戏剧性的两个半小时的会议结束时，以非常接近的票数投票支持分治，为使这项计划通过，美国在幕后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我们支持它，”克利福德告诉乔纳森·丹尼尔斯说，“正是因为白宫支持它，才使它获得通过”）。苏联也加入了美国支持的行列。

埃迪·雅各布森用电报文体记下了他自己的幕后活动的编年史：

11 月 6 日——华盛顿——总统依然全力支持巴勒斯坦（分治）。

11 月 17 日——再去白宫……

星期三，26 日——接到白宫电话——一切顺利。

11 月 27 日——感恩节。给杜鲁门发出两页纸的电报。

星期五，接列他的秘书（马特·康内利）的电话，不必担心。

11 月 29 日——使命完成。

雅各布森写道，杜鲁门曾告诉他：“他（杜鲁门），即他本人负责争取过来了某些代表团的票。”

犹太复国主义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欢欣鼓舞。在位于弗拉兴草地的联合国总部、这座 1939 年世界博览会中曾为纽约市大厦的大会会议厅外的走廊中，犹太人代表团被各代表团和来访者（除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之外）轮流地拥抱。在会议厅中，当阿拉伯各代表团的成员退出会场时，听众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却欣喜若狂。一位拉比在代表团休息室中高喊道：“这是上帝

创世的日子！”“犹太人热泪盈眶，非犹太人则被此中蕴含的崇高所感动。当时活着的人从心底里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刻。”阿巴·埃班回忆说，他当时是正式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犹太代办处”一名年轻的联络官员。

对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来说，这次投票是时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一次“成功的辩护”和“争取国际公正的一次胜利”。西尔弗拉比称它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并对美国和苏联所起的作用表示特别的谢意。《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是“我们破碎的战后世界所能取得的勇敢的政治家们少有的重大集体行动中的一个”。在纽约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庆祝这一胜利的集会上，2万人试图挤进位于第34街的一座礼堂，这个数字已经3倍于该礼堂的座位容量。

英国宣布，对巴勒斯坦的责任将在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内，即1948年5月14日转交给联合国。阿拉伯人说分治就意味着战争，杜鲁门也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警告：美国为保护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而进行的军事干预至少需要10万人的部队（英国大约撤出的是5万人的部队）。福雷斯特尔告诉克利福德，阿拉伯人会“把犹太人赶进大海”。

正如福雷斯特尔向杜鲁门所报告的那样，无情的事实是当时可供调遣的现成部队不足3万人，也许可以再加上2.3万的海军陆战队。

从任何意义上来看，巴勒斯坦在1948年2月初决非唯一值得关注的地区。在捷克斯洛伐克，红军支持的一场激烈政变已经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制造了一个亲共政府。这是战后时代最具伤害性的事件之一。一种突变的感觉袭击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因为纳粹攫取捷克斯洛伐克不过是10年前的事情。意大利和法国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杜鲁门前往基韦斯特去度另一次亟须的休假，而环境的变换毕竟未能改变他的看法。在3月3日从基韦斯特发出的一封信中，他告诉玛格丽特：“情况看起来很不妙。”俄国没有履行任何协议。“因此，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与英国和法国在1938—1939年面临希特勒时完全一样的形势。”

两天后，3月5日，卢修斯·D·克莱将军从柏林发来一份绝密的电报，报告说在柏林的苏联人的态度有了令人担忧的转变，“一种新的紧张出现在每一个我们与之有正式联系的苏联人身上”。直到最近，克莱一直认为另一场战争至少在10年内不会爆发。现在他的感觉是，战争随时可能到来，并“具有明显的突然性”。

如果说克莱电报的真实目的如后来所显示的，是要给国会造成需要恢复征兵的印象，那么在当时人们是难以体会到这一点的，它给华盛顿造成的影响是使之大吃一惊并完全信以为真。布莱德雷将军后来说，它“立刻使我从椅子上跳起来”。陆军部长罗亚尔则与戴维·利连撒尔核对了一下，看看把原子弹运到靠近苏联的地中海需要多长时间。约瑟夫·艾尔索普与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他们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今天华盛顿的气氛不再是战后的气氛，它成了一种战前的气氛。”

“犹太人对白宫的压力在联合国分治投票后的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减轻。”多年后杜鲁门在回忆中仍带有抱怨地写道，“个人和组织经常是以相当不和谐和动感情的方式要求我制止阿拉伯人，使英国人不要支持阿拉伯人，装备美国士兵，做这个，做那个，或者做其他的事。我想我能说的就是，我保持了使我的政策正确的这种信念，而不管某些犹太人怎么说。”

成千上万张明信片涌进了白宫的信箱，几乎所有这些邮件都是来自犹太

人利益集团。主要是由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理事会努力的结果，33个州议会通过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决议。40个州长和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签署了给总统的请愿书。在杜鲁门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上，戴维·奈尔斯变得如此激动以至威胁着要辞职，除非杜鲁门采取更明显的行动支持犹太人的事业。埃德·弗林从纽约赶来告诉总统说，他必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否则就只能指望纽约在7月份反对他的再次提名。

杜鲁门的忍耐力被折磨得越来越有限。他拒绝对巴勒斯坦问题发表进一步的评论，拒绝再见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言人，甚至拒绝考虑钱姆·魏茨曼博士的来访，后者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主要的老领导人，不顾身体的衰弱，从伦敦坐船来就是想要会见他。现年74岁的魏茨曼是位有名望的科学家，已经将其大半生奉献给了建立犹太人家园的理想。他矮小、迷人、聪慧，是《贝尔福宣言》的设计者之一。此外，他与杜鲁门已经相识，并且相互喜爱。杜鲁门回忆说，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不知道“钱姆”怎么发音，“所以我叫他‘查姆’，他喜欢这个称呼。他是个极好的人，我想，是我所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一位领袖，一个人们在书中常读到过的那种人”。

1947年11月，刚好在联合国对分治进行表决之前，他们曾在白宫秘密会晤，这次会晤对杜鲁门的影响几乎就像30年前的那次会晤对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影响一样显著。魏茨曼在杜鲁门的办公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然后以内格夫沙漠（其未来的控制权还有待裁决）的农业前景紧紧地吸引住这位前密苏里州的农民。杜鲁门发誓支持把内格夫包括在犹太国家的版图内。“你可以信赖我们。”杜鲁门说。而魏茨曼则以作弄人的克制笔调写道：“我极其幸运地发现，总统看地图非常快，也看得很明白。”

然而现在，杜鲁门对这位“矮博士”关上了门，对魏茨曼及其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盟友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使人担忧的信号。通过克利福德和奈尔斯，他们已经详细地知道了他们在国务院所遭到的反对。

来自乔治·凯南的政策计划办公室的一份秘密文件建议不要进一步支持分治。新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皆的结论是，分治不可取，并敦促重新考虑有关政策。对杜鲁门来说，更重要的是乔治·马歇尔的看法，在2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马歇尔说美国“正在玩火，但是没有可以用来灭火的东西”。

马歇尔看到的是美国受到苏联严重威胁，作为一名军人，他敏锐地察觉到一旦战争爆发于欧洲，中东石油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当时战争爆发似乎是很可能的。马歇尔还具有一种军人对政治的厌恶。在谈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他直率地声称：“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于事无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的语气甚至更强硬。只要他任国务卿，就决不会“屈从”于政治或军事的威胁。

克利福德越来越担心。“有5次我告诉总统说我们对以色列问题的立场正在出岔子。”克利福德的记录中说，“而每一次总统都答道：“不，马歇尔知道我怎么想。””

在国务院，接到了几千封信，要求洛伊·亨德森因其“亲阿拉伯人”的立场而辞职。

亨德森被召到杜鲁门的办公室，在克利福德和奈尔斯也出席的一个会议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亨德森感到，克利福德和奈尔斯正试图在总统面前丢他的脸。“我指出，我所表达的观点不仅是我自己的，”亨德森回忆说，

“也是我们在中东的所有使馆和领事馆的，以及国务院负责那个地区的所有成员的观点。”克利福德和奈尔斯的交叉提问变得越来越苛刻，直到最后杜鲁门站起来说：“，见鬼去吧！我要走了！”

从他的举止和面目表情来看（亨德森回忆说），我一点儿都不相信甚至迟至那一天总统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全力以赴支持犹太国家的建立。当然，我并不处在那种能够知晓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的地位上，但是我已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即他已认识到如果他撤消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支持，那么，国会、新闻界、民主党以及被激起来的整个美国公众舆论都将转而反对他。另一方面，我似乎感到他也在担心继续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倡导的政策将会给美国造成的长期影响。我觉得，他几乎是在绝望中希望国务院告诉他，联合国的那个委员会所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国家和犹太人国家正是美国的利益之所在。然而，这是国务院迄今为止所不能做的事情

从伦敦到达纽约后，钱姆·魏茨曼由于活动“过度紧张”而病倒。与杜鲁门进行接触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接着，在2月20日深夜，当魏茨曼正躺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他的房间中的时候，全国“圣约之子会”主席弗兰克·戈德曼接通了给堪萨斯市的埃迪·雅各布森的电话，把雅各布森从床上叫起来，询问他是否愿意帮忙。戈德曼说，没有人能够说动总统，即使是埃德·弗林也不行。

在给杜鲁门的一封加急信中，雅各布森请求他尽快会见钱姆·魏茨曼。但是，在2月27日发自基韦斯特的一封复信中，杜鲁门称魏茨曼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告诉他。杜鲁门还说，“目前形成的”这种局面“无法解决”。

雅各布森拒绝接受失败。杜鲁门刚回到华盛顿，雅各布森就从堪萨斯市赶来。3月13日，星期六，没有预先约定，雅各布森就走进了白宫西侧楼，在杜鲁门办公室的门外，马特·康内利警告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提及巴勒斯坦问题。

进入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雅各布森与他的老朋友握了手，并对他气色那么好显得很高兴。雅各布森说，佛罗里达很适宜他。他们聊了会儿各自的家庭和雅各布森的买卖，对这个话题，雅各布森说，杜鲁门“总是怀有一种兄弟般的兴趣”。这里只有他们两人，由于西侧楼在星期六时大部分都空着，所以房间里显得比往常更寂静。

雅各布森提出了巴勒斯坦问题。杜鲁门突然严肃起来，拉下了脸，以难听的粗鲁的话作答，完全不像是他自己了，雅各布森认为。“在我们保持友谊的所有这些年中，他从未以这种方式和我谈过话，即便是与此相近的方式也没有过。”雅各布森回忆说。杜鲁门后来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他并不生雅各布森的气，但对那些用雅各布森来和他打交道的人感到愤怒。

杜鲁门说，他不希望谈巴勒斯坦、犹太人、阿拉伯人或英国人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留给了联合国。他痛苦地谈到他所遭受到的辱骂，以及某些犹太人对他是如何的“无礼和刻薄”。雅各布森突然并且悲哀地感到：“我亲爱的朋友、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在这一刻就像一个人可能成为的那样，是那么接近于一个反犹主义者……”

雅各布森尽力地反驳——“当时我很惊讶自己有这个勇气。”

他后来写道——而杜鲁门却不为所动。雅各布森感到自己垮了。

在右边靠墙的一张桌子上，摆着总统最珍视的物品之一、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安德鲁·杰克逊的小铜像，这是杜鲁门委托查尔斯·凯克为堪萨斯市内的杰克逊县法院塑造的那个铜像的模型。雅各布森在前几次来访中曾注意到它，现在，他指着它，发现自己发表了一篇动情的演说：

哈里，在你的一生中你心目里一直有一位英雄……我心目中也有一位英雄，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但是我认为，他是永远活在我心里的最伟大的犹太人……我说的是钱姆·魏茨曼。他是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几乎病入膏肓，但他行程数千英里，为的是来见你并为我的人民的事业辩护。而体现在却拒绝见他，只是因为你受到了某些我们美国犹太人领袖的冒犯，即使你知道魏茨曼绝对与这些冒犯无关，知道他最不愿意与他们这些人为伍。这不像是你，哈里，回因为我认为你能够忍受他们已经说出来的那些废话……

正如阿巴·埃班后来所写道的，把魏茨曼与安德鲁·杰克逊作比较有着难以想象的牵强之处。但是，它却发生了作用。

杜鲁门开始用手指敲击着他的办公桌。他把坐着的旋转椅转过去，背对着雅各布森，坐在那里望着窗外的花园。在雅各布森觉得“像是几个世纪”的这段时间里，两人都沉默无语。接着，杜鲁门把椅子旋转过来，盯着雅各布森的眼睛，说出了雅各布森后来称之为他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亲切的话：“你赢了，你这秃顶的母狗息儿。我见他。”

从白宫出来，雅各布森径直穿过拉法耶特广场，走上第16街，来到斯塔特勒饭店的酒吧，喝下了两大杯波旁威士忌酒，他以前从未像这样过。

3月16日，各家早报上充满了战争的谣传。杜鲁门极其担心。马歇尔计划对遏制苏联的威胁是不充分的。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必须尽快重建。他写信给罗斯福夫人说：“这是1939年以来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形势。我将尽我所能来对付它。”

他必须唤醒国会和这个国家。他告诉他的班子说：“这样做总比挨打强，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战争中那样，没有预先警告国会和人民。”

3月17日，华盛顿迎春花盛开，在装点精美、喜气洋洋的圣帕特里克节日里，他走上国会山，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立即通过马歇尔计划，再次要求通过普遍军训计划，并要求“临时性的重新颁布”征兵案，以应付欧洲正在发生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急剧变化。此时，距他在这同一个讲坛上发表关于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几乎恰好是一年。现在，他第一次把苏联确认为一个阻碍和平道路的国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性的声明：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行动结束以来，苏联及其代理人已经摧毁了东欧和中欧一系列国家的独立和民主性质。

正是这种残酷的行动方针及试图将其扩张到欧洲其余自由国家的明确意图，造成了今日欧洲的危机形势……我相信我们已经到了将美国的立场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的时刻……在世界历史的某些阶段上，行动远比犹豫不决要明智。

他说，和平的愿望必须以和平的实力来支撑。“我们必须准备为和平付出代价，否则我们将肯定会为战争付出代价。”

然而，国会基本上却无动于衷。

对于《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这位公认的“强硬路线主张者”来说，杜鲁门的勇气及其置政治后果于不顾的做法值得大大称赞，因为在选举年要求恢复征兵案似乎是最糟糕的一种政治战略。然而对于国会听众中的许多人来说，谈论俄国人“日益增长的威胁”像是一个哗众取宠的选举年把戏，而这类做法也是一种糟糕的把戏。理查德·斯特劳特在《新共和》杂志上写道：“坦白地直率地说，我们认为哈里·杜鲁门已经失败了。我们认为任何‘危机气氛’都不会有助于他的当选。”

一项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几乎不论杜鲁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都将在11月的大选中败于4位可能的共和党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个、即杜威、范登堡、明尼苏达州前州长哈罗德·E·史塔生以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斯特劳特的结论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杜鲁门并非是在国家的危急关头老百姓可以指望的那种强人。把杜鲁门看作‘马背上的英雄’的这种看法完全是可笑的。”

3月18日，星期四晚间，天刚黑，为了避免被记者看见，钱姆·魏茨曼穿过东配楼被悄悄地带进白宫。杜鲁门没有通知国务院他要做的事情，坚持认为这次会晤应保密。埃迪·雅各布森因现在已为白宫新闻记者所熟悉，所以同意不参加会晤。

据后来杜鲁门和魏茨曼各自的记录来看，会晤进行得很顺利。他们谈了45分钟。杜鲁门说，他想看到不流血而实现公正，并向魏茨曼保证，美国将支持分治。杜鲁门后来写道：“在他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认为他时我的政策已有了一个充分的理解，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在多年后对这件事的回忆中，杜鲁门记得埃迪·雅各布森也在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确在场。

然而，形势已经变得比魏茨曼所知道的、甚或比杜鲁门本人所理解的还要复杂，就像事情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戏剧性地显现出来的那样。

杜鲁门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应该部分地为所发生的事情受到责备。他不仅没有把魏茨曼的来访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马歇尔国务卿或国务院的任何人——也许因为马歇尔当时在西海岸，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接受由此而可能造成的印象，即他和马歇尔所追求的目标相互矛盾——而且他似乎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犹太人社团对美国政策突然转变的反应。这项转变是几个星期前在基韦斯特时他本人所默许的，现在，他自己的驻联合国大使、前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在预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于星期五，3月19日，即杜鲁门和魏茨曼达成“谅解”的第二天将其公布出去。

奥斯汀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为了使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论战各方有时间冷静下来，美国建议放弃分治计划，并要求由联合国暂时“托管”巴勒斯坦。

这是行政当局的一个完全的、似乎令人费解的转变，对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美国犹太人大会”在一次紧急会议中谴责国务院的行为是非美的，“全然不讲信义”。在国会山，出现了“被出卖了”的鼓噪。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国会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指责说，在国际政治中没有比这更让人感到羞辱的决定了；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民主党参议员指出：在那些人数最多的州中，犹太人的愤怒可能会导致 11 月投票中的反叛，这些反叛总起来给杜鲁门造成的损害就像反天主教运动在 1928 年给艾尔·史密斯造成的损害一样。

《纽约时报》指责行政当局是史无前例地愚蠢，并指责它屈服于卑鄙的物质的利害关系：

一片牛奶和蜜糖的土地现在被石油所淹没，三大宗教的发源地正在由毫不顾及精神和道德考虑（这本应由至少是世界的那个地区去决定的）的权宜之计来决定其命运。古代巴勒斯坦曾被描写为“并非学者、而是先知的家园”。人们需要用一位坐在急速旋转的转台上的先知来预见过去儿个月中我国政府所遵循的方针。

白宫被信件、电报和给总统的请愿书所淹没，其中充满了警告和对这种“想入非非、玩世不恭的行动”及这种“摇摆不定”和“灾难性的”政策的愤怒。它们并非全都来自于犹太人或犹太人组织。

“这个变化完全意味着那个可爱的民族的美好家园被彻底毁灭了，他们虽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在那个实际上诞生了上帝这个属于他们的人之前的国度中所能取得的奇迹。”一位名叫约翰·P·廷利的艾奥瓦州康瑟尔布拉夫斯市的市政法官写道，“他们不能被出卖。为了上帝和人类的缘故，做些事情来纠正这可怕的错误吧！”匹兹堡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的萨缪尔·A·斯隆教授宣称：“啊，你怎么堕落到如此下贱的地步！你星期五的行动是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势力达成的一项‘君子协定’吗？这种反叛行为肯定是、也应该是联合国的末日……你不能不做政客，而像一个人那样去行事吗？”

对于在堪萨斯市的埃迪·雅各布森来说，3 月 19 日是“黑色星期五”。被这个消息激怒了的人们整天都在给他打电话。对于他的朋友杜鲁门变成了犹太人的叛徒他有什么感受呢？“没有人……表示相信或信任这位美国总统的话。”雅各布森回忆说，他感到如此伤心，以至在那个周末的其余时间里不得不躺在床上。

直到星期一，当他回到自己的商店时，雅各布森才从钱姆·魏茨曼那里听到了消息，魏茨曼本人打电话告诉他不要绝望。魏茨曼比所有觉得被出卖了的人都要正确，他肯定总统会保持他们会晤时的诺言。魏茨曼强调说，雅各布森千万不能忘记，他的朋友哈里·杜鲁门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一个人，保持白宫大门的敞开还要指望雅各布森。

杜鲁门最初是从星期六，20 日，即奥斯汀讲话的第二天上午的报纸上得知联合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早晨 7 时半，杜鲁门给尚在家中的克利福德打电话，让他立即赶到白宫来：

今天早晨我发现国务院已经改变了我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杜鲁门在他的日程记事本中愤怒地写道）。我得知此事的最初途径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这不是活见鬼吗？现在我处在了撒谎者和骗子的地位上。我一生中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国务院中层工作人员中某些人总想要割我的喉咙。他们现在成功地干了这件事……



他仍然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即也许是马歇尔在反对他的立场、或误解了他的立场，他把国务院本身，以及“那些过分注重礼仪的家伙们”看作是他的麻烦的制造者。

克利福德回忆说：“杜鲁门在他的办公室里心烦意乱，我从未见他这样过。‘我不能理解这种做法，’他说，‘怎么能这样呢！我向钱姆·魏茨曼保证……他肯定认为我是个狗屁东西。’”

在一次紧急内部会议后，埃本·艾尔斯写道：“总统声明：（在联合国的）那个行动他并不知道，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其政治效果可能极其糟糕，要说那些对这个行动负责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它将引起的反应，这似乎不能让人相信。”

当天晚上，马歇尔国务卿在洛杉矶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托管巴勒斯坦是“最明智的方针”。马歇尔说，他本人已将它推荐给了总统，而总统也已同意。这个声明简洁、明确、精辟，但对杜鲁门却毫无助益。

第二天，星期日，21日，马歇尔飞返华盛顿；星期一，22日，他和洛伊·亨德森在白宫会见了总统，总统现在平静、镇定得多了，显然是出于对马歇尔的尊重，说他同意把托管的意见作为一个中间步骤，并说只是奥斯汀讲话的“时机”让他感到心烦意乱。

不过，在会见结束他走出来时，人们听到杜鲁门嘟囔说：“这使我们一无所获。”

事实是他早先已明确指出，在联合国大会上什么也不要做，这样就能被看作是从分治计划上后退。此外，他曾坚持事先要看奥斯汀的讲话稿。2月22日，他曾指示“把奥斯汀讲话的最后草稿送我考虑”，而国务院显然没有这样做。正如查利·罗斯在其日记中所写：“未经事先与总统或其班子中的某个人商议，类似奥斯汀讲话这类具有重大性质的公开见解就不应发表。”不过，也正如罗斯所说，现在杜鲁门拒绝对奥斯汀所讲的话承担责任，这也是难以想象的。

虽然杜鲁门没有向马歇尔说明这些要点，但他认为这些要点是很明确的，就像他仍然认为是马歇尔的下属决心破坏他的政策一样；现在他在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称他们是“注重礼仪形式的阴谋家”。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含糊其辞地说，托管未必会“损害最终的政治解决的性质”。那么他仍旧赞成在将来的某一天分治吗？“那正是我在这里试图尽可能明白地说的话。”

他正在骑墙，正在使人困惑。他知道这一点，记者们也知道这一点，对此他感到悲哀。玛格丽特证实：“这是我父亲生涯中最一塌糊涂的时刻，他除了忍受之外，别无选择。”

埃莉诺·罗斯福写信递交了她辞去驻联合国代表职务的辞呈，而她的两个儿子，小富兰克林和埃利奥特，则加入了毫无希望但人数却在不断增长的忧虑的民主党人行列，想要选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总统提名候选人。

杜鲁门拒绝接受罗斯福夫人的辞呈，也不去留意她两个儿子的行动。

4月9日，钱姆·魏茨曼从纽约写信给总统，感谢杜鲁门“你如此经常地向我表达的个人仁慈”以及“你对我们人民的事业所一贯表示的同情的关注”，然后在信中他强调了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及杜鲁门本人在其中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总统先生，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选择存在于立国和灭绝之间。历史和天意已将这个问题交到了你的手中，我相信你仍会以道德法的精神来决定它。

4月11日，星期六下午，为了避开那几个一直在白宫周围转悠的记者，埃迪·雅各布森从东配楼溜进了白宫。杜鲁门再次确认了——据雅各布森说，是“非常坚定地”——他对魏茨曼所说的话。此外，现在他向雅各布森保证，他将承认新的犹太国家。雅各布森后来写道：“对此，他全身心地赞同。”哈里·杜鲁门已经下定了决心。

随着在巴勒斯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距英国撤离的时间越来越近，白宫的紧张气氛明显增加，而对总统本人的压力也并非无人注意到。在4月21日的一次会议后，戴维·利连撒尔写道：“总统看起来精疲力竭——自我认识他以来还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

时间从来都不够。总是有更合理、更精明的行动方针可取。没有任何事情看起来是简单的。

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为棒球新赛季开幕投出第一个球时——当时是参议员队与扬基队的一场比赛——这位善用左右手的总统甚至好像对使用哪只手都显得犹豫不决，后来他用左手投出了这个球。

新闻报道说他在华盛顿“乱转”。杜鲁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转到”国家美术馆去看美军第三军在德国的一个盐矿里发现的古代大师们的绘画收藏品。他出席了“烧烤宴会”，这又是一个迎春的习俗；还出席了一个白宫老雇员莫里斯·C·拉塔的葬礼，自1898年以来他就受雇于白宫。在宪法大街彩旗装点的观礼台上，他检阅了陆军节的游行队伍，然后又在白宫举行国宴欢迎表情极其紧张的比利时年轻的摄政王。在附近的洛尔大戏院，他在贝丝和玛格丽特的陪同下，观看了弗兰克·卡普拉的新影片《联邦国家》的首演，这部由斯潘塞·特蕾西和凯瑟琳·赫伯恩主演的影片给了他长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鼓舞。他写信给玛丽·简说：“这是一部令人捧腹大笑的影片。如果有机会你应该去看看。它使共和党人受不了，不论别人相信不相信，它对你哥哥都是有利的。”

最近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支持率仅有36%。共和党人喜出望外，民主党人和自由派报纸却越来越萎靡不振。《民族》周刊问道：“非得是杜鲁门吗？”《新共和》杂志的封面上则写道：“杜鲁门应该辞职。”“哈里·杜鲁门不具备任何做总统所需要的品质。”他“毫无特色”，是一个“在文字理解方面有着众所周知的困难”的“微不足道的人”。在《纽约时报》上，阿瑟·克罗克冷酷无情地写道：

当他（杜鲁门）否决他所谓的“富人的”税收法案、这个国会用以取代他本人的“穷人的”法案时，国会中众多的民主党人加入了推翻这项否决的行列。

民主党正在危害总统的权力，自从共和党激进分子弹劾安德鲁·约翰逊以来这个国家还没有哪一个主要政党如此做过……一个在下一次民意测验中失败的总统通常就预示着他在履行其公职方面将面临困境，可以想见，这将会带来灾难……在本文发表之时，总统的影响力正处于比现代史上任何总统的影响力都要微弱的时刻。

5月初，在即将举行的一次有关巴勒斯坦的重要的白宫战略会议之前，杜鲁门要克拉克、克利福德准备出一份立即承认新犹太国家的论辩，尽管此时这个新国家还没有名字。杜鲁门告诉克利福德，他必须亲自去准备，就像准备一份提交给最高法院的论辩一样。“当然，你要当着所有我们这些在场的人的面宣讲，”杜鲁门说，“但我真正想要你去说服的人是马歇尔。”

杜鲁门正如他告诉克利福德的那样，倾向于认为马歇尔是反对这项承认的。不过这与杜鲁门对这位将军的尊敬毫无关系。而马歇尔本人的感情也毫无问题。在5月8日给总统的一封私人生日贺信中马歇尔写道：“我想让你知道，我非常清楚你给予我的那种明显的忠诚。作为回报，我只能尽全力来报答你，并且向你保证我完全忠实和信任于你。”

在为总统举行的一次私人生日宴会上，马歇尔以令在场的人难以忘怀的话更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总统的尊敬。的确，这是杜鲁门有生以来获得的最伟大的称颂之一。这次在附近的F街俱乐部举行的宴会是由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主办的，有大约40位来宾，包括总统和杜鲁门夫人，同时也是马歇尔及夫人这种少有的在华盛顿应邀外出就餐的几次中的一次。克拉克和约翰·斯奈德在餐后分别起身祝酒。接着，马歇尔出乎意料地站起来，推开了他的座椅，俯身向前，两手撑在桌子上开始讲话，他的表情极其严肃。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马歇尔从不恭维与他一道工作的人。那不是他的风格。

他用目光看着杜鲁门，说道：“这个人的完美形象将由历史来证明，但我现在在这里想说的是，在这个人的行政当局的领导下，从没有一项决定以及对我国海岸之外有影响的政策是不符合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的。将会长存的并非是做这些决定的勇气，而是这个人的正直。”

杜鲁门满面红光，慢慢地起身想致答辞，但却说不出话来。大厅里的寂静让人不知所措。他站在那里半张着双臂，试图使自己镇静下来。最后他只能朝马歇尔做着手势说：“他赢得了战争。”不过，他在以这种简朴的方式讲话时，感觉到许多来宾正热泪盈眶。

5月12日下午总统办公室的会议于4点钟开始，恰好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结束前两天零两个小时。

出席者有马歇尔、罗伯特·洛维特以及他们在国务院的两位助手罗伯特·麦克林托克和弗雷泽·威尔金斯，还有克利福德、奈尔斯和卡特·康内利。他们没有说话便在围绕着杜鲁门办公桌的椅子上就座，马歇尔和洛维特在总统的左边，身后是麦克林托克和弗雷泽，克利福德坐在总统的正对面，奈尔斯和康内利在他的左边。杜鲁门讲了几句开场白，其中没有提到巴勒斯坦的承认问题，接着轮到马歇尔讲话，他请洛维特来为托管提出论辩。洛维特的发言比较长，其间马歇尔曾简短地打断，报告说在最近与“犹太代办处”的摩西·舍托克的谈话中，他和马歇尔曾警告说，犹太人正在巴勒斯坦进行一项极其危险的军事冒险，舆论潮流可能会转而反对他们，他们也不可能获得美国援助的保证。

然后，杜鲁门让克利福德发言，克利福德首次提到了承认的问题，并建议说美国应尽快地赶在苏联之前采取行动。美国甚至不应等到新的犹太国家宣布建立，而应在明天、即5月13日便宣布美国的承认。

克利福德回忆说：“我一边讲，一边就注意到雷云正在聚集——马歇尔的脸色变得越来越红。”

“这完全是政治，”马歇尔说，“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克利福德在这儿。这不是一次政治会议。”

杜鲁门温和地回答说：“将军，他在这儿是因为我要他在这儿。”

克利福德继续他的陈述，讲了大约 15 分钟。他平静、有条不紊，也不慌张，他那圆润的声调像往常一样优美、抑扬顿挫，清晰而措辞得当的句子平稳而流畅地一句接着一句（后来在回忆这毕生难忘的时刻时他说：“我确实做好了准备！”）。不过，克利福德毕竟比马歇尔年轻 26 岁——在重大的权力和重大的世界决策的经历方面仍是新手。马歇尔的威望在这所房间里明显可见，这种威望由于他的愤怒而格外使人难忘，也格外吓人。在克利福德发言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坐在那里怒目而视。也许正是克利福德的风格使马歇尔心烦意乱，他对这个世界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克利福德说，对新犹太国家的承认从一开始就与总统的政策构想完全一致。它是一个“这个国家的一切政策所主张的”人道主义的行动。600 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是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暴行。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肯定会感到对那些幸存者负有的某些责任，这些幸存者不像欧洲的其他人那样，他们无处可去。他解释了《贝尔福宣言》。他摘引了《圣经·申命记》中的段落来论证犹太人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的权利。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并拥有的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他说，巴勒斯坦的分治和美国的承认是没有什么选择的，因为国务院想象中的那种拖延决不会为犹太人所容忍。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几天之内它就将宣布。“不论国务院或其他任何人怎么想，我们面临的实际事实就是，将会出现一个犹太国家。”考虑别的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洛维特再次发言。他说，在其边界尚未确定、政府尚未建立之前，过早地承认犹太国家是一种未见实物便瞎买东西的做法。他出示了一叠情报机关的报告，这些报告显示，许多到巴勒斯坦去的犹太移民是共产党人或苏联间谍。洛维特争辩说，这整个问题都应该是联合国的问题。联合国正在努力确定巴勒斯坦未来的政府形式，而这正是在美国的具体敦促下进行的。任何过早地、鲁莽地对新国家的承认都将对美国在联合国的威信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并且看起来就像是对 11 月份犹太人选票的“一个极其明显”的出价。

关于这个问题，马歇尔插进来，勉强地控制着他的愤怒，表情严肃并带着他的声望的全部分量做了发言。

马歇尔说，克利福德的建议是错误的。国内的政治考虑决不能决定对外政策。“总统的伟大职责”正处于危急之中。马歇尔直视着杜鲁门说，确实如此，如果总统打算采纳克利福德的建议，那么在 11 月份的选举中，如果他——马歇尔要投票的话，他将投票反对总统。

这对杜鲁门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指责——克利福德肯定地说这是“他所遇到的最尖锐的指责”——因为它来自于马歇尔这个“伟大的年长者”，他在行政当局中的存在给了杜鲁门如此自豪和自信的感受。

“这使会议陷入了一种令人难熬的停顿之中。真正是一种休克的状态。我想，总统已被它击得发愣。”多年后，克利福德在试图回忆当时房间里的

感觉时说，“屋子里一片可怕而绝对的沉默。”

然而，杜鲁门没有显出任何激动的表情。他那从一开始就很严肃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他只是举起手说，他已经完全清楚了其中的困难、危险以及政治风险，这些他自己会去处理。他倾向于同意马歇尔将军的意见，不过，他认为最好大家都回去睡觉，把问题留到第二天去解决。

马歇尔及其随员起身离去，他甚至都不看克利福德一眼，后者内心非常生气，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正是马歇尔的这种“十足的该死的浸礼会教徒的风格”使人感到如此气恼，他后来告诉乔纳森·丹尼尔斯说——马歇尔“从一个地洞里看不到自己的愚蠢”。克利福德只能得出结论说，总统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为的是不使这位将军在别人面前感到尴尬。

当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杜鲁门对克利福德说：“那种做法粗鲁得就像是一匹矮脚马。”杜鲁门让他别太在意。克利福德说，作为一名辩护律师，他以前也曾打输过官司。

“咱们应该看法一致：它还没有输。”杜鲁门说。

第二天，记者们问道，美国是否会承认新的巴勒斯坦的国家。

杜鲁门回答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然而此时，车已经到了山前。那天傍晚，即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小时，洛维特打电话给克利福德，说他必须尽快与克利福德谈谈。克利福德到位于卡洛拉马区的洛维特家中，边喝酒边谈，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做些事情，否则总统和国务卿之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裂。可以想见的是，马歇尔也许会辞职；克利福德明白，这将是杜鲁门的国内声望可能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并且无疑会摧毁他重新当选的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克利福德回忆说：“马歇尔是他拥有的最大财富。他经不起失去他。”这可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坚持排除政治考虑，并如此“超脱于政治之上”的马歇尔，本人现在却变成了政治考虑中最重大的因素。

洛维特要求克利福德仔细考虑这一点，然而当洛维特第二天上午打电话给克利福德时，克利福德却告诉他说他已无能为力。洛维特应该去说服马歇尔，使他相信他错了。

当克利福德把这全部情况向杜鲁门做了汇报，杜鲁门的反应是，马歇尔，用杜鲁门的话来说，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那是星期四，13日。

星期五，5月14日，这一天新的犹太国家准备在耶路撒冷的午夜——华盛顿时间下午6时——宣告成立，克利福德和洛维特在安静的F街俱乐部共进午餐，并起草出将由总统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文字。现在，洛维特仅敦促在承认新的犹太国家时不要有“不适当的匆忙”之举，以便使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团能得到充分的预先警告时间。然而，连这一点克利福德也没有答应。

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马歇尔打电话给总统，说他虽然不能支持总统希望采取的立场，但他不会公开地反对它。

杜鲁门对克利福德说：“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克利福德给在华盛顿的犹太人代办处官员伊莱休·爱泼斯坦打了一个加急电话，告诉他承认将在那天宣布，让他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并立即送到白宫来。当爱泼斯坦询问需要什么文件时，克利福德不得不说他也不确切地知道。“一个新的国家要求承认，这是很不寻常的——它并非每天都会发生。”克利福德说。

克利福德打电话给国务院，然后又通知爱泼斯坦。当这些文件最后交到白宫时，新国家的名字被空下来——后来才填上——因为还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新的犹太国家——第一个犹太国家曾存在了近 2000 年——按时在耶路撒冷的午夜，华盛顿时间下午 6 时宣告成立。11 分钟后，查利·罗斯在白宫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这是它已被称呼的名字。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大吃一惊。事实上，一些美国代表轰然大笑，以为这项宣布肯定是有人在故意开玩笑。奥斯汀大使是代表团中唯一在事先（只是在最后时刻）得到通知的人，他极为沮丧，以致回来后没有告诉任何其他的人。

与此同时，在国务院，马歇尔派出他的联合国事务办公室主任迪安·腊斯克，乘飞机前往纽约去稳住整个代表团，使其不要辞职。

在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大街上，人们在跳舞；在马球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向以色列致敬”集会。全国各地的犹太教堂都举行了感恩节仪式。在华盛顿马萨诸塞大街 2210 号“犹太人代办处”总部，一面新国旗迎风招展——白底，浅蓝条，中间有一颗“大卫王之星”。

在堪萨斯市，埃迪·雅各布森收拾好行装，立即乘飞机前往纽约去看望钱姆·魏茨曼，后者将成为以色列的新总统。3 天后，即 5 月 17 日，雅各布森作为以色列的“临时的非正式大使”出现在白宫。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指出的是，美国对新的犹太国家采取的仅是事实上的承认，而苏联随后则给予了一个更为正式的法律上的承认；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当以色列遭到阿拉伯人的军队进攻时，杜鲁门拒绝对装有运往以色列的军事装备的船只解禁；在整个夏秋，美国在联合国强烈地支持一项以色列人反对的调停和妥协政策。不过，这些情况并不能缩小杜鲁门所做的那件事的较大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性：是美国总统在世界上最先给予那个新的犹太国家的承认的。当有经验的观察家，包括大多数他自己的外交事务专家，都认为他的这些表现是管理不当出洋相时——《时代》杂志说是“一出滑稽剧表演”——全国大多数舆论却认可了这种做法。《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一篇社论很好地表达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

许多人说前一段时间美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管理是矛盾的和混乱的。然而此时，事情的这一面已经完全被美国在世界各国中率先承认了以色列这个新犹太国家的迅速而带有戏剧性的决定所掩盖。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决定……

正如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电台评论员和世界旅行家洛厄尔·托马斯在那天晚间的广播中所说，全国各地的美国人都要去求助于《圣经》以我寻“历史的今日”的某些历史背景。

杜鲁门毫无遗憾。他已达到了他的目的，除此之外，他还明确了一点，即究竟是谁在掌管美国的政策：

对于政府中许多职业官员来说，困难在于（他后来写道）他们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制定政策和管理政府的人。他们把民选官员仅仅看成是临时的任职者。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位总统都曾面临这一

问题：如何防止职业官员围困总统的政策……一些总统曾建立起相当于他们自己的小国务院的组织来对付这种局面。罗斯福总统就是这样做的，他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并不觉得需要效法这种方式，因为国务院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掌管外交政策运转方面的政策，而国务院自身也应该谨慎。不过，我想使这一点更明确，即负责制定政策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国务院中的第二或第三级官员……

他对能为犹太人做这些事情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为当时和以后的年代中他们所表示的感谢所深深感动。当以色列的大拉比伊赛克·哈勒维·赫佐格访问白宫时，他对杜鲁门说：“上帝把你放入你的娘胎中，使你成为 2000 年后使以色列再生的使者。”

“我认为他这话讲得过了头，”戴维·奈尔斯回忆说，“不过当我转过眼看总统时，泪滴已淌到他的面颊上。”

洛伊·亨德森被调离了职位。杜鲁门让他重新安排列远离华盛顿和美国中东政策事务的地方去。他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有趣的是，亨德森却一直是杜鲁门的一个坚定的赞扬者，认为他是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亨德森后来说：“我认为，国务院的士气和效率从未有杜鲁门任总统时期那么高……当总统是一个不惧怕作出困难的决定，并准备承担由这类决定而产生的责任的人时，国务院的士气一般就比较高。”

马歇尔将军继续留在以前的职位上。当马歇尔的一些朋友劝他辞职时，马歇尔断然答道：人们不会因一个拥有作出决策的宪法权利的总统作出了这样一项决策就辞职。不过，马歇尔此后再也未与克拉克·克利福德说过话。

很久以后，在被问到他是否记得对马歇尔讲了什么话来使得他在最后关头同意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认时，罗伯特·洛维特回答说：“我告诉他这是总统的抉择。”

### 3

以色列诞生的这一年，共和党减税和“杜鲁门阳台”修建的这一年，记得也是绿色（叶绿素）口香糖风行的一年；是一种叫作“摸索”的新拼词游戏风行的一年；是“凯迪拉克”轿车装上尾翼的一年；也是一种称作“比基尼”的难以想象的大胆的新泳装风行的一年，它的名字是根据前年夏天试验原子弹的一个小岛的名字取的。

经济正迅速发展。利润在增氏。农民富裕了。美国的总体繁荣比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显著。美国公司的纯运营资本达到了近 640 亿美元的新高度。对钢铁、石油和汽车工业来说，这是成绩斐然的一年。失业率降到 4% 以下。几乎每个想要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尽管通货膨胀在继续，但人们的收入和实际购买力都比以往增加了，《幸福》杂志报道说，所有这些都超过了去年、即 1947 年的记录，是“我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历史上和平时期中最高的生产记录”。

在伦敦，1948 年全国政治集会不断举行的那同一个夏天，美国运动员——鲍勃·马赛厄斯、哈里森·迪拉德、梅尔文·佩顿——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以来的首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横扫了赛场，赢得 38 枚奖牌。

这是一个非凡的科技进展的时代。世界上最大的一架 200 英寸的望远镜在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马山上落成。试飞员查克·耶格尔驾驶一架革命性的火箭动力飞机“贝尔 X—1”号，冲破了音障。晶体管收音机发明出来了，一种新的抗菌素金霉素以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阿司匹灵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燃料液氢，据发明者说，为“把人送上月球”提供了可能。

在晚间娱乐方面，全国都收听“达菲的旅店”及“杰克·本尼节目”这类人们喜爱的广播。新闻和娱乐由无线电广播占据统治地位。不过，约 1/8 的家庭现在拥有了被杜鲁门称之为“电视机器”的设备，人们会记得 1948 年开播了第一个晚间电视新闻节目，也是由约翰·卡梅伦·斯韦兹主持的“卡海尔新闻短片剧场”开播的第一年。此外，电视也首次转播了政治集会的实况，那是在同一个城市费城举行的，为的是使这种实况转播容易些。

这一年也是安德鲁·韦思画出那幅令人难以忘怀的肖像画《克利斯蒂娜的世界》的一年，画的是一位跛脚的妇人及在一座凄凉的新英格兰的山上的一所被遗弃的房子——一个与绿口香糖和超音速飞机的世界毫无关系的世界——这成为迄今为止美国人所画的最受欢迎的绘画中的一幅。

1948 年的演唱和舞蹈音乐中包括这样一些流行歌曲：《享受这迟到的欢乐》、《最不平凡的一天》，以及堪萨斯市最受欢迎的歌手皮·威·亨特演唱的一支新曲《第 12 街拉格调》。科尔·波特的《吻我吧，凯蒂》在百老汇上演，几部新的影片成为有史以来摄制的最好的影片——《马德雷山的宝藏》、《红舞鞋》和劳伦斯·奥立弗的《哈姆雷特》。

畅销书中，有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罗伯特·E·舍伍德的《罗斯福与霍普金斯》、艾森豪威尔的战争回忆录《欧洲征战》，以及阿尔弗雷德·金西的《男子的性行为》，后者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对战后美国生活中男子乱交行为所作的数量分析引起了轰动。

1 月份，圣雄甘地在步行经过新德里的一个花园时被人谋杀。3 月，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从布拉格一幢楼房的第三层窗户中跳楼或被人推下楼身亡，他的父亲创建了自由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消息激起了自战争结束以来几乎从未有过的悲痛和愤怒（多萝西·汤普森写道：“但是，由于这次跳楼，让世界不要误解他所说的话。他说：他与共产主义合作是选择了奴役、叛逆、耻辱——或自杀。”）。6 月，柏林危机来临。

7 月，杜鲁门最喜爱的美国人之一、约翰·J·潘兴将军在 87 岁的年纪上去世，遗体隆重地安放在国会圆形大厅中。杜鲁门驱车前往国会，为表示他的尊重，他不要警察车队护卫，正如他所说：“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任野战炮兵上尉一样。”

正如时间所示，1948 年的政治也引进了许多新词和表达方法，它们后来都被美国人所共同使用——“短暂逗留”，“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以及“转移注意力的谈话”。

根据新闻界给予特别关注的“科学的”民意测验的结果，94% 的美国人相信上帝。这些民意测验还显示，杜鲁门根本没有机会再留任总统。全国最受欢迎的杂志《生活》报道说：“显然，共和党的明星正如日中天。”的确，由于当时所有这些变化和混乱，人们普遍接受的几项判断就是：这次选举将成为共和党年，它将是一次令人乏味的选举，将是杜鲁门的一场灾难，而民主党人的处境甚至比 1946 年时更糟。

两次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杜鲁门对那年春天发生，并持续到夏秋的事情的



看法，给了他勇气和似乎无法压抑的信心，不论预测的前景多么暗淡——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暗淡——也不论会有多少人抛弃他——人数可能会很多。

第一次经历发生在 8 年以前。他认为，没有任何事情、任何斗争和任何要走的路会像 1940 年初选时在参议院赢得席位那么困难或看起来那么无望，那年夏天，他与劳埃德·C·斯塔克竞选。杜鲁门的这段历史是 1948 年许多政治评论家和预言家所熟知的。流行的说法是，勇气“以前已经用完了”，而在 1948 年杜鲁门也知道它以前就用完了——形势极为不利，没有钱，没有报纸的支持，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保佑，也没有任何被认为是知道他实际上可能经过努力会获胜的人所做的严肃的预测。关于他 11 月份将会失败的那些固执的议论，那么多的文章和谈话中所带有的那种自命不凡的肯定语调，所有这些都是他非常熟悉的声音。

最重要的还是最近在 6 月间乘火车跨越全国的一次被大力宣传为“非政治性”旅行的经历，这完全是按照罗的报告中的建议安排的。在两周的旅行期间并非没有忙乱和尴尬、甚至在当时看来似乎是错误的地方，然而杜鲁门发现这次旅行给他带来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以带给他的那种振奋；返回华盛顿后，他的气色和感觉都像他政治生涯中的任何时候一样：朝气蓬勃，信心十足。

不过，勇气和信心尽管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其他那些不易估量的品质，它们仍不足以成事。这些品质包括对人类感情的真正同情、幽默、共识、体力——对一个 60 多岁的人来说的那种真正的超常的体力——自豪感、决心，以及根本的、不可动摇的、杰克逊式的对民主制的信仰，这后一种品质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哈里·杜鲁门信任美国人民。他经常这样说，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却是真实的。他喜欢政治家的那种“走出去，到人民中间”的工作，喜欢去看看乡村，喜欢群众。在这次和后来的旅行期间，在一个接一个的火车站上，当地方上的政治家登上列车来与他握手时，杜鲁门为他们的每一个人都腾出些时间来谈话，这不仅仅是装装样子，他真心地喜欢这些人，把会见他们作为一种享受。

作为总统，他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会见和接触他称之为普通美国人的人。这样做总能使他感觉更好些。不久前在华盛顿的一天晚上，他散步时决定去看一看波托马克河上那升降“纪念桥”中段的机器。他从铁梯上下去，走向那位正在拿着小锡盒吃盛在里面的晚饭的大桥看守人。对于美国总统从这个狭窄的梯子上爬下来并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守桥人丝毫不感到惊奇，说：“你知道，总统先生，我刚好在想你。”这对杜鲁门是一种极其开心并永远难忘的欢迎。

1940 年初夏，在密苏里，他曾经挤进那拼命与他握手的小镇的人群，说：“我就是想来让你们看看：我并没有因为来自杰克逊县而就长了犄角和尾巴。”如今，在穿越西部的行程中，人们又听到了这种话的重复，不过语气多少缓和了些：“我走出华盛顿来到这儿，为的是你们能看看我并听听我不得不说的话，然后作出你们的判断：你们是否相信某些议论你们总统的话。”

6 月 3 日夜，16 节车厢的“总统专列”从联邦站出发，杜鲁门坐在他的特别装甲车厢“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中，再次外出旅行；同行的有包括秘密保安人员在内的约 20 人的白宫班子，还有 59 名新闻和摄影记者，这是一个创记录的庞大记者团。

这次“非政治性”旅行的借口是应邀接受一项荣誉学位，并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学位授予仪式上发表一个演说；不过，没有人认真对待这次旅行的非政治性的说法，杜鲁门尤其如此，在第二天，即6月4日中午在俄亥俄州克雷斯特莱恩站开始作首次短暂停留时，他对显然异常兴奋的群众说：“在这次不分党派、两党都参加了的旅行中我们来到了这里。我明白，现在有大批的民主党人在场……”

把这次旅行宣布为正式的总统出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民主党委员会没有了钱。因此这笔费用要从总统每年的旅行经费中出，而这引起了主要的共和党人和大多数报刊的愤怒。

使专列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同时也使杜鲁门感到格外高兴的是群众出动的规模——在克雷斯特莱恩小镇上有1000人，在芝加哥则有10万人，在那里他乘坐敞篷车前往帕尔默大厦。

在奥马哈，他的老友埃迪·麦金造成的一次令人尴尬的糟糕局面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公众效果。在一次主要演讲会上，仅有不足2000人出席，他们坐在巨大的“艾克—萨—本”（“内布拉斯加”的倒拼）大礼堂的前排座位上，后面留下了8千个刚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空座位。负责安排这项活动的麦金想掩盖这个事实，即这次演说是对公众的一次公开演说，而不是仅对杜鲁门在第35师时的老战友们（他们正在奥哈马举行重聚联欢会）的一次演说。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近乎空旷的大礼堂的照片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这不仅成了杜鲁门人望低得可怜的一种象征，也成了政治上明显无能的一种标志。然而杜鲁门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登上讲台，像是对着满堂的听众那样发表了演说。他既没有责备也没有批评麦金。麦金后来经常回忆他所说的话：“我并不诅咒那里除了你我之外是否就没有其他人。我是在对农民们发表一个广播演说。他们不在那儿——他们会在家里听这个广播。他们正是我想要对之演讲的人。”

杜鲁门认为，比那天晚上成排的空座位更能衡量人心、也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天早些时候他在奥哈马的大街上受到的欢迎，当时他与第35师一同在街上列队行进。他身着浅棕色双排扣的华达呢军服，脚登一双他最喜爱的双色夏季皮鞋，走在他自己所在的D炮兵连的前面，还不断地把那顶西部风格的帽子脱下向左右的人群致敬。他显出像一个男子汉所能有的那种幸福，而无数的人群也真心实意地回应着他——在奥哈马，一个共和党统治的城市。正如爱德华·T·福利亚德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所说：“在这个共和党的堡垒城市，他们排列在街道两旁，有16万人，他们给予杜鲁门总统的欢迎使人回想起了3年前他在白宫时的‘蜜月’时光。”杜鲁门的老理发师弗兰克·斯皮纳行进在他身旁，手举着D炮兵连的旧军旗。后面的队伍中有埃迪·雅各布森、蒙西格诺尔·蒂尔南、埃迪·麦金和吉姆·彭德格斯特。

旁观者被感动、被陶醉。杜鲁门先生感受到了他们的友善，显出从未有过的喜悦（奥哈马《世界先驱晨报》说）。

杜鲁门总统度过了他最美好的一个星期六早晨……他得意洋洋地行进着，挺着胸膛。他微笑着并挥动着他的帽子。那些观看游行的人们惊讶地看到总统行进在奥哈马的街道上，他们笑着，欢呼着。

4月份，在他办公室与阿瑟·克罗克的一次谈话中，克罗克问道，自成

为总统后他是否发觉自己性格上有什么变化，杜鲁门回答说他想不到有什么变化，除了越来越感到被“封闭”起来之外。如今，他走出华盛顿，回到了他本人所属的人民、那看见他们在他们的街道上行走而自然地喜笑和欢呼的人民之中，他感到从封闭他的障碍中解放出来，同时感到他更像他自己了。“你们知道，总统实际上是在监禁中，”在这次行程的第一站克雷斯特莱恩时他曾对人们说，“他从书房走到办公室，从办公室走到书房，所有的时候都必须有卫兵跟着……不过，当你走出来会见人民，并发现人民正在想什么的时候，你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现在，他一次又一次地使他的听众们知道他是多么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会见他们对他有多么重要，他对他们的出席人数感到多么鼓舞。在该州西端的小镇西德尼，他说：“今天在内布拉斯州西部的这个小镇上见到了全镇所有的人，这几乎使我不知所措。”在怀俄明州的拉勒米，他“看到这样热情的群众，无疑感到非常幸福”。在蒙大拿州的狄龙，他看到出席者的数量时惊呼：“我的天哪！”

在比尤特，欢呼的人群在一条4英里长的游行路线的两旁便道上排了好几层。当他的专列在深夜开进米苏拉时，一群人等在那里，希望能看他一眼，他身着睡衣睡裤出现了。他说：“真对不起，我已经上床了。不过我想你们愿意看到我是个什么样子，即使我没有穿任何正式服装。”

他很随和——他只愿意说“都好吧”——并经常像个乡巴佬似的——他正在“去伯克利接受一个学位”的路上——而人群中的人数却越来越多。

凌晨5时15分，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上，他们告诉我说全镇都出动了（他给玛丽·简写信说）。我还没有起床。7时15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有2000人，而在凯彻姆，当地邮局的所在地，该地的每一个人都在场。

在爱达荷南部的一个小镇凯里，发生了另一次被新闻界广泛报道的失言。在新的威拉·科茨机场落成仪式上，杜鲁门开始赞扬那个为国捐躯的勇敢的小伙子，结果那位泪流满面的科茨夫人告诉他说，“我们的威拉”是一位姑娘，而且是死于一次民用飞机的失事。

查利·罗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在鼓励杜鲁门尽可能地作即席演说，并且肯定地说有了这种实践他就能在公众面前变得更有力，就像他们通常看到他同少数人在办公室会面时那样。罗斯经常说，如果公众能够了解到他所了解的哈里·杜鲁门，那就好了。4月份，杜鲁门曾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了一个即兴讲话，5月份，他又在“青年民主党人”华盛顿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这两次都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新闻界赞许地评论着“新的杜鲁门”。不过现在，他有时说的话却使他的班子感到畏缩。在波卡特洛，他出人意料地宣称：“我已经在政界呆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议论你的话，而事实又不是这样，那么根本就别去理睬它。如果他们能赞扬你，那你肯定是非常糟糕。他们从不会赞扬我。”

同行的记者们开始唱起了一支用几段打油诗编成的歌，其中包含这样的迭句：

他们什么也证明不了，  
他们不会赞扬我，

我打算去伯克利，  
为的是接受我的学位。

东部报纸的编辑们对这次旅行的狂欢节式的气氛感到悲叹。《华盛顿明星晚报》说，总统正在“出自己的洋相”。

在俄勒冈州的尤金，杜鲁门回忆起他在波茨坦与斯大林会面的情景，他突然向聚集在他的专列尾部平台周围的群众吐露说：“我喜欢老约瑟夫！他是个很体面的家伙。”这个评价使记者们乱作一团，并立即引起了轰动。罗伯特·洛维特从国务院打来一个紧急电话给克利福德，后者圆滑地建议总统再不要重复这个评价。杜鲁门再也没有说过这句话。“咳，我想我把事情搞糟了。”在他继续乘火车前行并且心情很好的时候他曾这样说。

穿越华盛顿州时，他在斯波坎、埃夫拉塔、韦纳奇、斯凯科米尔、埃弗里特、布雷默顿、西雅图、塔科马和奥林匹亚等站停靠。在斯波坎，他估计有“大约两英亩那么宽广的人群”。在西雅图，10多万人在场欢迎，是30年来西雅图所见到的人数最多的人群。甚至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没有受到这样的欢迎。

现在，他的演讲中开始显现出一种明确的格调，一种把国会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大胆的风格。

在布雷默顿，他说，“你们知道，本届国会关心的是上层人的福利。他们对普通人的福利不感兴趣。”

“加油干，哈里！”有人喊道。

“我是要这样做，我是要这样做。”杜鲁门高兴地答道。

在奥林匹亚，他告诉听众说：“接受教训吧，你们不要再像1946年那样做了。1946年你们中2/3的人呆在家里，结果看看我们得到了怎样的一个国会！那是你们的错，那是你们的错。”

他对一个记者说，第80届国会是历史上最糟糕的国会，这立即引起了华盛顿共和党人愤怒的嚎叫。众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说，哈里·杜鲁门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杰称他是一个“卑鄙的小流氓”和“密苏里的傻瓜”。培夫脱参议员在费城演讲时，对一位美国总统“在穿越全国时在各地短暂逗留期间谩骂国会”的洋相感到悲哀；而民主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及其宣传局长杰克·雷丁立即看到了一个不容丧失的好机会。电报发送到杜鲁门途经的35个西部城镇的市长手中，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塔夫脱参议员把他们的社会描述为短暂逗留的小镇。俄勒冈州尤金市市长回电称：“肯定是说错了城市。”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份回电说：“格兰德艾尔绝非是个小镇。”

在伯克利发表学位授予仪式的演讲（这个演讲在全国无线电广播中播出）时，杜鲁门转向了外交事务，发表了一个在他总统任期中最精采、最富有思想的演说。地点是在加州大学巨大的洒满阳光的足球场上，足有5.5万人出席，是往常出席这类仪式人数的两倍。

杜鲁门说，世界处于一种如此高价地赢得的战争与我们仍然难以掌握的和平相互交替的黎明时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苏联。巨大的分歧不是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之间，而是存在于苏联与全世界所有的自由国家之间。苏联拒绝与其战时的盟友为世界的复兴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这是“我们时代最令人沮丧的事情”。

他说，不同的经济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但只有在一方不是集中精力于以武力摧毁另一方的条件下。

我们的政策仍将是一种复兴、重建、繁荣——以及拥有自由和公正的和平的政策。在这项政策的推动下，我们愿意与一切具有相同目标的国家联合起来。

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扩张就是人类自由以及使所有国家都能更广泛地享有地球上的美妙事务的扩张。

我们唯一渴望的奖赏就是国际家庭中我们的伙伴成员国的良好祝愿和尊敬。

我们唯一追求的理想王国是这样的王国，在那里，尊贵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权力则通过真诚、同情的品质和正确的指导来行使……

我相信，这个地球上每一部分的人们都热切地期望和平和自由。我相信，世界各地的善良人民都不会允许他们的统治者（不论这些统治者可能把自己塑造得多么强大）把他们引向毁灭。美国对人民怀有信念。它知道，统治者可以沉浮，但人民却能永生。

两天后，即 6 月 14 日，在洛杉矶，大约有 100 万人拥挤在他从火车站到“大使饭店”的途经道路的两旁。《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他们坚守在建筑物的屋顶上，挤在窗前和防火安全梯上，沿着街道两旁排了 5 层。”这是 13 年来一位总统首次访问这座城市。

当天晚上在“新闻俱乐部”，杜鲁门笑嘻嘻地说，洛杉矶可真是一个供短暂逗留的小镇。他进一步加强了对国会的攻击，要求在物价控制、住房、农业援助、医疗保险和扩大社会保障的基础等方面采取行动。正是在那天上午，他否决了一项将使 75 万人丧失社会保障的共和党提案。

他说，学校已过分拥挤，教师则工资不足。一项援助教育的法案已经参院通过，而众院也只需 10 分钟就能通过，但是众院却“在这项法案上睡大觉”，他说，“不采取行动！不采取行动！”

在这次讲话和沿途其他的演讲中，一个被回避了的问题就是民权问题。现在根本不要提它，还是大胆地讲出来，究竟哪种方式对他更有帮助，杜鲁门的顾问们对此看法不一。杜鲁门决定此时不提它。

当满脸微笑的吉米·罗斯福来到大使饭店与杜鲁门私下会晤时，据在场的唯一证人、秘密保镖亨利·尼科尔森说，他们握了手，小罗斯福比杜鲁门长得高，杜鲁门用食指戳着小罗斯福的胸前，对他说：“你父亲要求我担当这项工作。我并不想要它……如果你父亲知道你对我做的事情，他会在坟墓中感到不安。不过，直说了吧：不论你是否喜欢，我准备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就是这样。祝你好运。”

在返回东部的行程中，列车穿越了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堪萨斯州的沿途各站，然后继续进入密苏里、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欢迎的人群一直人数众多，也很友善。“究竟是那些特权人物要来管理这个国家，还是人民来管理这个国家？”他问道。这是问题的关键。他确信，这次选举的结果将会依据这个问题来决定。

他穿越了 18 个州，行程 9505 英里，发表了 73 个演说，与大约 300 万人

见了面。列车于6月18日、星期五，一个湿热的华盛顿的下午，到达了联邦车站。杜鲁门，正如报道所说，鼻子被晒脱了皮，嘴唇干裂，然而却“充满了活力”。

194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前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告诉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代表们说，哈里·杜鲁门是一只“垂死的呆头鹅”。从这一天起，直到大会结束的庆祝活动止，会议一直都洋溢着一种肯定获胜的感觉。

大会是6月21日、星期一，在费城开幕的。在共和党选票上5位被广为宣传的竞争者——杜威、塔夫脱、范登堡、史塔生和马丁——中，领先的是该党东部自由派支持的杜威。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几乎是压倒性的优势，并在第三轮投票中、在史塔生拒绝将支持自己的选票让与塔夫脱后赢得了提名。至于他的竞选伙伴，杜威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从而使这对搭档成了“候选人名单中的理想的一对”——合众国中两个最大最富的州的两位知名、年轻、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州长。如果说杜威在举止上显得过于冷酷和自信，那么沃伦则具有更多的可以补偿的热情。人们不会忘记在上一次选举中杜威离击败获胜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多么接近。《时代》和《新闻周刊》相信，只有奇迹和共和党犯下一系列不可想象的政治错误，才能从势不可挡的失败中挽救杜鲁门。

杜鲁门认为，共和党人已经犯下了一个错误。他私下说，他们如果选塔夫脱，境况将会更好些；塔夫脱是应该获得提名的受尊敬的人，他会比杜威更难对付。

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杜威谈到了国家的团结。“我国人民渴望更高的基础，渴望在能使我们团结的更美好的事物中找到共同的目标……”

杜鲁门没有时间来仔细研究共和党人和他们的大会。在杜威被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天，即1948年6月24日星期四，俄国人对进出柏林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上交通实行了封锁，形势极其危急。斯大林显然企图迫使西方盟国撤出这座城市。除了空中通道外，盟国占领区完全被切断了，什么东西都不能进出，250万人面临饥荒。事实上，食品的储存坚持不了一个月。煤的供应在6周内也将断绝。

杜鲁门以引人注目的谨慎和坚定来面对这个问题。有人建议盟国以武装护送从陆路强行进入柏林；也有人建议美国以对俄国船只关闭其港口和巴拿马运河的方式进行报复，杜鲁门拒绝了这些意见。在他办公室与福雷斯特尔、洛维特和陆军部长罗亚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人问到美国军队是否要留在柏林时，杜鲁门说，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柏林。没什么好说的。”

罗亚尔怀疑地问道，其后果是否被仔细地考虑过。

杜鲁门说：“我们将不得不根据形势的发展来处理。我们是根据协定的条款驻扎在柏林的，俄国人无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压力把我们赶出来。”

当天晚上，洛维特给驻伦敦大使发电报：“我们留在柏林。”

驻柏林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已经开始空运物资，不过规模很有限，这个步骤被认为不过是一个治标的办法。6月128日，星期一，杜鲁门下令进行大规模的空运。

同一天，他把两个中队的B—29型飞机派往德国，全世界都知道，这些巨型飞机就是把原子弹投在日本的那种飞机。不过事实上，这些飞机并没有

被改装来携带原子弹，但这个细节俄国人并不知道。

柏林空运几乎成了战后阶段美国最辉煌的成就之一，以及杜鲁门最自豪的决定之一；它极大地影响了西欧、即非共产党的欧洲的士气，冷战的整个进程，以及杜鲁门本人再次当选的竞争，这些在当时时每一个人来说都绝非显而易见。没有人知道柏林的局势会怎样发展，杜鲁门也不例外。接替艾森豪威尔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莱德雷将军认为，当“我们面对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时，正如布莱德雷后来所写道的，总统的态度极其含糊。指望一个大城市完全由空运来供给，哪怕是在一段极其有限的时间内，似乎都是不现实的。

在做出决定时，由于各种政治压力和当时形势的混乱，杜鲁门未与白宫班子或其政治顾问中的任何人商量。的确，在封锁的全过程中，正如乔治·埃尔西回忆所说，白宫班子“无论是在决策中还是在实施进行空运的决定中都没有发挥直接的作用”。既没有讨论总统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会如何影响他的形象，也没有讨论会使他赢得什么政治优势。杜鲁门也没有试图以鼓吹空运的效果来鼓舞他周围的那些人的士气。他只是强调他要留在柏林的意图，并且让人们无法怀疑他所说的话的确切含义。

华盛顿的夏季已经来临，在6月28日星期一，这同一天的晚间，总统和第一夫人在白宫南门廊下共进晚餐，杜鲁门选择在这里进餐是为了能够享受外面的景色。他记录当时景色的一张纸后来在他的文件中被发现：

在草坪南面的公园里进行着一两场球赛。从欢呼声和教练们的喊叫声来看，显然比赛非常激烈。一只知更鸟四处跳着找虫子吃，发现了一只虫子后便用尽全力把它从洞里拽出来。一只模仿鸟正模仿着知更鸟、鸟、红雀、乌鸦和鹰的叫声——但完全没有它自己的有特征的鸣叫声。许多人就像是这样。飞机在杰斐逊纪念堂南面的国家机场起飞扣降落。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

他在想象中勾画了横跨华盛顿纪念碑前草地上旧有的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就像很久以前那样，驳船在纪念碑西面的某些地方停靠着。

“我能看到老J·Q·亚当斯在运河中游泳，他的衣服被一位想找工作的愤怒妇女偷走。”他写道，“接着我醒来了，走上楼去工作……”

正如丘吉尔在波茨坦所观察到的那样，杜鲁门是一个判断力极强的人。“顽固得像一头骡子。”一些人经常评论说。杜鲁门本人或其他任何人所写所说的东西正如1948年所展示的那样，没有一件是显示他曾经下定决心竞选连任然后又打算退缩的，或是像模仿鸟那样，唱不是他自己的歌。

他曾说：“我不是个懦夫。”对于要去做的事情他的确如此。

他已感到竞技状态很好，而且感到自己在西部之行后已恢复了斗志，然而一切迹象显示民主党人没有理由抱希望。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举行前夕，他的前景不可能不显示出众多凶险。这不只是他要面对一个强大的资助充足的极有信心的共和党对手，或是华莱士运动把他的自由派支持者分走的威胁。除此之外，整个民主党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起来的由劳工、知识分子、城市老板和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组成的那著名的、无可比拟的民主党“联盟”正陷于分裂。哈罗德·伊克斯似乎想与杜鲁门捐弃前嫌，写信告诉他说：

你有着自愿或体面地退休，或被觉醒和愤怒的公民赶下台的选择。你见过池塘中的冰在温暖的阳光下突然从各个可以想见的方向崩裂的情景吗？这就是在你领导下民主党所发生的情况，除非你的党对明亮的阳光毫无反应。它已经自动地崩裂了。

现在最大的分裂来自伊克斯本人为首的该党的自由派，即教条主义的新政派人士。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最先提出艾森豪威尔为候选人的呼吁，由于得到了克劳德·佩珀，前物价管理局局长、现正竞选康涅狄格州长的切斯特·鲍尔斯，明尼阿波利斯市长、现正竞选国会参议员的休伯特·汉弗莱的支持，而扩大成了一个合唱，他们都支持动员艾森豪威尔参加这届大会。“民主党行动美国人联盟”，这个新近成立的与华莱士运动遥相呼应的非共产党自由派组织（有时被称为“新政流亡者”）声称它支持以艾森豪威尔来取代杜鲁门，如果艾森豪威尔不行，就选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芝加哥的杰克·阿维、纽约市的威廉·奥德怀尔市长以及新泽西的民主党首领弗兰克·黑格等职业民主党人也确信是选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了。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沃尔特·鲁瑟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菲尔·默里联合发起了艾森豪威尔运动。亚拉巴马州国会参议员希尔和斯帕克曼以及南卡罗来纳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也发起了这一运动，似乎旧的罗斯福联盟正重新组合在这位当时已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颇具魅力的将军周围。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这个事实，即无人了解任何有关艾森豪威尔的政治方面的情况。甚至无人能够说出他是否是一个民主党人，更不必说他对各种问题——民权、社会保障、税收——的立场如何了。也不知道他如何保持与斯大林之间的和平。

对于杜鲁门和那些忠于他的人来说，老新政派人士的反叛特别使人心烦。这除了是一种个人间的背叛行动外，似乎完全是不讲原则的和理智上的不诚实行为。他们认为，杜鲁门像任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继承者可能做到的那样，忠实地举起了新政的旗帜。从来没有任何一项提交国会的进步主义的计划能够比得上杜鲁门的计划。这是有案可查的。

尽管艾森豪威尔几次公开声明他不是总统候选人，也不想获得提名，但却没有劝阻他的那些新崇拜者。7月份的第四个周末，即民主党大会开幕前一周，吉米·罗斯福为首的艾森豪威尔派给1592名代表分别打电报，要求他们选择“现成的最有能力、最强有力的人”作为他们的候选人，还说“在这形势危机的时代，没有人会拒绝在提名和实际竞选美国总统职位中所蕴含着的履行职责和领导的召唤”。

《纽约时报》老资格的政治记者詹姆斯·C·哈格蒂的结论是，杜鲁门能够指望的是“一场艰苦而可能失败的争取提名的斗争……”

在6个月中，他遇到了历史上任何总统所能遇到的那种最粗暴的辱骂和困境。他曾因民权问题而遭到南方民主党人的申斥，也曾被共和党国会所遗弃，还曾因他的白宫阳台及密苏里老友而被奚落。他遇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压力，遇到了在柏林问题上不断增长的战争威胁，看到了在民意测验中他的名望丧失，也看到了他本人在报纸上被勾画成无能和悲哀的形象。他的党分裂了。如今，新政派人士正吵闹着要抛弃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受到他的党如此公开的蔑视，甚至赫伯特·胡佛在其最黑暗的时期也没有受到这种待遇。



杜鲁门喜欢说：“如果你忍受不了高温，最好离开厨房。”这是密苏里的一句老话，他是在30年代第一次从另一位名叫E·T·（“雄麋”）珀塞尔的杰克逊县的政治家那里听来的。

对于几个前新政派人士来说，全部情况都是极其可怕的。“我被杜鲁门总统正在接受‘审判’的这种不公正的方式惊呆了，如果最近的这种私刑法的气氛可以被称作是‘审判’的话！”戴维·利连撒尔在日记中记载说，“而自由派和进步人士的态度，目前他们正高喊着支持艾森豪威尔或道格拉斯，是最难于理解的，简直就像是疯子一般。”

杜鲁门的记录（利连撒尔7月5日继续写道）是一个面对各种折磨人的、甚至罗斯福在最好的状况下也可能会被难倒的问题的人的记录，他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与这些难题迎头相遇。他处理俄国侵略问题的方式……在他的民权计划上，他既没有逃避责任，也没有见风使舵——我的天！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

如果说他在退伍军人住房或巴勒斯坦问题，这个或那个问题上犹豫不决，那么，罗斯福就从未犹豫不决过吗？不是开玩笑，罗斯福在中立法和武器禁运（最糟糕最盲目的一种孤立）上就犹豫过；在经济事务上他也不时地犹豫过……罗斯福对公共电力的发展、人权、劳工的支持从根本上来看，一直比杜鲁门更坚定吗？而谁又知道艾森豪威尔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会采取什么做法呢！呸！

总之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说人民想要其他人，人民不支持他。算了吧，除了南方极端主义分子和追求尽善尽美的“自由主义旨”联合起来造成这种印象（当然，还得到反动分子和共和党人的热情鼓励）外，还有哪些该死的人会说人民不信任他呢？

真让我感到发疯和不舒服，这些追逐一个真诚的人的猎狗们！

当马特·康内利向杜鲁门报告弗兰克·黑格的背叛时，他只是说：“好吧，让他走。不管怎么说，我从来就不喜欢他。”同一天晚些时候，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把黑格、吉米·罗斯福、杰克·阿维以及“民主党行动美国人联盟”描写为“都是骗子”，还说“不过他们将一事无成——两面派人物从来成不了气候。”民主党领袖反对他的提名是极其愚蠢的表现。他已经肯定艾森豪威尔不会做候选人，甚至不会成为民主党人。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认为他无论如何不会做民主党名单上的一位候选人。”一位在职总统一——正如他的党的领袖——其影响之大是难以挫败的。他提醒他的班子说，甚至西奥多·罗斯福运用其全部威望也未能阻止在任总统塔夫脱于1912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7月1日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被问道，他认为他拥有足够数量的有保证的代表票数以使他能在费城的第一轮投票中取胜吗？

“当然。”他答道。

不过，如果没有后来根据阿瑟·克罗克所写的（他的材料显然来自肯尼思·罗亚尔）那件事，他也许不会像公开表示的那么乐观。

大会开始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在白宫南门廊下举行的一次大约有六七个政府官员参加的“自由讨论酒会”上，杜鲁门问他们所有的人，如果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上了提名者的竞选名单，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此时，已在费城的

克劳德·佩珀已提议大会把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全国的”而不是一个党的候选人。除了罗亚尔之外，每一个人都让总统放心，说他能很快地解决任何这类企图。杜鲁门注意到罗亚尔的沉默，询问他的看法。罗亚尔说，艾克将被欢呼通过提名，这话引起了其他人的愤怒。杜鲁门什么话也没说，但是后来在白宫大门前，一位侍者告诉罗亚尔说总统希望在楼上会见他。他在椭圆形书房中发现杜鲁门正与约翰·斯奈德在一起。

杜鲁门说：“我想告诉你，我同意你的看法。”

据克罗克的故事说，接着杜鲁门问怎样才能防止艾克的名字出现；罗亚尔让总统放心，说那位将军也有同样的目标，并同意去看看他能做什么，“在与艾克的一次电话会谈中，”阿瑟·克罗克写道，“罗亚尔拟出了艾森豪威尔致佩珀和其他人的声明，这个声明阻止了提出他的名字的努力。”

7月9日，星期五，艾森豪威尔再次说不，这一次他的拒绝是“最后的和完全的”，而且“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在宣读艾森豪威尔的电报时，据报道说，黑格首领嚼碎了他的雪茄，说：“杜鲁门，哈里·杜鲁门。噢，我的天哪！”

克劳德·佩珀拒绝放弃，宣布现在“没有时间像往常一样考虑政治问题”，并且表示他本人将参加竞选。他的候选人资格仅坚持一天。

克拉克·克利福德在费城溜进溜出，散布着总统已经打电话给正在俄勒冈的瓦洛厄山度假的威廉·道格拉斯的消息。道格拉斯是杜鲁门选择的副总统候选人。他会使竞选名单达到地域上的平衡。他是年轻的、在民权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坚定的新政派人士。道格拉斯只想要一些时间来考虑。

克利福德像往常一样处在事情的中心，不过更多的是出于对杜鲁门的忠诚，而不是出于任何更高的个人期求。他后来承认：“当时我们之中没有什么人真的认为提名有多么重要。我们的目标仅仅是使总统获得提名。因为，如果在4年后，这个党抛弃了他而转向其他什么人，那对他将是一种极不公正的非难。”

尽管艾森豪威尔热已经过去，但它却成了一种衡量的尺度，说明民主党人对11月份的溃败已经变得多么担心。这不只是杜鲁门不会重新当选的问题，而且他还会使所有的人和他一起倒台。在拥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空前的胜利者作为他们的旗手的16年后，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肯定的失败者的前景。如果说还有人在指望着党的精神复兴的话，那么一旦人们聚集到费城，这种错觉也会很快被纠正。那些新近到达的代表们在7月10日、即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漫步在这座城市空旷的安息日大街上，据报道说，就像是葬礼上的哀悼者一样。

报纸上引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的话说：“我们为这次会议准备错了用具。他们应该给我们灵车。”

出席者比预期的要少。原来预约很满的饭店现在却接到了取消预约的通知，几个星期前，共和党大会期间，饭店的大厅里一直都喧闹非凡。共和党大会后剩下的旗布和旗子看起来都显得悲哀地陈旧了。

艾尔本·巴克利回忆说：“你可能要用一把镰刀去斩断忧愁。甚至于空气中都散发着失败的气息。”

期待着会议大厅中开幕日到来的群众在会议开幕时都感到很失望。边座大部分都是空的。坐在代表席上的代表在会议发言期间到处乱走，也有的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转过来转过去，在几乎难以忍受的高温下扇着扇子，因

为尽管这个礼堂为了这次大会和共和党大会而花了很多钱重新装修过，但却没有空调，巨大的电视照明灯加上费城炎热的夏季天气，使得这地方成了一个蒸汽浴室。讲台上的温度达到华氏 93 度。

电视、照明灯、电缆、电线、麦克风、扩音器、电视摄像机等设备的在场，以及密密麻麻的技术人员及所有这些东西所产生的舞台效果，才造成了这次大会的新奇感和趣味感。对于许多出席会议的人来说，电视是 1948 年民主党大会中最值得记忆的部分。

为了使这次“政治演出”成功，一切能够想到的事情都做了，像他们的共和党对手一样，现在，一个接一个的民主党人在走上讲台之前或为防备会场外“毫无准备”的突然采访，都得忍受着薄煎饼似的化妆品和眼脸膏的涂抹。几位在大会上发言的女士涂上了褐色的唇膏，因为她们被告知，在黑白的家庭电视屏幕上，这样显得更好看。在记者席上的记者们都戴上了墨镜，以便在照明灯的强烈光线下工作。

在白宫，为使杜鲁门能够如其所愿、或详或简地观看到大会进程的一切安排都已准备妥当，一台崭新的落地式 12 英寸“杜蒙”电视机搬进了他的办公室，被放置在紧靠他左面的墙边。这样，从多少有些失真的黑白图像中，他就能从自己的座椅上观看到会议进程，这是以前的总统无法享受到的。12 日下午，当摄像机第一次在新闻办公室中架起，NBC 广播公司与几位白宫新闻记者举行半小时的讨论会时，杜鲁门和他的班干都聚集在那台新的电视机前观看。

威廉·O·道格拉斯此时已决定拒绝列名竞选名单上第二的位置，他告诉杜鲁门，原因是他希望留在最高法院。杜鲁门被深深地刺伤了。他对他的班干说：“我从始至终都为道格拉斯而招惹了很多麻烦，而他却对我釜底抽薪。”据说，道格拉斯告诉别人，他不想成为一个第二号人物手下的第二号人物。

当天晚上，在费城的礼堂中，艾尔本·巴克利以一个令人振奋的主旨发言，首次为大会带来了生气。乐队高奏“我的肯塔基老家”，代表们欢呼雀跃。作为一个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一个老派的演说家、一个出生于小木屋的情感丰富、受人欢迎的民主党人，他的演说在会场上激起了过去的新政荣耀和对反对派的大量的无情的蔑视。同时他的演讲显然也取得了很好的电视效果。在白宫观看电视的杜鲁门几乎像会议大厅中的代表们一样喜悦。

杜威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曾发誓要清除华盛顿的蜘蛛网。如今，汗流满面的巴克利声称他不是个清除蛛网的专家。“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民主党在 16 年前接管政府的时候，甚至那些蜘蛛被饿得是如此虚弱，以至它们不可能在华盛顿政府中的任何部门编织一张蛛网。”

它第一次显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大会了。巴克利成了一位英雄和选举人名单上第二位置上的合适入选。甚至有人在谈论选巴克利做总统候选人。

然而，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说中，巴克利对 11 月份的胜利未置一词，提到杜鲁门的地方也仅有一次。杜鲁门就像他欣赏这个表演一样地赞赏说，巴克利具备了一个竞争总统职位的人的一切素质。

霍华德·麦格拉思从费城打电话来询问总统是否看到了这次演说，并说它已把巴克利推到了争取副总统提名的“前列”。杜鲁门答称，如果巴克利是大会想要的人物，那么，巴克利也正是他的选择。

当天夜里，他曾试图与巴克利通电话，但巴克利已经上床睡觉了。

此前，杜鲁门一直认为他需要像道格拉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自由派人物

来与他搭伙参选，并且最好是比他年轻的人。而巴克利两个方面都不具备。他已 71 岁，比杜鲁门年长 7 岁，并且是来自肯塔基州，这将不会使竞选名单达到地域上的平衡。与共和党竞选名单的这种反差可能会带来危害。

不过，杜鲁门在第二天早晨通过电话询问巴克利，为什么他从未告诉他想要当副总统。

杜鲁门说：“我不知道你想要获得那项提名。”

巴克利答道：“总统先生，你确实还不知道。”

“那么，如果我知道你想要得到它，那我肯定是会同意的。”杜鲁门说。尽管这次电话确认对双方来说都很难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这项决定的安排，但是在费城，麦格拉思在事后几乎是立即就告诉记者说，如果大会认为提名巴克利参议员为副总统候选人是适宜的，那么总统将“非常高兴”。（自 1928 年以来，在历次大会上巴克利一直是现成的副总统候选者，他告诉朋友们说，如果提名是他，他希望尽快确定。“我不希望通过的程序磨得那么长，让它最终像块冷饼子似的。”）

事实上，杜鲁门对道格拉斯的拒绝所表现出来的忧伤比对巴克利的接受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还要多。他的班子认为，对整个事情他显示出一种奇怪的、近乎不负责任的冷漠。如果是别人，都会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所包含的潜在重要性，然而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他对此有何富有创见的评论。埃本·艾尔斯写道：“谈到副总统的职位，总统说他从未真的在意谁被提名与他共同参选。”

当会议在民权问题上的斗争爆发出来后，巴克利先前的激动很快就消失了。

杜鲁门观看着这场在小黑白电视屏幕上展现的戏剧，记载道：“来自圣路易斯的一位黑人代表作了一个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建议剥夺密西西比州代表团的席位。他的名字叫沃恩，他的建议被驳回。接着，另一位黑人代表、芝加哥的国会议员道森，对民权问题做了一个出色的发言。这两位黑人似乎是到目前为止能让我全神贯注地听他们发言的仅有的两位演说者。”

第二天，7 月 14 日，星期三，即安排了杜鲁门的提名和接受提名演讲的日子，当休伯特·汉弗莱市长为首的一个“民主党行动美国人联盟”的激进派别要求在党纲中加入一个更强硬的民权纲领时，在民权问题上的喧闹变成了愤怒。现存的民权纲领基本上就是 1944 年党纲中的内容——温和而模棱两可，足以平息南部代表团的不满——它的措辞已经白宫同意，杜鲁门及其顾问们确信现在不是疏远南方人的时候。汉弗莱得到警告，如果他坚持，他就可能分裂党并毁掉自己的前程。

然而，汉弗莱及其派别提出了一项强调逐条地支持杜鲁门本人的民权计划的纲领——反人头税和反私刑立法、公平就业法律、在军队中结束种族隔离。在贝尔维尤—斯特拉特福饭店高层代表出席的一次艰难而激烈的纲领委员会会议上，汉弗莱指责行政当局的纲领是一个把人权“出卖”给州权的纲领。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温和的纲领后，汉弗莱派便把斗争提到了大会会议上。该派的一名竞选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的候选人保罗·道格拉斯回忆说：“我们本来就比杜鲁门的追随者所想象的要强大。”

当纲领委员会多数派报告正在大会上宣读时，汉弗莱坐在讲台后座上等待轮到发言，党魁埃德·弗林招呼汉弗莱过去给他看这份多数派报告，待他看完后，弗林说：“年轻人，这才是这个党所需要的。”

与杰克·阿维和弗兰克·黑格不同，弗林认为选择艾森豪威尔的这整个主意都是愚蠢的，那些想象有其他选择的人都是些不中用的老马和业余政治家，对他本人所珍爱的政治箴言“绝不能让事实搅乱了你的愿望”一窍不通。弗林一直在说，杜鲁门获得提名是毫无问题的，他想要看到哈里·杜鲁门获胜。

汉弗莱走向讲台，他容光焕发，听众一下子静了下来。他讲了不到 10 分钟，但却创造了历史。现在是民主党前进的时候了。“有些人对你说——在民权问题上我们正在仓促行事。我说我们已经落后了 172 年……对民主党来说，已经到了该走出州权的阴影、直接走进人权的明亮阳光的时候了。”

随着大会爆发出赞同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踏上了座位旁的通道。其他代表团也随之效法，美国音乐家联合会主席詹姆斯·C·皮特里洛率领的一支 40 人的铜管乐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然而，散座在会场内的闷闷不乐和沉默的南部各代表团则依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讲台上，大会的常务主席、得克萨斯州的萨姆·雷伯恩以不赞成的态度看着下面，他担心南方代表团如“退出会场”可能会摧毁杜鲁门在 11 月份也许尚存的那微小机会，同时可能会永远地毁灭了党。雷伯恩试图拖延表决，但是，当表决推迟来临时，汉弗莱派却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据说，那天晚上亚拉巴马代表团打算带头退出会场，在最后一次点名表决时，雷伯恩命令以呼声表决的方式来代替，结果大会再次以雷鸣般的呼声表示了它的赞同。

在白宫，杜鲁门对正在发生的这些转折感到愤怒，他把汉弗莱及其追随者称作是希望看到南方退出会场的“疯子”。然而事实是，这次看起来如此悲哀地滞留在阴郁气氛中的大会，现在却突然地戏剧性地通过了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毫不含糊的民权纲领；不论杜鲁门和他的人如何评价这件事，赫伯特·汉弗莱都已经比出席这次大会的任何人（除杜鲁门本人外）为杜鲁门的重新当选做了更多的事情。

当天晚上，有电视摄像机在联邦车站报道了总统的出发，当他到达费城车站时，有更多的摄像机进行了报道。“现在隐私无法获得足够的保护了。”他写道，尽管他对此保持着平静并且镇定自若。他要给大会一个惊喜，并且知道效果会如何。1948 年拥有电视机的美国人相对来说还比较少，他们从自己家里的电视屏幕上看到他安静地坐在他的专用车厢的窗户旁等待着离站。

第一夫人玛格丽特、查利·罗斯、克利福德、埃尔西、艾尔斯、唐内利和萨姆·罗森曼和他一起在这趟车上，吃着旅途中的晚餐；杜鲁门本人则独自呆在他的车厢里写日记。大约行至到费城的路程一半时，他从广播中听到亚拉巴马代表团和密西西比代表团中的部分成员退出了会场。他在笔记中写道：“难以置信。我女儿和我的班子成员试图阻止我听。认为我可能会心烦意乱，我才不会呢。”

到达费城时，天正下着细雨，他 9 时 15 分踏出车厢门，身着一套洁白的亚麻布西服，显得无拘无束。他被直接用车从车站送往会议大厅，现在大厅中已挤满了嘈杂的满怀期望的人群——他们热情地不顾酷暑，西服、夹克衫早已脱下，领带和衣领也已解开，衬衣已被汗液弄脏。

支持性的发言已经开始，在发言者冗长的发言过程中，杜鲁门一直呆在场外，先是在麦格拉思的所谓“办公室”、一间没有窗户令人窒息的屋子里，然后又转到舞台入口附近的一个有点凉风的室外坡道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到

一条小胡同和铁轨。他由艾尔本·巴克利陪同，他们并排坐在那里聊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杜鲁门坐在一张直背的木椅上，巴克利则坐在一张更舒适的红皮扶手椅中，这是有人从发言者的讲台上借来的。

对于许多在以往出席过其他这类全国代表大会的人来说，此次大会是记忆中最拙劣、组织得最糟糕的一次——《新闻周刊》称它是美国政治史上组织得最糟、最令人沮丧的一次大会——一位美国总统不得不像杜鲁门这样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等待着轮到他发言，这种主意似乎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了。某些报道把这个场面描写为杜鲁门一生中的最低点。不过，杜鲁门和巴克利却都不这样看。巴克利回忆说，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愉快的访问”，其间，他们谈到了“许多事情，政治、琐事、如何抚养女儿……”杜鲁门也认为，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益的晚上”，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汤姆·埃文斯回忆这个“炎热、可怕的夜晚”时曾描写说，杜鲁门身着白色西服平静地坐在那里，“我敢对你用名誉来担保，西服上一条皱纹都没有——他沉着冷静……泰然自若……那种情况似乎一点都没有让他烦恼”。

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需要耐心，经常是要极大的耐心，以及处理事情不能太个性化的那种力量；而杜鲁门和巴克利是两位老牌的职业政治家。

“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就像你一样地行事。”乔治·埃尔西回忆说，“他们等待着。”

当支持性发言结束、提名总统的投票开始时，将近4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12时42分，杜鲁门终于赢得提名，得到了948票；佐治亚州的国会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南部在最后时刻提名的候选人获得263票。接着，巴克利被以鼓掌欢呼的方式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因此，当杜鲁门和巴克利终于步入会场时，已是凌晨近两点钟，他们踏上讲台时，乐队高奏“向领袖致敬”的乐曲。

考虑到时间和群众的疲劳，这一场表演似乎注定会失败。杜鲁门对其寄予希望的所有电台和电视台的听众和观众早已入睡。把事情搞得更有点儿糟的是，一位前宾夕法尼亚参议员的妹妹突然从一个“自由钟”的花卉图案中放出一群白鸽——代表“和平鸽”——它们这一整夜都呆在那里，被关在酷热的鸽笼中。这些发了狂的鸽子不顾一切地跌跌撞撞地飞向四空，冲进楼厅，撞碎了灯，袭击着观众，并低飞掠过讲台，以致雷伯恩主席不得不立即用手挡开了几只，这使观众以及杜鲁门和巴克利都感到很开心，他们捧腹大笑。（多年后杜鲁门曾描述过一只鸽子实际上落到了雷伯恩的秃头上的情景；而雷伯恩则看不出这种情景有什么可笑，他激烈地否定杜鲁门的说法，告诉一位记者说：“哈里·杜鲁门是该死的骗子。根本就没有任何鸽子落在我头上。”）

巴克利首先讲话，他讲得很短，然后轮到杜鲁门讲话。

他走向麦克风，在照明灯那强烈的光线下，他那漂亮的白色服装闪闪发光。尽管时间已经很晚，天气炎热，听众已经很不舒服而且汗流浹背，但他却获得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成功。他没有用打趣或感谢之类的后来浪费时间，他讲话时没有讲稿，昂着头，声音洪亮，双手在空中用力挥动，从而使大会立即振奋起来。

“巴克利参议员和我将赢得这次大选，并且要让这些共和党人心服口服——记住我说的这话，”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使用他所说的意义上的“赢得”一词。

民主党将在11月份获胜，因为民主党是人民的党。共和党则一贯就是少

数特权人物的政党。

自 1945 年以来，他第一次不是作为一个由于继承、被偶然推上台的领袖，而是作为他的党选举的领袖发表讲话。他既不低声下气，也不显得高贵或傲慢。与杜威在这同一个讲台上趾高气扬地发表接受提名演说的情景比较起来，他也不显得更张狂。他的措辞很注意方式和内容，以便人们能够把他与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区别开来。杜威曾声称，获胜并非唯一的目标，似乎他已经当选似的。杜威说：“我们的任务是要让我们的胜利充满这样一种意义，即让世界各地渴望自由的人们鼓起勇气，向前奋进……”杜鲁门则宣称：“现在是我们团结起来，打败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了。”他的话带有一种乡土气息的直白，使用了诸如“糟糕的”（形容共和党的税收法案）和“胡扯”（形容共和党允诺增加社会保障福利金的纲领）一类的字眼儿。《生活》杂志称这是他的“利尔·艾布纳·欧扎克风格”。这正是他喜爱的感情激烈的边远地区政治的精神，他知道自己属于那里，这也正是那充满生气和战斗精神的安德鲁·杰克逊和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传统。

他列举了在民主党领导下 16 年来为农民、劳工和穷人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同时他也猛烈抨击了共和党控制的第 80 届国会阻止在住房、教育资助、医疗保障，是的，还有民权等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做法。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民权计划。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自己的党中的某些成员不赞成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激进立场。但是他们是站出来公开地这样做的。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立场。然而，共和党人尽管都声称支持这些措施，可国会却不采取行动……

他说，的确，在新的共和党纲领中有一长串的允诺，共和党声称这是他们想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然而，控制着国会的共和党人却阻止他的行政当局来做这些事。

正是在这时，他露出了他带给大会的惊喜，他的炮弹；他讲话的速度如此之快，似乎每个字都擦到了一起，只是由连字符隔开似的。

因此，我要求这届国会在 7 月 26 日复会。

7 月 26 日，在密苏里我们称之为“萝卜节”的这一天，我打算要求国会复会，并要求他们通过阻止物价上涨、应付住房危机的法律——在他们的纲领中他们说他们是支持这些措施的……我将要求他们拿出行动……援助教育，他们说他们是支持这样做的……为民权立法，他们说他们是支持这样做的……

大厅里的欢呼声和跺脚声震耳欲聋，他必须喊着讲话才能被听见。

现在，我的朋友们，如果在共和党纲领之中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应该从第 80 届国会的一次简短的会期中得到某些实际行动。如果他们想要做的话，他们能够在 15 天里完成这项工作。他们将仍会有时间出来竞选。

他正在诱使共和党人摊牌——“让他们实现自己的诺言吧！”——代表们欣喜若狂。《纽约时报》说，他“使大会激动起来”。克拉克·克利福德回忆说：“他走出会场，内心很平静，他找到了发表这篇激烈演说的力量和鼓舞，而这篇演说必然会使他大受欢迎。”

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发现自己已被这张古怪的脸上所具有的那种果敢和大胆以及他对群众的影响力不自觉地打动了。马克斯·勒纳写道：“他们意识到，这是自布赖恩以来两党接受总统提名演说中最具战斗性的一篇演说。他们喜欢他队艰难的战斗中奋头出来这一事实……这是一篇在伟大的时刻发表的伟大的演说，在我聆听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也鼓掌了。”

甚至《新共和》杂志也给予了它最高的赞扬：这篇演说“极其精明地合乎”时宜，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能发表的任何演说那样。“至少在那天夜里，哈里·杜鲁门是一位真正的领袖。”

《时代》报道一位代表的话说：“对于一位冒着风险进行战斗的人，你不能保持冷漠。”

杜鲁门被比作依靠全体船员来拯救一艘正在沉没的船舶的勇敢的船长。事实上，他正像是1918年在孚日山中的那位密苏里的炮兵上尉，当时他的炮兵连在敌人的攻击下惊慌失措，他站在他的大炮旁，用一通言辞激烈的大声训斥使得他的士兵重新恢复了镇静。

共和党指责他玩弄赤裸裸的政治手段。召开国会特别会议的要求是“一个绝望的人的行动”，是“一个行将死亡的行政当局发出的歇斯底里的最后喘息”。

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当然，这是政治，并且是有效的政治，强硬的和不加做作的。”

它的主要作用，正如杜鲁门所期望的，是要把问题的焦点放在国会身上，进而放在像杜威和厄尔·沃恩这样一些赞成30年代以来新政所发起的许多计划的共和党人与那些仍在阻碍这些计划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分裂上。它给第80届国会造成了争论，使共和党人处于守势，并使杜威处于两难的选择之中：究竟是支持第80届国会，并由此而承担它失败的一份责任呢？还是与这届国会保持距离，而这种做法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似乎是缺乏勇气的表现。

众院议长乔·马丁后来承认，杜鲁门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就“像鬼一样精明”。自1856年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在大选年间要求召开国会紧急会议的。一句密苏里的农谚说：“七月二十五种萝卜，不论晴雨别耽误。”国会在26日开会（25日是星期日），所以被称作“萝卜国会”。

“凌晨5时30分，我通常起床的时间，到达华盛顿白宫。”杜鲁门从费城返回后，在记事本中7月15日那页上简短地写道。

但6时上床，听新闻。睡到9时15分，吩咐早饭，10时去办公室。我要求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我的，我的反对派如何狂叫。我打算让他们在选举前面对他们纲领中的许诺。据“御用”报刊及反对党领袖说是“廉价政治”。我不知道“昂贵政治”会是什么样！

两天后，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一个红砖礼堂中，州权民主党人（他们现在自称是“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举行了一次仓促召集的大会，他们挥动着南方联盟的旗子，向亚拉巴马前州长弗兰克·M·狄



克逊欢呼，因为他谴责杜鲁门的民权计划是“把我们贬低到杂种和劣等种族地位”的一项努力，接着，他们又一致选举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L·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南部各州民主党人的纲领要求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和每一个种族的种族完整”。他们的希望是使杜鲁门和杜威都不能获得多数选票，从而使这次选举转由众议院来操作。

在被问及他为什么现在与民主党决裂，而当初罗斯福在民权问题上也曾做出过与杜鲁门一样的许诺时，斯特罗姆·瑟蒙德答道：“但是杜鲁门真的说话算数。”

7月27日，在费城的会议大厅又一次召开了大会，这次是亨利·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的大会，3000多名代表——远比共和党和民主党大会的人数要多——聚集在那里欢呼华莱士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格伦·H·泰勒、爱达荷州的那位“唱歌的牛仔”被他们出人意料地选为华莱士的竞选伙伴（泰勒作为一名民主党人，在1944年竞选国会参议院席位时曾唱道：“啊，在国会的大厦，给我一个家。”）。

黑人代表的数量使人印象深刻。有近1/3的代表是妇女。青年代表占了大多数。据报道说，出席费城大会的进步党的代表们比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代表平均年轻20岁，体重轻30磅。这一次酒的消耗量也较少，而且没有“充满香烟气的屋子”。不过，代表们也显然缺乏政治经验；尽管华莱士和泰勒以及绝大多数代表都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像保罗·罗伯逊和纽约州国会议员维托·马坎托尼奥这些亲共分子受到欢迎的引人注目的场面，以及这个新的狼狈不堪的进步党组织中，到处都是共产党人占据支配地位的明显迹象，使得许多观察家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感到深深的不安。

从发动他的“讨伐运动”开始，华莱士就拒绝与他的共产党支持者断绝关系。他说，他不会拒绝接受任何“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给予他的支持。泰勒参议员则强调“粉色”共产党人与“红色”共产党人之间的区别。他告诉记者说，粉色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演变而不是革命来改变美国的制度，他们支持进步党的事业。相反，红色共产党人则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基础上支持着社威，即另一个胡佛式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革命。

这次大会所形成的进步党纲领实际上在下面几个方面与共产党的纲领没有什么不同：它痛斥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和新的征兵法，要求销毁美国的核武器，这仍是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唯一实际存在的核武器。当一位名叫詹姆斯·海福德的农民提出一项修正案，说进步党无意支持任何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时，这个意见被指责为“来自外部压力的反映”，并遭到否决——华莱士明知这是一个错误，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它。

华莱士在费城希伯公园3万多兴高采烈的听众面前发表了接受提名演说，听众须为他们的座位付费，这是进步党人为支付开销而搞出的一项发明。他把世界上大多数麻烦和紧张局势归罪于美国的政策，却一句都没有批评苏联。他说，在柏林问题上，为了寻求和平，作出让步不会有任何损失。“我们坚持反对那些拥有旧的政党而享有特权的首领们……他们企图控制我们的思想，支配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

在华盛顿夏季那令人窒息的酷热中，“萝卜国会”勉强地进行着。柏林的紧张局势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增加。而最让杜鲁门感到烦恼的是，詹姆斯·福雷斯特秘密地发起了一个将原子弹的监管权转交军事首脑的运动。

一位名叫伊丽莎白·本特利的妇女和《时代》杂志的一位名叫惠特克·钱伯斯的编辑（两人以前都是共产党员）在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显示，这显然是正在被揭露的一个重大的间谍丑闻。

总统办公室的来访者们发现他显得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贝丝和玛格丽特已经到密苏里去度每年一次的夏季假日，他又感到特别孤独。把她们送上火车后的那天晚上他写道：“又热又潮湿又寂寞。到底为什么人们都想当国家的首脑？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话，去他的罢！”

关于柏林问题他的想法没有改变。美国部队要留在那里。7月19日会见马歇尔和福雷斯特时他再次说，这是他的决定，他将坚持这个决定，直到尝试用一切外交方式达成某种避免战争的和解为止。他私下写道：“我们将留在柏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推卸责任，也不为我做出的任何决定寻找借口。”他相信，马歇尔也相信，西欧的未来与柏林利害攸关，这不只是该城市盟国占领区内250万人的幸福问题。斯大林显然决心要把盟国赶出柏林。“如果我们希望留在那里，我们就必须显示力量，”杜鲁门后来写道，“但是一直存在着俄国人的反应可能导致战争的危险。我们不得不面对着这种可能性，即俄国可能故意地选择柏林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盟国在柏林的全部军队有6500人——3000名美国人、2000名英国人、1500名法国人——而俄国军队却有18000人，并且还得到德国东部地区大约30万人的军队的支持。

现在空运已进入了第四周，满载着货物的美国和英国运输机每天都要轰鸣着进入柏林数百次，而且在任何气候中都要飞行。它们一架接一架地低空飞进，在隆隆声中掠过建筑物废墟的顶端，以至人们成群地来观看。德国的孩子们用玩具飞机在瓦砾堆中玩着“空运”的游戏，而真正的戏剧则在他们的头顶上空上演着。

克莱将军最初估计，以他所谓的“规模极大的行动”，每天可能把大约700吨食品空运到这座被围困的城市。有些天，吨数已两倍于这个数字，而现在，几乎难以想象的是，连煤也要用飞机载着从天上运来。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正在创造英雄业绩。飞机经常每四分钟就要降落一架——英国的“约克型”和“达科他型”，美国的C—47型以及更新更大的四引擎的C—54型，它们是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派到德国去的。大多数飞机平均一天飞三个班次，从法兰克福到柏林的加托机场或坦普莱霍夫机场，距离是275英里。地勤人员则夜以继日地工作。《纽约时报》说：“战争期间我们为我们的空军部队感到自豪。今天我们更为它感到自豪。”已经有3名美国机组人员在他们的C—47飞机失事时遇难。

但这样的努力仍然不够。7月15日是创记录的一天，1450吨货物被运到柏林。然而为了支撑这座城市，仅食品一项每天就需要2000吨，外加12000吨燃料和其他供应。冬季，燃料的需求会更大。柏林市长已然说，靠空运提供必要的食品和燃料供应是不可能的。伦敦的一家报纸报道说：“但是，每一个专家都知道，飞机尽管有巨大的心理效果，却不能被指望来在冬季向柏林提供必需品。”柏林的盟军官员还对俄国的“雅克型”战斗机加强了在空中走廊的活动感到担心。

陆军部长罗亚尔命令克莱将军飞回华盛顿向总统汇报，而杜鲁门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他写信给贝丝说：“我的笨蛋陆军部长命令克莱从德国飞回来，造成了一种没有适当理由的可怕的尴尬局面。”）。在7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克莱说柏林人民将坚持下去，即使这意味着更大的磨难。俄国人眼下可能会试图阻止用武装护卫打通陆路交通的任何企图，但他们不会去干涉空中交通，当然，除非他们决心挑起一场战争。杜鲁门问，俄国人想要打仗吗？克莱认为他们不想这样做。其他人则说不准。杜鲁门拒绝了武装护卫的主意。

当杜鲁门询问增加空运可能产生什么问题时，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空军力量会被危险地削弱这一点表示担心。但是，这是杜鲁门必须去冒的一个风险。他决定大量增加空运，并再次表达了他的留在柏林的“毫不动摇的决心”。更多的大型C—54型运输机将被增派去参加空运。克莱命令修建另一个柏林机场，根据他的命令，3万名柏林人开始进行清理瓦砾和修筑跑道的工作。

“在与克里姆林宫的斗争中，行政当局有着可观的政治优势。”詹姆斯·罗在他勾画1948年政治战略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在危机时期，美国公民倾向于支持他们的总统。”因此，以这个理由看来，柏林危机如果能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对杜鲁门来说将是一个天赐良机。不过，在他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中，没有一点迹象显示出他在为了“政治优势”而操纵这种形势。相反，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作为总统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似乎比他担任这项职务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沉重。他感到竞选运动以及它对他的时间和精力所造成的压力和负担是任何更糟的时候也不可能有的，在7月10日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丘吉尔：

我正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政治上的“火的考验”。它在这个时候到来真是太糟了。

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的基础上，即人民有权对他们的领袖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论形势如何危机……

我们正处在严峻的考验时代中。你可以满意地面对你在推翻世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方面的巨大贡献。“共产主义”——所谓的——是我们下一个面临的大难题。我希望我们不用“血和泪”这两种不久前的代价就能解决它。

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柏林问题会议的前一天、即7月21日，在福雷斯特尔安排的讨论原子弹监管问题的会议上，杜鲁门的样子显得很可怕，在他烦恼的那一刻，比以前更真实地显露出他对原子弹的恐怖比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被人们料想与他非常接近的人都了解得更详细，也比那些他希望让他们了解这种情况的任何人都了解得更详细。

“总统相当严肃地欢迎我们。他显得精疲力竭、冷酷无情；一直没有显示出丝毫喜悦，我们立即就开始认真讨论。”戴维·利连撒尔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当时，这全部情景及所说的每一句话仍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中。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一种严肃的气氛笼罩着它，不用说，这个议题的性质及甚至在某个时刻某种可怕的事情会在柏林发生的这

个现实丝毫也不会使这种气氛缓和……我十分相信，这是我出席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出席者除了杜鲁门、福雷斯特尔和利连撒尔外，还有其他4名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此外还有陆军部长罗亚尔，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雷明顿武器公司总裁唐纳德·F·卡彭特，他也是全国军工企业集团军事联络委员会的主席。

讨论开始时，卡彭特大声宣读了一封正式的信件，要求总统发布命令，将原子弹的监管权转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其理由是：最终对武器的使用负责的人应该拥有这种监管权，以便增加对它的“熟悉程度”和“统一”指挥。杜鲁门并不赞赏以这种方式来宣读信件，打断了他，粗率无礼地说：“我自己能看。”他让利连撒尔发言，后者说真正的问题是制定一项明确的政策，原子弹的监管绝不是除总统之外的任何人的责任，因为宪法赋予他的职责是总司令和总统。利连撒尔说，由文职人员控制原子弹是必须的。

但是接着赛明顿发言，他以一种极不适宜的轻松口吻谈到了他对洛杉矶阿拉莫斯的一次访问，在那里，“我们的同行”告诉他，他们应该得到使用原子弹的确实保证，尽管一位科学者曾说他认为永远不应使用原子弹。

“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杜鲁门插话说，他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继续说道：“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使用这东西，除非绝对必要时。它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要下令使用的这东西……（据利连撒尔的记载，杜鲁门在这里停顿下来，低头看着他的办公桌“沉思了一会儿”）。具有如此可怕的毁灭性。其毁灭性超出了我们已有的任何东西。你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件军事武器（利连撒尔写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句特殊的话。”）。它通常会消灭妇女、儿童以及没有武器的人，因此不适于军事上使用。我们不得不以不同于对待步枪和大炮以及类似的常规武器的方式来对待它。”

过去，杜鲁门曾像其他人一样，说原子弹是一种军事武器。过去，他曾说广岛和长崎是军事目标。现在他不再这样说了。这是一个特殊的宣言，绝对能够驳倒——正如利连撒尔理解的那样——任何认为杜鲁门不知道原子弹的恐怖或轻率地履行其总司令的职责的想法。

不过，赛明顿似乎没有理解杜鲁门的观点或他此时的心情。“我们的同行需要熟练地掌握它。”赛明顿重复道，现在他指的是军队。

杜鲁门坚决而严厉地说，他们必须明白他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考虑。“没有时间围着一颗原子弹耍来耍去。”

他从办公桌旁站起身，他已得到足够多的信息，讨论该结束了，其他人也站起来离去。

“如果让总统感到担心的部分原因是他能否信任这掌握在军事当局手中的可怕的力量，”当天晚上利连撒尔写道，“那么，这些人的表现肯定无法消除这种疑虑……”

两天后，在一次讨论国内问题的内阁会议结束时，杜鲁门把福雷斯特尔多留了一会儿，告诉他原子弹将继续由文职机构来监管。

私下，杜鲁门一直在表示对福雷斯特尔的担心，杜鲁门说，他最近似乎不能“把握住自己”。

7月26日，星期一清晨，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玛丽·简写信：“星期五中午，我乘游艇顺河而下，并且睡了一天一夜。”

我确信需要这样做，并且在 11 月份以前需要更多这样做。一切都那么微不足道。杜威、华莱士、那些疯狂的南方人，还有，如果我赢了——我恐怕会赢——我可能要着手对付一场俄国人的战争。两场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足够了，而我已有了两场战争。

明天我要去国会，给他们宣读一份咨文，要求控制物价、修建住房以及许多其他必需的事情，而我十有八九什么也得不到。不过我必须去试。

在国会山，国会特别会议开幕了，同一天早些时候，杜鲁门抛出了另一个意外的惊奇。他事先没有预告，便颁布行政命令结束军队中的种族歧视，并在行政机构中提供公平就业的保证。

第二天当他出现在国会面前时，对他的接待明显地冷淡（作为怨恨的表示，某些议员在他进入国会大厅时甚至都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要求就他的包括民权问题在内的八点计划采取行动——控制消费者分期付款信用、征收超额利润税、加强租金管制、控制物价、对住房采取行动、援助农业、援助教育、增加最低工资、改变《背井离乡者法律》中歧视天主教和犹太人的条款——所有这些他以前都曾要求过，但都被否决。

杜威州长对此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是他从位于奥尔巴尼的办公室中，通过他的竞选管理人赫伯特·布劳内尔，敦促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认真考虑总统的计划。培夫脱坚决地拒绝了，说：“不，我们不会给那个家伙任何东西。”对塔夫脱来说，对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大多数公众来说，这整个计划都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

两周的会议正如杜鲁门期望的那样，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除了证明了他的观点，即共和党国会是这个国家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之外，还显示了共和党的诺言及其表现之间的巨大差距。

他告诉贝丝：“他们肯定像泼妇一样又气又急。如果我让他们更疯狂一些，他们也许会去做那些古代的众神们曾经施加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头上的事情……”

8 月 4 日，国会山上，在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面前作证时。《时代》杂志编辑惠特克·钱伯斯指责卡内基基金会主席阿尔杰·希斯是他在一个共产党间谍网中的同谋，希斯曾是新政中“辉煌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是罗斯福和杜鲁门两届政府中的官员，在国务院服务了 14 年。钱伯斯说：“多年来，我本人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地下组织中服务。我了解它的高层领导……这个组织的一名成员……是阿尔杰·希斯。”这个消息轰动了这座城市，据说，华盛顿官方“带着愤怒和怀疑的神情大吃一惊”。萨姆·雷伯恩秘密地告诉一位记者说：“在这次对共产党的调查中有一个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新闻，不要怀疑这一点。”

不过，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杜鲁门被问道，他是否认为国会山的“间谍恐慌”不过是用来转移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注意力的“一条红鲱鱼”，他回答说同意这种看法。这次听证会是“遮掩他们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情的一条‘红鲱鱼’……他们正在诽谤许多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

记者问，他们是否可以引用他的话。杜鲁门答道，是的。这更进一步地增加了他的麻烦。

一个星期后，随着国会特别会议的闭幕，他又上了另一位记者的钩，不过这一次却对他有利。你认为这是一届“不干事”的国会吗？杜鲁门答称：“完全正确。”他认为，对第80届国会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恰当的名字。

在白宫的楼上，这座老建筑物的塌陷问题不再是理论上的了。玛格丽特的起居室、即他书房对面的那个大厅的地板已经在她的钢琴下方出现塌陷。总统被告知，他自己的洗澡间也面临坍塌。然而，这些都没有被泄露，它们将不会被泄露，直到选举之后。玛格丽特回忆说：“你能想象新闻界会对这件事做些什么吗？他们会对哈里·杜鲁门群起而攻之。”

8月10日，他向他妹妹报告说：“玛格丽特起居室的地板已经裂成两半，不过尚未深及家庭餐室的天花板。他们把它撑起来，固定了一下。现在，我的洗澡间也要塌陷到红客厅里去了。他们不让我睡在我的卧室里或使用洗澡间。”

他补充说，他现在睡在林肯卧室中，在“老艾贝的床上”，并且发现它相当舒适。

## 十四、一线生机

这将是迄今为止任何总统所进行的最伟大的竞选运动。不论输赢还是平局，人民都将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

——杜鲁门写给他妹妹的信，1948 年秋

### 1

“费迪南德·麦哲伦”号是有史以来为美国总统专用而准备的唯一的一节私人列车车厢。它长 83 英尺，车身涂着普尔曼公司的标准的墨绿色，建造于 1928 年，最初只是作为以著名的探险家如马可·波罗、戴维·利文斯敦、罗伯特·皮里等命名的几节豪华车厢中的一节，后来在 1942 年由政府接管，供富兰克林·罗斯福战时使用，当时它被完全大修改造成了一座活动堡垒。

它的窗户只有 3 英寸，装着防弹玻璃，整个车厢，包括它的两边、车顶、车底、前后端和门，都包在装甲钢板中，结果，它重量达到 142.5 吨，或者说就像一个火车头那么重。为了支撑这种重量，不得不建造了特殊的车架和车轮。

战争期间为了安全起见，显现在车身外部的仅有“普尔曼”一词，1948 年时，它仍在那里，外表上唯一不同的是固定在车尾平台处的总统徽章以及安装在平台顶部的 3 个扩音器。

车厢内部，一切设计都以舒适为宗旨。前端有厨房、餐具室、佣人的住室以及一个用橡木板装嵌的餐间，它兼作总统的会议室，里面摆放着几个瓷器橱、一张红木餐桌以及 6 把黄绿条缎面的红木椅。由此向后，沿着一条侧面的走廊，是写有 A、B、C、D 的 4 个卧室，中间的两个卧室，即 B 室和 C 室，是带有澡盆和淋浴的总统套间。为第一夫人准备的 B 室是淡红色的。总统的房间 C 室则有暗绿色的墙壁、地毯，以及装饰着缎面的镀铬固定家具。

走过卧室，在车厢尾部是一个摆有蓝色和褐色椅子以及一张蓝色沙发的观光起居室，墙上覆盖着引人注目的淡棕色类似翻毛皮的材料，窗子上和门上挂着蓝色天鹅绒的帘子，出门便可登上车尾平台。地毯是暗绿色的。

整个车厢都有空调，在现有的巨大重量上又给降温系统增加了约 6 千磅的冰，每个房间内都有电话，只要火车停站，电话便能接在铁轨旁的引线上。

对于喜爱列车和喜爱游览这个国家的杜鲁门来说，它是旅行的最佳方式，也是自他成为总统以来不断享用的一种方式。在陪丘吉尔去密苏里发表“铁幕”演说的途中，他曾与丘吉尔有过一个难忘的扑克之夜，6 月份，又有过漫长的“非政治的”西部巡回旅行。最近，他又作了一次快速的密歇根一日行，在底特律的凯迪拉克广场上发表了一个劳动节演说，从而开始了他谋求连任的竞选运动。然而，就他走过的所有里程来说，就他在“麦哲伦”号上度过的日日夜夜来说，这些以前的远征不过是 1948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上午开始的漫长的旅程的序曲而已。当时，在 17 节车厢的专列末尾，“麦哲伦”号正等待在华盛顿联邦车站那多孔的天棚下方的 15 号铁轨上。6 月份，他曾行驶了 9000 英里。如今，在将会以“短暂逗留式的竞选运动”而闻名的旅程中，他将要旅行的全部路程据说是 21928 英里，几乎能绕世界一圈——几乎与麦哲伦的航程相等。

这个主意是他自己的。他曾说，“我想见见人民。”这次旅行有 3 条主

要路线：第一条是用 15 天时间再次横跨全国前往加利福尼亚；接着用 6 天时间作中西部的旅行；然后，最后的一条路线是在东北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作 10 天精力充沛的旅行，并回一次密苏里家乡州。

查利·罗斯回忆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深藏不露的打算，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计划，根本称不上是政治分析家语言中所说的什么‘高战略’。”总统只是在一场高度紧张而又毫无宽恕的竞争中向全国申诉自己的理由。里程便意味着群众。

据罗斯说，杜鲁门最初打算走遍所有 48 州，包括最南部的那些州。“他对于在南部各州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家乡去勇敢地面对他们的这种前景很感兴趣。”（在被问到他希望南部受到怎样的接待时，杜鲁门回答说：“噢，当然是礼遇啦！”）

去南部旅行的主意一直坚持着（罗斯写道），因为它能显示出“老板”有勇气，不过这项计划最终被取消了，理由是每一分精力都应被用在有望获得实际政治成果的地方。总统的政治勇气已经被充分地展示了。

这样，在总共 33 天、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麦哲伦”号将成为一次快速运转的政治巡回演出的中心舞台，不过这次巡回演出正如报道所说，仅有一幕，而且这一幕也仅仅是围绕着一个演员而设计的。一位随行的记者写道：“我们的演出所到的城镇比‘欢乐世界’和‘布伦克的小丑们’所到的城镇还要多……而且我们工作的时间也比他们长。”对于离开了白宫的杜鲁门来说，这节庞大的私人车厢成了他的家、办公室、总统指挥中心、竞选总部，以及他一天接一天地以某种方式勇敢地、几乎是不可思议地使希望的火花不熄灭的地方。

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总统走出这么远的距离去寻求人民的支持，或是没有更充足的理由便寻求这种努力、让明达的舆论来做出评判。此后也不会再有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去试图从事这样一种乘火车旅行的竞选运动。

作为对他这样一位职业政治家的技能和判断力的考验（还不必说对他这样一位 64 岁的人的耐力和身体状况的考验），正如他自己所清楚地知道的，在他漫长而通常是很困难的生涯中，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一次。与他的公共生涯或迄今为止的总统生涯中的任何其他事件相比，这一次将更能揭示他是怎样的一种人。

他对自己班子的全体成员说：“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将是严峻的，但这正是这一次所要采取的方式。我知道我可以忍受，我只是担心我会折磨死我班子中的某些人。我非常喜爱你们所有的人，因此我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

这列火车的其余部分是由几节餐车、休息车厢、卧室车厢、一节记者车厢、一节提供电力的发电机车厢以及一节通讯车厢（由通信兵部队负责操作的一节用行李车改装的车厢）组成，在通讯车厢中，无线电传打字电报与华盛顿、因此也就与世界其他地区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对杜鲁门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已经对柏林的局势感到越来越不安。9 月 13 日夜，他私下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距离战争非常接近。”

安全是一件主要的事情。每一个平面交叉道口都必须由秘密保安部门事



先检查过。一列向导列车——由一个火车头和一节车厢组成——行驶在总统专列前面 5 英里处，以“承受”任何可能出现的麻烦。自沃伦·哈定时代以来就一直负责总统出行的管理工作的那位铁路官员承认，他精神紧张得都要崩溃了。他告诉一位记者说：“在专列通过时，每一个交叉道口都必须由人来操作，我简直无法告诉你在我们开动之前到底要搬动多少道叉。”一旦开动，这列火车就将在“pOTUS”即“美国总统”的代码名称下行驶，这个代码使它在全国各地的铁路上享有优先行驶权。

杜鲁门喜欢列车快速行驶。罗斯福因身体虚弱，在乘“麦哲伦”号旅行时喜欢选择每小时不超过 35 英里的平稳和轻松的速度。杜鲁门则喜欢列车开到约 80 英里的速度。

当他的轿车小心翼翼地穿过人群间的缝隙，吃力地来到联邦车站的大门口时，聚集在车站月台上的规模不小的入群中发出了欢呼声，这声音在车站的拱顶下回荡。杜鲁门踏出车门，显得“精神矍铄”，玛格丽特紧跟在他身后。马歇尔和巴克利已前来为他送行，第一夫人将在得梅因加入这个旅行团的行列。

查利·罗斯、克拉克·克利福德、马特·唐内利、乔治·埃尔西、查利·墨菲、白宫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以及总统的秘书罗斯·唐韦全都在场，并准备登上火车。此外还有几位白宫速记员，还有帮助起草演讲稿的乔纳森·丹尼尔斯，以及 3 位新的演讲起草人戴维·M·诺伊斯、艾伯特·Z·卡尔和约翰·富兰克林·卡特。杜鲁门的老友和助手、曾任职于杜鲁门委员会的堪萨斯市的比尔·博伊尔像马特·康内利一样，将掌管政治杂务。

整个白宫班子加上秘密保安人员小分队、44 名记者和 5 名摄影记者，全部随行人员达到约 70 人。唯一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哈里·沃恩，他应杜鲁门的要求，在竞选运动期间留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不与新闻界保持接触。

一切准备就绪后，杜鲁门和巴克利一同在车尾平台上摆好姿势照了最后的几张相。

巴克利激励他说：“摧毁他们，哈里。”

杜鲁门则说：“我打算努力战斗。我准备要狠揍他们。”以此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的劣势似乎难以扭转。随行的记者之一、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写道，杜鲁门竞选运动的障碍“显得像落基山脉那么突出”。亨利·华莱士和南方反对本党纲领的民主党人已把民主党分裂成了 3 块。可以想见，杜鲁门已经失去了纽约和南方。共和党人在 1946 年选举中的胜利是巨大的，而且自内战以来，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总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继续赢得总统职位。在华盛顿的宴会上，正如贝丝·杜鲁门曾听到的那样，人们谈论的是谁将进入杜威的内阁。华盛顿的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已在为出售自己的住房而开价。甚至总统的岳母也认为杜威会获胜。

在杜鲁门于 6 月份曾全力以赴争取获得支持的西部，各项预测显示，在 71 张生死攸关的选举人票中他最多能获得 19 票。仅有亚利桑那州似乎对杜鲁门来说是安全的，但它仅有 4 张选举人票，而西部对获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对农业选民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杜威得票率 48%，而杜鲁门的支持率仅 38%。但农民的选票也是必不可少的。

9 月 9 日，即杜鲁门的专列离开华盛顿之前的一个星期，一位受到广泛

尊重的民意调查人员埃尔莫·罗琅宣布，他的组织将不再进行民意测验，因为调查的结果已经如此明了。罗珀说：“我的调查的全部倾向都预示着托马斯·杜威将以悬殊的票数当选，因此我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转向其他事务。”最近的一次罗珀民意测验显示，杜威以“不可战胜”的44点领先于杜鲁门的31点。罗珀说，更重要的是，这类选举的结果早已确定了。

政治竞选运动基本上是遵循仪式的……1936年以来我们所搜集到的一切证据都表明：在竞选运动开始时领先的人也就是在最后获胜的人……显然，获胜者在发表竞选演说之前，在竞争的早期，便已确立了他的胜利。

竞选运动“基本上是遵循仪式的”不过是一种俗套的思想，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最近出版的一期《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一张杜威州长及其工作班子的照片，上方的大标题写道：“奥尔巴尼提供了杜威行政当局的预展。”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杜鲁门在劳动节那天在密歇根却吸引了数量众多的群众。10万人涌入了凯迪拉克广场。他乘坐火车和汽车驶过了大急流城、兰辛、哈姆特拉术克、庞蒂亚克和弗林特，对杜鲁门和他的白宫班子来说，这些地方的群众甚至更令人难以忘怀。马特·康内利回忆说：“凯迪拉克广场……是有组织的。但我们乘车从那儿到庞蒂亚克……从底特律到庞蒂亚克，我看到沿途的人群。这不是有组织的，许多人都走出了家门！”据警方估计，在杜鲁门于密歇根停靠的6站上，出动欢迎的人数总共超过50万。

在后来的年代中，欢迎杜鲁门的庞大人群经常被回忆说成是这次竞选运动最后几周的一种现象，但这却是一种错觉。他们从一开始就在那儿，在密歇根，在传说的共和党的艾奥瓦州——在达文波特、艾奥瓦市、格林内尔和得梅因——从9月18日开始，这是他前往西部的第一整天。

《时代》周刊报道说：“记者们感到迷惑不解。在穿越共和党的艾奥瓦州的全程中。大量的群众出动了……大量的欢呼声非常热烈。”

当天最主要的事件是在得梅因以西40英里的德克斯特举行的全国犁耕比赛，杜鲁门正午时分到达那里，在强烈的阳光下，站在一个高高的宽阔讲台的中部前方发表讲话，他的面前是一片脸庞的海洋，身后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犁耕记分牌，听众达到9万人。

长长的地平线上镶着正在成熟的玉米。这气氛就像是在美好的时光中举行一个庞大的乡村集市，到处都是身体健壮、丰衣足食、皮肤黝黑并且显然是正享受着生活的富足的人群；在和风中，尘烟翻卷处是更多的家庭乘坐着崭新的卡车和小卧车来到这里。在一片休耕的土地上，整齐地排列在那里的大约有50架私人飞机，它们那鲜艳的色彩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是共和党的群众。艾奥瓦有一位共和党的州长，国会中全部8名艾奥瓦州的众议员以及两位参议员都是共和党人。在上一次总统选举中，艾奥瓦州的10张选举人票投给了杜威。但是对杜鲁门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他的听众都是农民，他知道，在经济大危机中，艾奥瓦的农民曾投票支持罗斯福。

几年以前，在1934年当他第一次竞选国会参议员时，一位圣路易斯的记者曾写道：“在一场战斗中，这位文静的人能够也确实猛然爆发出毁灭性的火焰。”如今在德克斯特，他猛烈地抨击共和党的“特权迷……冷酷的人……”

狡诈的人”，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时代以来，还没有人听到过一位总统候选人讲这种话。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态度”上的区别：

你们记得大繁荣和 1929 年的大崩溃。你们记得 1932 年农民的境况曾变得如此令人绝望，以至在许多农业社区都发生了实际上的暴力。你们记得保险公司和银行接管了大量的独立小农的土地——22.3 万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农场……

我想知道有多少次在你们发现谁打你们之前，你们就已被人击中了头部？……

民主党代表人民。它发誓要致力于农业……民主党把人权和人的福利摆在首位……这些共和党的特权迷们是些冷酷的人，他们是狡诈的人……他们想要恢复华尔街的经济独裁……

许多人认为这些语言似乎出奇地陈旧，并且在这种明显的繁荣时期当中也不合时宜。《得梅因纪事报》指出了这种“在大丰收的年代充当广大听众的厄运预言家的不和谐性”。它说，杜鲁门悲哀地错扮成新的布赖恩，他的演说“既刺耳又蛊惑人心”。不过，他在某些十分具体的事情上却占了先。

6 月份，在修改农产品信贷公司（CCC）——联邦农业贷款机构——的章程时，国会加进了一项禁止该公司获得额外的谷物贮存仓的含糊的条款。这项条款被解释为是一项节约措施。但是，由于农民要获得政府的价格补贴就必须使用农产品信贷公司批准或拥有的仓储设备，因此，一旦小麦和玉米等谷物太多而现存的仓储设备装不下时，他们将遭受严重的损失。如果没有经批准的贮存仓来贮存丰收后的剩余农产品，那么对农民来说，大丰收可能就不会意味着繁荣，而是意味着严重的损失。

这项议案未遇民主党人的反对而获得通过，杜鲁门也签署了它。但那是在 6 月份，当时还没有人特别注意它。如今，一个大丰收年的前景已不再是假设的。尽管谷物的收获要到 10 月份才开始，但是在穿越艾奥瓦州的全天中，从清晨开始，专列上的人们所看到的景象除了丰收在望的农作物外几乎没有别的。艾奥瓦的说法是每英亩能产 135 蒲式耳的谷物。

现在，杜鲁门在德克斯特指责说，是共和党国会修改了农产品信贷公司的章程。杜鲁门说，共和党国会已“在农民的背上刺了一草叉”。共和党人没有阻止对谷物仓储的限制，“政府价格补贴的整个结构”处于危险之中。

他说：“我并非在要求你们投票支持我。投票支持你们自己吧！”这是他一再谈论的一个主题。经历了这件事情的记者们认为，广大的听众看起来很友善，但却没有被打动。可是以后怎样，谁知道呢。

随后，在讲台后面的一个帐篷里，穿着衬衣、汗流浃背的总统被安排在一把木制的折叠椅上，坐在铺着红格纹台布的一张长桌旁，与 30 位农民和他们的妻子一起品尝乡村炸鸡和获奖的蛋糕和馅饼。在被问到他是否愿意再次演讲，不过这次要以一种更为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时，杜鲁门同意了，并重新登上了讲台。

有人问道，他以前在密苏里他所在的那个地区能犁出最直的犁沟，这是真的吗？杜鲁门回答说，是的，不过那只是根据一位极其偏袒的证人、他母亲的说法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他说，在播种小麦时他确实有从未遗留过一块“漏播的地方”的名声。“我父亲总是习惯于对一块漏播的地方没完没了

地唠叨。”

他谈到了在格兰德维厄他驾驭的 12 英寸马拉多铧犁以及有时他是如何花 4 天的时间来犁一片土地。他不能回到那个时代去。“我不想把时钟倒转，我不想回到马和马车的时代、尽管我们的一些共和党的朋友想要这样做。”他说，并且这话引来了一阵热烈的喝彩声。

曾认为社鲁门此前的演讲“可悲”的《纽约人》杂志的理查德·罗维尔写道：“他惹人喜爱，而听众也兴高采烈。”

社鲁门那天早晨 5 时 45 分就起床了，在到德克斯特之前，他已停靠过 6 站并作过 6 次演说。离开德克斯特后，他又在艾奥瓦州的得梅因、梅尔彻和沙里顿作了演讲。《得梅因纪事报》报道说：“在每一站上，集聚在他的车尾平台听他演讲的听众比该镇的总人口还要多。”

在沙里顿，他说：“1946 年你们呆在家里，因此你们得到了第 80 届国会，你们所得到的正是你们应该得到的。你们没有运用上帝赋予你们的权利去控制这个国家。如今，你们将要有另一次机会。”

跨越了该州的铁路线后，在下一站、即密苏里的特伦顿，他说，他是在为普通人的福利进行一场十字军征战。晚上 8 时刚过，他到达密苏里的波洛，他告诉欣喜的听众。他原来没有确定是否能在这里停靠，不过最后铁路答应了。这是当天他的第 13 次演说，他的声音都有点儿嘶哑了。

第二天，9 月 19 日，星期天，在对家乡独立城作了短暂的访问后，他又上路了。当天夜里穿越堪萨斯州时，火车司机把列车开到了每小时 105 英里的高速上，杜鲁门坐在车厢休息室的座位上，认为开得太快了，他考虑到“麦哲伦”号太重，如果司机被迫突然刹车。将会对前面的车厢造成恶果。他平静地轻声让查利·罗斯给火车司机送去口信：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情，每小时 80 英里的速度合适。

“当我谈到共和党人的作为时，请理解我。我不是在谈普通的共和党选民。”在丹佛，杜鲁门告诉散布在州议会大厦草坪上的 2.5 万听众说。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是好人。然而，共和党选民个人与共和党的政策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当共和党领袖们控制了政府后，某些事情便在他们身上发生了……

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有一种对人民的呼声装聋作哑的习惯。在听取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民正在说些什么时，他们感到很难忍受。但在听取华尔街正在说些什么时，他们却毫无困难。他们能够听到大企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最轻微的耳语声。

他只有一项战略——进攻、进攻、进攻，把战斗带到敌人的阵营中。在科罗拉多州的大章克申以及犹他州的赫尔珀、斯普林维尔和普罗沃的演说中，他无情地锤打共和党人。在盐湖城，面对在巨大的摩门教堂中只有站席的一群听众，他指责说：“自私的人总是力图从我们国家的资沅中揩油，以满足他们的贪婪。而……在这种努力中，（他们的）工具一直是共和党。”在奥格登，他警告那些“在华尔街有办公室的吸血鬼们”。在内华达州的里诺，他说，第 80 届国会是由“一帮仍然生活在 1890 年的老顽固们”来指挥

的。

这个国家绝不能走回头路，他要一直这样反复地说，因为他从心底感到美国人民是向前看的人民，而他自己的计划，正如他早些时候曾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的那样，是一个向前看的计划。如果共和党老卫士派夺取了对一届共和党政府的控制权，他们就会粉碎新政府所取得的进步，并在对外事务中退回到孤立主义去，这对国家和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他确信这一点，并决心使它不会发生。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斯维尔，面对站在南方太平洋公司的铁轨两旁的听众，他声称共和党的“一事无成的国会试图”通过停止公共拥有的输电线路的拨款，“把你们闷死在这个谷地中”。他告诉弗雷斯诺的公民：“你们在这个地区有一个糟糕的国会众议员。他是最糟的人中的一个。”他指的是共和党人伯特兰·W·吉尔哈特，此人曾在众院大会上谴责过乔治·马歇尔。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记者罗伯特·多诺万后来把杜鲁门的竞选运动的特征归结为“正面批评共和党和政策保卫新政自由主义的尖锐演讲，与诡辩术、堆积得比干草堆还要高的废话以及沿铁轨激烈奏响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混合在一起”。

杜鲁门在听众较少时状态最好，而且不要讲稿，通常这时的主题是他本人、他的家庭、他自己以前的背景及对生活的看法。他被某些东部的记者描写为“饲料磨机式的演说家”，与小城镇的群众在一起时，“的确非常出色”。查利·罗斯认为，这些“小型演讲”比那些重要的演说更重要。“它们使他与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科罗拉多州的大章克申和盐湖城的摩门教堂中，他缅怀起他的外祖父所罗门·扬及其在大平原上的历程以及他与市里格姆·扬的友谊。在盐湖城，他感情冲动地说：“，我真希望我的外祖父现在能看见我。”听众最先是发笑，接着又爆发出持久的掌声。他说：“那些先驱者们有信仰，他们有干劲。”好像他自己的身上也体现了用不完的这两种品质似的。

尽管他拒绝戴印第安人战斗时的羽毛头饰，也拒绝吻孩子们，但他一直很感谢在一站又一站上人们客气地送给他的礼物——帽子、马刺和一篮篮的水果（“从现在起，直到我到达华盛顿，我得一直吃这些桃子”）。对于地方的风景、地方的历史、地方的成就和利益，他几乎总是有话要说。

他们告诉我（在莫哈韦他说），1883年——这一年我还没出生——一位名叫韦伯的绅士就在这座城镇里建造了10辆豪华而巨大的四轮马车，自己又买了100头骡子，然后开始从莫哈韦荒地中往外拉运硼砂——这就是我小时候一直保存在家里的“二十头骡子的硼砂队”的起源。我从未想到自己会作为总统来到这个它起源的地方，并向你们的人民谈论你们在这个国家的福利中的利益。

他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小城镇的美国、即他的美国的古老真理及道德的热爱。“当然，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的家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就不是非常忠诚的公民。我们都应该这样想，”他对犹他州的“美国同乡会”的忠诚公民们这样说。

在内华达州的斯帕克斯，他站在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下、装点得光彩夺目的第一流的音乐台上宣称：“你们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模棱两可的说法。

不论是我支持或是反对某件事，你们都会清楚。你们知道我坚持什么。”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过他所坚持的东西就是一个归人民所有和为人民办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享有的政府。

他获得了友善，也获得了欢呼。他的整个战斗也是如此。

他一次又一次地说：“你们即是政府。现实的政治即是政府。政府始于基层。”“我认为政府属于你和我这样的个人公民。”“我把这次旅程称作一次十字军的征战。它是一次人民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十字军征战，如果你们支持我，我们就将获胜……”

“这次竞选运动的基本争论点再简单不过：它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抗人民的问题。”“我来这里是从事一项严肃的使命，由于它如此严肃，我打算尽可能简单明了地向你们说清。”“1946年，你们知道，你们之中有2/3的人留在家中，没有投票。你们想要变革，结果，你们得到了它。你们得到了变革。你们得到的完全是你们应得的。”“如今，运用你们的评判权，让人民保持对政府的控制……”“我不是只想让你们投票支持我，我是想让你们投票支持你们自己，如果你们投票支持你们自己，你们也就会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

通常，人们从清晨起便聚集到车站，等待他的来临。男人和孩子们会攀在屋顶或附近的信号塔上，以便能够看得更清楚。还会有一支高中的乐队站在一旁，准备演奏国歌或“向总统致敬”，或困难地演奏密苏里华尔兹，这支曲子杜鲁门特别不喜欢，但却注定要重复地听上几百次。他的专列在站上一停，乐队就会高奏起来，人群也欢呼起来。接着，在三四名当地政治家——通常总有一名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或在前一站登上列车的州民主党主席——的陪同下，杜鲁门从蓝色天鹅绒的门帘后走出来，登上月台，群众（有时多，有时少）会再次欢呼。然后，一位当地的政治家向人们介绍这位美国总统，群众会又一次欢呼。

在10分钟的停站期间，他会讲上5分钟，一般是以赞扬那位当地的国会候选人或某些当地感兴趣的问题开始，然后很快地从普遍的问题转向具体的问题。他会严厉地谴责共和党国会支持生活费用上涨或未投票支持谷物贮存仓，谴责它支持塔夫脱—哈特利法或“富人税收法案”、削减联邦对西部灌溉和水电计划的资助，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在阻碍加利福尼亚中部谷地的进步。共和党人的心目中对西部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对水利没有兴趣，对公共电力也没有兴趣。控制着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们、联邦中部谷地计划的未来所依赖的这些人不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们也不是西部人：“他们是东部的共和党人。”

“狠揍他们，哈里！”人群中有人会这样喊道——新闻报道中所说的他对巴克利的允诺“狠揍他们”，如今已席卷了这个国家。这个呼声在一站又一站上响起，通常还不止一次——“狠揍他们，哈里！”——这呼声总是引来更多的呐喊、笑声和赞同的叫声，尤其是当他猛烈地攻击第80届国会时。

（“我从没有狠揍过谁，”他后来曾说，“我只是告诉了人们真相，他们就认为这是狠揍。”）

最后，他会问是否他们愿意见他的家人，人们从未以拒绝来作答。这种固定的程序成了一种规范。他首先介绍贝丝——“杜鲁门夫人”——她会从蓝门帘后走出来，显得高兴而慈祥。他拉着她的手，然后她默默地站在他的右边。如果群众较少又很友好，他会把她称为“老板”。接着，他再自豪

地介绍“玛格丽特小姐”，她的出场总是引来所有人的最强烈的欢呼声，这显然使她的父亲很高兴。她总是抱着一把玫瑰花，并把其中的几枝抛向人群。杜鲁门会屈身从铜栏杆上方与一两个人伸出的手相握。有人会给那支当地的乐队发出信号，让它们再次开始演奏，随着汽笛的警告声，记者们重新登上火车，群众欢呼，杜鲁门一家三口挥手，列车便慢慢地驶离这个车站。

理查德·罗维尔写道，不论这次竞选运动的结果如何，上百万美国人在他们的余生中将会记得“杜鲁门一家三口的旅行”这最后的场面。

这将是一幅值得珍爱的画面，它会在杜鲁门的余生中都于他有利。和他一起旅行，你会获得这样的感觉，即那些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见过他和听过他演说的美国人，将会愿意给予他一切他想要的东西，除了总统的职位之外。

也许还可以说，他们亲自听过和见过一位和善而坦率的总统，他忠于他的党，喜爱他的家庭，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他们的人，他相信政府的事情就是他们的事情。当他身处困境时他并不抱怨，而是勇敢地、一心一意地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履行他所理解的自己的职责，同时他也非常愿意来到他们中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的信念就是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谈话方式也就是他的谈后方式。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他在一个短语办一个名字上卡了壳，他会吃力地再试一次，而他们也会笑他。

“人们对杜鲁门有着一种一致的热情和纯朴，这是真的。”理查德·斯特劳特在《新共和》杂志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他补充说，总统专列也许是探测舆论的最糟糕的地方。“不过，记者在报道群众的规模及其热烈的欢迎场面时，心里一直是不舒服的。”

在洛杉矶吉尔摩体育场，影星劳伦·巴考尔、汉弗莱·博加特以及罗纳德·里根——所有狂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都坐在台上他的身旁，杜鲁门激烈地抨击亨利·华莱士，警告自由派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认为投票支持第三党就是投票支持和平的话，那可要“三思”。由于共产党人“指导并利用”了它，因此第三党并不代表美国的理想。投票支持华莱士只会做对共和党“反动势力”有利的事情。现在，是美国的自由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了。“三思吧，不要浪费了你们的选票。”

在圣迭戈，尽管气候恶劣，又是上午9时这种很早的时间，仍有1万人出动，给了他迄今为止最热情的欢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申赛德，专列在能见到太平洋沿岸翻卷的浪花的景色中行驶，从这站开始，行程又折向了东方。

到此时、即9月24日、星期五为止，他已在旅程中过了一周，当同行的某些人已开始显露出过度疲劳的迹象时，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的杜鲁门却安如磐石。他没有丢开椭圆形办公室的职责和事务。每天都有一个白宫邮袋到达，里面装着需要他签署的文件、需要签名的信件、需要阅读的信件、各部首脑的报告、给国会的报告、标着“机密”的封了口的马尼拉纸制的信封，以及《堪萨斯城明星报》和《独立城考察家报》等报刊。来自白宫总管豪尔·克里姆的一份备忘录报告说东厅脱落了大量的墙灰。

柏林危机和空运所包含的风险沉重地压在杜鲁门身上。尽管8月份以来

运入这座城市的供应品数量增加了，但令人烦恼的事实是，空运的供应品还不足柏林需求量的一半。克莱将军打来电报说：“我们似乎坚持不住了。”几天后在达拉斯，应杜鲁门的要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悄悄地登上了专列，把他对斯大林的心境及战争机会的评估带给了杜鲁门。

在列车上，白宫班子的工作已形成了一种模式，虽然它不系统、效率也不怎么高，甚至不那么正式。在主要的演讲中，只有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的那一次是预先准备好的。其他的演讲——在丹佛、盐湖城、洛杉矶——都是在行进中由罗斯、克利福德、埃尔西、墨菲及3位新笔杆子诺伊斯、卡尔和卡特共同准备的。没有一份讲稿是一位作者的成果，也没有一份讲稿没有经过反复修改。杜鲁门本人对每一份草稿都逐行审查，“刻苦”工作，并且是第一个同意建议删除某些部分的人。“这样好，”他会说，“能用一个词很好地表达，就绝不要用两个词。”复杂的句式和浮夸或模棱两可的词他最不喜欢。当这群人围坐在“麦哲伦”号的餐车的红木桌旁，一直工作到深夜时，他会说：“那不是我讲话的方式，咱们还是说咱们要说的话吧！”

罗斯写道：“没有任何人对讲稿的写作活动拥有特别的自豪感，不过，我们的确不时地陷入激烈的争论。总统会咬着牙说：‘好吧，你们这些家伙去争个明白，我将作决定。’”罗斯想让杜鲁门缓和这种辱骂人的语言，以一种更尊贵的方式来申诉他的理由。可杜鲁门却决心保持这种刺激性，他还增加了一行让其他人都感到畏缩的住房短缺的内容。杜鲁门将微笑着告诉听众，如果他们在11月2日都去投票和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他就不必去“围绕着这类住房短缺的问题拼命搜寻了”，他就能端坐在白宫里。这是他喜欢的一行内容，他肯定人民也会喜欢，因此，他保留了该内容。

背景材料，特别是用于车尾平台上发表的那些材料，是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调研部”提供的。它是由蛰居在华盛顿杜邦广场旁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的三四名“聪明的年轻人”组成的，据乔治·埃尔西说，他们“像狗一样地工作，并苦心准备出了数量多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材料。各类历史、文学、政治和经济资料都来自他们，还有新闻剪报、有用的文件的影印件，以及一切能给杜鲁门总统竞选运动的效果增添火花、生气、新颖和活力的东西。”

埃尔西的任务是把所有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辑，然后拿有关的资料供总统从中挑选，并在它们快速传递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次序。他回忆说：“我成了‘小火车站的站长’，做的工作是编写大纲，把这些材料整理在一起，然后把它们拿到后面供给他用。在竞选运动的那几周里，从我的车厢走到他的车厢，我觉得自己获得了25年的走步锻炼。”

比尔·博伊尔被称赞为对杜鲁门旅程的“每一英寸都做了计划”。他不断地与各州民主党领袖们接触，并告诉杜鲁门哪个城镇重要，为什么重要。

作为“先遣队”，在专列前方旅行的是内政部副部长奥斯卡·查普曼和白宫班子成员唐纳德·道森。他们负责地方欢迎仪式的一切细节，保证让地方政治家们知道在哪儿和什么时间登上杜鲁门的专列，因此，类似6月份在奥马哈空旷的礼堂的那种惨状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两站之间“麦哲伦”号上相对安静和清闲的时候，这位候选人内心保持着平和与毫不动摇的信心，他承受着的压力是冷酷无情的，但他没有显示出丝毫倦怠的迹象或退缩的征兆。他知道自己现在落后，私下他也这样讲。不过他也确信到11月份时他会赶上去并领先，到那时才算数——这种观点在



专列上几乎没有其他人持有，尽管除了报纸之外曾有几个人谈到这一点。

一次，在一个格外漫长的白天将尽时，显然疲倦了的第一夫人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他是否认为总统真的相信自己能获胜，克利福德回答说是的。

“他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出场演讲了。”克利福德说。

“唉，”她说，“我不晓得胜利来自何方。”

尽管他班子中的某些人特别担心民主党阵营内部的分裂——进步党人和南方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正在从事自己的竞选运动——可杜鲁门却好像从未将华莱士和瑟蒙德的总统候选人身份看作是严重的威胁。

亨利·华莱士正在拼命竞选。8月份，他曾勇敢地走遍南方去竞选，他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拒绝在实行种族歧视的饭店中下榻。在北卡罗来纳州，愤怒的群众用鸡蛋和烂土豆袭击他。在全国其余地区的行程，他主要是乘飞机，最终他走过的路程甚至比杜鲁门还要多，他贯穿始终的主要话题是：进步党是“和平党”，它能够通过与苏联的直接谈判来结束冷战。在洛杉矶，华莱士在杜鲁门演讲的同一个体育场发表演说，他吸引的群众比杜鲁门吸引的还多，但他们都是由进步党付钱的听众。站在华莱士一边并赞同他的演说的听众总数正在缩减，他的进步党的“十字军征战”的激情明显地在下降，因为人们发觉他——报刊上越来越多地把他描写为——“正在帮莫斯科的忙”。他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政策都“同样的险恶”，都是由华尔街和五角大楼来掌握的。

斯特罗姆·瑟蒙德则反复地谈论州权，要求把民主党领导层中的“邪恶势力”“驱逐出去”。他把杜鲁门的公平就业委员会称作是“共产主义的”，在武装部队中取消种族隔离是“非美国的”。南方必须坚守战线。“军队中并没有足够的部队来摧毁种族隔离而让黑人进入我们的家庭、餐馆、游泳池和剧院。”瑟蒙德说，他和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将赢得南部的140张选举人票，这些票数足够左右众议院中的选举。不过，几乎没有任何人看重他的这些话，杜鲁门尤其如此。

在各次演说中，杜鲁门从未提到华莱士和瑟蒙德的名字。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主要演说中，还是在边远地区对人数很少的听众发表的大量即席讲话中，他也从未提及过杜威的名字。提到杜威时，他总是称“我的共和党对手”或“另外的那个家伙”。

他从未在人身方面对杜威进行批评和奚落。有意思的是，杜威甚至从未成为“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上讨论的一个主题。没有谈论过杜威的个性或弱点，也没有关于他的流言蜚语或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任何考虑。人们不记得总统曾提到过杜威。

## 2

9月19日，星期天，杜鲁门离开华盛顿的两天后，托马斯·E·杜威州长在奥尔巴尼登上了他自己的竞选列车。20日，星期一，即杜鲁门在德克斯特犁耕竞赛上发表演讲后两天，杜威也在艾奥瓦州的得梅因发表了他的首次重要演说。杜威比杜鲁门晚出发两天，他以一种更为悠闲得多的速度前进，没有再到过与杜鲁门相距这样近的地方。他发表的演说也远比杜鲁门的少得多——所有演说，就像杜威竞选运动的一切事务一样，都是预先精心考虑好的。正如这位候选人及其顾问们骄傲地告诉新闻界的那样，一切都是经过考

虑的。

新闻界对杜威跨越全国的进展的报道也远比杜鲁门所获得的要多。乘坐“杜威胜利专列”的记者有92人——当列车到达加利福尼亚时有98人——大约是与总统同行的记者人数的两倍，并且他们还享受食品供应，他们的日常需求管理得有序而且有效，这是杜鲁门专列上从未听说过的。这位候选人的演讲稿副本几乎总是提前24小时便能拿到，而在杜鲁门的专列上却很少能够得到这类副本。一个国内公共演说系统直接把杜威的讲话稿送到新闻车厢和餐车上，因此，记者们无须为离开空调的舒适而烦恼。咖啡和三明治每单数小时都向记者们提供，他们的衣服有人管洗，如果停站过夜，他们的行李有人负责从火车上搬进旅馆。对于那些与两位候选人都一同旅行过的记者来说，比较起来，杜鲁门专列的运转要落后时代40年。

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上告诉他的读者们说：“如果你想说任何东西（在杜鲁门专列上），你就得自己在普尔曼盥洗盆中洗。”

当在某地停车过夜而下车时，完全得自顾自。你拿着自己的行李袋，凑合着去找饭吃。如果有人是职责的奴隶，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听听总统在车尾平台上的演讲中讲了些什么，那么他就得爬下专列，跑到列车尾部，夹杂在群众中去听。通常，这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因为总统习惯于在深夜对危险地聚集在路基各个部位上的听众发表讲话，而路基修筑得比周围地面高出15或20英尺。当地人知道地形的情况，可记者们却不知道，结果，不止一位记者跌倒在表面粗糙的路堤上。

许多报道杜鲁门及其竞选努力的文章带有一种屈尊俯就的调子。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他的全部竞选运动被许多随行的东部记者赋予了“一种土包子的名声”。相反，杜威的竞选运动则被描写为“第一流的”，“井然有序”，“生气勃勃的年轻行政官员”掌管着一切。在“杜威胜利专列”上讨人喜欢的饮料是马提尼酒，而不是杜鲁门专列上的波旁酒。最受欢迎的游戏是桥牌，而不是扑克。杜威本人则沉着、细心、“极其自信”，并且从一开始在语调上就很高尚。

“今晚，我们开始了一项团结美国的竞选运动。”在得梅因他告诉群众说。据报道，他在此地以强有力的51点比37点领先于杜鲁门。

杜威说：“我们准备在华盛顿建立一个相信美国人民的政府，一个同情地理解他们的需求并有能力满足他们的政府。我们将重新发现我国人民的基本团结及使我国变得伟大的精神力量。我们将再次肩并肩地开始前进……”

讲话中没有刺耳和造成不和的谴责，没有农民反对华尔街的斗争，没有背上的草叉或对任何政府部门和社会集团的愤怒而声音不连贯的攻击。

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奥古斯特·H·安德烈森曾写信就农民中的不满警告杜威说：“没有农民的选票我们不可能获胜。”但是杜威仍然根本不提农业问题。

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就像最温和的广播布道者那样侃侃而谈——所有这一切，在杜鲁门的声音中都不具备。杜威是高贵的，他既未贬低任何人，也未冒犯任何人。他很少有令人震惊的话语，他不冒任何险。这种模式占据了演说的大部分，他演说的内容并不比一本公民学入门书更能使入党醒。

“政府必须援助工业，工业则必须与政府合作。”他会像一位崇高的布道者那样挥着右臂说。

他也会说：“美国的未来就在我们的前面。”

它们不是 1944 年时他所发表的那种演说，那时，他激烈地抨击并经常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未能结束经济大危机，未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建立美国的防御。有一次，他把罗斯福称作是真正的“不可缺少的”人——“对于现在组成了新政派的那些城市老板、共产党人和职业官僚们的草率拼凑而成的渴望权力的联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一次却没有这种夸夸其谈，因为这一次杜威不是挑战者，这一次他已经垄断了选举。

这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角色颠倒，在职总统像个挑战者似的在进行竞选，而他的对手则表现得就像是他已经当选、竞选运动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手续似的。杜威只顾原地踏步、小心谨慎、不出错误、不说不做任何愚蠢或不合时宜的事情，那么总统便非他莫属。

这样，他的演说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积极调子。他赞成团结，赞成和平，赞成“建设性的变革”。他不是在进行反对新政的竞选。他甚至不是在进行反对杜鲁门的竞选，他从未提到过杜鲁门，至少不比杜鲁门谈及他的时候多，这又是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颠倒。当“胜利专列”驶越加利福尼亚，在某一时刻与杜鲁门的专列在几英里的距离上擦肩而过时，《纽约时报》报道说：“杜威州长有意避免与民主党在职总统进行任何激烈的论战。”

在某些方面，两位总统候选人又极其相似。对于时间，他们都能充分利用，都很机警，也都是精力充沛。他们的穿着都极其整洁并精心地熨烫过。他们都是中等身材，尽管常被诋毁为“矮个男人”的杜鲁门要比 5.8 英尺的杜威高出 1 英寸。但是不像杜鲁门那样，杜威对他的身高极为敏感。

他们俩都是勤勉的职业公务人员，都真心地相信优秀的政府和最佳的政治是可以得到的。他们都喜爱音乐。杜鲁门曾梦想当一名音乐会钢琴演奏家，杜威则想成为一名音乐会歌手并仍在热爱着歌唱（特别是在浴缸中高唱“俄克拉荷马”）。两个人都专心于他们的家庭。杜威的夫人弗兰西斯是一位有点羞涩但风度迷人的特别上相的女人，一般认为她是他政治生涯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们有两个 10 多岁的儿子：小汤姆和约翰。

像杜鲁门一样，杜威也是美国中部小城镇的产儿。他成长于密歇根州的奥沃索。他父亲是当地报纸的编辑，对政治极感兴趣，就像约翰·杜鲁门那样。

不过，超出这些之外，这类相似性也就消失了。杜鲁门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 19 世纪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代的思想和观念中成长、受教育并成型——杜威则是不同的一代。杜威从未经历过农业债务的负担；他从未参加过战争，从未经历过破产。他生于 1902 年，比杜鲁门晚了 18 年，他是第一位出生于 20 世纪的总统候选人。此外，他的中部美国人的根迹也不再明显了。他受教育于密歇根大学和纽约的哥伦比亚法学院，他已使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扎根于东部；戴着翘边帽，用那高雅的声音谈吐，他已把奥沃索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杜鲁门就像内利·诺兰所说，“始终是一株迟开的花朵”，只是到了 50 岁出头才获得了声望；而杜威几乎从一开始就飞黄腾达，还是在 30 岁上就作为一名纽约州具有讨伐精神的地区律师赢得了全国性的名声。他是一名“侦缉犯罪集团者”式的民族英雄。1938 年，36 岁时他就首次竞选纽约州长。1942

年再次竞选后，他成为 20 年中纽约州的第一位共和党州长。1946 年竞选连任时，他获得了该州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赢得了近 70 万张选票。

作为州长，他削减了税收，把州对教育的资助增加了一倍，提高了州雇员的薪金，减少了该州债务总额 1 亿多美元，并通过了全国第一个禁止就业中种族歧视的州法律。如果这次当选，46 岁的他将成为西奥多·罗斯福以来最年轻的总统。以他的年轻、抱负及已证明的能力来看，可以想象，托马斯·E·杜威可以服务得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职的时间那么长，甚至会长于后者。如果他能有 4 个完满的任期，那么直到 1965 年他都会在白宫，即便到那时，他也比 1948 年时的杜鲁门要年轻。

不过，正如通常人们注意到的，杜威在举止上极其谨慎和冷静，至少在对于政治家非常重要的公共场合下是如此。在竞选的路途中，他似乎不在意人们送给他的礼品，也不在意与听众打成一片。杜鲁门在月台演说结束时会说：“你们愿意见我的家人吗？”而杜威却生硬地说：“我很高兴向你们介绍杜威夫人。”

1944 年在竞选途中的一个车站上，一位摄影记者曾高叫：“笑一笑，州长。”杜威答道：“我认为我在笑。”一位纽约的共和党政治家的夫人所做的一个评论曾被广泛地传播。她说：“你不得不清楚地了解杜威先生，以便厌恶他。”

他有着机械般的自制力——理查德·罗维尔写道，杜威走上台来，“就像被铸在模子里并被人从后面狠狠推了一把的人似的”——两只黑色的眼睛里具有一种难以对付的神态，这神态使他很像是一位检查官。他班子里的一位成员曾说：“这两只眼睛告诉你，这个家伙可不胡闹。”

正是杜威那“瓶刷”式的小黑胡子使公众能清楚地认出他，也使得很多人不喜欢，或希望他刮掉，因为胡子在公务人员中早已不时髦。他是在早年骑自行车在法国旅行时留出胡子的，之所以将其保留下来是因为他夫人喜欢。女演员埃塞尔·巴里莫尔认为，这胡子和杜威那矮小的身材使他看起来就像是“站在婚礼蛋糕上的新郎”，这个评论被西奥多·罗斯福的那位尖酸刻薄、多嘴多舌的女儿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斯广泛地扩散开来，它也许给竞选运动中的杜威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他专列上的记者们认为，他有点孤僻，甚至傲慢。他们都与他保持着距离，尽管他们确信他会赢——并且大多数记者相信他会成为一名胜任的总统——但却几乎没有人喜欢他，这与他们对杜鲁门的感情几乎完全相反。理查德·斯特劳特写出了新闻车厢中的情绪：杜威那“刻板的笑容……以及他温和地拒绝论及争论问题的态度，已经激怒了每一个人”。人们已经在讥讽，杜威是能够神气十足地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的唯一的人。

与从未想要成为总统的杜鲁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杜威早在 1939 年，即提名温德尔·威尔基为总统候选人的那届共和党大会之前就开始竞选总统。杜威相信，他的命运就是当总统。他私下曾说：“这是写在我的司令星上的。”

这也是写在民意测验的结果上的，并且对他具有重大影响，因为不像杜鲁门那样，杜威可是极其认真地看待这种民意测验的抽样调查。他是第一个拥有自己的民意测验班子的总统候选人。

作为一个自由派共和党人，杜威在一些主要问题上都持有与杜鲁门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杜威支持对希腊的援助，他也支持马歇尔计划。他相信需要一个强大的国防，包括实行普遍的军训。他赞成承认以色列。他支持柏林的

空运，并想要在民权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他和他的顾问们对形势的理解是：真正的斗争是在 11 月份以后，不是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而是与杜威极其厌恶的塔夫脱（人们不止一次听杜威说过，那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可能与他自己有肉欲关系）。

杜威竞选运动的首要战略虽然很少披露，但可以看出，是杜威本人的话——“当你领先时，不要讲。”这话他曾对登上他的列车的共和党政治家们说过。然而，“杜威最高指挥部”却比杜鲁门身边的人更有影响力。这个指挥部的成员包括竞选总管小赫伯特·布劳内尔，他的指挥部虽然在华盛顿，但他每天晚上都通过电话与杜威交谈；还包括杜威的老行政助理保罗·洛克伍德，以及埃利奥特·贝尔，后者是负责起草演说稿的杜威的老友，并在列车上担任非正式的杜威工作班子的首领。他们都是有能力、有经验的人。布劳内尔上一次就是杜威的竞选总管，也是共和党主席。洛克伍德自杜威任地区律师时起，就一直跟随他。埃利奥特·贝尔是《纽约时报》的前金融专栏作家，曾总了杜威竞选州长的两次胜利的竞选运动。

而且他们都同意这种说法，即竞选运动进行得很好。至此，尚无其他的共和党政治家不同意这种说法。贝尔回忆说：“我们一直问他们：我们的战略是什么，而他们都说不，照目前的情况看杜威肯定会获胜，要做的事情就是别挑起太多的争论，从而冒丧失选票的危险。”一致的看法是，如果杜威不像 1944 年那样去进攻，那么他就会比 1944 年做得更好。因此，为什么要去重复以往的错误呢？

《时代》周刊赞许地写道：“他的竞选运动的调子已经确定。”《时代》周刊像它的姊妹刊物《生活》一样，已经断定杜威会顺利当选。《时代》周刊报道说，杜威班子中真正关心的是，从现在起直到 1 月份杜鲁门可能做哪些事情来搅乱局势，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领域。“掌权的责任已经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肩上，以至一位记者态度平和地问道：‘杜威对于杜鲁门对政府的干预还准备容忍多长时间？’”

《生活》杂志说，杜威将保持镇静，“不论他的对手怎样辱骂、戏弄或激他到小胡同里去打架”。杜威自己评论说，他绝不会和杜鲁门“走到街上去计较”。他要选择一个更值得对付的对手。在他蛰居的专用车厢中，杜威曾大声惊叫道：“在政治上打败一个蠢人，难道不是比打败一个能人更难吗？”

为了帮助确保杜威获胜，J·埃德加·胡佛秘密向他提供了联邦调查局所能提供的一切情报。杜威和胡佛是老朋友，而且一直相处得很好。几个月前，胡佛曾将联邦调查局的人力物力供杜威调用，希望杜威成为总统时能提名胡佛任司法部长。“在那次竞选运动中，联邦调查局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损害杜鲁门的东西都给了杜威，用以帮助他，尽管这类材料并不太多。”胡佛的一位助手威廉·C·沙利文回忆说，他是负责挑选这些档案的人员之一。

我们发掘出总统以前与吉姆·彭德格斯特合作的材料……并试图造成杜鲁门太无知，没有处理渗透进来的共产党人的威胁的印象。我们甚至给杜威准备了以他的名义发出的研究材料，就像这材料是他和他的班子所写的那样……联邦调查局中没有任何人给杜鲁门提供任何获胜的机会。

杜威唯一想要嘲弄杜鲁门的是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问题。“我建议你们选举一个根本就不会首先去任命他们的政府。”杜威在一站又一站上这样说，而且总是博得听众们的掌声。

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圆形剧场，共和党的影星们——加里·库珀、珍妮特·麦克唐纳以及来自密苏里州独立城的金格尔·罗杰斯——坐在台上两侧，杜威向听众讲述了共产主义的进军。“灾难性的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自己的政府似乎太经常地丧失了对我们的机会自由的制度的信念，它鼓励这种共产主义的进展，而不是阻止它……共产党人及其同伙们（已经）升到了我们政府中获得信任的职位上……（然而）我们自己政府的首脑却把共产党人在我们政府中的暴露称作是‘一条红鲑鱼’。”

杜威并不想去燃起群众的激情。他反对剥夺共产党人的公民权。他说：“我们不会有思想警察。”但是，关于政府“溺爱”共产党人的指责，这种由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注入这次竞选运动的指责，仍会在几乎每一站上被一遍又一遍地提出。

约瑟夫·艾尔索普把这种典型的杜威演说称作是“过分重复”和“令人扫兴的琐事”。马奎斯·蔡尔兹则在他的专栏文章警告说，杜威在其“非常内行”的竞选运动中，可能“正在给自己的未来埋下祸根”。杜威的人私下对听众的规模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安，正如《时代》周刊所承认的，目前的情况是“好的——不过仅此而已”。在盐湖城，杜威的听众像杜鲁门的一样，挤满了摩门教堂，但沿街出动的群众却无法与杜鲁门到来时相比。“我们大约在下午5时到达盐湖城，”埃利奥特·贝尔回忆说，“我对下面这个事实感到吃惊：街道两旁的人很少——在街上行走的大部分人几乎都懒得看我们的车队一眼。”

在密苏里的尼欧肖，杜鲁门后来曾向听众描述了他最近的冒险，他说：“然后我们进入得克萨斯，每个人都认为，得克萨斯将会冷淡总统。”

我们停靠的第一个城市是埃尔帕索，埃尔帕索的每一个人都来到了车站上。警长说，他估计有2.5万人，接着我们受到欢迎，并与前副总统、我的一个好朋友约翰·加纳共进早餐，他请我吃了一顿值得大书特书的早餐。我们吃了鸡和白翅鸟，我们还吃了火腿、熏肉和炒鸡蛋、热饼以及我叫不上名字的好多东西。得克萨斯州长在那儿会见了我们，萨姆·雷伯恩也会见了我们，我们穿过得克萨斯州，在得克萨斯我肯定会见过100万人。

在他隆隆地驶过得克萨斯州的途中，杜鲁门似乎每一小时都增添了力量，每一站都使自己更加投入到竞选运动中去。他正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战，并且在这方面过得非常愉快。

萨姆·雷伯恩说：“在一长队人的后面他显得很自在，因为他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和他们一起微笑而不是讥笑他们，他和他们一起大笑而不是嘲笑他们。”

由于老南部的其他州因其民权立场而起来造反，杜鲁门不得不抓住得克萨斯州和它的23张选举人票不放。然而，种族偏见此时正盛行于得克萨斯——实行种族隔离、人头税、毫无掩饰的种族仇恨。到了得克萨斯，他就首次进入了南方反叛者的领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担心他会受到“冷淡”待遇的

原因。甚至有谣传说南方反叛者威胁他的生命，声称：“他们要枪杀杜鲁门这个狗娘养的糟儿子和他的民权。”这是第一次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发现必须向得克萨斯州献殷勤，杜鲁门指望与雷伯恩和加纳这类长期的有势力的民主党人的友谊，他决心使这场一个非得克萨斯人在那儿进行的最艰苦的竞选运动取得成功。

这次访问的一个高潮是“仙人掌杰克”·加纳在尤瓦尔迪为他举行的早餐会，记者们吃惊地发现，尤瓦尔迪是一个绿树成荫的城镇，碧绿的草坪干净整洁，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类似仙人掌之类的植物。早餐是在加纳的那座米黄色的大砖房中用玻璃封起来的门廊上举行的，杜鲁门后来告诉外面欣喜的群众说，这是40年来他吃过的最美的一顿早餐。那天清晨6时50分，一万群众和一支高中的乐队就已在尤瓦尔迪车站上欢迎了他。现在，当他站在门廊前面时，几千人欢呼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的有加纳、雷伯恩和博福德·杰斯特州长，这几个人中间，没有一个是因为民权奋斗而知名的（不久前，杰斯特曾把杜鲁门的民权计划称作是“背上的芒刺”）。

杜鲁门说，约翰·加纳和他是“很长、很长时间”的朋友，他们打算终生为友。“以后我打算再次来访，我已受到另一次邀请到这里来钓鱼，并且接受了它。”

换句话说，以往的友谊、以往的忠诚，不仅现在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将保持，而且今后也将保持下去，不论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听众们理解他的意思，并且报以热烈的掌声。

贝丝·杜鲁门对接待的这种热情感到兴奋异常，她打破了惯例，走到麦克风前说了声谢谢你们，《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报道说，由此可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时刻啊”！

同一天，即9月26日星期天的早些时候，在圣安东尼奥，估计有20万人走上街头欢迎他，当晚在冈特饭店举行的晚宴上，杜鲁门自然而朴素地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感情和他对和平的期望，他的演讲够得上是乔纳森·丹尼尔称之谓的“一篇近乎总统诗歌的雄辩”。

我们的政府是由人民组成的。你们就是政府，我只是你们雇佣的仆人。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的总统，这是这个星球上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但是，我是美国人民的仆人。他们不是我的仆人。我不能把你们喝来使去，如果你们在政治上不赞同我的意见，我也不能把你们送到劳改营去或者砍掉你们的脑袋。我不相信这些……

我相信，如果我们自己努力生活下去，我们就能够活下去；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持续地为和平而努力，就像那位老清教徒所说的那样，“保持你们的子弹擦亮、火药干燥”，那么我们最终将会在这个世界上取得和平，因为在我们生活于现代发明基础上的情况下，这是我们能够存活的方式。我们已经开始把这些发明利用于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人类的毁灭。

那才是我感兴趣的事情。那才是我正在为之奋斗的事情。

那些事情远比我是否是美国总统重要得多。

《圣安东尼奥快报》的头条标题写道：“杜鲁门以‘触动人心’的方式

获得了得克萨斯的选票。”当该《快报》的一位记者征求专列上随行记者们对竞选结果的看法时，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认为杜鲁门至少有“一线生机”。

在得克萨斯不足4天的时间里，他停靠了24站，作了25次演讲。在整个行程中，天气晴好，群众热情。9月27日、星期一，这最忙碌的一天是以清晨6时40分在圣马科斯发表车尾平台演讲开始的。这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奥斯汀、乔治敦、坦普尔、韦科、希尔斯伯勒、沃思堡、大草原城、达拉斯、格林维尔以及贝尔斯这个小火车站上发表了演说。在贝尔斯，他告诉听众：“我正要到博纳姆去……发表演说……这儿离博纳姆只有12英里——你们干吗不上车跟着一块儿到博纳姆去，在那儿我将开足马力赶上共和党人。我想你们会喜欢的！”博纳姆演讲是当天最后一个演讲，它通过广播向全国播放。

当天和他一起在专列上的有雷伯恩、杰斯特州长和国会参议员候选人、现任国会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他刚刚在初选的大约100万选票中以总共87票的多数击败了他的对手前州长科克·史蒂文森，而被该州民主党大会确定为候选人。

在韦科，当杜鲁门与一位黑人妇女握手时，一个男孩挥动着南方联盟的旗子，人群中发出了零星的“呸、呸”声。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和谐。不过，当时他也没有提及民权。

在达拉斯的南方人体育场，当局那天悄悄地放弃了种族隔离的做法，在欢呼的人群中黑人和白人混合在一起，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杜鲁门首次猛烈地抨击了共和党人“高层次”竞选运动——杜威演说——的虚伪性：

这样，在他们的演说中，他们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上，高到使他们超然于讨论人民面临的具体和严肃的问题之上的程度……共和党的竞选者们显然想用一首团结的催眠曲把美国选民们唱睡着……他们想要一种有利于全国制造商协会……不动产托拉斯……自私的利益集团的团结……他们不是在要团结，他们要的是投降。而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告诉人民：我不会投降……

博纳姆坐落在肥沃的黑土草原上，是萨姆·雷伯恩的故乡，在博纳姆，杜鲁门再次穷追杜威，说共和党的团结意味着国会中的塔夫脱们和马丁们的团结——“给富人减税方面的团结……让物价涨得比天还高的团结……削减新政的一切福利方面的团结。”杜鲁门问听众，这真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某些东西是值得奋争的……我们必须与孤立主义者和反动派作斗争，必须与投机商和特权阶级作斗争……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那些小家伙。我们认为大家伙们总是能很好地照顾他们自己……照看那些小家伙、使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这正是政府的职责。问问萨姆·雷伯恩，在他累死累活地为小城镇的农夫和人民能获得电力而苦干时，有多少腰缠万贯的大家伙帮了忙……

所有这些语言都是他的听众能够理解的。正如雷伯恩所说，他确实是“这些人中的一员”，而他们也让他知道了他们是多么赞同他的观点。



后来，在城西雷伯恩的那幢白木房子里举行的招待会上，数百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在房前的草坪上。玛格丽特回忆说：“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并且还在不断地来。”杜鲁门的秘密保安分遣队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走到欢迎队伍的前面去，除非保安人员能得到每一位来客的名单，这时雷伯恩高叫道：“我认识这里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孩子。”雷伯恩说，他们都是他的朋友，每一个人都是；他为他们每个人担保。

这样，杜鲁门就站在门前同他们握手，还不时地啜一口偷偷地兑了水的波旁酒，而雷伯恩也确实能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过，后来雷伯恩对州长惊叫道：“关上门，博福德，他们又来了一次。”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钱从未成为过问题。谈到杜威背后的大富翁，这是可以想见的另一个迹象，它表明杜威领先有多远、他的胜利是多么肯定——从理论上讲，大富翁是绝不会追随一个失败者的。可是要找到杜鲁门的支持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春夏季节，在为民主党人举行的几次白宫小型招待会上，杜鲁门本人曾请求财政援助（这是他所厌恶的事情），目的仅仅是在于使他的竞选运动能够开始。9月初在红厅举行的一次这种招待会上，他站到一把椅子上（以便更有效）说，他知道大多数人认为他会输，但是他认为美国总统应该有充足的资金使他能够向人民去申诉他的理由，然而事实却是：他不可能这样做。没有钱购买广播时间。他说，劳动节那天他在底特律演讲中最重要的部分被掐掉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继续广播。现在，也没有足够的钱来使总统专列开出联邦车站。据报道，他的恳求为他带来了10万多美元。

当杜鲁门请伯纳德·巴鲁克到财政委员会去任职时，巴鲁克拒绝了，说担任党派性如此强的一个角色，这不是他的方针这个回答激怒了杜鲁门，他在措辞尖锐的复信中写道：“大量的荣耀已从你身边溜掉……似乎只要路面不好走，它可能就是一条单行道。”巴鲁克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把这位总统说成是“一个粗鲁、无知、笨拙的人”。

其他的人也拒绝了他，直到最后，他提名西弗吉尼亚州克拉克斯堡的路易斯·A·约翰逊任财政主席，后者是美国军团的前任司令和陆军部助理部长，1936至1940年曾掌管民主党财政委员会。约翰逊是个高大、秃顶、刚愎自用的公司律师和百万富翁，他身高超过6英尺，体重250磅。过去他曾是争论的对象，未来，让杜鲁门感到遗憾的是他将再次成为争论的对象。不过现在因为没有其他人，他便承担了这项工作，考虑到除杜鲁门外没有其他人认为选举尚有一线生机的这个事实，应该说，他还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在捐款数量较多的人中，有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威尔·克莱顿。哈里曼捐助5000美元，克莱顿捐了9000美元。其他人包括斯图尔特·赛明顿；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协会的戴维·杜宾斯基；控制着华盛顿酒类批发业务的老米尔顿·S·克龙海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曾为厄尔·朗州长最大的财政支持者、被称作“黄金希腊人”的路易斯安那州的石油商威廉·赫利斯；科尼利厄斯·港登比特·惠特尼；以及华盛顿的一位家庭主妇珀尔·梅斯塔，她在得克萨斯州的盖恩斯维尔登上了杜鲁门的专列，以便乘车穿越俄克拉荷马，她的第一位丈夫已在那里的石油业中发了财。

一家华尔街的投资公司阿特拉斯公司的总裁弗洛伊德·B·奥德伦捐助了3000美元，然后又从他的同事们那里筹集来2万美元。不过，最大的一笔捐助似乎是来自杜鲁门在堪萨斯市的老友、杂货店大王汤姆·埃文斯，他本人

捐助了 3000 美元后，又在中西部筹集了 10 万多美元。

列车穿越俄克拉何马州时，天气一直很好。“兴高采烈”的杜鲁门长期地站在车尾平台上，向他快速经过时沿途遇到的人们招手。如果他真的担心竞选资金或其他什么事情的话，是不会有别人知道的。在阿德莫尔停站期间，杜鲁门对走近专列的一个牛仔帕洛米诺马表示赞赏，他验看了这匹马的马口后宣称它有 6 岁。“对极了！”那位欣喜的牛仔惊叫道，而这个消息很快便出现在全国的报刊上：“杜鲁门从马口中得出了正确的内部信息。”

阿德莫尔的听众约有 4 万人，据说，甚至比吉恩奥特里的听众还要多。在没有安排停靠的边远小站上，人们等在那里只是为看到专列通过。在保罗斯瓦利，杜鲁门问听众，他们是否真的种出了比在艾奥瓦州长得还要高的玉米，5000 听众兴奋地高声吼道，是的。在诺曼，人群中爆发出“你好，哈里”的喊声。

在俄克拉何马城，有 10 万人出动欢迎；2 万人出席了他在州集市广场的演讲会。他已选定到达俄克拉何马城的时间和这个地点来答复共和党对政府中共产主义问题的指责，而且他是处于“严格意义的攻势上”。共和党的这种伎俩不过是用以掩盖他们在处理住房、物价控制、教育等真正问题上的失败的一种“烟幕”。他声称，他本人的忠诚计划已经证明了全部联邦雇员中 99.7% 的人是忠诚的。遏制住共产主义浪潮的并非像共和党空谈的那样，而是有诸如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这类方案，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政府并未因共产党人的渗透而受到危害。想要出名和拉选票的共和党人及其不负责任的指责对国家安全的作用是损害大于维护。

这个演讲被认为极其重要，以至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第一次掏出它那可怜的资金去支付全国广播时间的费用。

然而钱也因此而花光了，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让专列开出这个车站。

俄克拉何马州长罗伊·J·特纳和来自肖尼市的一位企业家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上组织了一次紧急募捐聚会，筹集到足够的捐款——“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使列车在以后的几周中能继续运行，危机才算解决了。不过，即便如此，据查利·罗斯回忆说，后来的竞选运动的行程一直是“摆在那位州长面前让他心神不安的事情”。

第二天，9 月 29 日星期三，是竞选中最重要的一天。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杜鲁门发表了她的第 100 次演讲。那一天结束前，他演讲了 16 次。在肖尼、塞米诺尔、韦沃卡、马斯科吉，都有大量的听众，在塔尔萨，有“数量惊人的”听众。进入密苏里州后，杜鲁门告诉尼欧肖的听众说，这一天他已对 50 万人发表了讲话——考虑到他已见过的所有的听众，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夸大其辞。在后来穿越密苏里、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州的行程中，情况也是如此。在伊利诺伊州的芒特弗农，他离开专列乘汽车旅行，行程 140 英里，走遍了该州最南部的煤矿区，经过了 50 年来从未属于过民主党的 5 个县。“杜鲁门先生（《纽约时报》报道说）是到伊利诺伊南部去竞选的第一位总统，人们成千上万地走出家门，冲破警戒线，聚集在整个车队的四周，嘈杂地高呼着表示欢迎。”

由于他一味地攻击华尔街和“特殊利益集团”，并坚持倾听人们对经济大危机时期的可怕回忆，所以经常让人感到好像他是在与赫伯特·胡佛竞选。不过在卡本代尔、即南部伊利诺伊的 9 站中的第 6 站，他好像自己还没有进入现在的战后时代似地谈起了他本人感到对之负有责任和为之感到骄傲的

“历史”，他知道听众中有那么多人记得第一次战争后形势已变得多么地不同了。

一个民主党的政府和一个民主党的国会共同工作，负责 1945 年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它不仅避免了战后的衰退，而且达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文明和比以往更好的生活标准的高峰。

在世界历史上，一场大战之后还没有像这样的情况。请把  
这个事实牢记在心……以往无人充分地讲述过这个事实，但我们确实既无暴乱，也无流血。我们没有人们吵着要工作，我们没有农民向华盛顿进军，我们没有复员的士兵向华盛顿进军，因为我们在教育机构中照顾他们，并把他们吸纳进了没有崩溃的国家经济中去。

我们制定了 1946 年的就业法，保证将我们的全部资源扣努力用来保持繁荣。

在世界事务中，我们把美国带到了一个毫无疑问的领导地位上。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们与此不同的情况。

即便没有其他原因，单是由于艾尔本·巴克利出现在竞选名单上，在肯塔基受到热烈欢迎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那儿的人们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路易斯维尔的《信使日报》报道说：杜鲁门“从未比这更具人情味。他走下车，操着普通人的语言……”在谢尔比维尔，一个木结构的仓库前面挂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欢迎谢尔比县的子孙、故乡的总统杜鲁门及其家人”，他谈到了曾在这里结婚的他的祖父。在列克星敦，这个布卢格拉斯马产地的心脏地带，他提请每一个人注意：在赛马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哪匹马在前还是在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终点时跑在前面的那匹马。在肯塔基的莫尔黑德，他对聚集在铁路两旁、并尽可能挤到离他车厢尾部的平台最近处的数千名听众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他们的期望：

现在，你们所要做的就是在选举日的清晨到投票站，并且不要浪费任何时间。直接拿上选票，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投民主党候选人名单的票，这样，你们就是在帮助你们的国家，也是在帮助你们自己。你们将不仅是在投我的票……而且你们也是在投你们自己的票，投你们的最佳利益的票。而且我相信，这是你们正打算去做的事情。

当天晚上 10 时 45 分，在西弗吉尼亚州蒙哥马利这最后一站上，杜鲁门对在这么晚的时候人们出动的规模感动万分，因此在开始演讲前，他请摄影记者掉转照相机给群众照一张相。他说，那才是值得向全国报道的真正新闻。

然而，是什么东西造成了杜鲁门拥有群众的这种现象呢？

大多数记者都把这归结为是普通人的好奇心。《时代》周刊说，杜鲁门已将他的竞选运动变成了一出杂耍剧，因此，人们自然要出来看看表演。从一开始就在专列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写道，美国人民高度尊重总统的职位，所以自然想要看一看占据这个职位的人。考尔斯报系的弗莱彻·克内贝尔特别回忆了在谢尔比维尔车站的情景：

清晨，薄雾仍飘绕在山头，太阳还没升起。可这些不可思议的人群已聚集在铁路周围，在你所能看到的各个地方——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肩头以使他们能看清的男人们，爬在树上和屋顶上的小男孩们，老大爷们和穿着工装裤的男人们。当然，我们在新闻车厢和专家们也谈论着这些人群，我最终确定，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该死的结果。“每个人都想出来看看一个成了美国总统的人，这只是为了表明他们曾亲眼见过这样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投票支持哈里·杜鲁门。”他肯定会输。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每天都这样写。

乔纳森·丹尼尔斯指出，某些记者确信：杜鲁门的听众根本就不是杜鲁门的支持者，而是一些希望看看将要被遗忘的正在旅途中的一位好人的人们。

对于沃尔特·李普曼来说，还像往常一样坐在位于华盛顿的常青藤覆盖的房子里观察世界，他认为所有这些推测都不重要。李普曼对于一位总统奔走全国、致力于炫耀和握手，并试图“谈论他自己的通往胜利之路”的一切表现都感到悲哀。已在秘密地为杜威提供对外政策咨询并与杜威同样蔑视哈里·杜鲁门的李普曼认为，一位总统根本就没有时间丢下自己的职责外出，而这位总统却已经走了16天。李普曼写道，杜鲁门无意中已证明他是多么地无关紧要。

10月2日，星期天上午，杜鲁门告诉等待在华盛顿联邦车站上欢迎他的人们说，他的战斗不过是刚刚开始。几天内，他将转入另一场战斗。其他人——他的夫人、女儿以及新闻秘书——都显得筋疲力尽，可杜鲁门却一点儿也不显疲倦。

他写信给他妹妹说：“我们停靠了约140站，我作了147次演讲，与至少3万人握了手，并且身体状况很好，可以再次出发……”他保证说，这是迄今为止任何总统所进行的最伟大的竞选运动。“不论输赢还是平局，人民都将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

关于1948年杜鲁门的竞选运动，关于其中逐渐形成的不很连贯的“狠揍他们的哈里”的风格，以及这位乡土气息很浓的命运注定的候选人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力和决心，有许多东西值得写、值得说；不过，对竞选结果有影响的其他因素通常却总是被忽视。杜鲁门确实一直是他本人在表演，从未有过任何一位总统在竞选连任时比他更努力。但是，幕后其他人的努力也是相当重要的，像所有的竞选运动一样，他的竞选运动也是一个除候选者本人之外的许多人联合努力的产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宣传局长杰克·雷了后来曾写到这种“典型的政治团结”，说这种团结对于一场竞选运动来说，就像时间、地点和行动上的协调对于一场成功的戏剧一样，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团结一旦形成，它所取得的效果远远超出各部分效果的总和。”考虑到雷丁、霍华德·麦格拉思等人也清楚地知道形势于他们不利的这种情况，他们仍像其他人那样努力而有效地工作，便越发值得称赞了。

例如，正是雷丁争取到了纽约一份波兰语报纸的经理迈克尔·西普林斯基的帮助，后者负责使有关杜鲁门的一切新闻稿在送往全国的外文报刊和广播站前被翻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后来，这似乎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主意，可在此之前却从未有人这样做过，据雷丁回忆说，这些材料立即便被各新闻媒

介接受了。杜鲁门的事情被用波兰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瑞典文写成，实际上被居住在美国的 3500 万外国出生的居民，即约占美国人口总数 25% 的人所听到或看到，在这些人中间有 1100 万人符合投票条件，这可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机会。

麦格拉思尤其着重外国出生的美国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他曾 3 次当选为罗得岛州长——他也理解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以及杜鲁门的移民政策对这些团体的影响有多么大，正是因为杜鲁门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使他拥有了赢得他们的支持的绝好机会。

为总统安排了一位人们热爱的波兰艺术家塔迪·斯泰卡来给他画像，尽管此人曾经是一个铁杆儿的共和党人，但是，在听到杜鲁门对一群波兰裔的编辑们谈影响波兰的世界问题的讲话广播后，立即成了一位杜鲁门的皈依者。（在 9 月 14 日的日记中，杜鲁门写道：“又是难以忍受的一天。我坐在一位波兰老画家的面前，我并不愿意摆姿势让人画像——不过，这也是对当总统的考验的一部分。他画了一幅很好的神气十足的讨厌鬼的肖像。”）10 月份，在白宫举行的一个正式的仪式上，斯泰卡呈上了这幅肖像后，美国全部 72 家波兰文报纸都刊登了这幅肖像的照片，以及斯泰卡本人对总统的赞誉。对宣传家雷丁来说，这可是一场“政治大捷”。

与此同时，让新闻界感到好笑的是，杜威演说中的那些老生常谈和陈词滥调的选集也筹备好并发行了：

“我国的河流中鱼产丰富。”

“我国的矿工对于我们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

“坐在小卧车和公共汽车中的每一个人都使用汽油和石油。”

“我们的土地是壮丽的土地。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如此。”

一本 16 页的 4 色连环画传记《哈里·杜鲁门的故事》出版了，它一页接一页地勾画了杜鲁门在独立城的童年，向贝丝·华莱士的求婚，杜鲁门在农场的年代，以及邻居们如何评价他（“我的天哪！不必想到杜鲁门曾更新过有关农业的观念，他也是极棒的家伙！”）。他参加战争的部分占了两页半，然后是他在商业上的失败（“你曾认为共和党政府会做些事情来帮助小企业家”），以及他公务生涯的辉煌时期，包括担任总统。许多人认为连环画的形式对一位总统来说很不合适。白宫有几个人抱怨说，它是在杜鲁门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的。但是，杜鲁门不仅事先知道，而且还同意了，结果这本书获得了成功。300 万册很快就告罄。在一些地方，学校允许在学生中间发行，而学生们则把这些书带回家里。《时代》周刊在一篇特写中欢呼它是“‘竞选文学’中的新事物”，但同时也对它根本不提“已故的、大腹便便的”汤姆·彭德格斯特表示遗憾。

甚至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是一部有关杜鲁门的 10 分钟影片，它以其“短”而闻名于电影院（美国当时约有 2 万座电影院，1948 年每周的电影观众约为 6500 万人）。听说一部有关杜威的电影正在制作并且是由共和党人掏钱搞的，手头没钱来制作影片的杰克·雷丁便威胁说，除非制作一部用来“起平衡作用”的有关杜鲁门的影片，否则将包围电影院以抗议这种不公平的做法。结果，电影行业决定免费制作一部有关杜鲁门的影片——《环球新闻制片公司》在以掷硬币决定制作厂家的掷币中输了，因此由它来承担这项工作。由于时间非常紧迫，同时也为了使成本保持最低的程度，《杜鲁门的故事》几乎完全由已有的新闻片剪接而成，其结果是这部完成的影片具有了一种杜

威影片中所没有的真实感，杜威影片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舞台表演式的。杜鲁门影片中，人们所看到的这位候选人是“邻居杜鲁门”的形象，他在独立城的街道上与人们握手（其中有一个穿着工作围裙的黑人）。影片也展示了如下的内容：他在埃迪·雅各布森的商店中访问，在格兰德维厄与母亲在一起，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总统，他在签署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对国会发表演讲，检阅部队，在椭圆形办公室中的那个大地球仪旁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讨问题。

这部两盘胶卷的影片没花杜鲁门竞选经费的一分钱，并且被认为比杜威的那部影片效果好得多，它在全国各地的影院中放映。“这样，在大选前6天中美国各地的电影观众就没有一个人看不到总统的故事了。”雷丁自夸地说。他认为这是这次竞选运动中最重要的一次宣传上的突破。

与此同时，71岁的艾尔本·巴克利正乘坐一架名叫《蓝草》的DC—3型包机在全国各地交叉往返。与比他年轻得多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正在乘火车作竞选巡回演说的厄尔·沃伦相比，巴克利发明了他所谓的历史上第一次“撑木站”竞选运动。他飞行了15万英里，发表了250次演说，大多是在小城镇、农业城镇、煤炭和铁路城镇、工人礼堂和小旅店的饭厅中作的。有时他的听众仅有数百人，新闻界称他是“穷人的候选人”，但巴克利却非常乐于讲故事，乐于详尽的即席演说，并且从未显示出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好处的迹象，而仅仅是为了帮助总统和任何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他喜欢说，他本人得到的最大帮助是来自共和党人。巴克利说，杜威的演说使他想起了一个被称为“提琴手鲍勃·泰勒”的田纳西州的以前的政治家。当时是白银自由铸币时期，他拉着提琴竞选州长，并且总是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尽可能少地谈论任何具体问题，直到最后他才被迫声明自己在货币问题上的立场。巴克利饶有趣味地讲述着这个故事说：“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才说：‘我的立场是这样。我支持多一点儿金币，多一点儿银币，多一点儿绿背纸币——以及那么一丁点儿假币。’”

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一位记者问巴克利，他是否真的认为民主党人有一线希望，巴克利答道：“当然。你认为我这样到处跑为的是什么？”

两名新的总统演讲稿起草人在幕后策划的一个计划被证明是一场大尴尬。偏好戏剧性的词句和姿态的戴维·诺伊斯和艾伯特·卡尔——正是他们在德克斯特的演讲稿中加入了“背上的草叉”的词句——断定总统需要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来使他对世界和平的愿望戏剧性地引人注目，并且要尽快地这样做。

他们建议他派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去执行一项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特别使命。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名大法官，文森从未与行政部门的外交角色有过任何关联，文森对于柏林危机除了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之外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他既不具备在苏联事务上的任何经验，也从未与斯大林打过交道，这些情况显然没有被认为是值得撤销这项计划的严肃理由。

杜鲁门同意了 this 计划——这项决定似乎清楚地说明，尽管他在一切场合都显示出自己的信心，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形势是多么地令人绝望，因此他想要去尝试做几乎是一切事情。无疑，他也希望如此大胆和非正统的一种方式能够给斯大林一个“展示”的机会，正如后来他所写的那样。他仍然相信，从个人对个人的角度来看，斯大林可以接触，也可以理喻。“我们只要能使斯大林对某个他感到完全可以信赖的我们这边的人倾吐心声，我

认为我们就可以取得进展。”

10月3日，星期天，他回到白宫后的第二天，在没有预先告知正在巴黎出席试图解决柏林危机的联合国大会的乔治·马歇尔的情况下，杜鲁门将那位首席大法官召到白宫，请他去完成这趟旅行任务。

文森惊呆了。他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应该把自己的职责限制在最高法院的职责范围内，在选举年中尤其应该如此。但后来，出于恭敬，文森同意去。

计划要由杜鲁门在一个特别广播节目中向全国宣布这项使命。查利·罗斯受命去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声明与广播网商定安排一个免费的非政治性的半小时节目时间。国务院得到了预先的警告，要清除某些与斯大林之间的障碍。杜鲁门记得还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来防止消息事先泄露。

白宫的气氛极其紧张，神经都要崩溃了。那些曾与总统共同旅行的白宫班子成员仍感到精疲力竭，而那些留在幕后的人则感到劳累过度却未受赏识。“情况特别混乱，精神也特别紧张（那位忠实的记日记的人埃本·艾尔斯记载说），因为……相信总统将会被击败。这儿有几个乐观派，但整个班子中却潜藏着猜忌和暗流。”

建议中的“文森使命”使得气氛更紧张了。克利福德和埃尔西激烈地争辩着反对它，埃尔西回忆说，“几乎是疯狂地”反对它。

但是，当杜鲁门于10月5日、星期二在内阁会议室会见他的主要顾问们时，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唯有戏剧性的、“甚至是铤而走险的”措施才能挽救此次竞选。

杜鲁门借口离开了会议，去到地图室用电传打字通知马歇尔。但是，马歇尔被文森计划的主意震惊了，他激烈地反对，结果杜鲁门立即取消了这个计划。

当他返回内阁会议室报告他的决定时，坐在桌子旁边的几个人，包括乔纳森·丹尼尔斯，都异口同声向他争辩说，这项使命是他最后的、最好的机会。但是，杜鲁门打断了他们。他说：“我们将不做这事情。”

对丹尼尔斯来说，这是他在白宫亲眼见到的所有时刻中最生动的时刻之一。丹尼尔斯后来写道，如果曾有过杜鲁门显得最真诚的时刻，如果曾有过他比他的职位还显得更高大的时刻，那么，这种时刻就是当时，而

在所有的报道看来，他当时比以往显得更渺小。

他站起身，走出那扇嵌有玻璃的门，经过玫瑰园旁边的台阶，独自——那天他可是非常孤立——走回到白宫的楼房里。我想，他是错的，但我也知道，他是坚强的。在这件事情中，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成分。他决不会说他宁可坚持正确的东西而不当总统。下一次我见到他时，他正与记者们、政治家和警察们一起谈笑，当时他又回到那列长长的专列上，大家似乎都不知道列车要把他载到什么地方去。

这一次他只离开了3天。作为一次额外的努力，他决定飞速造访宾夕法尼亚州东部、新泽西州和纽约州北部地区。“文森使命”也许已经死亡并被埋葬，而且没有人知道更多的详情，但消息仍被泄露出去。可以理解，广播网在撤销总统竞选中期的一次免费半小时节目之前，坚持要求知道这次“非

政治性的”广播的性质。于是，罗斯向它们“吐露了秘密”。

流产的和平使命这件事广泛地传开了。报刊的社论指责杜鲁门企图搞绥靖政策，玩弄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手腕。《时代》周刊写道：“他企图搞的这个行动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它表明他对于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家之间的区别何在根本就没有概念。”这次根本就没有希望的竞选运动据说又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杜威公开宣布，他决定让总统的行动不说自明。在非正式场合，他却傲慢地告诉记者：“杜鲁门在后几个星期中真该什么事情也别碰！他最好别去碰外交政策，他对这方面什么也不懂。”

10月9日，星期六，马歇尔从巴黎回国，他踏出他的座机时脸色“苍白”，有报道说他回国后将辞职。事实上，尽管马歇尔的身体状况不佳，但他与杜鲁门的关系却极好。马歇尔甚至为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指责承担了部分责任。他对未能使杜鲁门保持对巴黎会谈进展状况的更多的了解而向杜鲁门道歉。

杜鲁门对报刊上的小题大作并不担心，他认为很难相信美国人民会因一位总统想要取得世界和平而过于苛刻地指责他，同时他也为自己三天的巡回旅行所鼓舞。在奥尔巴尼这个杜威本人的首府，1万人在清晨的瓢泼大雨中来到车站向他欢呼，并高喊：“狠揍他们，哈里！”

10月10日，星期天，他重新回到了专列上，在民意测验中他依然落后，但他依然信心十足，而现在距选举日仅有3周了。

### 3

如果有人想要在哈里·杜鲁门1948年竞选总统的所有日子里选出有代表性的一天，在他乘火车作竞选巡回旅行的远征中选出在精神和内容方面堪称是典型行程的一天的话，那么，10月11日，星期一，也许能够称作是这样的一天。这一天，他走遍俄亥俄州中部地区去作巡回演讲，从而开始了后来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中西部巡回旅行。

像这次他的大多数竞选活动一样，这一天是在一种阴郁的气氛中开始的。

早晨7点钟他到达辛辛那提时，天气很冷，还下着雨。从车站到他在那里发表演讲的尼德兰广场饭店所经过的街道上行人稀少。一位已跟随在杜鲁门专列上旅行了几个星期的《得梅因纪事报》记者描写说，那天早晨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已经得到了坏消息、但感到这台戏必须继续演下去的人一样。”

那天早晨显得很凄凉，而当天的全部计划也似乎毫无意义。俄亥俄州的26张选举人票是生死攸关的，然而，俄亥俄，这个“七叶树州”在48个州中就像一座共和党的堡垒一样难以攻克，它拥有一位共和党的州长、19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与4名民主党议员相对立），以及两名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和约翰·布里克，后者曾在1944年做过杜威的竞选伙伴。此外，杜鲁门还决定当天在俄亥俄州的农业地区多呆些时间，这个地区在1944年曾有70%的选民支持杜威。

是比尔·博伊尔促请杜鲁门到俄亥俄去竞选的，杜鲁门也决定仰仗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博伊尔仍负责掌管杜鲁门的旅行计划，此刻，他正坐在华盛顿民主党总部的办公室中指挥着这次旅行。



从位于该州西南角的塔夫脱的家乡辛辛那提出发，杜鲁门将向北经过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前往哈密尔顿和代顿。然后继续前往一系列的小城镇：悉尼、莱马、渥太华和德什勒，从这里，专列再折向东驶上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干线，途经福斯托里亚、维拉德、里特曼，最后在当天夜间到达该州东北角上的工业城市阿克伦。这是一次 350 英里的旅行，杜鲁门甚至要为渥太华和维拉德这类小镇来操心，这使很多人感到是在浪费时间。不过，当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他的整个竞选运动都是在浪费时间。杜威曾在 1944 年带领着俄亥俄来反对罗斯福，可以确信这次他会再次赢得它的支持，因此他没有在这里大事竞选。有一次在俄亥俄州停站时，杜威甚至都懒得走出列车尾的平台上去，而是坐在他的拉上窗帘的包厢中。在被告知外面有一群人希望能看他一眼后，杜威都懒得去拉开窗帘。

在 11 个站上的 11 次演讲中，在当天的 15 个小时的时间里，杜鲁门从容而愉快地不断重复着他所喜爱的那些主题——生活费用的上涨、充分住房的需求、第 80 届国会的短见和顽固、塔夫脱—哈特利法的邪恶以及他对和平的渴望。他称颂起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阿克伦的演讲、即当天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中，他讲到了以往演讲中从未谈到过的如此多的有关新政“全部哲学”的内容，把这作为他自己的哲学，发誓“要在这个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永远美好的生活方式”。

演讲中没有令人吃惊的声明或宣告。他只是保持着有压力的攻势，他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以及在对谁演说。他赞扬了哈密尔顿的人民在战时的生产记录，他说，这个记录他从在杜鲁门委员会的年代起就知道。在农业城镇渥太华，他说：“我成长于一个农场，所以总想看看优秀的农业地区。”接着，他便用了 10 分钟来描述 1932 年以来在“民主党年代”农民所取得的成就和繁荣。

在莱马这个机车工厂的故乡，他高呼：“我已经用坏了 3 个火车头，在我完成使命之前，我还要再用 3 个，以便能为这里的企业带来好处……”

他告诉福斯托里亚小镇的公民们说：“啊，我要说感谢上帝造就了我们国家的这些小镇。它们是这个国家的脊梁。”

贝丝和玛格丽特按照提示从蓝色的门帘后走出来，并且总是能博得听众的欢心。“你们愿意见见老板吗？”在莱马，杜鲁门问道，并补充说，大多数结了婚的男人在家里都有老板。《莱马新闻报》的那位编辑写道：“他是总统，但他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中的男人，也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感到骄傲。他在某些方面与许多听他演讲的人是一样的。”

（正是在这次之后不久，贝丝告诉这位候选人，如果他再叫她一次“老板”，她就下车。）

在辛辛那提那种阴郁的开端之后，天空逐渐放晴。雨住了，阳光冲破了云层。凉爽的秋风吹过，枫叶开始变黄、变红，在田园诗般的美国小镇上，俄亥俄州到处是一片金秋十月的图画。

从哈密尔顿开始，往后的全部行程中，听众部很多而且反应热烈，杜鲁门恢复了生气，就像注射过一支强心针似的。在哈密尔顿，一万听众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景象带来了那位得梅因的记者称之为的“在全部旅程中所见到的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举止上的最惊人的变化”。每一个人都对听众的规模和情绪感到吃惊。俄亥俄的那位年轻而漂亮的前州长弗兰克·劳希正在为再次获得州长职位而进行着“孤狼”似的竞选，他在辛辛那提登上了专列时还完

全不能确定人们看到他与哈里·杜鲁门在一起的这种情景究竟是福还是祸。不过，当时他就告诉心情沮丧的杜鲁门说，他还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听众。在代顿，他和杜鲁门一起乘车行进在长长的车队中时，道路两旁排列了5万人。原先计划在代顿下车的劳希决定继续留在专列上。

杜鲁门的演讲没有重样的。几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随着这一天时间的推移，他的精力和愉快似乎混合在了一起，他的行程越长，他也就越多地谈到“普通人民”、“美国人民”、“你们这些德什勒的优秀人民”，或是代顿、福斯托里亚、维拉德的优秀人民。像以前一样，他利用人们对艰难年代的担心和对歉收年代的回忆，他知道这些走出家门来欢迎他的如此多的人们曾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他知道例如在农民中间，对20年代的回忆绝不会像是爵士乐时代那种千篇一律的美好时光的景象。“如果你们不想倒退，”在渥太华，他说，“如果你们不想滑落到共和党统治的12年间你们所处的那种破产和贫困的境地、回到20年代去，那么，你们最好在选举日那天早点走出家门去照看你们自己的利益。”他知道他已达到了目的。

他说，现在看一看你们的繁荣吧。请记住，并不是共和党人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复兴的。

他说，他的对手一直在谈论团结，因为他不敢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他怕如果他说了别的任何事情，他会露出马脚。”与此同时，在“一事无成”的第80届国会中的共和党的真正领导人们已被“派遣到灌木丛中躲了起来，直到竞选运动结束”。

人民有权知道总统候选人的立场是什么，这就是他去他们城镇的原因。他们有权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有权看看他们的总统，听他讲些什么，并且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正是民主的理念：人民决定。

在福斯托里亚，他说：“他们告诉我，塞尼卡县是个共和党的县。好吧，我不在乎。我想让塞尼卡县的共和党人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当天他最精采的铁路旁演讲是下午4时55分在俄亥俄州休伦县的维拉德所作的演讲。这是杜鲁门作为杰出的巡回演讲人的一个完美的例证。

维拉德是一个拥有朴素而宽阔的木结构房子和4000人口的铁路城镇，1917年以前一直被称为芝加哥枢纽站，1917年才以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裁丹尼尔·维拉德的名字重新命名。镇内有一个外科手术用手套工厂，一个扶轮社的地方分社，一支优秀的高中美式足球队，以及一块位于默特尔大街和珍珠街拐角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荣誉碑，上面列有876位阵亡将士的名字。人们都知道，韦尔·罗杰斯曾在那座红砖砌成的意大利风格的火车站的饭馆中吃过一次午餐。

杜鲁门的专列停在车站的东边，杜鲁门面向西站在车尾的平台上，夕阳照在他的脸上，他身穿深蓝色的双排扣西服，系着深蓝色的领带，依然显得精神饱满、干净利索。旗子在秋风中飘扬，数千人紧紧挤在那里，向他欢呼、招手，并高喊：“你好，哈里！”就像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带孩子来的人们把小孩举在肩头，以便他们日后能说他们曾见到过总统。

早在专列出现在铁道上之前，维拉德的激情便已开始酝酿。1944年竞选期间，当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专列停靠在维拉德站时，也有数千人聚在这里，可罗斯福却没有出现。他们只看到他的狗法拉。

杜鲁门由维拉德的一位通用铁条及铁艺业主、休伦县青年民主党人俱乐部主席哈洛·A·斯特普夫向听众作了介绍，使杜鲁门感到高兴的是，斯特普

夫系着一条竞选领带，上面印有杜鲁门的肖像。

杜鲁门以几句感谢热情欢迎的客套话开始了演讲，接着他提到了当地的历史，在这部分内容中，杜鲁门指出，丹尼尔·维拉德由于在经济大危机期间对该镇陷入困境的家庭所表现出来的慷慨，依然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怀念。然后，几个关键的主题便讲了出来——住房、通货膨胀、第80届国会——杜鲁门提前了一点儿来鼓吹即将在阿克伦发表的主要演讲的内容，在阿克伦的演讲将由广播来播送。

他个人对民意测验的价值的价值的评价在维拉德也首次增加进了演讲。整个演讲都是发自内心的，它持续了12分钟。它的特征是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增强效果的引语或者大话。他既没有使用难懂的术语，也没有使用陈腐的笑话，没有任何装腔作势。但是，他的思想意图却总是非常明确。他使用合适的、结构紧密的完整句子来演讲——实际上就像他在整个沿途中、甚至整个竞选运动中所做的一样。从他所谈的话中，他的听众要了解他的意思决不会有任何困难。

今天，我在俄亥俄州受到了最好的欢迎。在我穿越俄亥俄州的全程中一直是如此。我们从辛辛那提开始，前往本州的西部边界，现在我们要开往阿克伦，似乎每个地方、每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出动了，因为他们对今天这个国家和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兴趣。

今天下午来到维拉德是很有意义的，即便是作短暂停留。你们维拉德的人民有一个伟大的传统，一个由丹·维拉德在许多年前任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裁时建立起来的传统。我认为，丹·维拉德的名字受到全国上下的爱戴和尊敬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他是一个相信这个国家普通人民的人。他喜爱和尊重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们，他承认他们参加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合同的权利。

要是在今天，丹·维拉德是不会讥笑我们国家的“铁路沿线的小城镇”的。他信任人民，而人民也信任他。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原则，这是管理一条铁路的好方式，它也是管理一个国家的好方式。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用来管理国家的方式，但共和党国会，这个第80届国会却不配合。

好了，这就是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打算再对这个国家进行4年管理的管理方式。

共和党候选人和共和党国会不信任人民，他们只是一味地在犯他们的老毛病，即试图愚弄人民使之投票支持少数人的利益。他们不告诉你们自己在想什么，试图以此来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我已走出来，到人民中间近一个月了。我相信你们已清楚地知道了我的想法，而我一直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们。

今天晚间在阿克伦，我准备通过广播谈谈共和党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我准备撕下共和党国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假面具。

今天早晨在辛辛那提，在一个非常个人满意的集会上，我谈到了住房问题。我告诉那里的人民，为了使一个体面的住房法案得以通过，你们的总统是如何地努力了3年。在俄亥俄停靠的另一些地方，我谈到了物价。我告诉人民，你们的总统是如何两次要求国会召集特别会议，以努力对正在扒窃你们钱包的通货膨胀采取一些行

动的。

自我到白宫以来，在事关今天美国人民的任何问题上，对于我采取的立场是什么还从未发生过一次疑问。我总是大胆地把它们讲出来；对每一个问题，只要它一发生，我便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我不会等待任何民意测验来告诉我该想些什么。这是某些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可能做出的声明。

你们知道，自我开始这次竞选以来，我已与各个地区的 300 多万人谈过话。他们来到这列火车旁，就像今天下午你们这样，因为他们对这次选举感兴趣。他们知道，国家的和平以及世界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次选举。他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持续繁荣有赖于这次选举，因此他们想要了解候选人们在各个问题上的立场。而我的立场就是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地简明而清晰地告诉你们的这些东西。

今天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男人或妇女不能在两分钟之内查明我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问题包括外交政策、劳工、农业、社会保障、住房、居高不下的物价，以及所有我们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其他问题。

然而，在美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男人或妇女能够在最近的两个月中查明共和党候进入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我想，他将在 11 月 2 日遭受一场重大的打击。他将得到一项最后算数的大的民意测验的结果——那就是美国人民在投票箱中说话的声音。

他将会发现，人民已经厌烦了那些像本地区选出的那个人一样的家伙们，他们一直在帮助第 80 届国会把时钟倒转。而我相信，你们打算把德怀特·布莱克默选进他应去的国会。我相信，你们打算把弗兰克·劳希选为俄亥俄的州长。

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是在选举你们自己的利益，而当你们在 11 月 2 日投你们自己利益的票时，你们就会投可靠的民主党候选名单的票而不会去投别人的票，这样我也就不会被住房问题所困扰。我将在白宫中再住 4 年。

这样的结果确实完全符合你们的利益。你们将有一个相信人民的国会，你们将有一个他已清楚地向你们表明了他相信作为整体的国家的幸福，而不相信仅仅是处于顶层的少数人的幸福的总统。

橡胶工业中心阿克伦是一个拥有众多劳工的大城市，也是坚定的民主党的城市，人们已指望它给这位民主党的旗手一个热烈的欢迎，尽管它对他的前景也感到沮丧。但阿克伦的欢迎却“热闹非凡”，一切都是辛辛那提无法提供、无法相比的。人们在街道两旁挤了三四层，估计有 6 万人，在被全国新闻界称之为的“该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展示会”上，当杜鲁门经过时，每一个人都“狂热地欢呼”。阿克伦军械库中挤满了人。这是当天行程的美好而又壮观的终结曲，杜鲁门容光焕发。

他告诉听众：“我已经活了很长时间——64 年——我也旅行过很多地方，在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各个地方，就我所见，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欢迎人群……共和党人有宣传机器和钱，但我们拥有人民，而人民又拥有选票。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会取胜的原因！”

与杜鲁门同行的记者们都同意说这是杜鲁门竞选运动中最杰出的一天之一，如果不是最杰出的一天的话。据保守的估计，甚至在到达阿克伦之前，当天的听众总数已达 10 万人。

当晚 11 时，他回到专列上，再次朝西开去。第二天早晨 8 时，到达印第安纳州的里士满，他走出车厢来到车尾平台上，准备开始新的一天。

某些人已经知道，当时《新闻周刊》正在举行一次对 50 名高度受尊敬的政治作家的民意测验，询问他们认为哪位候选人会赢得这次选举。由于这 50 人中有几位在竞选运动期间曾跟随在杜鲁门的专列上——马奎斯乙蔡尔兹，《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奥尔布赖特，《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伯特·安德鲁斯——因此，对这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一直有着大量的推测。这个结果刊登在 10 月 11 日出版的那期《新闻周刊》上，10 月 12 日、星期二，即距选举日之前三周的那天清晨，在进入印第安纳州不久的一个站上，克拉克·克利福德溜下专列，想抢在其他人之前得到一份杂志。车站报刊亭的那位女售货员指着一捆卷在牛皮纸中的报刊，让他自己去找。“可找到了！”克利福德多年后回忆说。

在接受调查的政治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认为杜鲁门会赢。民意测验的投票结果是一致的，杜威 50 票，杜鲁门 0 票。这份杂志宣称：“杜威的压倒优势将会席卷全国。”而共和党人将会保持它对参院的控制，并进一步增加它在众院中的多数席位。选举实际上已经完结。

返回专列的路上，克利福德将这份杂志藏在外套内。由于专列马上就要开动，专列上唯一开着的门就是车尾平台上的那扇门。

于是，我走了进去。杜鲁门总统正坐在那儿，所以我爽快地问候道：“早上好，总统先主。”他答道：“早上好，克拉克。”我又说：“等待在前面的又是繁忙的一天。”“是的。”他说……于是，我便走开……在我几乎就要走过他身旁时，他问：“它说了些什么？”我说：“您说什么？总统先生。”他说：“它说了些什么？”我又问：“嗯，您指的是什么……？”他说：“我看见你下车进站去了。我想你进站可能是去看看他们是否有《新闻周刊》杂志。”他还说：“我想你可能把它放在你夹克里面了，看你夹着胳膊的样子。”唉！我只好说：“是的，先生。”

于是，我把杂志递给他……他翻看了杂志……然后说：“我了解这 50 个家伙中的每一个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走出困境的足够的头脑。”

杜鲁门然后把杂志丢在一边，根本不再提及它。“就好像他把这本杂志撵走了似的。”克利福德回忆说。

专列在印第安纳州停了 3 站，在伊利诺伊州停了 4 站，那儿的农民坐着拖拉机挥舞小旗或举着手写的“投杜鲁门的票”的标语。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保罗·道格拉斯写道：“我随杜鲁门到达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人们热烈地欢迎他，并不断地喊”狠揍他们，哈里“……他与群众在一起无拘无束……他朴实、真挚、果敢。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

天黑后到达斯普林菲尔德，这里旧时的竞选运动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

街道上挤满了人。杜鲁门在演讲中说，到斯普林菲尔德来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想到亚伯拉罕·林肯。

今晚我只是怎知道，就像过去我曾多次想知道的那样，如果林肯看到共和党已偏离了他如此深信的基本原则那么远，他会说些什么。林肯来自朴实的人民中间，他一直相信他们……

他进入了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在德卢斯，他与休伯特·汉弗莱一起坐在一辆敞篷车内，全城足足有一半的居民、大约6万人，在休皮里尔街上排列了两英里长，他们挤得如此之密，以至敞篷车都蹭到了他们的衣服。

在圣保罗，过分地拥挤在市政大礼堂中的听众在他发表这次竞选运动中最具战斗性的演讲中的一篇演说时吹着口哨、跺着脚并高声呼喊。

现在，我呼吁所有的自由派和进步主义者站出来，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站在为民主而奋斗的行列中……这是一场你必须参加、必须以你的全部精力投入的战斗。11月2日之后，它就太晚了……此时此地就必须做出决定。

不过，我们必须取胜，我们也必然会取胜，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在这场战斗中，人民与我们站在一起。

圣保罗的听众有2.1万人——礼堂中有1.5万人，外面还有6千人。杜威于两天后到达圣保罗，他仅吸引了7千人。

杜鲁门再次折向东行，他说，11月2日来临时，肯定会有“一大堆惊讶不已的民意测验者”。

杜威手下的某些人开始忧虑了。当杜威问他的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他认为杜鲁门竞选运动进行得怎么样时，哈格蒂答道：“我觉得他干得相当好。”杜威说，他也是这样看。

在堪萨斯市，杜威私下会晤《明星报》的罗伊·罗伯兹时，被告知中西部的农民正在成群地背离共和党的竞选名单，他最好是迅速地对此采取一些行动。《时代》周刊现在则把杜威的听众描写为“有点儿好奇心理”的人们，而杜威的演说则“不令人振奋”。

杜威班子使记者们确信：“我们的头儿肯定会‘获胜’。他不必去赢得选票，他所要做的是避免失去选票。”杜威自己告诉塔夫脱，多年来他发现自己只要参与争论就会丧失选票，塔夫脱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不光彩的。

杜威要答复杜鲁门其实有许多话可以说。“一事无成”的第80届国会毕竟是支持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国会。杜鲁门对塔夫脱—哈特利法的攻击并没有提到在众院中他自己党的大多数议员曾投票支持该法，因此才使他的否决无效。如果指出杜鲁门自己的官员圈子中诸如哈里曼、洛维特和福雷斯特尔这样的重要人物全都是从华尔街来到华盛顿的，那么，杜鲁门所说的华尔街对共和党的邪恶影响听起来就会有那么几分虚伪。杜鲁门解除亨利·华莱士的职务是一个大失败。他对铁路工人罢工的处理可以很好地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问题。塔夫脱后来曾写道：“制服杜鲁门的唯一方式是在他每次张嘴说话时就打击他。”但是，塔夫脱是个好争论的人，而杜威则决心按照自己的战略行事。

与此同时，在伊利诺伊州一个名叫博库普的小镇上发生的“意外的小事”却引起了骚动。正当杜威准备在博库普发表演说时，他的专列突然跌跌撞撞地向后朝着听众移动了几英尺，人们惊叫着在慌乱中向后退。杜威突然地在麦克风中怒吼道：“这是我雇用的第一个疯子司机，他也许应该在日出时被枪毙……”

这话中包含的那种冷酷的傲慢给杜威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件事情到处流传，而那位火车司机——“疯子司机”——评论此事时说，“我对杜威的看法还像以前一样，那件事没有什么。”

距选举日仅有两周时，一次新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杜威的优势缩减为6个百分点。在奥尔巴尼州长官邸的隐居处，杜威命令放映有关这次竞选运动的全部新闻短片，他所看到的东​​西使他感到极其烦恼。这些影片告诉他，他正在一步一步地丢失阵地。然而，当他的竞选总管赫伯特·布劳内尔打电话给全国的约90位男女委员时，除了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敦促他保持现在的战略。

在职业赌徒中，不利于杜鲁门的赌注让步平均为15：1。在有的地方，赌注让步达到30：1。

除了赌注让步、民意测验、专栏作家的预测、政治记者和政治专家们的预测外，到此时为止，杜鲁门还受到大多数报刊社论对他极其不利的评价。他经常声称90%的报刊反对他当选，这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竞选策略式的夸张。其实，反对他当选的报刊有65%，但实际上它意味着占压倒多数的报刊支持杜威，特别是由于这个数字中实际上包括全国所有的最大最有影响的报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明星晚报》、《堪萨斯市明星报》、《圣路易斯邮报》以及《华尔街日报》都支持杜威。《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称杜鲁门在智力上不合格。《芝加哥论坛报》尽管远非钦佩那位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候选人，但却直呼杜鲁门为“一位不能胜任的”候选者。

诸如出现在《波士顿邮报》上、以“勇敢的首领”为题的支持杜鲁门的社论，这仅是少有的例外。这份波士顿的报纸说，哈里·S·杜鲁门是

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谦恭、忠诚、朴实而执着地决心做最有利于美国的事情的人。

他与他的党站在一起，坚持该党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尽职的固有原则，竭力效仿伟大的美国人——杰斐逊、杰克逊、亨利夫兰、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阿尔年雷德·E·史密斯。像他们一样，用一首老歌的歌词来说，他——

敢于做一个但以理，  
敢于独自坚持，  
敢于坚定地保持目标，  
敢于让人们了解这个目标。

由此看来，他应该赢。美国喜欢一名斗士。

更具代表性的是《洛杉矶时报》所下的这样的结论：“杜鲁门先生是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在高级职位上所见到的最为地道的笨蛋和傻瓜。”

甚至那些对于总统作为一个个人而公开表示喜爱的报纸也没有选择支持他。《巴尔的摩太阳报》在头版社论中写道：“不论你对杜鲁门先生多么喜

爱，也不论你对他与困境的斗争有多么同情，在 11 月 2 日把他选为总统对国家和这个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悲剧。”

对查利·罗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乔治·埃尔西来说，对乘坐在杜鲁门专列上的每一个人来说，竞选运动已变成了一场不可想象的折磨——漫无止境、耗尽了精力，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他们的经历中还一无所得。

克利福德后来说，“如果你能取胜，你就会惊讶自己多么能忍受疲劳。如果你觉得正在输，那么它就变得不可忍受……那是极其漫长的日子。我当时很年轻，也很强壮，身体非常好。可是我时常无法肯定自己能否保持这种状况。”

那位承受着主要压力的候选人似乎永不疲倦，他对前景的看法完全是积极的。在两次演讲的间隔里他能躺下并立即入睡，不论别人有多大压力，也不论路基有多么颠簸。他会说：“给我 20 分钟。”

乔纳森·丹尼尔斯回忆说：“压力似乎使他更镇静，也更坚定。”在整个竞选运动中，他工作班子中的任何人、任何记者或他家里的任何成员从未见过杜鲁门显示出精力不济或丧失信心的丝毫迹象。

一次，在离开德卢斯前往圣保罗的途中间歇时，杜鲁门要乔治·埃尔西把 48 个州的名字都写下来，之后他把每州的选举人票数告诉埃尔西，并给他讲这些票将如何分配。根据他的计算，他将赢得 340 张选举人票。杜威能赢得 108 票，斯特罗姆·瑟蒙德 42 票，亨利·华莱士一票没有。

埃尔西回忆说：“他不是在给任何人表演。显然他也不是在试图影响或说服我，或向我兜售什么。这是他这个人真心相信的东西。”

“他真诚地相信他会赢……同时他也摆出任何前途未卜的候选人都会有的那种最动人和最好斗的乐观主义表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伯特·安德鲁斯写道。

安德鲁斯还注意到，杜鲁门的工作班子却是另一种情景。他们都显得“有点冷酷”。

工作从早晨 7 时持续到下半夜，一天接一天，直到他们都失去了时间感，直到每一天都与另一天融合在了一起，一切都变得模糊一片。玛格丽特回忆说，这世界开始变得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铁轨。她坐在窗户旁边，无聊地给所经过的乡村拍着快照——一掠而过的电线杆、空旷的原野、似乎不能通到任何地方去的乡村小路。

正如罗斯所写，总统正在“无情地”役使着自己，班子里无人希望比他做得更差。罗斯这位“老学者”尽管患有关节炎和心脏病，仍得每天工作 12 或 14 小时，他知道杜鲁门是多么倚重他。克利福德说：“许多年后，我有时在夜间醒来，一身冷汗，总以为我又回到了那可怕的专列上。”

渐渐地，听众一天天地多起来。显然，某种事情正在发生。听众的情绪、他们对杜鲁门的反应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听了他的演讲后，似乎总是显得比以前高兴。

克利福德说：“我记得自己曾想‘啊，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成功，但是老天作证，我敢打赌，如果我们再有一周的时间，我们肯定会成功。’事情正在取得进展……我们能够感觉到，新闻记者也能够感觉到。”

《华盛顿邮报》的老牌政治记者罗伯特·C·奥尔布赖特反思道：“难道我们错了吗？”

10 月 20 日，杜鲁门从白宫写信给他妹妹说：“在这场竞赛中我们已经



赶上了他们，我认为我们将会获胜。”在华盛顿呆了一天，他又飞往迈阿密，在那里，20万人涌上了街道。从迈阿密，他又向北飞到罗利，在那里，“从离城15英里外的机场开始，沿途都是人群”。

在几条战线上，形势都明确地显现出了更大的希望。在柏林，经过数月的经历后，由于改进了地面设施，加强了空中交通管制，空运终于战胜了一切不利条件和预言，显然正在获得成功。10月22日星期五，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前，授权派遣更多的巨型C—54运输机、即增派另外的26架飞机前往柏林。克莱将军在柏林得意洋洋地宣称：“空运将持续下去，直到封锁被解除。”柏林的冬季供应有了保证。

杜鲁门再次返回他的专列，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他告诉兴高采烈的听众说，共和党的别称GOP代表的意思是“自负的老生常谈”；在匹兹堡亨特军械库举行的欢声雷动的集会上，他宣称，“我是个老竞选运动员，我喜爱这个角色。”

杜鲁门说，他的对手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大夫，其他治疗一切病症的魔术般的方法是一剂叫做团结的镇静糖浆。现在是美国人民要去进行的四年一次的例行体格检查。

杜鲁门学着大夫的样子说：“看来你显得不太好！”

“啊，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妙，大夫，”他又扮作人民的声音回答说，“我一直感到不太强壮，从没有过更多的钱和一个更光明的未来。我有什么毛病吗？”

“我从不与患者讨论问题，不过你所需要的是一次大手术。”

“我的病严重吗，大夫？”

“不是那么太严重。它只不过意味着要拿出你们全部精力来使一个共和党政府就职。”

听众爆发出笑声。他最终也制造了一个极妙的准确的有关杜威的笑话。

芝加哥全城都出动了。曾加入1936和1940年伟大的罗斯福联盟的那些政治家都说，他们还从未见过类似这样的情景。也许有5万之多的群众加入了从布莱克斯通到芝加哥体育场的游行行列，另有50万人排列在游行道路的两旁。游行的乐队喇叭高奏，焰火在头顶上空爆炸开花。不过，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欢呼。保罗·道格拉斯回忆说，到处都有人眼中含着泪花。“报纸已经使他们相信杜鲁门将会失败，而他们也相信他们在新政时期取得的成果正在被剥夺。他们似乎感到某些珍贵的东西将要失去，因此他们要走出来，显示他们对这位正在不顾这种恶劣的逆境而为他们战斗的勇猛的小斗士的同情和支持。”私下里，道格拉斯感到自己也像杜鲁门一样，将会在参院席位的竞争中流于失败。

在挤满了人的体育场，面对2.4万名听众，杜鲁门发表了这次竞选运动中最激烈的一次演讲，在这次猛烈的攻击中，他毫无理由他说投票支持杜威就是投票支持法西斯主义。这个演讲稿的作者又是戴维·诺伊斯和艾伯特·卡尔，他们的主要目的，据诺伊斯后来讲，是要激杜威进行反击，这个策略杜鲁门也是同意的。克利福德在回顾这件事时说：“一种绝望的因素在竞选运动中滋生起来。是疲劳导致了这种结果。”

杜威也确实被激怒了，以致他为自己计划中到芝加哥的行程起草了一份新的演讲稿，不过，后来他又被顾问们说服放弃了它，不与杜鲁门进行这种犯规的比赛。由于胜利就在眼前，他可不能显得这么龌龊，可不能犯错误。

据报道，杜威的夫人说，如果她要是整夜没睡而看到了他把他所写的讲稿撕碎，那么她就会去做这个演说。

杜威在芝加哥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民主党人，他说：“他们已经在全部行程中，沿途散播了不顾后果的辱骂，现在，我很遗憾地说，他们已落到了一个新的诽谤的低劣地步……这是一种我拒绝参战的竞选运动……”

杜鲁门既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他正在向东行进的路上，而“潮流正在涌起”。杜威的“胜利特别号”专列正好尾随着他、相距有一天的路程。

在波士顿，有 25 万人排列在杜鲁门行进的路线上，他们欢呼、喊叫，并欣赏着那写在这位候选人整个脸庞上的明显的喜悦神情。面对力学大厅挤满了人群的屋子，杜鲁门说，共和党对团结的议论整个都是“一堆废话——如果这些词引起了什么麻烦的话，那可不是我的错。”

10 月 28 日，星期四，在历经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州的 9 个站和 9 次以上的演讲后，杜鲁门的竞选队伍到达了纽约，那儿的仁慈和激情的倾泄超过了迄今为止的任何地方。如果说杜鲁门的整个生涯中迄今还没有经历过庆祝场面，那么纽约所给予他的雷鸣般的抛彩带的欢迎则弥补上了。100 多万人出动了。杜鲁门是下午早些时候到达大中央站的，然后在 100 辆摩托车护卫队雷鸣般的护卫下，披着十月的暮色，踏上了一条通往该市的 9 英里长的道路。杜鲁门站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座上。贝丝和玛格丽特则跟在与他相距 6 辆车后面的车里。

五彩的纸屑、彩带及撕碎了的电话簿沿着第 42 街漫天飞舞，这种情况是极不寻常的（《纽约时报》的迈耶·伯杰写道）。它们飘飘洒洒地从空中落下，许多都落在那些敞篷车上。它们从街道两旁高楼的窗户里翻卷着、飘舞着落下来，落在地上就像是吹积的雪花。透过这场彩纸的飞雪，总统的身影不时地隐约可见。他微笑着，一直没有停止朝路边人群、朝聚集在高楼窗口的男女老少们挥手致意……

当他经过富人区的第七大街时，广播喇叭开足了音量、高吼“幸福的日子又回来啦！”

他发表了三次令人振奋的室外演讲——在联邦广场、在市政厅、在东南边的萨拉·德拉诺·罗斯福公园——并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说。接着，当天晚上他又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他那天的第五次演讲，在这儿，他的两个老对手艾伯特·惠特尼和哈罗德·伊克斯和他一起登上了讲台，当时乐队奏起了“我只是野性难移的哈里”的曲子。当杜鲁门唤起了人们对艾尔·史密斯、瓦格纳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回忆，并发誓信奉新政，发誓支持以色列，而且又像在匹兹堡那样，用另外一个大夫的故事博得了满堂喝彩时，1.6 万名听众爆发出了他们的赞同声。他说，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即某个人正在跟踪他。这使他心烦意乱，所以他就去问白宫医生，可白宫医生告诉他不必担心。“有一个地方是那个家伙不可能跟踪到你的——那就是白宫里面。”

竞选已接近尾声，杜鲁门决心要以强有力的姿态来结束它。29 日，星期五，晴空万里，在至今仍被称为“杜鲁门的天气”里，他在灿烂的阳光中行程 36 英里，走遍了这座城市。警方说，有 124.5 万人见到了他并向他欢呼。

在整个这一天中没有一点儿不和谐的调子。东河上的拖船鸣着汽笛欢迎他。在布朗克斯，人群高呼：“你好，哈里”和“你好，玛格丽特”。在昆斯，他告诉兴高采烈的群众：“你们可以把盖洛普民意测验这类东西扔进垃圾筒里去。”如果这次竞选运动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仪式，那么，它就是一个人民喜爱的仪式，他们喜欢他以如此的热情来接受这种仪式。

在哈莱姆区，他发表了这次竞选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民权演讲。演讲中没有充满激情的个人宣言，而是集中谈到了他的民权委员会的工作及其“重要的”报告。不过，他的到来标志着一个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首次踏上了哈莱姆区的土地，他提醒几乎全部是由黑人组成的听众说，他已签发了两道行政命令以在军事部门和联邦雇员的雇用中建立平等的机会，然后他发誓要“以我的全部力量和决心”来继续为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而奋斗。哈莱姆的欢呼声是所有地区中最响亮的。

当天晚上，当他去到布鲁克林音乐学院演讲时，听众给予了他长达 12 分钟的掌声欢迎。

几个月来，曾作出努力想说服埃莉诺·罗斯福出来说些话以帮助杜鲁门——杜鲁门本人一直拒绝参与这种努力——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埃莉诺·罗斯福从她正在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巴黎写信给弗兰西斯·珀金斯说，她一直不赞成杜鲁门，因为他是“一个如此软弱和动摇的人”，并且作出了许多如此糟糕的任命。现在，在最后的关头，她改变了她的想法，希望帮助这位民主党人赢得纽约。

她在巴黎的一个广播讲话中说：“从未有过任何人在一次竞选运动中显示了比他更多的个人勇气和对美国人民的信任。”

这次竞选运动的最后一次集会的场景、哈里·杜鲁门作为公职竞选者最后一次在讲台上出现，是在圣路易斯的巨大的基尔会堂中，会堂里没有一张空座位。

他抛开了他的班子为他准备的演讲稿，继续进行攻击，最后一次痛斥共和党国会、共和党报纸、共和党的“老爷们”和共和党候选人。跺着脚高声呼喊的听众敦促他继续这样讲下去。

后来他觉得自己讲得非常成功。总之，他现在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最佳的效果。

这次远征结束了。10月31日，星期天，万圣节前夕，他在位于北特拉华大街219号的自己的家中度过。玛格丽特回忆说：“回家了！我简直不能相信。”

杜鲁门准备着一篇第二天晚上要在起居室宣读的选举前夕的广播讲话。

我从心底里感谢美国人民给予我的真诚以及他们对这个伟大国家和世界事务的关心。我信赖人民，因为当他们知道了事情真相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

选举日那天，他早晨5时起床，进行了通常的散步，读了报纸，并吃了早餐。然后在一大群记者和摄影师的尾随下，他、贝丝以及玛格丽特去到相距3个街区远的梅普尔大街上的纪念堂投票。

最后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尽管他已缩小了杜威的领先优势，但杜威仍保持领先实实在在的5个百分点，即49.5比44.5。赌场的赌注差距

仍然很大，虽然一般来说，杜威的优势是 4 比 1。

《纽约时报》预言，杜威将得 345 张选举人票而获胜。《华尔街日报》说：“在托马斯·E·杜威总统的领导下，政府将保持庞大、活跃和开支较高的特色。”《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则看出杜威会取得彻底的胜利。新的一期《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下届总统”杜威乘渡船横跨旧金山海湾的整页照片。《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以“哈里·S·杜鲁门，一个值得研究的失败者”作为他 11 月 1 日电讯的题目。

基普林格的杂志《变化中的时代》在封面上用黑体制版大号字写道：“杜威会做些什么？”沃尔特·李普曼著文谈到了杜威给他安排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德鲁·皮尔逊认为杜威进行了“一场近年来最精明最老练的竞选运动”，并评述了“杜威的班子”、这个将要进入白宫的“令人振奋、兢兢业业、组织严密的小团体”。马奎斯·蔡尔兹怀疑民主党此后能否再次组织起来；艾尔索普兄弟在选举日之前他们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中则担心“在‘跛鸭总统’时期，政府如何能挨过以后的 10 周：形势可不会耐心地等待托马斯·E·杜威来正式地取代哈里·S·杜鲁门。”

对杜鲁门来说，权有两个非正式的、而且完全是非专业的民意调查结果能给人一点儿信心。一个是参议院秘书莱斯·比弗尔自发地装扮成一个“卖儿童品的小贩”，跑到农业地区去询问人们对这次选举的看法。杜鲁门不必担心，比弗尔报告说，普通人都支持他。另一个调查结果是来自堪萨斯市的斯特利谷物加工公司，它在农民中间举行了一次“小母鸡民意测验”，让农民按自己的意愿购买分别贴着“民主党的”或“共和党的”标签的袋装鸡饲料。结果，民主党的饲料远比共和党的饲料对顾客有吸引力，可当时，该公司认定事情肯定出了差错，因而放弃了这项民意测验的努力。

在总统竞选班子中，精疲力竭的状况以及折磨可算是结束了的轻松感几乎妨碍了他们对竞选结果作出理性判断的能力。尽管他们对总统比以往更忠诚，但那毕竟是另一回事。不过，此时也有人真心地相信他将会获得成功。在华盛顿，经历了白宫中平静的一天之后，埃本·艾尔斯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下了他本人对形势的卓越的评估：

如果不是因为民意测验机构和专家们的所有那些预测和一致，我就要说总统拥有极好的获胜机会。我所看到的一切迹象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他竞选的旅程中出来欢迎他的群众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我无法相信他们出来仅仅是由于好奇。其他的情况也对总统有利，如国家的普遍繁荣。选民们在繁荣时期抛弃一个政府是与政治先例不符的。

杜威的个性及其竞选运动都无法吸引选民。人们不喜欢他——这一点是人们普遍同意的。我曾不断地问人们，包括记者和其他人，他们是否能举出一个曾说过他喜欢杜威的人的名字，可至今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人说“能够”。杜威的竞选演说只谈到了国家的“团结”，并许诺会把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他既没有明确地讨论任何问题，也没有在任何时候去正面地面对这些问题。我曾反复地问过我的妻子，美国人民是否会选举一个没人喜欢而又不告诉他们任何事情的人。

选举日下午的早些时候，杜鲁门决定从公众场合消失一段时间。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而又从未清楚地解释过的举动。给人的印象是他想独自呆一段时间，完全从一切人和一切事上脱身而独处。只有他的直系亲属和秘密保安人员知道他要到什么地方去。

秘密保安人员在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即将换岗。4 时 30 分，一辆秘密保安人员的越野轿车、四门的黑色福特轿车载着夜班岗哨开进了房后的汽车道。白天班的岗哨正准备离开，开车回堪萨斯市米勒巴赫饭店的总统总部。

一群人聚集在房前。杜鲁门走出厨房的门，钻进了这辆福特车的后座，秘密保安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和杰拉德·麦卡恩分坐在他的两旁。保安人员弗兰克·巴里开车，吉姆·罗利、这组保安人员的头儿，迅速坐进了司机旁边的前排座位。车子开走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们开往密苏里州克莱县的那个小旅游城镇埃克塞尔西奥斯普林斯，住进了埃尔姆斯旅店，16 年前，当杜鲁门得知自己未被汤姆·彭德格斯特选中做州长的那天夜晚，失望之余，他也曾逃避到这同一地方。

这座布局散乱的三层木石结构的旅店是自 1880 年的年代发现矿泉以来建成的几家旅店中的最后的一座。它吸引人的主要地方在于它的与世隔绝、宁静和安详。众所周知，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D·洛克菲勒以及艾尔·卡彭都曾来到埃尔姆斯旅店避开公众的视野。在这个 11 月的晚上，这地方几乎空无一人。

秘密保安人员挑选的几个房间都是在 3 层楼上的一条长长的走廊的尽头。杜鲁门离家时没带行李，他从旅店经理那里借来了浴衣和拖鞋，洗了一个蒸汽浴并作了按摩，然后在 6 时 30 分吃了送到他房间来的一份火腿奶酪三明治，并喝了一杯白脱牛奶。他吃饭时，打开了旁边的收音机。

第一份选举结果统计报告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作哈特斯洛凯逊的小镇，那儿的选票、包括 2 张缺席选举人票的情况是：杜鲁门 1 票，杜威 11 票。到密苏里时间晚 8 点时，杜威在诸如纽约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重要的东部州中均居领先地位，但杜鲁门却在全国的选民票中领先。

大约 9 点时，杜鲁门将吉姆·罗利唤进房间。杜鲁门说，他想睡一会儿，但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的活，罗利要叫醒他。

保安人员麦卡恩回忆说：“当然，我们全都没睡。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只是不睡。”

秘密保安人员的头目詹姆斯·J·马洛尼在纽约，他已确信杜威州长肯定将成为下届总统。马洛尼率领手下的 5 人在罗斯福饭店顶层的一个套间外站上了岗，杜威正与家人和朋友们在这个套间内休息，等待着走下楼到挤满了人的罗斯福舞厅去宣布他的胜利消息。

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外面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门前草坪上大部分也被人群占据。一股汽车的车流在街上缓缓通过，司机们一边慢慢地驾驶着汽车，一边观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或招呼着朋友们。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们已在街道两旁房屋的大小小的门廊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指挥部。

夜晚的天气相当凉。杜鲁门住宅的每一个窗户里都亮着灯，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只有楼上大厅中的窗帘是打开的，从那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幅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肖像画。

记者们指望着总统能够出现。《考察家报》的休·金特里回忆说：“我

们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待着。”像其他住在附近的人们一样，他认为这将成为独立城最激动人心的夜晚之一。到晚间 11 点时，尽管几位评论家和共和党主席布劳内尔仍预言杜威会取胜，但杜鲁门却不可思议地在选民票中仍然领先。聚集在草坪上的人们开始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快活的好汉”以及“今晚这个老城中的热闹时光”。

接着，门廊上的灯亮了，玛格丽特走出来。她微笑着站在门廊上，双臂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势。

她宣称：“父亲不在家。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这后一句话不是真话。

记者们表示怀疑。休·金特里回忆说：“我们不会相信这话。”一些群众开始散去。

窗内的灯亮了通宵，全城以及全国家庭中的灯也都亮了通宵。

“多么难忘的一个夜晚呵。”玛格丽特在日记中写道，她感到自己正处在创造历史的中心地带。到午夜时，杜鲁门已在选民票中领先了 100 万票。

我整夜都没睡。我一直在楼上楼下地奔忙，不断地应答看来自（米勒巴赫饭店总统套间的）比尔·博伊尔的直线电话，他告诉我计票结果。我们处于领先地位，不过，大约在凌晨 1 点 30 分时，我们突然落后了——然后又逐渐地回升。父亲已悄悄溜到埃克塞尔西奥斯普林斯去了，记者们正发疯似地找寻他。他们说，如果我告诉他们他去了哪儿，他们将答应我提出的任何条件。

近午夜时，杜鲁门醒来，打开了收音机，拨到 NBC 台，收听到政治评论家 H·V·卡顿伯恩那带有权威性的声音，这声音曾报道过 1938 年慕尼黑会议的消息，这声音被很多美国人认为是非常可靠的新闻。卡顿伯恩说，尽管总统领先了 120 万张选民票，但他仍将“无可置疑地会被击败”。杜鲁门关掉了收音机。转过身，又睡着了。

保安人员罗利、尼科尔森、麦卡恩和巴里在后来的几个小时中也没有睡觉，他们一直在收听 NBC 台的广播。罗利回忆说：“大约凌晨 4 点钟，突然间潮流转变了。因此我揣测：‘这便是重要的事情！’于是我走进屋去告诉他。‘我们胜利了！’他打开了收音机。”

卡顿伯恩正在报道说，杜鲁门已领先了 200 万张选民票，尽管卡顿伯恩说他仍看不出杜鲁门如何才能当选，因为在俄亥俄和伊利诺伊这样重要的州中，杜威获得的“农业地区的选票”尚未被计入。

“我们已经狠揍了他们。”杜鲁门说。罗利被告知去准备车。“我们回堪萨斯城。”

差几分钟 6 点、天刚要亮时，这辆黑色的福特车开到了米勒巴赫饭店门前。街道上空无一人。

在总统的总部、这个 17 层楼上的楼顶平台的房间里，杜鲁门只看到 4 个人已起床走动——马特·康内利、比尔·博伊尔，以及堪萨斯市的两位律师杰罗姆·沃尔什和扬·莱曼·菲尔德，后者曾独自横跨密苏里为杜鲁门当

选做巡回演讲，而现在，因为他离门最近，所以有幸成为第一个与总统握手并向他表示祝贺的人。

查利·罗斯像是个醉死鬼似地四仰八叉躺在一张床上，但他确实是精疲力竭了。对所有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夜晚，而对罗斯来说尤其如此。新闻记者们因他不说出杜鲁门的去向而对他大发雷霆，而罗斯也终于忍耐不住，显示出了自竞选运动开始以来“他的第一次歇斯底里的表现”。他不知道总统去了哪儿，马特·康内利也不知道。他们没有人知道。

这几间屋内都乱糟糟的。杰罗姆·沃尔什后来试图描述当时的景象，他写道：“周围没剩下一滴酒，顺便说一下，到处都是不加糖的咖啡和香烟，还有4部响个不停电话……6点钟，我们都起了床。”

杜鲁门虽然没刮胡子，但却显得精力充沛、目光炯炯有神，“就像是度了两星期的假而恢复了精神的人一样”。他脱掉外衣，坐在长沙发椅上问道：“情况怎么样了。”

尽管杜威赢得了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州，但杜鲁门却在马萨诸塞州中获胜，并赢得了除4个州——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被瑟蒙德赢去的路易斯安那州——之外的其余南部各州，同时他在威斯康星、艾奥瓦和科罗拉多州也处于领先地位。他在伊利诺伊、俄亥俄，以及非常关键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到目前为止，也以微弱的多数领先。在选民票的计算结果中，他已领先近200万票。杜威尚未承认失败。

不过，使屋里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杜鲁门在此时此刻的那种绝对的平静。莱曼·菲尔德说，总统显得“全然不在意”这些情况。一切迹象表明，他是一个即将实现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翻盘的人。他已使两党的专家和职业政治家们惊惶失措，更不必说专栏作家和民意测验者掀起的全国大合唱了。这位曾经连获得本党提名也要经历苦战的总统现在正在击败那位人人都说是不可战胜的竞选对手。这不仅是长期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获全胜的最辉煌的时刻，而且是有史以来任何美国政治家所能取得的一项最伟大的个人的胜利。可是，他坐在那儿，就好像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会发生似的。“他仍旧像是那同一个老的哈里·杜鲁门。”菲尔德在40年后如是说、对那天清晨的回忆仍使他感到惊叹。杰罗姆·沃尔什·被杜鲁门的绝对镇静所感动，他决定在一切都还记忆犹新的时候记录下这一场面，几天后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

他既没有显示出紧张，也没有表现出得意。例如，有人尖刻地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华莱士，民主党将会以很大的多数赢得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可是，总统摇了摇手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提到亨利，他并不是一个坏蛋；他正在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在这个世界上有充分的权利去追寻他自己的路线。还有人提到《堪萨斯城明星报》的那个“胜负未卜的选举”的头条标题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总统只是一笑，说：“罗伊·罗伯茨会在几小时后改变观点。”我没有听到总统提及杜威的名字。

我试图让你有……一种我们都具有的惊奇感，即总统正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冷静来面对这整个形势，他那种认为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态度，就好像两个星期前他就已经从一颗水晶球中看到了这种结局似的。清晨6点时，杜威州长尚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承认失败。可以

想象，俄亥俄在后来的计票中可能能够扭转形势。加利福尼亚或伊利诺伊也可能扭转形势，总统领先的局面可能被完全地翻转过来……事实上，杜鲁门先生在清晨 6 点时似乎已对事情不太感兴趣了。对他来说，选举已经获胜，并且自他开始诉诸人民进行他的战斗的那天起，选举就一直在获胜，他的思绪已经转向了他的计划的其他方面……我想，总统的镇静……已经对我们所有的人说明，他在职期间的那些危机年代已使他得到了可资利用的巨大的内在力量和训练。

沃尔什正如他进一步写道的那样，不能不想到了亚伯拉罕·林肯。“这是一种多愁善感的流露吗？”他问道，“我认为不是。”

查利·罗斯记得在 6 点半时被人推醒。“我睁眼一看，老板正在我床前——咧着嘴笑。我们大家立即就开始了谈论。”

杜鲁门给贝丝和玛格丽特拨通了电话，她们两人听到了他的声音后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叫来一位理发师，刮了胡子并修剪了一下头发，然后换上了一件新的白衬衣，打上蓝色的圆点花纹领带，穿上了一身双排扣的蓝色西服。

到 8 点 30 分时，俄亥俄已归了杜鲁门，使得他以 270 张选举人票高居榜首。总统套间中爆发出了庆祝胜利的欢呼声。维维安·杜鲁门、特德·马克斯、埃迪·雅各布森、艾尔·里奇、汤姆·埃文斯和弗雷德·坎菲尔都来了。外面的大厅里挤满了盛情洋溢的美好祝愿者。

9 点 30 分，杜鲁门被宣布在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州取胜。到此时，事情已很明显，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都取得了控制权。

10 点 14 分（在纽约的罗斯福饭店里是 11 点 14 分），杜威承认选举失败。米勒巴赫旅店的 17 层楼上，狂热的欢呼声越来越大，通往总统套间的各扇门突然大开，更多的友人、政治家和记者夺门而入。

“谢谢你、谢谢你。”杜鲁门不断地说着，不断地握手，在一盏盏的玻璃杯后面，他的两眼中含着泪花。

数分钟后，独立城的每一座钟、每一支汽笛、警报器和汽车喇叭似乎是同时鸣响。该城的每一个人原来都未想到要庆祝胜利，但是现在，罗杰·赛蒙市长立即宣布放假一天。学校也放了学，并且在傍晚时分，在一场喧闹的自发的自豪和友善的流露中，4 万人挤到了广场上来目睹这位获胜的故乡之子，并向他致敬。

杜鲁门站在一个小讲台上发表了演讲，身后就是他曾工作过的县法院办公楼，他明显地被该城历史上最多的群众的到来所感动，把这称之为不是为他、而是为这个国家所举行的一次庆祝活动。

整个国家都目瞪口呆。它被称作是一次“令人吃惊的胜利”，“使人惊讶”，“一个大奇迹”。《新闻周刊》在封面上写道，杜鲁门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人。

他在总统政治历史上的最不利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没有任何一个民意测验组织的预测是正确的。没有任何一位电台评论员或报纸专栏作家、或者



报道这次竞选运动的数百名记者中的任何人正确地预测到了这个结果。每一位专家都被证明是自己错了，正如有人所言，“全国各地都发出了喧闹的嘲笑声”。人民愚弄了那些被认为是知道内情的人。在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当中，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哈里·杜鲁门成了唯一知道他正在谈论什么的人。

女演员塔鲁拉·班克黑德给杜鲁门发了一封电报，说：“人民已将你安置在了你的位置上。”电台喜剧演员弗雷德·艾伦说，杜鲁门是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失败、但却轻而易举地获胜的第一位总统。

几家报纸曾预测说这是一次势均力敌的选举。《匹兹堡信使报》、一份主要的黑人报纸的驻华盛顿记者还曾分析了杜鲁门在理论上获胜的可能性。

《信使报》的约翰·L·克拉克曾随杜鲁门的专列旅行了一段时间，他很看重听众的规模。克拉克写道，总统在除南方外的23州的胜利，加上在南方的运气，或者在加利福尼亚或纽约州的翻盘，就可能造成总统的获胜，尽管他无法预言这种情况能否发生。作家路易斯·比恩也未能预测出这种结果，尽管他在7月份出版的一本书《如何预测选举》中，也曾提出了杜鲁门翻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事实上，杜鲁门赢得了28州总共303张选举人票，并且在选民票上以刚刚超过210万票的多数击败了杜威。在最后的记票结果中，杜鲁门获得24105812票，杜威获得21970063票。

杜威在16个州中取胜，赢得189张选举人票。亨利·华莱士和斯特罗姆·瑟蒙德各获得110余万张选民票。瑟蒙德由于在南部4个州中取胜，从而获得39张选举人票。华莱士没有在任何一州中赢得多数，因此，未获得一张选举人票。

国会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获54个参议员席位，共和党获42席。在众议院中，民主党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即263席比171席。

尽管杜威赢得了东北部的3个工业大州，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以及他自己的家乡州密歇根，但杜鲁门却在这个国家最大的13个城市中彻底地击败了他，并且攻占了共和党在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堡垒，赢得了俄亥俄、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威斯康星，甚至艾奥瓦，“这个共和党人最坚固的堡垒”。尽管有斯特罗姆·瑟蒙德的反叛，杜鲁门仍拉住了南部的7个州。他赢得了4个南北交界的州、即西弗吉尼亚、肯塔基、俄克拉何马以及他自己的家乡州密苏里，在密苏里，他以25万余张选民票的多数取胜。在西部，起初只有亚利桑那州看起来对民主党来说是保险的，结果他赢得了除俄勒冈以外的所有各州。

杜鲁门还使杜威所得的全国选民票总数（45.1%）比他1944年与罗斯福竞选时的得票少了一部分。

应该指出，杜鲁门在诸如俄亥俄、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这样一些关键州的胜利是很微弱的。他以7000票的勉强多数赢得了俄亥俄，以3.3万票的多数赢得了伊利诺伊，以1.7万票的多数赢得加利福尼亚。这3州中的任何两州的形势逆转都会使他获得的选举人票少于必要多数，这样，就将由众议院来作决定。如果杜威赢得了全部这3个州，那么杜威就会获得足以取胜的选举人票，从而赢得总统职位，而杜鲁门则会在获选民票领先的情况下完蛋。这种逆转，总共只需要3.3万张选民票按比例分配到这3州，便可以完成。

不过，下述的情况也是确实的：其他州中类似的逆转可能使杜鲁门成为更大的赢家。例如，杜鲁门差一点就在纽约州取胜，如果不是由于亨利·华莱士在该州席卷了 50 万张选票（它占华莱士在全国得票总数的一半），那么毫无疑问，杜鲁门就将赢得纽约。克拉克·克利福德说：“我认为，错误在于没有给纽约以更多的时间。我们本应赢得纽约的。”杜威仅以 6.1 万张选票的多数赢得该州——在他的家乡州——而纽约州意味着 47 张选举人票。如果没有华莱士或斯特罗姆·瑟蒙德，杜鲁门可能多得 85 张选举人票，从而使他在选举团中占据压倒优势。

对于这种不可能的结果为什么会进行解释的努力立即就开始了，可以理解，那些在这件事情上已失败得如此明显的记者、编辑和广播评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灵魂自我反省。

H·L·门肯对这种结果感到高兴，因为它确实“使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人都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认为，答案就在于两位竞争者在选民面前所表现出的反差。门肯在结束自己漫长的评论美国政治问题的生涯之前所写的最后几篇专栏文章中的一篇中写道：“两位候选人都没能发表一篇将会保存在教科书中的巡回竞选演说，不过，杜鲁门的演说至少有热情。当杜威听起来就像是大学教授那种最糟糕的装腔作势的声音吟诵他的论文的时候，杜鲁门却很实际地在演说中用丑角的方式来满足周围的那些低能者们。他每表演一次都能获得选票，而杜威却丧失选票。”

杜威本人认为，这个结果完全是由农业地区的选票造成的。他在写给亨利·卢斯的一封信中称：“农业地区的选票在最近 10 天中转变了，你可以分析一下从现在直到上西天前的这些数字，它们显示的全部迹象将表明，我们失去了农业地区的选票……”

乔·马丁由于新的民主党议员在众议院中占据了多数而不再可能成为众议院院长，他说，错误在于共和党，它“脱离”人民太远了。像许多老卫士派一样，马丁和塔夫脱都认为杜威进行了一场深不可测的竞选运动。阿瑟·范登堡以多少有点屈尊的口吻赞扬杜鲁门说：“你不得不称赞那个矮子。”塔夫脱则狂怒地说：“我并不在乎如何解释这件事情。把那个无赖式的政客送回白宫就是对一切常识的玷污。”

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最终民主党花在这次竞选运动上的钱比共和党还要多，一般人的印象却正好相反。民主党花费 2736334 美元，共和党花费 2127296 美元——尽管给民主党的许多最大笔的捐助是在事后、即 11 月 2 日以后注入的，其中约 70 万美元是填迟日期的支票。

共和党政策委员会起草的一份特别研究报告的结论认为，从本质上讲，共和党人自己应该受到指责，他们“错过了”16 年来赢得总统职位和保持对国会的控制的最好机会。错误主要是在于杜威的战略和杜威的表现，他的“避让”、“超出选民理解力”的演说以及“不加批评地容忍民主党宣传”的错误。这份报告说，杜威被民意测验的结果所“麻醉”，因而“丧失了主动性”。杜鲁门对第 80 届国会的猛烈攻击“尽管是毫无原则和蛊惑人心的”，但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因为这使他能够“把战斗引向”远离他本人和他的党的记录的战场。“他成功地唤起了公众的义愤……民主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以及它保住了总统职位，便是他们战略上的辉煌的雄辩证明。”

正如许多研究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农民的选票、劳工的选票、黑人的选票、以及西部的选票在杜鲁门的成功和民主党的彻底胜利中都起了重要的作

用——正如罗的备忘录所预言的那样。

杜鲁门为进行竞选运动而选择的方式，其价值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例如，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巨大努力给他在该州带来了在所有各州中最大多数的选票。他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传统的共和党控制的各县中所进行的那次额外的汽车巡回竞选改变了那里的潮流，对赢得伊利诺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0月11日在跑遍了俄亥俄农业地区所进行的竞选，曾被其他人认为是白费努力的乘火车巡回竞选的一天，实际上它显然获得了不同的效果。在杜威曾于1944年赢得的各县中，杜鲁门成了赢家。

少数民族强烈地投票支持杜鲁门。人们发现，天主教选民绝大部分也支持民主党。在波士顿和匹兹堡的一些主要的天主教选区中，杜鲁门的得票超过了过去艾尔·史密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得票。

有报道说，杜威承认失败后，在总统套间的喧闹和激动气氛中，杜鲁门曾说：“劳工干得好。”不过，这个国家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确实在为他的竞选努力挖掘选票，并提供了主要的财政支持，可约翰·L·刘易斯和阿万利·约翰斯顿却在杜威的阵营中，而且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的失败也很难说是表明了劳工在选举日为他尽了力。

正如杜威所说，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选票，而且正像杜鲁门的班子所预见的那样，在这里，玉米价格的下跌起了重要的作用。1921年，下跌的谷物价格曾使服装用品店主杜鲁门破了产。如今，它们却帮助使总统杜鲁门留在了白宫。在8个最大的玉米生产州中，他赢得了除2个以外的其他各州。

黑人对杜鲁门的支持是压倒性的。他获得了2/3以上的黑人选票，这个百分比甚至高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历次得到的。在俄亥俄和伊利诺伊这样一些关键的州中，可以说，黑人选民对于杜鲁门取胜比任何其他选民都更关键。谈到杜鲁门的民权计划及其对此次选举的影响时，J·霍华德·麦格拉思称它具有真正的政治家的风度，并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帮助。“它使我们丧失了3个南部州，但却使我们赢得了俄亥俄和伊利诺伊州，如果不是由于亨利·华莱士，它将为我们赢得纽约州，而且，它也是赢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重要因素。”

世界不稳定的形势似乎也对杜鲁门的竞选运动有利，特别是当柏林空运取得了毫不含糊的成功这一点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几位杜鲁门的最尖锐的批评者（沃尔特·李普曼也在其中）如今也勉强地承认，甚至那个“不合时宜”的文森事件最终也被证明是杜鲁门在政治上的一个纯收入。杜威班子的成员埃利奥特·贝尔在谈到俄国的威胁时说：“这只熊咬住了我们。”

此外，一批强有力的民主党候选人显然也是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伊利诺伊，最引人注目的是，杜鲁门的3.1万选民票微弱的但却是关键的优势，与保罗·道格拉斯在其争取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以及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艾德莱·E·史蒂文森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道格拉斯以40万张选票的多数取胜，而史蒂文森更以令人惊叹的57万票的多数当选。

休伯特·汉弗莱在明尼苏达州赢得了参议院的竞选。戴着浣熊皮帽竞选的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成了田纳西州、这个杜鲁门阵营中的另外的一个州的新当选的国会参议员。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已在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州获胜。弗兰克·劳希则在俄亥俄以超过20万票的多数当选为州长。

关于共和党将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预测被人们广泛地相信着，它把共和党选民哄骗得进入了一种自鸣得意的错觉中。许多人争辩说，如果民意测验不

是那么一边倒和一致，那么，共和党就会做更大的努力，在选举日呆在家里的共和党人就会更少，这样杜威就会取胜。但是，由分析家塞缪尔·卢贝尔为《星期六晚邮报》领导的一项对此次竞选运动所作的研究显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卢贝尔说，共和党在东部工业地区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原有的罗斯福的选民们的冷漠的错误所致，他们认为杜鲁门没有机会取胜。“这些呆在家里的民主党人远没有使杜威为这次选举付出代价，反而可能从几乎与1936年兰登遭受的同样的惨败中拯救了他。”

乔治·盖洛普、埃尔莫·罗珀以及其他公共舆论专家显然都目瞪口呆。盖洛普说，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罗珀承认：“我不可能犯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但究竟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后来的研究显示，民意测验直到10月中旬时都是合乎情理而精确的，正是在此时，盖洛普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竞选调查，预测结果刚好在选举日之前发表。错误也许不在于此次民意测验不完善，而是在它是两周前进行的，已经过时了。显然，正是在这最后的两周中，群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几乎在全国各地，似乎是大批的同意说杜威肯定会赢的人们，以及那些毫无疑问会下注赌杜威获胜的人们，去到了投票站并投了杜鲁门的票。

《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报道说，在俄亥俄，“全州上下”没有一个他与之谈过话的杜鲁门的选民指望杜鲁门会取胜。“然而，来自煤矿、面粉厂和农场的大多数的这些‘小人物们’却暗暗地、坚定地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走出家门去投票支持他。”

偶然听到两个俄亥俄的农民开玩笑地谈到对一位投票支持杜威的邻居的不满，他们说：“那个家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支持再过4年的繁荣日子吗？”

另一个人说：“我一直在读有关杜威那家伙的消息，我越读，他就越使我想起来一则那种尽力从我口袋里抠钱的狡猾的广告。现在，哈里·杜鲁门正在到处竞选、喊叫，完全是在孤军奋战——我感到，他能够理解我所处的这种困境。”

艾奥瓦州格思里县的一位农民告诉一位记者说，整个夏季他都在谈论投票支持杜威。“但是，当投票日来临时，我却不能这样做。我记起了……所有得到的一切好处都是在民主党领导下实现的。”

伊利诺伊州迪凯特的弗雷达·库姆斯说，她投票支持杜鲁门是因为他是“普通的人”。

沃尔特·李普曼对全国各地他的大量读者解释了选举的这种结果，称之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死后的一次大捷。李普曼说，这次选举完全是新政的另一次胜利。

这个看法是杜鲁门比较赞同的。在给温斯顿·丘吉尔发来的祝贺信的复信中，杜鲁门写道：“当你读到这个国家的报纸时，你也许会感到似乎这里发生了一次了不起的政治翻盘。其实它不是政治翻盘——它仅仅是过去16年来一直在实行的那些政策的继续，是人民想要的那些政策的继续。”

但是，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来说，正像对于大多数亲眼目睹了这场竞选运动的其他人来说一样，造成这个结果的全部原因在于哈里·杜鲁门本人的“勇敢战斗”以及他的自信和对选民们的信任。作为巡回竞选家，这位总统“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华盛顿邮报》在其编辑部的文章中说，美国人性格中的某些东西回报

了一位斗士。“美国人民钦佩有勇气的人，即便他们并不赞同他。” 德鲁·皮尔逊写道，他在 11 月 2 日以前所写的文章中也像报界的几乎所有记者一样，犯了明显的错误。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承认：“人们必须向一位拒绝屈服的挨了打的人脱帽致敬。”

理查德·斯特劳特在《新共和》杂志上把选举之夜描述为政治作家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

作为预言家，我们个人已经蒙羞，但却仍有一种辉煌和奇妙的感觉：美国人民不能由民意测验的结果来左右，他们清楚自己的想法，并且选择了相当不可靠但却有勇气的人、杜鲁门来擎起他们的旗帜。

这种感觉广泛蔓延，以致对民意测验的威信形成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人们开始怀疑它对国家是否有益。埃本·艾尔斯写道：“我似乎感到存在着一种危险：如果民意测验结果继续保持正确的话，那么民意测验就可能达到可以轻易控制一个选举的结果的程度。”

纽约时代公司总部进行了所有事后分析中最认真也最有趣的分析，来自读者的电报充斥了该总部，电文大都写道：“哈，哈，哈！”总编辑亨利·卢斯在给各部门首脑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时代》和《生活》已引起了人们的“一大堆怀疑”，编辑们“非常苦闷”。卢斯像其他人一样进行了自责。他承认：“我本人对这次竞选运动的关注比以往我经历过的任何一次竞选都要少。”记者和编辑们不仅被民意测验结果所哄骗、而且被两党的政治家们所哄骗。卢斯说，每一个人都本该知道得更多，每一个人都本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本该一直工作到最后——“就像哈里·杜鲁门所做的那样！”

卢斯认为，杜威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杜威本人。“他的个性在反对他。”

《时代》杂志的总编 T·S·马修斯认为，新闻界在选举问题上犯错误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闻界经常触摸不到大众的意愿。

我认为新闻界一直在装聪明（或者可以说是自作聪明？），这种状况已远远超出了它实际具有的智力水平，而且一段时间以来它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马修斯写给卢斯的信中说）。现在看来，明显的事实已显示（至少在有关的政治问题上），新闻界多年来都不明白今天究竟是什么时代。

目前，最大的错误在于把杜鲁门看作是一个在政治上创造奇迹的人。“这不是一种个人的奇迹——那可太容易了——而是一种不可置疑、不可忽视、却被错误地报道了的全国的现象。”

然而，在《生活》杂志总编辑小约瑟夫·J·桑代克看来，问题主要是在于偏见。他写道：“诚然，我们并不打算误导我们的读者。”

然而，我确实感到我们自己被自己的偏见所误导了。由于这种偏见，使得我们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去报道我们不相信的另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太愿意接受诸如奥马哈的空旷的礼堂这类图片的证据，而忽略后来的听众了。我们太热衷于报道杜鲁门的失误，而忽

略对共和党的竞选运动不利的东西了，诸如：杜威空洞的演说、糟糕的共和党的各类候选人、共和党赞同大企业的危险性。我本人对这类事情曾有过许多担忧，但却认为反正选举结果已确定了，我们可以以后再来训诫这些共和党人……

桑代克说，杜鲁门的胜利“主要是一项个人的胜利”。

而这一点，正如事情后来所证明的那样，是选举后出版的第一期《时代》周刊的结论。该杂志在称赞作为政治家的杜鲁门时说：“他完全凭借自己而取得了胜利。”他是美国政治中的“新冠军”，是“复苏了的民主党的绝对首领”。

《生活》杂志在打头文章的标题中写道，“杜鲁门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杜鲁门如今是“辉煌场面中的经久不衰的英雄”，是经历过一场竞选运动的“一位最富有战斗精神的人”。

对于萨姆·雷伯恩和乔治·马歇尔这类坚定地忠实于杜鲁门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一直与他在一起的疲惫的白宫班子成员们来说，关于杜鲁门为什么会获胜这一点是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他是通过作为他本人、从未忘记自己是谁的这种方式，是通过以他自己的风格走到人民中间去的方式而获得这场胜利的。

萨姆·雷伯恩说，哈里·杜鲁门获得了90%的人的信任。马歇尔在11月4日写给杜鲁门的信中指出：“你已完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个人的战斗。你所做的正是你曾告诉过我、而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查利·罗斯写道：“我认为哈里·杜鲁门也成熟了，在精神方面成熟了。”罗斯说，杜鲁门如此努力地竞选，是因为他真心地认为这个国家的基本幸福正处于危急中。他想要世界和平，国家繁荣，他想使民主党真正地成为人民的党。此外，罗斯写道，他竞选也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的”动机。“他曾被人描写为小人、愚笨、无能，不适于担当总统的工作。他具有一种人类的欲望，要证明他的诽谤者们错了。”

像其他人一样，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杜威的人工作做得很糟。“我认为杜威的整个竞选运动就是一个错误……他们贪婪、愚蠢，并急于恢复权力。”不过，这并不能解释杜鲁门的成功。克利福德也不认为杜鲁门的成功是由于他身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敏锐性。

我不认为他获胜是由于他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他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一个明智的政治家……但那并非他当选总统的理由……他获胜的原因在于这个人身上的惊人的勇气——他拒绝泄气，他要经受竞选运动考验的愿望、经受疲劳的考验的愿望，经过每一步的战斗开辟出道路的愿望，获胜的愿望……

获胜的并非作为政治家的哈里·杜鲁门，而是作为男子汉的哈里·杜鲁门。

11月4日，星期四，清晨，在圣路易斯短时停靠期间，当杜鲁门走出车厢，踏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的车尾平台时，摄影记者们抢拍下了那张将会被人们记忆得比任何其他一次竞选运动更久、也更为人们所欣赏的照片。杜鲁门微笑着，与记者们聊着天，这时，有人递给他一张《芝加哥论坛

报》，这份他最不喜欢的报纸的第一页通栏写着巨大的、很快就出了名的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杜鲁门双手高举起这份报纸，咧开嘴大笑，这位曾经仅有一线生机的人似乎不仅是在说，“不要相信你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切东西”，而且似乎在说，在美国，仍然是人民作裁决。

像某些别的总统的其他照片那样——西奥多·罗斯福身着白亚麻布西装在巴拿马驾驶蒸汽掘土机的照片，伍德罗·威尔逊在凡尔赛的照片，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 1941 年盛夏在“威尔士亲王”号的甲板上在温斯顿·丘吉尔身边昂着头、高唱古老的赞美诗的照片——哈里·杜鲁门 1948 年的这张照片传达了一种几乎所有其他照片所没有的男子汉气概和抢拍时机感。

11 月 5 日，星期五，杜鲁门凯旋般地回到华盛顿。他所受到的欢迎是这个首都的历史上最大、也最热情奔放的一次。这座都城中的人们如此激动，以致前一天报纸便预言说也许会有 50 万群众走上街头。但实际上，至少有 75 万人——该市人口的 2/3——排列在他从联邦车站到白宫的道路上。

这一天天气很暖和，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杜鲁门、贝丝、玛格丽特、当选副总统的巴克利和他的女儿马克斯·特鲁伊特夫人以及霍华德·麦格拉思乘坐在一辆大型的 7 人座敞篷“林肯”车中，两名秘密保安人员站在汽车的后保险杠上。杜鲁门和巴克利坐在后座的靠背座上。

途经《华盛顿邮报》那正面用石头砌成的办公大楼时，杜鲁门抬头看见二楼上横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被迫认错者欢迎您回来。”

选举日的第二天，《邮报》的全体工作人员曾发了一份电报，邀请他出席一个“乌鸦宴”（即以吃乌鸦的方式来谢罪——译者注），宴会邀请了所有的报纸社论作者、政治记者、民意调查者、广播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主菜就是冰冻的老乌鸦，杜鲁门将独自享用火鸡。这位荣誉贵宾将着西服革履，系白色领带；而其他人则穿丧服。在复信中杜鲁门写道，他“无意对任何人幸灾乐祸，也无意看到任何人去借喻性地吃乌鸦或做其他事情。现在我们应该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创造一个人人只要愿意就能吃上火鸡的国家”。

漫天的五彩纸屑飘落下来，一支乐队高奏“我只是野性难移的哈里”。杜鲁门挥动他的帽子，微笑着。

到达白宫，他走到北门廊上的一个麦克风面前，大声说谢谢你们。整条宾夕法尼亚大街上，整个拉法斐耶特广场上，他目所能及的各个地方，到处都挤满了人群，向他招手、欢呼、大声地喊叫着他的名字。

## 第五部 世界的重担



## 十五、铁人

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他的胜利带给他的巨大责任。他的决策也许会影响人类的未来。在哈里·杜鲁门的美国的前面，到处都潜藏着难以形容和难以想象的危险。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华盛顿明星晚报》，1949年就职日

### 1

1949年1月20日，星期四，华盛顿寒气袭人，但也让人眼花缭乱，据国家气象局报道，有一阵来自北方的强风，但阳光却是“100%”。城市上空万里无云，呈现出一片鲜艳的海蓝色。市内到处都是五颜六色，在这富有生气的冬季氛围中格外显眼。在阳光下，一切都在闪闪发光——白色的大理石、铜管乐器、鲜红的上衣、铜纽扣、擦洗一新的黑色官方轿车的长长的车队。从国会山到白宫，沿着整条宾夕法尼亚大街，千百面彩旗就像爱国影片中的战旗一样，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这是一个创造辉煌时刻的日子，正如总统的女儿在日记中所写，是“一个完美的就职日”。正午时分最高气温为华氏30度，但由于有风，天气显得相当冷。

自从战前以来，华盛顿就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就职典礼，而这一次将要成为创记录的、最大的、花费最多的就职仪式，游行也是这个城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一年前，当共和党人重掌总统权力看起来是如此肯定的时候，控制着第80届国会的共和党人曾投票同意拨出前所未有的8万美元来举办一个迄今为止最豪华的就职仪式。如今，兴高采烈的民主党人得到总统满心喜悦的批准，决定把这笔费用全部花光。

群众的规模也令人吃惊。比一个世纪前的1829年、在一个同样的阳光灿烂的冬日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城市里观看安德鲁·杰克逊在国会东门廊前宣誓的民主党人还要多。那是这种仪式首次在那里举行，1.5万至2万人出席观看。在随后举行的杰克逊的著名白宫宴会上，参加的人数增长到难以控制的程度，为了减轻压力、保护这座建筑物，威士忌酒桶被提了出来放到了草坪上。如今，为了观看哈里·S·杜鲁门、这位现代的杰克逊派人物、另一位“普通人民的人”和“1948年最伟大的政治戏剧的主角”坐车到国会去在那同一地点举行同样的宣誓，100多万人聚集到了这里，这数字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要多。

几天来，他们一直在不断地涌入这座城市，这些人中包括戴着西部风格帽子的各种代表团、带着随员的大城市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妇女委员、来自美国军团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童子军队伍、佛罗里达海水浴美容业的代表，以及由罗杰·塞蒙市长率领的密苏里州独立城的50名格外自豪的居民代表，还有第129野战炮团D连的98名老战士，柯蒂斯·蒂尔南阁下是他们的名义连长。演员和影视明星们也来了——吉恩·凯利、简·鲍威尔、简·弗罗曼、莉娜·霍恩、埃德加·伯根、艾伯特和科斯特洛——还有本厄·古德曼和莱昂内尔·汉普顿的两支巨大的军乐队，以及菲尔·斯皮托尼和他的女子管弦乐队。

大多数饭店已经爆满，某些饭店的房价已3倍于平日的价格，而且在这

座城市的历史上黑人宾客首次住进了几家最好的饭店，因为杜鲁门已下令：美国黑人在就职典礼的主要活动中将受到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的欢迎，以往从没有任何总统这样做过。

单是参加东门廊宣誓仪式的“应邀贵宾”，在就职台下就座的就有 17740 人；还有 4.4 万人在游行道路两旁的木制大观礼台上就座，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座位支付 2 至 10 美元。

这也是首次通过电视转播的就职仪式。在场的观众已如此众多，还另有更多的 10 倍于此的观众可以通过电视观看——估计有 14 个大城市的 1000 万人已由同轴电缆联接起来。这将使它成为迄今为止观看同一个节目的人数最多的一次就职仪式。的确，自从乔治·华盛顿首次就职以来，看到哈里·杜鲁门于 1949 年 1 月 20 日在电视上宣誓成为总统的人，比所有见过以前的总统宣誓的人的总和还要多（远至圣路易斯这个同轴电缆的最西端的城市，据报道说，电视图像就像在华盛顿的活动一样，“鲜亮而清晰”）。此外，还有 1 亿人能够通过广播来收听。

不过，正如日后人们常说的，那天参加仪式、观看游行、出席宴会和舞会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会比那位处在这壮观场面的中心的人更高兴，对他来说，一切迹象都显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他的女儿说，是“这样的日子中的他的节日”。杜鲁门在戏答他本人对出席这些仪式的自我邀请时，以极高的兴致写道：“如果天气允许，我希望出席。”

自 11 月份在基韦斯特休假以来，现在已过去 2 个月了，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由于白宫的情况很糟，总统及其家人现在住在街对面的布莱尔大厦中，即宾夕法尼亚大街 1651 号。当杜鲁门在大选后返回华盛顿的那天，他已被告知，那座老的总统官邸正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随时可能坍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座建筑的唯一安全的地方竟是他那个新阳台（他说：“难道那不是说明了一切吗！”）。

这种形势的真相首次被公开；白宫对旅游者关闭了。总统、第一夫人和玛格丽特都去了基韦斯特——这是贝丝和玛格丽特第一次访问佛罗里达的这座“小白宫”——由于油漆工和装修工昼夜工作，布莱尔大厦已收拾停当，家具也搬了进去，及时地赶上了总统家庭在感恩节时返回华盛顿。

私下里，杜鲁门对于这项变化和有机会来确定使白宫恢复其应有的风貌感到前所未有的幸运。由于他对建筑的热爱和对历史的热爱，他对这项规划的一切细节都由衷地感兴趣，负责这项规划的建筑师洛伦佐·温斯洛写道：“正是总统的意愿使得这项修复工程完成得如此彻底、完美，以致它的建筑状况和所有主要的固定的建筑终饰能够在未来的许多代人的时间里保持完好。”当时，这项工程计划进行一年。

1906 年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修建的西配楼还保持着良好的状况，可以继续使用。这样，杜鲁门又开始步行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往返”于椭圆形办公室之间，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后头几周他所做的那样。在秘密保安人员相随左右的情况下，他要在早晨穿过这条街道，午饭时又两次穿越，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又一次穿越这条街道。在他穿越时，街上的交通暂时中止，行人瞪大眼睛注视着。12 月初，有一次，一辆挂着弗吉尼亚牌照的小轿车差一点儿撞倒他，那位司机一个急刹车后，双手抱着头在思索他差点儿铸成的大错，可杜鲁门却无所谓地继续走他的路。《生活》杂志报道了这件事，它写道，从总统的阔步行走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是“一个新的非常

幸福的人……知道自己正走向何处……”

感恩节不久，杜鲁门作出了他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乔治·马歇尔不久将要去割除一个肾脏的手术，他已表明自己希望退休，杜鲁门经过慎重思考后，挑选了迪安·艾奇逊来做下一任的国务卿，以便开始他的新任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已私下向艾奇逊谈了这项任命。经过沉思后，艾奇逊说他无力胜任这项职务的要求。杜鲁门答称，这一点是无疑的，不过此时他也可以对自己或任何其他人说同样的话。问题在于他是否愿意做这项工作？

在非正式的谈话中，杜鲁门常说，这个国家中可能有 100 万个人可以当比他更好的总统，但那不是问题的要害。现在他，哈里·杜鲁门，是总统。

“我拥有了这项工作，我必须做这项工作，而你们这些人必须帮助我。”

柏林空运仍在以极大的努力进行着，它从未远离过他的思考。中国越来越成为令人忧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毛泽东的军队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麦克阿瑟将军从东京发出警告说，中国的“陷落”将使美国处于危险之中；而在国内，红色恐怖越来越使人担惊受怕。12月15日，阿尔杰·希斯被控犯有伪证罪。

在独立城过圣诞节时，杜鲁门坚持着每日的散步，还轻触帽沿向邻居们致敬，并且正如记者们所注意到的，在进屋前还小心地掸掉他靴子上的雪。圣诞节和就职日期间，他的生活逐渐开始繁忙。他通常破晓前便起床，然后一直忙下去，除了午饭后的一段短暂的小憩时间之外。国会议员和内阁成员一直在排着队进出于他的办公室。他批准了最后一批美国部队从朝鲜撤军——这个决定当时没有被任何人看作是严重的不祥之兆——新年那天，又发表了一个承认新的大韩民国的声明。1949年1月5日，星期三，他去到国会山向新的第81届国会宣谈他的国情咨文，再次要求实行一年前他所倡导的那同样的进步主义的社会计划，不过现在他给他的国内计划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公平施政”，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一次不像1948年1月几乎无人听他讲话那样，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洗耳恭听。

在1月7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显然很激动地宣布了马歇尔的退休和艾奇逊的任命。又有一天，他溜出了西配楼，飞往北卡罗莱纳州的派恩赫斯特，去探望正在康复中的马歇尔。

他要提出一项要求拨款 419 亿美元的新的预算，这是迄今为止和平时期最大的一笔预算，这笔预算中有一半的钱是用于国防和对外援助。他要准备出他的就职演说，要为许多会议以及更多的记者招待会和一个杜鲁门—巴克利俱乐部的宴会做准备；在就职日前夕的夜晚，他在“五月花饭店”的舞厅举行的一个正式的总统选民宴会上，使他的听众们感到了极大的惊喜，当时，他即席模仿 H·V·卡顿伯恩在选举日之夜以那不容置疑的干脆的播音风格所宣布的话：“尽管总统在选民票上领先 100 万票……但是当农村的选票被计算出来后，杜鲁门先生将被一个压倒性的多数票所击败。”听众们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杜鲁门似乎越来越有活力和信心。

他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应感到满意的人，他的年龄是 64 岁，在经历了近 4 年的总统任期和迄今一位总统所进行的最艰苦的政治竞选后，他看起来仍像他所说的那样，感到自己“非常健康”。他的个人声望，根据最后的计票结果，已反弹到 69% 的高度，与 3 年前的情况相当。国会已把他的薪金从 7.5 万美元提高到 10 万美元，并且另外增加了 5 万美元的免税款项来供他花费。

贝丝在就职日之前的几周中，据说一直在以出色的幽默而“妙语连珠”。

不过，在五月花饭店他对听众的演说中也存在着一种对责任的忧郁的压力。“无论如何我对这次大选并未感到得意洋洋，我确实没有感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同异常的东西。我只感到了责任，这正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东西。”私下里，他对处于在华盛顿看到的这种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之中的危险性感到担忧。他对自己班子中的某些成员吐露：“偶尔我自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把它拽出来。”

他的就职日在6点45分便开始了，当时，在昨晚的宴会完毕他睡了4个半小时后，便走出房间来到了布莱尔大厦的前门廊上。天还黑着，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寂静，一轮明月还挂在街对面老国务院大楼那巨大的大理石建筑的上空。

“就职日快乐，总统先生。”一名记者在便道上招呼道。

杜鲁门凝视着天空，说道：“妙极了，妙极了。看起来就像是老天爷打算再次支持我们。”

他穿一件黑色的大衣，灰色的西服，戴着一顶灰色的软呢帽。看上去显得机敏而安详。秘密保安人员在台阶上走上走下，也有的站在等待着他的轿车旁的路边。移居布莱尔大厦使他们增加了担心，因为这座四层楼的建筑物直接面临着繁华的大街，几乎与人行道齐平，它的前门仅比街面高出10级台阶。白天所有的时间里总有大批行人过往。总统每次出门都随随便便。二楼上他的卧室也面对这条大街。

几分钟后，他坐进轿车出发了，再次到五月花饭店去与D连的“小伙子们”重聚，共进密苏里火腿和粗燕麦粉的早餐，这些老兵们和着“蒂珀雷里”的调子唱道：“你是一个伟大的、伟大的人——哈里·杜鲁门；为了你，我们已经穿越了地狱。”他告诉他们，他不在乎那天下午1点钟以后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可要庄重些。

他告诉记者们说：“这些老战士们非常真诚。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打算。他们不想要任何官职。他们就是为了来到这里。他们不称我是总统先生，他们管我叫哈里上尉。”今天他想要他们和他在一起，就像是“一种仪仗队”。

这辆大型轿车从五月花饭店飞速开往白宫，车前的小旗子在前挡泥板上方向风飘扬。人群已经在拉斐特广场上聚集。当轿车经过时，人们朝他招手，也有人手搭凉棚，挡住早晨的阳光，想要看他一眼。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大约15分钟后，他从白宫西配楼返回布莱尔大厦去换衣服。10点整，他穿着就职典礼的盛装，礼服大衣和条纹裤，在贝丝和玛格丽特的陪同下，坐车经过两个街区，去到拉斐特广场上的圣约翰主教派教堂这个历史上的“总统教堂”作祈祷。仅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个祈祷——内阁成员、几位朋友和几位教区的居民——因为应杜鲁门的请求，事先没有宣布这次祈祷仪式。他坐在自詹姆斯·麦迪逊时代以来传统上保留给总统的63号座位上，和人们一起唱了开场的赞美诗“啊，上帝，我们过去时代的救世主”，并认真地诵读了《诗篇》第122篇：“为平安祈祷……愿平安在你城中……愿平安在你中间……”祈祷期间，因贝丝和玛格丽特都是主教派教徒，所以都跪在他的身边，杜鲁门则坐在那里，低着头。“用你的恩惠……注视和保佑你的仆人哈里，美国总统，以及政府中所有其他的人。”

这里他将充当许多角色的一天，从上尉哈里到仆人哈里，再到美国总统。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他有一段时间甚至将不是美国总统，而又成了普通

的公民哈里，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他的职务任期结束于正午，而由于早晨的耽搁，仪式比原来的安排推迟了。

他和艾尔本·巴克利一起乘车前往国会山，现在，他们两人都戴着白色的丝绸围巾和大礼帽，高高地坐在大型敞篷林肯轿车的后座上，以便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们。在国会山，圆形大厅中的欢迎仪式比原来安排的时间要长些。然后，所有的人都来到外面的就职典礼台上就座，华盛顿第一浸礼会教堂（杜鲁门的教派）的爱德华·普鲁顿博士宣布仪式开始，男高音歌手菲尔·里根演唱了国歌，艾尔本·巴克利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年迈的罗马人，他在大法官斯坦利·里德的主持下，宣誓就任副总统，圣路易斯犹太人联合大会的拉比塞缪尔·瑟曼诵读了另一段祷文，此时，已是近 12 点半。

杜鲁门摘下了礼帽、围巾，脱掉了大衣。他光着头站在风中，举起了右手，就像一尊身体挺得笔直、长着一头剪得短平的灰发、戴着眼镜的雕塑，神情极其严肃。他的身后，国会大厦的圆顶和巨大的白色圆柱高耸在冬日的阳光下。他的夫人、女儿和大约 15 位家人坐在附近这个国家的最高级的官员中间，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是自他第一次来到华盛顿时便认识的。首席大法官文森领读了 43 字的誓词，他那乱蓬蓬的灰发在风中飞舞；杜鲁门缓慢而清晰地复述着誓词，他的左手放在两部《圣经》上，一部是较大的谷腾堡《圣经》的摹真本，这是来自独立城人民的礼物；在它上面的另一本是较小的吉迪恩版的《圣经》，它曾于 1945 年 1 月 12 日在这种宣誓的另一个场合中使用过。

宣誓完毕，杜鲁门像安德鲁·杰克逊在其就职仪式上那样，迅速地弯下身去吻了这部《圣经》。

此时已是 1 点 29 分，他第一次作为依靠自己努力而当选的总统，转过身来面对麦克风和期待已久的听众发表了演说。

我满怀谦恭接受了美国人民授予我的这个荣耀。我怀着一种为了这个国家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尽我所能的决心接受了这个荣耀。

（一位记者写道：“1945 年春天，这种平淡无奇的密苏里口音对于一个已经熟悉了另一个人的词令和另一个人的声音的世界来说，是多么的生疏啊！今天，对于各地的听众来说，它已不再生疏。这就是总统在讲话。”）

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了它的特殊的挑战。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其严重性可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挑战相比。今天，不仅标志着一届新政府的开端，而且标志着一个对我们、对世界将有重要意义、也许将有决定意义的新时期的开端。

他在读写在一个活页本上的这个讲稿时，显得庄严而坚定。声音出人意外地响亮。没有任何犹豫，句子也没有任何磕绊。显然，他自己起草了全文，熟悉每一句话。那些紧靠讲台的听众能够看到他呼出的白色空气。

演说专门谈到了外交政策。尽管这是有关美国的抱负的重要声明，但它的重点是集中谈世界——“世界和平”、“世界复兴”、“全世界的人民”。他谴责共产主义是一种依赖于欺骗和暴力的错误学说。共产主义和民主制的

界限非常清楚：

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信念，即人是软弱和机能不全的，以致无力管理自己，因此需要强大的主子来统治。

民主制则以如下的信念为基础：人拥有道德力和智力，以及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明智而合理地管理自身。

共产主义强使个人未经合法起诉而被捕，未经审判而判刑，并且强迫劳工成为国家的奴隶。它规定了人们应得到的信息、应展现的艺术、应遵循的领袖和应思索的思想。

民主制则坚持认为，政府的建立是为了对个人有好处，它应承担起保护个人权利及其运用自己的能力的责任。

人类的未来处于危险之中，他没有点苏联的名字，但却强调指出：“共产主义哲学所导致的行动是对自由国家实现世界复兴和持久和平努力的一个威胁。”

民主制是世界上的“充满生气的力量”。美国人民“坚定地坚持”最初创立了这个国家的“信念”。美国人团结在这种信念下，“即所有的人都享有在法律上获得平等审判的权利，享有分享共同利益的平等机会”。

在内心，他十分肯定，特别地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或者如他所说，四点建议。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它将“全力”推进马歇尔计划；美国将加入北大西洋热爱自由国家的一项新的“防务安排”，“以充分地使这一点变得明白无误……任何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武装进攻必将遭到势不可挡的武力的抵抗”。

不过，最后一点建议，即他的第四点建议，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他提出了一个使美国的科学和工业进展的好处能为“不发达”国家分享的“大胆的新计划”。这是首次提到后来被称之为的“第四点计划”。

杜鲁门说，老的帝国主义——剥削外国的利润——在这项计划中没有任何地位。世界上半数的人民正生活在近于悲惨的境地，知识和技能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可以减轻这种痛苦的手段。它的重点是知识的分配，而不是金钱的分配。

我们能够负担的用以援助其他民族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无法估量的资源正在不断增长，而且取之不尽……只有民主制可以提供充满生气的力量来激起世界人民采取成功的行动以反对他们的人类压迫者，也反对他们的古老的敌人——饥饿、痛苦和绝望。

掌声响亮而持久。他正在把对美国的允诺扩展到美国之外。在国情咨文中他曾说，贫穷正如可以预防的疾病一样，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不必要的。现在，他又发展了这种思想。

《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写道：“杜鲁门向世界提出了‘公平施政’计划。”此外，他口若悬河、娓娓动人，这是他很少有过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所发表的最好的一次演讲。《纽约时报》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都会赞同他的讲话，并加入到鼓掌

者的行列中。

游行开始前，在总统准备到国会去出席午餐会的间歇期间，几乎从未有人在华盛顿上空见到过的一个巨大的机群轰鸣着飞过空中，这个大约由 700 架飞机组成的机群中，包括与柏林空运中使用的同样类型的各种运输机，以及 5 架从得克萨斯州不停歇地飞越了 2000 英里而来的新式巨型六引擎 B—36 轰炸机。

当最后一架飞机飞过时，就职典礼台上的这位面目冷峻的总统、这位承担着世界重担的男子汉，重新变成了喜气洋洋的哈里·杜鲁门，他和巴克利重新裹上了大衣、戴上丝制的大礼帽，笑逐颜开地脱身坐进敞篷林肯轿车中，缓缓地驶回宾夕法尼亚大街。

现在，在轿车两旁行进的是 D 连的这些荣誉卫兵，这两行做着持枪姿势的银发中年美国人挥动着白柁木的拐杖，与这辆缓缓行驶的大型轿车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多少还算是步调一致的这些老兵在行进时受到了兴高采烈的观众的欢呼（在前往白宫的 1 / 4 英里的路程中，仅有两个人掉队）。

这整个的壮观游行队伍打动了无数的观光者，包括许多曾见过无数次就职仪式的人也深受感动。这是为民主精神而奉献的一天，这一天中，民主精神与大大小小的各种力量都暂时地和谐一致了。

明媚的阳光、总统的明显的高昂兴致〔《纽约时报》写道〕、大批人群的耐心和喜悦、杜鲁门先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们所组成的荣誉卫队出现时的那种动人插曲……沿着从国家立法权的所在地到行政权的所在地的那条大街缓缓行进的人群和车流、为总统鸣放的礼炮声的轰响、头顶上空的飞机，这个场景的整个气氛——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一种自信的、甚至狂喜的美国主义……它是一种面向国内、横跨一个大陆的民主制，也是面向世界的民主制，在这个世界上，民主制再也不会是软弱无力、羞羞答答或需要作出辩解的了。

在总统的身后，游行的队伍绵延了 7 英里，总共需要 3 个小时才能过完。到达白宫后，杜鲁门在一个玻璃围起来的观礼台中观看游行，他的目光没有放过任何一支游行队伍。西点军校的学员、来自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校的学员、海军陆战队的军乐队、美国陆军军乐队，都边演奏边行进，通过观礼台；游行的队伍中还有陆军妇女队、海军女子后备队、戴着白羽毛头饰的里士满黑人爵士乐队、高校的乐队、警察的乐队、鼓号队的女队长、漂亮的“彩车皇后”、潇洒的骑士、坐在敞篷车中的各州州长、堪萨斯市的“牛仔”骑士队——身穿化装服、制服和平常服装的 15153 名男人、妇女和儿童，40 多支军乐队，55 部彩车、卡车、吉普和装甲车辆，100 多匹马，4 头来自密苏里州拉马尔的骡子，以及一支用卡利欧瑟笛吹奏着“我只是野性难移的哈里”的老式杂耍团。巴克利站在杜鲁门身边，杜鲁门则戴着手套不断地鼓掌、招手、闲谈、大笑，和着海军陆战队的歌声打着拍子，向着“南部反叛者”的曲子摇着头，并不时地踮起脚尖以保持身体的暖和，同时也不时地从一个白纸杯中呷一口据报道说是咖啡、但肯定不是咖啡的饮料。《生活》杂志的罗杰·巴特菲尔德写道：“正像他所属于的那种最真挚的性格外向的密苏里人一样，他不想掩饰自己的心绪——群众和相机把这种心绪看得一清二楚。”

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走在伊利诺伊州的彩车前面，通过了观礼台。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群众自发地呼喊出来的称颂声中，站在他的敞篷车的后座上向总统致敬。杜鲁门微笑着，挥动着他的大礼帽。当一辆装饰成普利茅斯岩岸的彩车通过时，车上扮演清教徒的演员们突然亮出了相机，开始给他快镜拍起照片来。

表现美国民主制的各种形式、规模、造型和色彩的游行队伍在这个寒冷的下午的阳光中都通过了检阅台。上一次的就职游行是在8年前的1941年，当时全国正在备战，因此它是一种不祥的军事力量的展示。如今的气氛完全不同。在总统对面的观礼台上的群众，戴着色彩鲜艳的围巾、穿着冬季服装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还裹着毯子，都是幸福的人；它显示出，现在美国是一个更强大、更丰裕的国家。哈里·杜鲁门是一个拥有1.47亿人口、自1940年普查以来增加了1500多万人口的国家的总统。历史上还从未有任何总统是在如此繁荣和强大的时代掌权的。工业生产超过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以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去年秋季的农业丰收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佩恩在美国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旅行后，于1949年写道：“绝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强大。”

她像一个巨人一样高踞于世界之上：在世界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中，从未有过一个国家拥有对其他国家的如此广泛或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美国政府的决定影响到了最遥远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和生计，这已成了不言自明的道理。世界半数的财富、半数以上的生产力、全世界将近2/3的机器都集中在美国手中……

戴维·利连撒尔写道：“这次游行是我所参加过的游行中最有趣的一次。”不过，正如报纸所说，总统是“所有人中最快乐的人”。

仅有两次他似乎不太高兴。当南部各州中与本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人的候选人、南卡罗莱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愉快地挥着手乘车通过时，杜鲁门冷冷地看着他。另一次是当佐治亚州州长赫尔曼·塔尔梅奇、另一位白人优越论的鼓吹者驶近观礼台时，杜鲁门背过了身去。不过，唯一真正要怠慢的人只是瑟蒙德。杜鲁门在培尔梅奇通过时转过身，是因为他脚下的一个电热器短路，冒出了烟，他试图把火扑灭。

当太阳落到国务院旧办公楼的背后、下午的天气越来越冷时，得克萨斯州的游行队伍出现了，队伍前面的一辆车上有一面彩旗，两边写道：“上尉州长迎风颤栗。”群众和总统都爆发出了笑声。

杜鲁门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在当晚于后备军训练场举行的就职舞会上，将近凌晨2点时，他依然精神饱满。他没有跳舞，而是在一个阳台上观看并向约5000人的群众挥手致意。他系着白领带，身着晚礼服；贝丝则“微笑着，显得很快活”，穿着一件银线织成的闪闪发光的长袍式礼服。和他们在一起的有玛丽·简·杜鲁门、J·维维安·杜鲁门及其女儿马莎·安·弗兰克和纳培利·华莱士，乔治和梅·华莱士，内利和埃塞尔·诺兰。

“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快活极了。”玛格丽特写道，她穿着粉红色的薄纱裙，整晚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跳舞。所有的人中最快活的是她父亲，“他的脸就像一轮新月似的发着光”。



与他上任的前几年有那么多事情要处理的情况相比，新任期的前6个月对杜鲁门来说，是一个相对轻松的阶段。到1949年仲夏前，形势的发展总的来看是好的，前景是有希望的。国内没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任何突发的国际性危机要处理。希腊和土耳其并未落入共产党颠覆者之手，它们也不会落入。法国和意大利也不会。最幸运的是，就职后几天，柏林的紧张局势便开始出现了有决定意义的缓和迹象。

俄国人认识到空运已获得了肯定的成功，以及封锁已对他们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的事实，因而出现了“改变态度”的迹象。斯大林正在让步。自波茨坦会议以来，潮流似乎第一次出现转折。秘密谈判开始了——奇普·波伦评论说：“这似乎可以说是一条原则，即当苏联人对某件事情认真时，他们就会以秘密的方式来做它。”——并且在1949年5月12日结束了封锁：柏林的灯又亮起来了。空运结束了，经过1年零2个月，飞行277804架次，运送了2325809吨食品和物品之后。

对杜鲁门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坚韧和耐性取胜了，没有付诸武力，战争被防止了。

也是在5月12日，盟国批准了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依靠它，西德人将用设在波恩的自己的政府来管理他们自己。

杜鲁门私下对利连撒尔说，形势总的看起来要比1年前“好50%”。甚至共产党军队在中国的进展似乎也没有使他感到沮丧。在波茨坦，斯大林曾告诉他说，中国北方的人民决不会是共产党人，杜鲁门认为这种说法“大致正确”。他说，这条龙正在“翻身”，“这之后，可能会取得某些进展”。杜鲁门以利连撒尔所描述的一种“大笑和他那不可小视的特有魅力”，热情地谈到了一个像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计划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意义，“旨在使它在经济上自立”。

到此时，北大西洋条约也已经过艾奇逊国务卿极其艰苦而灵活的谈判，于4月4日在华盛顿签字。美国、加拿大和10个西欧国家加入了一项防务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条约国的进攻：对美国来说，它标志着对传统的根本背离——自宪法签署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军事同盟——不过，杜鲁门确信，如果在1914和1939年存在这样一项协定的话，那么世界就可以避免两场可怕的战争。他把北大西洋公约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看作是他总统任期中最值得自豪的成就之一，并且坚信时间将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尽管艾奇逊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为这项条约作了大部分工作，但正是杜鲁门为它提供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就像他对马歇尔计划所做的那样。11月份选举后他采取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指示国务院开始进行有关这项新同盟的谈判，他简直就把它看作是他的条约。签字仪式后在卡尔顿饭店举行的国宴上，他在祝酒辞中说道：“我们确实已经跨过了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尽管参院保守的共和党人的反对可能会很激烈，但他坚信条约将会获得批准。结果，参院和新闻界的反对出乎意料的温和，而赞成的呼声则非常广泛。7月21日，参院以82票对13票批准了这项条约。

北约的建立，柏林空运的成功，一个成功的、自治的西德成为西方联盟中的一员的前景，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杜鲁门的面貌。利连撒尔注意到：

“他显得更加轻松……从双眼到颧骨的那些长长的皱纹似乎大大地减少了。”

3月份，他曾又一次飞往基韦斯特，度他的另一个“工作度假”，这是自任总统以来他第六次前往基韦斯特。这个地方比其他地方对他更有感染力。他酷爱温暖的海水浴与暖和的热带之夜，这也许是唯一能够享受到这些的北美小岛。他的住地在基韦斯特海军基地原来的司令官邸中，这是一座具有西印度群岛建筑风格的中型白色木结构房子，带有装着百页窗的门廊，家具很简单，但却很舒适。花园中盛开着木槿和叶子花。从他到达的那一刻起，总统的谨慎、压力和拘束，所有这一切都开始退居次要地位。

他穿上了图案鲜艳的运动衫——它们后来被称作“哈里·杜鲁门衫”——开始了每天清晨的散步，穿过风景如画的基韦斯特老城、有时在一个地方的便餐柜台前驻足喝一杯咖啡。白宫的邮袋每天都寄来；内阁成员、国会领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该市飞进飞出来参加各种会议，有时他要打远超过自己意愿的长时间的电话；不过，他喜爱每天的游泳，或者说是以他自己的侧泳姿势激烈地搅动碧蓝的海水，并昂着头以防止眼镜打湿，与此同时，有一两艘海军舰艇负责警卫，让其他的船只远离此地，并注意着梭子鱼。他与总统班子的成员一起在阳光中闲逛、开玩笑、互相讲故事、读书、从唱机中听古典音乐、睡午觉、几乎每晚都在门廊上玩扑克、然后痛快地入睡、每天早晨起床，在散步前喝一杯波旁酒。

他在基地的生活隐蔽得很好，安全从不成为问题，这使秘密保安人员都很高兴。班子的全体成员都过得很快活，通常跟来度假的那30多名记者除了享受外，很少做别的事情，他们也都很快活。每人对他选择的这个度假地显然都很满意，也很高兴能参加这次度假，愿意和他在一起，所以杜鲁门就过得更快活了。当时仍是秘密保安分队头目的吉姆·罗利回忆说：“在基韦斯特，他简直妙极了！”

不久，他们都开始炫耀自己的杜鲁门衫。最让杜鲁门高兴的是，甚至萨姆·雷伯恩在11月份的一次来访期间，也穿上了一件绘有一群仙鹤和倾斜的棕榈树的这种运动衫。

5月8日返回华盛顿后，在使馆街富丽堂皇的拉兹·安德森大厦的舞厅中举行的他65岁生日的庆祝宴会上，据一份报道说，当祝酒开始时，杜鲁门显得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精神，“就像一个对未来没有什么疑虑的人一样”。他的医生华莱士·格雷厄姆说：“总统在我所知道的他这种年纪上的人中，近乎是一个铁人。”

1949年这“头几个阳光灿烂的月份”中的一个明显的阴影，就是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那悲剧式的命运。追溯起来，远至去年夏天他便开始显出了疲惫和烦恼，大选结束以来，他的行为一直很古怪。从本质上讲，福雷斯特是一个精神紧张、性格内向、极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已工作到了精神近于崩溃的状况，却还只是希望能坚持并更加努力地工作。

甚至在秋季竞选运动之前，杜鲁门已开始失去了对福雷斯特的信任。勉强地进行了军事机构的重组后——一个前所未有的让人精疲力竭的任务——福雷斯特变得日益优柔寡断和注重琐事。杜鲁门抱怨说：“他将会控制不住局面。”有一次，杜鲁门被福雷斯特对一个问题的处理所激怒，送去了一张毫无特色的粗率无礼的便条，上面写道：“这是你的责任。”接着，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始，对福雷斯特的忠诚发生了怀疑：他与托马斯·E·杜

威的会面是否真如福雷斯特尔本人所说，是有关防务问题的，还是希望被保留在杜威政府中的一种安排？德鲁·皮尔逊称，不论 11 月份选举的结果如何，福雷斯特尔想要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而最接近杜鲁门的那些人中，有几个已日益相信：这位国防部长在政治上已不再被信任。

福雷斯特尔也是亨利·华莱士离去后在政策上不赞同总统的极少数内阁成员之一——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上，特别是在对文职官员控制原子弹的问题上——现在他又强硬地反对杜鲁门在国防开支上的立场。为了达到预算的平衡，杜鲁门坚持国防开支不能超过 150 亿美元，这个数字等于全部联邦预算的 1/3 强，但福雷斯特尔认为，在苏联威胁大规模存在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过低，因而是危险的。

由于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不受欢迎的立场，新闻界对福雷斯特尔的批评不断增强，德鲁·皮尔逊和沃尔特·温切尔在他们的专栏文章和广播中领导着这场攻击。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讨好新闻界的福雷斯特尔来说，这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他被称作是华尔街和石油公司的一个工具，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一个反犹分子。皮尔逊和温切尔用一份多年前捏造的报道，说福雷斯特尔在几名珠宝窃贼勾引他妻子时，吓得逃出他在纽约市的住房的后门，以此试图造成人们对他的个人勇气的怀疑。1 月份在 NBC 的电台广播中，一位来宾声称，战争期间位于法兰克福的 I·G·法本工厂没有遭到轰炸是因为福雷斯特尔拥有法本的股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诬陷，NBC 后来也收回了。

攻击越是增强，杜鲁门就越倾向于让福雷斯特尔留在他的职位上，因为杜鲁门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极不愿解除任何人的职务。杜鲁门也不会把他留在“火力网中”而不管。2 月份，德鲁·皮尔逊曾攻击哈里·沃恩，说他接受了阿根廷独裁者胡安·庇隆颁发的一枚勋章，其他的几个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将军，以前都曾接受过勋章，但新闻界对此却没有说一句话。皮尔逊要求立即解除沃恩的职务，杜鲁门则在公开的答复中把皮尔逊称作是“狗娘养的”，这引起了一阵新的与皮尔逊相反的评论，从而给了杜鲁门以极大的满足。他说：“没有任何评论家或专栏作家能够任命我的内阁或我的班子中的任何成员。我本人才能任命他们。在需要让他离开时，是我来解职——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这是他以前的其他总统都曾感受到的一种感觉，并且会被他以后的更多的总统所经常感受到，但是，却没有任何人以如此多的语言如此开诚布公地声明过。

正如福雷斯特尔告诉一位朋友的那样，他感到杜鲁门一直对他很公平。杜鲁门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老板”。他曾给另一位朋友写信说，美国人民有幸在最高的权位上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这个国家和全世界都代表着自由力量，然而，他又是保守的，是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的保守者——我们所希望保持的事物中的一个保存者”。

福雷斯特尔仍然受到几位杜鲁门特别重视其判断的人的极大钦佩。杜鲁门最近邀请来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非正式“主持官员”的艾森豪威尔就认为福雷斯特尔是公共生活中最杰出的人之一。并且，艾森豪威尔在私下的记录中说，在有关“我们因忽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出现的混乱局面”上，福雷斯特尔比杜鲁门更有洞察力。

如果我不是喜爱、钦佩和尊重他的（福雷斯特尔的）高尚品德

的话，我是不会走近华盛顿的，即使我被迫完全放弃我的使命（艾森豪威尔在 1949 年 1 月份的日记中写道）。这同样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哈里·S·杜鲁门，不过，他对问题看得不如吉姆那样清楚，也没有像吉姆那样因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格外痛苦。他们两人我都喜欢。

但是，福雷斯特尔正如艾森豪威尔也注意到的那样，“看起来很憔悴……他的弦绷得太紧，他工作的时间之长，足以累死一匹马”。

（艾森豪威尔本人不久便发现了各部门之间几乎无法容忍的争吵。他一天抽 4 包香烟，并担心着自己的血压。到 3 月中旬时，他患了严重的胃痉挛，杜鲁门把他送到基韦斯特的小白宫去休养了 3 周。）

就职日那天见到福雷斯特尔的一位记者被他那“难以形容”的面容所震惊。福雷斯特尔被失眠和食欲减退所折磨，显得不可思议的消瘦和年老了，衬衣的领子也显得特别大。有些日子，他会为了同一个问题数次给总统打电话，这使杜鲁门感到很奇怪。私下里，福雷斯特尔告诉几位他最亲近的朋友说，他的电话正在被窃听。在会议上，他会下意识地抓挠自己头皮上的某个特定的部位，直到把它抓破。

2 月初，福雷斯特尔告诉杜鲁门，他打算辞职并准备在 6 月 1 日离任时，杜鲁门就看出他离任的时间不得不更早些。

正如福雷斯特尔所知道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杜鲁门一直在考虑让路易斯·约翰逊接替他的职位——约翰逊是乘火车沿途竞选期间创造奇迹的任性的财政官员，曾任罗斯福的陆军助理部长——而福雷斯特尔也同意这个人选，或者说他口头上同意。在与福雷斯特尔会面讨论移交事宜时，一个小时后约翰逊便得出结论，正如后来他告诉德鲁·皮尔逊的那样，说福雷斯特尔已精神错乱，或者可能正在吸毒。

杜鲁门写道：“福雷斯特尔在提出辞呈前，早就想辞职，而我不让他辞职，但后来我认识到，在他想要辞职时我应该让他离任。他辞职是因为身体健康越来越糟，这就是他辞职的原因。”

3 月 1 日，星期二，杜鲁门将福雷斯特尔召到白宫要求他辞职。杜鲁门也敦促他去休假，虽然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寻求医疗照顾的话题。

在以后的几周中，福雷斯特尔在公共场合坚持着必要的镇静，不过却非常勉强。3 月 28 日，路易斯·约翰逊正式就任国防部长的那天，他也在五角大楼；当天晚些时候，在白宫举行的另一个仪式上，他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当时杜鲁门授予了他“杰出服务奖章”。不过，第二天，福雷斯特尔，“一个病容满面的人”被飞机送往佛罗里达，去到位于霍布桑德的罗伯特·洛维特的家中，在那里他告诉洛维特：“他们在跟踪我。”在后来的几天中，他至少有一次企图自杀。

不知道在佛罗里达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在听到报告说福雷斯特尔认为自己正在被外国间谍跟踪后，杜鲁门命令秘密保安部门的头目 U·E·鲍曼立即前去调查此事。标着“机密”、日期标明为 3 月 31 日的报告说，福雷斯特尔的怀疑没有事实根据，他近来已变得“极其神经质和容易激动”，并且在他任国防部长的最后一天时已如此神经错乱，以致他甚至都不认识自己的雇员了。

他显然已丧失了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并执行它的能力，结果他是被两位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协助护送上(飞往佛罗里达的)飞机的。当福雷斯特尔先生在最后一分钟显示出不愿离去时，据说，其中的一位朋友对另一位说：“我们不得不做点事儿了——我们不能总让他在这儿转。”

报告的结论是，福雷斯特尔正患着一种“轻微的精神崩溃症”，这显然与到那时为止杜鲁门所听说的情况完全一致。

在佛罗里达，一位海军的精神病医生和很有名望的威廉·C·门宁格大夫被派去诊疗；4月2日，福雷斯特尔被飞机送回华盛顿住进了贝瑟斯达海军医院治疗他的“精神衰竭症”。

德鲁·皮尔逊报道说，福雷斯特尔已“丧失理智”；还错误地称，福雷斯特尔在佛罗里达时曾冲到街道上惊呼：“俄国人来啦！”

杜鲁门在5月份的第一周里曾打电话给正在贝瑟斯达医院的福雷斯特尔，并且觉得福雷斯特尔似乎还是“他的老样子”。

两星期后，5月22日，星期日凌晨2点钟，福雷斯特尔坐在位于医院16层楼上的他的病房中，抄下了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中的合唱”的歌词：

时光的消磨耗尽了精力——  
没有安慰、无可名状、毫无希望得到拯救  
黑暗的前景中是张着大口的坟墓……

大约3点钟，他穿过大厅走进一间小厨房，他把浴衣腰带的一头系在一个暖气上，另一头则系在自己的脖子上，然后从打开的窗户中跳了下去。他的尸体在3楼的一个房顶上被发现，腰带仍然缠在他的脖子上。

这个消息震惊了华盛顿，高级政府官员自杀还从未听说过。多年来，有一些内阁成员辞职，或因失宠而被解职，但从未有人自杀过。杜鲁门用他自己的后来说，“被惊呆了，并且非常悲痛”。第一夫人被对她父亲的回忆所缠绕，正如玛格丽特后来所揭示的，“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仅仅一个星期以前，在复活节时，贝丝还给福雷斯特尔送去了一束玫瑰；而在一封感谢信中他还说，这些玫瑰是多么“有助于使一个凄凉的日子焕发出光彩”啊！

劳你费心送我一一份代表着你的体贴的纪念品，我深受感动。祝你和总统以及杜鲁门小姐复活节快乐。你们都值得祝贺。

总统、副总统、前总统胡佛、内阁成员、大多数国会议员、最高法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马歇尔将军以及大约6000人出席了在阿灵顿公墓以最高的军葬礼为福雷斯特尔举行的丧葬仪式。

杜鲁门对自己未能及早地卸除福雷斯特尔的工作负担而心烦意乱，无疑也非常悔恨，他指责德鲁·皮尔逊“逼死”了福雷斯特尔。皮尔逊则写道，杜鲁门让福雷斯特尔辞职的要求“无疑加重了他的病情”。戴维·劳伦斯在《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专栏文章中说，毁灭福雷斯特尔的并不是工作，而是总统对他失去了信任。

有关这个悲剧的疑问一直在持续。福雷斯特尔在具有自杀倾向的状况

下,为什么会被安排在位于 16 层楼上的病房中?为什么不给他的神父见他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华盛顿市内对共产党阴谋的担心的不断增长,又有谣传说福雷斯特日记中的几页已根据白宫的命令被秘密撕去——福雷斯特,这个政府中最狂热的反苏分子被逼致死,实际上是共产党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的证据已被杜鲁门班子中的“共产党间谍”所毁掉。

不过,在华盛顿仍是一如既往,掌权的人是最至关重要的,因此,注意的焦点很快便转向了新任国防部长,由于他以往在该部任职的经历及其做事认真的名声,他似乎很有资格担当此项职务。路易斯·约翰逊坚韧、精明而实干,更重要的是,对总统控制开支上限的政策已表态支持。在国会山,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喜欢他们所见到的这些品性。参院一致地批准了这项任命。不过,很快约翰逊的个人作风和处事方式便使他成了一个与这些品性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像旋风一般袭击了五角大楼。

约翰逊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这幢大楼中最大的部门里驱逐了几位高级官员,并换上了自己的人。他重新用上了潘兴将军的旧办公桌,并安排罗斯福的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作了副部长。整个五角大楼的雇员中有一半人、即大约 2.5 万人在一场巨大的“抢座位”的游戏中被调整了工作。他取消了过时的机构,削减了官员的用车。

约翰逊正在做杜鲁门曾要求做的事情。根据在杜鲁门要员会的经验,杜鲁门坚信国防开支正在被大量浪费。在事关花钱的问题上,他基本不信任陆、海军的将军们。4 月底,在预先没有告知总统和海军部长的情况下,约翰逊突然取消了海军整个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价值 1.86 亿美元的新型超级航空母舰“美国”号的建造计划——导致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愤而辞职。杜鲁门尽管很喜欢沙利文,也没有因辞职而责备他,但却批准了这项计划的取消。不过,约翰逊的做法也使他感到极不舒服。

5 月份,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法相信的是,约翰逊命令从军事预算中再削减 14 亿美元。面对那些指责他正在削弱这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的人们,约翰逊吹嘘说,美国“把自己的一只手绑在背后也能战胜俄国”。

福雷斯特谨小慎微,性格内向,对政治几乎全无兴趣;而约翰逊则是一个大吵大嚷的粗鲁人,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可以向一位海军或陆军上将大吼大叫,并且流露出了如此明显的政治野心,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真正的动机的猜测。因为才上任几个月,他便感到自己有责任多次公开声明他不是竞选总统。新闻界引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的话说,约翰逊每节约 1 美元便树立起 2 个敌人。

事情很快就变得明显了:路易斯·约翰逊可能是杜鲁门所做的最糟糕的一次任命。在 1 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许多与他一道共事的人,包括杜鲁门和迪安·艾奇逊,都得出了结论:约翰逊的精神不正常。布莱德雷将军后来写道:“杜鲁门无意间以一个精神病人取代了另一个精神病人。”

这个国家获悉,总统的“情绪很好”,“愉快而高兴”,并且非常忙。他提名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霍华德·麦格拉思为新的司法部长,让比尔·博伊尔这个他在堪萨斯市的老门徒和乘火车沿途竞选的策划者接替麦格拉思的位置,任民主党领袖。他还挑选了珀尔·梅斯塔为新任驻卢森堡的公使,这项任命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却能引起人们的甜蜜回忆,因为它启发了风行一时的百老汇音乐喜剧《请称我“夫人”》的灵感,这个剧是由欧文·伯林作曲,埃塞尔·默尔曼主演的。

然而，甚至在春天消逝在6月的暑热中、另一个漫长的夏季来到这座城市之前，杜鲁门那美好的快乐和乐观主义便经受了一场考验。自去年夏天指控阿尔杰·希斯以来一直在聚集力量的反共浪潮，如今已越来越高涨，在这股势力中的纽约枢机主教斯佩尔曼称，美国正处于一种被共产党接管的紧迫的危险之中。1948年12月，希斯已因伪证罪而被起诉，不过，每一个人都知道，真正的问题并未改变：究竟他是不是共产党间谍？像他这样的人在政府中还有多少？

杜鲁门让记者们相信，这个国家并不是在走向地狱。他们应该读读历史，美国从前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歇斯底里最终灭亡了，事情澄清了，这个国家没有走向地狱，今天它也不会走向地狱。”7月份，对希斯的审判因陪审团意见不一致而休庭、下一次审讯安排在秋季。问题并没有完，这是杜鲁门始料未及的。

接着，到了仲夏时节，前景突然变得暗淡。到1949年8月时，杜鲁门已经进入了严峻考验的时期。超出了他控制的事件——在中国和苏联——震惊了西方世界，这在战后以来还从未有过；与此同时，在国会山，似乎是为了提供一种任性的滑稽场面。哈里·沃恩被传唤到参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去作证。

来自中国的消息在这一年中都是不祥的，尽管杜鲁门曾就这个问题向戴维·利连撒尔作过令人不可思议的自信的评价。中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共产党人的冲击下，正迅速地土崩瓦解。蒋介石的美国军事顾问戴维·巴尔将军报告说：

军事形势已恶化到了唯有美国部队的积极参与才能产生效果的地步……自从我到达以来，没有一场战斗是因缺乏弹药或装备而输掉的……根据我的看法，（国民党的）崩溃完全应该归咎于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普遍存在的腐败和贯穿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不诚实……

4月份，一支百万人的共产党军队跨过了长江，南下进入仍然忠于蒋介石的最后几个省份。中国完全陷落给毛泽东军队的这个结局——这个结局早在1946年乔治·马歇尔毫无成果地在中国呆了一年后所写的报告中便暗示过——到春季时已成为一个预料中的必然结局了。

激烈的警告声到处响起。后来被称作“中国院外集团”的组织对政府进行了愤怒和恶意的指责，其成员包括全国的宗教和爱国组织、国会中著名的共和党人、以及《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R·卢斯，他是赴中国的一位传教士的儿子。《生活》杂志刊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篇题为“中国的陷落使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的文章。《时代》周刊则警告说，亚洲掀起的红色浪潮有吞没世界半数人民的危险。

然而，解释自己的中国政策正是政府的企图，这是一项试图在事情发生前就澄清在中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好以此使美国保持镇静的努力，它把焦点集中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个重大转折关头，可它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8月4日上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宣布将发表一份国务院的大型报告《美国与中国：特别是1944—1949年期间的关系》，报告长409

页，另有 654 页小号字印刷的附录文件。杜鲁门说，他已命令将报告编制成一份“坦率而现实的记录……清晰而明白地阐明了……你们想要知道的（自 1840 年以来）有关这项政策的一切问题。”

正如迪安·艾奇逊在报告的前言中所强调的，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国已注入了 20 多亿美元用以支持蒋介石——包括用来帮助摧毁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的金钱和武器——但是，这些资金一直不够。艾奇逊说，错误在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它的猖獗的贪污、缺乏领导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抱负的漠不关心。“不幸而又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已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它是中国内部力量的产物，美国试图影响但却无法影响这些力量。”

拼写并不比以往更好的杜鲁门在以前一份手写的笔记中曾写道，“腐败的”（此词杜鲁门拼写有误——译者注）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灾难的原因。他告诉阿瑟·范登堡说：“我们选中了一匹坏马。”

这份“中国白皮书”引起了轰动。对中国的感情在这个国家中是非常普遍的。美国孩子中有几代人都曾带着 5 分或 1 角钱的硬币来到主日学校捐助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赛珍珠写的有关中国农民生活的书曾赢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心；蒋介石大元帅和他那笑容可掬、非常上相、受过韦尔斯利学院式教育的夫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美国的忠诚盟友。如今，国务院正式宣布，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输给了共产党势力。这份报告并未如杜鲁门和艾奇逊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份辩解的材料，反而引起了一场争论。《纽约时报》称它是一份“好心犯错误的令人遗憾的记录”。更为激烈的批评则把它称作是一份掩盖和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文件；还有更难听的，说它是“一份力那些……协助共产党征服中国的……国务院中的亲共分子所作的圆滑的辩解”。在参院，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诺兰尽管没有丝毫的证据，但却高喊着想知道阿尔杰·希斯是否帮助制定了对华政策。中国院外集团狂叫：杜鲁门和艾奇逊“丢失了”中国；似乎中国曾是美国的，现在丢掉了似的。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国会众议员约翰·F·肯尼迪在内的几名民主党人也加入了这场攻击的行列。

与此同时，哈里·沃恩则在新闻报道中陷入了一切迹象都表明是不折不扣的白宫丑闻中，以北卡罗莱纳州民主党人克莱德·R·霍伊为首的一个参院小组委员会已开始调查所谓的“百分之五人”（因其抽取 5% 的佣金而得名）运用其被人们想象中的影响力以保证从政府方面获得合同或优待的问题。一些证据显示，沃恩曾运用他身处高层的地位——“他的将军军阶、他的白宫电话及其深受杜鲁门宠信的地位”——来为詹姆斯·V·亨特及“神秘的”约翰·马雷冈这样一些接近华盛顿的人打通关节，前者是一位前陆军军官，据称是沃恩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后者确实是沃恩的一位老友，1945 年杜鲁门就任总统之初，人们经常见到他走动于白宫西配楼，以至被人们误认为是总统班子中的一名成员。

当证据显示亨特对陆军防化兵司令和军需兵司令具有不正常的影响力时，杜鲁门立即下令让防化兵司令退役，并让军需兵司令停职。

沃恩为这些朋友的利益进行的活动大多是始于战争刚刚结束时。作为对亨特的帮忙，他曾帮助他得到了稀缺的木料用以建筑加利福尼亚的一条运动跑道，这个建筑计划此前已被政府对住房所需建筑材料的限制所中止。对马雷冈，他确保了允许他购买另一种稀缺物资糖浆。他还为亨特的另一名客户、



芝加哥的一名香水制造商安排了由空军运输司令部进行的一次飞往欧洲的优先飞行——在德国刚刚投降之时，一切运输设备实际上都优先安排给军用——由于这项安排，那名芝加哥制造商将价值 5.3 万美元的香料运回了国内。

“百分之五人”的行动并无违法之处，沃恩的所作所为也不违法。但是，根据揭发出来的材料，那名芝加哥的香水制造商戴维·A·贝内特送给了沃恩一个冷藏食品柜作礼物，这是一个价值约 400 美元的“快速制冷冰箱”。此外，根据沃恩的建议，贝内特又送了 5 个冰箱：一个送给了第一夫人，它被摔坏了，不得不丢弃；一个送给了弗雷德·文森，他当时是财政部长；一个送给了 J·K·瓦达曼，他把它捐赠给了总统在马里兰州山中的休养所“世外桃源”；另一个送给了马特·康内利；还有一个送给了约翰·斯奈德，他把它退了回去。

在霍伊委员会面前，沃恩坚持说他只是想成全他们。他解释说：“我给这些人一个优待，让他们能够接触他们可以对之讲述自己的事情的人们。”

无疑，这正是华盛顿的每一个政治家几乎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没有一项法律禁止公共官员接受朋友和选民们的礼物，正如许多新闻报道所认真地指出来的那样。总统本人一直在收到并接受各类礼物——油画、获奖的火鸡、乡村的火腿、哈瓦那的雪茄、酒，甚至在他上任的第一年曾接受过一辆福特汽车。沃恩说，这些冰箱是“友谊的表示，而不是有什么别的含义”，在经过沃恩的两天作证后，霍伊主席承认没有证据表明沃恩受贿。然而，损害已经造成。这些冰箱一直是保密的，而沃恩运用他的特权地位如果不属非法，也肯定是不适当和不合适的。他那苍白无力的辩解，以及长期以来对待查利·罗斯和埃本·艾尔斯等白宫其他人的那种近乎荒唐的不得体的态度，已经让人抓住了把柄。

尽管他在委员会面前的态度很平静而有尊严，有时甚至很动人，但是从形象上看，沃恩可以是任何类型的人，但绝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那肥胖臃肿的身躯，他那看起来就像军睡衣一样的戴满黄铜色勋表的军服，使得他很像是一个贪污的卡通人物形象。当沃恩懒洋洋地靠在听证席的椅子上点燃一支大雪茄时，托马斯·纳斯特因有机会把这形象画下来而感到非常自豪。

《时代》周刊写道，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已准备把沃恩当作烤叉上的一只猪来进行一次政治上的烤全猪。不过，最热衷于此的是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他在听证会上容光焕发，直呼这位身着军服的将军为“沃恩先生”。

麦卡锡问道，他曾从“诈骗王”弗兰克·科斯特洛那里拿到竞选捐助，这是真的吗？

“你们认为我认识弗兰克·科斯特洛吗？……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沃恩深表疑惑地答道。

如果听证会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沃恩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人物，他凭借一个将军的伪装，以哈定时代的方式在白宫玩弄着法庭政治。使共和党人感到格外高兴的是，“百分之五人”和“快速制冷冰箱”成了令人作呕的新的时髦词。

埃本·艾尔斯写道：“罗斯和我在某种程度上讨论了整个事件。我们认为，由于沃恩的麻烦和他带给总统和其他人的麻烦，他完全成了一种耻辱。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已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杜鲁门所作的事情正是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会去做的事

情。如果他是由不同的性格构成，如果他能够看到在沃恩事件上确实的混乱，而不把它看成是对他的个人攻击——这是他对这件事的解释——如果他能够看到沃恩是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愿意牺牲他以取得政治上的信任，即使不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声望，那么，事情本来会是完全不同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这，正如时间所证明的，是一个错误。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杜鲁门不仅喜欢沃恩，而且喜欢他的处事方式，特别是他面对新闻界的表现。在听证会期间，当沃恩休假完毕返回华盛顿时，曾在联邦车站与记者们遭遇，他警告他们对他别太苛刻。“毕竟我是总统的军事助理，而你们这些家伙总有一天都会有求于白宫。”在被问到他与“百分之五人”的联系时，他说：“无人与此该死的事情有关，你们可以引用我的话。”杜鲁门谈到这个回答时感到如此兴奋，以致他给沃恩戴上了一枚模拟的勋章，表彰他的“联邦车站行动”。

艾尔本·巴克利后来评论说：“我认为杜鲁门先生对于某些欺骗他而且其行为有时不利于他的政府的老朋友太心善、也太忠诚了。”

当沃恩提出辞职时，杜鲁门告诉他以后在他面前别再说这种话。杜鲁门说，他们曾一起进入白宫，他们也将一起走出去。

仅仅几周后，出现了一个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消息，正如戴维·利连撒尔所写道的，它预示着“一箱子麻烦”。在1.8万英尺的高空从日本飞往阿拉斯加的一架空军气象侦察机在堪察加半岛以东的北太平洋上空探测到了稠密的放射性云层的迹象。不久，在太平洋上空各空域飞行的飞机都报告说，自己空域的放射性物质高于正常值20倍。空军跟踪了这片从太平洋上空几乎延伸到英伦三岛的放射云，在英国，皇家空军搜集了它的样品。

科学家花了几天的时间来分析这些数据。他们的结论在9月19日、星期一下午出来了。正在马撒葡萄园岛度假的利连撒尔当晚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接到了这个消息。当他和夫人参加完一个晚宴，正在返回位于该岛北岸他的住地的途中，借着汽车前灯的强烈光线，他们突然看到一个人影在雾气笼罩的地面上时隐时现。这是詹姆斯·麦科马克将军，他显得很茫然，利连撒尔想：“就像我很快在狂风吹过的荒野中、在寂静的夜晚、在一个孤岛上发现了他似的……”

后来，麦科马克随利连撒尔上楼进入一个由一盏煤油灯照亮的房间里，把他的报告递给了利连撒尔。

煤油灯在我俩之间（利连撒尔写道），四周全是阴影；窗外，北斗七星和北极星与新贝德福德的灯火交相辉映……我拿着它，表情就像这是一份预算问题的报告似的……

上床后，他夫人问他是否在因某些事而心烦。他回答：“噢，有些事。有一件事。”

第二天早晨8点20分，他和麦科马克已乘上一架C—47军用飞机，踏上了回华盛顿的路程。利连撒尔打算当天下午到白宫去见总统。到11点30分时，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与匆忙集合到这里来的核科学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会晤，该委员会主席J·罗伯特·奥本海默显得异常激动。奥本海默说，无疑，俄国人已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利连撒尔写道：“佛蒙特事件，我们碰上了。”“佛蒙特”是俄国原子

弹的代号。

总统会怎样看待这个消息？他会告诉全国吗？要等多久？

利连撒尔准时于下午3点45分见到了杜鲁门，后来，他在日记中以近乎电报的文体，对他们在一起的这半小时作了非同寻常的记录：

总统正在读一份《国会记录》，一幅不可想象的平和、镇静的景象；外面的花园中，阳光明媚……

他说：想谈谈这个侦察报告——知道它——知道这一天可能会到来——在俄国的德国科学家完成了它，也许类似的某些事情。很高兴请来了（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少数高级官员，告诉他们……现在不打算谈任何自己的事情；以后，等这个（杜鲁门指着一份标题写有英镑贬值的报纸）平静下来，也许在一周内；认识到可能泄露，许多人知道仍然要冒那个险，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对付它。

我说：可以允许我谈谈（我的）看法吗？尽管事实上你已得出了结论。他摘掉他的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他不戴眼镜，大大的、漂亮的眼睛，考虑周到、忍耐和关切的良好风度。我试着陈述现在就公布它并正式介绍这件事而不是防止泄露肯定有好处……第一，显示新闻是知道（俄国的）佛蒙特计划进行得怎样……第二，新闻界知道并报道这件事可以显示出它不惊慌，因此其他人也不必惊慌；第三，将显示新闻界在形势发展到人们需要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所说的伤害时，就会告诉人民。

（总统同意），自己保持对人民的信任，从他本人的镇静中得到启示，都是很好的论点，但并不担心这些。无论如何不能肯定（俄国人是否真的拥有了原子弹）。我插话说：可以肯定，真实的——那些最悲观的人都显出吃惊的神色。真的吗？——强烈的神情……

不过，他（宣布）（可能）导致巨大的惊慌和麻烦。他们（俄国人）变了……重新非常理智讨论，（自柏林危机结束以来）形势显得好些了；这可能是某些东西在起作用。不要担心；认真考虑这种情况；打算做出计划……

3天后，9月23日、星期五上午，查利·罗斯的办公室里挤满了白宫的新闻记者，他先要求把门关上，然后散发了一份油印的总统声明。瞬间，记者们蜂拥而出去打新闻电话，匆忙中，挤碎了一个剥制的鹿标本的头。

我相信，美国人民与国家的安全完全是一致的，他们有权知道在原子能领域中的一切进展，这正是我公布下述信息的理由。

我们有证据表明，在最近几周内，苏联进行了一次原子弹爆炸……

尽管这份声明中也说，“其他国家的这种新武力”的最终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这个消息却比大多数预测提前了3至5年，这个现实的出现仍是一个巨大的冲击。美国对原子弹4年的垄断结束了。虽然在这个国家中没有出现惊慌，但冷战的紧张形势和担心却大大地加剧了。如今，世界已不同于从前了。

一个星期后，10月1日，在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拥有5亿多人口、占人类1/5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正式建立了。

不久后，1949年10月，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办公室举行的一系列高度机密的会议上，对一种热核武器或称氢弹武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一种超级原子弹或“超级炸弹”——它的摧毁力比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要大10倍以上。人们感到，俄国的原子弹已“激烈地”改变了形势。如果俄国人有能力生产出一颗原子弹，那么，他们现在也就处在了能够进一步生产出毁灭性更大的武器的地位上。

制造“超级核武器”的最初建议来自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斯特劳斯，它获得了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的强有力的支持。

曾任职于负责第一颗原子弹计划的总统临时委员会的詹姆斯·B·科南特断然反对。奥本海默也反对。恩里科·费米最初似乎赞成进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结果，科学顾问委员会基于技术和道义的理由，表达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态度。布莱德雷将军支持它主要是因为它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显然，将不得不由总统来作决定。

利连撒尔曾私下决定，他也反对“超级核武器”计划（利连撒尔写道：“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应该说的是：‘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去寻求任何其他的路。’”）。不过，11月1日、星期二早晨，他会见迪安·艾奇逊，向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本质”，以使艾奇逊能“很快地”与总统处理此事，在他面前，利连撒尔和其他人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这个计划。

艾奇逊听完利连撒尔的解释后评论说，一个多么让人沮丧的世界呵！他不明白利连撒尔是怎么样和“这令人恐怖的东西”搅在一起的。

在1949年11月第一天的这晚上，总统独自坐在布莱尔大厦中进晚餐。贝丝·杜鲁门正如她那个夏天大部分时间一样，仍在独立城看望她的母亲；玛格丽特则在纽约继续她的歌唱生涯；像往常一样，她们的缺席使他情绪低落，如果没有工作或他身边的人来充实的话。在这个漫长而难过的夏季里，他曾数次在家信里陷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沉思中，描述着各种把他带回到曾生活过的地方的事情。他曾写信给贝丝说：“我们永远无法说出在我们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告诉内利和埃塞尔·诺兰说：“在我最疯狂的梦想中，我也从未想到或希望处于这样一种境况里。”他已“成功地使自己进入了一种比在这个世界上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还要麻烦的境地”。

如果他比往常更多地感到了贝丝的缺席，那是因为如今他们在布莱尔大厦中的共同生活比起在街对面的白宫中的生活来，似乎有了一些改进。这座楼房本身，即使去年进行了应急的装修，不仅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地方，而且还显得有点邋遢。它总是嘎吱嘎吱地作响，每当街上的汽车在外面经过时，它就明显地颤动。它那黑暗的老地窖里充满了老鼠，秘密保安人员全都知道，他们特别不愿走下地窖，但有时也不得不去。由于华盛顿急救医院正坐落在F街的拐角处，救护车的警笛经常一夜数次在总统卧室窗下的街上尖啸而过。一些秘密保安人员后来说，在所有他们了解的总统中，只有杜鲁门一直愿意住在这个地方。

不过，由于玛格丽特不再回家，并且没有了白宫宴会的负担，总统和第一夫人就有了更多的时间独自在一起，坐在房后的小花园中读书、吃午饭或休息。的确，在他们的结婚生活中，这是第一次他们有了一所属于他们自己

的房子。J·B·韦斯特回忆说：“他们非常谨慎、非常斯文地在布莱尔大厦中那紧闭的门内消磨了许多时光。”女仆们取笑楼上的那对“情鸟”，韦斯特后来在描述杜鲁门年代的回忆录中，提供了一个人们都知道的暗示：这两个非常保密、基本上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之间的性吸引。

那年初秋的某个时候，当贝丝在独立城和她母亲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返回华盛顿时，她和总统都“喜气洋洋”，对两人又在一起显然都非常高兴，以致整个家庭服务班子都感到精神振奋。韦斯特回忆说，每一个人都带着笑容。

第二天早晨，当韦斯特像往常一样在9点钟走进第一夫人的书房去报告和讨论当天的日程安排时，她用“一种很低、很不自在的声音”告诉他，总统的古式的床出了点儿问题。夜里，两条床板断了，她红着脸说。

韦斯特已经得出了结论，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立即就注意到，杜鲁门夫妇绝对不是“古式的”。

如今，11月1日的晚上，由于贝丝再次去了独立城，在经历了“另一个困苦的一天”之后，杜鲁门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所有自我素描中最高兴的一篇——有忧郁、有娱乐、但都表现了他的人性和性格：

今晚我自己进晚餐。在李宅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餐时分。一位男管家非常郑重地走进来说：“总统先生，晚餐已准备完毕。”我走进布莱尔大厦的餐厅，穿戴着燕尾服和白领结的巴尼特拉出我的椅子，入座后他把我推到餐桌前。穿燕尾服、打白领结的约翰递给我一个水果杯，巴尼特把空杯拿走。约翰递给我一个盘子，巴尼特送上来嫩腰肉，约翰拿来了芦笋，约翰给我上了胡萝卜和甜菜。我不得不独自在点着一支蜡烛的餐厅中静静地用餐。我摇了铃——巴尼特拿来了盘子和黄油碟。约翰走进来，拿着餐巾和一个装碎饭屑的银托盘——桌上没有碎饭屑，但约翰仍不得不擦一下桌子。巴尼特递给我一个盘子，上面有洗手指的小盆和垫布——我拿开了小盆和垫布，约翰将一个玻璃碟和小碗放在这个盘子里。巴尼特拿来了一些巧克力奶糊。约翰送上来一小杯清咖啡（在家里喝的很小的一杯咖啡——大约只够两大口），这样我的晚餐便结束了。我在洗手指的小盆中洗了个手，然后就回去工作。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呵！

在内阁的9名成员中，没有一人像举止优雅、精明干练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那样惹人注目，也没有一个比他对杜鲁门的影响力更大。他的地位是无人能比的。不像伍德罗·威尔逊（其肖像挂在内阁会议室的壁炉上方，至今仍俯视着每星期五上午10点的内阁集会）。杜鲁门没有像爱德华·豪斯上校这样的私人顾问，也没有任何人充当像哈里·霍普金斯为罗斯福担当的那种解决国内麻烦的能手。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的关系正如杜鲁门所希望的那样，是非常清楚和一望便知的。艾奇逊管理着国务院的大量工作及其2.2万雇员，但他也是总统与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联系纽带，是总统的世界事务的报道者和解释者，以及总统的主要协商者和对外政策的发言人。除了内阁

会议上艾奇逊坐在杜鲁门右手边之外，他们每周定期会见两次——星期一和星期四的 12 点半——并且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交谈。

杜鲁门认为国务卿办公室的重要性仅次于他自己的办公室，因此，现在已把它的人员扩充了 3 倍，用已被证明有能力并具有强烈个性的人充实了它。关于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这个罗斯福时代留任并很快被取代了的国务卿，杜鲁门写道，他是“一个杰出的人，相貌堂堂、和蔼可亲、易于合作，但却从没有思想，不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挂名的国务卿或白宫政策的纯粹的执行者是不符合要求的。但他却在艾奇逊的身上看到最不寻常的国务卿的形象，艾奇逊不像他的前两任贝尔纳斯和马歇尔，他是在国务院多年任职之后，是在杜鲁门第一任期中两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即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中曾起过决定性作用之后，承担起国务卿的职责的。

在行政当局中、在内阁中、在白宫班子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其总体观点，其均衡感、时间感、历史感，其个人准则及有关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说服力，能像艾奇逊这样对总统具有如此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其与总统之间的信任和友谊能与艾奇逊相比。

艾奇逊回忆说：“杜鲁门和我之间的关系是超乎寻常的。”

我们两人都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对方的角色。在这上面我们从未发生过争执。我从不认为我是总统，而他也从不认为他是国务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之间的关系要十分真诚，有时甚至要很率直，这是很重要的。但你必须恭敬。他是美国的总统，而你不能对他说粗鲁的话——你可以对他说直率的话。有时他不喜欢这种话，那很自然，但他可以反驳，而你也可以把事情辩个水落石出。但是，这是你的职责，你不能只对他说他想要听的话。那对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杜鲁门经常把艾奇逊称作是他内阁中的“首席谋士”。

密苏里的哈里·杜鲁门、彭德格斯特集团的产物、哈里·沃恩的“知心朋友”，也许和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这个格罗顿中学的第 11 名、耶鲁大学的第 15 名、哈佛法学院的第 19 名的高材生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或是他们在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中都感到很惬意，这些猜测撞击着很多人的心灵，近乎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艾奇逊还是在总统的任期中那不断地让总统感到惊讶的事情中的另一个惊讶。

从外表上判断，他似乎具有杜鲁门所发现的令人讨厌的、极端的“穿条纹裤的家伙”的一切特征——而在艾奇逊的身上，几乎不可能不让人从外表上来判断，因为在第一眼中，他身上就有许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东西。

他那漂亮的白垂条纹英国法兰绒西服，那引人注目的仪态，那密密的警卫军式的小胡子和浓浓的眉毛，都使艾奇逊看起来不太真实，倒更像是一位扮演国务卿角色的演员，一位高个、修长、傲慢、全然一幅英国人相貌的国务卿。他的穿着打扮都非常整洁——擦得锃亮的昂贵的英国皮鞋，没有一丝污迹的尺寸合适的袖口，从宽大的前额梳向后方的头发。他虽然身高刚过 6 英尺，但出色的衣服做工和挺胸昂头的完美姿势使他显得比实际上的高度更高些。他不可能不引人注目。在对当年华盛顿生活的回忆中，人们喜欢谈论的就有这位国务卿早晨在上班路上的情景，他手里拿着公文皮包，在大法官

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陪伴下，从乔治敦的家中步行1英里半来上班，弗兰克福特几乎比他矮一头，国务卿每走一步他似乎要走上两步才能跟上。这两位著名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会谈上一路，但据说从不谈论政府；弗兰克福特的汽车跟在后面，一旦他和艾奇逊在国务院的台阶上分手，就把他载到最高法院去。

一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说：“如果哈里·杜鲁门是一个画家，从未见过艾奇逊，坐下来给这位外交部长画像，那么他将用掉和迪安真人大小一样多的油彩。”多年来，参议员林登·约翰逊招待朋友时都仿效艾奇逊进入一个委员会会议室时的样子，趾高气昂的。艾夫里尔·哈里曼自在耶鲁读本科生时起就认识艾奇逊，他担心艾奇逊的外表可能成为一个不利条件，敦促他至少要刮掉小胡子，他说：“你该把它给杜鲁门。”可这位小胡子却说，如果艾奇逊的外表、风度、背景中有什么东西让杜鲁门感到烦恼的话，他可没有说过。

对于杜鲁门来说，国务院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主要是由那些在学院里得高分的特别聪明的人们组成的，不过他们与下层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却没有联系。”他认为，他们是“宗派式的，并且目中无人”，他经常恨不得把“这一整伙人”都解雇了才痛快。不过，这种感情可不适用于国务卿，艾奇逊正在做“了不起的工作”，杜鲁门希望他永远别离开政府。

艾奇逊1949年时是56岁，他是在另一个时代的小城镇的美国成长起来的，在世纪之交的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这个地方不同于密苏里州的独立城。他的母亲是一个加拿大威士忌酒产业的继承人。他父亲生在英国，曾是女王私人步枪队的一名老兵，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后来成为康涅狄格的主教。他对儿子最经常的告诫是“打起精神！”像杜鲁门一样，艾奇逊在青年时期便有了与“现实世界”的第一次遭遇，当时他与一个铁路乘务班一道工作。像杜鲁门一样，他也爱好历史和传记文学。他也崇拜马克·吐温。如果艾奇逊是一个时装样板，那么，无疑，杜鲁门也是他的生活方式中的一个时装样板。

他们共同都有早晨散步的习惯，都是体力格外充沛的人，都是业余建筑师。杜鲁门常说起他初到华盛顿时大法官布兰戴斯对他的影响；艾奇逊1919年从法学院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华盛顿时，便是给布兰戴斯充当书记员，他经常说，他从布兰戴斯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里学到的都多。在政治上，艾奇逊也像杜鲁门一样，认为自己属于中间偏左一点儿的人物。

与他生硬的外表相反，艾奇逊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并带有一种对杜鲁门都有着很强感染力的机智。艾奇逊喜爱开怀畅饮、也喜爱一本好的小说（由于他父亲是牧师，而母亲则是一位制酒商的女儿，他喜欢说自己从小就知道善与恶）。他也像杜鲁门一样，专心于自己的家庭。当他的女儿玛丽在1944年患了肺结核并被迫送到纽约萨拉纳克的一家疗养院去进行长期治疗时，艾奇逊每晚都给她写信，经常用他品尝到的比普通人所理解的更丰富的生活去启示她。

在国会的午餐会上，我被安排与伊利诺伊州的杰西·萨姆纳坐在同一张桌旁，她是最顽固、最具煽动性的孤立主义者……我们相处得融洽极了。她是一个庄重的老处女，使我想起了约翰·斯坦贝克的《罐头厂街》中的那位出身卑微、富有幽默感和人道精神的妇

人。我们成了好朋友，并打算再次共进午餐。我常感到奇怪，自己是否有原则，这是一个使人困惑的世界。

杜鲁门在写给埃塞尔·诺兰的一封信中曾说：“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内心都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色彩，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大胆怯或太有意地抗拒，而不愿意显示出来。”几年后，当艾奇逊被埃里克·塞瓦赖德问道，在他和总统这两个似乎如此不同的人之间是怎样建立起那么多的信任和喜爱的，艾奇逊说，答案是复杂的，但是其中重要的在于他称之为的杜鲁门那“深深的爱心和体贴的品质”，他补充说：“这绝不是对他的一般的印象。”当艾奇逊的女儿不得不接受一个大手术时，艾奇逊正在国外，而且她能否挺过这个手术还不知道，杜鲁门每天亲自给医院打电话要求提供报告，然后他再通过越洋电话把情况转达给艾奇逊。

艾奇逊后来说：“啊，这是一种值得人们崇拜的人。你对这种人能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仰慕之情。”

艾奇逊知道，杜鲁门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或他希望人们所知道的更具感情色彩，他的行为远远超过了在许多人看来可能只是例行公事的姿态。那年晚些时候，杜鲁门在再次飞往基韦斯特的飞机上给艾奇逊写了一张标有“私人信件”并在这个字下面划有横线的手书短笺：

感谢你的好意，来送我们上飞机。你总是做得对。我仍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当国务卿这个最高级的公共官员来机场送我去度假，我不能不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艾奇逊说：“而且，他总是那么公正。他不会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决定。他把所有的人都叫到一起。你们所有人的意见他都听，你们也一起得到了答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公平的人。”

此外，杜鲁门也欢迎其他人的意见。“他不怕其他的意见来竞争……他没有一个领导人身上的那种最常见的缺点，在他本人和他的职务之间，从来没有过自负。”

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列举艾奇逊的个人行为准则的内容时，把忠诚放在第一位，然后是诚实和“不装成比你更强”。杜鲁门不会忘记，1946年中期选举的那次蒙羞之后，是艾奇逊独自到联邦车站去欢迎他。杜鲁门告诉戴维·利连撒尔说，艾奇逊是一个杰出的人，“忠诚、聪明、不像某些耀眼的人物那样”。

艾奇逊具有勤奋工作的特殊能力，他还赞成这样的哲学、即文明主要是依赖于那些愿意肩负起必要的艰苦工作的相对少数人的努力，这些都很有助于赢得杜鲁门对他的尊重。艾奇逊相信清晰而有序的思维，他知道世上没有轻而易举的答案，也没有快速见效的药物。他说，由于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美国人就不得不克服这种思想、即国家面临的问题能够用点儿小聪明或没有烦扰地得到解决。

他并不把冷战看成是善与恶之间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1949年12月，他在国家陆军学院告诉一群军官听众：说善与恶不能并存于这个世界上，这是荒谬可笑的。



今天你们听到很多人谈论绝对……人们说，我们和俄国人那样的不同的两种制度不可能并存于同一个世界上……一个是善，一个是恶，而善与恶不可能并存于这个世界……自正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以来，善与恶就一直并存在这个世界上。

正确的探索要针对有限的目标，它很快就足以使我们在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中受到教育。这正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美国必须学会做的事情：限制目标，使我们脱离对绝对的追求，找出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必须尊重我们的对手。我们必须懂得，在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他们将继续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在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都将居住

在这个巨大的宇宙空间中的旋转的地球上。

事情不久就足以使每一个人看得很清楚，艾奇逊不仅是杜鲁门内阁中最重要的一员，而且是杜鲁门迄今所任命的最重要的官员。不像贝尔纳斯和马尔歇尔，他将作为国务卿任满一个完整的任期，尽管他会遭遇到美国公共生活中很少有人遇到过的那种中伤。他将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一个大累赘，被称作是笨蛋和叛徒。他的批评者和敌手并不只是来自共和党人的阵营。一个在一切场合都特别热衷于向他的权威挑战，并决心要看艾奇逊出几次丑（即使不是出尽丑的话）的人是路易斯·约翰逊，他显然不喜欢艾奇逊，并且他对艾奇逊的尖刻评论便很快传到了白宫。杜鲁门极不高兴，警告约翰逊停止这种做法。杜鲁门告诉前预算局长、现任艾奇逊的副国务卿的詹姆斯·韦布说：“艾奇逊是一位君子，他不会屈尊去争吵。约翰逊则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用谩骂来达到他的目的。当他攻击你的时候，只管反击他。”

其他认识艾奇逊的人认为，如果摊牌的话，约翰逊不会有获胜的机会。英国大使、艾奇逊的密友奥利弗·弗兰克斯称艾奇逊是“一个浪漫的人”和“一把钢刀”。

11月7日，杜鲁门告诉利连撒尔，他有一个严肃的——非常严肃的——问题要在不久后作出决定，此时，艾奇逊已将超级炸弹的事情向他作了汇报。

利连撒尔回答，他希望不久得到一份原子能委员会下属委员会的完整报告。

杜鲁门说，是的，他当然想知道事实。

这份报告连同顾问委员会关于不应发展超级炸弹的一致结论，以及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赞成上述意见的建议，在两天后、即11月9日提交给了杜鲁门。原子能委员会以3比2的票数决定反对发展这种核弹，其中，利连撒尔是关键的一票。第二天，杜鲁门提名艾奇逊、约翰逊和利连撒尔组成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它被称作“Z委员会”——就是否继续发展超级炸弹和是否应将此事“公布”，向他提出建议。一周后，整个华盛顿都知道了正在考虑一种超级炸弹的问题。

《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从国会两院原子能联席委员会成员、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在纽约的一个地方电视广播节目上所作的评论中，察觉到了此事的第一个蛛丝马迹；当约翰逊对科学家们保守秘密的能力表示担心时，他泄露了秘密。于是，突然间，一个新词“氢弹”成了公开的议题。

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欧内斯特·劳伦斯正在为继续研制它而拼命游

说。1945 年任职于“临时委员会”并刚刚离职成为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卡尔·T·康普顿写信给杜鲁门说，在没有关于原子能控制的国际协议的情况下，美国除了研制超级炸弹外，别无选择。

在国务院，出于道义上的激愤，乔治·凯南集中精力在撰写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周密的分析报告；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中，一份他知道如何去做的“真挚而雄辩”的抗辩中，他不仅宣称反对这项计划，而且敦促美国树立一个榜样。人类最后的希望在于对一切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行国际控制。美国应该宣布，为了达成国际协议，它“准备走得很远，准备表现出对其他国家的极大信任，并承担自己面临的某种风险”。进行了这项计划就还会有更可怕的下一步，这将使这个国家和世界陷入一种毁灭和代价的无止境的升级之中。

这样，反对超级炸弹的意见基本上来自 3 个人：利连撒尔、凯南和奥本海默，后者除了本人在道义上反对外，还认为这样一种炸弹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不过，凯南像利连撒尔一样，快要退休了，而新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办公室的主任保罗·尼采，是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的。尼采认为，苏联拥有原子弹不仅意味着美国必须进行氢弹的研制，而且还意味着必须增加它的常规力量。

艾奇逊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曾赞成与苏联进行原子能方面的合作，可现在又回到了他最初的观点上。事实上，他告诉凯南带上他的教友派观点，走人。

我告诉凯南，如果这就是他的观点，那么他就应该从外交机构中辞职，走出去鼓吹他的教友派的福音，而不要在国务院中推行它。如果他不愿意以一种责任感来面对这类事关美国人民利益的问题，他就没有权利呆在这个机构中。

在与另一位助手谈话时，艾奇逊反问道：“你怎么能说服一个患妄想狂的对手去做‘裁军的榜样’？”

这场绝密的辩论持续了 3 个月，以 1949 年 11 月到 1950 年 1 月底，大多数辩论都发生在国务院 5 楼艾奇逊的大办公室中——他说，这个房间使他想起了一艘北德意志劳埃德海轮上的二等舱的那间餐厅兼交谊室。不过，艾奇逊、约翰逊和利连撒尔组成的三人 Z 委员会只开过两次会，据艾奇逊说，这主要是“由于路易斯·约翰逊那尖酸刻薄的性情”。约翰逊与利连撒尔争辩得非常激烈。

第一次会议是在 12 月 22 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是在 1 月 31 日。

在此期间，杜鲁门的总统日程一直安排得非常满。在朱利叶斯·克鲁格辞职后，他任命奥斯卡·查普曼为内政部长。他接待了伊朗新国王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与 5 名残疾儿童一起照像以支持“一角钱进军”的慈善捐款运动；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联邦住宅管理局向 27 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的低租住房发放 2000 万美元的贷款；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禁止联邦住宅管理局向带有种族和宗教限制的新住房计划提供财政支持；与教皇互致了圣诞祝辞；并从秘密保安部门获悉，仅 1949 年一年便有 1925 项对他或他的家人发出的书面或口头的威胁（其中一项说：“总有一天我要挖出你的心，

去把它喂蚂蚁” )。

进入新的一年的4天后，在新近重新装修的下院会议大厅中，他发表了第五个国情咨文。如果美国的生产力继续以半个世纪以来的同样速度增长的话，他告诉国会，那么今后的5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将增长3倍，平均每个家庭的收入将是1950年的3倍，即每年12450美元，这个数字使许多人吃惊，感到不可想象。“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自由和繁荣的国家，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在1950年1月7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提出了他的年度预算——这本厚厚的绿皮书的篇幅和重量相当于一本纽约的电话簿——并回答了有关的问题。全部预算数字为424亿美元，其中包括为国内计划增拨的10亿美元。但是，大部分开支、即300亿美元左右是用于支付过去的战争和现在的国防费用的，后者为135亿美元。这是一个不平衡的预算。预算赤字为50亿美元，这意味着到1952年时，国债将达到2683亿美元。

在给国会的一项咨文中，他要求“适度地”增加税收，以带来1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一天晚上，他在肖勒姆饭店呆了一个小时，站在一间餐厅雅座的门前与实际上的国会每一位民主党议员握手。他在劳联的一个宴会以及一个民权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还举行了5次记者招待会。

他也面临着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戴维·利连撒尔这两位最好的助手将在2月份离职回到私人生活中去的事实。失去克利福德将是一个真正的打击。但是，克利福德已精疲力竭，并欠了一屁股债，在过去4年中他的生活开销远远超出了他在白宫的薪金。他将留在华盛顿从事律师事务。利连撒尔也已筋疲力尽，知道自己离职的时候已经来临。杜鲁门正如他本人所说，感到好像“翻了船”似的。

然而，更严重也更令人担忧的是对迪安·艾奇逊的攻击。12月份，对失去中国和想象中的共产党人在各处渗透的愤怒，导致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要求杜鲁门解雇艾奇逊。接着，1月21日在纽约漫长的复审结束时，阿尔杰·希斯被判犯有伪证罪——他在传递秘密文件的问题上撒谎——当天晚间，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中的唯一律师，一直在希斯案件的审判中扮演主角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在广播中指责行政当局“故意”掩盖希斯的“阴谋”。1月25日、星期三，希斯被判处5年监禁的当天，在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奇逊被问道他对此有何评论。

这个问题并不出人意料。在一年前批准他任职的听证会上，艾奇逊曾承认希斯是他的朋友，并将继续是他的朋友，他补充说，他本人的友谊既不会轻易地建立，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希斯的兄弟唐纳德是艾奇逊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艾奇逊任助理国务卿时，他曾担任艾奇逊的助手。如今，面对众多的记者，艾奇逊说：“我愿意向你们清楚地表明：不论希斯先生或他的律师对此案提出的任何上诉的结果如何，我都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

这绝非是一个感情冲动的回答。艾奇逊对他要说的话已考虑过很长时间，许多在场的人立刻感到，这是杜鲁门政府的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他的语调中充满了感情，继续说道：

我认为，每一个认识阿尔杰·希斯或在任何时候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在良心上面临着一个非常严肃的任务，即确定他的态度是什

么以及他应该怎样做。每一个人都肯定会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和他自己的准则来做这件事。对我来说，这些标准和准则是确定无疑的。我想，它们在很久以前就为我们确定了……在橄榄山上，如果您有兴趣读读它们，您可以在《福音书》的第 25 章、《马太福音》第 34 节开始的地方找到它们。

一位助手站在门口，拿着一部《圣经》，以备那些希望查阅下面这句话的记者之用：“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也许艾奇逊的父亲、那位康涅狄格州的已故主教的声音正回响在这句引文中，该报是赞扬艾奇逊所说的话的很少的几份报纸中的一份。

本报经常感到有必要批评和反对艾奇逊先生的政策……然而，对于星期三在一个困难的时刻所作的这项声明，我们却高兴地宣布，根据我们的判断，它具有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勇气。

这也是一场政治灾难。消息几乎立即就传到了国会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打断了参院的正常议程，以便报告国务卿刚才所作的“最荒谬的声明”。麦卡锡问道，这是否意味着这位国务卿将“不会背弃国务院中的任何其他共党分子”？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艾奇逊立即去见杜鲁门，后者此时已见到了有关这件事的自动收报新闻。艾奇逊提出了辞呈。他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杜鲁门“对此事的态度妙极了……说，一个刚参加过一位才出狱、没有朋友的老人（汤姆·彭德格斯特）的葬礼的人没有心思来了解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去验证这些话”。

艾奇逊还写道：“所以，事情就是这样，正如伊朗国王在他的戒指上刻下的那句话一样：‘这也将过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过去。此事对他本人和总统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们两人所知道的都要大。理查德·尼克松称艾奇逊的声明“让人恶心”。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休·巴特勒在一篇激烈的演说中怒气冲天。“我看到这个家伙，我看到他那自作聪明的样子和那英国式的服装，以及在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中包含的新政的味道，我就想喊：‘滚出去！滚出去！你代表了美国多年来所有的错误的东西！’”

华盛顿的气氛、正在考虑氢弹决定的气氛，已经变得充满了积怨和担忧。第二天、1月27日星期五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首次被问到他是否也会拒绝背弃阿尔杰·希斯——对此，他答道：“无可奉告”——接着，又波问道他对氢弹问题的观点是什么，似乎这两个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杜鲁门答称，在他作出决定前，没有什么话要说，由此便首次承认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对氢弹问题的评论和猜测在继续。报刊标题称它是“终极炸弹”、“地狱炸弹”。《生活》杂志发表了一幅芝加哥的航空照片，来显示这座城市将有多大的部分——50 平方英里——会被一颗这种炸弹毁掉。在《华盛顿邮报》上，漫画家赫布·布洛克多年来一直把原子弹画成是隐现在各种和平会议的上空或掂量世界的一种可怖的东西。现在，他画了一颗原子弹握着一个

标有“超级炸弹”的更大更可怕的怪物的巨手，问一位惊恐的山姆大叔说：“还想要会会我的朋友吗？”

埃莉诺·罗斯福和伯纳德·巴鲁克公开表示了他们对制造氢弹的支持。芝加哥大学的哈罗德·尤里，因发现重氢而于193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子能研究的一位先驱者，在纽约的一次演说中宣称：美国如果输掉军备竞赛，就不可能不冒丧失自由的危险。

有关行政当局内部激烈对立的谣传、谈论谁支持或谁反对氢弹，成了华盛顿的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在国会山，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国会两院原子能联席委员会主席布里恩·麦克马洪据说对不继续研制氢弹的前景“几乎流下了眼泪”。这位权力很大的参议员向利连撒尔保证说，与俄国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迅速地将他们从地球表面炸掉，在他们对我们做这同样的事情之前——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在给杜鲁门的信中，他写道：“如果我们让俄国人首先获得这种超级炸弹，大灾难几乎就成为肯定的了——如果我们首先得到它，那么就还存在着拯救我们自己的一线生机。”

参谋长联席会议想要一个“应急计划”。布莱德雷将军写道：“争论一种武器是否比另一种武器更不道德是愚蠢的。因为，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战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这种不道德的耻辱必须由创造敌意的国家来承担。”尽管存在一项谅解、即有关氢弹问题的审议将保持在Z委员会内部，但路易斯·约翰逊仍马上将布莱德雷的备忘录提交给了杜鲁门。

就像一个病人坐在医生的接待室中，而专家们正在讨论他的病情一样（《时代》周刊写道），美国公众……坐在外面，而总统，他的军事、科学和外交顾问们正在辩论是否制造……世界上迄今所能想象的爆炸力最强的武器……但是，由于俄国人也知道了氢弹的原理，所以拖延是危险的，也许还是致命的。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尽管这可能让人讨厌），如果俄国人有可能制造一颗氢弹，那么美国也将不得不制造它。

1950年1月31日，当艾奇逊·约翰逊和利连撒尔及他们的几位助手在国务院老办公楼的216室召开Z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时，是艾奇逊主持会议。他已做出结论：应该继续进行研制氢弹的工作，并且要提交总统将要发表的声明的草案。

约翰逊同意，但利连撒尔不喜欢在一种“激动的气氛”中仓促行事。现在，一个研制氢弹的决定也许会给尚不存在的核武器竞赛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认为，国家几乎唯一依赖于这种武器是极不明智的；研制这种武器会给美国人民一种“错误的和危险的保证……似乎当我们有了这种新的发明后，与俄国人较量的‘优势就会在我们一边’”。他对这项计划将对国防预算和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表示怀疑。

艾奇逊非常钦佩利连撒尔，后来他描写说，利连撒尔反对意见表达的“雄辩而有说服力”，尽管如此，当时他还是说他有两个“棘手的事实”无法对付：推迟氢弹研制工作并不能推迟俄国人的氢弹研制；同时美国人民完全无法容忍一项推迟研制的政策。

约翰逊说：“我们必须保护总统。”尽管利连撒尔仍有严重的保留，但

他也同意签署这项声明。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海军上将西德尼·W·索尔斯的陪同下，这3人朝白宫走去。他们的会议持续了2个半小时，他们与总统的会见只用了7分钟。

杜鲁门也许早在10天前就下了决心，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是他最亲近的班子成员们的印象，尽管他什么具体的话也没讲过。艾奇逊明白这一点，显然他们都知道这一点。利连撒尔写道，总统“在我们进门之前，显然已对他打算做的事情下了决心”。

在杜鲁门审阅声明的时候，艾奇逊说利连撒尔有些补充意见要表达。

杜鲁门转向利连撒尔，说他一直相信：美国应永远不使用“这些武器”；和平是“我们的全部目的”。利连撒尔说，尽管他并不过高估计自己判断的价值，但他感到他必须表达出自己对拟议中的这项方针的严重保留。虽然他尽力去理解，但他仍无法将它看作是最明智的行动。不论措词如何谨慎，不论怎么辩护，这项声明只会使一项依靠核武器为国家主要防御手段的基本错误的政策得以推广。

杜鲁门打断说，国会“以及到处”对此事的议论都太多了。人民“如此激动”，他看不到自己能有的选择。

他问在场的人：“俄国人能做这件事吗？”这是他唯一的问题。他们都点头。

索尔斯海军上将插话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说，“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将进行下去。”

在签署这项声明时，杜鲁门说他想起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希腊问题的另一次会议，当时，“每一个人都预言：如果我们进行的话，将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可我们确实进行了，而世界并未走向末日”。他说，“这次的情况”和上次是“一样的”。

在总统回布莱尔大厦的家里吃午饭时，查利·罗斯又散发了一份油印材料。

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确保我们国家能够抵御任何可能的侵略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据此，我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继续其在一切形式的原子武器上的研制工作，包括所谓的氢弹或超级炸弹……

利连撒尔描述说，原子能委员会此后的心绪有如一个送葬的团体。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伤心之夜。他写道：“我希望我错了，或是被某种方式证明我是错的。我们不得不把许多事情留给上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少有的一次在电视上的露面中，谈到了空气所受到的放射性的毒化，并对“普通毁灭的召唤”提出了警告。

杜鲁门在多大的程度上挣扎于这个决定中，或者事后又考虑过多久，人们不得而知。他在著作中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艾奇逊对他的影响也无法轻易地衡量出来，尽管它无疑是相当大的。正如杜鲁门所说，艾奇逊是他所认识的最会说服人的人。

倘若对整个问题进行更长、更仔细的审查、并且压力再小一些的话，即便假定杜鲁门可能做出与此没有什么不同的决定，那么肯定会有更好的——

更明智、更审慎的——选择。这个国家就能准备得更充分。就能有时间准备一份清楚的、解释性强的总统对全国的演说，而不是一份油印的通告。如此令人不安、如此重大、如此代价高昂的一步本应做得更好。

不管怎样，正如预料的那样，公众和报界对这项决定的赞同是压倒性的——总统已做出了“正确的和必然的”决定。接着，仅仅在几天之后，恐惧感因下述的情况而变得更大了：来自伦敦的消息说，一位曾在洛斯阿拉莫斯供职的前原子科学家克劳斯·雷克斯已供认自己是一名俄国间谍；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突然宣称，他已掌握了一份国务院雇用的 200 多名已确认是共产党人的雇员名单。

#### 4

由于如此多的巨大的、似乎永不平息的坏消息——中国陷落、俄国的原子弹、阿尔杰·希斯、克劳斯·富克斯的背叛——的冲击，所有这些都是不到 6 个月的时间里、在这种喧嚣混乱中突然发生的，使得这个国家处在了一种可怕的、不安的状况中。

印第安纳州的国会参议员霍默·凯普哈特问道：“我们还将被迫接受多少这种坏消息？”

《生活》杂志用一期中的大部分版面来说明俄国军事力量比美国的军事力量究竟大多少——它有一支 260 万人的军队，而美国军队为 64 万人，30 个俄国武装师对一个美国师。美国一年生产 1200 架新飞机，而俄国人则生产 7000 架。只有美国的海军处于领先地位，但苏联人已有了一支比上次战争开始时德国所拥有的更强大的舰队，而且它的潜艇数量是美国的 3 倍。美国国民收入的 6% 用于军事力量，而俄国人则有 25% 用于此，等等。《生活》杂志的标题问道：“战争可能来临；我们要做准备吗？”

当然，这是政府内部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几个月以来，艾奇逊在非公开场合一直争辩说，杜鲁门对国防开支的 130 亿美元的限制已经不现实了。如今，由于他决定继续研制氢弹，杜鲁门授权对军事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开始着手起草一份新的综合性报告，同时，由于形势的压力，国务卿与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在 3 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路易斯·约翰逊雷霆大发——摔开座椅跳起来，喊出他的反对意见，用拳头擂着桌子——以致艾奇逊只能得出结论说，约翰逊像福雷斯特一样，在紧张的压力下精神崩溃了。

当艾奇逊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杜鲁门时，杜鲁门震惊了。也许正是在这时，他知道了约翰逊必须离职——一旦时机合适的话。

恐惧支配了华盛顿和整个国家。霍布·布洛克回忆说：“空气中充满了恐惧，只需一个小火花就能点燃它。”而这个火花就是麦卡锡。当布洛克在《邮报》上他的另一幅漫画中，把一个溢出沥青的桶标上“麦卡锡主义”时，另一个新词随着“氢弹”进入了人们的语言中。

直到那年 1 月时，约瑟夫·R·麦卡锡这位威斯康星州的 41 岁的年轻参议员一直在搜寻一个可以使自己从默默无闻中崛起的争论问题。麦卡锡在参院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在最近华盛顿记者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又被选为最差的参议员，他似乎代表着毫无希望的失败。一天晚上，在科洛尼餐馆用餐时，一位天主教的教士、乔治敦大学的埃德蒙·A·沃尔什神父建议他应对政府内

的共产党渗透问题敲响警钟，而已经对共产党颠覆问题提出了某些大声的、即使不是引人注目的指责的麦卡锡，似乎立即就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个月后，在西弗吉尼亚州举行的林肯诞辰纪念会的演说中，他挥动着一张纸，说“在我手中”他有在国务院的 205 名“已确认是共产党人”的人名单。这个演说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但是，不久后在盐湖城和里诺，他又提出了基本相同的断言，不过人数被减到了 57 人，而且现在他们被称为“持有党证的”共产党人。这样，他就上了全国各报的头条新闻。回到参议院后，他歇斯底里地讲了 5 个小时，声称已穿透了“杜鲁门的秘密铁幕”，并能举出 81 个人的名字。

这个指责是轻率的、也没有获得支持。麦卡锡提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也提不出任何的新证据。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喧嚣者，乖僻、鲁莽、酗酒成性；是自休伊·朗时代以来参院尚未见过的那种蛊惑者，只是他没有朗的那种魅力或才华。新闻界称他是一个绝望的饶舌者、一个典型的杀手。他对共产党人的追捕是“严肃而必要的忠诚审查事务中的一出可悲的滑稽剧”。但是，他既不为自己前后矛盾的说法感到难堪，也不为这些批评而感到烦恼，而他所说的话报纸上都印了出来，他最轰动的断言经常获得最大号字的标题的待遇。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即使他可能在某些细节问题上弄错了，但也许他真的了解某些情况，似乎他揭露这些问题正是时候。

麦卡锡指责说，杜鲁门是“一帮狡猾的知识分子的俘虏”，他们只对他讲他们想要他知道的事情。他攻击艾奇逊说：“当这个穿着条纹裤、装着英国腔的自负的外交家对美国人民宣称，橄榄山上的基督赞成共产主义时，这种对一个神圣的可信赖的人物的严重不忠和背叛、这种亵渎神明的说法是如此的可恶，以致它唤醒了美国人民沉睡着的义愤。”在麦卡锡继续着他的攻击时，艾奇逊收到如此多的恐吓信，以致警卫人员不得不通宵在他的房前站岗。

在他的许多共和党伙伴沉默地悲叹麦卡锡的做法时，其他一些人——布里奇斯、布鲁斯特、凯普哈特、蒙特、惠里——则开始表示支持。布鲁斯特说：“我不会背弃乔·麦卡锡。”鼓励也来自塔夫脱参议员，在 1946 年选举中他曾第一个提出了“对共产主义软弱”的问题，如今，他公开承认他正在怂恿麦卡锡，他对新闻界说，攻击“要保持下去，如果一场攻击不奏效，就发动另一场攻击”。塔夫脱这样的共和党人对 1948 年杜鲁门的惊人的翻盘所感到的全部愤怒和怨恨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与此同时，参院的民主党人要求对麦卡锡的指责进行彻底的调查。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在一位备受尊敬的参院有影响的民主党人、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的主持下，开始举行听证。采取这种做法的设想是，在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麦卡锡和他的伎俩将无处藏身。

然而，这种众目睽睽仅仅是抬举了他。在参院大理石柱的秘密会议厅举行的听证会使他一天又一天地处在舞台中心，并引起了新闻界的全力关注。他说：“你们别想愚弄我。这个委员会不是在寻求得到那些造成严重的安全危险的人的名字，而是……想找出给我提供消息的人的名字，以便明天把他们赶出国务院。”到了月底时，自他首次在惠灵发难以来的 6 个星期中，麦卡锡没有指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名字。

他宣称，他有在美国的“俄国高级谍报代理人”的名字，此人确实“一度”曾是阿尔杰·希斯及其谍报圈的上司。麦卡锡说，这个人就是前国务院



官员、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欧文·J·拉铁摩尔。正如时间所证明的，拉铁摩尔既不是共产党员，甚至在国务院时也不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曾于1946年在国务院总共工作过4个月，在一个日本赔款委员会中任顾问。这项指责是一个欺骗。麦卡锡告诉委员会：“如果你们破了这个案，就会发现它会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间谍案件。”他说，他准备与这个问题共进退。

1950年2月中旬，大约正是在麦卡锡鲁莽的指责首次成为头条新闻时，杜鲁门同意了《纽约时报》的阿瑟·克罗克对他进行一次单独的采访。其间，他给克罗克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是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自制力和能力的人。

在一个原子能可以转变为能够摧毁大城市和人类文明杰作的武器的时代，在能够把摧毁力扩大许多倍的氢弹爆炸的阴影中，一位美国总统安详地坐在白宫里，他对人类美好的本性必将胜利的信念没有减弱，对他本人谋求持久和平的努力必会取得进展的信心也没有减少。

克罗克说，哈里·S·杜鲁门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但是，在那些有机会与他直接交谈的人看来，他对未来的信念有着一种“光明的”性质。

他处在动乱和恐惧的世界中心……但是，怀疑和恐惧的阴影（在这阴影中，美利坚民族进行着巨大的最危险的冒险）……由于他而突然消散。来访者看到他临危不惧，因而确信，不论是在他这个时代还是以后，必将会从许多人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中找到一条保存这个世界的道路……

戴维·利连撒尔于2月14日去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做最后一次告别会见，他后来描写说，这是“我与他的最幸福的一次会面”。

杜鲁门说：“关于那些科学家，我们需要拥有极高智力的人，需要他们的思想。但是，我们也需要使他们与其他类别的人保持平衡。”

利连撒尔，也许其他人也一样，知道杜鲁门承受的负担的重量。然而，杜鲁门看上去“非常精神……他的目光锐利”。仔细地看他，听着他谈话，利连撒尔感到很惊奇。他后来写道：“我对他看待事物的那种轻松的方式感到钦佩和惊奇，而他那显然良好的健康……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他那结婚30年的妻子却知道不同的情况，他只对她一个人描述了自己的不同的状况。她越来越担心他的身体，以及麦卡锡的攻击给他造成的压力。他的头痛病又犯了。3月中旬，贝丝敦促他再次撤退到佛罗里达，去恢复他的体力。他从基韦斯特写信给她，说：“你看到每一个人都冲我开火，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也是冲班子中某些与我最亲近的人。”

在参院，共和党人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如今已加入了麦卡锡的行列并逐步加强了攻击。杜鲁门曾经很喜欢布里奇斯，一直认为他是一位朋友。约翰·斯奈德最近也成了一个靶子。谣传说斯奈德酒喝得太多。

新闻界对哈里·沃恩的苛刻评论，对迪安·艾奇逊的几乎没完没了的辱

骂，对他本人表现的轻蔑批评，所有这些他似乎都对之无动于衷，可实际上却使杜鲁门极其心烦意乱，他内心并不感到这对他是无所谓的。

这些批评的总趋势（他给贝丝的信中写道）是，我是处在一个极大的位置上的一个极渺小的人，当某些我信任的人加入了这个批评的行列时——这使我感到非常伤心。我已经很老了，也很累了，我需要无人曾需要过的那种支持。

使我如此极度紧张不安的是——他们开始打斯奈德并且几乎打垮了他，还有沃恩，他的精神状况很糟。现在他们又在追踪我的内阁中最高的一位参谋。正当我们设想寻求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整个外交政策却处在了危险之中……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能够理解，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啊！

他认为，麦卡锡是一个暂时心理失常的人，“一个不得不同野蛮的攻击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大吹大擂的能手”。即使如此，他也受够了。3月30日，在基韦斯特逗留期间，杜鲁门决定站出来讲话。当时，根据民意测验，有半数美国人对这位参议员持有一种“赞成的看法”，认为他正在帮助这个国家。杜鲁门本人的名望却完全相反，跌至37%，几乎与1948年春季时一样低。

他在小白宫旁边的草坪上召开了一个罕见的记者招待会，小白宫的上空阳光灿烂，微风吹动着棕榈树叶，在这儿谈论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年轻参议员似乎与环境很不协调。杜鲁门看上去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合身的浅色亚麻西服，没有系扣子，他坐在一把白色的柳条椅中，记者们围成一圈坐在他周围。

他希望麦卡锡参议员在国务院中找出任何不忠诚分子吗？

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表情说道：“我认为，克里姆林宫拥有的最大的财宝就是参议员麦卡锡。”

他说，还有其他人——惠里和布里奇斯。共和党人一直在为那次失败的选举而徒劳地挑起争端。他们已经尝试了“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福利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某些人甚至想挖出“那匹被称作‘孤立主义’的恶臭的死马”。他震怒了。他用一个手指指向空中说，正在参院进行的这场“将以失败而告终的闹剧”是阴谋破坏两党一致的外交政策的企图。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它心须被制止。他强调补充说，迪安·艾奇逊将作为一位伟大的国务卿而名垂青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个俄国间谍吗？

“噢，当然不是。乍听起来，这个问题很愚蠢。”这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时刻，记者们认为，他的表现与富兰克林·罗斯福震怒时一样。

塔夫脱指责杜鲁门诽谤麦卡锡。回到华盛顿后，在另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一位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时，杜鲁门答道：“你认为这可能吗？”

在联邦酒吧协会的一次聚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保证说，没有任何一例已被确认的共产党颠覆或其他任何类型的颠覆可以逃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或是在他本人的忠诚计划中漏网。“在美国的生活中，没有共产党发展的余地，除非在某些人的思想中它可能发展……”他本人的忠诚计划也许造成了一种总体气氛，使得麦卡锡崛起，这是他似乎不愿去考虑的一种思想——至少在当时他不愿去想。

“我想，我们的朋友麦卡锡最终将得到他应得的下场。他根本就没有体面感或荣誉感。”杜鲁门写信给欧文·拉铁摩尔的妹妹说。

我想，你能够明白总统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一周中，每天他都处在那些不尊重真理且目的在于诋毁和羞辱他的人的持续不断的火力网之下。这些攻击不获成功他们是绝不会满意的，因此我懂得你对你兄弟遭受的攻击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面对它，真相终究会大白。

然而，杜鲁门或其他人所说的话似乎并未损害麦卡锡的声誉，也未减少他在政府和全国所散布的恐惧。当杜鲁门先是拒绝把安全档案转交给泰丁斯委员会（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后又决定让泰丁斯及其委员会到白宫来看被麦卡锡指控的 81 人的档案时——这是一项帮助泰丁斯羞辱麦卡锡及答复一位共和党人指责他杜鲁门“掩盖”证据的努力——这被证明是一项糟糕的决定。如今，甚至连总统似乎也在向乔·麦卡锡投降。

泰丁斯在一种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每天给白宫打三四次电话。杜鲁门的班子显得极其担忧和紧张。杜鲁门告诉他们保持镇静。他说，麦卡锡将会自我毁灭。此人是一个骗子，他将被揪出来并会被逐出参议院。这就是这些事情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它应被引入的方向。杜鲁门只是担心参院是否会有一人有骨气的人来做这件事。

6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中，人们看到那位有骨气的参议员原来是一位共和党人，参议院唯一的女议员、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当她宣称，她不想看到共和党“靠着 4 个诽谤的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而奔向胜利”时，杜鲁门对他的班子说，她做了“一件好事”，尽管他认为她应该更激烈些、更具体些。

在那年春天的一个特别荣耀的日子里、即 1950 年 4 月 11 日、星期日，丁香花和杜鹃花盛开，樱桃花开满了泰德尔盆地，这一天杜鲁门亲手起草了一份他打算在两年后公布的声明。4 月 11 日标志着他第五年任职的结束，他决定不再竞选下一任总统。

1947 年，作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 4 任总统的回忆的一种责难，第 80 届国会的共和党人通过了宪法第 22 条修正案，把总统任期限制为两任，杜鲁门是反对这条修正案的。由于获得了各州的批准，它将于 1951 年成为法律。但是，由于它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杜鲁门，所以他可以不受约束于 1952 年再次参选，因此，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认为他会参选。

他一直在考虑“权力的诱惑力”问题，以及他心目中的英雄、那位放弃了权力的罗马将军辛纳图斯所树立的榜样。对于形势的发展他既不沮丧，也不愤怒。他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如华莱士·格雷厄姆所说的那种铁人的气质，或者再有，像一位白宫记者所说的“一个幸福的人，而且就像一位具有无限的自信心的观察家”的气质。不过，这一次他自己平心静气地、除了夫人以外没有与任何人讨论过，便决定在 1952 年春发表他的退休声明，届时他将是 68 岁：

我不是民主党大会提名的候选人。

我第一次竞选公职是在 1922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

在武装部队中服役两年，在参院 10 年，担任过 2 个月零 20 天的参议院副议长和参院议长。我担任公职有 30 余年，就任美国总统几乎整整两届。

华盛顿、杰斐逊、门罗、麦迪逊、安德鲁·杰克逊和伍德罗·威尔逊，还有卡尔文·柯立芝都是两任的先例。只有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试图打破这种先例。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了。

据我的看法，当总统 8 年已经足够了，有时，对于一个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来说都是吃不消的。

权力有一种诱惑力。它能够渗入一个人的血液，就像众所周知的赌博和贪财所起的作用一样。

这是一个共和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共和国。我想让这个国家继续成为一个共和国。辛辛纳图斯和华盛顿指明了道路。当罗马忘记了辛辛纳图斯时，它就开始衰败。当我们忘记了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这些人的榜样（所有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原是可以继续担任总统职务的），那么，我们就会走上独裁和毁灭的道路。我知道我能够又一次当选，并继续打破这种旧的惯例，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它那样，但我决不这样做。这个先例的继续——不应靠宪法修正案，而应靠以在职的人的荣誉为基础的惯例。

虽然我可以辩解说，我只做了一届总统，但为了重就建立这种惯例，我不是一个候选人，我将不接受另一届的候选人提名。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声明中的基调有点儿自我庆贺的味道，他对连任的信心到底是出于真挚还是想给记录中增加点儿色彩——免得有人把他看成是从恐惧的战场上退职——这很难说。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因选择超过两任的竞选而不认为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的这种暗含的指责，是与他在 1940 年大选中的立场一致的；但在 1944 年大选中他没有坚持这种立场，当时他是罗斯福的竞选伙伴。不过，这仍是一份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几乎从未写过的有价值的声明。他献身于辛辛纳图斯的理想，这一点毫无疑问。正如事情将证实的那样，这绝不是一时兴致所在。

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说任何话。这两页手写的文件被静静地收藏起来。

4 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被称作 NSC—68 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的关于国家军事力量的具有爆炸性的秘密报告已准备就绪。它是在迪安·艾奇逊的指导和国防部的参与下，由保罗·尼采主要负责起草的；它于 4 月 7 日提交给杜鲁门，并于 4 月 25 日星期二首次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白宫会议上与他一道讨论。正像早些时候的克利福德——埃尔西备忘录一样，它的意图也在于引起震动。代替克拉克·克利福德成为总统特别顾问的查利·墨菲还记得对他在报告的一个初期草案中所看到内容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他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来一遍又一遍地读它。

报告开篇就以一个富有启示性的主题震慑了读者：“这个共和国及其公民，以及他们的实力上的优势，正处于最严重的危险之中……”为了增强效果，这份报告称，美国巨人的实际军事力量正在令人悲哀地削弱。乔治·凯南所推行的“遏制”政策无异于一项没有“占优势的总体军事力量”——常

规部队——支撑的恐吓政策。核武器是不充分的，无论如何，苏联人将会在1954年达到核平衡的水平。

报告要求大规模地增强军事力量。这将对“我们的勇气和智力提出严重的挑战”，财政负担也会极其沉重。尽管报告中没有包括费用估算，但与杜鲁门一起讨论的数字是每年400至500亿美元，至少3倍于现在的军事预算。

杜鲁门在报告结尾的段落中读到：“全部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这个政府、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认识到：冷战事实上是一场维系着世界的生死存亡的真正的战争。”

这样，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警告说毁灭在召唤时，国务卿及其助手以及国防部却在说，缺乏大规模的军事发展、包括核武器，正在把生存置于危险的境地。

艾奇逊后来解释说，在起草这样的意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文件时，人们不能像写博士论文那样来处理。“分数的考虑必须要给陈述的简明让路，要精确、细微到直率、甚至几乎是残忍的地步，以便击中要害。”他承认，就NSC—68号文件这个特定的例子来说，其目的是要“对‘高层政府’的总的思想来一个当头棒喝”。

然而，杜鲁门却没有被当头棒喝所动。他的反应如同对克利福德—埃路西报告一样。他把它放在一边锁了起来。NSC—68号文件和《生活》杂志都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强调了美国军事实力的危险状况，但他却拒绝急于做决定，即便他没有对他们的主张提出质疑。他的处理方式基本上就是柏林危机时的方式，基本上就是面对麦卡锡时的处理方式——在他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前他不会采取激烈的行动。

他感到需要与美国人民再次接触，于是在5月份乘火车出发去做另一次“非政治性”的全国旅行，表面上是去参加华盛顿州的大古力坝的落成仪式。在两周的旅行中，在15个州中的50多次演说里，他从未提到过乔·麦卡锡或发出过加强武装的号召。相反，他似乎心平气和、红光满面，充满了乐观。他在演讲中说，冷战将要“和我们共处很长、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迅速的方式、没有轻而易举的方式来结束它。”不过，即便如此，在这段长时期中，也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形势没有在6月末发生灾难性的转折的话，他是否想要做任何像NSC—68号文件中要求的增强军事力量这类的事情，这是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不过，它看来似乎是不会做的。

在6月1日每星期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认为世界比过去5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达到真正和平的地步。

## 5

6月24日，星期六下午，中部标准时间大约1点45分，总统的银白色座机开始在密苏里农田的上空长距离地平稳地下降。杜鲁门计划回家和家人过一个周末，日程表上没有任何正式的安排，正如当天清晨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一个美妙的访问——我希望。我打算从巴尔的摩去看望贝丝、玛格丽特以及我的弟弟和妹妹，监督一些栅栏建筑——不是政治上的一一为那所农场房子订购一个新屋顶……”

他在布莱尔大厦开始了他那天的活动，按照惯例，先浏览了《邮报》、

《巴尔的摩太阳报》、《纽约时报》，当天早晨所有的报纸上都充满了正在蔓延的共产主义恐怖。加利福尼亚大学解雇了 157 名雇员，因为他们拒绝在一个反共的誓言上签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波士顿举行的年会中，已作出决议，驱逐其成员中的一切已确认的共产党员。在华盛顿，一位联邦法官驳回了宣布 3 名电影剧本作者无罪的上诉请求，他们都是所谓“好莱坞十君子”的成员，曾拒绝告诉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在《时代》周刊第一页的一幅照片中，一位名叫戴维·格林格拉斯的圆脸的前陆军中士正戴着手铐被从一所纽约的法庭中押送出来，他被指控是克劳斯·福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间谍网中的成员。在《时代》周刊的第 4 页上，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挪威的特赖戈夫·赖伊愤怒地答复一个记者关于他是否是、或曾否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问题。他大怒道：“上帝作证，对我的人格应该放尊重点儿。”

使杜鲁门感到鼓舞的一则消息是，希丁斯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宣布，在白宫几周的努力中，审阅了被参议员麦卡锡指控的 81 人“案件”的全部档案，结果均查无实据。

天气预报是杜鲁门从不放过的一个栏目，它报道说将有一个炎热和潮湿的天气，最高气温达 90 度（华氏）并且傍晚有短时的雷阵雨。

他的飞机“独立”号上午时分队国家机场起飞，在向西飞行之前，在巴尔的摩作了短暂的停留，在那里，杜鲁门出席了该市新建的友谊机场的落成仪式，发表了一个强调和平和建设性信任的 8 分钟的演讲（“如果我们没有对和平的未来怀有信念，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的航空贸易建设如此精美的一个设施……”）。在此后的大部分航程中，天边一直隐隐呈现出雷雨云砧。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狂风暴雨中，载着 58 名乘客的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密歇根湖上空坠毁，机上乘客在这场全国最严重的空难中全部丧生。不过，杜鲁门的旅程既平稳又顺利。2 点时，他降落在堪萨斯市，走下飞机的舷梯时，他显得精神饱满、一身轻松，在密苏里炎热的气候中甚至可以说是“逍遥自在”。

在独立城他的住房前，700 人的群众等在秘密保安部门新近安装的 5 英尺高的新铁栅栏旁。现在，栅栏门是开着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到杜鲁门家的草坪上。

当他走下汽车时，有人高声问道，他昨夜是否出席了伊格尔斯的集会。杜鲁门高兴地招着手，答道：“有很多地方我都想去，可却不能去。”然后就踏上了走道。

夏季炎热的下午静静地过去了，这座老房子的窗户大开，迎接吹来的微风。贝丝和玛格丽特参加一个婚礼去了。汽车在范霍恩街上往来，现在这条街已重新命名为杜鲁门路——该市的这个做法一点儿也没让杜鲁门高兴——不过，声音很微弱、柔和，与布莱尔大厦外的持续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忙里偷闲的隐居正是杜鲁门所需要的。自圣诞节以后他还没有回过家。

6 点 30 分，维塔·加尔来叫吃晚饭，杜鲁门和华莱士夫人坐在餐桌两端他们习惯的位置上。玛格丽特记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家庭晚宴”，之后，他们走出餐室来到一个新扩建的紧靠厨房、装有纱窗的走廊上，坐在那里聊天、“拉家常”，直到天黑；然后，大家又都回到了书房里。

9 点时，杜鲁门准备洗脸睡觉。这里的白天很长，独立城和华盛顿的时差是 2 个小时，因为西密苏里没有实行夏时制。

大约 9 点 20 分，大厅里的电话铃响了。迪安·艾奇逊从马里兰州他的乡间住宅打来电话。

“总统先生，”他说，“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消息告诉您。北朝鲜人侵入了南朝鲜。”

艾奇逊解释说，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交来了一份报告。北朝鲜人已越过了三八线，穆乔这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官在报告中把这描述为是一场严重的进攻，而不只是以前所发生的那类巡逻队的袭击。

艾奇逊已主动地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

杜鲁门说，他将立刻返回华盛顿（他后来写道：“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必须返回首都。”）。不过，艾奇逊建议他留下，没有必要冒夜航的危险，而且它还可能惊动全国。

艾奇逊说：“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已做了。如果你能睡的话，就放心地睡。”他知道更多的消息后，明天会打电话的。

据玛格丽特说，她父亲放下电话回屋后，一直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中，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她写道：“我父亲从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起，就清楚地表示：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这将是这个家庭的一个长长的夜晚。

星期天上午，又是一个密苏里盛夏的气氛，炎热而潮湿。

在独立城的 17 个教堂中，最先在 8 点钟响起了钟声的，是位于自由北大街上的那个红砖建筑的老天主教堂圣玛丽教堂；随后，是与杜鲁门住宅相距两个街区的第一长老会教堂里那清新的号角声，它演奏着赞美诗的音乐，直到 10 点 45 分；到这个时候，全城教堂的钟声开始进入了星期日祈祷钟声的高潮。

贝丝和玛格丽特不到 7 点便离家到三一主教派教堂去作祈祷。而杜鲁门此时已乘坐秘密保安人员的卧车前往格兰德维厄，他们都尽可能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离家前他曾指示：“干事要像平常一样。”

他在格兰德维厄滞留了大半个上午，和他弟弟维维安亲热地闲谈，仔细地观看了一个新的挤奶机，对一匹新买的马不住地赞叹，并且在前往看望玛丽·简之前与维维安的 5 个孙儿孙女一一握手。他对谁也没有谈到关于朝鲜的事情，即使有关入侵的报道已出现在早晨的头条新闻和广播中。

正午之前他到达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发现埃本·艾尔斯带着一份穆乔大使的电报副本正在等他，电文写道：“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的方式来看，显然它已构成了一场对大韩民国的全面的进犯。”

一大群记者和新闻摄影记者出现在大门前。艾尔斯离去时告诉他们，很自然，总统对此事非常关注。

艾奇逊大约 12 点半再次打来电话时，贝丝和玛格丽特刚刚从教堂回来。

爸爸接了电话（玛格丽特在日记中写道），几分钟后他就去整理行装，并且告诉我给堪萨斯市打电话，让埃本·艾尔斯通知所有与他一道出来的人，就说他将在 2 点到 2 点 15 分之间到达机场。

离开堪萨斯市是如此迅速和突然，以至杜鲁门自己班子中的一些成员和坐包机来的白宫记者都被落下了。当《独立》号起飞时，贝丝、玛格丽特和维维安都默默地站在那里送行，贝丝的表情很像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

那天夜晚的表情。

当天晚上在家中，玛格丽特写道：“一切都极其紧张。北朝鲜或共产党朝鲜正在跨入南朝鲜，我们准备战斗。”显然，从她所见到和听到的当中，她完全不难猜到她父亲的想法。

当晚，6月25日，星期天，7点15分，《独立》号降落在国家机场。迪安·艾奇逊、路易斯·约翰逊以及预算局长詹姆斯·韦布正等在停机坪上，杜鲁门走出机舱时显得很严肃、很烦恼。他对拥挤在那里不断拍照的记者们说：“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要做。”

韦布后来回忆，杜鲁门在他们向市内疾驶的汽车中说：“上帝作证，我要让他们吃些苦头。”而坐在杜鲁门前面的折叠座位上的路易斯·约翰逊，则转过身来去和他握手。

在从密苏里返航的飞机上，杜鲁门已通过无线电通知艾奇逊在布莱尔大厦召集一个紧急会议，7点30分开始，连带吃晚餐。杜鲁门后来写道，在飞机上独处的时间为他提供了一个冥思苦想的机会。在他那一代人的时期里，这已不是第一次强国攻击弱国了。他想到了满洲里和埃塞俄比亚。

我记得每一次民主国家是如何地不采取行动，以致鼓励了侵略者继续前进……如果允许共产党人以武力进犯大韩民国而不受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一个小国会有勇气去抵抗强大的共产党邻国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允许这种行为不受到挑战，那么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完全就像是曾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同样的事件。

北朝鲜的进攻是一个完全令人震惊的消息。尽管沿三八线一直有事，而且朝鲜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麻烦地区，但这只是全世界无数的麻烦地区中的一个，从未在任何人心目中引起高度重视。最后一支美军已于最近撤离南朝鲜。在1月份全国新闻俱乐部上的一次即席讲话中，艾奇逊在描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利益的范围时，甚至都没有提到朝鲜（后来有关因这次讲话而鼓励了共产党对南朝鲜进攻的指责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就在6月份在国会作证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还说，他看不出在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确，在当时众多的不确定性中，是否入侵南朝鲜只是一个模糊的、初步的印象，比较而言，更可能的进攻是在其他地区，也许在南斯拉夫，或在台湾、或在伊朗。

杜鲁门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已获悉，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下午举行了会议，通过了一个美国提出的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北朝鲜将军队撤至三八线。投票的结果是9比0。苏联没有参加投票——苏联没有否决——是因为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在当年早些时候已离开了安理会，当时安理会拒绝剥夺国民党中国的席位，而现在他尚未返回。

除了总统、艾奇逊、约翰逊和韦布外，聚集在布莱尔大厦的与会者还包括另外10人：来自国务院的3人有迪安·腊斯克、菲利普·杰塞普和约翰·希克森；三军的部长，取代肯尼思·罗亚尔任陆军部长的小弗兰克·佩斯、海军部长弗兰西斯·P·马修斯以及空军部长托马斯·K·芬勒特；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以及3位参谋长，劳顿·科林斯将军、海军上将福雷斯特·谢尔曼、空军上将霍伊特·范登堡。《纽约时报》报道说，这14个人到达时，“一种紧张的、战时以来从未有过的气氛笼罩着首都”。



杜鲁门给贝丝打电话告知自己已安全到达，然后下楼来，与大家一起在花园中喝饮料。他要求晚宴结束、布莱尔大厦的服务人员撤离后再开始讨论危机问题。8点刚过，阿朗索·菲尔兹宣布晚宴开始。他们坐在餐室中一张长长的红木餐桌前用餐，通向花园的门都开着，以便温柔的晚风吹进来，由于某种原因，这顿仓促准备的饭菜——炸鸡、炸土豆条、芦笋、热饼、香草冰激凌加巧克力酱——被认为是特别出色和招待周到的，用艾奇逊的话来说，“棒极了”。

随着餐桌被清理后，它就变成了一张会议桌，会议便开始了，艾奇逊先做了一个“阴暗的报告”，之后，杜鲁门要求每一个人发表看法。

腊斯克说，美国占领南朝鲜已有5年，因此对南朝鲜负有特殊的责任，如果它被共产党人兼并，就会成为“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利剑”。布莱德雷刚刚与路易斯·约翰逊一道从日本返回，感到非常累，似乎都撑不过那个晚上似的，他说，“我们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线”，朝鲜是能与任何地区相比的一个好地方。（几个月后，艾奇逊将会说，如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进行“这场该死的战争”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的话，那么他们一致的选择将会是朝鲜。）布莱德雷认为，俄国并没有准备打仗，只是在“试探我们”。

没有不同意见的反应，也没有任何人表示出丝毫的怀疑：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由莫斯科导演的。而当时，这也是这个国家和新闻界风行的看法。根据报纸上的新闻简报的说法，是“俄国人支持的”北朝鲜军队发动了这场入侵。正如布莱德雷所写：“潜藏在这些讨论下面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义愤，甚至比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变时我们所感受到的还要强烈。”

会议桌前的每一个人的基本一致的态度很快就变得十分清楚了，而杜鲁门本人的明显的决心更激励了与会的每一个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与会者后来说：“他以他那领袖的姿态，使所有的与会者都振奋起来。”杜鲁门重复了布莱德雷的用语，同意必须“最有力地”划出这条线，北朝鲜必须被阻止住。他说，俄国人正试图自己不出面而得到朝鲜，他们赌的是美国会害怕引起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不进行抵抗。

他后来写道：“我认为我们仍就占有优势，尽管很难说出这种优势究竟有多大。”

海军上将谢尔曼和空军上将范登堡认为，海军力量和空中掩护相结合，可以为完成这项任务提供充分的保证。布莱德雷和科林斯将军不同意，他们反对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承担任何义务，至少在当时是如此。

苏联军队积极干预的可能性问题是杜鲁门非常关注的。尽管没有一个人似乎认为俄国人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但是谁又能说得准呢。杜鲁门询问了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的情况，并要求立即提供一份有关苏联人在世界各地“可能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的情报。

后来在回忆当晚的情况时，杜鲁门写道，使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完全地、几乎是默契地接受了这种看法，即为了对付这场侵略，一切不得不去做的事情都是应该去做的。没有任何人提出建议，说是联合国或美国应该逐渐撤退”。

杜鲁门下决心后，主持会议的艾奇逊提出了杜鲁门所作的决定。麦克阿瑟将军应尽快地给南朝鲜送去武器和装备。在朝鲜的美国平民将在美国空中力量的掩护下撤离。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出发，前去保卫台湾海峡，以防止共

产党中国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或如艾奇逊所说，台湾对共产党中国的进攻。

会议即将结束时，约翰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及时想起来的重要意见。鉴于他刚刚在日本和麦克阿瑟呆在一起，他认为给这位将军的任何命令都必须详细，这一点非常重要，“以便不给他太多的自由处置权”。

在与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的交谈中，杜鲁门说，他刚才做出的决定也是给联合国的。杜鲁门，他曾全心全意地相信国联，可国联却失败了。联合国绝不能失败。“它是我们的理想，在这第一次大考验中，我们绝不能让它失败”。

将近 11 点时会议才散，当与会者为了避开记者从后门离开时，杜鲁门说，在他发表声明之前，任何人不得发表任何声明。

有人会说，哈里·杜鲁门不与国会和美国人民商量就匆忙地做出决定，“就像赫尔曼·戈林一听到有教养的话就去拔枪一样，哈里·杜鲁门一听到有问题的消息就做出一个决定”。然而，杜鲁门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朝鲜或其他任何地方打一场战争，尽管他对这场进攻感到非常愤怒，尽管他显然决心要做他认为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到目前为止，他并未采取任何无法挽回的行动。

星期一，当来自朝鲜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时，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仅仅是原则性的声明。普遍的印象是美国打算采取很少或根本不采取行动。据来自麦克阿瑟的最新情报，南朝鲜人显然没有能力阻止北朝鲜人的进展：“我们的估计是，一场彻底的崩溃即将来临。”

当晚独自吃过晚饭后，杜鲁门召集了另一次紧急会议、在布莱尔大厦的第二次“战时内阁”会议，并且决定向南朝鲜军队提供美国空军和海军支援，同时敦促联合国提供支援。

他说，不应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又补充说“还不要”。

此外，他命令增加在菲律宾的美国部队，并加速向印度支那提供军事援助。

不过，尚无地面部队派往朝鲜，在会上也没有任何人建议这样做。布莱德雷将军记得是艾奇逊“主持”会议，就像昨天晚上那样。布莱德雷，正如他后来所写，对在亚洲进行一场地面战争的可能性表示严重的关注。不论派什么部队去，麦克阿瑟都肯定会要求派更多的部队。此外，“我们还没有在朝鲜的作战计划”。布莱德雷建议他们“等几天”。艾奇逊同意了。

杜鲁门明确地说：“我不想进入战争。”这话他们都忘不了。

当会议结束时他悲哀地说：“过去 5 年来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避免做出今天晚上我不得不做出的这种决定。”

第二天，6 月 27 日星期二，报纸头条新闻报道，北朝鲜的坦克一路横扫、进入南朝鲜首都汉城。南朝鲜政府已逃离这座城市，它的总统李承晚痛苦地称美国的帮助“太少、太晚”了。在来自北朝鲜首都平壤的一则广播中称，共产党首相金日成发誓要尽速地“打垮”南朝鲜。

在白宫，形势发展得很快，国会领袖、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头头们乘坐的官方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向西配楼，一共来了 40 多人。11 点 30 分时，内阁会议室的门关闭了，半小时后会议结束。国会领袖们给予了总统一致的支持。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反对他已做出的决定的话。此外，他还被建议可以继续单独根据总统的权力行事，而不必为请求国会通过一项战争决议而烦恼。100 多名记者焦急地等待在会议室外的大厅

中，几分钟后，查利·罗斯刮起了一场“旋风”，交给了他们来自杜鲁门的第一个命令：他已下令美国空军和海军部队去支援处于危急中的南朝鲜：

“对朝鲜的进攻毫无疑问地清楚显示出，共产主义已越过了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的范围，如今要运用武装入侵和战争手段了……”

当这项声明被大声朗读时，众院和参院爆发出了欢呼声。众院以 315 票比 4 票的表决结果，迅速通过了一项将征兵法延长一年的决议案。在参院，共和党人威廉·诺兰要求所有的美国人，不论其党派归属，都应给总统以“压倒之势的支持”。

在联合国，开始就一项支持美国决定的决议案进行辩论当晚 10 点 45 分该决议被采纳，苏联代表仍然缺席。一个世界性组织投票决定使用武装力量来制止武装力量，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

美国人民的反应——通过信件、电报、打到白宫和国会的电话——新闻界的反应，那些其观点在华盛顿和在这个国家中都很有影响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立即地、毫不含糊地支持——这一点很快便被遗忘了。各报社论赞扬杜鲁门的“大胆方针”，以及他的“重大而勇敢的行动”。

尽管总统得到了周全而又忠诚的建议（约瑟夫·扣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写道），但人们不能不钦佩那标志着他本人处理重大危机的朴实的勇气和朴素的常识的合成气质。的确，这是杜鲁门似乎可以集美国的优秀东西之大成的一次机会。

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讲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华盛顿邮报》说，杜鲁门给了自由世界以它极度渴望的领导。

这是召唤坚定的勇敢者的时代，是召唤密切注视这个星球的人的时代，是召唤一位能在我们与那些要使世界陷入黑暗的人的搏斗中保持我们目标纯洁的新生的刚毅者的时代。时机已经在哈里·杜鲁门的身上找到了这个人。

《华尔街日报》、沃尔特·李普曼、托马斯·E·杜威、乔治·凯南、艾森豪威尔将军，所有这些都同意：是到了划线的时候了。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一种坚定的立场，我们不久就会有一打的朝鲜。”亨利·摩根索、小富兰克林·罗斯福、菲尔·默里、沃尔特·鲁瑟和萨姆·戈尔德温都发来电报赞扬杜鲁门的决定。科德尔·霍尔则打来了电话。

白宫接到的信件都强烈地赞成总统的行动。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人写道：“你也许是像某些人所说的一个狂饮威士忌的酒鬼，一个贪婪地玩扑克的老贪玩鬼，不过，去他们的吧，自老特迪（指西奥多·罗斯福——译注）1909年3月离开那儿（指白宫——译注）以来，美国第一次在白宫中有了一位来自基层的美国人。”

甚至塔夫脱和亨利·华莱士也表示了他们的支持，尽管塔夫脱敦促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话。英国大使奥立弗·弗兰克斯向他的政府报告说，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舆论都支持总统。首都的整个气氛突然地、戏剧性地改变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哈希写道：“我已在华盛顿内外居住和工作了 20 年，但是此前我从未感受过这样一种欣慰感和贯穿于这座城市的团结

感。”

星期三上午，杜鲁门出席了预备役军官协会的一次会议，面对五月花饭店的 1000 名与会者，他受到了经久不息的凯旋式的欢迎。

星期四，6 月 29 日，在危机开始以来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强调说：“我们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中。”他的话能引述吗？“当然，”杜鲁门说，“我们没有处于交战状态中。”

一位记者问道，把这称作是联合国授权下的一次警察行动，是否正确？杜鲁门答道：“是的。这的确就是这样一场行动。”

后来这被称作是他记者招待会上的又一次失误——他允许一位记者教他怎样讲话。然而，这并没有错。“联合国授权下的一次警察行动”准确地表达了他所希望的这场行动应被看成的性质。问题在于没有任何人看透其中的原因，却反过来指责他。

6 月 30 日星期五，华盛顿时间凌晨 3 点钟，即在华盛顿的深夜时，五角大楼还收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另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以他首次亲临朝鲜视察形势为基础。报告称：“守住当前战线的唯一保证和夺回最近失去的阵地的能力在于依靠把美国的战斗部队投入朝鲜战场。”任何仅用空中和海上力量来遏制北朝鲜推进的进一步企图都是在浪费时间。现阶段的形势如此之惨，甚至美国全力努力——陆、海、空军——都可能会“注定失败”。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一个毫不迟疑的明确的决定是迫在眉睫的。”

当弗兰克·佩斯打电话到布莱尔大厦时，外面天还没亮，杜鲁门已经起床并刮了胡子。他于凌晨 4 点 47 分在床边接了电话，佩斯重述了那份不祥的报告的内容。麦克阿瑟要求派两个师的地面部队。

杜鲁门毫不犹豫。这是 he 已准备了多日的时刻，他立即做出了决定。

后来他说，把美国部队投入朝鲜的战斗是他总统任期中最困难的一项决定，甚至比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还困难。他不想开始另一次世界大战，在最关键的那个星期里，人们不止一次听到他私下讲过这话。6 月 30 日，星期五这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小心，不要导致一场普遍的亚洲战争。”他想知道毛泽东会做些什么？俄国人的下一个行动会来自何方？

多年后，艾奇逊评论说：“既然作为总统，你的职责就是做决定。杜鲁门先生做出了决定。”

后来，——许多年以后——艾奇逊又公布了一封他收到的总统短信，正如艾奇逊所言，这封信很好地说明了他“用不可动摇的信仰将他的副手们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人品。信是用普通手写体写的：

给迪安·艾奇逊的备忘录

关于 6 月 24 和 25 日——

星期六晚间，你立即主动地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并通知了我，这对后来事情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假如你没有在这个方向上立即行动，我们将会独自地进入朝鲜。

星期日晚间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会议是星期六晚上我们行动的结果，后来的结果显示，你是一位伟大的国务卿和外交家。

你对形势的处理一直是超等的。

我寄给你这个说明供你留作记录。

哈里·S·杜鲁门

1950年11月7日

## 十六、总司令

哈里·杜鲁门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乔治·埃尔西

### 1

在国家最终介入战争后的5年里，总统办公室的面貌依然如故，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即在1945年杜鲁门办公桌对面壁炉台上方挂着的那幅照着月光的具有情节剧风格的雷明顿所作名为“袭击”的画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乔治·华盛顿威严的全身画像。画像下面的壁炉前，立着杜鲁门的一个硕大的办公室地球仪，那是艾森豪威尔将军送给他的礼物。

这样现在从他的办公桌抬头望去，杜鲁门一眼就能看见两件东西。一件是那位身着戎装威风凛凛的开国第一位总司令；另一件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整个世界的主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世界和全球战争的威胁；世界和不能再重复过去错误的迫切需要；世界和杜鲁门。

杜鲁门对一个记者说过一旦要做决定，他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但是，对于这个“朝鲜事件”，他不得不忧虑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绥靖只会引起进一步侵略并最终导致战争。”他在7月19日晚发表的一次历史性的电视广播讲话中这样说。当时，他仍然不愿意把在朝鲜发生的事情称为一场战争，而说成是共产党领导人发起的一次“侵略行动”。

那幅华盛顿肖像出自伦布兰特·皮尔之手，是从国家美术馆借来的。那个将近齐胸高的地球仪装在用锃亮的红木制成的沉重的三腿支架上，是艾森豪威尔任欧洲盟军总司令时使用的。室内的新摆设是由杜鲁门亲自挑选的，他对屋里每样东西的意识很敏锐，他喜欢它们全部一点不错。有一次查利·罗斯从桌上拿起杜鲁门的约会台历查点事情，然后把它放下时摆得稍微歪了一点，杜鲁门一边说着话，一边立即把台历按原来的位置重新摆正。

大地球仪使室内有壁炉的那一端、也即椭圆型办公室的北拱尤其增添了它以前未曾有过的影响力和重要性。现在摄影师们让总统摆姿势时，特别是拍摄他与众将军的合影时，都喜欢他站在那个地方。他会被要求把右手放在地球仪上，似乎正在解说着什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姿势，因为平时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或内阁成员、国会议员或他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讨论时，杜鲁门总是经常走到地球仪前去证明论点。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托比曾经问过总统：“哈里，你难道有时不觉得被你的工作所压倒吗？”杜鲁门走到地球仪旁，慢慢地转动着它说：“全世界都把目光集中在这间办公室。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做些事情来保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找到一条实现和平的途径，否则，人类文明就将被毁灭，世界将倒退至公元900年。”

现在，在朝鲜危机的最初几周里，他常用手指在欧洲或中东——易北河或伊朗——苏联边界——的一些地点上指指点点，然后转动地球仪，指向朝鲜半岛那块灰白色地区，这个地方位于日本海和黄海之间，大多数美国人这时都还很难在地图上找到它。

“这是远东的希腊，”杜鲁门总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次了。”

整个朝鲜半岛，从北至南的面积几乎相当于希腊的面积的一倍半，合计

约 8.4 万平方英里。从北朝鲜与满洲接壤的鸭绿江起至半岛最南端的距离长约 600 英里，宽约 125—200 英里不等。

大韩民国——在三八线这条专横的分界线以下的一切——面积略大于印第安纳州，人口约 2000 万，是北朝鲜的两倍。它的经济以农业为主，而朝鲜的大部分工业都在北方。

无论在朝鲜的历史、地理或任何其他方面，三八线这条分界线都没有任何依据可查，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周仓促确定的，作为促进日本军队投降的一项临时措施。该线以北为苏联人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迪安·腊斯克上校和另一位名叫查尔斯·博尼斯蒂尔的年轻军官一天深夜在五角大楼作出的。他们之所以挑选了这条北纬 38 度线，是因为它具有在当时大多数朝鲜地图上都标有这条线的有利条件。

从南朝鲜沦陷的首都汉城至半岛东南端的最大港口釜山有一条主要公路和一条铁路，长 275 英里，现在已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段路，因为关于北朝鲜“人民军”（NKPA）正沿着这条线路挺进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1950 年 7 月在朝鲜和华盛顿都已成为一个沮丧的时刻。新闻报道不再把杜鲁门描写成“潇洒”“快活”之人，而是显得精疲力竭，似乎“拖着疲倦者的沉重步伐在行走”。一个星期天，杜鲁门乘“威廉斯堡”号游艇沿波托马克河而下，进行少有的一次郊游。在与工作人员共进午餐后，他说声“请原谅”就走开了，下午其余的时间都在睡觉。

杜鲁门已不再把记者招待会安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举行，而把它改在路对面老国务院大楼里那间装饰华丽的、发霉的印第安条约厅里，这里可为不断扩大的新闻记者团提供更多的空间（他对记者们把墨水从自来水笔中甩到他办公室地毯上的做法也感到厌烦）。他对前景的看法是记者反复提到的问题，对此他总是说他“当然”感到有希望。可是记者们从每日公报中得知，来自朝鲜的消息几乎全是糟透了，杜鲁门心里则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因为奥马尔·布莱德雷每天早晨都要向他简要通报情况。

布莱德雷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将领之一，不是一位爱炫耀自己的人。这位生长在密苏里州的莫伯利人，举止朴实无华，人缘很好，他是杜鲁门一类的人，有常人难以理解的钢铁意志。他的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称他有“敏锐有序的头脑”。朝鲜危机之前，布莱德雷只是问或来总统这里汇报。现在他却每天早晨准 9 点半来到椭圆型办公室，摊开他的朝鲜地图，操着密苏里教师的干巴奇特的高嗓音，开始报告严峻的形势。

美国陆军和残存的韩国军队正在被迅速粉碎。美国第一批陆军第 24 步兵师的 2 个半连共 256 人曾在汉城以南投入战斗，7 月 5 日在乌山附近停住进行英勇抵抗，随后便一直后退，边撤边进行殊死战斗，以免被彻底击溃。这支部队是从日本空运过来的，还未进行充分的准备就仓促投入战斗。他们许多人都是新征入伍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由于在日本时是担任驻防任务，他们几乎全都吃不了苦，而且与他们的韩国盟军一样装备不良，而他们面对的却是纪律严明、装备着俄制 T—34 重型坦克快速推进的大批敌人。如报纸评论的那样，它完全使人悲惨地联想起 1940 年纳粹德国在法国发动的那场闪电战。“其进攻规模和随后的推进速度，”杜鲁门对全国说，“十分明显地说明，这是一直都在策划着的阴谋。”

7 月 6 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副总统巴克利问有多少北朝鲜军人投入了战斗行动，布莱德雷回答说有 9 万人，而美军只有 1 万

人，南朝鲜军队有 2.5 万人。

在战斗中，美军和韩国军队的人数经常只相当于对方的 1/3 或 1/10，在有些地方甚至是 1/20。他们没有坦克、大炮，或者任何能够减缓俄制坦克前进速度的武器（此前，美国确实执行了使南朝鲜军队装备不足的政策，为的是不想鼓励南朝鲜对北方的侵略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反坦克火箭炮打俄国坦克时就像石子在装甲上弹跳一般。马修·李奇微后来评论说，那就像少数童子军部队挥舞手动武器企图阻挡一支德国装甲部队那样。

军队冒着倾盆大雨及气温经常在华氏 100 度以上的折磨人的暑热边战边撤。此时正值朝鲜季风雨季的 7 月，武器生锈，衣服发霉。再加上交通设施损坏，土路已被成千上万逃难的难民踩得稀烂，那种混乱场面使人不知所措。美军完全不熟悉那里的地形，对朝鲜人民和朝鲜语言也一无所知。他们边战边退，再战再退，几乎顾不上睡觉和吃饭。在炎热的暑气下，因饮用水不足，士兵只好喝以人粪尿为肥料的稻田旁的排水沟里的水，结果是剧烈的痢疾在队伍中迅速传染开来。“伙计们个个汗流浹背，裤衩上沾上了屎也顾不上换，像傻瓜一样挪动着。”一个美国步兵回忆说。“我才意识到我们准备去找另一个小山头时就遭到了袭击，再找另一个山头，又遭到袭击，就这样一直没完没了。”伤亡率高达 30%。“这真是一个死亡之地啊。”报纸上引用一个年轻士兵的话说。一些美国人急忙逃走了，成了“逃窜热”的牺牲品。

7 月中旬的一天早晨，布莱德雷把他的地图支撑在总统办公桌前的一个画架上，开始进述局势。他指出地图上的各个部队，标出美军和韩国军队穿越半岛的阵线的长度并谈到逐步撤退的必要性。他指出：希望在于继续采取拖延行动即一种最困难的军事策略，一直后退到东南角并在那里建立起一条缩短了防线的为止。

美军和韩国军队从乌山退至锦江，然后又退至临时首都大田，并于 7 月 19 日（华盛顿时间 7 月 18 日）在那里与敌军展开一场激烈的逐屋巷战。全城一片火海，第 24 师师长威廉·F·迪安将军失踪了，有人报告说最后看见他时，他正力图用 0.45 口径的军用左轮手枪阻止一辆敌人的坦克。

各种出版报道把敌军的自杀性攻击描写为北朝鲜人的“波涛”，一场“红色浪潮”。《华盛顿邮报》引用一个美国士兵的话说：“我们每打死 10 个人，另外 10 个人又冲到山头上来替换他们。”一天早晨在布莱尔大厦吃早饭前，杜鲁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看见 7 个被杀的美国士兵，他们都是北朝鲜人的俘虏。他们被发现躺在路旁，双手捆在背后，子弹从脸上穿过。

“这决非正统的战争。”《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这样写道，她是到那时为止去采访战争的唯一女性。

“掉队的还在进来，他们是小批的筋疲力尽的人。”《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在大田战役之后几天这样报道：

理智和求生的欲望使他们穿过敌人的阵线，走过山间小路，通过狙击手出没的村庄，来到安扎在雨水浸透了的河床上的营地。

一批 200 多人的队伍走出来了，他们在星期四大田战役之后被迫退入丘陵地区。他们在拐弯抹角的山间小路上行走了 50 英里，穿过敌对的村庄，在今日（7 月 22 日）拂晓才抵达安全地区。

另一批 25 人，在一名中校的带领下，也于上午稍后时抵达这里。他们在开始时有 80 名身强力壮者，但只有这一个撮人自始至终



获得成功，其余的人因疲惫不堪而沿路掉队了。

部队继续撤退，经过小白山脉陡峭的一道道关口来到洛东江后面高地的又一道防线。经过 17 天残酷的战斗，美军和韩国军队后退了 70 英里。

这次溃退在许多方面是美国军事历史上最灰暗的篇章之一。但此时已担任联合国军总指挥的麦克阿瑟，正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对策，即从釜山港调运进大批人员和物资的时间，而奇迹是没让北朝鲜人径直横行于南朝鲜。尽管美国和韩国部队吃苦受辱，命运对他们很严酷，他们还是做了该做的事，几乎是创造奇迹般似的。杜鲁门说，他们已经阻止了崩溃之势。他恰当地把此举称作记录在案的最英勇的后卫战斗之一。

7 月 29 日，联合国军地面战术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下达“不坚守毋宁死”的命令。沃克称，不能再后退半步，釜山决不能失守。“不许再有敦刻尔克，不许再有巴丹。”在获得增援之前，如有必要，每个人必须战斗到底。

这番话无疑是讲给国内人听的，对部队来讲则是多余的。他们没有想到过另一个敦刻尔克或巴丹的前景。“我从来不喜欢逃跑。”一位来自费城的二等兵对玛格丽特·希金斯说。

在 6 月那决定命运的最后一周里，杜鲁门采取的重要的但不甚引人注意的首要步骤之一是把一直在欧洲当某种巡回大使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召回，任命他为特别助理，来协助处理有关战争的紧急问题。而哈里曼担当新任后采取的第一批步骤之一则是迫使总统感到有必要为自己在朝鲜的所作所为获得国会的支持。他敦促总统乘全国还在支持他的时候，尽快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战争决议案。然而，迪安·艾奇逊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坚持认为这样一项决议案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艾奇逊说，总统应该信赖宪法赋予他的作为统帅的权威。诚然国会通过议案本身没有什么害处，但艾奇逊认为，做到这一点的进程却可能有很大的害处。当大家都在担心朝鲜情况如何的时候，这个时机选得不对。

杜鲁门站到了艾奇逊一边，他进一步对哈里曼说，现在呼吁国会的做法，会使今后的总统在应付紧急情况时感到更加困难。

后来，当罗伯特·塔夫脱和其他人开始批评总统时（哈里曼回忆道），我确信总统已犯了一个错误。然而，这个决定却反映了杜鲁门总统的特点。他总是留意自己的行为对今后总统的权威会产生何种影响。

在 7 月的第一周，麦克阿瑟要求派给 3 万名美国地面部队以使他的第 8 集团军的 4 个师达到满员。仅过了几天，到了 7 月 9 日，局势变得十分严峻，麦克阿瑟又提出将他的部队数量翻一番。他在一份使华盛顿大吃一惊的电报中说，紧急需要再为他调来 4 个师。

当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危险的情况下，美国还能在朝鲜再投入多少呢？布莱德雷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继续认为在朝鲜发生的事很可能是克里姆林宫一个更大战略中的一次佯攻。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杜鲁门说，只是在别处需要“用兵来对付的情况下”，他才会“放弃”朝鲜。

严峻的现实是陆军只有 10 个师的兵力，在西欧仅部署了 1 个师。按照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的一次讲话称，盟军在西欧的总兵力为 12 个师，面对的

却是苏联 80 个师的威胁。北约的盟友都极度担心，生怕美国在遥远的朝鲜介入过深。

几年来，政府一直把削减国防开支作为平衡国家预算的一种手段，但这样做的代价是重大的。对五角大楼实行“减肥”政策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一致竭力要求的，对此公众也表示普遍赞同，而且不久前路易斯·约翰逊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但是，最终责任应由总统来负，这是总统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痛苦地了解到，大量的骨头与肌肉和“脂肪”一起砍掉了。正如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这样的政策评论家一直说的，尽管对其核优势自吹自擂，国家对战争却毫无准备。

现在在这些“屠杀和令人痛心的几周内”，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并产生巨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结果。

杜鲁门本人已经发生变化。自从共产党入侵南朝鲜以来，总统关于和平的梦想被彻底粉碎了，白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谈论起总统失望时的“揪心的痛苦”。他每天要工作 18 小时，显得非常紧张。他女儿玛格丽特写到了他父亲在美军溃退时的极度痛苦。朝鲜问题“无时无刻”不压在他的心头。

与此同时，从 7 月 8 日开始，杜鲁门花三周时间在沃尔特·里德医院连续诊治 12 次，进行了广泛的牙科治疗，安上两个齿桥，镶上 4 个单个的齿冠并重新补了一颗牙。根据有关的记录，在所有这些治疗过程中，仅有一次在镶其中的一个齿冠时，他打了麻药。他为什么恰恰在那时候要使自己忍受如此的折磨，至今还是令人不懈，除非这是为了全面保护他的健康，因预料到战争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每一次当杜鲁门与他的军事顾问开会的风声传出，布莱尔大厦外面便会聚集起大群严肃的“具有战争意识”的人。许多美国人，可能是多数人，最初都以为朝鲜冲突真不过是一次“警察行动”，一个只是灌木林火式的事件，只要美国军队一到达，就会迅速被压制住。因此，数不尽的信件和电报源源涌入了华盛顿，涌向白宫和国会，对政府处理事情的方式大声表示反对。其中一封说：“好像沃恩将军正在操纵朝鲜的局势。”另一封信说：“我们是否正在受到国务院的阴谋破坏？”那些写给杜鲁门的信和电报中，反对战争的一度达到了 20 比 1：

我不知道这几天晚上您睡觉是否睡得好？在我们可爱祖国的各地有多少母亲和父亲正在度过许多不眠之夜，他们再次担忧他们被送出去在外国土地上打仗的孩子，这些战争与我们毫不相干……

我们要求您停止屠杀美国孩子和朝鲜人民……

以上帝的名义，看看您在干些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创伤血迹未干……我们与朝鲜毫不相干，这些人能够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

让他们现在尝一尝原子弹吧……

我是一位士兵的母亲，我儿子正在朝鲜服役。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的意思是一个良好的美国人。我爱这个国家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想让我的儿子回家。他是我唯一的孩子，非常年轻。总统先生，请您同意吧，我恳求您……

您过去干过一次，住克里姆林宫扔上一个（原子弹）就都了结了……

在参议院，塔夫脱要求迪安·艾奇逊辞职。欧文·布鲁斯特要求授予麦克阿瑟“自行”使用原子弹的“权力”。报纸上刊登了两组照片，一组是春季照的，总统兴高采烈，信心十足；另一组是夏季照的，总统愁眉苦脸，满脸皱纹。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他过去常见的含笑的脸不见了。”艾尔索普兄弟写道，“总统欣快的信念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终于也消失了。”

对艾尔索普兄弟和其他早已叹惜美国军事实力衰落的人来说，现在可以讲：“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了。”路易斯·约翰逊在五角大楼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快他妈的够算叛国了”。约瑟夫·艾尔索普后来私下说道。杜鲁门过去最好也就算天真了。然而随着朝鲜危机的爆发，杜鲁门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转变”。

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变开始于7月14日星期五召开的一次内阁会议。如同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的多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一样，这一次也是艾奇逊首先拿出一项提案，要求立即扩充所有军种和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杜鲁门同意了。从这以后就不再有任何退却，他一辈子没有，所有那些桌子边上的人一辈子没有（退却）。

7月19日星期三，杜鲁门先是在一份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随后又在对全国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对朝鲜的进攻要求美国投入更多的兵力、武器装备和物资。除此之外，“世界局势”的现实需要美国保持更强的军事力量。他要求提供10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最后提出的款数为116亿美元，几乎和当年财政年度原来计划的全部13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差不多。他还宣布要加速征兵并征召某些国民警卫队。

“朝鲜是个小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那里发生的事情对每一个美国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面对电视摄影灼热灯光的照射，脸上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在他脚下电线与电缆缠结成一团，他对全国这样说。由于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我重复一遍，这是赤裸裸的侵略”，北朝鲜人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虽然美国军队正在作出主要的努力去解救大韩民国，但他们是在一个联合国司令部的指挥下并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行战斗的，这是人类长期寻求国家之间法制化的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作为打仗的号召这并不特别鼓舞人心。而且他一次也没有用过“战争”这个字眼来形容在朝鲜发生的事情。但那时也没有人对他的诚心表示过怀疑，而他对全国提出的要求也毫不闪烁其词。这项“任务”是长期的和困难的，这意味着要增加税收和在必要时实行配给制以及“今后的艰苦时日”。

很可能时间长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那些刺耳的警告和嘱咐会造成这样的政策转变，但是朝鲜发生的事情使这些都已成为不过是烦琐哲学罢了。杜鲁门对加强军事实力的承诺已不再是纸上谈兵。在夏末的另一次电视演讲中，他宣布了把军队扩展一倍到将近300万人的计划，声称这些费用和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国需要承受的负担的一部分。

国会通过了这笔拨款，同意1950—1951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为482亿美元，接着1951—1952财政年度的为600亿美元。

在7月最后一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杜鲁门是否考虑过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他说没有。问他是否计划不久在随便什么时候离开华盛顿？他也予以否认，他将坚守岗位。

杜鲁门对他的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极为恼火，也很不喜欢或欣赏其

远东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总统的参谋人员对此都一清二楚，这也是越来越让五角大楼担心的一个原因。布莱德雷将军后来评论说：“如果他（总统）在一开战就解了这两个人的职，他就会省掉许多烦恼。”约翰逊开始表现出“一种想操纵整个政府的过度自私自利的欲望”。杜鲁门后来记载道：“此人得罪了内阁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从不错过机会说一些关于我身边工作人员的坏话。”杜鲁门推测，他的国防部长患有一种“病态心理”。

当杜鲁门从艾夫里尔·哈里曼那里获悉，约翰逊在电话里，而且在哈里曼面前，为塔夫脱对艾奇逊的攻击而吹捧塔夫脱（接着又向哈里曼许诺：一旦艾奇逊被搞下台，他就将竭尽全力让哈里曼当国务卿）时，约翰逊实际上便完蛋了。根据埃本·艾尔斯的日记，大家知道7月3日总统向查利·罗斯吐露了哈里曼的话。第二天早晨，7月4日，杜鲁门带着女儿玛格丽特乘车前往弗吉尼亚州的利斯伯格，诡称对马歇尔将军进行一次假日叙谈。马歇尔自从恢复健康后已经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负责人。”那天上午真是有趣极了。”这是杜鲁门在他自己的日记中所写的一切。

然而由于当时朝鲜的局势如此恶化，在这时辞退约翰逊，羞辱这个曾经为了在五角大楼执行杜鲁门本人的政策而极其受人注意的人并不是在杜鲁门喜欢的一种做法。所以几周过去了，路易斯·约翰逊还是留在他的职位上。

至于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私下看法似乎与1945年时没有什么不同，当时麦克阿瑟名声大噪，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把这位将军描写为“自负先生，高级将领”，一个“戏剧演员和骗子”。埃本·艾尔斯写道，总统对麦克阿瑟“很不赏识也不怎么尊敬”，称他为“极度的自我主义者”，自以为“有点像上帝”。但是，与自己不一定喜欢或钦佩的人一道工作是生活中难免的，对政治家的生活来说尤为如此。如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免除路易斯·约翰逊的职务是件难事，那么要辞退这位远东战区五星级的司令官则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私下表示信任地对杜鲁门说应该尽快将麦克阿瑟免职。杜勒斯是共和党最著名的对外政策的发言人，也是国务院的特别顾问。他曾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一系列会见，回来后确信这位70岁高龄的将军已经远远过了他的全盛时期，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私人会谈中，杜勒斯劝杜鲁门把麦克阿瑟调回国来并在他引起麻烦之前就让他退休。杜鲁门瞪着戴眼镜的蓝灰色大眼睛回答说：这个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他提醒杜勒斯要注意国内将会产生的反应，因为麦克阿瑟的“英雄形象”在国人心中是十分巨大的。

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些作家强调说杜鲁门不很器重手下的将军，甚至很蔑视他们，认为他们目光短浅、才智平庸。他本人退休之后，常说大多数将军都是“蠢才”，尤如“戴着眼罩的马”，并挑剔他们在西点军校所受的教育（他本人年轻时梦寐以求去西点军校学习，但未能实现）。然而，他这种偏见并非针对所有的将军，而只是对着像麦克阿瑟这种似乎盛气凌人的人物。杜鲁门痛恨各种等级制度，厌恶形形色色的自命不凡的有钱有势者。1918年他在法国服役时的经历，使他持久不变地厌恶军界的等级制度，尤其是西点军校的那些自命不凡的有钱有势者。

然而，尽管杜鲁门后来说过一些话，但他对像布莱德雷和李奇微（两人都出自西点军校）那样的将军的尊敬就不可能再大了。他早就把布莱德雷看作一位模范军官，在那年夏天，他很快就发展到信赖布莱德雷的地步，把他当作一位在他政府中仅次于艾奇逊的顾问来对待。李奇微也给杜鲁门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并且终于不辜负杜鲁门对他的信任。接着有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是杜鲁门愿为他让位使之成为总统的那个人。而马歇尔，杜鲁门称他为“伟大的人物”，对他的崇敬超过了所有的人。

重要的是，此时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并没有表示任何疑虑。要说有什么不同，他似乎一直在依赖着麦克阿瑟的能力。

在8月的第一周，美国和韩国军队在洛东江的后面构筑工事，建立起一条最后的防线，该防线后被认为是釜山环形防线，这条长130英里的细长防线在釜山港周围形成一条半圆形的弧。从地图上看，这个防区看上去像是半岛上一个很小的立足点。地面上的战斗还像以前那样残酷地进行着。季风雨季已经结束，部队开始抱怨高温天气，尘土四处弥漫，运送物资的车队甚至大白天都要开着前灯行驶。但是撤退已经停止。此外，北朝鲜人为长驱直入的进攻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的伤亡数字甚至比美国人料想的要大得多。他们的补给线现在已经拉得太长。联合国军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而在釜山，集结着的大批的美国坦克、大炮和生力军正在迅速移动。8月12日星期六，布莱德雷像惯常那样用干巴巴的、谨慎小心的方式向总统简要汇报情况，但他首次把局势描述为“虽不稳定但不断有所改进”。

艾夫里尔·哈里曼此时已结束一项突击性使命，从东京回到国内，带来了麦克阿瑟最新制定的一项大胆计划的详细情况。

哈里曼此次被派遣去向麦克阿瑟将军转达杜鲁门的决心即保证他（麦克阿瑟）能拿到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也要使麦克阿瑟牢记总统要避免任何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行动的紧迫愿望。这是杜鲁门最为关注的事情，不能有半点误解。尤其是杜鲁门让麦克阿瑟要与蒋介石“保持距离”。7月31日，麦克阿瑟在高度宣扬的情况下飞往福摩萨进行访问并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之后，他还亲吻蒋夫人的手并被拍成照片。因而这成了一个使得人们十分恼火的问题。杜鲁门指示哈里曼转告麦克阿瑟一定不能使蒋介石成为诱发跟中共发生战争的触媒。

就杜鲁门所知，哈里曼与麦克阿瑟很熟。自从1920年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时以来，他们就是直呼其名的朋友。

8月4日，哈里曼在李奇微和空军的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的陪同下出访东京，于8月9日早晨返回华盛顿。哈里曼下飞机后顾不上刮脸洗浴和吃早点，从机场直奔布莱尔大厦。后来他解释说，这样做是早已计划好了的。他准备在早晨大约7点时会见总统，因为这是与总统“单独会见”的最佳时刻。

哈里曼汇报说，麦克阿瑟完全赞同总统在朝鲜作战的决定，“绝无保留”。麦克阿瑟确信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俄国人都不会干预朝鲜。关于蒋介石，麦克阿瑟向哈里曼保证：作为一名军人，他当然会按照总统的命令去做，虽然麦克阿瑟在说此话时的腔调中有某些东西使哈里曼感到疑惑不定。

会见时更紧迫重要的一点就是哈里曼不得不向总统汇报了一项以大胆的一击打赢战争的计划，这就是麦克阿瑟制定的用两栖登陆办法从后面进行袭击并以侧翼包抄敌人的战略。几个星期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谈论这个计划，因具体细节含糊，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疑虑重重。但是在东京，哈里曼、李奇微和诺斯塔德在听取了麦克阿瑟“用他全部戏剧性的口才”（李奇微的书写用语）所作的2个半小时才华横溢的讲解后，茅塞顿开。这三个人都被说服了。哈里曼说“服了”，表示要立刻回国，向总统力荐此计划。哈里曼对

杜鲁门说，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救世主”。

这个计划就是要在朝鲜西海岸距釜山西北 200 英里的仁川港组织一次出其不意的两栖登陆。问题是仁川港的潮汐极大，涨落差约 30 多英尺，而巨没有可供登陆的海滩，只有防波堤。因此，必须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城市本身，而且仅仅在满潮时才有可能使登陆艇畅通无阻地靠近防波堤。涨潮仅持续 2 小时，一旦落潮，登陆艇便会陷入淤泥中。

对布莱德雷来讲，这是他听到过的最为冒险的军事计划。但是，如同麦克阿瑟所强调的，日本人曾在 1904 年在仁川港成功地登陆过；而且正是那些“不能实行的事项”往往有助于确保奇袭成功的十分重要的因素。正如 1759 年，沃尔夫攀登亚伯拉罕平原旁边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奇袭魁北克，使得蒙塔卡姆大吃一惊并打败了他那样，麦克阿瑟说，所以他电会在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仁川港登陆，搞一次奇袭使北朝鲜人大吃一惊并打败他们。但此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袭击必须在朝鲜的冬季开始之前进行，因为严寒会比战场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9 月 15 日正是仁川港下一次涨潮的确切日子。

“我向总统讲明了实现这项计划的种种困难，”哈里曼后来说，“包括势头十分猛烈的退潮，它会使任何增援部队在下一次涨潮之前都不可能登陆。”

总统对哈里曼说“你尽快”去见约翰逊和布莱德雷。虽然杜鲁门对其中任何一种建议都没有作出什么许诺，但是，哈里曼在离开大楼时确信总统已同意这项计划。

拼死的战斗仍在釜山环形防线上激烈地进行，美军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到 8 月 25 日已达 6886 人；到 9 月中旬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在欧洲打过仗的士兵们称朝鲜是一场比任何他们所知道的都更加顽强的战争。一名叫约翰·奥斯本的记者在发给《时代》和《生活》周刊的一篇冷酷的长篇快讯中，把这场战争称作是“一场丑恶的战争”，是“可悲的”、“令人厌恶的”，是“一场特别可怕的战争”。任何做过实地采访的人都不会把它称作是一次“警察行动”。北朝鲜人的暴行是骇人听闻的，但是有些南朝鲜警察的野蛮也毫不逊色。美国人描绘说曾清晰地看到北朝鲜陆军脱去绿军装，改穿朝鲜农民普通的白裤子和白衬衫。由于极度地辨别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已逼使美军士兵自己也出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行为和态度。

这并不是指那种在战场上常见的不可避免的残酷行为，而是指一些细碎的暴行。比如，摧毁那些可能藏匿着敌人的村落；枪杀和射击可能混有穿着朝鲜农村的无个性特征的白色衣裤的北朝鲜人的难民，这些难民可能掩护着敌人向我们阵地的一次进军……

源源不断地运到釜山港集结起来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是惊人的。尽管如此，奥斯本仍然警告说：“我们有可能被挤出朝鲜。”

到 8 月初，布莱德雷将军告诉总统，美军在釜山的人数已达 5 万人，加上韩国军队 4.5 万人以及联合国内盟军的分遣队，使整个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人数接近 10 万人。为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计划要袖出另外的美军的前景仍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不高兴。布莱德雷继续认为那是“一种最荒唐的”计划。

但是，经过一系列紧张的白宫会议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

员会于8月10日在原则上同意采纳登陆战略。随后在东京和华盛顿召开的进一步的会议上，布莱德雷、谢尔曼海军上将和柯林斯空军上将纷纷表示了“极大的担忧”，8月26日星期六，布莱德雷面见杜鲁门向他简要报告了有关情况。就在这一天，美联社突然发表了麦克阿瑟致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大力维护蒋介石以及蒋介石控制台湾的重要性：“那些鼓吹在太平洋实行姑息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说，如果我们保卫福摩萨，我们就会疏远亚洲大陆。再没有比这种陈腐论调更荒谬的了。”这恰恰是麦克阿瑟曾向哈里曼保证过的作为一个好战士，他要抑制自己做的那种涉猎政策的事。

杜鲁门脸色发青，“嘴唇发白并紧闭着”。上午，他召集艾奇逊、哈里曼、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来开会，他连通常的寒暄话也不说，就读了麦克阿瑟的这篇声明全文。艾奇逊听后气得说这是十足的抗上行为。布莱德雷认为它是“狂妄自大到了极点”的声明。感到最不痛快的是哈里曼。杜鲁门后来说，他考虑过当时当场就解除麦克阿瑟战区指挥官的职务，由布莱德雷取而代之，但最后放弃了这个主意。“要避免降职的出现会是困难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想要伤害麦克阿瑟将军。”

杜鲁门让路易斯·约翰逊通知麦克阿瑟收回这篇声明。当约翰逊对此犹豫不决时，杜鲁门便亲自口述一份电报，要约翰逊立刻发给麦克阿瑟。

但是，不管他对麦克阿瑟有多生气，也不管这件事有多么让他更不喜欢或不信任这位将军，杜鲁门仍然继续讨论仁川登陆计划，而且不顾布莱德雷和其他人提出的异议，他决定给麦克阿瑟以他的支持。布莱德雷后来回忆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推迟仁川行动，直到我们确信釜山能够守住时为止。但是，杜鲁门现已表态。”8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通知他计划已初步通过。

他们全部清楚，这次行动犹如一次大的赌博。据后来了解，就连麦克阿瑟自己的几名参谋人员也认为这个计划是不明智的。麦克阿瑟自己也说只有五千分之一的机会。布莱德雷写道：“万一失败将会导致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的一场大灾难，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杜鲁门的决定受到哈里曼的强烈影响，也受到李奇微致函表示支持的影响。但是归根到底，杜鲁门凭的是自己的直觉。“这是一种大胆的战略构想。”他后来写道，“我对它将会成功充满了最大的信心。”

在以后的年代，很少有人谈论或论述杜鲁门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即作为总司令的他，也只有他才有批准仁川计划的最后发言权。他可以说，他的军事顾问们肯定也会同意他的看法，站在他一边。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碰碰运气，做出了决定，为此他既没有要求也没有获得他应该得到的任何像声誉之类的东西。

以后的几周被杜鲁门描述为“每天都非常困难”。他已决定要把约翰逊赶下台。

9月6日星期三，马歇尔将军单独来白宫会见杜鲁门。以前马歇尔曾两次在杜鲁门需要他时出任要职。杜鲁门要求马歇尔重新任职，这一次当国防部长。马歇尔告诫杜鲁门要仔细考虑这一决定，他说：“我会干的，但我希望你考虑一下任命我可能会带来对你本人及你的政府的指摘。人们仍在指控我使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垮台。我想帮助你而不想伤害你。”

杜鲁门深受感动，他在写给贝丝的信中说：“你能想到还有别的什么人

这样说吗？”

三天后，9月9日星期六，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召开了有关仁川行动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去了最终的启动信号。登陆时间定在9月15日，距现在不到一周。

11日星期一，杜鲁门召见路易斯·约翰逊，告诉他：他必须离职。此外，在宣布他辞职的时候，约翰逊应推荐马歇尔来接替他的职务。

约翰逊看起来似乎可能要晕倒了，杜鲁门觉得很担心。约翰逊请求给他一点考虑的时间，杜鲁门说可以给他一天的时间，但事情不会有什么改变。第二天下午，约翰逊手里拿着未签名的辞职书回来见杜鲁门，恳求总统不要撤他的职。杜鲁门坚持要他在辞职书上签字，约翰逊崩溃了，痛哭流涕。杜鲁门后来说，他过去很少如此难受地感到不安过。他认识约翰逊已有30年了。

约翰逊的辞职和马歇尔的任命是同时宣布的。

9月15日凌晨，华盛顿时间为9月14日下午，在仁川的两栖登陆计划开始实施了。如同麦克阿瑟保证的那样，这次进攻使敌人全然猝不及防，而且也如他断言的那样，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势不可挡的成功，彻底扭转了敌人占上风的局面。

入侵的力量计262艘舰艇和第10军的7万人，由美军第1陆战师首先发起攻击，用了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就攻克了仁川。11天后汉城收复。与此同时，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冲出釜山环形防线，开始向北行进。在军事史上，命运发生这种戏剧性转变的情形还相当少见。到9月27日，一半以上的北朝鲜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钳形包围之中。到10月1日，联合国军已攻到了三八线，整个南朝鲜已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在两周内，战争完全变了一个样。

消息传到了华盛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远比至今任何人敢于希望听到的结果要好。全国一片欢腾，这是一个“军事奇迹”。喜气洋洋的总统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封电报：“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所有国内的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既好又漂亮’。”

自战争开始将近3个月来，人们关注的问题是联合国部队能否在朝鲜坚持住并生存下去。现在问题突然变成了是否要把战争打过三八线去，摧毁共产党军队和北方的共党政权，从而统一这个国家。麦克阿瑟赞成对敌人“穷追猛打”，参谋长联席会议、新闻界、两党的政治家以及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都这样认为。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令人兴奋的时刻，胜利的激动四处风行。国务院中除了少数几个政府官员如奇普·波伦、保罗·尼采和暂时重返职位的乔治·凯南之外，实际上没有什么人竭力主张在三八线上打住。“不可能指望部队……一直前进到一条测量员划的线那里然后停下来。”迪安·艾奇逊说，“作为一条分界线它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价值。”

杜鲁门似乎和任何人一样也被卷入了当时的气氛中。追歼敌军乃是军事理论的基本原则。如果他曾对他总统任上最命运攸关的这一决定有过犹豫或是感到痛苦，那也是无据可查的。

决定是在9月27日星期三作出的。麦克阿瑟现在的军事目标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这个目标大大不同于以往。如果没有迹象表明苏联或中国的部队在北朝鲜进行重大干预，他就被授权越过三八线。而且，他不能使战火超出北朝鲜与中、苏的边界。总之，为了尽快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可以



随心所欲地干他必须得干的事情。此时马歇尔已担任国防部长，他告诉麦克阿瑟“在战术和战略上不要感到有束缚”，而当麦克阿瑟回电报说“我认为军事行动可遍及整个朝鲜”时，没有什么人表示反对。

战争向北发展涉及两大风险，即中国人的干预和严寒。但麦克阿瑟已准备行动，而且在仁川之后，人们对他“几乎是迷信般地敬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发出警告说，如果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支持北朝鲜。在华盛顿，即在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这些警告却被判断为主要是虚张声势而已。

10月的第一个周末，在纽约成功湖，联合国建议采取一切“合适的步骤以确保整个朝鲜的稳定局面”，这意味着联合国同意将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仅仅几天后的10月9日，麦克阿瑟派遣第8集团军在开城附近越过三八线。第二天，杜鲁门突然宣布说，他将飞往太平洋上的一个没有具体说明的地点去和麦克阿瑟将军就朝鲜的“最后阶段”进行磋商。

## 2

这件事就像那种极好的高水平戏剧一样无法抗拒新闻界和美国公众的极大兴趣。人们说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就像不同王国的君主在自己各式各样的随从陪同下前往一个中立地点会晤。这两个人过去从未见过面。麦克阿瑟自1937年后一直呆在国外，而杜鲁门去过的离远东最近的地方是旧金山。

会见地点在太平洋当中一个极小的地方即威克岛，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外侧有一个微小的珊瑚路航空站。

总统的远征队由三架飞机组成。杜鲁门与他的参谋人员，保健医生及特工部分遣队乘坐“独立”号飞机；哈里曼、腊斯克、菲利普·杰塞普、陆军部长佩斯、布莱德雷将军以及他们所有的助手、秘书等乘坐一架空军“星座”号飞机，该机到达檀香山后，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也登机同往；另有35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乘坐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同温层客机。麦克阿瑟将军在几名参谋人员、一名保健医生和约翰·穆乔大使陪同下飞赴会见地点。

作为一种礼遇，杜鲁门让麦克阿瑟选定会见地点，而对杜鲁门来说，威克岛意味着要进行一次跨越7个时区的飞行，从华盛顿到那里的来回飞行距离为14425英里；而麦克阿瑟从东京到那里的来回飞行距离仅为4000英里。杜鲁门解释说，在朝鲜事情发展很快，“我觉得不应该让他（麦克阿瑟）从他的岗位上离开得太久”。

在许多人眼里，整个这件事情看上去好像一场哗众取宠的政治游戏，这就是要在11月的中期选举的前夕利用这场战争的突然的、意料之外的胜利并且分享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荣誉。人们注意到，总统已经有段时光未上新闻大标题了。现在他回来了，而且对于国会中那些想在中期选举中重新当选的民主党人来说，这是“对祈祷和斋戒的极好回答”。麦克阿瑟本人在去威克岛的途中显得对他“为了政治原因而被召见”一事感到厌恶。查利·墨菲回忆说，其实举行这次会见的主意是由白宫的参谋人员作为“选举年的好东西”首先提出来的，而起先杜鲁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反对这样干，因为它的“政治色彩太浓，用心太露骨”。有人提醒他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4年时就曾有这样一次旅程前往夏威夷去会见麦克阿瑟，显然是这件事才使杜鲁门

改变了初衷。

引人注目的是迪安·艾奇逊不包括在总统的随行人员中，他很不赞成这次会见因而要求不参加。“虽然麦克阿瑟将军具有一位外国君主的许多特征……而且也像任何其他外国君主那样很难对付，但是承认他是一位外国君主则似乎是不明智的。”艾奇逊后来这样写道，“我很不赞赏这整个主意。我不想参与其中，也看不出这样干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甚至当飞机飞越夏威夷以东的太平洋上空时，杜鲁门对此行好像也有了重新的考虑。他写信对内利·诺兰说：“我身负重任，明天不得不同天之骄子谈话……”

在这个时候，总统与他远东战区司令官的这一次戏剧性会见可能具有重大的政治价值，这当然是不能否认的。但对于许多参加会见的人来说，如果指责这次会见只不过是、或得甚至主要是一次阴谋，那么他们就会断然驳斥说这是荒谬可笑的。布莱德雷说：“一派胡言。”

这次会见就像其戏剧效果一样，它的重要性集中于人们在观察问题时的误差上，即个性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两个秉性如此明显不同但人们又如此依赖他们的人，第一次能够不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或者通过官方公报或者只是通过顾问们的看法，而是通过彼此检查对方来互相作出评价。海军上将雷德福当时这样评论说：“两个人有时两个小时内面对面地了解到的彼此的见解，能够比多年来通过正当通信所了解的还要多。”杜鲁门回国后总爱这样简单地说：“我并不在乎人们怎么说，我想去见见麦克阿瑟将军，所以我就去见他了。”

此外，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的关系恶化之后，在后来的日子里会被双方大都忘却或歪曲的是，在威克岛上会见的实际情况如何，一旦会见后总统和将军当时又作了什么决定。

杜鲁门的飞机于10月15日星期天早晨6点半降落，此时太阳刚从海面升起，光辉异彩，景象壮观，从背后照亮了天上高高的成团的白云。独一无二的简易机场纵伸整个小岛。

麦克阿瑟此时正在岛上等待总统座机。按照后来杜鲁门和华莱士·格雷厄姆交给作家默尔·米勒的一篇杜鲁门到达威克岛的记事，麦克阿瑟被描写成有意力图压低总统，因而绕着机场迟迟不降落，只等待杜鲁门首先降落，从而使总统处于不得不等候这位将军的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麦克阿瑟不仅在场而且在前一天晚上就已到达，后来又提前半小时到达机场。艾夫里尔·哈里曼乘坐的飞机在总统座机“独立”号之前几分钟着陆，他和麦克阿瑟一起站在那儿等着，当然会记得麦克阿瑟问他这次会见要讨论的内容。哈里曼告诉他谈谈如何能够在朝鲜获得一次政治上的胜利，既然麦克阿瑟已经取得了一次如此辉煌的军事上的胜利。麦克阿瑟说，“很好，总统想知道我的看法。”

当杜鲁门的飞机开始进场时，麦克阿瑟眼看着飞机，伸手拉着哈里曼的胳膊开始朝跑道走去。哈里曼谈到总统对仁川行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麦克阿瑟说，在仁川登陆这件事上，他麦克阿瑟已由自己承担了“重大责任”。哈里曼说，也许麦克阿瑟应该考虑一下总统在支持他方面已经承担的责任，而对于这一点，哈里曼注意到，麦克阿瑟显示出了强烈的兴趣。

当杜鲁门跨出飞机并走下舷梯时，麦克阿瑟正站在下边等候着，脸上“充满热情友好的表情”。虽然旁观者也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未向总统敬礼，而

且虽然杜鲁门似乎对麦克阿瑟的衣着略感不安——他敞开衬衣的领口，戴一顶“油渍斑斑的、普普通通的军帽”（麦克阿瑟的有名的镶着金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驻防军军帽）——但他们之间的问候却是极其热诚友好的。

麦克阿瑟伸出他的一只手。紧紧抓住杜鲁门的右臂，同时使劲地握总统的手，他说：“总统先生。”有经验的观察麦克阿瑟的人知道这是他对人的一种头等待遇。

“将军，我对与你相见已盼望很久了。”杜鲁门笑容满面地说。

“我希望下一次不会这么久，总统先生。”麦克阿瑟热情地回答道。

杜鲁门穿一套深蓝色双排扣西装，头戴灰色斯特森牌帽子，在檀香山，他曾要求他的全体随行人员都换上夏威夷式的衬衣，但现在他看起来衣冠楚楚，完全一副总统派头，而且由于在飞行的最后一段航程里总统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因此休息得很好。

为摄影师们打算，他与麦克阿瑟再几次握手，周围一小伙簇拥的人不断地鼓掌喝彩。之后，两人登上一辆用得很旧的黑色双门“雪佛莱”轿车，并排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这是岛上能提供的最好的一辆车了。车行驶不远便到达海洋边上的一所半圆形活动房屋，在那里两人单独谈了半小时。

据当时坐在轿车前排司机弗洛伊德·博林身边的特工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回忆，在车上杜鲁门几乎立刻就开始谈到他忧虑中国可能会干预朝鲜。尼科尔森清楚地记得杜鲁门说：“我对此事一直很担心。”

根据杜鲁门自己在他的《回忆录》中的叙述，在那所活动房屋中，麦克阿瑟向他保证已经在朝鲜赢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发起进攻。当麦克阿瑟对自己在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发表的声明表示歉意时，杜鲁门告诉他不要再去想它了，他认为这件事已经了结了。总统这种姿态给麦克阿瑟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特意告诉了哈里曼。

两人在活动房屋里还谈了些什么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没有其他人在场。但有一点很清楚，这段时间足以使两人都感到轻松舒坦。从各自后来发表的评论来判断，两人都断定对方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

像其他许多首次见过麦克阿瑟的人一样，杜鲁门也被他吸引人的风度、非凡的有形举止和受人称颂的“仪态”所打动。杜鲁门写道：“这位将军好像真的感到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我谈话。我发现他是一位极能使人感到鼓舞和有趣的人物。我们的谈话非常友好——可以说比我所预期的要友好得多。”

至于麦克阿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报纸上的报道和杂志中的文章对总统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人们警告我说杜鲁门先生性子急躁，易发脾气而且爱有偏见，但在与我会见时，他流露出的不是那些东西，而是恭谦有礼和好脾气。他的个性令人着迷，语言敏锐机智，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

大约7点半钟，他们迎着早晨灿烂的阳光，再次乘坐“雪佛莱”轿车，这次是来到一幢用粉红色火山灰岩砌成的平顶单层小平房。这个建筑物是一所民用航空管理局楼房，屋顶挂着一个飘动着的风向袋。离这儿不远就是海滩，1941年日军就是从这里强击登岸的。海滩外面，蓝色的太平洋巨浪不断冲撞着两艘日军登陆艇的深色残骸。

其他大约17名顾问和助手此刻正聚集在一间没有装饰的大屋子里等着。这间大屋通往好几间更小的屋子，之间只用装有半人高的百叶窗板的转

门相隔。杜鲁门首先定下了不拘礼节的基调，他说这里的气候让人穿不住外套，大家都应该轻松随意一些。他穿着衬衣在松木长桌的首位坐下，麦克阿瑟坐在他右边，哈里曼坐在他左边，其余的人依次坐在木桌两旁或坐在靠墙的椅子上。麦克阿瑟取出一只石楠根做成的烟斗，问总统是否介意他吸烟，引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杜鲁门说他不介意。他还说他猜想他闻到过的朝他这方面吹来的烟味恐怕比活着的任何人都多。

会议持续了不到两小时。会议期间，哈里曼、布莱德雷、迪安·腊斯克和菲利普·杰塞普分别做了笔记，而且是相当公开的；一名叫维尔尼斯·安德逊的国务院女速记员也用速记文字做了记录。此时她正在隔壁的一间房间里，由于只隔着一道半高的门，因此她能清楚地听见大部分的谈话。本来，她被要求去会议室外面待命，会议结束时需要她打出一份最后公报，但她却“自动地”一直用速记方式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她事后解释说，因为她觉得好像应该这样干。当时并没有人让她那样干或不要那样干。因为当时她一直坐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所以麦克阿瑟的崇拜者们后来把她称作潜伏在门背后的“被安插在那里的”偷听者。她的到场被诋毁为“最低级的政治把戏”。据说，根据所有的笔记、也包括那位女速记员的笔记整理而成的会议记录公开发表后，麦克阿瑟十分生气。可是，在会议结束后不到一星期麦克阿瑟收到几份会议记录的副本时，他并未表露出惊讶或不愉快，也没有提出要进行任何修改。

这次会议是在没有正式议程的情况下进行的。麦克阿瑟后来写道，会议没有提出或讨论任何新的政策或战争的战略问题。但是会议讨论的范围很广泛，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听麦克阿瑟发言，杜鲁门只是偶尔做些笔记或问些问题。同以往常见的一样，麦克阿瑟的表演是专横的，他似乎完全控制了每一个细节，而且信心十足。查利·墨菲回忆说：“他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有说服力的家伙。”弗兰克·佩斯说：“他确实是一个军事天才。”时间过得很快。

麦克阿瑟报告的都只是好消息：朝鲜局势已在控制之中；这场战争，“正式的抵抗”的战争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首都平壤将在一周内被攻克；到圣诞节时，他将把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他期望在来年初，联合国将举行选举，此后不久，美国军队可以全部撤出。麦克阿瑟宣称：“军事占领没好处，所有占领都是失败的。”对此，杜鲁门点头表示赞同。

杜鲁门首先关心的是把它保持为一场“有限的”战争，他问道，中国与苏联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说：“很小”。

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会是决定性的。我们现在不再怕他们干涉了……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也许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因此，如果中国人试图开始认真对待平壤，那将会有最大的残杀。

麦克阿瑟继续说，俄国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在西伯利亚有空军部队，能够投入上千架飞机进行战斗。他暗示，如果中国的地面部队与俄国的空军威力联合起来，就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但是，空中支援协同地面部队作战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他怀疑他们能否设法做到这一点。

麦克阿瑟强调他从华盛顿获得过的支持是超乎寻常的。他环顾桌子的四

周说：“在战争史上没有哪个司令官从华盛顿各个机构得到过比我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得到的更为全面和充分的支持了。”

布莱德雷想知道，什么时候他能从朝鲜调走一个师到欧洲驻防。麦克阿瑟肯定地告诉他不迟于明年1月份。

迪安·腊斯克担心讨论进行得太快，因此递给杜鲁门一张条子，建议他放慢会议速度。腊斯克感到会议不能过于简单，否则只会招致新闻界更多的嘲讽，因为他们本来就对会议颇多非议，杜鲁门潦草地写了一个答条说：“混蛋，不！我想在遇到麻烦前就离开这儿。”

由于胜利在望，因此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讨论朝鲜的复兴问题。也讨论了费用问题，关于如何处置战争罪犯的问题，以及布莱德雷提出的一个如何处理大约6万名北朝鲜俘虏的问题。（麦克阿瑟说：“他们是整个朝鲜的最幸福的朝鲜人，他们第一次吃饱饭和洗刷干净。”）接着，讨论的话题简要地转向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对付胡志明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所作努力的问题。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对那里的局势发展均感到迷惑不解。麦克阿瑟不理解法国人为什么未能在几个月内“收拾干净”。杜鲁门说他也无法理解。后来在同迪安·腊斯克谈话时，麦克阿瑟说，法国人最需要的是采取攻势的将军。

杜鲁门说没有必要讨论福摩萨问题，因为他已经同麦克阿瑟就此问题进行过“详细”讨论，并且已取得“一致共识”，麦克阿瑟听后什么也没说，这就暗示或许两人关于福摩萨所涉及的已经比麦克阿瑟在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上所说的还要多，或许更有可能的是麦克阿瑟此时不想发表不同意见，也不希望说任何可能毁损自己正在描绘的美好景象或破坏此刻的和谐气氛的话。

至于需要增派联合国部队一事，麦克阿瑟愿意把它留给华盛顿去决定。这时已经大约是9点零5分，杜鲁门要求休息一下。

他说：“我们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就像我们已经实际能够涉及的那样，未参加会议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一点的。”他建议休息一下去吃午饭，同时准备一份会议公报。但是，麦克阿瑟谢绝了，说他急着要赶回东京，想尽早动身出发。在场的一些人认为他这种做法近似于无礼举动。布莱德雷写道：“不管他有意与否，谢绝与总统共进午餐是无礼的。我想杜鲁门是不高兴的，虽然他没有表示出来。”

杜鲁门说：“公报一准备好应该写上提交上来，这样麦克阿瑟将军就能立刻返回。”整个会议持续了1小时36分。

有些历史学家后来发表研究文章说，杜鲁门行程万里收获甚少。但在当时对杜鲁门来说，他认为此行是完全值得的。他精力充沛。他对在场的记者们说，他有一次更加令人满意的会议。《纽约时报》的记者托尼·利维尔罗描绘说，杜鲁门眉飞色舞，“就像一名保险业务推销员终于和一位重要的可能成为主顾的人签署了一项合同那样”。

当公报正在起草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一反常态，竟然谈起政治来。麦克阿瑟问总统是否计划再次参加竞选，因为日本天皇希望了解这一点，麦克阿瑟紧接着补充说道。杜鲁门反问麦克阿瑟，他自己的政治抱负如何。

“什么也没有，”麦克阿瑟答道，“如果你有一个将军出来与你竞争，他的名字将叫艾森豪威尔，不是麦克阿瑟。”

杜鲁门笑起来。他喜欢并且佩服艾森豪威尔，把他看作一位朋友。但是，

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最不懂得的就是政治。”

经过麦克阿瑟阅读并草签的公报强调，“由于意见完全一致”，才使会议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并且称麦克阿瑟是“美国伟大的战士兼政治家之一”。临登机前，在机场上举行了一个小型仪式，杜鲁门在授予麦克阿瑟一枚优异服务勋章时又讲了更多的话。他赞扬麦克阿瑟的“眼光、判断力、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以及他的“勇敢言行和坚强”，“在进攻方面的勇敢大胆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军事行动能与之相匹敌”。

此后，在回国途中，杜鲁门在旧金山发表了一次演讲，“美国之音”用26种语言向全世界播放。杜鲁门在讲话中一再提到麦克阿瑟，说他在军事史上写下了“新的光荣的一页”。“对于这个世界很幸运的是，我们有了实现这个目的合适的人，这个人是一位十分伟大的战士，他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杜鲁门在演讲中说，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取代同因具有直接经验而了解那里的问题的战地司令员进行个人交谈。但是杜鲁门也感到“迫切需要”讲清楚，“在我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做法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麦克阿瑟在离开威克岛时也感到精神振奋。在飞返东京的途中，据穆乔大使讲，麦克阿瑟“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在听到杜鲁门在旧金山的讲话后，他立刻拍电报给总统，表示他对此热烈地赞同。

威克岛的全部精神是一种宽慰和欣喜之情。在朝鲜发生的可怕的流血冲突以及煎熬都过去了，战争取得了胜利。如果麦克阿瑟说过中国人将进行干预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在仁川登陆之后，谁还会对他的判断产生疑问呢？特别是如果他所讲的证实了华盛顿方面所想的（“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和我们所有其他的人都错了”，迪安·腊斯克在回顾时写道）。如果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会议前曾经互不喜欢或互不信任过，会议后他们显然再也不这样做了。即使会议仅只做到了这一点，也是成功的。

如同1950年10月15日上下较晚的时候在威克岛上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麦克阿瑟几乎会在任何一天结束这场战争。“到平壤来吧，这个时间不会很长了。”这是他在简易机场对向他送行的华盛顿记者们道别的话。朝鲜今后面临的问题可能只是和平和复兴的问题，由于麦克阿瑟有他在战后日本的经验，这类问题恰好是他能够胜任处理的。

对于杜鲁门这位总司令来说，他6月30日的决定即决定投入美国的军队和威信来阻止在朝鲜的侵略并采取措施以使这样做成为一项联合国的行动，没有比这时看来再正确的了。他的“警察行动”，虽然经历了夏季的倒霉时日，却已经成功了。共产党人的挺进被阻止了，他实现了言行一致。他做了他认为应该为美国和世界的利益而做的事，他毕竟做了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合适的将军，支持他，拿他的大胆行为进行赌博，而这一切都起了作用。现在看起来可以把朝鲜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柏林空中运输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起都归入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获得的最令人骄傲的成就。随着朝鲜危机的解决，战争即将结束，发生一场更大冲突的可怕的可能性也已在逐渐消失，这些对杜鲁门来说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考虑。如果说杜鲁门眉飞色舞得就像一个成功的保险业务推销员，如果说麦克阿瑟“兴高采烈”，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杜鲁门认为并经常说：一个人在历史上占何地位跟他的死的选择时机有很大关系。如果他或者麦克阿瑟在那时候或不久以后死去——假如他们两人

中有一人乘坐的飞机坠毁，或者两人中的任何一人死于心脏病——那么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业绩记载会跟后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当杜鲁门登上他的“独立”号总统座机时，他们在威克岛上迎着正午灿烂的阳光相互道别。

“再见，先生，”麦克阿瑟说，“一路平安。与你会谈，我真感到荣幸。”

这就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从此以后他们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 3

各种迹象表明，在担任总统职务期间，杜鲁门很少考虑他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他觉得人的生死由命，无需终日小心防范。他很喜欢守护他的特工人员，这些人大多来自小城镇或者具有和他自己很相似的背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人要求他给予什么帮助。有一次他对女儿玛格丽特说：“我喜欢他们要胜过所有那些地位很高的人。”他特别喜欢与固定在每天早晨陪他散步的那二三个保卫人员交谈。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谁来自什么地方，是否结婚或有孩子了，去哪个教堂做礼拜等。“他几乎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对待我们。”一个叫雷克斯·斯考顿的保卫人员回忆说，“我们散步时，几乎大部分时间都由他在说话，比如谈军队的事情（杜鲁门很喜欢斯考顿也曾在炮兵服役过这一事实）、他在密苏里的成长经历以及南北战争的事情。他在经过一幢楼房时，会告诉你这座楼的所有情况以及它为何如此设计……”

他们知道，杜鲁门对他们这些人的兴趣决非转瞬即逝的事情。比如，当杜鲁门得知弗劳埃德·博林的妻子生了小孩，他会让另外的特工人员开车送他去医院看望产妇和小孩。

但是，杜鲁门对特工人员的形影不离、时时刻刻受到保护的感觉感到恼怒。他一直不习惯这种做法。他觉得少一点保卫措施倒会使他感到更为自在。如果说在搬进布莱尔大厦之后他有什么这种情况所引起的对安全问题的顾虑，他却从未说过一句话。

1950年11月1日，星期三正午，即威克岛会议之后两周的日子，杜鲁门在度过一个极其烦扰不安的上午后回到布莱尔大厦。根据中央情报局新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的报告，已经“明确证实”现在在北朝鲜与联合国军队作战的部队中包括中共的士兵，估计人数多达1.5万至2万人。

这一天华盛顿的天气热得不合时令，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两旁的树荫下，气温高达华氏85度，是记录上的11月最热的一天。

杜鲁门与贝丝和马奇·华莱士一起安静地用午餐，饭后，他上楼去午睡。按计划，他下午2点50分要去阿灵顿公墓，出席英国陆军元帅约翰·迪尔爵士雕像的揭幕仪式并讲话。迪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英美联合参谋团英方成员，作为他战时服役的结果，他在1944年死于华盛顿。

由于天气炎热，杜鲁门脱去外衣，穿着内衣躺在四边有立柱的床上，窗户大开。

房子的其他部分渐渐安静下来，贝丝和她的母亲已在另一间屋里安歇。楼下，前厅的大门对着街道敞开着，里面一扇纱门用插销插着。前厅比较凉快，特工人员斯图尔特·斯托特正在那儿值班。

“房子里这么安静，天气又这么闷热，需要挣扎一番才能保持清醒。”

一名叫 J·B·韦斯特的传达室副主任回忆说，他当时与传达室主任豪厄尔·克里姆正呆在大厅边上他们的小办公室里。

大厦外面，有三个白宫警察身穿冬季制服在站岗，高温使他们热得发昏。除了天热之外，这天的下午像任何其他下午一样正在过去，人们在总统卧室的窗户下步行通过，公共汽车和小轿车沿着阳光照耀的大道急驰而过，秋天的树叶慢慢从树上落下。

为了稍微减轻单调感，卫兵们采取一种名叫“提神”的轮流制度。2点15分“提神”开始，二等兵唐纳德·伯泽尔站到大厦正面台阶的最下层，这里刚好位于遮篷的下面，他站在那里面对着街道。他的左右两边的人行道上各有一个涂了白漆的卫兵岗亭，相距约30码，每个岗亭里面各有一名身穿制服的白宫卫兵。左侧岗亭的东面是拉菲特广场，二等兵约瑟夫·戴维森正坐在那里与保卫人员弗洛伊德·博林聊天。（博林回忆说：“我时不时地喜欢出来聊两句。戴维森今天戴了一副眼镜，而我以前从未见他戴过眼镜……我打趣地说：“喂，戴眼镜干什么？想看清在这里走过的那些姑娘吗？”）

在右边岗亭里的是二等兵莱斯利·科费尔特。第4名白宫警察叫作约瑟夫·邓斯，他刚刚由科费尔特替下岗位，正开始向地下室的大门走去，这时两名瘦高身材穿着整洁的男子从相对的两个方向走近布莱尔大厦，他们混在其他行人中沿着人行道走过来，此时正是2点19分。

这两个人穿着深色西服，戴着深色的帽子，看上去十分温文尔雅，也不引人注目，以至于前一天晚上联邦火车站附近那家他们所住旅馆的一位职员把他们俩误认为是神学院的学生。从西边走近莱斯利·科费尔特岗亭的男子叫格里塞里奥·托列索拉，年龄25岁。从东边走近另一岗亭的男子叫奥斯卡·科利亚索，年龄36岁。两人都是来自纽约的波多黎各人和狂热的波多黎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们事业的注意，他们决定要行刺总统。

托列索拉身上带着一支德国卢格尔手枪，科利亚索携带着一把德国造0.38口径的沃尔特手枪，但他以前从未打过枪。两人一共带了69发子弹。

托列索拉来到科费尔特岗亭的窗前停住，开始大声他说起话来，显然他是想转移卫兵对他同伴的注意力。科利亚索此时正好已越过戴维森和博林所在的岗亭，径直朝布莱尔大厦的台阶上走去，唐纳德·伯泽尔在那里站岗，他刚转过头去朝西向科费尔特那边望去。

伯泽尔记得，他听见一声轻微的但不会弄错的金属碰撞声。他急忙向后转过身来，看见科利亚索离他约8或10英尺远，手持一把0.38口径的枪，向他瞄准并准备射击。

伯泽尔正要拔自己的枪，对方的枪响了，伯泽尔的右腿中弹。但令人惊异地，他没有还击，尽管他腿部受伤，在他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念头，即离开这里向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跑去，以便把火力从总统的住宅引开。当他移动时，科利亚索转过身来，继续向他射击，再次打中了他。伯泽尔被有轨电车的轨道绊倒了，但转过身来用一只膝盖支撑身体用枪还击。

此时，枪声从四面响起，托列索拉已步行至西边岗亭敞开的门前，他举枪向科费尔特一阵平射。科费尔特胸部和腹部中弹，倒在地上血流不止慢慢死去。托列索拉急速转身又向地下室门旁的白宫警察约瑟夫·邓斯射击，三次击中了他。邓斯设法挣扎着冲进门里大声呼救。

“这一切都发生得那样快……我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弗洛伊德·博林回忆说。尖叫声、呼喊声响成一片，人们四处乱窜想找个藏身之



处。枪击的噪音令人惊恐——2分钟内打了27枪。

博林和戴维森一起向科利亚索开枪射击，一发子弹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另一发子弹打中了他的帽子。博林第二次射击打中了他的胸膛，科利亚索脸朝下倒在人行道上，他的两腿又开在前面的台阶旁，他的帽子还戴在头上。

与此同时，托列索拉还在变换着方向向有轨电车轨道旁的伯泽尔射击。伯泽尔的好腿现在也被击中，他向前跌倒，但是把手枪支撑在一臂开外的人行道上继续开枪还击。此时，已受到致命伤的科费尔特设法拿起自己的手枪向托列索拉射击，一枪打在他的头上，把他打死在地。

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之后是几秒钟奇怪的沉寂。接着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更多的是警察、摄影师、白宫的特工人员和新闻记者，人群计达几百名。

在前厅里，特工人员斯托特跑进传达室，从枪柜中取出一把汤姆森式冲锋枪，端着它守在前门旁。

J·B·韦斯特走进前厅，看见第一夫人正站在楼梯上。她问，发生了什么事。韦斯特答道，有人开枪射击。他记得，夫人“瞪大了眼睛”盯着他，然后急速转身，朝楼上跑去。

杜鲁门在射击的喧闹声中从床上跳起来，冲到窗户跟前。外面人行道上有人看见了他，便大声喊道：“回去！回去！”一直喊到杜鲁门离开了窗口。

救护车在外面的人群中小心驶过。谣言迅速传开：总统被谋杀了。各个区域都发生了交通阻塞。

伯泽尔一动不动地躺在街上，血从双腿流出，染红了人行道。科费尔特在他的岗亭旁边伸着四肢仰躺在地上。已被拖入一间地下室房间的邓斯要求为他请一位牧师来。

托列索拉已蜷曲成一团，倒在黄杨木篱笆墙下死去。科利亚索还活着。

杜鲁门迅速穿好衣服，走下楼来。他来到一楼向外观望，看到许多警察在弯腰查看倒在前面台阶上的科利亚索。查利·罗斯从警察中挤出来，登上台阶问：总统是否还要去阿灵顿公墓？“噢，当然要去。”杜鲁门回答。

15分钟后，他从大厦的后门出来，坐上他的大型高级轿车，由七八名特工人员紧随其后，坐在一辆大的敞篷汽车里，一行人驰上车道，迅速通过了波托马克河。

在阿灵顿公墓，几百人正聚集在那里等待揭幕仪式，他们看见杜鲁门从车上下来神色严峻但很沉着。没有一个人知道已发生的事情，直到10分钟后，一名通讯员骑摩托车来此取一名摄影师的胶卷时，消息才立刻传开，人群中发出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杜鲁门站在约翰·迪尔爵士骑马造形的铜像旁，坚持宣读已准备好的讲话稿，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相互理解和充分相信彼此的诚意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求的只此而已，我们想要的只此而已……”

只是在后来，当听说二等兵莱斯利·科费尔特在医院中死去时，杜鲁门才感到极其心烦意乱。为纪念科费尔特，在布莱尔大厦前新的铁栅栏上挂上了他的一小块名牌。杜鲁门后来说，科费尔特是白宫卫队中最受人喜爱的警官之一。

警官伯泽尔和邓斯最终伤好复原后重返他们的工作岗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为波多黎各做的事情比任何前任总统都多。

他赞同波多黎各人民确定他们与美国保持政治关系的权利，而且多次这样讲过。他任命了第一位波多黎各本地人担任这个岛国的统治者，而且把社会保障法的实行范围扩大到波多黎各人民。

奥斯卡·科利亚索坚持解释道：“但是杜鲁门……恰好是这个制度的一个象征，你们并不攻击这个人，你们攻击这个制度。”

科利亚索被控犯有4项罪，包括谋杀科费尔特，被宣判坐电椅处死。然而，1952年，作为对波多黎各人民的一个姿态，杜鲁门把他的刑罚减轻为无期徒刑。199年，科利亚索在莱温沃思监狱监禁了29年后，得到吉米·卡特总统的赦免。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开始要去散步时，杜鲁门对记者们说：“一位总统必须预料到这些事情。”户外活动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杜鲁门迈着他惯有的轻快的步伐，漫步穿过安静的城市，看不出这天早晨与往常有什么不同。但是，现在他身旁至少育十几个特工人员守护着，另有4人是紧随其旁。这些人中有些远远走在前面或者在街对面，其他人则更加荷枪实弹地坐在一辆缓缓行驶的汽车上跟随其后。

这天下午的定期的记者招待会照常举行，杜鲁门回答问题时坚持说，他从未有过生命危险。他对海军上将李海说，人们唯一需要担心的事是坏运气，而坏运气从来都与他无缘。但是他一直考虑着已经发生的事。他在一张便条中对艾奇逊说，此事完全是“毫无必要的”，“那些真正受伤的人是了不起的人”。那两个枪手是傻瓜。“没有比他们再愚蠢的了，”他写道，“我知道我能组织一次比他们安排的要好的计划。”这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完全清楚地知道事情本来可以有多大的不同。他要去阿灵顿公墓参加揭幕仪式的计划已经登在早晨的报纸上。刺客只需再等20分钟，他就会从大厦里走出来。

11月5日，在去独立城投票的途中，他在圣路易斯市下榻的旅馆房间里写下这样一篇日记：

（离开机场后）我们乘坐一辆封闭轿车前往圣路易斯。天气很冷，刮着西北风。沿途的人门都想看一看总统——不是我！有些人看见了我，结果是通常说声：“他就在那里！”“喂，哈里。”在美国多数人都是善良快乐的人，他们用微笑、招手以及叫喊来表示……

由于几天前两名古怪的人或者说疯子企图枪杀我，我的精干的卫兵们感到很紧张。所以我力图尽量给他们一些帮助。

今天早晨我很想外出散步，但是特工人员以及“老板”和马吉为我担心，所以我取消了我平常的散步。

当总统真倒霉……

杜鲁门告诉埃塞尔·诺兰，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犯人”。那些在布莱尔大厦保卫他的“威严的卫士”从未有过尚好的运气，“那位被杀害的卫兵在他能做什么之前就被冷酷无情地谋害了”。

从此以后，杜鲁门在华盛顿不再从布莱尔大厦穿过大街走到白宫的西侧楼去了。他总是坐在一辆防弹车里开来开去，车上还安装有特殊的顶篷和底盘，按杜鲁门的说法是“上防手榴弹，下防地雷”。

他总是想象他可能需要提防任何想要成为刺客的人，就像安德鲁·杰克

逊总统做过的那样，当年他在国会大厦里遭到一名精神错乱的刺客射击时，他拿着他的手杖去追赶那个男子。

4

从 11 月 1 日即行刺未遂的那一天起至 1950 年 12 月底，对杜鲁门来说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奥马尔·布莱德雷称这 60 天为他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难熬的时光，情况甚至比“腹地之战”时还差。对杜鲁门来说，这是他任总统以来所经历的最阴暗和最困难的时期。

这一年的中期选举虽然不像 1946 年那样，丢人现眼，但对民主党人来说却是一次明显的失败，在有些方面是极其令人沮丧的。在许多国会议席的争夺中，地方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也有一些对朝鲜战争的担忧以及《时代》周刊称之为人们对国务院“与共产党人在搞秘密交易”的怀疑。乔·麦卡锡指控说：“我们可以把朝鲜这个死亡陷阱归咎于克里姆林宫和那些破坏重新扩军的人，包括艾奇逊和总统本人，你看怪不怪。”参议员惠里说，艾奇逊的双肩上沾满了美国男孩子的鲜血。在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与民主党多数派领袖参议员斯科特·卢卡斯竞选时说：“政府所有的虔敬之举都无法使装在木匣子里运回国的那些年轻人的尸体恢复生命了。”

麦卡锡本人并不参加中期选举，但发誓要使卢卡斯和米勒德·泰丁斯这两个参议员、政府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以失败告终。泰丁斯尤其是歪曲与谎言的牺牲品。在马里兰州的竞选运动中，麦卡锡和他的助手们散发伪造的相片，显示泰丁斯与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在一起交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院竞选中，理查德·尼克松称海伦·加甘·道格拉斯是“彻头彻尾的左倾分子”等等，因而击败了她。

杜鲁门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所有最使他伤心的事情之一是麦卡锡主义似乎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贝丝·杜鲁门说，结婚 30 年来，她很少见过杜鲁门如此情绪低落，他为自己不能对麦卡锡施加压力而进行自责。

全国 52% 的选票投向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仅得 42% 的选票。民主党人仍然控制着国会的两院，但是，在参议院里，民主党多数派多出的席位从 12 席减至 2 席；在众议院里多出的席位从 17 席减至 12 席。虽然杜鲁门没有时间进行竞选讲演，他只在他家乡所在的州里搞过一次，那是他在回家投票的途中在圣路易斯城进行的，但是结果显示他个人遭到了失败。在参议院里，他实际上已不再有控制权。此外，杜鲁门长期以来一直把他当作非党派人士的支持的阿瑟·范登堡一病不起，不可能重返职位了。

在他的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说：“一些共和党人把这次选举理解为其意思是你应该要求艾奇逊先生辞职。”

杜鲁门说，艾奇逊先生将留任，“其他没什么好讲了”。

选举结果使他感到闷闷不乐了吗？杜鲁门答道，一点也不。事实上，与正在朝鲜发生的事相比，选举失利就不在话下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军队投入战争已经是个既成事实，尽管还拿不准他们有多少人数。麦克阿瑟估计有 3 万人，可是不管有多少人他都倾向于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但是，华盛顿方面的忧虑却增加了。为了阻止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川流不息地进入朝鲜，麦克阿瑟请求授权轰炸鸭绿江上朝鲜一端的所

有桥梁。杜鲁门批准了这个决定，但警告麦克阿瑟不要把战争，尤其是禁止把空袭，扩大到鸭绿江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去。

担忧的另一个原因是麦克阿瑟决定在北进时，要兵分两路，让第10军沿半岛的东部向前挺进；让第8集团军沿西部挺进。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部署，因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疑问。但是，麦克阿瑟一点也不为之所动，毕竟正是如此的大胆行为才创造了仁川登陆的奇迹。马修·李奇微写道：“于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觉得，这样一个人对批评的反应可能是更加顽强、更加热情地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想要阻止他是毫无用处的。”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发动一场强大的、“结束战争”的攻势，一场“大规模的全面包围”，战争就会迅速取胜。像以往那样，他绝对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而在五角大楼或白宫找不到这样的信念时，就没有什么人、包括杜鲁门在内采取步骤来阻止他了。

来自西伯利亚的凛冽寒风席卷着北朝鲜，此时麦克阿瑟乘飞机前往第8集团军在清川江的司令部，督察进攻的开始。“如果这次行动成功，”他用记者听得见的声音说道，“我希望我们能把孩子们送回家去过圣诞节。”

进攻于11月24日星期五感恩节之后的那一天开始。4天之后，11月28日星期二，在华盛顿，早晨6点15分，布莱德雷将军打电话给在布莱尔大厦的总统说，他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我们手中有了一种可怕的形势。”几小时之后，杜鲁门在白宫把情况告诉了他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上午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耐心地等待着，会议处理的是例行事务，即屋子里的那些人所提出来的各种使他们焦虑的事情。

中国人发动了猛烈的反攻，投入了26万人，杜鲁门说。麦克阿瑟正在转为防御，“中国人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

他周围的人全都是同样的、熟悉的面孔——查利·罗斯、马特·康内利、哈里·沃恩、查利·墨菲、比尔·哈西特、乔治·埃尔西、威廉·霍普金斯；但增加了一个人，即作家约翰·赫西，他正在为《纽约人》杂志撰写一本总统的“传略”，被准许在几个工作日、大抵是日常的工作日中对总统进行跟踪采访（对一个作家来说，过去是没有这种先例的，但是赫西为此向杜鲁门呼吁，理由是他撰写的书可能是对历史的一个贡献）。

杜鲁门停住说话，屋里静悄悄的，在场的人被他的话惊呆了，一个个默不作声地端坐在那儿。在朝鲜各种事情似乎一直是进展十分顺利，自从仁川登陆后，所有的景象都是令人兴奋的，威克岛也使希望高涨，但顷刻间这一切都无影无踪了。正像赫西写的那样，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下子就明白这个消息对总统意味着什么，谁应“单独地和不可逃避地”对朝鲜目前所发生的一切负责。打过三八线的决定是他批准的，正如冒入侵仁川之险的决定是他批准的一样。只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不同了。

行政秘书威廉·霍普金斯递给总统一摞信件请他签名，这些大都是答复有关行刺未遂事件来信的（事件出现后的几周内，杜鲁门接到了大约7000封对他没有受到伤害表示感恩的信，他坚持每封信都要给回信，而且这7000封感谢信全部由他亲笔签名）。他签了又签，签完了这一大摞信，签名的同时，他不时地谴责“诽谤中伤”的人，称他们的用意是要分裂国家。从朝鲜传来的消息表明，敌人错误地判断了美国的决心。苏联《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说，华盛顿出现了深刻的分歧。他对此表示说：“我们可以为我们今天上午陷入的困境谴责那些谎言家。……我们报纸上出现的消息报道，连同参

议院中领导人的被击败，使得全世界都认为美国人民并不支持我国的对外政策……”

他开始概要说明准备即时采取的措施，以便提交内阁和国会。到此为止他没有动过感情。但是，据赫西记录说此刻他再次停了一下，突然，他的全部被“压抑住的”情绪似乎一下子都涌上脸来了。

他的嘴巴紧紧闭着，两颊发红。刹那间，他几乎看上去要啜泣了，然后考虑到人们可能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什么来，他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沉着平静的声音、一种充分显示他个人勇气的声音说：“这是我们遇到过的最坏的处境，我们只能不得不面对它，如同我们曾经面对所有其他的困境那样……”

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国军队真是 26 万人吗？杜鲁门回答说，是的。罗斯说，或许还不应该宣布什么事情，杜鲁门表示同意。对注视着他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时刻是极其痛苦的。毫无疑问，如同他说过的，这是他当总统以来收到过的最坏的消息。

但是接着他似乎恢复了常态，端正地坐在他的高背椅上。“我们必须正视这件事情，”他操着低沉而自信的声音说，“现在让我们干起来吧，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干我们的工作。”

“我们面临着一场崭新的战争。”麦克阿瑟宣称。在他发动“结束战争”攻势后过了整整三天，然而所有胜利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中国人一心要“彻底摧毁”他的军队。“这个指挥部……现在面临着超越其控制和实力的情况。”

在随后发来的文电中麦克阿瑟要求给予“最大规模”的增援，包括来自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已经“心力交瘁”。他采取军事行动时所奉行的命令“被发生的事实证明是完全过时的”。他要求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他要求对中国大陆进行轰炸。他坚持说他必须得到扩大冲突的权限，否则政府将面临一场灾难。

同一天，即 11 月 28 日，下午 3 点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阁会议厅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是杜鲁门年代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因为会议在杜鲁门主持下，实际上在当时当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即无论情况多么的可怕，都不能让朝鲜的危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这个决定就像原先进入朝鲜那个决定一样是决定命运性质的，而且考虑到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因此它是杜鲁门政府的成就之一。

布莱德雷将军以评论战场上的惨淡局面开始了讨论。在这样的会议上很少说话的艾尔本·巴克利尖锐地问道，为什么麦克阿瑟要许诺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他怎么能诚实地说这样的话。陆军部长佩斯说，麦克阿瑟现在否认他说过此话。杜鲁门警告他们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一定不要做出什么让这位指挥官在敌人面前丢脸的事情。

马歇尔发言时，语气极其严峻。他说美国在朝鲜的介入应该作为联合国努力的一部分而继续下去。美国一定不要在朝鲜境内“搁浅”，而要找到一种“体面撤出”的办法。千万不能与中国交战，这一点是清楚的。“这样做将会落入俄国人精心设计的圈套。我们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行动来限制这场战争”。

限制这场战争，不要落入圈套，这些同样的观点，在后来的时日里一再

地讲。“在我的头脑中是毫无疑问的，”杜鲁门后来这样写道，“即我们不应让在朝鲜的行动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必须避免对中国的全力以赴的军事行动，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陷阱。”

“我们无法在朝鲜打败中国人，”艾奇逊说，“他们能投入比我们所能投入的更多的力量。”由于担心麦克阿瑟可能会过分扩大他的军事行动，艾奇逊极力主张对满洲的空袭行动“要三思而后行”。只有在不这样干就无法挽救美军时，才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如果美国的攻击在满洲获胜，俄国人就可能来帮助他们中国盟友。

艾奇逊说，要做的事情，即“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条我们能守住的防线，而且要守住它”。

在他们所面临的一切事情的背后是苏联，“这是一个忧郁的需要考虑的问题”，布莱德雷写道。一场更大战争的威胁比以前更加迫近了，而压在他们所有人心头的就是这个与俄国随时随刻爆发一场全球冲突的可怕前景。

消息如此之可怕而且来得这么突然，好像几乎难以令人置信。此刻任何人最没有料到的事情是在朝鲜的失败。11月28日的晚报描述说，“成群的中国赤色分子”从美国第8集团军右翼不断扩大的缺口处拥入，“联合部队的攻势的失败变成了对整个联合国前线部队的一个可怕的威胁”。第8集团军开始全线后退。《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号通栏大标题是：“20万敌军在朝鲜向前推进了23英里。”军事策划者们最怕的两大灾难——朝鲜严寒的冬季和中国人的大规模干预——同时降临到了联合部队的身上。

悲剧性的史诗般的撤退开始了——这场战争中的一些最恶劣的战斗——顶着怒吼着的寒风和大雪，冒着零下25度的低温。中国人不仅“成群地”冲过来，而且乘机利用了麦克阿瑟的兵分两路，猛攻他们的两侧。第8集团军在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指挥下从清川江向后溃退朝着平壤而去。只有一种选择，或者撤退或者被歼。在东北部第10军的严峻考验更为恶劣。第1陆战师的退却——从楚兴水库区后撤40英里至兴南港——其情景可以与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写的关于不朽的1万人的撤退或者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相提并论。

杜鲁门回忆他自己在华盛顿的那段日子时说：“花费时间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

在办公室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杜鲁门与在华盛顿工作的新闻机构结下了极好的关系。他诚心诚意地喜欢和尊重大多数的记者——尽可能出席每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或在早晨散步时回答任何觉得能够向他采访的记者。“记住，摄影师是劳动人民，他们靠出售照片为生，”他曾经对玛格丽特这样忠告过，“帮助他们出售照片。记者是出售文章的人，帮助他们出售文章。”反过来，记者们也很喜爱和尊重他，其程度可能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多。在刺杀未遂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当他走进印第安条约厅出席他的记者招待会时，记者们长时间向他鼓掌，这完全是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

“过去50年来，没有哪一位总统像杜鲁门那样受到记者们如此广泛和热烈的喜爱。”卡口尔·菲利普斯这样写道：

他像大多数总统曾经做过的那样有时“利用”新闻媒介来探测风向。但他从不试图以奉承和不正当的偏袒来“骗取他们的信任”……哈里·杜鲁门很少干讨好人们的事，但在这方面他却比我

所认识的任何重要的社会人士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我认为，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对自己无限真诚，毫无我们所说的那种“自高自大”或“装模作样”。

新闻秘书查利·罗斯的这种感情也值得受到部分的称赞，因为他从不认为有必要把杜鲁门“出卖”给他们。

杜鲁门看不起的是当时的一些新闻业巨头、有权威的出版商和编辑以及好些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受人雇佣的”和“捡垃圾”的专栏作家。杜鲁门鄙视地说，“如果这行得通，对民主是个多大的考验啊！”《堪萨斯城明星报》的编辑罗伊·罗伯茨曾以傲慢的口吻写了杜鲁门入主白宫第一天的情况。亨利·卢斯认为杜鲁门是“惯用归谬法的俗人”。《新共和》周刊的编辑迈克尔·斯特雷特在1948年写过一篇文章，称杜鲁门“在理解印刷文字的方面存在着大家都知道的困难”。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沃尔特·温切尔、德鲁·皮尔逊都曾猛烈地攻击过他，其方式使他难以忘却。

他在私下里谈到这一伙人时带着强烈的轻蔑感。他说罗伊·罗伯茨是“一罐没用的肥猪油”；佩格勒是“一只耗子”；温切尔和皮尔逊是“新闻骗子”；艾尔索普兄弟是“贿赂姐妹”。他厌恶赫斯特报系和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而在所有这些人中最卑鄙的仍然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板罗伯特（“伯蒂”）麦考密克上校。在杜鲁门看来，麦考密克之流是以毁坏知名人士的人格而发家的，而为他们干肮脏工作的那些人，像有些专栏作家，在为了金钱而委身于人方面并不比婊子好多少。“依我的看法，这些出卖思想的妓女对人类未来的危害比那些出卖肉体的妓女大得多，”他在一封未曾发出的、给弗兰克·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此人是《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专栏作家，杜鲁门特别讨厌他。那年的11月，当他听到一个朋友说《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叫霍姆斯的作家在堪萨斯城打听有关杜鲁门及其家庭的问题时，杜鲁门写信回答说：“请你转告这位叫霍姆斯的先生，如果他编造出一大堆关于杜鲁门夫人或我任何一位家人的谎言，我将与他奉陪到底，直到撕下他那张厚脸皮。”

但是，对那些在白宫里每天都对他进行采访的记者，对那些1948年和他一起旅行的记者，对那些曾经去过基韦斯特的记者，他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和托尼·莱维罗；《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福利亚德；合众社的梅里曼·史密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国际新闻社》的罗伯特·尼克松；《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乔·肖特。他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不是“新闻骗子”或者伯蒂·麦考密克一类的人。正是这些人在1950年11月30日上午的那个引起轰动的记者招待会上站起来向他提出问题。当时，杜鲁门踉跄地陷入了更多的麻烦，对记者们犯了他以前从未犯过的错误，他的讲话向世界各地发出了冲击波。

印第安条约厅里挤满了人，在他进来时有200多人站在那里。起初，一切进展顺利。他开始宣读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一份强硬的、强制性的政策声明。

无论美国还是联合国都没有任何侵略中国的意图。然而在朝鲜发生的事，是俄国—共产党人全球侵略扩张模式的一部分。因而世界现在面临着—场严重危机的威胁。

如同他曾经决定在柏林困守一样，杜鲁门现在决定要留在朝鲜，而且他

这样说了。他不是言过其实，他不是能言善辩，他只是说得条理清楚，简明扼要。

我们可能会遭受挫折，就像我们以前曾经遭受过的一样。但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

我们将在联合国内继续为采取一致行动来阻止在朝鲜的这一侵略而工作。我们将加紧努力帮助其他自由国家加强他们的防务，以应付其他地区的侵略威胁。我们将迅速地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

这份声明是由白宫的十几个工作人员和国务院极其小心谨慎地拟就的。它没有谈到原子弹问题。在准备这份声明时甚至从未讨论过原子弹这一议题。

但是接着开始提问题了。记者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福利亚德首先问杜鲁门对欧洲报界批评麦克阿瑟有何评论。

杜鲁门回答说：“当一个人获胜时，人们往往拥护他，但当他遇到一点麻烦时，他们就全都责备他，说些应该怎么做之类的话，而这些话他们以前却并未告诉他。”麦克阿瑟将军“现在工作干得很出色”。

福利亚德夸张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后又说，人们特别批评他的是，他越权行事，而且做得太过份了。

“他没有做那样的事。”杜鲁门厉声说。

其他记者开始向他进逼：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渡过鸭绿江对满洲发动进攻，怎么办？

杜鲁门像往常一样笔直地站着，当他讲话时，他的手指尖压在桌面上。有时在回答问题的间隙，他从玻璃杯里呷一口水，或者扭转一下戴在左手上的沉重的共济会金戒指。

“我们会采取无论什么的必要步骤来应付这种军事局势，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

这包括使用原子弹吗？

杜鲁门毫不迟疑地说：“它包括我们所拥有的各种武器。”

这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呢？

大厅里安静下来。从未被认为适合于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论的这个话题突然成了提问的焦点。杜鲁门应该在此之前就终止对原子弹问题的讨论。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会把他引向何方，而记者们认为，如果像看起来的那样，他的意思是要稍微动用一下原子弹来进行吓唬的话，就没有理由抑制住不进逼他。

“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的问题。”杜鲁门回答说，然后他悲伤地摇了摇头补充道，他并不想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当用在无辜的男女和儿童身上，他们与这一军事侵略毫不相干。一旦使用它，就将发生这种情况。”

梅里曼·史密斯意识到总统讲得太多，超过了他意思所指的，便要求澄清的办法向他提供一个后退的机会。“我们是否清楚地理解了你的话，即使用原子弹问题正在积极考虑之中？”

杜鲁门坚持说：“一直在积极考虑。原子弹是我们的武器使用这种手段是针对军事目标，还是针对民用目标？白宫新闻处的另一名老记者罗伯特·尼



克松开始发问。但是杜鲁门打断他的话说：“这是军人们必须做出决定的一个问题，我不是决断这类事的军事权威。”

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弗兰克·布戈尔策希望他答得再具体一些。

“总统先生，您说这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这是不是说，除非联合国认可，我们不会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驳回说：“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对共产党中国采取行动取决于联合国的行动。战地军事司令官将主管武器的使用，就像他一直拥有这一权力那样。”

他说的话远远超出了他本来想讲的内容，而且有些还讲得不准确。但是记者们有了他们的报道内容。记者招待会于上午10点30分结束，到10点47分时合众社的一份公报就上了广播：杜鲁问总统今天说，美国正在考虑与在朝鲜的这场战争有关的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美联社跟随其后补充说：是否使用原子弹取决于美国战地军事指挥部，意思很明显，这个决定权将交给麦克阿瑟。这一消息以大亨标题的形式出现在下午较早出版的报纸上。

杜鲁门的回答真是傻得透顶，记者招待会是一次大惨败。白宫的电话应接不暇。埃本·艾尔斯为此忙得筋疲力尽，他在那天晚上私下写道，这是曾经有过的“最失控的日子”中的一天。欧洲的反应是极度的惊慌，尤其是在英国，在那里这一消息使下议院陷入一片恐慌，这是老资格的议员们从未见到过的状况。艾奇逊带着一份“澄清性”声明的草案匆匆来到白宫。查利·罗斯受到了自从他担任新闻秘书以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压力，他接到电话，要他去到椭圆形办公室中，在“损害控制”方面助以一臂之力。到下午的中段时间，一份声明已准备好，该声明说，虽然“使用任何武器一直暗含着对该武器完全的占有”，但是在法律上，只有总统才能授权使用原子弹，而“现在还没有人获得过这样的授权”。声明由罗斯宣读，他看上去和听起来都已精疲力竭，眼窝沉陷，眼圈发黑，甚至比往常更厉害，声音也沙哑，他知道“损害”早已成为事实。

下午较晚的时候，从伦敦传来消息说，首相艾德礼将前来与“总统磋商”。《纽约时报》第二天早晨在头版登出消息的标题是“总统警告说，我们会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印度时报》登出的大字标题是“不不不”。

危机的气氛很快得到和解。第二天，12月1日星期五上午，杜鲁门在内阁会议与国会的领导人一起，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站在一大幅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地图前讲解在朝鲜发生的事件与欧洲的事件有何关联。史密斯报告说，俄国人刚刚举行完有50万人参加的军事演习，而且把西伯利亚的武装力量联合在单一的指挥下，这是“值得注意的”，非同寻常的举措。

那天很晚的时候，后来又在12月3日星期日，在五角大楼的作战室里举行了国务院和国防部联合召开的“危机会议”，共讨论了大约6个小时。

如艾奇逊记述的那样，总统的所有顾问们，不管是民事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都知道在朝鲜有些事情情况很糟糕，并非只是中国人猛攻。人们有不少问题，如关于麦克阿瑟的士气如何、对他的战略的极大担忧以及在实际战场上是否需要以一个“新手”来取代沃克将军。而且，事情很明显，与总统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这位远东战区司令官的再次保证性评论相反，麦克阿瑟确实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他发出的一项明确的命令，即在接近满洲边界的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部队。

但是没有发出改变战略的命令，没有“新手”替代沃克，也没有出现反对麦克阿瑟的声音。很可惜，总统是失策的，布莱德雷后来这样评论。他和马歇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都“使总统失望了”。艾奇逊后来说，在那几天至关重要的日子里，他们在这里没有抓住机会阻止在朝鲜的灾难继续发展。艾奇逊为他们的表现抱憾终身。杜鲁门从来不会对他们任何人有任何责备，但是艾奇逊说，杜鲁门本该得到更加好得多的辅佐。在过了将近20年后，艾奇逊写道：“我有一种不愉快的负罪感，即当初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我本人突出地也包括在内，给了他应该得到的那种服务。”

马修·李奇微还“清楚记得”，在12月3日那个沉闷的星期天，由于一小时接一小时在作战室里不停地就朝鲜的不祥形势进行讨论，他越来越感到不耐烦。

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花了很多时间进行交谈，谁也明显地不愿意对远东战区司令官发出直截了当的命令来纠正每况愈下的事态。然而这种责任和权力显然就存在于这间屋子里……

李奇微实在忍不住了，他大胆地说，必须立刻采取行动。这是他们对战场上的人和对上帝所负的义务，“对上帝我们必须担保这些人的生命”，不要再谈下去了，拿出行动来。艾奇逊后来写道，第一次“有人表达了每个人的想法——‘皇帝没有穿衣服’”。但是，坐在桌前的20个人，包括艾奇逊，以及在后面靠墙而坐的其他20多人，没有一个人说话，会议结束时一项决定也没有做。

后来，李奇微问范登堡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何不就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怎么做。范登堡回答说，麦克阿瑟不会服从这样的命令。

李奇微发作了，说：“你难道不会把不服从命令的司令官撤职吗？”但是，范登堡带着李奇微记得是既吃惊又困惑的表情，只是走开了。

第二天接着又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次是在国务院召开，迪安·腊斯克建议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会上又没有一个人愿意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正面临一场他从未经历过的、新闻界对他的责备。曾经长期吹捧他的《时代》周刊抨击他说，他要对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灾难之一负责。《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宣称，在朝鲜的“巨大的军事失误”表明麦克阿瑟“不再被公认为军事事务方面的最后权威了”。由于不习惯这些批评，麦克阿瑟的极度的虚荣心受到了损伤，他开始对新闻界发表他自己的言论。他否认他的战略促使了中国的入侵；说他不能打败新的敌人是由于华盛顿对他硬规定了一些“没有先例”的限制。

杜鲁门并不认为麦克阿瑟对11月攻势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是，他叹惜麦克阿瑟为失败开脱责任的做法以及他的言论可能在国外造成的损害，因为这些言论暗示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很久以后他写道：“我当时当地是应该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的。”

事实上，他命令所有的军事官员和外交官员，今后除了例行声明以外的所有声明在公布之前，都必须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并且……制止同报纸、杂志和其他宣传媒介就军事或外交政策直接交换意见”。该命令的日期是12月6日发布，它被广泛地和正确地看成是针对麦克阿瑟的。他仍被指望自由地表示他的看法——表示他的看法是他的责任——但是只能在政府的一些委

员会范围内。

杜鲁门没有解除这位远东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他后来解释说，因为他知道常胜将军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因为不希望让事情看来好像是麦克阿瑟因为失败而被解职。

如果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大胆说出看法并坚持要求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杜鲁门可能会怎样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无法作出回答。

在朝鲜的悲剧此时使一切都投上了阴影。如果麦克阿瑟遇到麻烦，那么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11月2日，在布莱尔大厦与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开过一次紧张的会议后，杜鲁门的情绪极为低落，他在当天深夜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的话，我们必须帮他渡过难关。这次会议是自柏林原子弹会议以来我所参加过的最严肃的一次。”

会议谈论的是撤退全部美军的事——毕竟是美国在朝鲜的敦刻尔克。如果中国人投入他们自己的空军力量，马歇尔甚至对这样一个行动是否会成功都没有把握。杜鲁门写道：“看起来情况糟透了。”

虽然形势的确很坏，但是并不存在恐慌的情绪，而这一点，如同总统周围的人后来证实的那样，是由于杜鲁门毫不畏缩的反应所致。在形势显得最阴暗那一时刻，艾奇逊说：“总统先生，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中国人把我们赶出朝鲜。”杜鲁门沉着地表示同意。当克莱门特·艾德礼到达华盛顿，实际上力其放弃远东保住欧洲的目的游说时，杜鲁门断然拒绝了。

在朝鲜，美军继续后撤并付出血的代价。如同报纸报道的那样，平壤沦入“大批推进的中国人手中”。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正向三八线进发。《生活》杂志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近，”“向我军发起猛攻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如果穿苏联的军装就会如同他们想要成为的那样真正是苏联的军队。”在华盛顿，到处都在谈论形势的“‘危急’”。参议员麦卡锡呼吁艾奇逊和马歇尔两人都下台，并且大谈要弹劾杜鲁门。但是，杜鲁门依然保持冷静和沉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来研究我国国家所面临的极度紧张不安的局势以及艾德礼、福摩萨、共产党中国、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等问题。我已为实现和平工作了5年零6个月，而现在看来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面对可能发生的无论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总统）认为，如果我们放弃朝鲜，那么南朝鲜人就会统统遭到杀害，而鉴于他们曾经帮我们英勇作战，而且我们为帮助他们也付出了这么多的事实，我们无法面对这一点（请阅总统与艾德礼会谈的官方记录）。我们可能会受到俄国人和中共从满洲起飞飞机的轰炸，这也许会摧毁我们新拥有的一切。他很担心。他不希望进入像这样的一种局面，然后承认我们挨揍了。他宁愿战斗到底。他开始就是这样想的……他要在此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处于逆境时不会抛弃我们

艾德礼强烈要求，在事先没有与英国政府商量并可能达成一个正式协议的情况下不能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对此，杜鲁门婉言拒绝了。他回答说，

他不会不与英国协商就使用原子弹，但另一方面也不会以书面的方式宣布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人说的话一点也不可靠的话，那么把它写在纸上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已被放弃。回到三八线，安排停战是目前最好的希望，为此目的，英国同意通过联合国予以帮助。在一定不扩大战争的政策上，杜鲁门和艾德礼的看法完全一致。

艾德礼于12月4日星期一到达华盛顿。关于第一天会议的情况，对新闻界几乎没有透露什么实质性内容。但是在第二天12月5日星期二结束时，作为对他施加压力要求公布一些情况的回答，查利·罗斯在白宫会见了大约40名记者。那是傍晚开始不久的时刻，罗斯与总统和国务卿一样，准备出席定于几小时后在宪法大厅开始的由玛格丽特·杜鲁门主演的一场音乐会。

由于受到他能讲多少的限制，罗斯花时间详细地谈了在“威廉斯堡号”游艇上为首相安排的午餐的情况，为了记者的利益，罗斯假装很有耐心地清楚地说明了诸如“有汁的”等词语。埃本·艾尔斯写道：“查利似乎情况良好……”

简要吹风完毕后，罗斯同意把他谈后的要点对弗兰克·布戈尔策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人员复述一遍。一台麦克风设置在他的桌子上，罗斯在等待时点燃一支烟，靠在他的椅子背上，微笑地看着他的秘书默特尔·伯格海姆。

“不要跟我咕味着说话。”她逗地说。

“你知道，我说话从来都很清楚。”他开玩笑地说，然后斜向一边地倒下来。

布戈尔策以为他在做滑稽表演。默特尔·伯格海姆抓起电话招呼其办公室是在下一层楼的华莱士·格雷厄姆医生，医生立即冲上楼来，但是查利·罗斯已经死于冠状动脉闭塞。

以后不久，杜鲁门独自坐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旁，以普通写法写悼词说：

我这位青年时期的朋友，在国家高级官位的职责如此出乎意料地降临到我身上时，他成了一位中流砥柱，现在走了。要收集个人的意见来称颂查利·罗斯并不容易，在他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我都认识他……

爱国和正直、荣誉和诚实、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追求是他行为的准则并指挥着他从少年时代起一生奋勇向前。他坚定沉稳地经历了一生而且完整无缺地经历了一生……

但是当杜鲁门沿着走廊走到记者们正在那里等着的新闻休息室时，他发现他无法宣读他写好的悼念词，刚念了一句，他的嗓音就变调了。

“唉，天啊，”他叹道，“这篇东西我不能读下去了，不管怎样你们大伙儿知道我是怎么感受的……”他转过身去，脸上挂满泪水，走向他的办公室去了。

罗斯65岁，比杜鲁门年轻一岁。据华莱士·格雷厄姆现在透露，在这之前，罗斯已经犯过两三次轻度的心脏病，但是他拒绝退休，宁愿继续工作。

由于担心罗斯的死讯会使玛格丽特过于烦乱，以致影响她上台表演，杜鲁门下命令让人们在音乐会结束前不要对她说这件事。对这个决定她后来很

生气。如果她当时知道这件事，她可能会说些什么以表示对罗斯的哀悼，或者也有可能改变她的全部节目。

总统和第一夫人陪伴首相走进宪法大厅，里面 3500 个位子座无虚席，坐满了“显赫的听众”，大厅显得更加堂皇。玛格丽特走上舞台，身穿粉红色的绸缎服装容光焕发，当她向总统包厢鞠躬时，杜鲁门微笑着向她鼓掌致意。没有哪一个总统像他那样如此频繁地出席在华盛顿举办的音乐会。他是宪法大厅的一位“常客”，有时，如果节目中包括了莫扎特或肖邦的作品，他会把乐谱也带去。然而，今天晚上，尽管台上演出的是他的“宝贝女儿”，杜鲁门还是显得极度的萎靡不振。

她唱的都是轻快的曲子，包括舒曼、舒伯特的选曲以及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个咏叹调。她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而且谢幕达 4 次之多。第二天，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发表赞美性的评论，说这是她“在她不长的演唱生涯中唱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一次”。她的莫扎特咏叹调唱得“清新悦耳”而且“毫不费力”，她的嗓音“动人”。

她本人也这样写道，“演出结束后，甚至对父亲来说，他也大喜过望，他拥抱我说，他从未听我唱得这么好。”

但是，观众中的其他一些人认为她的演出不够标准。“她那天晚上确实相当糟糕”，约翰·赫西回忆说，“她有一副好嗓子，但是有人即她的指导老师一定对她要求过急。”而《时代先驱报》的评论不是她父亲第二天早晨首先阅读的报纸。

早晨 5 点半在布莱尔大厦，杜鲁门打开了《华盛顿邮报》，在它第 2 部分第 12 版上看到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的一篇评论。评论的开头说，“女高音玛格丽特·杜鲁门昨晚在宪法大厅演唱”。

杜鲁门小姐是美国的一位奇才，她悦耳的嗓音音量很小，音质尚好。她在台上极有吸引力……然而，杜鲁门小姐无法唱得很好。她在大量的时间里唱得很平淡，昨晚甚至比过去几年来我们曾听到过的任何一次都更加平淡。在她的独唱音乐会过程中，几乎没有有什么时刻能使人感到轻松并相信她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有这种时刻那就是在她唱歌结束时。

杜鲁门小姐在我们听她唱过的这几年来中没有提高……她还不能以任何接近专业完美的水平唱歌……她在她上演的音乐中几乎什么也没表达出来。可是公众还是去听她的音乐会并且要付与听世界上最优秀歌唱家演唱一样多的门票费……对于一位如此真正吸引人的人物，记录她的这些令人不快的事实，是一件极其讨厌的本份工作。但是，只要杜鲁门小姐还像她三年来这样，或者像今晚这样唱下支，我们似乎也就无可求助了，除非对她表演的节目完全不予评论。

这是一种确实很尖刻的评论，虽然其中许多最严厉的批评以前已经表达过。而且至今已有一段时间内，瓦格纳歌剧演唱明星海伦·特劳贝尔曾经劝告玛格丽特不要匆忙决定自己的生涯，因为她的嗓音还太小而且缺乏经验。特劳贝尔很喜欢玛格丽特而且非常钦佩她的决心，说她至少还要学习 5 年。当特劳贝尔向总统强调这一看法并坚持说，玛格丽特能够自立而无须依赖他

的地位时，根据特劳贝尔后来的叙述，杜鲁门砰的一声在桌上捶了一拳表示坚决同意：“这正是我想说的。”

与其说是保罗·休姆所说的话，不如说是《华盛顿邮报》刊登这篇评论的时机更使杜鲁门大发雷霆。由于他处在紧张状态下以及他的悲痛，因此如果不是这篇评论，也会是另外的什么东西使他这样。

在布莱尔大厦的书房里，他在一本白宫便笺簿上，开始了那将成为他所有的“普通字体发作”中最出名的一次，他写了一封150个字的激昂万分的给保罗·休姆的信，他把信封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地址，贴上一张3美分的邮票，然后带着信到白宫去。

杜鲁门对一位年老的白宫收发员塞缪尔·米切尔问道，那天是不是一个并不特别愉快的日子，米切尔表示同意，杜鲁门建议他可以到外面去走走，顺便把一封信塞进街上的一个邮箱里。

如果查利·罗斯还在值班，他可能会及时制止发出这样一封信。一旦看见这篇评论，罗斯马上会明白杜鲁门的反应将会是什么。“查利·罗斯决不会让这封给保罗·休姆的信发出。”乔治·艾尔西说，“查利能对杜鲁门产生一种使他平静的微妙影响，一种调和的影响……他的作用远远多于一个新闻秘书。”

虽然休姆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决定不对总统的信做什么事，但信件显然被复印了出来，而且很快就全文出现在小的《华盛顿新闻晚报》的头版上：

休姆先生：我刚刚读过你对玛格丽特演唱会的卑鄙的评论，我因此而得出结论，你是“靠4个脓疮的报酬维持的有8个脓疮之辈”（杜鲁门这里引用的是他曾听史蒂夫·厄尔利用过的一句短语）。

在我看来你是一个灰心丧气的老头（休姆34岁），总是希望可能获得成功。当你在你为之效力的那份报纸的后面一部分写这样的废话时，它确实说明你是做错了，至少是你身上的4个脓疮又工作了。

我希望有一天会会你，一旦这样，你就需要一个新的鼻子了，许多牛排补补打青的眼圈，或者还需要一个保护下体的橡皮三角带！

（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即与你一起工作的那位先生，是个拾破烂者。我希望你将把这一声明当作比指责你的祖先更厉害的侮辱来接受。

此时，玛格丽特正在纳什维尔继续其旅行的途中，她拒绝承认这样的消息。她说她非常肯定，她的父亲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首先，他不会给休姆先生写信，我父亲不会有时间写信。”她补充说要得到白宫便条纸并不难，尽管她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一件事，而且签上他父亲的名字。

私下里杜鲁门承认他本不该写这封信，但是既然他写了，他就要固守这一点。他对玛格丽特说他有权利成为两个人，即总统和他本人。他告诉女儿，写这封信的是哈里·S·杜鲁门这个普通的人。

但是对于忠诚的白宫工作人员来说，这种把自己看作既是总统又是普通人的意向并不完全是一种美德或者必然是一种值得赞赏的性格。乔治·艾尔

西回忆说，杜鲁门忘记了国内其余的人可能不会进行这种区别，“当他表现得像个普通人哈里·S·杜鲁门而不是美国总统，写信痛骂一名音乐批评家或者把德鲁·皮尔逊称作婊子时，这会使他难堪，我想这还会使政府机关出丑，当然这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

早先发生过的令人感到难堪的感情爆发包括：1948年竞选期间他气愤地写信给伯纳德·巴鲁克，导致巴鲁克骂他是“野蛮、粗鲁和无知的人”。杜鲁门还在一封信中说他不会任命约翰·L·路易斯为捕狗贩子。前一年夏天在写给一位国会议员的信中，他称海军陆战队是“海军警察”，而且斥责陆战队员的“宣传机器与斯大林的几乎一模一样”，为此指控，他曾经公开道歉过。但是这些都比不上他这次在给休姆的信中所爆发出来的狂怒。

休姆本人对公开这封信深表遗憾，他告诉记者说，他完全同情总统：“我只能说，一个痛夫一位朋友并且承受着当前世界危机之负重的人，本该偶尔发泄一下情绪。”但是，这种姿态几乎不起什么减缓的作用。

《芝加哥论坛报》警告美国人民称，他们总统的“精神能力和情绪稳定性”有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纷纷寄给各报的编辑，表达对总统的“粗野行为”和缺乏自制力的震惊。在几百封寄往白宫的信中，有一封来自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党人，该信说：“这触及了要害，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总统甚至连一个绅士都不是。我们确实选择了一位‘凡人’总统——的确非常平凡。”也有一些来信建议杜鲁门可以开始对自己及其女儿别那么认真对待。有一个人来信这样说：“关于玛格丽特我是同情你的。我有4个孩子，个个都不会唱歌。”

虽然有一些来信是站在杜鲁门一边的，说他仅仅做了任何一个称职的、忠实慈爱的父亲在那种环境下都会做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属于少数。在白宫收到的信件和电报中，批评和赞成他的比例差不多为2比1，而且许多由母亲们和父亲们写来的信都认为这一事件只能与在朝鲜发生的悲剧联系起来看待，他们表达的根深蒂固的义愤都必然比杜鲁门曾经表露过的更加触动了

在诸如现在全国都处于异常的束缚和紧张状况的时候，你对你女儿音乐生涯的过分“关注”是完全可笑的。

你为什么不对休姆道歉，然后劝你的女儿放弃唱歌并从事于某种战时的工作，让公众将感激她在那里所作的努力呢？

你怎么能把你琐碎的私事放在1.6亿人的那些事情之前呢。我们的孩子在死亡，而你却把你幼稚的思想放在对你女儿的评论上。由于疏漏你向全世界显示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无聊小人而已。

杜鲁门实际看了多少这类信件无从知晓。但是，康涅狄格州纽坎南市威廉·班宁夫妇写的一封来信，他既看了也把它保存下来，随信寄来了一颗紫心勋章。

杜鲁门先生：

由于你对我们儿子在朝鲜丧命负有直接的责任，你也就可以把这枚徽章展示在你的战利品陈列室里，作为对你的历史性行为之一

的纪念。

此刻一个重大的遗憾就是你的女儿没有在那里受到像我们的儿子在朝鲜所受到的同样待遇。

杜鲁门把这封信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一直把它放在手边达好几年之久。

## 5

杜鲁门长期存在的信念是：如果你在生活中尽了全力，一直拼死命干，那么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至少会知道磨难是少不了的。但是他也非常相信运气和个性所起的作用，这些力量完全超越了努力和决心，虽然几乎没有哪位总统曾经这么辛苦地工作过，或者在遇到危机的时刻，像杜鲁门自朝鲜开战起那样尽心尽职，但是一再决定事态发展过程的是运气，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以及个性的巨大影响，而且从没有比在 1950 年 12 月底他经历的那段最黑暗时期中的情况更是这样的了。

圣诞节前两天，在汉城以北冰封的公路上，第 8 集团军指挥官沃尔顿·沃克将军乘坐的吉普车与南朝鲜一辆军用卡车相对撞，沃克将军身亡。麦克阿瑟请求由马修·李奇微替补沃克的空缺，杜鲁门立刻同意。李奇微立即动身离开华盛顿，并于圣诞节这天到达东京。在第二天他会见麦克阿瑟时，他被告知在前线需要靠他自己作出判断。“第 8 集团军是你的了，马特。你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干吧”。迪安·艾奇逊后来这样写道，麦克阿瑟“从来不讲更高明的话”。

这天下午，李奇微飞抵大邱，在此后的几星期内，情况发生了没有人曾经认为是可能的转变。很少有哪个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带来如此明显的变化。李奇微具有奥马尔·布莱德雷所说的“杰出的、有干劲的和毫不妥协的领导才能”，他恢复了第 8 集团军的斗志，并且像历史上很少几位指挥官那样扭转了战争的局面。

自从 11 月 28 日中国人发起猛攻以来，第 8 集团军已经后撤了差不多 300 英里，退到了正好在三八线下方的某一地点，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李奇微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后退。新闻界的报道称，联合国部队沿着经过汉城的两条主要道路像川流不息的河水那样地后撤。一名记者报道说：“溃退的韩国士兵是我见过的最悲惨的军队。”数以百万计的朝鲜难民也走这两条道路。一位美国军官的话被引用说：“当敌人并不在乎他们失去多少人时，你能怎么办呢？”汉城再次处于大火燃烧之中。李承晚总统和他的政府已经逃到釜山，李奇微放弃汉城撤到了远至乌山那个地方，这儿正好是 7 月美国第一批初出茅庐的军队投入战斗的地方，当时美军冒着盛夏酷暑战斗，现在却要忍着严寒奋战。

华盛顿的情绪依然低落。麦克阿瑟继续极力要求扩大战争，他再次主张对中国进行轰炸和封锁，并且使用蒋介石的军队。像以往那样，他的这些建议被否决了。他暗示说，除非改变政策，否则悲惨的结果就会接踵而来。

在经历了长期和艰苦的战役后，部队已疲惫不堪（麦克阿瑟报告称），错误地谴责他们的勇气和战斗本须的可耻宣传使他们更加



难受……他们的士气将成为对他们战场效率的严重威胁，除非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被要求以生命换取时间的政治基础是什么……

杜鲁门发现这样的文电“极其扰乱人心”。乔治·马歇尔评论说，当一个将军抱怨他的部队的士气低落时，也就已经到了这个将军看看他自己的士气如何的时候了。

中央情报局建议说，“在目前的条件下不可能在朝鲜长期地守住一个阵地”，最好的希望就是停战。麦克阿瑟被告知，他的首要考虑是他部队的安全和日本的防守。

（麦克阿瑟答复说）由于对在朝鲜的指挥部强加了种种特殊的限制和条件……那里的军事阵地是防守不住的。但是，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如此支配的话，它也能防守任何一段时间直到它被完全摧毁。

麦克阿瑟呼吁政府要认清中国人所强加的“战争状况”，然后对满洲和中国大陆的城市投掷 30 至 50 枚原子弹。

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对杜鲁门说，用核武器大规模摧毁中国的城市是影响朝鲜局势的唯一办法。但是，这一抉择从未被认真考虑过。用迪安·腊斯克的话说，杜鲁门直率地拒绝“沿这条道走下去”。

我记得仅有一次认真讨论过使用核武器的问题，（腊斯克后来写道）。当时我们正在考虑轰炸鸭绿江上的一座大坝。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亲自去了朝鲜，坐一架飞机从大坝上空飞过，把我军一颗最大能量的常规炸弹投在大坝上，只在大坝的表面炸出一个很小的伤痕。他返回华盛顿后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炸毁大坝。杜鲁门拒绝了。

杜鲁门仍然拒绝斥责麦克阿瑟，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以艾奇逊所认为的那种“无限的耐心”对待麦克阿瑟——太多的无限耐心。艾奇逊认为，现在已经断定这位将军已“固执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对于他的总司令的旨意是根本不忠的。1951 年 1 月 13 日，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一份语重心长的长文电报，先大度地称赞他的“杰出领导才能”，并再次强调在朝鲜作出高代价努力的巨大重要性，作为一种“显示我国或联合国都决不会接受侵略”的手段。但是，行动上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杜鲁门说。

某些步骤，其本身可能是完全正当的，而且多少有助于朝鲜的战役，但如因此而把西欧或日本卷入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就未必是有益的……

重要的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必须撤离朝鲜，就应该向全世界表明，这种行动是由军事的必要性强加于我们的，在侵略行为得到纠正之前，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我们将不承认撤离引起的后果。

杜鲁门此时已经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通告对价格和工资实行紧急管制，并且还把国际开支增加到 500 亿美元，是战争开始时那一年的国防费用预算的 4 倍多。他委派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负责新成立的“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工作，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高司令官，并且在 12 月 15 日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电视演讲，呼吁每一个公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把他的个人利益摆在一边”。所以在杜鲁门尽力避免扩大战争的同时，他显然正在准备打一场这样的战争。

如同马歇尔将军后来证实的那样：“我们正处于最低落的时刻。”

但是在 1 月 17 日星期三早晨，马歇尔打电话给杜鲁门请他阅读一篇乔·柯林斯将军刚带来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报告。柯林斯曾经飞到朝鲜去和李奇微进行会谈。马歇尔读着报告说：“第 8 集团军已处于良好状态。在李奇微的领导下，情况日益好转。”“士气令人十分满意……李奇微有信心，在下得不开始撤退之前，他能使之延迟二三个月的时间……总的来说，第 8 集团军现在严阵以待，而且准备严厉惩罚任何大规模的进攻。”

麦克阿瑟对局势的惨淡估价和关于厄运的预测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而且这种认识的影响是惊人的。这一天，当报告中的这些话在政府上层人员中传开时，人们记得，他们几乎听到了如释重负的叹息声。第 8 集团军的长途撤退——美国军事史上最长的撤退——已经结束了。1951 年 1 月 25 日，李奇微抵达后不到一个月，第 8 集团军就开始“滚滚向前”，如同李奇微所报告的那样。

李奇微以冲天的干劲和普通的常识开展他的工作。他首先考虑的是部队的基本需要——较好的伙食、更温暖的冬季服装以及改善了巡回陆军外科医院等。他强调要密切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较少依赖大路和公路，要更多地注意坚守高地，更好更多地使用空中力量和大炮进行惩罚性的打击。李奇微以他自己的信心、天生的活力，经常地和惹人注目地出现在前线，身穿准备进行战斗的服装，胸前绑着的两颗手雷，为部队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军队是李奇微的生命，就像在他之前曾经是他父亲的生命那样。他才思敏捷，朴实无华，时年 56 岁，身体非常健康，而且被誉为是二战空中袭击的先驱。但是李奇微也了解麦克阿瑟，他佩服麦克阿瑟的能力，而且知道他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李奇微既了解也赞成政府的政策，他不仅确实佩服杜鲁门，而且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有胆量的人。

如布莱德雷写的那样，在华盛顿，现在所有的倾向都是把目光“越过麦克阿瑟”而落在李奇微的更为可靠的军事判断上。到现在为止，华盛顿几乎完全依靠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提供情报，依赖于他自己的看法和战略。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对制订计划的影响已不复存在，战争的一个新阶段已经开始了。就军事行动而言，布莱德雷这样写道，麦克阿瑟已经“主要变成了一个人们不得不容忍的喜怒无常的傀儡”。

由于第 8 集团军重新发起攻势，无情地向前推进，到达汉江、仁川，接着是汉城，在 3 月 15 日夺回了这座首都城市所剩下的一切，华盛顿的士气大振。如艾奇逊所说，新的战地指挥官的出现是一件无可估量的重要事件。“在麦克阿瑟将军与五角大楼作战时，李奇微将军却正在与敌人作战。”

李奇微手下的部队只有 36.5 万人，而他面对的却是 48 万多人的敌军。但是，李奇微善于使用密集的炮火攻击，如他所说“我们火力的真正令人惊恐的力量”，再加上“我国已经造就的这支英勇的野战军的战斗”精神，使

得人员上的差距得到了弥补。到了3月底，第8集团军在重创中国人之后又回到了三八线。

然而，李奇微的进展似乎只是更加使麦克阿瑟感到苦恼。美国驻东京的大使威廉·西博尔德发现这位远东战区司令官“疲惫不堪，无精打采”。麦克阿瑟说，除非允许他大胆地打击敌人，否则他关于朝鲜统一的梦想是不能实现的。他抱怨“政策的空缺”。他现在建议不仅要对中国实施大规模攻击，而且要把朝鲜从满洲“分割开来”，也就是沿着整条鸭绿江设置有放射性废物、即“原子产品的副产品”的隔离地带。像以往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麦克阿瑟需要抢李奇微的“戏”已接近于可笑的地步。在2月末李奇微发动的一次新的攻势的前夜，麦克阿瑟飞到前线，站在十几名记者的面前，而李奇微却退居后台。麦克阿瑟宣称，他“刚刚命令恢复攻势”，而实际上他与这次行动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关系。

3月7日，麦克阿瑟在同记者谈话时哀叹，美国人在一场消耗战中被“野蛮屠杀”是不可避免的。到3月中旬，如杜鲁门所写，战斗的潮流“开始转向对我们有利”，杜鲁门在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顾问们都认为，直接呼吁中国进行和平会谈的时机已经到来，麦克阿瑟拒绝回答对这一问题的询问。相反，他大声反对对他的指挥权实行任何“进一步的军事限制”。

麦克阿瑟后来这样写道，对他来说，杜鲁门的神经似乎正处于一种破裂的时刻——“不仅是他的神经，而且是一个交战国的总统的具有更大威胁性的东西——他的精力。”

杜鲁门命令对停战建议进行认真的准备。3月21日，一份总统声明的草案交由联合国17个出兵朝鲜的国家审议批准。3月20日，参谋长们通知麦克阿瑟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给他送去一份文电其中有杜鲁门称之为声明中的“鲜肉章节”的内容，该文电似乎给了麦克阿瑟过去其他文电都没有的深刻印象，即确实不会与赤色中国发生竭尽全力的战争了。他的回答使华盛顿十分震动，以致许多人怀疑他可能失去理智了。过去，福雷斯特尔和路易斯·约翰逊也曾先后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轮到麦克阿瑟了。多年之后，布莱德雷推测，可能麦克阿瑟认识到，他对中国的战争将不会“绷断他的英明但又脆弱的意向”。

在朝鲜，3月24日星期六早晨（在华盛顿是23日星期五），麦克阿瑟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用一种人们认为只会激化局势的态度，试图抓住主动权。他向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他自己的炫耀实力的声明，这份声明实际上是一份最后通牒。他在声明的开头嘲笑赤色中国人缺乏工业实力，他们在朝鲜与受到“抑制”的联合国军队作战时在军事上的可怜表现。更严重的是，麦克阿瑟威胁说要扩大战争。

因此，敌人现在必须痛苦地认识到，美国已作出决定摆脱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地区的忍让做法，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那样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在声明的结尾中说，他个人“准备随时同中国司令官会晤以便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杜鲁门为停火建议所做的精心准备工作全都白费了。麦克阿瑟使他的论点站不住脚。后来麦克阿瑟驳回说他是“例行公报”的形式说这番话的。然而他自己的忠心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将军却称这是麦克阿瑟的一个大胆举动，以便阻止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阴谋之一得逞，这意思是指政府计划姑息中国。

黄昏后，消息传到了华盛顿。

艾奇逊写道，麦克阿瑟以他的“宣言”搞了一场大的破坏活动。对艾奇逊来说，这是“最严重的抗上行为”。对布莱德雷来说，这是“不能原谅的和无法挽回的行动”。

3月23日星期五，华盛顿晚上11点钟，艾奇逊、洛维特、腊斯克和另两名国务院资深官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卢修斯·巴特尔在乔治敦艾奇逊的家中开会，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之后。洛维特通常是个性格沉着冷静的人，却是所有人中最生气的。他说，麦克阿瑟必须立即被撤职。艾奇逊表示同意并引用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名言：“众神要摧毁一个人，首先要使他变成疯子。”

在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在楼上的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着麦克阿瑟的最后通牒文本。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在试图回忆当时的失望和气愤的心情时这样说：“在那之后我不能向中国人发出文电了。我准备一脚把他踢进中国的渤海里……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麦克阿瑟认为他是美国政府的地方总督，可以随意胡来。”

在他的《回忆录》中，杜鲁门写道，他现在明白必须对麦克阿瑟做些什么了。

作为联合国的一名军事司令官，这是他自行发表的一篇极其反常的声明。这种行为完全无视不要就对外政策发表任何声明的一切指令。这种行为公开违抗了我作为总统和总司令发布的命令。这是对根据宪法选出的总统的一种挑战。它也蔑视了联合国的政策……

麦克阿瑟的这一行为使我没有了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这种违抗上级的行为……

然而……麦克阿瑟并未被解职。杜鲁门没有说任何暗示他已作出这一决定的话。第二天，24日星期六，杜鲁门召集艾奇逊、洛维特和腊斯克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按艾奇逊的说法，杜鲁门看上去正处于一种“怀疑和有克制的怒气”两者兼而有之的心理状态。艾奇逊和洛维特尽管他们自己也都气愤，但考虑到国家的情绪和麦克阿瑟的巨大声望，担心会出现相反的公众反应。人们对战争已感到极其厌倦。麦克阿瑟正在许诺将取得胜利。如果总统对此进行挑战，就会像洛维特说的那样，似乎使自己站到了“罪恶的一边”。杜鲁门决定向麦克阿瑟发去一份有克制的谴责，这份电报由杜鲁门亲自口述，提醒麦克阿瑟要遵守他于12月6日发布的、禁止发表没有报请华盛顿审批的公开声明的命令。

杜鲁门极其谨慎地向前迈步，后来有些人称这是一种玩弄政治诡计的行为。其他人则把它看作是另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像柏林危机那样，当时他展示了自己作为总统的较好本性，不管他自己的感觉如何，拒不凭一时冲动或不负责任地行事。

与此同时，3月14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报告显示，总统的公众赞同率空前低下，仅为26%。到3月底，联合国秘书处关于战争的新统计数字令人吃惊地显示，联合国部队的伤亡总人数达228941人，其中最大部分是南朝鲜人，有168652人；其次为美国人，有57120人。

杜鲁门详细论述了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与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1862年秋季，林肯迫不得已解除了麦克莱伦对波托马克军的指挥权。杜鲁门曾派一名他的工作人员去国会图书馆查阅林肯—麦克莱伦危机的详细材料，然后给他写一个报告。如同杜鲁门所知道的那样，林肯与麦克莱伦之间的麻烦和他本人与麦克阿瑟之间的正好相反。林肯要麦克莱伦进攻，麦克莱伦却一再拒绝。但另一方面，当林肯发布命令时，麦克莱伦像麦克阿瑟一样，对之不予置理。麦克莱伦也像麦克阿瑟那样，偶尔对军事领域之外的一些事情发表政治言论。问林肯对此有何想法时，根据杜鲁门所喜爱的一个故事，林肯回答说，这使他想起一个人，当这个人的马蹶子并把一只脚伸进了马镫里时，这个人就对马说：“要是你继续踢下去，我可就要下马了。”

杜鲁门后来写道，林肯很有耐心，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但是他终于还是被迫解除了这位联邦军的主要司令官的职权。虽然我对与麦克阿瑟相处方面的这种困难进行了许多令人厌烦的思考，但是我认识到除了解除这位国家高级战地司令官的职权以外，我本人没有别的选择……

我对这个问题仔细考虑了好几天，终于在4月5日之前作出了决定，这时又一个事件发生了。

4月5日星期四在国会大厦，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乔·马丁起立发言，宣读了麦克阿瑟给他的一封信的文本，马丁说他感到有义务不再扣留这封信。

2月份，马丁在布鲁克林的一次讲话中要求在朝鲜使用蒋介石的军队，并谴责政府的失败主义政策。“我们在朝鲜到底是为了什么，战胜还是战败？……如果我们在朝鲜不是为了打赢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应该被指控为犯有谋杀美国孩子的罪行。”马丁曾把他的一份讲话稿寄给麦克阿瑟，征求他的“意见”。3月20日麦克阿瑟作了答复，而且实际上他说的那些话全都必定会激怒杜鲁门，这点马丁心里是很清楚的。由于麦克阿瑟的信中没有保密的规定，马丁决定把信公布于众。

麦克阿瑟写道，那位国会议员要求取得胜利是正确的，他希望看到来自福摩萨的中国部队加入反对共产主义的战斗也是正确的。真正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是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我们在这里（在亚洲）用武器进行欧洲的战斗，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末，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打赢，欧洲就极有可能避免战争却保持自由……胜利是没有什么可替代的”。

信立刻通过电报形式发出。在白宫，一位新的助理新闻秘书罗杰·塔比拿着自动收报机的简报朝椭圆形办公室奔去。他发现杜鲁门正安静地坐在那里阅读布莱德雷写的书《一个士兵的故事》，他看上去漠不关心。

“总统先生”，塔比说，“此人不仅违抗上级而且蛮横无理，我想他应该被撤职。”

杜鲁门再次看了一遍电报纸条说：“嗯，我想他们正在策划让将军失去他的工作。”

在五角大楼，布莱德雷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他回忆说：“我不知道杜鲁门早已下决心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我认为这有很大的可能性。”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事没有作出结论。

4月6日星期五，白宫的停车场上停满了政府官员的凯迪拉克轿车。总统召集马歇尔、布莱德雷、艾奇逊和哈里曼来开了一个小时的会。杜鲁门未说自己的意见，问与会者应该做什么。马歇尔极力主张要谨慎小心，艾奇逊表示赞同。在艾奇逊看来，与其说这是个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个应该怎么做的问题。

艾奇逊回忆说，解脱困境的办法只能是撤掉这位将军的所有指挥权，免去他的远东职务。由此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但是，只要总统根据他所有文武顾问经过仔细考虑的建议行事并得到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切困难都将被克服。万一他超过了他们或者看起来认为他们是理当如此或者表现急躁，那样将遗害无穷。

艾奇逊告诉杜鲁门：“如果你撤了麦克阿瑟的职，你将经历你政府的一场最大的战斗。”

哈里曼提醒总统说，麦克阿瑟成为一个问题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现在应立即被解职。

“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公布我的决定。”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星期五下午，我将命令这4个人再次开会，研究各个方面的局势。”

杜鲁门的自我克制力堪称典范。麦克阿瑟在自传中叙述说，他读过杜鲁门写给音乐批评家的信，他如何看到自己“处在某种局势的顶点，这会使我成为杜鲁门不受控制的激情的下一个牺牲品”。但是那些接近杜鲁门的人知道“不受控制的激情”从来都不成其为问题。在这种最紧张时刻的压力下，他的每一个行动又关连到这么多他自身的处境和政治福利，他表现得极为沉着稳定。在以后的好几天中，一种不自然的平静气氛似乎笼罩着白宫。乔·马丁回忆道，“风停了，表面平静下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杜鲁门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在知道发生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巴克利无可奈何地断定，妥协已不可能办到——麦克阿瑟不得不下台了。当杜鲁门召集大法官文森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到椭圆形办公室时，文森像马歇尔一样提出要谨慎行事，雷伯恩说了什么则无人知晓。

星期六，杜鲁门再次会见马歇尔、艾奇逊、布莱德雷和哈里曼，结果又一无所获。马歇尔和布莱德雷仍然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根据布莱德雷后来的说法，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犹豫不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个人将受到什么样的谴责——对于这样两个即将结束漫长而又杰出的职业生涯的人来说，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前一年的秋天，参议院在确认马歇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职务的剧烈辩论中，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人威廉·E·詹纳称马歇尔是“叛徒的出面人物”和“逼真的谎言”。布莱德雷写道，现在解雇麦克阿瑟，肯定会引起那些艾奇逊称之为“政治原始人”对马歇尔的更多如此野蛮的攻击。布莱德雷本人也难逃同样的遭遇。

4月9日星期一，这4个人再次与总统会晤，这次是在布莱尔大厦。但

是现在形势已有改变。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前一天的下午开过会并得出结论说：从军事观点出发，麦克阿瑟应该被解职。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布莱德雷的助理切斯特·克利夫顿上校后来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对于麦克阿瑟已经清醒过来……而且是根据军事的理由而不是根据政治的理由。

他们不满的一部分是和他的一些战略和战术决定有关系的，诸如在朝鲜兵分两路的做法，以及在充分掌握敌方战场情报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动他的11月攻势等等……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麦克阿瑟对他本人已丧失信心，而且开始对他的战场指挥官们和部队丧失信心。在书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一点更加严重地破坏了一个司令官的战斗能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就完了……

当他犯下违抗总司令的命令——关于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最后错误时，他们毫无困难地做出了应该怎么办决定。

这时在布莱尔大厦，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哈里曼全都同意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当每一个人都发言完毕后，杜鲁门才第一次说他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已做出了决定。他叫布莱德雷去准备必要的文件。

“白宫里很少有哪件事情被笼罩在这样的秘密之中。”《华盛顿邮报》4月10日星期二早晨的报道这样说，“对有关麦克阿瑟的任何问题的回答都是‘无可奉告’。”

在国会山上，一位身份不明的“国会官员”告诉《邮报》记者，总统已经决定反对撤换远东战区司令官。众议员马丁说，他赞成让麦克阿瑟回国向国会汇报的做法。在东京，根据合众社的一则电讯，麦克阿瑟的一名参谋人员说，将军和陆军部长佩斯之间的会谈“在诚挚的气氛中顺利进行”——这似乎驳斥了关于佩斯是被派去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谣言。《邮报》的头版上刊登了一幅照片显示：在东京机场，麦克阿瑟微笑着迎接刚刚到达的佩斯，后者甚至更加喜气洋洋。

与此同时，《邮报》的一篇社论对麦克阿瑟一再力图“窃取外交大权”的做法在美国人民中只引起了几乎不比涟漪更大的反响这一点表示担忧，并且责备政府对此问题“装聋作哑”。公民的最高权力处在危急中，总统应该予以紧紧的控制。“任何再次断言总统作为总司令和国家对外政策创始人的权威的说法将会使他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对于这一点我们觉得是有把握的。这是他们正在大声疾呼要求得到的东西，即领导……”

这天早晨的报纸上刊登了赫布·布洛克画的一幅漫画：“哈里·杜鲁门上尉”躺在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行军床上，害怕得全身发抖，他惊恐万分，不敢向五星上将挑战。

在早晨的工作人员例会结束时，总统平静地宣布：“这样你们就不用再去阅读报纸上有关此事的报道了。”即他已决定解除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杜鲁门补充说，他确信麦克阿瑟已要求被解职。

他也确信自己面临着一场政治风暴，“一场巨大的公众骚动”，它不同

于他政治生涯中的任何一次。从办公室窗外传来阵阵施工建设的噪音，声音太大，以至于几个随从人员不得不使劲地听才能听见他的讲话。

这天下午3点15分，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哈里曼来总统办公室汇报工作，带来了草拟好的一些命令文本。杜鲁门审阅后从比尔·哈西特那里借来一支钢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些命令将通过国务院的渠道发送给驻朝鲜的大使穆乔，再由他转交给现在也在朝鲜与李奇微一起呆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里的陆军部长佩斯。佩斯将立即返回东京并亲自把命令交给麦克阿瑟——设计整个这一套传递方式是为了让这位将军免受通过正规军队通讯的直接传递给他带来的窘境。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到那时为止都是保密的而且执行得很成功，但是要紧的是在最后关键性的几小时内不要走漏风声，如同杜鲁门对他的新任新闻秘书乔·肖特讲清楚的那样。肖特原为《巴尔的摩太阳报》驻白宫的记者，后被杜鲁门挑选来接替查利·罗斯。关于麦克阿瑟的轰动消息一直要到第二天早晨才予宣布。

后来的几个小时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一直到傍晚开始时杜鲁门重返布莱尔大厦之后。当哈里曼、布莱德雷、腊斯克和六七名杜鲁门的工作人员正在内阁厅里忙着准备免职的材料时，乔·肖特得到消息说，《芝加哥论坛报》驻五角大楼的记者劳埃德·诺曼正在询问将在东京发生的据说是“重大辞职”事件。这暗示麦克阿瑟由于某种原因已经获悉杜鲁门的决定，而且准备在杜鲁门可能免去他的职务之前就提出辞职。

大约9点钟时，布莱德雷给杜鲁门打电话，报告说消息已经泄露，杜鲁门一面说要用点时间考虑一下，一面让布莱德雷把马歇尔和艾奇逊找来。听说马歇尔与夫人出去看电影了；艾奇逊则立即赶到白宫，像腊斯克和乔治·艾尔西一样，他认为由于一个记者的询问就草率行事将会是一种错误。艾奇逊如同他从一开始就采取的态度那样，再次强调免除这位将军职务的方法的重要性。在这传说传开之前就通知到他本人，这才是公正恰当的做法。

哈里曼、查利·墨菲、马特·康内利、乔·肖特和罗杰·培比争辩说，一定不能允许麦克阿瑟“抢在”总统“之前行动”。真相必须出自白宫而不是东京，而且那天晚上就应公布。

艾尔西认为这样一个决定看来好像是白宫方面有些恐慌，这对总统是不适当的而且有失他的尊严。但是如同艾尔西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恐慌。”

令人担心的是麦克阿瑟可能已听见风声，而且可能作出他自己的某种哗众取宠的姿态。谣言四处飞扬，说什么他正打算在世界范围的广播网络中亮相……而实际上，恕我直言，恐怕白宫确实害怕麦克阿瑟可能抢先行动，因而感到恐慌。

与此同时，关于总统命令的传送有些地方显然出了故障，未曾听到穆乔大使关于他们接到命令的消息。

如果那天晚上马歇尔或者查利·罗斯在场，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杜鲁门记得布莱德雷很晚时“匆匆赶到”布莱尔大厦，实际上当时刚刚过10点，伴随布莱德雷来的有哈里曼、腊斯克、乔·肖特和马特·康内利。



到 10 点半钟，杜鲁门作出了决定。

肖特给在白宫的罗杰·塔比打电话，要他把所有的命令——那些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命令以及那些任命马修·李奇微接任其职务的命令——尽快用油印机印出来。

据报道，杜鲁门说过：“他不会被允许对我辞职。他将被解除职务！”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干巴巴地记录着：“讨论了形势，我下令立即发电并直接发给麦克阿瑟。”

迪安·艾奇逊在其乔治敦家中一层的一间小书房里，开始打电话给汤姆·康纳利、莱斯·比弗尔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情。在国务院，腊斯克花费了长长的一个晚上的时间，打电话给所有出兵朝鲜的国家的国家的大使。新西兰的大使听完电话后的反应是：“哼，这个小个子终于这样干了，他不会不干的。”

在白宫，电话交换台的接线员们开始打电话到记者们家里，通知他们上午一点钟将召开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4月11日星期三上午一点，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室里，新闻秘书肖特分发了油印的命令稿。

到那时，杜鲁门已在布莱尔大厦二楼他的卧室中熟睡。

麦克阿瑟将军听说他被召回的消息时正在东京吃午餐，这时，他的妻子递给他一个棕色的通信部队的信封。

麦克阿瑟在几小时后私下说，如果杜鲁门只要让他知道他的感觉如何，他会“毫无困难”地退休。《论坛报》记者的秘密消息从何而来始终没有弄清楚。麦克阿瑟后来证实他从未流露过想要辞职的任何想法。

根据麦克阿瑟曾经从一位未被提到姓名但是“著名的”医学界权威人士那里听说的，杜鲁门因患恶性高血压症而导致“精神不稳定”，“其特征是昏乱糊涂，思维混乱”。麦克阿瑟预言：杜鲁门会在6个月后死去。

1951年4月11日，《华盛顿邮报》早版的通栏大标题是：

### 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

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报纸也都登出了大同小异的标题。反响是巨大的，美国人民为之大哗。杜鲁门曾料到他将会不得不面临一场风暴，但是不管他的预感是如何的阴暗，他都不可能估量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人经历过这种事，也没有人可能经历过这种事。在这一天内一位南方的参议员描述说他所在地区的人民“几乎是歇斯底里的”。这位参议员本人也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国会山上的其他几十个人和许许多多的美国人也是这样。

有人称国会山上的这一天是“现代……最苦难的日子之一”。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包括塔夫脱参议员，愤怒地谈到要弹劾总统。早晨9点半，全体共和党领导人在乔·马丁的办公室开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紧急会议。会后，马丁对记者们谈到“弹劾”问题，重音是在“弹劾”一词表示多数的词尾：“我们可能要弹劾1次或者50次。”国会已安排妥当对总统的战争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调查。马丁宣布将会邀请麦克阿瑟将军到国会向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的看法。

参议员尼克松要求立即让麦克阿瑟官复原职。参议员詹纳宣称，国家“被掌握在”受俄国间谍指挥的“一个秘密小集团的手中”，在参议院的议员席上，詹纳叫嚷道：“我们唯一的抉择就是弹劾杜鲁门总统，并且查明如此巧

妙地引导我国沿着毁灭之路走下去的那个秘密的无形的政府是谁的问题。”他的话引起了满堂掌声。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名新手民主党人、参议员罗伯特·克尔站起来为总统辩护。他说，如果共和党人认为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执行麦克阿瑟将军的政策，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赤色中国宣战。否则，共和党对麦克阿瑟的支持就是一种嘲弄。汤姆·康纳利提醒他的同僚们说，美国人历来坚持文官政府控制军事的做法。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即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马萨诸塞州的索顿斯特和洛奇发言表示同意。

但是这些声音都被淹没在共和党人愤怒的风暴中。将军的被撤职是“另一次珍珠港事件”，是“俄国共产党人的盛大节日”。麦克阿瑟被解职是“因为他讲了真话”。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P·凯姆说：“上帝救救美国吧。”

在纽约 2000 名码头工人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抗议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巴尔的摩一妇女团体宣布计划组织一次向华盛顿进军的游行，以声援这位将军。在其他一些地方，愤怒的爱国者升起半旗或者倒挂着旗帜。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并把一封封狂怒的信件和电报投向华盛顿。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布里埃尔，杜鲁门的模拟人像被焚毁。在休斯敦，一位新教牧师在宣读一封致白宫的电报时，由于太气愤而死于心脏病。

佛罗里达、密歇根、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 4 个州的州立法机关投票通过决议谴责总统的行动，而洛杉矶市参议会则体会一天“对麦克阿瑟将军被政治谋杀表示哀思”。在芝加哥，《论坛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呼吁立即开始弹劾程序：

杜鲁门总统必须受到弹劾和定罪，他慌忙而又报复性地免除麦克阿瑟将军职务的做法，使他的一系列行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行动显示出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不胜任他的崇高职务……美国民族从未陷入过更大的危险，领导它的竟是一个受歹徒包围的傻瓜……

“弹劾这个低能儿”……“控告这个来自堪萨斯城的小选区政客的愚蠢行为”……“建议你在布莱尔大厦期待另一片嘘声”，不断涌入华盛顿的那些典型的电报读起来就是这样的。在参众两院办公大楼的过厅里，“西部联盟”的通讯员用容量的筐子来传送邮件。根据一项记录，在杜鲁门宣布决定后的最初 48 小时内，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一共收到 44358 份电报，除了 334 份电报是谴责杜鲁门或支持麦克阿瑟的以外，大部分都是要求杜鲁门立即离职。

共和党人欣喜若狂。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宣称：“这是共和党曾经得到过的最大的意外收入。”

一些著名的自由派人士——埃莉诺·罗斯福、沃尔特·鲁瑟、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公开站出来支持杜鲁门。早在 10 月份道格拉斯就告诉杜鲁门，麦克阿瑟应该被免职，他这时写道：“在你今后的日子里，你可能需要得到你所有朋友的力量。我写这张便条就是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和将来都会站在你一边……我知道你是对的。”

虽然至今最大的喧嚷声是来自国内那些对杜鲁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的

人，但是在那些认为他是正确的、基本原则正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当中并没有因此而缺乏信心甚至热情。而且对许多这些同样的人来说，如何看待哈里·杜鲁门个人并不重要。

“如果说杜鲁门是个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无知的人，曾经在男子服饰用品店干过活，是我们最糟糕的城市头目之一的一个门徒，后来又偶然地当上了总统，这一点区别也没有。”牧师邓肯·E·利特菲尔德博士在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喷泉街浸礼会教堂的一次布道中说。

如果说麦克阿瑟这个人具有惊人的个性、巨大的成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伟大的军事学院，有着非凡的经历而且被证明是日本人民杰出的管理者，或者说我们喜欢他超过了我们喜欢哈里·S·杜鲁门，这也没有任何区别。原则，原则，必须永远高于个性而且必须在权宜之计之上。我们这里承认的原则……（是）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必须通过总统以及在他领导下组建起来的各个部门并且通过议会而来。任何通过这些手段来自那个人的决定都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发表这一决定的人的个性而不予置理，也不能因为我们有一个攻无不克的英雄而被搁置一旁……

另一封写给总统的支持信来自《华盛顿邮报》的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

在整个欧洲，麦克阿瑟的被免职被当作值得欢迎的消息来迎接。伦敦《旗帜晚报》宣称：“麦克被解雇。”在《纽约人》杂志上，记者珍妮特·弗兰纳报道，法国人“坚决拥护杜鲁门”。在巴黎连一份不支持杜鲁门决定的报纸都没有。

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国内报纸社论意见显示的分量，尽管麦考密克、赫斯特、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报纸进行了恶毒攻击，或者在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上重新出现了对麦克阿瑟的吹捧赞扬。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纽约邮报》、《巴尔的摩太阳报》、《亚特兰大新闻日报》、《迈阿密每日新闻》、《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密尔沃基新闻报》、《圣路易斯邮报》、《丹佛邮报》、《西雅图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报纸都支持杜鲁门的决定。重要的是，在这些报纸的名单中还包括这样一些坚定的共和党报纸，如《得梅因纪事论坛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它们特意赞扬了杜鲁门及其性格所造成的力量。

最明显的事实是麦克阿瑟将军被免职实际上是他咎由自取。在高级政策方面就像在战时那样，指挥权是不容分散的……麦克阿瑟将军是一名有极高才能的战士……失去他的服役和才干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是对国家的一场悲剧，但是这完全是他一手造成的局势，而且确实让总统没有任何别的选择。由于杜鲁门先生在紧急状态所特有的那些大胆而果断的手段之一，一个非常困难和危险的问题已经得以应付，而且只能这样应付而别无他法。

在报纸的“今天和明天”栏目里，沃尔特·李普曼赞扬杜鲁门和马歇尔两人都“尽了自己的职责”。根据《星期六评论》的说法，在营业的报纸中，

私下里都站在杜鲁门一边，其差数为 6 比 1，虽然多数记者认为，对于免职一事，他处理的方式很差。

然而，国内的喧闹、愤怒、对杜鲁门的嘈杂的敌意以及对麦克阿瑟的奉承仍在继续，而且当麦克阿瑟凯旋时发展得更加厉害。自从南北战争以来，还没有哪件事情在国内引起过这么大的政治热情。

喧闹的实质是对朝鲜战争的愤怒和受挫感。没有人喜欢这场战争。参议员惠里开始称它为“杜鲁门的战争”，而这名称也就流行开了。人们对杜鲁门的战争感到厌恶、灰心丧气，而且对一场“有限战争”的谈论感到有点儿困惑。美国打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要达到一种僵持局面，而且付出的血的代价已经变得骇人听闻。如果这是一种联合行动，那么美国一方似乎承受着负担中沉重的那一部分。根据最新统计的数字，已有 1 万多名美国士兵阵亡，另有 5 万人在战斗中受伤或失踪。国家希望这场战争结束。麦克阿瑟至少提出了胜利。

在大部分国民的心中，麦克阿瑟是个光辉的形象、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公认的美国英雄和杰出英俊的将军，他领导美国军队在所有最重大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在那些战争中从来没有任何别的目的而只是完全彻底的胜利。“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大人物的化身……而哈里·杜鲁门几乎只是个有点专业特长的小人物。”《时代》周刊这样写道。这种对国内情绪的评价显然有失于公道，但它仍然适用于大部分国民。就杜鲁门这样一个成就不大及这种“身材”的人而言，他居然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职，他这种做法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一种侮辱性的报复行为，更不用说是个判断失误的问题了。这件事发生的方式似乎也不对了。据说宣布撤职的时间是精心安排好的，以便可以让一些晨报登载消息，并“趁共和党人还在睡觉时就制服他们”。谣言还把命令的宣布归因于杜鲁门的又一次深夜发脾气或酗酒。在密尔沃基的一次讲话中，乔·麦卡锡称杜鲁门为“狗崽子”，指控他的决定受到了“波旁烈性威士忌酒和法国的一种甜酒”的影响。甚至对比麦卡锡和共和党其他大声喧嚷的右翼分子更为公正的共和党人来说，就像对许多民主党人那样，这似乎是一种不体面的和没有必要刻薄地断送一个人的伟大生涯的方式。“小个子哈里·杜鲁门”以为他是谁呢？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旧时崇拜者们推测这位“政治大师”可能会如何不同地处理这些事情——也许会让麦克阿瑟去当驻英国的大使。

但是在更大的方面对于许多人来说，麦克阿瑟的撤职是近年来那些发生创伤性转变的事件中的又一桩——像中国的落入共产主义控制，像俄国原子弹的出现——这似乎是世界处于混乱状态的一个信号，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理解而且越来越危险。

根据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国内 69% 的公众舆论支持麦克阿瑟将军。而全国以及几乎所有的共和党领导人都强烈支持杜鲁门去年 6 月决定出兵朝鲜的事实，11 月最高军事战略家麦克阿瑟指挥了美军历史上最惨痛的溃退之一的事实，或者国内仅有 30% 的公众表示愿意与中国交战的事实，全都被忽略了。

杜鲁门直到 4 月 20 日才在一次大的公共场合露面，这时麦克阿瑟已经回国，而且已在国会面前亮相。这天杜鲁门来到格里菲思体育馆为一场球赛的开赛仪式掷出第一个球，他一露面就被观众大喝倒彩。这是一件自 1931 年赫伯特·胡佛总统出席一次球赛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除了在4月11日、即宣布麦克阿瑟被免职的第二天晚上，他从白宫发表过一次简短的广播讲话以外，杜鲁门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他对全国说，麦克阿瑟将军是“我们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家中的一员”，但是世界和平事业远比任何单个的个人更加重要。

远东战区指挥部的变换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政策有任何变化。我们将继续有魄力和有决心地在朝鲜战斗下去……新的司令官，马修·李奇微中将早就显示出他具有执行这项任务所需要的非凡的军事领导才能。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将随时为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而进行谈判。但是，我们决不会采取姑息迁就的做法。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真正的和平……

我们不希望扩大冲突……

他继续按照他的日程安排进行活动好像一切如常。4月13日，他充满信心地微笑着拍了一张照片，开始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生涯的第7个年头。有一天晚上，他和贝丝去了一趟剧院。另一天晚上，他们看了奥芬巴赫拍的一部英国电影《霍夫曼的故事》。

4月17日星期二，麦克阿瑟乘飞机在旧金山着陆，受到了发狂的欢迎。他离开故土已有14年了。直到现在，美国人民还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他，向他欢呼，并欢迎这位英雄归来，有1万人到旧金山机场迎接他。从机场到城里的路上挤满了人，汽车车队足足开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他下榻的宾馆。麦克阿瑟对向他欢呼的人群说道：“我所有的唯一的政治包含在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一句简单的话当中，即上帝保佑美国。”

第二天4月18日，杜鲁门在这场危机开始以来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会见记者时，拒绝回答任何有关这件事的问题，破灭了他们的一切期望。按照日程安排，4月19日星期四杜鲁门应前往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讲话，但这一天麦克阿瑟正好要去国会演讲，杜鲁门因此而取消了他的讲话活动，因为他感觉那天应该是这个将军的日子，他不希望有任何事情来损坏它。

杜鲁门仅仅在很少几封个人信件中涉及到这件事，而且看法简明扼要，没有任何歉意也不做详细解释。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写道：“我很遗憾不得不了与亚洲的这个大人物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但这是他要求这样干的，而我不得不成全他。”

杜鲁门对他的工作人员和内阁说，也许在六七周内，为此会有“痛责”。但是最终人们会醒悟过来，包括越来越多的共和党政治家们会日益怀疑全力支持那位将军是否合理。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阿瑟将会逐步降为凡人。与此同时，杜鲁门能够经得住痛斥，因为他知道，从长远来看，将会判断出他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美国人民将会理解我做了我不得不做的事”。

为了给低落的情绪打气，有人在白宫工作人员中散发一份模拟的“欢迎麦克阿瑟将军到华盛顿的日程”：

12点30分	从装有通气管的潜水艇涉水上岸
12点31分	海军乐队演奏乐曲《树顶上的麻雀》和《你死我高兴，

你这个流氓》

12 点 40 分	麦克阿瑟将军骑在大象上行进到国会大厦去
12 点 47 分	沃恩将军在中央大厅被斩首
1 点 00 分	麦克阿瑟对国会议员发表演讲
1 点 30—49 分	为麦克阿瑟将军鼓掌欢迎
1 点 50 分	焚烧宪法
1 点 55 分	私刑处死国务卿艾奇逊
2 点 00 分	鸣原子弹礼炮 21 响
2 点 30 分	300 名裸体的美国革命女儿从华盛顿纪念碑旁跳跃前进
3 点 00 分	在纪念碑的场地上供应大筐午餐

事实上，1.2 万人在国家机场一直等候到午夜之后麦克阿瑟的飞机才降落，人们热烈欢呼欢迎他的到来。

国防部长马歇尔、布莱德雷将军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迎接他，因为杜鲁门认为这样干就足够合适的了，但是沃恩少将也在其中，他的在场可能是杜鲁门本人的开个玩笑的主意。

4 月 19 日，星期四中午 12 点 31 分，在电视摄影灯的一片强光照耀下，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走进众议院大厅，沿着杜鲁门自 1945 年以来如此经常走过的那条通道走来，拥挤的大厅内响起疯狂的鼓掌欢呼声，这个热烈的、真正戏剧性的时刻过去是极少有人见到过的。

总统内阁的官员、最高法院的成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都没有到场。

麦克阿瑟穿一件“艾森豪威尔”式短夹克军服，不佩带任何装饰，肩上表明 5 星军衔的银环闪闪发光，他停下来与副总统巴克利握了握手，然后走上讲坛。他的脸像“一副难以辨认的面具”。在大厅里完全静下来之后，他才开始讲话：

“我对你们讲话并不带有人们在垂暮之年的积怨和辛酸之情，我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国效劳。”

大厅里又响起了热烈的鼓掌欢呼声，低沉的颤动的噪音不断响着，演讲者完全控制了这一时刻。

麦克阿瑟断言，从军事观点来看，出兵干涉以支持大韩民国的决定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要求增援时，他们却对他说这是不能办到的事。他说，他已“明确表示过”，如果不允许他摧毁鸭绿江以北的敌人的基地，如果不允许他使用 80 万福摩萨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允许他封锁中国的沿海地区，那么“从军事观点来看，指挥职务就妨碍了胜利……”。而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胜利，怎么可能是另外的什么呢？“在战争中，确实，”他重复他喜欢的那个口号说：“胜利是不可能有什么替代的。有一些人为了各种各样理由对赤色中国姑息让步。他们不了解历史的明确教训，因为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诫我们姑息迁就只能导致新的流血更多的战争。”

他的讲话既有挑衅性又有对抗性。继之而来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回荡着的掌声和喝彩声，在 34 分钟内共有 30 次。他一点也没有谈到他曾建议过的轰炸中国工业中心的问题。虽然他说要运用“一切可能得到的手段”去获得胜利，但却没有提到他想使用原子弹、或者沿着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带的愿望。他说他的一些观点受到过严厉批评。然而他断言，他的观点是与参谋

长联席会议“完全共享的”——这个断言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却引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大厅四周座位上的共和党人及大部分观众从他们的座位上跳起来，欢呼跺脚持续了将近一分钟，然后他才能重新开始讲话。

对于那些宣称美国的军事实力不足以对抗不只一条战线敌人的人，麦克阿瑟说，他想象不出还有比这表达出更多的失败主义的了。“你不可能对亚洲的共产主义采取绥靖政策，或向它投降却同时并不破坏我们阻挡它在欧洲得逞的努力。”把这场战争限制为中国人对朝鲜的侵略，只是遵循一条“长期犹豫不决”的道路而已。

“我的士兵们向我问道，为什么把军事优势交让给战场上的敌人？”他停顿住，然后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轻轻说，“我无言以对。”

创纪录的 3000 万人收看了电视，表演是出色的。对丰富多采的噪音的利用和对时机的掌握超过了多数的演员。这种演讲家的风格在国会中已很长时间没听到过了，一位电视评论家写到它使人回想起“去年的剧场”，它使大部分众多的观众为之神魂颠倒。举国上下，机关和工厂停止上班，这样人们可以收看电视。酒馆和酒吧间里挤满了人。上学的孩子们或在教室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或被集合在会场或餐厅里收听广播。不管他们对人们激动是为了什么这一点有什么看法，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还在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加入陆军时，我少年时代的全部希望和梦想便实现了。”麦克阿瑟说，当他开始讲他最后几句有名的话，即这篇演讲为此而被人记住的激动人心的、伤感的、模棱两可的结论时，他降低了他的嗓音。

希望和梦想早已消失殆尽。但是我仍然记得那时最流行的军营歌谣之一的迭句，它极为自豪地宣称：“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而像那首歌谣中的老兵一样，作为一名上帝使之明白职责何在的力图尽心尽职的老兵，现在结束我的军事生涯，只是悄然隐去。

再见。

大厅里刮起一阵“感情的飓风”。无数双手伸向了他。听众中许多人哭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了上帝的讲话，是具有肉体的上帝，是上帝的声音！”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一个过去的传教士杜威·肖特呼喊道。对乔·马丁来说这是他当国会议员 35 年来所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高潮”时刻。马丁知道舞台效果是国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从未有过能与此匹敌的事情。

这是麦克阿瑟最炫耀的时刻，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奉承的逐渐增强，开始时是那天下午穿过华盛顿的胜利游行，第二天在纽约举行的雷鸣似的抛彩带游行则达到了高潮，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据报道在纽约有 750 万人涌上街头，比 1945 年欢迎艾森豪威尔的人还多，甚至超过 1927 年对飞行员林德伯格的几乎是传奇式的欢迎。《时代》周刊这样评论道：这个情景是“令人敬畏的”。“每个人都在欢呼……一个敢于冒风险作出断言的人，这个人那些犹疑不决和持否定态度的人相比似乎受到了欢迎。”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他欢呼。在纽约游行路线经过的一些地方，当麦克阿瑟的敞篷汽车经过时那里的人们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注视着，决无高兴可言。在华盛顿，一名参议员曾对一名记者吐露说，在听麦克

阿瑟讲话时，他感到以前从来没有为国家更加担忧过：“我真诚地感觉到，如果他的演讲再长一些，可能会导致一场对白宫的进军。”甚至《时代》周刊也表明，虽然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可能认为麦克阿瑟是上帝的恩赐，但是准备赞同他的提议的人却几乎没有。

杜鲁门没有听麦克阿瑟的演讲，也没有看电视。他像往常一样，在每星期四的那个时间内把他的时间消磨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的办公桌旁会见迪安·艾奇逊，之后他便返回布莱大厦吃午饭并睡了一会儿午睡。然而，在某一时刻，他确实也阅读了麦克阿瑟所讲的话。他私下里发表评论说，他认为那是“一堆该死的废话。”

如同杜鲁门预料到的那样，喧嚣开始平息下来。在1951年晚春的7周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举行了关于调查麦克阿瑟免职的听证会。听证会由民主党参议员理查德·B·拉塞尔主持，于5月3日在参议院办公楼318号那同一间大理石装饰的秘密会议厅里举行。这里也是杜鲁门委员会召开其会议的地方。虽然听证会是保密的，但是为了军事安全原因编辑的经过核准的每天会议的正式文本，每小时都向新闻界散发一次。

麦克阿瑟作为第一见证人，出庭作证了3天，争辩说他在朝鲜的做法是赢得胜利的做法和残杀的结束。他对参议员们说，他和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一样见到过同样多的鲜血与灾难，但从没有像他最后一次在朝鲜期间所见到的如此大的劫难。“在我看到一片残骸以及那些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各种情景后，我呕吐了。你们现在准备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华盛顿的政客们已经把“一种新概念引入到军事行动中——绥靖主义概念”，其目的只不过是“无限期地打下去……优柔寡断，没有任务地战斗着……”

但是他也开始让人听起来他专注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对全球性问题奇特地漠不关心。他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也没有判断失误。比如，没有预料到中国入侵的规模是中央情报局的过失。他指挥的任何一次行动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的考虑都始终不太重要。他确信他对中国开战的战略不会使苏联人卷入，他贬低发生更大冲突的危险性。有人问他如果他碰巧错了怎么办？如果发生另一次世界大战怎么办？麦克阿瑟说那不是他的责任。“我的责任在太平洋，为了寻求全面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办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的各个机构正在日夜工作。现在我对他们的研究是不熟悉的。我不曾投入过这些研究……”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他已经赢了总统的这个案子。

马歇尔、布莱德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证词，使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完全否认麦克阿瑟关于他们同意他的战略的说法。杜鲁门从这场危机一开始就认识到在宣布他关于麦克阿瑟的决定之前，他需要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完全支持。现在经过19天的听证会，他获得了完全的支持，这不仅使他的决定增加了分量和效力，而且以任何其他事情都不可能有的方式使麦克阿瑟信誉大大下降。

谈到这个问题时，马歇尔神色庄重，他开始时说，“一种令人十分不幸的需要和一个令人十分不幸的时机迫使我今天早晨来到这里，而且实际上是为了几乎完全反对麦克阿瑟将军的大部分观点和行动。他是一位同事陆军军官，一个我特别尊敬的人……”马歇尔说，政府并非不想在朝鲜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而是因为除了引起另一场世界大战以外，在朝鲜不可能取得轻而易举的或决定性的胜利。当前执行的政策可能确实似乎代价昂贵，但与一场原子战争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他提醒参议员们说，在柏林危机时也有人抱怨



我们停滞不前，要求我们拿出迅速、决定性的解决办法。朝鲜战争才进行了10个月，而柏林危机在持续了几乎15个月后才以“体面的胜利”结束的。

有人问国防部长马歇尔究竟如何看待“朝鲜事务”，这是“一次警察行动呢，还是一场大的或小的战争？……”

马歇尔平静地回答道：“我把它定性为一场有限战争，我希望它将保持为有限的。”

布莱德雷在他出席听证会的第一天坐在证人席上以令人料想不到的精力，并用后来成了最广为引用的证词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他说，麦克阿瑟确定的加速和扩大同中国交战的纲领“将会使我们卷入这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不管他们多么崇敬麦克阿瑟，但他们从未赞同过麦克阿瑟争取胜利的计划。

柯林斯将军接受的提问是：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指挥表现与他在1941—1945年太平洋战场上的杰出指挥表现一致吗？柯林斯说，这是一个他宁愿不回答的问题，也没有人坚持要他回答。

所有的人——马歇尔、布莱德雷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都说，麦克阿瑟的被免职是有充足理由的，也是必然的。马歇尔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考虑到麦克阿瑟反对总统政策的严重性，他对总统权威的挑战，“除了免去他的职务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高级军事指挥官必须忠于文官政府控制军事的原则，这一点是绝对的和毫不含糊的。

国家德高望重的军事领导人表示出来的意见如此一致，似乎使共和党参议员们大吃一惊。如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所写的：“麦克阿瑟开始时是原告，现在却变成了被告。”

听证会进行得越来越沉闷，对麦克阿瑟的歇斯底里已经过去，兴趣也减少了。6月份，麦克阿瑟开始穿越得克萨斯州进行演说旅行，他坚持说他并无当总统的奢望，他的讲话开始听起来越来越尖刻，充满了报复性，越来越不像一个英雄。他攻击杜鲁门、绥靖政策、高税收以及“从内部起作用的阴险势力”。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少，全国范围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对他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这位老兵真正开始销声匿迹了。

麦克阿瑟危机的狂热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它散布了人们对朝鲜战争的混乱和越来越多的疑虑、对华盛顿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对总统本人的日益增多的怀疑。在政治上，对政府和民主党的损害是严重的。甚至在杜鲁门最坚定的支持者当中，他也在处理免职的方式和没有让国人确信他是正确的这两方面受到了批评。在如此极度需要的情况下。他的口才、作为总统“独霸讲坛”的能力到哪里去了？布莱德雷在回顾时说：“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后，杜鲁门没有组织起全国的力量来支持他。”在麦克阿瑟被免职的那天晚上杜鲁门对全国的讲话，按照布莱德雷的估计“是个彻底的大失败”。

5月末，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虽然对麦克阿瑟的支持率已下降为30%，但对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支持率仅为19%，在那些接受调查的人当中，3/4的人把麦克阿瑟听证会看作“只是政治而已”。

当时有许多人，后来则有越来越多的人指出，杜鲁门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早几个月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于这样一种看法，杜鲁门本人是完全同意的。

杜鲁门把免职的决定看作是他作为总统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然而，他不同意那些人的说法，即这个决定显示了他具有巨大的勇气（持这种说法的人中包括哈里曼，他后来说，此举是任何一位总统曾经采取过的最有勇气的步骤之一）。“勇气与此毫无关系。”杜鲁门则强调说，“麦克阿瑟将军违抗命令，我就撤了他的职。这就是事情的全貌。”

但是如果说撤麦克阿瑟的职在政治上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如果说杜鲁门作为总统并不是一个具有很大说服力的能手，他在如何安然渡过这场风暴中却还是完成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并显示出非凡的忍耐力和性格力量。不管这位英雄——将军有多么大的灵气。或者他作为一个能使听众入迷的演说者的力量有多么大，杜鲁门在朝鲜的政策，即他坚决努力把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做法并未被放弃。文官政府控制军事的原则经受了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挑战，保存了下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总统已经证明了他的论点而且在他的将军们的支持下，他使它坚持下来了。

迪安·腊斯克写道：“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冲突超过了自我主义的冲突和意志的竞争；杜鲁门关心的是总统的职位……我确信杜鲁门之所以做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其 95% 的原因是依据于作为总司令的总统和他的将军的关系以及文官政府控制军事的原则。”

麦克阿瑟确实真的认为自己比总统高明。他自己后来对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说，应该允许一个战场指挥官独立行动，而不听命于总统、联合国或任何人；然后为了确保对他的意思不会有什么误解，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这段话。

哈里·S·杜鲁门仍然是总统兼总司令；同时，他还是他本人哈里·S·杜鲁门，决不是忧郁的和一副被击败的样子。在参议院听证会结束之前，他早已重新抬起头来并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击，说的话时常听起来很像他在 1948 年竞选运动中的情况那样。5 月 18 日，在出席斯塔特勒建军节晚餐会时发表的讲演中，他提醒身穿礼服的听众说，甚至当“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儿……分享在白色桌布上的食物并过得很快活时……前方的将士正在战斗和死去……为了实现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和平……你们必须放弃在国内这儿的争吵……你们必须放弃耍弄卑劣的权术……”

谈到朝鲜的战争，他说：“我们正在为时间……为我们自己而战。人们总是强调在朝鲜的伤亡人数，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与我们谈论的这么多的那些可怕的原子弹中的一颗相比，这点伤亡不过是沧海一粟。

“想想吧——想想吧——想想吧，”他的嗓音低沉、几乎发颤地说，“你们的总统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啊。如果你们愿意想一想并且想明白了，你们就会支持我，帮助我去赢得这个和平……这是你们的责任。”

如果在朝鲜取得“胜利”意味着要冒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原子弹大战——的危险，杜鲁门就会满足于不在朝鲜取得胜利。这就是他制定的路线。胜利有一个替代物，这就是和平。而且为了实现这个明确的目标，他将会坚持自己的有限战争政策。

他在田纳西州塔拉霍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看看这些批评家不得不提出的一些另外的办法吧。”

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在朝鲜扩大冲突的风险吧。冒一下把我们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亚洲一场浩大战争中去的风险吧。冒一下

失去我们在欧洲的盟友的风险吧。冒一下苏联不愿在远东打仗的风险吧。冒一下我们不会有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吧。他们要我们用美国的对外政策——用装着子弹的手枪的全部弹膛来玩俄国人的轮盘赌。

这不是一种政策……没有哪位对这个伟大国家的利益负有任何责任感的总统，会以像这样的愚蠢理论为基础去对付严重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6月25日，在他作出进入朝鲜的决定后几乎一年的日子，他在同一篇讲话中说，实际上他已准备好在三八线上进行解决战争的谈判。

俄国的外交部副部长雅各布·马利克刚刚提出了朝鲜停战的建议。杜鲁门在塔拉霍马给了苏联人一个迅速的答复。

“我们现在准备参加在朝鲜和平解决战争的谈判，就像我们一直准备做的那样。”

## 十七、最后的岁月

我对它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

——杜鲁门

1

在他执政的第七个年头的夏天，这位 67 岁的总统看上去一副健康的模样。他的气色很好，他的服装像以往那样整洁、合身、无可挑剔，他的步伐坚定并富于目的性。他整天都与群众见面，然而好像还有时间会见每一个人。椭圆形办公室的来访者们发现，他立刻站起来迎接他们。他坐在办公桌前，挺着胸，面带微笑，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们身上。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在他的工作中显得完全得心应手，只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信奉在中学时学过一句古老的拉丁语格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克拉克·克利福德有时去他那儿随便访问一下，总是说他从来不知道哪一位像总统这样年纪的人能在身体上和心理上保持得这样健康和健全。

杜鲁门还是“几乎每天早晨”都要走两英里的路，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着：

我在早餐时不吃面包只吃一片吐司，不吃黄油，不吃糖，也不吃甜食；通常吃水果，一个鸡蛋，一片熏肉和半杯去脂牛奶，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午餐有肝和熏肉，或甜面包或火腿肉或鱼和菠菜，以及另一种不会使人长肥的蔬菜，甜食则吃水果。晚餐有水果杯、牛排、一两道不会使人长肥的蔬菜、一份冰淇淋、桔子、菠萝、木莓……所以，我一直能保持我的腰围尺寸，而且还能穿 1935 年时买的服装！

每天早晨步行 2 英里后杜鲁门通常都要喝一盎司“老祖父”牌烈性威士忌酒或烈性土耳其酒，并做一些保健操和进行按摩，这已成为例行要做的事。不知喝这种烈性酒是遵照大夫的命令还是效仿祖传秘方上的养生之道，即他这一代的许多人认为，人过 60 岁后喝这种酒有利于血液等的循环（“使机器开动起来”），无人知晓，但这似乎很适合他。

1951 年夏天，麦克阿瑟危机刚刚过去，杜鲁门的容貌、举止、音色，他的信心程度等全都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推测他是否打算继续工作到下一届大选以后的方法。他是否计划在 1952 年再次竞选呢？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来自佐治亚州梅肯的访问记者慢声慢气地问：“总统先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记者招待会，你给我的印象是，你看起来比我原来想的要年轻得多。”和屋里的众人一起，杜鲁门大笑起来。

“你能告诉我，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比你初当总统时更好吗？”

他从未感觉比现在更好的了，杜鲁门看起来高兴地说。“我仍然很年轻，足以去参加一次十足的竞赛——我指的是竞走。”说完他笑得更加开心了。

“这不会是一种预告吧，是吗？”

“不，不。”

对于那些在白宫与他朝夕相处而且常常是处在极其磨难的境况下的人来说，他还是那个原来的杜鲁门，辛勤工作，心情愉快，从不对他们简慢无礼，从不小心眼儿。他似乎具有某种更多的内心平衡机制，因而使他沉着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事情，使他不仅能够担负起他办公室的令人敬畏的责任并保持一种令人疲乏的日程，而且能镇静自若地接受伴随工作而来的琐碎无聊的令人恼怒的事情。正是他这种泰然自若的处事标准不时使他周围的那些人感到有趣，甚至更加喜爱他。

在斯塔特勒举行的另一次晚宴上，主桌上的招待员们竟然弄错了他们得到的关于为患溃疡病的乔·肖特准备的一份特殊饭菜的命令。他们给杜鲁门送去一碗牛奶吐司，杜鲁门毫无怨言地把它吃了，以为也许这是格雷厄姆大夫要求为他准备的。

一天在“威廉斯堡”号游艇上，格雷厄姆坐在船尾甲板上正在口述录音，他的膝盖上放满了来信，大多是为了询问总统的健康、他的体重、饮食、运动方式等。杜鲁门走过去，抓起格雷厄姆膝盖上的信，把它们扔到船外。杜鲁门笑着说：“你总是叫我放松，现在你自己也该放松了。”

杜鲁门迅速恢复愉快心情的本领不但使人感到惊奇，而且不时使得在他身边工作的有些人感到不知所措。这几乎好像是他并不完全明了他的困境有多么严重、他目及的范围显得多么的邪恶吓人，即使麦克阿瑟危机已经过去。仅仅透过他那厚厚的眼镜片，从他的眼睛里，人们有时能看出他疲倦了。仅仅偶尔的几次，人们听他提过，他是多么地想干一些别的事情。

有一次，杜鲁门看望主管白宫维修工程的工程师格伦·E·埃杰顿将军，他的办公室设南草坪的一个简易工棚里，四周是工程开始时搭起的临时房屋。一名管件承包商鲁本·安德森在工棚的墙上为埃杰顿写了一首虚构的小诗。这首诗深深吸引住了杜鲁门，以至于他停住脚步，大声地读起来。

每人都是怀有各自愿望梦想的爱好运动者，  
一个由兴趣支配的潜在的出门在外者。  
但是必干的工作使他往往打消这念头，  
把握不住出游的机会直至出游的日子消失。  
如此紧赶慢赶操劳工作，生命就这样度过，  
在那绿色低矮的小帐篷下是他最终安息的营地。

“紧赶慢赶，操劳工作！”杜鲁门叹息道，“生活就是这样。”

另一次在9月间的一天，杜鲁门乘车前往一个牧师的集会去讲话。在路上，他再次叹息道，他有时不知道这么干是否完全值得。

虽然朝鲜的和平谈判已于7月8日在开城开始进行，但是战争仍在残酷程度未减的情况下拖延下去。乔·麦卡锡继续进行着关于叛国和间谍的指控，这次他把最恶毒的语言对准了乔治·马歇尔。国会在“提高税收以支付战争费用”问题上遇阻，威胁称要削减对外援助，因而有了财政府内部进一步丑闻的指控。早先，在麦克阿瑟歇斯底里过后的间歇里，赫布·布洛克在《华盛顿邮报》上画了一幅漫画，题目叫“骚乱与喧嚣平息，名将们与国王们分手”。漫画的内容是：杜鲁门孤独一人工作到深夜，案头堆满了各种报告，上面标着“朝鲜”、“欧洲”、“原子弹”、“氢弹”、“军队”、“飞机”、“联合国”、“经济计划”、“和平”与“战争”等。自这段时间以来，他

的担子反而增加了。

到仲夏时节，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作战的时间和死亡人数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鲁门和他那一代人在法国作战的时间和死亡人数一样长、一样多。在朝鲜的斗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越来越相像，命运起伏的周期性交替、急速移动的规避伎俩、仓皇撤退和仓促前进等等，现在均已过去，战斗集中在三八线附近和沿线。战争中一些最残酷的极度拼死的战斗为的是争夺一些有限的地貌——数量有限的山头 and 山脊。1918年在法国战场上也往往是这种情况。敌人挖了很深的壕沟，敷设铁丝网和地雷，而且修建起精心隐蔽的坑道。报纸和新闻广播充满了关于“1179高地之战”、“浴血岭”、“伤心岭”等的报道。美军的伤亡数字有时高达每周3000人，从不低于300人。8月末和平谈判破裂。美军在夏季结束时的伤亡总数已超过8万人，其中有13822人死亡。韩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的伤亡数字则更高。敌人或朝鲜人民的伤亡损失还未确定。

杜鲁门从来不想也不愿打、但知道它对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的这场战争——他认为这是他担任总统以来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对他整个的第二届任期投上了阴影。他对朝鲜的现实状况很清楚。他带着感情说：“我知道士兵们所经历的是什麼。”他知道国内家庭的痛苦之情。但是这一切何时会结束？谁又能说呢？除了他还没有做的以外，他还能做什么呢？烦恼和挫折是持续不断的。

8月的一天早晨，他在布莱尔大厦从报纸上看到一名阵亡美国士兵约翰·赖斯上士的遗体已被运回国内艾奥瓦州苏城埋葬，但当他的棺材就要往下放进墓穴的最后一刻，苏城陵园的官员阻止了安葬仪式的进行，因为赖斯是个温尼巴戈印第安人，不是“白色人种成员”，因而不能埋葬在那里。杜鲁门气愤地抓起了电话。几分钟后，通过电话与电报，就安排好了赖斯上士将以完全的军人礼仪被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而且一架空军飞机专程把他的遗孀和3个孩子接到华盛顿。作为总统，他至少还能做到这一点。

杜鲁门原以为将会很快结束的乔·麦卡锡的灾祸毒化了这整个时期的政治气氛。6月中旬，麦卡锡在参议院会议上对马歇尔的攻击是到那时为止他的最恶劣的一次长达3小时的疯狂的训斥性讲话。麦卡锡说，“神秘的和有权势的”马歇尔和迪安·艾奇逊是共产主义阴谋集团的一部分，这个阴谋集团臭名昭著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这种冒险行动”。是马歇尔制定了灾难性的对华政策，马歇尔的军事战略使朝鲜战争成为一场毫无目的的屠杀。杜鲁门已不再是白宫的主人，他正在受到一场“更大的阴谋，即已在莫斯科编织起来的世界规模的网”的操纵。在麦卡锡发表讲话的最后一个小时中，会议厅里的人几乎都走光了，除了3名参议员外所有的人都已离去。新闻界对于这些“愚蠢的和恶毒的指责”表示哀叹，但是麦卡锡继续到全国各地游说。他还是没有证据，也揭露不出政府中的任何一个共产党人。然而当他手中挥舞一叠所谓“提供的文件”，大叫大嚷并进行威胁时，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

一天晚上，在布莱尔大厦的餐厅里，杜鲁门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参加者有司法部长麦格拉思和4名民主党参议员安德森、蒙罗尼、亨宁斯和斯帕克曼，老资格的肯塔基州国会议员布伦特·斯彭斯、司法部副部长菲利普·B·珀尔曼、民主党主席威廉·博伊尔、再次出席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以及作为某种历史见证人的作家约翰·赫西。杜鲁门希望从自己的心腹那儿得到一些建

议：能对麦卡锡做些什么事？

根据赫西回忆，杜鲁门对麦卡锡的手法做了“精辟尖锐”的概括：“他威胁恐吓、含沙射影，使用卑鄙可耻的伎俩……专以毁坏人们的良知取乐。”杜鲁门说所有这一切都在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但是作为一个总统，他可以用什么解毒药来对付这种毒素呢？

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提到已收集到一份有关麦卡锡的“破坏性”的档案材料，由于含有多年来他同姘头鬼混的详细材料而很完整，足以“驳倒麦卡锡参议员的整个卖弄”。有人建议把材料透露给报界。但是杜鲁门用手掌猛击桌面，而据赫西回忆：“这是他的第三人称本身在气愤地讲话；总统不想再听此类的谈话。”

杜鲁门对这个刚被提出的建议讲了3点尖锐的评论，从此以后深深地印入了我的头脑（赫西写道）。其要点如下：

你不应该要求美国总统和一个街头流浪儿一起下到街边水沟去。

谁也不能，连美国总统也不能过于接近下流坏领地的下流坏，否则除了沾一身臭气之外什么也别想得到。

如果你认为有人正在大造你的谣言，那么回答他的唯一方法就是讲清整个事实。

在后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们反复问他如何评价这位参议员或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时，杜鲁门虽然对这个问题显得很激动，但总是只回答说：“无可奉告。”

马歇尔也拒绝回答问题，私下里说，如果在他一生中的此时此刻他不得不说明他并非叛徒的话，那几乎是不值得费力去做的。

马歇尔退休的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麦卡锡攻击的影响并不清楚。但在9月12日，杜鲁门带着极大的遗憾宣布，国防部长将最后一次从他的岗位上退下，结束其非凡的生涯。杜鲁门说，从未有人对自己的国家做出过比他更杰出的爱国主义的服务。

有一种逐渐增加的意识，即一些强有力的中心人物正在纷纷离开舞台。阿瑟·范登堡已在这年春天死于癌症；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8月份突然死于心脏病，他是杜鲁门最器重的和最好的军事顾问之一；现在马歇尔——杜鲁门的“台柱子”，也要离职而去了。

白宫的西侧楼少了查利·罗斯，杜鲁门的日子也与原先的样子很不相同了，新闻秘书乔·肖特虽然业务能力很强，但却是个严格认真的人，与文质彬彬头脑灵活的罗斯很不相同。在工作人员中，唯一剩下的接近于填补罗斯的空缺并受杜鲁门喜爱的人是通讯秘书比尔·哈西特。他是杜鲁门那一辈的人之一，他随和的外表、对历史的爱好、他的幽默感深深地吸引了杜鲁门。哈西特会给他带来一些从刊物杂志上剪下来的有趣新闻，或对他讲一些关于无止境的强制性的信件中的笑话，这些信件不得不设法被转送给一切想得到的团体，它们提出了一些荒谬的要求。哈西特具有在佛蒙特州当新闻记者的多年经历并为罗斯福工作过，他能贡献出他自己的一套聪明才智。但是杜鲁门知道哈西特已是71岁高龄，而且嗜酒成性。

关于丑闻的指控——日益增加的关于循私、公开的贪污腐化的证据——

又充斥了报纸的大字标题，白宫西侧楼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乔·肖特、罗杰·塔比、约翰·埃尔西、比尔·哈西特都对内部“骗子”所造成的损害感到激怒万分。他们看到那些所谓的忠实合伙人为了他们自己的邪恶目的正在利用总统，而杜鲁门却对这种行为一再忍让，这样下去不仅对总统而且也对民主党只能意味着今后更大的耻辱和麻烦。

在3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说过：“我的房子总是很干净的，”他好像不能想象他手下的任何人正在干什么违法和不光彩的事情。指责和旁敲侧击来自国会山，报纸上的报道全都夸大其事，杜鲁门坚持这样认为。

约翰·埃尔西回忆说：“他的生活信条是每时每刻都要始终如一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干好一天的工作，也许这是他身上农民意识的反映，即每天都要外出下地去干当天的活吧。”

1951年2月，在阿肯色州民主党人J·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下的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名为《复兴金融公司研究：循私及影响》，暗示“复兴金融公司”在向企业发放政府低息贷款方面有违法行为。那些受牵连的人当中有民主党主席威廉·博伊尔；白宫事务助理唐纳德·道森，他是杜鲁门政府中主管人事的行政事务助理；以及前复兴金融公司的审查员、道森的朋友E·默尔·扬，他的妻子洛雷塔也在白宫工作，是杜鲁门的秘书罗斯·康韦的助手。

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其权势直接来自白宫本身的有影响力的小圈子。复兴金融公司办公室的记录显示了博伊尔和道森两人在支持贷款申请人方面表现得过分积极。据说，道森对某些复兴金融公司的负责人施加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力图控制”这个机构。但是被最频繁地提到而且引起最大注意的人是E·默尔·扬。虽然他本人与杜鲁门没有什么关系，但多年来，他据说是通过杜鲁门的祖父母所罗门和哈里特·路易莎·扬让人们以为他和杜鲁门有关系，而且奇怪的是他长得很像杜鲁门，足以被看作是他的儿子。作为一个薪金丰厚、花言巧语的华盛顿“探险者”，扬利用了他原先与复兴金融公司的关系以及他同道森的朋友关系；而且据现在揭露，他近来给他担任白宫速记员的妻子一件价值9540美元的色彩柔和的貂皮大衣，大衣的钱是由得到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一家公司的律师支付的。一夜之间，这件貂皮大衣就像过去哈里·沃恩经手的低温快速冷藏箱一样，成了杜鲁门白宫腐败行为的一个象征。博伊尔·道森和E·默尔·扬也全都来自密苏里州——像沃恩、像早些时候曾涉嫌谷物预测丑闻的华莱士·格雷厄姆一样——这一事实不仅重新引起人们对“任人唯亲政府”的旧的指控，而且又使人回想起杜鲁门过去与彭德格斯特核心小集团的关系。

《时代》周刊写道，在经过对“华盛顿这种被认为是权势兜售者的特种人”进行了仔细调查研究后，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发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标志和特点：

这些最好的怪人自称密苏里州是他们的聚集地，他们同杜鲁门至少有一种点头之交，与他的助手和顾问的关系则密切得多。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出入白宫内外。他们还对钞票货币有极大的喜好。

杜鲁门斥责这一报道，称之为“像驴子一样愚蠢”，因为虽然其中的暗



示实际上是严厉的指控，但他们也虚伪地强调了并没有提出什么指控。他回想起自己作为某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负责人的经历，对报道者说：“你们听着，当我向国会做报告时，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就提出一些具体的指控。”但是像他在驳回希斯案中称之为“非马非驴、不伦不类”那样，他的“像驴子一样愚蠢”这个用词又惹出是非来，激怒了参议员富布赖特，后者宣布要开始举行公开听证会。杜鲁门也没有改善事态发展，把富布赖特描述为“一个受教育太多的狗杂种”。

杜鲁门让他的工作人员中的某个人，可能是道森，迅速检查一下复兴金融公司的来往信件。正如他预期的那样，他被告知复兴金融公司的档案中存有几百封来自国会成员的“施加压力的信件”，其中包括富布赖特本人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写的一些信件，道格拉斯是调查委员会中的另一名民主党人（道格拉斯迅速地检查了他自己的档案，发现3封这样的信，并立即把有关内容录入磁带。他承认这样做也许“走得太远了”），杜鲁门发了脾气，要通了国会大厦的电话，把调查委员会的主要共和党人查尔斯·托比从一个正在召开的行政会议中召来接电话。托比是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也是资深的国会成员，杜鲁门一直很喜欢并钦佩他，但是现在杜鲁门气愤地警告他说话做事要谨慎小心。保罗·道格拉斯后来写道，托比接完电话回来时脸色苍白，显得十分严肃。杜鲁门告诉他“真正的无赖和权势兜售者”是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查明真相。

但是当民主党人富布赖特和道格拉斯来到白宫会见杜鲁门，力劝他“打扫干净房子”，并允许道森到调查委员会去作证时，他们发现杜鲁门放下武器屈服了。

道格拉斯说：“你曾忠心于那些对你并不忠诚的朋友”他记得随之而来的沉默，那时杜鲁门在椅子上转动身体，面容忧伤地看着窗外斜飘着的雨点。

“我猜测你们是对的。”他低声他说道。

5月份，杜鲁门任命斯图尔特·赛明顿为复兴金融公司的负责人，赛明顿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使得情况好转起来。

在全国范围内，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道德结构已沦丧殆尽。一年来，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进行巡回电视听证会，调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诸如下层社会的有名人物乔·艾多尼斯和弗兰克·科斯特洛的证词引起了轰动。

匪徒巴格西·西格尔的女友弗吉尼亚·希尔·豪泽身穿一件前一天才偷来的价值5000美元的银蓝色貂皮大衣，出现在凯弗维尔委员会面前说：“你们这些杂种，我希望让你们每个该死的人挨一颗该死的原子弹。”

纽约的杨—鲁比肯广告公司为表示关注，在报纸上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如下的消息：

让你大吃一惊，凯弗维尔的调查报告的电视广播使千百万美国人为之惊醒。

电视屏幕上展现了各种人物：诚实的和不诚实的、坦率的和狡猾的、政府的公仆和公开的盗贼。在许多画面中出现了一幅更明朗的关于犯罪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可耻行为的令人不舒服的混合画面。

突然千百万美国人都在提问：

我们的是非观念到底怎么啦？……  
我们政府中诚实的原则哪里去了？  
公共的和私人的道德标准还存在吗？

1951年夏天传来了一件惊人的消息，90名西点军校的学员，包括大部分军队足球队的队员，因考试作弊被开除学籍。杜鲁门因西点军校丑闻而感到厌恶。他说这使他感到灰心丧气，其程度是长时间以来其他事情所没有过的。当其他学院竞相招收被开除的足球队员时，他感到更加难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道森、扬、博伊尔以及其他几十人纷纷到国会山作证。人们常常感到难以区别哪些是真事哪些是传闻，也说不清楚哪些事属于非法哪些只是做法不得当，或者是老式的小规模的政治哄骗和证券批发。一些摇摇欲坠的公司因为得到复兴金融公司好几百万美元的贷款而得以维持或获得挽救，而且看起来这往往也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复兴金融公司一名叫沃尔特·L·邓纳姆的主任作证说，唐纳德·道森曾告诉他公司的一切最高人事问题都要送交白宫审批，邓纳姆的电话记录本显示，收到道森打来的或关于道森的电话共45次，收到比尔·博伊尔或者他的办公室的电话151次，大部分电话都是力劝邓纳姆去见一些“非常可爱的朋友”或其他人去商讨有关公司的事情。然而邓纳姆也强调说，在发放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事情上道森从未企图向他施加过影响。

道森在轮到他到会作证时坚持说，他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他承认自己曾于3次不同的机会住在迈阿密饭店而没有付费，道森说他知道这是一种通常的做法，甚至有些参议员是被列入饭店的免费名单的。委员会里没有人就此问题进行更多的追究。道森仪表堂堂，表现出圆滑、讨好的样子，显得他是一种十分精明的人，然而他自称他从不知道迈阿密饭店从复兴金融公司那里获得过一笔150万美元的贷款。“我没有做什么不合适的事情，但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道森说，这时他已经聘请克拉克·克利福德当他的律师。参议员道格拉斯后来透露说，在克利福德的精心指导下，道森“表演得很出色”，最后只证明他犯有一些“小小的过失”。

正当复兴金融公司的听证会继续进行时，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开始对税务部门的不正当行为进行调查，调查一些关于贿赂、敲诈勒索、玩忽职守的指控。

杜鲁门对他的工作人员说，这全都是政治而且全都是针对着他的，他看不出道森和博伊尔干了些什么严重出格的事情，因而甚至拒绝惩戒他俩。他私下对比尔·哈西特说，他喜欢人，从来不愿意把任何一个人都想得那样坏或不可救药。

乔·肖特告诫说：“总统先生，我不认为这件事会被淡忘。”

与此同时，默尔·扬因为他妻子的关系而有一张白宫通行证，他每天下班时都愉快地闲逛似地走进去接其妻子回家。一天晚上，罗杰·塔比一时冲动，对扬痛骂了一顿。塔比后来仍然很生气地写道：“他身穿浮华的运动衫，嬉皮笑脸地同门卫肯·伯克聊天。”

杜鲁门似乎不愿对某个像默尔·扬这样的人在白宫的存在采取适当的行动，这是坏事的出现；而坏事的出现，无论是否具有代表性，却愈演愈烈。

7月份，《圣路易斯邮报》披露一条消息，指控比尔·博伊尔为圣路易斯的美国利索福德印刷公司筹借到50万美元的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自己因

而获得 8000 美元，这笔费用是在博伊尔担任民主党主席之后付给他的。

罗杰·塔比在休假后返回白宫时说：“哎哟，我不知道事情是不是全都像它看起来的这样糟，在每届总统任期内事情是否都是这样糟或者更糟呢？”塔比 40 岁，是个聪明的有理想的耶鲁大学毕业生，曾在佛蒙特做过记者，后又在国务院当过新闻助理，最后到白宫工作，从此成了杜鲁门忠实的助手。像他的前任助理新闻秘书埃本·艾尔斯一样，塔比每天都写日记。他也是一个很会自找烦恼的人，预感杜鲁门的末日正在来临，如同某些批评家所说的，像华伦·G·哈定总统那样。4 月份在基韦斯特，塔比在日记中这样评论杜鲁门：“扑克、扑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老是打扑克，要不然是一种空虚的感觉，没有斗争、刺激？……友谊、逗弄、娱乐、逃避国家的紧迫问题？”塔比当时写道：

杜鲁门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解救他自己……谣传国内收入署又揭发出新的问题——让白宫在检查清理方面带个头，而不是像在复兴金融公司的事务中那样被迫采取行动。先清查，然后撤换博伊尔。拿起一把好扫帚努力干，也许这并不行——也许不管怎么样都已经太晚了……要在政治上干好……永远不会太晚的。

在佛蒙特呆了两周——是的，猜想这是对的，杜鲁门和艾奇逊做出了适当的决定。但貂皮大衣的事怎么办呢？给音乐批评家的信又如何处理呢？

所以他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许是两个。但是他为了正确的事情一直在顽强战斗。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不使他自己、也使世界上我们所有的人都轻松一点呢？

在另一天的日记上，塔比这样描述总统：“他不愿意仔细考虑自己的党的缺点和瑕疵，或者甚至共和党的缺点与瑕疵——他是一个建设者，眼光放在遥远的未来……”

弗兰克·佩斯在当陆军部长前曾是财政预算部门的主任，有一次他问总统，为什么他总是容忍核心小集团的政客们对他的政府施加影响。杜鲁门轻声笑着回答：“弗兰克，你成了一名杰出的财政预算的主任，但却是一个劣等的政治家。”

对于杜鲁门来说，对博伊尔的攻击就像是刺进他的骨头。自博伊尔是堪萨斯城的一个孩子起他就与博伊尔相识，博伊尔在一个富裕的把政治视作生命力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里长大。他的母亲克拉拉曾经是彭德格斯特选举区的一名工人，一个精力充沛的虔诚的妇女，至今在堪萨斯城仍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杜鲁门对她特别崇敬，称她是“密苏里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民主党人之一”。在 16 岁时，博伊尔在该城市富裕的第 4 区组织了一个“年轻民主党人俱乐部”，从那时起到现在还从未有人指责他有过什么胡作非为。杜鲁门喜欢他，几年来为他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工作。杜鲁门首次把他带到华盛顿时安排他任杜鲁门委员会中一名助理顾问，从此，博伊尔便一直坚定、机智、热情地工作，为 1944 年罗斯福—杜鲁门这张候选人名单出了力，为 1948 年杜鲁门的竞选运动出力更大，在此期间他成功地当上了华盛顿的一名律师。博伊尔被人们普遍看作是杜鲁门 1948 年意外地击败竞选对手而获胜的“出谋划策者”之一。一旦杜鲁门任命他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如报纸

上所说的那样，他就真正成了一个政治上的实力派人物。

凡是在五月花饭店或斯塔特勒饭店的门厅里见过比尔·博伊尔的人没有什么困难都能猜出他的职业是什么。他身高6英尺，穿着体面，一个肥胖的“亲切人物”；有一张爱尔兰人圆圆的脸，一副职业政治家的模样。他对自己“很有办法”，对人名具有“索引卡片般的记忆力”，虽然他并不因效率或特别敏锐的思想而众所周知，但是他从经验中了解政治的方法是其他人，如杜鲁门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从来没有过的。他能说会道，会“察言观色”。

博伊尔的主要毛病是爱喝酒，为此，在过去的岁月中曾不止一次地使杜鲁门对他发脾气。1944年选举总统的那天晚上，博伊尔和一些人在米勒巴赫饭店的套房里喝得烂醉，以致贝丝和玛格丽特厌恶地离开了那里。杜鲁门事后很抱歉地写信对玛格丽特说：“你对博伊尔先生和其他中年酒鬼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喜欢能够控制自己的爱好并保持精神稳定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希望你把他们从你的名单上划去。这是一件关于博伊尔的可耻的事。我使他振作起精神离开堪萨斯城的大街，因为我认为他没有得到那里他为之工作的人的善待。他有了唯一难得的成为一名政界真正领导人的机会并已使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名声。烈性酒胜过他，而且就我而论，我是不能再信任他了……

但是，杜鲁门并没有把他从自己的名单上划去，他确实仍然信任博伊尔，而且继续真诚地喜爱他。1949年9月在堪萨斯城市政礼堂为博伊尔举行的宴会上，杜鲁门曾对聚集在那里的扎着巨大黑领结的宾客们说：“比尔一切都好！别听别人说三道四！”为参加这次宴会，杜鲁门和巴克利专程乘飞机从华盛顿赶到这里。由于在这里遇到了他任总统以来的三任党的主席博伊尔、麦格拉恩和鲍勃·汉尼根，杜鲁门显得精神焕发，他继续说：“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信赖的朋友。当你需要时，他们就来到你身边，我喜欢有这样的朋友在我的周围。”这是老的职业信念——政治如同朋友之间的事情——他的堪萨斯城听众们发出了一片赞同的叫喊声。

但在出席宴会的2000多名来宾中，有好几个来自北端的臭名昭著的赌徒显得非常惹人注目，其中包括当时堪萨斯城占统治地位的诈骗勒索者查尔斯·比纳乔，此人仅于几个月后在使人联想起该城市最苦难时期的一次黑社会屠杀中被人击毙。新闻界小心地报道了出席宴会向博伊尔表示敬意的这类“朋友”。后来则突出报道了这一事实，即比纳乔被人开枪打倒在位于杜鲁门大街上的一个民主党俱乐部里，他的被子弹打得满是窟窿的尸体倒在一幅招贴画大小的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画像下。

在白宫许多工作人员的眼里，博伊尔现在看来好像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

罗杰·塔比十分生气，几乎不能抑制自己，他写道：“博伊尔不仅愚蠢无能，而且似乎也是个骗子。”

他当然应该辞职，或者叫他辞职。但是这些利用总统并对总统造成巨大损害的骗子并不辞职。一旦向总统证实有过这些胡作非为，他就应该被解职……重要的事情是应把总统从他那些朋友中救

出来。

比尔·哈西特力劝杜鲁门应毫不延迟地使自己摆脱博伊尔，他恳切地说：“你的朋友将毁掉你。”

杜鲁门像试图使孩子安静下来一样地回答说：“没有关系，比尔，没有关系。”

杜鲁门悄悄地命令查利·墨菲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墨菲是他的刻板的、正直谨严的顾问，他在杜鲁门心中的位置十分重要，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墨菲的调查报告在仲夏季节准备完毕，在随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说他将会站在博伊尔一边。杜鲁门说，所有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有联系的人永远都不应该为了恩惠行为或为人服务而收取酬金，而他的印象是博伊尔没有干过那种事：“我对博伊尔先生充满最大的信心。而且我相信他对我所作的声明。”

墨菲在他的备忘录中报告说，对复兴金融公司的档案进行详尽调查后显示：博伊尔“没有作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影响复兴公司对美国利索福德印刷公司所给予的贷款。

利索福德公司在1949年至1950年贷款尚未兑现期间每个月向复兴金融公司圣路易斯办公室提出的报告表明，利索福德公司在1949年春季付给博伊尔1500美元……这似乎与博伊尔发表的声明是完全一致的，即在1948年春天他被该公司聘请去从事了2个半月的一般法律事务，1949年4月当他成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名正式的领薪水的雇员时，他便自动放弃了那笔帐目……

复兴金融公司负责利索福德公司贷款的调查员从未会见过博伊尔，从未就这一具体问题或任何其他事情与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书信。墨菲的结论是关于复兴金融公司的贷款没有什么“可疑之处”。“我相信我已发现的那些事实证实了博伊尔先生本人已经发表的关于此事的声明，这些事实相当清楚地表明，他和这个成为问题的发放贷款的事没有关系，也没有道理为什么他应该因此而受到明确表达的或含蓄的批评。”

墨菲的报告只会使杜鲁门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加强了他自己天生的倾向，即把对任何他的人的攻击都看作基本上是政治性的而且是针对着他的。杜鲁门评论说，这也许听起来是利己主义的，但是他认为他和任何一个曾经坐在他这把椅子上的人几乎一样能对人作出判断。他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他也曾经因而不得不解雇了一些人。但是他补充说：“你不能惩罚一个即使没有错误却看来好像并不正确的人。”

10月，对一件新案的揭发大大缓解了对博伊尔的指责。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乔治·加布里埃尔森作证说他因“照料”得克萨斯州迦太基·海特罗塞尔有限公司获得贷款并多次代表该公司对复兴金融公司进行干预，而曾获得2.5万美元的好处费。加布里埃尔森觉得，有人可能会认为他行为不轨，这是令人好笑的事情。他对委员会说：“认为一个在野党的主席会有任何可能的影响，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同报道的那样，国会中感到难堪的共和党人并不认为对选民们来说这也会听起来如此的不可思议。

当参议院委员会终于发表它的最后报告时，博伊尔被宣布没有任何违法

的行为。根据报告的奇怪地颠倒过来的词句，他的过失仅在于“未表现出那种将会消除违法行为出现的行为”。但是在当时“由于健康原因”，博伊尔也已辞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税务局的丑闻却比到那时为止的任何一件都显得更加突出了。

将近一年多来，财政部长约翰·斯奈德一直在努力弄清关于全国各地各类税收部门腐败行为的持续不断的谣言的真相。但是斯奈德的行动收效甚微。然后在1951年4月圣路易斯的收税官詹姆斯·P·芬尼根刚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后就辞职了。7月，杜鲁门不得不解除波士顿的丹尼斯·W·德兰尼和旧金山的詹姆斯·G·史密斯这两名收税官的职务。史密斯的8个同事也被暂令停职反省。几个月之后，布鲁克林的收税官约瑟夫·P·马塞尔被解除了职务。

这4个人——芬尼根、德兰尼、史密斯和马塞尔——都是由鲍勃·汉尼根任命的，当时汉尼根是罗斯福总统手下的国内收入署的负责人，而这4个人接受他们的工作时都认为需要收税这项工作只是他们兼任的职责，他们还有空闲干其他的事情。像汉尼根那样，这4个人也都是大城市民主党核心小集团的产物，而且其实在他们的任职期间，腐败的行为——或者至少是公然的“不正当行为”——是十分猖獗的。芬尼根被控告犯有受贿和渎职的行为；波士顿的收税官德兰尼则被控告犯有接受贿赂来“解决”拖欠税款问题的行为。在旧金山，史密斯也被控告犯有确定税收欺诈要求的行为；在布鲁克林，马塞尔被发现在申报他自己的税款时有欺骗行为并且通过他的执法工作，在他作为收税官的每年10750美元的薪金之外，积聚了将近25万美元的钱款。

在这期间，国内收入署署长乔治·J·舍尼曼突然“因健康原因”辞职，副署长丹尼尔·A·博里奇和税收局局长的顾问查尔斯·奥利芬特也几乎立即随后相继辞职。

11月份，杜鲁门不得不免除司法部税务司司长、司法部副部长T·拉马尔·考德尔的职务。众议院一个调查委员会做出的结论说，考德尔本人虽然是个可尊敬的人，但他在与确定税收的官员的交往上显得天真幼稚。

到12月，乔治·埃尔西在为白宫准备的一份备忘录中报告说，腐败的迹象蔓延得太快，白宫工作人员已无法用文件证明所有这些事情。

替杜鲁门辩护的人强调说，所有被解雇的收税官都是罗斯福政府的留用人员。此外，杜鲁门已采取行动迅速有力地清洗税务局的机构，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相比的。到12月为止，国内收入署共有113名雇员，包括6个地区收税官被解雇。在博伊尔的职务由新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兰克·E·麦金尼接替时，杜鲁门还决定今后国内收入署的收税官不再是恩赐的职务，而必须置于行政机构的监督之下。

然而，税收局的腐败行为确实令人震惊，清理工作早就该进行了，而且即使鲍勃·汉尼根是在罗斯福时期任命他的一些主要官员的，他也仍然被认为绝对是杜鲁门的部下，又一个密苏里老朋友。汉尼根本人曾经是第一流的税收局局长，但他已不再能够为他自己进行辩护了，他已于1949年10月死于心脏病。而且无论这位像T·拉马尔·考德尔一样倒霉人物的比较而言的罪过与愚蠢行为是什么，人们都记得他的老婆也接受过一件貂皮大衣，那是一位与税务司有交往的律师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

在12月份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是否要对政府采取严

厉的清洗行动。他回答说：“让我们说继续采取严厉的行动吧。”

“我不和违法乱纪者同住。”杜鲁门说，这个表达法使记者们感到迷惑，而杜鲁门后来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从小就爱引用这句话（《时代》周刊报道说，这是一句至少像《罗密欧与朱利叶》一样古老的俗语，在该戏剧中，朱利叶的父亲对她拒绝嫁给帕里斯一事很生气，对她说：“到你要去的地方吃饭吧，你不能与我同住了”）。

他是否曾感觉到他好像已被自己的朋友“出卖”了呢？

“咳，谁不会那样感觉呢。”他生气地厉声说。但除此之外他不再多说一句。

“老板，你将不得不参加 1952 年的总统竞选。”哈里·沃恩一天对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杜鲁门说，“还有其他什么人呢？”

“我们会有人的。”杜鲁门回答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你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人了。你必须参加竞选。”

“让我们走着瞧吧。”杜鲁门回答说，而沃恩走出总统办公室时确信总统将会再次参加竞选。

如同他对别人讲的那样，沃恩心里很清楚，如果杜鲁门不再参加竞选，他个人今后的情况将会怎么样。

一天中午时刻沃恩在楼下工作人员午餐室里说：“一旦我离开白宫，我完全知道那些平时对我点头哈腰叫我将军的人在大街上就不会再搭理我了，如果他们看见我，会说：‘瞧，走在那边的那个胖家伙是他妈的婊子养的！’”

正是这些时刻中的一次使得好些工作人员想到，为什么总统终究这么长时间地把沃恩留在身边呢。

唯一一个并不突出地竭力主张杜鲁门再次竞选的人是比尔·哈西特，他本人不久即将退休。他对杜鲁门说，为了他自己和为了他的家庭，他都应该这样做。

在朝鲜，虽然和平谈判已经重新开始，现在是在板门店，但是战争仍在继续。谈判的症结在于被联合国指挥部俘虏的 13.2 万北朝鲜士兵的命运问题。原先双方已同意，敌对行动一旦结束，双方应立即交换全部战俘。但是现在美国反对这一政策，因为将近半数的北朝鲜战俘约 6.2 万人不希望被遣返。杜鲁门坚持要求给他们以是否回家的选择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曾把成千上万的苏联士兵发配到西伯利亚，有些则被他处死，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曾被敌人俘虏。”我们一定不能以把人交给他们去屠杀或奴役来换取停战。”杜鲁门寸步不让地这样宣布。

美军在朝鲜的伤亡数字现在比战争第一年的大大地下降了。尽管如此，战争多打一星期，仍然意味着更多的死亡和磨难。朝鲜正在消耗着生命和资源，玷污着美国的政治，破坏着杜鲁门的总统职权。没有人比杜鲁门更加想使战争结束的了。根据民意测验的调查，有一半的美国人民赞成使用原子弹来结束这场战争。虽然杜鲁门决定坚持他的克制政策，但他也还是有可能向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的自己的幻想。在他另一处独个儿愤恨和受挫情绪的发泄中，一篇用普通写法写的冗长的私下独白中，他写道：

与一些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打交道就像一个诚实的人试图与许多敲诈勒索头子或贩毒集团的头目打交道一样.....在我看来现在最合适的做法就是下一道只有 10 天期限的最后通牒 通知莫斯科我们

打算封锁中国的从朝鲜边境到印度支那的海岸线；我们打算用我们现在掌握的手段摧毁满洲的所有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而且如果有进一步的干预，为了实现我们的和平目的我们将消灭无论什么港口或城市。

这种局势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所有中国军队从朝鲜撤出，而且俄国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战争与物资的支援。我们是当真的。我们没有挑起这个朝鲜事端，但是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联合国的权威，为了世界的和平，我们打算结束这场战争……

我们对这些虚伪的和平号召已感到厌倦，既然并没有打算采取走向和平的真诚办法……

停止对正在攻击自由世界的暴徒们供应战争物资并专心致志于一项遵守早已达成的那些协议的高尚政策。

这意味着竭尽全力的战争。它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沈阳、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口、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所有制造工厂都将被摧毁。

这是苏联政府决定它是否想要生存下去的最后机会。

但是从未有人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他没有这样的打算。他写得满满的这7张办公桌便笺纸被他收进了一个抽屉里，然后他继续埋头于他所负责的艰苦工作。他说：“我知道当总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在华盛顿的晚餐会上，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几乎兴高采烈地日益向记者们就共产主义、腐败和朝鲜等问题大谈1952年的这场“最糟糕的”选举。塔夫脱早已开始竞选。其他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则越来越多地谈论着艾森豪威尔是个理想的候选人。到12月份，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司法部长麦格拉思涉嫌国内收入署丑闻的案件。此时杜鲁门在民意测验中的名望已下降到最低点，全国仅有23%的人对他如何把握他的工作表示赞同。

但是此时白宫的工作人员已被告知情况。11月中旬时，杜鲁门在基韦斯特的短暂的休假期间，把他们召集到小白宫门廊上那张打扑克的桌子旁，然后大声宣读他于1950年4月12日写的那份声明，而且他计划在来年的春天即1952年4月，远在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发表该声明，他将不再参加竞选。但是，他告诫他们说，在未来的5个月内必须对此完全保密。他解释说他现在仅仅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开始作出他们自己的计划。杜鲁门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他似乎立刻感到大为轻松。

罗杰·塔比几个月后写道：“从那天起，我丝毫未觉察到我们在感情上或者在关系上对总统有任何不同——我们，而且我认为它适当地表达出全体工作人员的基本特征，如同以往那样忠心为他工作。”

更久以后，人们认为这是衡量这种效忠的一种标准，即那些知道杜鲁门对1952年的计划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向外讲过一个字。像他要求过的那样，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5个月。

1952年1月5日，在新的一年里中的第一周内，在近几个月内在77岁时已重返首相岗位的温斯顿·丘吉尔来到美国进行短暂访问。丘吉尔乘坐“玛丽女王”号舰船抵达，杜鲁门派他的“独立”号飞机去纽约接他到华盛顿，杜鲁门则在那里的国家机场欢迎他。满头白发的丘吉尔戴着人们熟悉的那个圆顶礼帽，叼着一根长雪茄烟，看上去老多了，腰比以前更加弯曲了，步伐



也更慢了。但当人们注视着他和杜鲁门相互致意时，他仍是个“老勇士”、“老雄狮”，身上透着惹人注目的高贵尊严的气质。像杜鲁门经常说的那样，对他来说，丘吉尔是这一时代最伟大的知名人士。对迪安·艾奇逊来说这个评价不够。他坚持认为，人们不得不往回追溯4个世纪以便寻找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人，“丘吉尔的成就是伟大的，他取得成就的方式也同样伟大……他的一切都使人感受到他的艺术格调——他的形象和举止……”。

那天晚上在“威廉斯堡”号游艇上吃晚餐，收拾了桌子后，丘吉尔开始谈论起世界的局势以及苏联帝国的威胁和种种似非而是的现象。他承认美国核力量的重要性，热情赞颂杜鲁门领导自由世界的才能，包括如丘吉尔所说的，美国出兵朝鲜的“伟大决定”。对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其他在场的人来说，这是个永远值得回忆的时刻。

看着杜鲁门，丘吉尔慢慢他说道：“总统先生，我们上次见面是对坐在波茨坦的会议上。”杜鲁门点头表示同意。

“我必须承认，先生，”丘吉尔继续说，“当时我对你很不尊敬，我不愿意由你来接替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停顿了一下说：“我对你的判断大大地错了。从那时起，你在拯救西方文明方面超过了任何其他他人。”

在对杜鲁门来说的这一段阴郁的时间里，在充满花哨而庸俗的丑闻、无止境的朝鲜战争以及公众对他的领导能力大大丧失信心的冬季里，这位具有骑士风度的老伙伴再一次地，而且也只有他能够，成为一种肯定的声音。

## 2

在他最初搬进白宫的几年里，杜鲁门经常嘲讽地把白宫称作是“白色大监狱”，“伟大抱负的白色大坟墓”或是“纳税人的房屋”。他曾经觉得住在这里很别扭，常常感到十分孤单。但他也是这样的总统，在战争结束后，他在白宫这个大厦的一些合乎规格的大厅里，严格尊重传统的方式重新举行国宴和招待会。如J·B·韦斯特所说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已经使白宫恢复了往日的“辉煌”，而且显然这样做给了杜鲁门很大的快乐。

也许几乎像曾在白宫居住过的任何人一样，杜鲁门感受到了这座古老建筑物的过去的灵气。这些年来曾在这里居住过的那些个性强的人逗留不去的存在，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即有几个晚上他听见他们的鬼魂蹑手蹑脚地走上中央大厅的楼梯或者敲他的房门。如同埃塞尔·诺兰和其他人已经观察到的那样，对杜鲁门来说历史从来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某种事物，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某种主要由于与人相关而有趣的事物。每当他谈起安德鲁·杰克逊、约翰·昆西·亚当斯或亚伯拉罕·林肯时，他常常好像是在谈论他认识的某个人一样。靠近1950年底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晨，他带着约翰·赫西巡视白宫的翻修工程，这时大楼的里面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那样，老的外墙已成了一个外壳，里面包着钢筋和未加工的水泥地面以及金属管道等。没有隔开的房间，原先内部的格局已不复存在。赫西认为，它看上去就像有人决定在一个废弃的城堡内部修建一个现代办公室。然而杜鲁门一边轻快地走着一边叙述着逐个房间的历史性特色，好像这些房间还全都在那里，每件东西都放在应放的位置一样。如赫西写的那样，这次巡视成了一种“想象游戏”。杜鲁门指出哪儿是“红厅”、“蓝厅”、“绿厅”，接着又指着远处的那一端说，那是“东厅”。

他说：“你知道，白宫始建于 1792 年。第一批住进来的人是约翰·亚当斯和他的夫人，当时是 1800 年。当他们搬进来时，整个大楼只收拾出 6 间屋子供居住用。这间‘东厅’当时只是一个石头框架，所以艾比盖尔·亚当斯夫人把这里用作晾干她洗的衣物的地方。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吧！后来，在这间屋子装修好了以后，杰克逊买了 20 个痰盂放在里面，每个痰盂的价格为 12.5 美元。”

当赫西问，是否打算使内部结构恢复得多少像该大楼被拆掉之前那样，杜鲁门断然回答道：“噢，确实是这样！”

除了历史以外，杜鲁门也了解这座建筑物作为象征的巨大力量。从他入主白宫的最初几周以后，他就始终使用那些较小的象征物，比如总统的游艇、总统的飞机、火车专列和大型高级轿车。这并不只是因为他喜欢这些东西，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所代表的职务的尊严和重要性的程度。现在在时间的选择上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在新闻界和反对党内的折磨者们利用诸如冷藏箱和貂皮大衣等其他象征物渲染“华盛顿的混乱局面”时，杜鲁门发现在维护和恢复为他在美国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这一最终象征服务的工作中，他能够多少减轻他的日常工作负担，并使自己从战争以及丑闻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可喜的排遣受到赞扬的密苏里州公路和法院大楼以及已经成为国家最著名阳台的那个建筑物的创作者可以再次成为民主神殿之一、联邦城市最古老建筑物的建筑者、修复者和护卫者。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这几年里，几乎没有有什么其他他能够完成的工程将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满足。

从开始阶段，他就密切注意着这项工程。白宫的官方建筑师洛伦佐·温斯洛在 1949 年春天写道：“总统的意愿是，这个修复工程要尽善尽美，以便使建筑结构状况以及所有主要的和固定的建筑终饰都能长期供今后许多代人的使用。”

在进行了 6 个月的规划后，第一期拆卸工程于 1949 年 12 月 13 日动工。杜鲁门希望对这项工程负有完全的责任——因为这些毕竟是总统的住宅——但被国会拒绝了。成立了一个翻修总统官邸国会委员会，由总统任命 6 名成员，包括 2 名参议院成员、2 名众议院成员、美国全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主席和美国建筑师学会会长。该委员会岁数最大的成员是来自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他是参议院临时议长，此时已 80 岁，他成为主席，而陆军参谋长办公室的一名退休少将格伦·E·埃杰顿任该工程的执行主任。但是在工程建设中与杜鲁门联系最直接的是白宫建筑师温斯洛，而且归根结底作出几乎所有重大的决定以及许多其他决定的是杜鲁门。

上次于 1902 年在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期间对这座古老的大厦进行过一次大的检修。在纽约著名的“麦金、米德与怀特建筑公司”的查尔斯·麦金的指导下，特别把主层有点难看的维多利亚式饭店的样式改变成一种具有优美雅致艺术风格的样式，还增添了一点新的豪华的电灯装置和枝形吊灯的格调。但是这个工程基本上是装饰性的而且完成得极其仓促。结构方面的需求被忽视了，使得房子总的来说比过去更不牢固了。如杜鲁门所说的，这确实是一项“拙劣的工作”。而且这是造成 47 年后杜鲁门所面临的情况的主要原因。

虽然白宫外层沙岩墙壁、房顶以及在柯立芝总统时期的 20 年代增建的防火的三层楼仍处于牢固的状态，但房子的其他部分已处于坍塌的边缘，并有发生一场可怕的火灾的危险。白宫的内承重墙已承受了很大的重量。为了安

装管道或电线，钢筋已被切开槽口或截断。整个二层楼的大部分在 1814 年这所房子被英国士兵烧毁后曾经重建过，现已很不安全。公共建筑物委员会的专员在其报告中称：“建筑结构上的弱点的性质和程度被发现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温斯洛声称，他可以从数学上证明，这座楼房已不可能再挺立下去了。）安装的管道全都主要是权宜之计而且早已过时，取暖系统和电线等也全部是不适当的和老式的。

1949 年时要决定的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房子 3 楼以下内部原有的东西都搬走，保留外墙，然后重新建造内部的一切设施；或者推倒整个大楼，在这过程中保存外部石块并给它们编号，这样在重建新的大楼时可以重新装配这些旧石块。用一份后来的报告的话说：“对于这些计划的抉择显示了这是一件并非不太复杂的事情，特别是因为这不仅涉及建筑因素，而且还涉及这件事情的使人不得不顺从的情感方面。”如果只是着手拆除外墙，将会使工程进展难度小一些，花费也少一些，能节省 30 万或 40 万美元之多。但是，翻修委员会中只有一名成员，即密执安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路易斯·C·拉博特赞成用这种方法。对其他人来说拆毁白宫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人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褻瀆的行为。杜鲁门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主意。

如果杜鲁门和翻修委员会决定采取另外的办法，那么白宫的墙壁在 1950 年初正当麦卡锡开始他的攻击时就已开始倒塌在地了。国人将会不得不看见这座大楼的全部拆毁，倒在地上，这大约是来自朝鲜的消息在随后到来的夏天变得十分可怕的时候，美国军队正在殊死战斗以便在釜山环形防线坚持下去。

事实上，外墙保留未动，而里面，3 楼以下的全部东西都搬走了，开始时是一件又一件地小心地进行着，后来就全面拆毁，直到整个内部都被挖空，房子变成了一个多孔的空壳，旧的外墙用钢架支撑在适当的位置上。卡车和压路机开进来，开始挖掘达到两层全新地下室的高度。这是一个特别的景象。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们把里面都拆空了。挖了两个地下室，放进了钢条和混凝土，这种状况在帝国大厦、五角大楼或任何其他地方你都从未见到过。”他喜欢到工地进行视察，常常走在离地面很高的工人们使用的狭窄的过道上。

这项工程计划造价 541 2 万美元，并于 1951 年 12 月完工。费城的约翰·麦克沙恩建筑公司以低价投标成为总承包商。这家公司曾建造过五角大楼、杰斐逊纪念堂，在华盛顿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一天早晨杜鲁门从布莱尔大厦走过来，看见白宫北草坪上有一幅麦克沙恩的大幅招牌时，他告诉传达室主任豪厄尔·克里姆立刻把“那个东西”搬开。

这项工程比一般人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华盛顿乃至全国的多数人决没有认识到它所涉及的一切或者在什么程度上这座大楼将变成成为杜鲁门修建的房屋。

白宫的外墙坐落在粘土上已有 149 年之久。如今为了适当加固基础，地基上打了共约 126 个 4 英尺见方、大约 25 英尺深的竖坑，一直打到坚硬的砂砾层。这些竖坑里灌注了钢筋混凝土，从而形成这座在原有墙壁的内部建立起来的钢架结构楼房的地基。内承重墙——对石料的支撑——也被发现太软，需要更换，因此，第一次露出了原有石块的内层面，杜鲁门高兴地发现，许多石块上都带有“共济会”象征的标记。（他还高兴地了解到，1792 年 10 月的那个星期六乔治敦的共济会成员在乔治·华盛顿总统和房屋的建筑师詹

姆斯·霍本面前埋下了这座楼房的第一块奠基石，后来，他们游行返回乔治敦，聚集在“萨特先生的喷泉酒店”里为美国的15个州，为总统和“普天之下的共济会信徒们”干杯。）

在“东厅”内1902年时挂上的灰泥后面发现了詹姆斯·霍本设计的原来的装饰性灰泥檐口。在东墙下面发现了托马斯·杰斐逊总统指示挖的一口井。埃杰顿将军在南草坪上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收藏着被发现的各种各样的珍品：一块有着一个狗脚印的砖头；在北门廊下找到一支埋在那里的长矛剑和一双古代的工匠鞋。

主层所有用作国事活动的主要厅室都要重新修建成为原来厅室的“忠实的复制品”。二楼三楼除了做一些小的改动外，也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室内原有的家具摆设，除了早已拿到布莱尔大厦的之外，最好的部分都已存放在国家美术馆。认为值得收存起来以备修建时再用的年代久远的红木门及窗框、壁炉台、金属器具和地板块、“东厅”和国宴厅的所有镶板都被编上号码，贴上标签，运到市区各地的联邦仓库保存。20个多余的壁炉架被送给了博物馆，而9.5万块左右的旧砖被卡车运往芒特弗冈（华盛顿总统的住地和墓地——译者注）供修复公园的围墙和重建乔治·华盛顿的柑桔园时使用。

还向公众提供了选购白宫拆卸下来的十几种不同的纪念品“物件”的机会，这些东西计有单独一块手工截开的1英尺长的原来的木板条，价格25美分；单独一块砖（“还几乎算是整砖”），价值1美元；一段年代够老的松木，价值2美元，足可以用它制成一根拐棍或法庭上用的惊堂小木槌。这些价钱意在支付销售时的费用。购买每件物品的人还可得到一小块金属的“证明牌”。人们付100美元买到的砖足以垒一个新的壁炉台面。

杜鲁门热诚赞同提供这些纪念品的主意，收款额最后超过开支1万美元。最初他曾说过要送给48个州的州长每人一把用白宫木料制作的小木槌。后来当发现石块上有显示原来的石匠的标记时，他下令搬走了大量这种石块，其中有些将重新放在修复后的一楼厨房的墙壁中，其余的将被送给每一个州的共济会组织的主要分会，作为共济会纲领和建国之间的联系的标志。

但是当拆卸工程的进度加快时，大量本该保留的材料却没有保留下来。成吨的古松木地板块、碎木料、古老的管道固定装置、松木门、砖头及石块被运往附近弗吉尼亚州的贝尔瓦尔堡和迈尔堡，其中有些材料被用于建筑，但大部分却将用作地面的填料。椅子扶手、门框、漂亮的灰泥装饰线条等（一旦它们已经为了复制而经过测量和计算）都被敲碎成为残骸的一部分。将近一个月来，卡车满载着白宫的“碎片瓦砾”在越过波托马克河至弗吉尼亚的公路上来来往往不停地行驶着。

按照现代维修工作的标准，这是不需要的和悲剧性的损失。为之进行辩护的花费将会很大，而且总统本人希望看到这项工程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

在翻修之前，白宫有62间房子、26个大厅和走廊、14间浴室。翻修完工后，将有100多间屋子、40个大厅和走廊、19间浴室。还会有147扇窗户、412扇门、29个壁炉、12个烟囱、3座电梯。也还会有一个电视广播厅和一个防空洞，这两套设施在当时都是明确的和耗资巨大的标志。

大多数新增加的房间和浴室都放在了三楼（31间屋子和9间浴室）和新的地下室里，这些修好之后将会很像一家50年代现代饭店的台后服务和公用事业集合体。有几间贮藏室、一间洗衣房、一个牙医室、医疗室、工作人员

厨房、理发室、餐具室，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全国的任何地方，很少有像正在形成中的新白宫这样在里面具有先进的机械和电气设备的建筑物。电气主控制板看起来大得足够一个剧院使用。管道设施、暖气设备、空调设备、厨房用具、电梯、垃圾焚化炉、火警系统、墙上保险箱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最先进的，耗资远在 125 万美元以上。为了安装空调设备的冷却压缩机，在贴近北门廊的外边不得不又挖开了一块很大的地方。

为了使最下面的地下室具有防弹能力，又追加了 86.8 万美元的施工费用，而且未引起任何非议。特工处和杜鲁门的军事顾问们使他确信这样做的必要性。这一决定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残酷的头几个月内做出的，当时似乎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随时爆发。1950 年 8 月 16 日，翻修委员会得到通知说：“总统已经批准在白宫内以及靠近其两边侧翼楼的地下室那一层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进行这一工程的计划目前正由白宫的建筑师在制定中……”

这一变动意味着在走廊的墙壁内和上面的地面上增添许多吨的钢条和混凝土，整个工程全速向前赶。防空洞不到一年就修好了，甚至比它楼上的那几层更早接近完工的时间。

在白宫的东北端有一个地下通道的入口，门口有一扇 4 英寸厚的钢门，上面在齐眼睛高的地方有一个狭小的瞭望窗，就像一家非法小酒店的入口处那样。如果总统和与他在一起的那些人在原子弹袭击已经发生后来到这个防空洞，他们走进一间小门厅后需要立即脱掉他们的衣服，然后裸体进入另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厅，在那里他们要进行淋浴——去除身上的任何辐射物质——并穿上救生服装。这些到 1951 年的夏季时，就像防空洞中的其他每样东西那样，都已准备好并等着使用哩。

再往里走是一间大屋子，靠着的一面墙整齐地堆放着大约 70 张军队帆布床、防毒面具、化学盥洗室和乙炔焊枪（假使占用者需要切割钢门逃生时用）。在与其相连的屋子里有紧急发电机，一个军队给养的食品贮存库；一个通讯联络中心，装备有无线电和密码机以及可以与五角大楼、国家警察总部及利兹堡附近一个以“气象山”闻名的秘密军事调动中心进行直接联系的电话交换台。供总统及其家人用的居住设备有一间 8×10 英尺的居室、4 张双层床、一间厕所和许多书籍。

在第一次参观防空洞时，人们告诉杜鲁门，在遭受原子弹袭击时这些防范设施可以使里面的人免受其害。然而这些设施却经受不住直接命中的打击。如同特工处和总统的多数工作人员早就知道的那样，如果受到原子弹袭击，杜鲁门打算在这期间和其后的时间里，留在白宫还是进入防空洞，主要是由于“士气方面的原因”。

（有一次，一名雷达操作员错误地报告说有 25 架——结果只是一架——非预定的且国籍不明的飞机飞临本地上空，白宫的几名工作人员进入了下面的防空洞，杜鲁门却没有进去。）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白宫翻修施工的进度比原计划要快得多；但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以及建筑材料日益短缺，施工进度放慢下来，开销则开始增加。干活的约有 250 人，每周工作 6 天。杜鲁门一再到工地上来转转，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来得如此频繁，以致工人们都几乎懒得抬头瞧他一眼或者理会他。

“他认为这是他的工程。他正在拯救白宫，他也常常表示出他很想把这件事情干完。”定期陪伴总统去进行这些巡视的特工人员之一雷克斯·斯考

顿这样回忆说。几年之后，斯考顿成为白宫传达室主任，后来又成为白宫博物馆的馆长。

杜鲁门总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得尽善尽美，工作是这样，起草文件也是这样。当他得知，翻修委员会作为削减费用的一种办法准备免去制定详细的新楼设施规划图时，他立刻给服务管理总局的负责人写了一份简明扼要的备忘录。

把楼里的电线、自来水的管道、地板下面各种复杂设施以及空调设备等绘制成图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白宫今后的机械师在需要维修设施时就能很方便地找到有关的东西。旧白宫的一大困难就是无人知道所有设施都是怎么规划的而且为何要这样安放。

如今，在档案室、在服务管理总局和在白宫中没有全部设备的完整规划真是太没有道理了，我要求这样做，即使这样干需要另加经费，我们也要那样做。

杜鲁门提出的修一个豪华楼梯的建议是他本人对新白宫设计的主要贡献。他坚持要把楼梯重新安置在主门厅的东侧，修得更加开阔，更适宜于总统及其贵宾在庆典仪式上列队行进。以前，楼梯的大部分是看不见的。

在好多年内，杜鲁门常对朋友和他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迫选择一项政治以外的职业的话，他会选择农民、历史学家或建筑师。如今，与温斯洛一起工作，他可以尽情地深入思考计划和制图，就像当年他与爱德华·尼尔德合作修建堪萨斯城县政府大楼一样，而且开始时，他与温斯洛合作得很好。温斯洛，高高的个儿，风度翩翩，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自30年代以来，他一直是白宫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精心维护着这座大楼，了解并热爱白宫的历史。私下里，他甚至同少数几位已经去世的总统的灵魂亲密地交谈。（195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在招魂板上施展了一番巫术后在日记中写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现在我面前，送我一枝玫瑰花，就像安德鲁·杰克逊做的那样。”）他虽已结婚，但仍与另外几个女人有婚外恋，而当杜鲁门似乎已经知道这一情况时，他表现得只是在工程进度开始滞后时才对此日益生气。杜鲁门失去了他的耐心，常会对温斯洛变得粗鲁无礼。

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在一起工作得很顺利，彼此都很佩服对方的长处，很高兴看到双方经常有共同的见解。温斯洛总是写出很长的备忘录，向杜鲁门报告工程进展情况，或者列举当前的问题，而杜鲁门总是用普通写法在备忘录的边缘空白处或段落之间给予答复。比如有一次，温斯洛报告说翻修委员会打算拆除南草坪上的临时小棚，在新的地下室地区内修建各种不同的库房和设备供工人使用。杜鲁门潦草地写道：“不行！——杜鲁门。”

（温斯洛在报告中继续称）有可能一层楼的范围将被……

用做承包商的办公室（而且）毫无疑问，这将会大大损坏内部各种终饰，而这些在最后一分钟时是不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修复的。

别用一层楼的范围。——杜鲁门

地下室范围在完工后应尽量保持整洁。在这种住宅内把任何这样的范围用作工人和技工的库房和化妆室是不能想象的。

就不能这样做——杜鲁门

我倾向于这种意见：南草坪上的小工棚应该一直保留到整个大楼内部的所有工程接近完工的时候。如果按此办理，那末所有的工具、油漆及其他建筑材料可以继续保存在大楼外面，它们应该妥善保存的地方。

对——杜鲁门

每一间厅室彻底翻修完毕后都应该锁起来，直到往室内搬进供居住用的家具时为止。此后，工人、政府人员等在没有得到翻修委员会执行主任的特许时，不得擅自进入大楼内部。

太对了——杜鲁门

1951年8月，泥瓦工人罢工2个星期，致使施工进度更加缓慢。充其量是个缓慢工序的在地板上铺细的镶木地板的活儿，好像总也干不完一样，因为几乎很难找到懂得应该如何干这种活的手艺工人，而能找到的那些人又往往是年纪已经很大而且工作得很慢。

纽约的“B·奥尔特曼公司”承包了白宫的家具配备和室内装修工作，这使整个工程代价很高。许多在社会上知名的纽约人在过去的岁月中曾在白宫顾问委员会中任职，当他们开始迫切要抓住机会提供他们的看法时，杜鲁门写道：

我想让人们清楚地了解，这件事将受到我的密切注意，（将）不允许任何有特权的人来决定该怎么做……

我对白宫内的家具设施按照它们应该放置的样子来妥善地把它们放回原处十分感兴趣，而且既然我是50年来唯一的一位对修复白宫工作感兴趣的总统，因此我要看到这项工作正确和妥当地完成。

这个问题解决后，工程便主要在奥尔特曼公司年轻的设计主任查尔斯·T·黑特的指导下进行。黑特是个精力旺盛、能力很强的人，他与总统和第一夫人相处融洽，甚至也不在乎杜鲁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施工现场。

杜鲁门不断催促要加快施工进度。他要求在1951年圣诞节前一切工作都要完成。他希望在他任职期满之前能在白宫里至少居住一年。新的一年开始后，镶地板的活儿仍然比计划规定的要慢。安装大理石和装饰板的工作也未完成。浴室附属装置尚未运到，而且虽然约有20名油漆工人投入工作，却仅有3楼、客人和服务人员的住处已经完工。

喧闹和混乱没有停止。1952年2月，主层里放满了脚手架、油漆桶和成堆的木料。这时杜鲁门带领六七个记者来进行预展参观。他显然很高兴地说，工人们正在加速施工。他“给他们带来了一把马梳”。他打算4月份搬进白宫。记者们承认难以想象完工后的大楼内部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3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白宫的改建工程“正在以加倍的速度进行着”。

两辆大型运输货车停在白宫的正门廊下，搬运工从车上卸下东西，经过白宫的双重门运进里面。推土机赶在园艺师之前平整出一

块新的前草坪，园艺师们则把卡车拉来的大批草皮铺种在上面……

12天之后，3月27日星期四下午较晚的时候，杜鲁门在基韦斯特呆了一周后返抵华盛顿，他偕夫人贝丝驱车前往白宫，经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北门进入白宫。

又值春季，大厦在黄昏里显得温暖、喜庆，一楼每个窗口都闪耀着灯光。这一天在前草坪上刚刚栽种的一棵群花盛开的大樱桃树成了喜庆的进一步标记。

在北门廊下，几名白宫工作人员、翻修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一些人正站在门口等候着，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群记者，摄影师和新闻纪录片摄影记者。在铁栅栏外面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他们一边鼓掌一边高呼欢迎。

传达室主任豪厄尔·克里姆站在门口迎接总统。看门人约翰·梅斯接过总统的外衣，他是白宫的老看门人，自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以来他一直在这里工作。

如同记者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草草记下的那样，杜鲁门从外面走进来，“皮肤晒成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显然十分高兴”。在离开白宫3年零4个月，美国总统又重返他在白宫的住宅。

大厦里灯火辉煌，映得室内所有的东西——水晶枝形吊灯与红色地毯、窗玻璃、大理石圆柱、镶有镀金框架的镜子——都在闪闪发光。木制地板擦亮的玻璃一样闪亮。新上油漆的墙壁和天花板也闪耀着光辉。这种效果令人晕眩。一切东西看起来和原来的差不多，然而更加光亮，更加宽敞、更加完美。

与贝丝一起，杜鲁门巡视了整个一楼。在白色和柠檬黄金色交相辉映的东厅里，安装了用田纳西大理石制作的新的壁炉台，为的是向翻修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凯勒表示敬意。厅内相对的两个角落里各有一架豪华的大钢琴，在远处靠墙的地方有两条新近得到的亚当长凳——是由爱丁堡的约翰·亚当设计的18世纪的长凳。除这些外，厅里没有什么家具，厅里的镶木地板在两盏水晶枝形吊灯的映照下亮得像玻璃一般，吊灯还挂在原来的位置，但形状的大小比原来稍微缩小了一些。绿厅曾经是杰斐逊的卧室，后来当作饭厅，再后来成为接见外交使节的接待厅，它看上去与原来毫无差别，墙上贴着同样的丝绸墙面，还有同原来一样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壁炉，它是詹姆斯·霍本于1816年定做的。然而，在蓝厅门口的上方有一个新的总统印章，原先这一印章刻在主门厅的地板上，但杜鲁门坚持要把它移开，因为他不喜欢想象到人们踩在它上面走路。

椭圆形的蓝厅的色彩已从蓝黑变为深蓝，其红玫瑰色丝绸墙面上的大图案的基本花纹都是金黄色的，而红厅则有新的红玫瑰色的绸缎墙面、新的帷幕和挂布，都是很红的颜色，衬托着另一个用有光泽的白色卡拉拉大理石制作的霍本式壁炉架。杜鲁门特别喜欢红厅壁炉架上的一个法国小闹钟以及墙上的4幅画像：是威廉·麦金莱、格罗佛·克利夫兰、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画像。罗斯福的这幅画由约翰·辛格·萨金特所作，杜鲁门总爱说“这是白宫里最值钱的一幅画。”

国宴厅过去的色彩颇为柔和，甚至暗淡，并用深色橡木板装饰。现在厅内涂上了淡绿色油漆，杜鲁门认为这是一种“可爱的颜色”。在厅内壁炉台的上方挂着由乔治·P·A·希利画的一大幅亚伯拉罕·林肯的画像，镶在镀



金很厚的框架中。

由于事先有约，贝丝这天晚上要去斯塔特勒参加救世军晚餐会，杜鲁门只得一个人用晚餐，他呆在国宴厅旁边的家庭餐厅里，头上是别人新近捐赠的古色古香的刻花玻璃枝形吊灯和一尘不染的全部重新换过的天花板，原来这里的天花板曾被玛格丽特的钢琴戳破过一个洞。

“贝丝和我看遍了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和国宴厅。”杜鲁门那天晚上这样记载道，“这些厅看起来可爱极了。门厅和礼仪用的楼梯也如此……我整个晚上都在房子里转来转去，费了这么多周折，操了这么多心，这一切看来都是值得的……”整个翻修费用为 583.2 万美元。杜鲁门认为如果完全由他来负责这项工程，可能会花钱少一些，耗时也会少一些。虽然这样，但他还是极其高兴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告诉他，翻修后的白宫还可使用 500 年。他希望能达到 1000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二，白宫重新对公众开放，5444 人参观了白宫。5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杜鲁门以新居主人的身份自豪地主持了他自己的参观大厦的电视节目。3 家主要广播网播放了这个节目，3 位有名的节目主持人出场解说，他们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森·拉什，全国广播公司的弗兰克·布戈尔策。他们 3 人轮流陪伴总统并向他提出问题。3000 万人收看了一所房屋的参观节目，这是收看此类节目最多的观众。没有剧本，杜鲁门却处在最佳状态，放松，文雅，有趣而且充满智慧。

《纽约时报》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写道：“他的泰然自若，他的自然的由衷的笑声以及他的直觉的尊严有助于一种非同凡响、引人入胜的视频感受。”在东厅里，为了证实豪华的斯坦韦牌钢琴的音质，杜鲁门对弗兰克·布戈尔策说：“这是我曾经听到过的任何钢琴的最美妙的乐音。”他坐下来即兴弹奏了莫扎特第 9 奏鸣曲中的部分章节，然后穿过屋子走到一架按照他的说法是美国制造的鲍德温牌钢琴旁，以站着的姿势也又弹奏了几小节的音键。

他谈到了艾丽斯·罗斯福在东厅里举行的婚礼，而且回忆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遗体就是在这里供公众瞻仰的。

总统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情报源泉（杰克·古尔德写道）。他介绍了室内布置和家具设施，并且提供了大量白宫前居住者们的趣闻轶事。然而贯穿在他的叙述中的的是他对总统职位的历史性连续怀有深厚诚挚的和令人感动的敬畏这样一种基调。

### 3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杜鲁门一直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他希望有人成为民主党参加 1952 年 11 月总统竞选时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名，并在 1953 年 1 月总统就职日以后接任他在白宫的职位。他预料共和党人将会推选塔夫脱参加竞选，而塔夫脱当总统的前景对他来讲是无法忍受的。决不能让一个“孤立主义者”接任总统，这将破坏他曾为之工作的一切。

到 1951 年夏末，他似乎已断定理想的民主党候选人，“最符合逻辑的和最有资格的”是最高法院院长弗雷德·文森。但是，文森婉言谢绝说，他脱离政治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杜鲁门在 11 月再次尝试，邀请文森到基韦斯特，

以便两人能够在小白宫里自由地私下交谈。在这之前，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一次，在会见当中，两人就许多问题发生争论。

艾森豪威尔当时还是国家的头号英雄，他是否会竞选总统仍然是非常无法正确估计的，虽然从他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传来的报道来判断，他对这个主意充满了热情。

在 11 月的第一周，艾森豪威尔对华盛顿做短期访问，这位将军与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共进午餐。据报道杜鲁门再次要提供其全力支持，如果艾森豪威尔接受民主党对他的竞选提名。会谈是在 5 日进行的。7 日，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披露了这个消息。他后来透露说，克罗克的来源是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后者告诉克罗克，他是在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共进午餐那一天的早些时候在布莱尔大厦的一次招待会上，从杜鲁门本人那里听来的，当时在场的还有最高法院院长文森和来自法院的一、两个其他人。艾森豪威尔据说当时这样对杜鲁门说：“你不能仅仅为了竞选就加入一个党。什么原因使你认为我曾经加入过民主党呢？你知道我终生都是共和党人，我的家人也一直都是共和党人。”

一周之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否认了上述报道，艾森豪威尔在巴黎也对此表示否认，两人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都如此。克罗克在《纽约时报》的同事 C·L·苏兹贝格有一天晚上在巴黎采访艾森豪威尔之后记载道：“他告诉我，阿瑟·克罗克关于杜鲁门在 1952 年向他提供民主党候选人资格报道实在是不真实的。”

在晚餐前和晚餐后他两次对我这样说。在他这次旅途中首次遇见杜鲁门时，他俩便互相使眼色并立刻达成共识说有一个问题是他们不打算谈论的，而这是他们谈话中最接近于政治的问题。

当文森到达基韦斯特时，杜鲁门对他说，如果他同意，候选人的提名将是他的。文森踌躇不决，说需要时间与他夫人商量一下此事。后来在华盛顿，文森告诉杜鲁门，他认为最高法院不应被看作入主白宫的踏脚石。杜鲁门引证前最高法院院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例子反驳说，休斯曾在 1916 年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而且差一点击败伍德罗·威尔逊。文森最后以健康为由加以拒绝，显然这使杜鲁门感到十分吃惊。但是，文森看起来气色一直灰黄，而且确实健康很差。他 2 年之后于 1953 年 9 月去世，时年 61 岁。

到年底时，杜鲁门似乎有点左右为难，甚至对他自己的打算也是这样，这种心态可从他 1951 年 12 月 18 日以普通写法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看出：

亲爱的艾克：

专栏作家、华而不实的杂志以及所有喜欢预测的政界人士都在纷纷评述 1952 年将发生什么事。

像 1948 年时以及 1951 年我们共进午餐时我对你说的那样，按你最好的想法为国效力吧。我本人的立场尚悬而未决，如果我于我想干的事那我就回到密苏里州去，而且或许参加竞选当个参议员。如果你决定结束在欧洲的工作（而我不知道这项工作舍你其谁），我就必须把孤立主义者堵在白宫之外。我希望你会让我知道你打算怎样做。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我对你的判断力和你的爱国主义具有最大的信心。

艾森豪威尔也很想同他的家人在一起过一种半退休的生活，他回信对杜鲁门说：“但是正如你已断定的那样，环境也许不允许你去干那正是你想干的事情，所以我已发现强烈的愿望有时可能不得不为对责任的确信让路。”艾森豪威尔说他无意于寻求总统职位。此外，“你比我更了解，我会被卷入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以致常被人们所忽略。”

艾森豪威尔这封信写于1952年元旦。5天之后，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在华盛顿宣布，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运动办公室成立。第二天1月7日在巴黎，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准备接受共和党的候选人提名。

在他下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被问及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宣布有何看法时，他只是赞扬了艾森豪威尔。他说：他是“一个大人物。我确实由衷地喜欢艾森豪威尔将军。我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完全不想挡住他的路，因为我对他寄予厚望。如果他要出去，并引起人们向他抛掷泥巴和臭鸡蛋，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当对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聚集起力量时，杜鲁门用近似悲哀的声音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很难过地看到这些家伙把艾克拉到这种事情中来。他们向他展示的金门和银门结果将证明是铜的和锡的。”

由于文森不再有可能被民主党提名当候选人，杜鲁门断定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将会是最佳人选。艾尔本·巴克利太老了，已经74岁。总统的职务干3个月就会要他的命，杜鲁门这样认为（杜鲁门在日记中伤心地写道：“他签自己的名字要费5分钟的时间。”）。艾夫里尔·哈里曼，杜鲁门对他的判断是“他们所有这些人当中最能干的”，但他从未竞选过官职，他的华尔街的背景肯定会使他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难道我们能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上的华尔街银行家或铁路巨头当美国总统吗？”）。参议员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是个有可能当选的人，但杜鲁门本能地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党内多数忠于领导的人对他也有同感。杜鲁门私下称他是“牛热病”。

对比之下，艾德莱·史蒂文森比较年轻，才51岁。他有能力而且有进取心，是一个主要工业州的州长，获得过正派州政府的称号，而且是个新面孔。1948年，史蒂文森第一次参加竞选任何官职的运动，以压倒的57万张选票在伊利诺伊州获胜，这给杜鲁门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杜鲁门这样写道：“他在那次竞争中证明了他知识渊博而且“同情”政治，他懂得政治充其量是政府的职责和艺术，而且他了解到为了落实我们的自由政府形式的职能，我们必须具备政治方面的知识。”

杜鲁门竟然转向史蒂文森，为此他是值得大大称赞的，因为不仅从全国范围来看史蒂文森在政治上还是默默无闻的，而且是个与杜鲁门完全不同的人。史蒂文森出身名门，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个有前途的律师。他能言善辩，灵敏机智，文质彬彬而且离婚独居，他几乎与杜鲁门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与当时的多数政治人物也极不相同。此外，杜鲁门以前几乎不认识他。但是，杜鲁门读过史蒂文森的演讲稿，很喜欢他的讲话，而且很欣赏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他的中西部背景和他继承的政治遗产——史蒂文森的祖父，首位艾德莱·E·史蒂文森曾经是一位民主党众议员，当过格罗佛·克利夫兰的副总统（杜鲁门称许地写道：“他出自政治世家。”）。而且白宫里的好几

个较年轻助手对史蒂文森也极感兴趣，在他身上看到了振兴民主党所需要的那种品质。

杜鲁门没有找任何拐弯抹角地提建议的借口，他要求这位州长于 195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的晚上来见他，与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俩在布莱尔大厦这个僻静的地方单独会晤。史蒂文森一路谈话时一次走过外面卫兵站岗的地方，卫兵竟然从未听说过他。

杜鲁门后来在详细叙述这次谈话时说，他向史蒂文森详尽地谈了担任总统职务的问题，然后要求他承担这一任务，说他只需要对此表示同意，这个提名就是他的了。史蒂文森可以期望得到杜鲁门的绝对赞同。杜鲁门在后来的笔记中写道：“我告诉他，我不会再竞选总统。我的看法是，他是这个位置的最合适人选。”

他被说服了……（我）表示要在 1 月份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名让他当候选人。我不得不向他说明任何总统都能控制他所在的党的代表大会。然后我举出杰克逊、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我本人 1948 年在费城的例子。我提醒他华盛顿选择了约翰·亚当斯接替自己；在利用代表大会之前杰斐逊用同样的方法选择了麦迪逊，麦迪逊则选择了门罗……我告诉他，无论他愿意与否我都能使他被提名当候选人。然后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打算怎么做。他感到很忧虑，并且说没有哪个爱国者会拒绝这样的条件的。

但是那天晚上史蒂文森还是说了“不”。杜鲁门判断说：“他显然是惊呆了。”但杜鲁门拒绝放弃最后的机会。

据史蒂文森一位亲密朋友说，史蒂文森在离开时心里充满了对杜鲁门的仰慕之情。当他到达时，杜鲁门正坐在炉火旁读圣经。

杜鲁门具有自制力，能保持内心的稳定，这一点给史蒂文森留下深刻的印象（卡尔·麦高恩回忆说），这是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的单纯的人。史蒂文森本人此时心里正翻腾不已，对杜鲁门的沉着、稳健及自制的品质感受很深。

史蒂文森后来对詹姆斯·赖斯顿吐露，杜鲁门说过史蒂文森是能够击败艾森豪威尔的人，当时共和党很可能选艾森豪威尔做总统候选人。杜鲁门说过，艾森豪威尔是个好心肠的人，但是，他缺乏政治经验，必然会被塔夫脱控制，从而破坏杜鲁门的外交内政计划。因而使一个民主党政府继续占据白宫是至关重要的。史蒂文森十分激动不安地告诉赖斯顿，总统希望他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手中把世界拯救出来。

史蒂文森的另一朋友乔治·鲍尔那天晚上开车接送他去布莱尔大厦。据他讲，杜鲁门也曾评论说：“艾德莱，如果说一个像我这样木节脑瓜的人都能当总统而且干得还不太坏，那么想想吧，像你这样一个受过真正教育、脑瓜又灵活的人干这样的工作会是什么样。”

但是史蒂文森还是拒绝了杜鲁门的要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想留在伊利诺伊州当州长，而且他不太肯定在华盛顿换成一个共和党政府对国家来讲会

是什么坏事。私下里他想知道民主党掌权的时间是否太长了。而且，不论怎样，考虑到杜鲁门名望的悲惨境地，他并不认为成为杜鲁门精选的候选人必然会是一件好事。史蒂文森告诉乔治·鲍尔，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没有人能够击败他。

3月4日，杜鲁门和史蒂文森在布莱尔大厦再次会见，这一次是应史蒂文森的请求。

（他）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决定竞选伊利诺伊州州长的连任（杜鲁门写道），而且他认为他不可能体面地违背该承诺。我对他的观点表示欣赏……他是一个很守信义的人。如果我在他宣布竞选之前就找他谈这件事该有多好。他也十分谦虚。他似乎认为我有点像个超人，这当然不是事实……他争辩说只有我才能击败任何一个共和党竞争对手，不管他是塔夫脱、艾森豪威尔、沃伦还是任何其他人！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一个小时前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当这个时刻来到时我会知道的，因为我相信全能的上帝会指引我的。

好几个星期以来，杜鲁门对待再次竞选的前景问题不很认真。他的一些工作人员确信他已改变主意，而且可能将宣布他的候选人身份。

3月11日，埃斯蒂斯·凯弗维尔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走遍全州各地发表竞选演说，戴上有他形象商标的乡下佬帽子，而且谴责政府在反腐败方面做得太少。杜鲁门虽然容许自己的名字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但并不见诸于竞选行动。他认为初选是许多“骗局”。尽管如此，凯弗维尔已向竞选总统发出挑战，而且轻易地取得了胜利。

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一次小型私人晚餐会上，杜鲁门请来了他的几位亲密的顾问，包括新任的民主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他在席间征求来宾们对他参加竞选的意见。他是否应该成为一名接替他自己的候选人呢？说得尽可能得体的回答是“不”。

杜鲁门到基韦斯特去了，他于3月22日打电话给克拉克·克利福德要求他前去那里。第二天，他俩单独坐在小白宫后面的花园里。克利福德对总统说，他希望他不再竞选。杜鲁门则表示担心如果他退出竞选可能对朝鲜战争产生影响。克利福德回答说，战争的发展早已成为定局了。

3月23日同一天，一名当史蒂文森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名叫戴维·劳埃德的白宫助理人员在杜鲁门不知道的情况下给史蒂文森州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促请史蒂文森重新考虑问题，而且主要是为了杜鲁门：

任何与此人一道亲密工作的人都爱戴他。所以我是抱有偏见的，而且像其他人那样，我认为他应该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由于他已投入到工作中去的一切，由于他对工作奉献自己的方式，由于他为我们大家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如果他想要退位，而且希望你接替他的工作，他应该想怎样就怎样。这也许听起来对你有些难受。但其中有着比我个人对他的感情更多的东西。由于他代表的正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我们必须支持他。如果我们不支持他，那

么我们就向世界表明了并非在认真对待我们所谈论和为之奋斗的事情，世界也将停止认真对待我们……

3月29日在国家军械库举行了杰斐逊—杰克逊纪念日晚宴，民主党人每年要利用这种宴会搞一场大型的捐款活动，来宾都需戴黑色领结，每人捐100美元便可得到一份份饭，艾丽斯·艾奇逊在赴宴途中问她的丈夫，他是否认为杜鲁门在晚餐结束后的讲话当中可能透露他的政治前景。这位国务卿像她后来告诉他的那样，用一种显然是上级的态度说：“根本不可能。”艾奇逊解释说，对总统来说现在宣布他无意再一次竞选尚为时过早，而如果他宣布相反的决定，则又会使参加宴会的许多人大失所望。

杜鲁门出现在讲坛上，看上去皮肤晒成棕褐色，因为这一场合而精神抖擞。他在一次生动的富有战斗性的讲话中适当地攻击了共和党一番并维护了他自己的政绩。讲完后杜鲁门把已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开始回答问题：

“我将不是再次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我为国家服务的时间已久，而且我认为我是卓有成效的和诚实的。我将不接受再次提名。我并不认为我有义务在白宫再呆4年。”

这番话是在没有造舆论的情况下几乎是干巴巴地讲出来的，在场的众多听众在几秒钟内安静地坐在那里并感到一片茫然。随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混合场景，有人自动鼓掌，有人高喊“不行”，就连有些曾经希望他会下台的人也这么喊道。1948年曾经试图制止杜鲁门被提名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道：“我发现自己在大声地叫喊‘不行’。然后我觉得奇怪我到底为什么要喊‘不行’，因为这正是几个月来我一直盼望出现的事情。尽管如此，‘不行’的叫喊声似乎至少是对总统高贵而勇敢的克制自己的这一做法应有的评价。”

杜鲁门迅速地离开了现场，向人们挥了挥手，脸上微笑着，然而显得多少有点紧张，虽然第一夫人有的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表情。哈里·沃恩后来告诉总统：“当你发表你的声明时，杜鲁门夫人看起来就像你在抽到4张“A”牌时的表情一样。”

总统和第一夫人回到白宫时，许多站在门口等候的家务工作人员都哭了。

几天之后，在他召开的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是否计划竞选参议员，他回答说：“不。”（他对工作人员说过，杜鲁门夫人不希望他那样干。）问他是否赞同史蒂文森获得候选人提名？他未做评论。

史蒂文森从斯普林菲尔德写来了这样的信：

星期六晚上在你那超等发言之后我被你的宣布惊呆了。我只能接受你的判断，即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虽然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希望并祈祷这可能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于我本人，我不会对你的信任努力表达我的深切谢意。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对于你对于我的信任以及你给我的荣誉无动于衷。

杜鲁门立刻写信回复说，他“极其高度地”赞赏史蒂文森的来信。当前需要这样一个人，他将会“坚持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制定的并由我竭尽全力加以贯彻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我们也必须有一位相信现行的国内政策已使

这种对外政策得以实现的总统”，因为没有了这一种政策就不可能有那一种政策。“我真诚地希望你不会使自己完全置身其外”。

富有特色的是，无论在与史蒂文森打交道中遇到过什么挫折，杜鲁门总是愿意再试一试。

#### 4

罗杰·塔比写道，总统如何挨过了4月最初的几周证明了他的令人惊异的精力。塔比本人，如他写的那样，感受是生不如死。

4月3日，杜鲁门解除了司法部长麦格拉思将军的职务。几个月来，麦格拉思似乎一直阻碍着杜鲁门下令对国内收入署腐败行为进行的调查。杜鲁门感到自己被他所信赖的人“出卖了”，因而在1952年1月把“清查工作”交给麦格拉思。这样做引起了对他企图掩盖事情真相的指控，因为麦格拉思是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麦格拉思曾在那时任命纽约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共和党人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莫里斯不久即与麦格拉思发生争吵而且得罪了国会。莫里斯发出了一份长长的复杂的调查表，要求所有联邦雇员包括内阁成员填写，调查表列举了他们的财产和收入来源。麦格拉思大怒，说这份调查表侵犯了隐私权，违反了个人权利。麦格拉思拒绝填写这份调查表，而杜鲁门在看了一份该表后也断定不应采用这种方法。

杜鲁门对麦格拉思在他工作上“无法于得出色”感到绝望。他喜欢麦格拉思——“我根本不认为霍华德个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他后来这样说——但是发现他的表现确实令人感到灰心丧气。4月3日，麦格拉思宣布他已解除了纽博尔德·莫里斯的职务，而且显然他认为这是杜鲁门想要干的事，这时杜鲁门就撤了麦格拉思的职。

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写的，由于这个滑稽的结局，整顿政府的努力似乎已化为泡影。“这种整顿活动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很糟糕，几乎是行政管理部门的一场杂耍表演，最后结果只是强调说明‘华盛顿的混乱’，远不只是共和党的幸灾乐祸的吸引人们注意的话。”杜鲁门对所有这一切感到沮丧。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这段插曲只字未提，不过没过多久他给麦格拉思写信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好感没有因此而改变分毫。政治形势有时会给一个人造成很大的痛苦。”

到那时，杜鲁门被卷入了电话和电报行业的罢工浪潮，以及另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钢铁工业罢工的威胁。他显露出那些接近他的人很少见到过的过度疲劳的神态。他看起来严峻宁静，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一天早晨在开完工作人员例会后，当威廉·霍普金斯把一堆日常文件拿来请他批阅时，杜鲁门请求暂缓办理，“等我感觉不再那么虚弱时再说吧”。他承认，他确实太疲劳了。前一天晚上在白宫，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是他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似乎被他的职责和决定以他从前从未有过的方式压垮了，好像他不再参加竞选的决定，不再当总统的前景使他受到了一些损伤。

罗杰·塔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麦格拉思，也许会一直发展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朝鲜停战谈判，钢铁、电报及电话业的罢工，以及他不再参加竞选的决定，这些最近发生的事件一直

都在消耗着他的感情储备……我们力劝他休息一个周末，减少他下午的约见活动。他快活起来了，说他认为乘坐“威廉斯堡”号游艇沿河而不是个好主意……但是，马特提醒他说他不能离开，因为星期天他要参加杰斐逊纪念馆的敬献花圈的仪式。“天啊，这是什么样的三个星期啊。”杜鲁门反感地说道。

4月8日星期二，这关键的一天的约见日程具有典型的意义，它甚至还不包括后来成为那天最重要的事件在内。

- 9点45分 接见M·C·沃尔格伦先生（打电话给康内利先生）
- 10点 （工作人员）
- 10点30分 11点接见预算局长弗雷德·劳顿先生（需半小时）
- 11点15分
- 11点30分 接见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克拉克·汤普森先生（4月9日动身去得克萨斯州，请求在此之前见总统）
- 11点45分 接见密苏里州国会议员摩根·莫尔德先生（很快要去密苏里州，请求召见）12点 接见新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埃尔思沃思·邦克先生  
（4月7日—9日在本市，通过国务院请求见总统）
- 12点15分 接见艾尔弗雷德·基尔希先生（基尔希先生是长岛韦斯特消毒公司的总裁和司库——打电话给康内利先生）
- 12点30分 接见国防部长（每周例行会见）
- 1点 在最高法院吃午饭（法官明顿打电话给总统）  
总统将于下午12点45分离开白宫
- 3点 接见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约瑟夫·基南先生（打电话给康内利先生）
- 3点15分 接见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哈利·M·基尔戈先生（打电话给康内利先生）
- 3点30分 接见农场主协会主席詹姆斯·佩顿先生（本周在本市，请求安排会见）
- 3点45分 接见哥伦比亚特区专员J·拉赛尔·扬先生（提出他的辞呈——打电话给康内利先生）
- 4点 接见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先生（打电话给康内利先生）
- 7点50分 总统将离开白宫去出席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国代表大会在肖尔海姆举办的晚餐会——这是与“第4点计划”有关的会议。总统将在晚上9点45分发表讲话

结果那天晚上他没有按预定安排在肖尔海姆发表讲话。而由国务卿代替他讲话。因为那天晚上他在白宫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向全国发表声明，他要接管钢铁厂。

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做出的最大胆、最有争议的决定之一。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钢铁危机的严重性由于朝鲜战争而有所缓解。朝鲜战争对杜鲁门的整个第二届任期投上了阴影，而且它很少不在他的挂念范围之内。他在广播讲话中强调说：“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我必须要考虑我们在朝鲜的士兵……”



他们需要的武器和弹药……”而且，这一年是大选年，如他所看到的那样，他的全部对内和对外计划都在争论中，他不希望脱离劳工。

根据杜鲁门阅读的历史来判断，他确信自己的行动是属于他作为总统和总司令的权力范围之内。他指出，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林肯总统曾经中止过人身保护的权力。现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姆·克拉克在过去任司法部部长时曾向总统建议，在遇到灾难性罢工时，总统拥有“固有的”权力来阻止国家经济陷入瘫痪。

杜鲁门的法律顾问们都支持他的观点，而弗雷德·文森也意味深长地支持他。根据约翰·施奈德后来的评论，这位最高法院院长曾表示信任地建议总统，他可以以法律为理由采取行动和接管钢铁厂。这个意见显然违反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分工，而且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尤为不合适，因为接管钢铁工业必然会受到法院的非难，因而文森本人很有可能在权衡这一案例后结束他的职务。但是出于友谊和忠诚，文森提出了这个人们非常关心的建议。

道路扫清了，杜鲁门对始终小心谨慎地反对接管钢铁厂的施奈德说：“总统有权力阻止国家走向地狱。”他向他的工作人员保证说。

钢铁工业的危机由来已久。在战争要求的驱使下，钢铁工厂的生产量达到了最高记录，利润也不断增加。然而与汽车和电力工业工人不同的是，钢铁工人的工资自1950年以来未曾增加过。1951年11月属于产业工会联合会一部分的拥有65万钢铁工人的联合钢铁工人工会在主席菲利普·默里的领导下提出每小时工资增加35美分的要求。资方拒绝进行谈判。工会通知说到12月31日它的合同期满时将举行罢工。12月22日杜鲁门把这一争端提交工资稳定局去解决，而为了维持生产，工会同意把罢工期限推迟至4月8日。经过几个星期的意见听取会，工资稳定局提出每小时工资增加26美分的建议，工会很快表示同意，钢铁公司却斥责该提议不合理，除非他们能把每吨钢的价格一下子提高到12美元。

谈判继续进行着，结果却以僵局告终。随着4月最后限期的临近，如新闻界报道所说的那样，国家正面临着“燃眉之急”。对杜鲁门来说，工资稳定局增加工资的建议似乎是“公平合理的”，而且是避免一场罢工的最直接的办法，这场罢工不仅会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而且会危急地减少流入朝鲜的和加强欧洲北约部队所需要的弹药的数量，而这一点杜鲁门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国防部长洛维特（杜鲁门后来写道）强调说，钢铁生产的任何停工，即使是很短时间的停工，都会增加我们在军备计划中“增加劳动强度的工业管理制度”方面所承担的风险。他还指出，我们所有三军中的整个作战技能取决于对我们工业设施的充分利用。在着重谈到朝鲜的形势时，他说：“我们现在是以弹药而不是以我们军队的生命来守住战线的。”他警告说，钢铁生产的任何缩减都会危及我们作战人员的生命。

杜鲁门拒绝实行《塔夫脱—哈特莱法》，根据该法政府可以在研究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之前的80天内禁止工人罢工。杜鲁门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再继续拖延解决问题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他觉得大家都早已知道事情的真相。再者钢铁工人已经像以往那样继续自愿工作了近3个月，让工人们

工资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继续再这么工作 80 天在他看来是不公平的。诉诸一项他不喜欢的和工人们鄙视的法律的指望也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但是现在促使杜鲁门采取行动的是他对钢铁工业巨头的看法，他在参议院多年任职期间曾经如此激怒地表达过对那些钢铁大公司的原有的不信任，这更甚于他对钢铁工人处境的同情。他认为钢铁公司提出的提高价格的做法简直就和牟取暴利的行为差不多，并看出以美国钢铁公司为首的那些钢铁公司企图强迫实行一项妥协方案，这最终将会对他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增加战争的费用。“在我看来，公司方面的态度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在加速执行国防计划的情况下，政府是至今钢和钢铁产品的最大主顾。在这个时刻提高价格意味着在国防工具上向政府索取更多的钱。”

虽然杜鲁门承认钢铁价格有节制地提高一点（4.5 美元）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固执地拒绝钢铁公司的无法控制的要求，并与他自己的国防动员局局长查尔斯·威尔逊意见相左，威尔逊认为钢铁公司一方的要求是合法的。结果，威尔逊辞职了。这是杜鲁门感到遗憾的事态转变，而且它招来了对他更多的非议。

对杜鲁门来说，接管钢铁厂是暂时的最后手段。4 月 8 日星期二，在工厂预定要罢工前仅仅几小时，他采取行动签署了第 10340 号行政命令。

“事实很清楚，钢铁公司在轻率地强行关闭工厂。”杜鲁门在那天晚上 10 点 30 分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这样说。

他们企图得到特别的、优惠的待遇……而且他们显然甘愿以停止钢铁生产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作为美国的总统，我的明确职责就是制止这种情况发生……政府将在午夜时分接管钢铁厂……

广播结束之后，在回他房间的路上，杜鲁门看起来十分疲倦，乔·肖特甚至认为他可能要垮了。

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即还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杜鲁门好像在有些方面又恢复到了他在 1946 年春天时的那个样子，那时他在任职不到一年之后，由于面临铁路大罢工的困境，他曾试图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

在全国各地大约 88 家钢铁厂方面，1952 年 4 月 9 日早晨，一切看起来都同往常一样。早班工人来上班，生产在继续进行。来工厂上班的还是原来的工人，管理工厂的还是原来的官员。唯一能清楚地看得见的变化标志是工厂的上空都飘扬着美国国旗。在华盛顿，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已经承担起对钢铁工业的合法指挥权。

但是杜鲁门又引起了一场危机，一场宪法方面的危机，就像 1946 年如果铁路工会在最后一分钟时不同意解决罢工的话他会做的那样。现在的喧嚷是即刻发生的，其激烈的程度不亚于他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后所遇到的情况。人们叫他是恺撒、希特勒、暴徒和犯法的人。4 月 9 日在他采取行动的这一天，在向国会报告他的行动时，即在当天立刻向国会山发表特别咨文时，他强调说他是极不愿意采取这一行动的：“由政府经营钢铁厂的主意我是完全不喜欢的，我希望看到它尽快结束。”他承认国会无权废弃他的政策，并且作为一种紧急措施自行通过一项使得政府能够经营钢铁厂的新的法律。他说，这样的立法也许是“非常合乎需要的”。但是，国会并不愿意授予他这种权力。相反，有的却是由国会进行调查的要求，对他进行弹劾的要求。

“内地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克拉伦斯·兰德尔在一次广播及电视上说，总统的“恶劣行为”在历史上还没有先例。《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杜鲁门群起而攻之。《新闻周刊》说，杜鲁门是制造事端的高手，使他自己和整个国家总不得安宁。《纽约时报》谴责他是根据“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坏主意”行事的。《华盛顿邮报》预言他下令接管钢铁厂的行动可能会作为一位美国总统曾经采取过的最专横的行动之一而载入史册。《邮报》还说，杜鲁门已经严重地篡夺了国会的权力，而在一个立宪民主制度中，没有比这更严重地冒犯贤明政府的行为了。“在宪法中没有任何条文可被合理地看作是给予总司令也许是为加强我国国防或者甚至继续进行一场战争所必需的一切权力。”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如果根据他固有的权力他能接管钢铁厂，他是否因而也能接管报纸和广播电台呢？

“在类似的情况下，美国总统不得不采取无论什么对国家最有利的行动。”他粗鲁无礼地回答道，使人推测他确实打算接管报纸，而实际上他从未出现过这个念头，也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钢铁工业为收回其财产而提出控诉。联邦政府所在地区的法官戴维·A·潘恩很快就确定接管钢铁厂是不合法的，最高法院宣称将接受审理这一案子。

法官潘恩在其4500字的鉴定书中说：“我认为，那场准备要搞的罢工如果发生，其全部可怕的对公众产生的损害，会小于在司法上胆怯地承认无约束无限制的总统权力的主张是有些根据的这一做法所产生的损害。”

杜鲁门读了潘恩的鉴定书后对他的工作人员说：“看啊，看啊……”他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会被人判断为错误的。他对商务部长索耶吐露说，如果最高法院竟也作出反对他的判决的话，他会感到“特别震惊、失望和烦恼”。

在一次工作人员的早晨例会开过之后，罗杰·塔比在记录中写道总统的心情十分压抑：

（我）从未看见过他如此沉默和消沉。偶尔他似乎刻意对我们的俏皮话笑一笑，但笑得极为短暂，他的面部表情多半是严峻的……当然钢铁工业引起的争吵折磨着他，还有朝鲜的一触即发的形势以及民主党前途未卜的处境——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了。

杜鲁门告诉记者，他理所当然要服从法院的裁决。他没有要成为一个独裁者的野心。他只是想使国家继续发展下去。

替美国钢铁公司辩护的律师约翰·W·戴维斯到最高法院出庭为这一反对总统的案子进行辩解。一头白发的戴维斯在1924年时曾经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后来败给了卡尔文·柯立芝。戴维斯具有卓著的律师经历，曾在最高法院为100多件案子辩护过。替总统辩护的是司法部副部长珀尔曼，杜鲁门后来称珀尔曼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他能干有力地介绍了政府的这一案子。

6月2日星期一，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宣判总统的行动违反了宪法。占多数的一方是雨果·L·布莱克，他发表了官方的意见，其余是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罗伯特·H·杰克逊、威廉姆·O·道格拉斯，以及使杜鲁门极为愤怒的汤姆·克拉克。

法官布莱克镇静而又缓慢地念着判决结果：“怀着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忠

诚，我们不能认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具有为了防止劳工争端停止生产而占有私人财产这样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国家立法者的而不是国家军事当局的工作。”

法官道格拉斯在一份表示赞同的意见书上写道：“今天，一位好心的总统使用接管权来实现工资的增长并使炼钢炉继续生产。然而明天另外一位总统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权力来阻止工资的增长，约束工会会员，像钢铁工业认为它曾受到这次接管行动的管辖那样暴虐地管辖劳工。”

最高法院院长给予总统强有力的支持，他争辩说总统的行动完全是在宪法赋予他的职责范围之内的，加入这个少数派的有法官斯坦利·F·里德和谢尔曼·明顿。文森争辩说，任何有资格呆在总统职位上的人都应该能“自由地采取至少是对国家的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执行立法机关纲领所必需的临时行动”。“对钢铁公司的占有不是临时性质的，而是从属于国会的批准与否”，或者“关于钢铁工厂将受人管理还是回归原主的行为”法规，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一次丢脸的失败，而且是栽在老朋友和伙伴精神的手里。最高法院是自由开明的。雨果·布莱克曾是一位热情的“新政派人士”。所有9名法官不是杜鲁门任命的就是罗斯福任命的。汤姆·克拉克已经变成反对他这一点使杜鲁门多年来一直很生气。有一天杜鲁门告诉作家默尔·米勒说，把这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混蛋傻瓜”安排在最高法院是他担任总统以来所犯的最大错误。虽然这句话像米勒观察到的其他事情那样，比他的用意或他当时所表明的更加严厉。

作为友谊和良好心愿的一种表示，雨果·布莱克邀请总统和法官们到老城亚历山德里亚出席他在河对面的漂亮的家中举办的晚会。威廉·O·道格拉斯回忆说：晚会开始时，杜鲁门虽然很客气，却显得“有些烦躁”。“但是在喝了一些波旁威士忌酒并吃了几片带肉的吐司后，他转向雨果对他说：‘雨果，我不太在乎你的法律，但是天哪，这个波旁威士忌酒真是太好了。’”

在最高法院6月2日做出判决之后开始的钢铁工业的罢工拖延了7周之久，一直进行到1952年仲夏季节，成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和损失最大的钢铁工业罢工。罢工造成的生产和工资方面的损失都是史无前例的，共少生产钢2100万吨，工资方面的损失为4亿美元，有60万钢铁工人以及140万其有关产业的其他工人没有活干。计划在1952年生产的军工产量削减了1/3。罗伯特·洛维特辛辣地说：“没有哪个敌对国家能像这次停工一样如此削弱我国的生产。不可思议的和悲剧性的事情是，这是我们对自已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要求工人每小时工资增加21美分，钢铁价格每吨增加5.2美元。这个数字与几个月前政府提出的每吨钢价增加4.5美元一样，再为提高了的运输费用增加70美分。

在罢工的漫长的几星期里，杜鲁门对国会的无所作为日益感到苦恼。国会拒绝采取任何别的行动，只是要求他而不是命令他使用《塔夫脱—哈特莱法》，从而把这个问题以及作出该决定的责任全部交还给他。至于是否会恢复钢铁生产，他是否会行使《塔夫脱—哈特莱法》，则是会引起很大争论的。

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最高法院和国会把我们逼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让国会做些事情把我们弄出来吧。”

令杜鲁门感到泄气的是，在国会山上只有这么少的民主党人支持他，而且“在那里”实际上没有什么民主党人为他的对外援助法案奋斗，他牢骚满

腹地，也许让民主党人丧失一阵子权力可能对他们有好处。

自从担任总统职务以来，杜鲁门第一次病倒了。早几年前在陆军的沃尔特·里德医院的3楼曾设立过专门的总统套房，以便在总统如果需要医疗照顾时使用。但是，这套病房却从未被使用过一次。杜鲁门从未感觉过不舒服，直到7月16日的那天早晨，当他醒来时，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华莱士·格雷厄姆发现他正在发低烧。两天之后，由于格雷厄姆称之为轻微病毒的感染，他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医院。他在医院里呆了3天，在此期间约有8名不同的专家为他做了检查。他在那里吃饭很好，睡眠也很好，签署了200多份议案，而且像他后来对他的工作人员说的那样，在那里他花了许多时间来考虑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要讲的内容。他对着床柱子发表演讲，杜鲁门说：“如果大夫这时走了进来，那么他会发现我的体温升高了两度，而且也许会认为我疯疯癫癫的。”他想不仅谈他的政绩，“而且还要谈论将来以及我们能怎么对待它”。

7月21日他重返椭圆形办公室的第一天早晨，他的脸色看上去仍然有些苍白且情绪低沉。乔·肖特问他，对钢铁工人的罢工能做些什么？杜鲁门说，他不知道。

“这是一种封闭工厂，这就是它现在的状况。美国钢铁公司是反对小人物的，想把他们接管过来，当然他们是反对劳工的，也是反对我的。”

3天之后，7月24日，杜鲁门召集菲尔·默里以及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本杰明·费尔勒斯到他的办公室去，要求找出解决办法，最后得到了。“这应导致钢铁生产的迅速恢复。”他在宣布罢工结束的一份简短的正式声明中说。

第二天，他动身去芝加哥参加已在进行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 5

杜鲁门对选择一位民主党旗手的苦恼已发展到了极端。他一直坚信，任何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党人都应准备好并且愿意在竞选中与共和党人一争高低。因此，他对艾德莱·史蒂文森越来越感到恼火。史蒂文森的不愿参与竞选使杜鲁门感到他不仅令人讨厌而且也许有几分演戏的成份。

如同新闻界报道的那样，几乎所有老的民主党首脑人物现在都不存在了。吉姆·法利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汤姆·彭德格斯特和鲍伯·汉尼根已经去世；埃德·弗林有病在身；弗兰克·黑格已经不再控制新泽西州；而凯弗维尔在他的初选运动中已使田纳西州的埃德·克伦普黯然失色。“除了总统之外，无人能够提供全党性的领导能力。”《新闻周刊》这样报道，而且杜鲁门“在提名他所中意的人当候选人一事上承受着巨大压力……”

杜鲁门继续在等待，坚持要史蒂文森。仅仅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一周前，他失去了耐心，决定差不多要竭尽全力去阻止凯弗维尔当选为候选人。他终于建议说巴克利是个很好的人选，而后又但愿他没有这样做，因为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宣布他本人是一名候选人之后，正在以过去使杜鲁门容光焕发的方式证明他是整个“新政—公平施政纲领”的一名精神饱满的拥护者。

当有人提出意见说，哈里曼从未竞选过政府职位，因此可能不会胜任一场持久的竞选运动时，杜鲁门评论说：“在你不得不做一件事情之前，你决

不会知道你是否干得了这件事。”

共和党人于7月7日在芝加哥召开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塔夫脱拥有最多人数的已经表态的代表。他攻击党在东部地区的民主派“我也是”共和党人，即这些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杜威派。塔夫脱说现在是让美国人民进行明确选择的时刻。会场里的争斗在投票之前愈演愈烈。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从乐队指挥台那里，对杜威坐在那里的纽约代表团摇着他的手指宣称：“以前我们跟随你们，你们带领我们走上了失败的道路。现在别再对我们这样做了。”但是这些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干才们的策略技巧，加上艾森豪威尔这一派人物的魅力，使得这位将军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大获全胜，就像如果他愿意他无疑也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了胜利一样。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凯弗维尔在民主党的候选人中遥遥领先，赢得了257名代表的支持，或者达到了获得提名所需要的将近半数的选票。作为南部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理查德·拉塞尔获得了161票；哈里曼获得112票；史蒂文森仅获得41票，而人们认为，杜鲁门至少能使400名代表转而投他所选择的任何人的票。如《时代》周刊报道的那样，杜鲁门对民主党的领导人仍然具有显然很强的控制力，因为他们都把他看作近旁最精明实干的政治家。“如果杜鲁门证明是对全国代表大会具有极大的影响，那事实也并非代表们在照他的意旨办事，而是他们听从他的极受尊敬的判断。”

巴克利的形势开始突然看好并聚集了惊人的支持力量，只是当有组织的劳工领导人会见他并告诉他直率的真相时，巴克利的势头就突然终止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反对巴克利，就像1944年他们对待吉米·贝尔纳斯那样，而只是因为他的岁数太大了。

巴克利打电话告诉杜鲁门说他将退出竞选。7月24日下午，即钢铁工人罢工在白宫获得解决的那一天，史蒂文森从伊利诺伊州打来电话问杜鲁门，如果此刻让他的名字列入候选人的提名名单是否会使杜鲁门感到为难。杜鲁门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挑选了一些“相当有力的”字眼。“我自从1月份以来一直在设法使你说这句话。”他告诉这位州长，“这为什么会使我为难呢？”史蒂文森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全力支持。就杜鲁门而言，史蒂文森就像自己被提名一样好。

在芝加哥股票交易所巨大的国际圆形大厅的经纪人席上，一个急速向前发展的支持史蒂文森的突然好转的形势已形成，这是这位州长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他本人的精彩的受人欢迎的讲话的结果。《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称史蒂文森是“漂在不断上涨的小河上的一片树叶”。第二天，25日星期五下午举行了第一轮投票，在密苏里州代表团投票时，总统本人的代理人，一位过去的忠于彭德格斯特的名叫汤姆·加文的人被人看见投了史蒂文森的票，此时总统和第一夫人正乘坐“独立”号专机离开华盛顿。电视在分成两半的屏幕上同时播放了这两件事。

在西飞的途中，杜鲁门“一路上”都在收看电视上的代表大会的情况，这是没有哪位总统以前曾经干过的事。他观看了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凯弗维尔得了340票，史蒂文森273票，拉塞尔268票，哈里曼123票。他还看了第二轮投票的开始。芝加哥时间下午6点钟，第二轮投票结束，史蒂文森得票增加但仍无结果。杜鲁门在“黑石”饭店709号房间里准备他的发言稿。8年前他就是在这同一间靠角落的套间里从富兰克林·罗斯福那里接到了决定他命运的电话。对杜鲁门的随行人员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似乎正在高速度

地工作着。

由于代表大会暂时休会，直到9点钟才继续进行，杜鲁门就在车队和发出隆隆声的摩托车的护卫下前去“股票交易所酒楼”，在一家私人餐厅里与杰克·阿维、萨姆·雷伯恩和民主党主席弗兰克·麦金尼共进晚餐。从那里，杜鲁门还捎信给马萨诸塞州和阿肯色州的两位州长以及艾夫里尔·哈里曼，把他们的代表让出来投史蒂文森的票。查利·墨菲是被派去见哈里曼的通讯员，哈里曼碰巧早已自行决定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史蒂文森。

在进行第三轮投票时，由于让出了原来投哈里曼票的代表的票，出现了代表大会对史蒂文森的戏剧性的转变。但是，几乎就像4年前一样的晚，代表大会一直开到半夜过后第二天凌晨1点45分时，投票选举才取得一致的结果。这时被提名者和总统挽着胳膊进入选举大厅，两人沿着泛光灯照耀的通道走上讲坛，杜鲁门精神焕发，脚步轻快；史蒂文森个子矮小，相当矮胖，看起来有点半信半疑。

他们已挑选了一位胜者，杜鲁门向人群保证说：“我将使足了劲尽一切可能帮他赢得胜利。”

史蒂文森简短而又雄辩地发表讲话。他说：“人民是明智的，比共和党人想的要明智得多。民主党是人民的党，它不是劳工的党，也不是农场主的党——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党，因为它是每一个人的党。”20世纪的严峻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牺牲、忍耐、理解和不能改变的目的可能是我们今后多年的命运。让我们向美国人民讲明道理……”

后来，史蒂文森、杜鲁门、雷伯恩和麦金尼以及四五个其他人在后台会面。史蒂文森要求在让谁来当竞选伙伴问题上提出建议。共和党人已经选择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作为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提出让凯弗维尔当竞选伙伴，但是杜鲁门竭力反对，雷伯恩和麦金尼也支持他。也提到了巴克利和拉塞尔，但也没有通过。最后选中了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那些当时在场的人中的一个后来向一名记者解释说：“史蒂文森在哈里·杜鲁门的帮助下做出了决定。”

7月26日，星期六早晨6点40分，杜鲁门在他的房间里大概睡了一小时（如果他有任何睡眠的话）后，用“黑石”饭店的信笺给被提名的候选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而这样的信他却不曾从富兰克林·罗斯福那里收到过。

亲爱的州长：

昨天晚上是我一生68年来度过的最非凡的夜晚之一。当数千人——代表和来宾——心甘情愿地在清晨2点钟坐着听我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和介绍发言，然后又听你的极为精彩的受命发言，这无疑表明了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将承担起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职务所赋予你的责任。

无论从家庭背景、政治背景和教育背景来看，你都是最适合从事这项奇妙工作的人选。如果你认为值得的话，你将得到我全心全意的支持和合作。

当喧闹和欢呼声结束后，我希望你有可能来华盛顿共商你的前程。

但是虽然史蒂文森客气地回答说，他最终会与杜鲁门在白宫会晤，他却依然和以前一样打定主意不被看作是杜鲁门的候选人。史蒂文森的朋友乔治·鲍尔回忆说：“他面对的是杜鲁门政府的很差的道德观念和不廉洁行为，因而刻意要使自己疏远杜鲁门。”史蒂文森接下来很快以他在芝加哥的一个朋友，一个政治经验不多的律师，斯蒂芬·A·米切尔接替了杜鲁门所在党的主席麦金尼的职务，并且宣布民主党的总部从此将设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而不在华盛顿。这些决定肯定冒犯了杜鲁门。史蒂文森也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征求杜鲁门对他参加竞选计划的意见。

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史蒂文森对他的态度是个“谜”。但在他一封从未发出的信中，杜鲁门告诉这位提名的候选人：“我得出的结论是，你由于叫美国总统站在你的角落里而感到为难……所以我将保持沉默并呆在华盛顿直到11月4日来临。”他不想被人当作一种负担来对待。他写道，在他的记忆当中，弗兰克·麦金尼曾经是党的最杰出的主席。“我不能忍受一再被你冷落的情况……”

到了8月份，史蒂文森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草率地签署了一封由一名助手起草的回答《俄勒冈日报》提问的信件。这家波特兰报纸的编辑提问的是：“史蒂文森真的能够清理华盛顿乱七八糟的东西吗？”史蒂文森的答复是：“至于我是否能清理华盛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愿正式表示我将仔细彻底地检查我在伊利诺伊继承的东西和这3年中所完成的工作。”共和党人很快使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看上去好像是史蒂文森本人确认了华盛顿确实存在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杜鲁门则在另一封从未发出的信中说，史蒂文森现在使整个竞选运动变得“十分滑稽可笑”。

我要对你说的是，带着你那帮怪人和神气活现的上层社会名流开展你的竞选运动，如果能够你就赢吧。凯弗维尔对我都还没能像你对我这般卑鄙。

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史蒂文森派主席米切尔去对杜鲁门说，如果迪安·艾奇逊将宣布一旦选举结束他就打算辞去国务卿的职务而退休的话，这将会大大有助于竞选运动。对这个主意，杜鲁门断然拒绝了。

但是如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回忆的那样，与其说杜鲁门生气不如说他很悲伤。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哦，史蒂文森会好起来的。竞选运动还没有真正开始。”在后来的时间里，杜鲁门写道，史蒂文森在竞选运动中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的确擅长讲演，因为他的话明确地指出我们时代一些主要问题的含意。他特别善于阐述我国的对外政策。他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虽然有些人认为他讲过的话可能有些人理解不了，但他是个毫不妥协的人。他的竞选运动是一场重大的竞选运动，为党和国家带来了光彩。他没有迎合人民的弱点而是求助于人民的长处。他不拿原则作交易以换得选票。他在南部说了什么，在北部地区也说什么，在东部说了什么，在西部也说什么。他值得称赞之处在于，尽管反对党提出挑衅，但是他不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和谴责……我对



他有理智的勇气表示最高的敬意。

8月12日，应杜鲁门的邀请，史蒂文森来到白宫与内阁成员共进午餐，并听取有关国情咨文的详细的简要介绍。在3个小时的讨论过程中，杜鲁门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想竭尽全力提供帮助。他不希望用任何方式来指挥或操纵竞选运动，杜鲁门强调说，史蒂文森现在是老板。史蒂文森评论说：“我认为总统比我更希望赢得这次选举。”杜鲁门插话说：“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在会谈结束以及他和史蒂文森两人走出去向新闻界人士发表谈话之前，杜鲁门显得非常高兴。

按照惯例，杜鲁门首先走出门外，只是现在摄影师们对他喊道：“等等州长，总统先生。”一种新的次序显然已经开始了。“你的接触点就在这里，州长。”杜鲁门用手指着扩音器说。

史蒂文森就他刚刚享用过的十分丰盛的午餐开玩笑说，如果他再吃一顿，他就会胖得无法参加竞选了。杜鲁门往常对这种玩笑总是第一个开怀大笑，而这一次只是微笑而已，好像他有些心不在焉。《纽约时报》的安德鲁·塔利写道：“这恰好暗示了气氛里有些紧张和忧伤，因为杜鲁门眼看着自己正在被这个人取而代之……”在史蒂文森讲话结束后，杜鲁门没有逗留片刻，而是转过身去，“昂着头慢慢地”走向他的办公室去。

白宫的好几名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切感到很痛心。特工人员弗洛伊德·搏林转向罗杰·塔比，指着总统评论说：“这是一位坚如磐石的人；而他（指着史蒂文森），他看起来好像是一块海绵。”

9月间竞选活动正在进行着，杜鲁门很快就忘记了他自尊心上遭到的任何损伤，抱着他过去的全部热情参加到这场竞争中去。虽然不是候选人，但他把这次选举看作对他总统职位的一次公民投票。由于他是被任命的，一旦战斗开始，他也不可能置身其外。党的新任主席斯蒂芬·米切尔回忆说：“我们并不一定要请杜鲁门参加到竞选运动中来。但是他一心要去……而且他表演得非常出色。”

杜鲁门再次乘专列“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走遍了全国。史蒂文森却乘飞机四处奔波，他们俩人的日程完全不同，从未出现过在同一个讲坛上。史蒂文森能言善辩，在一代多人当中，还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能与他相比；杜鲁门则是斗士和信仰者，他说：“当你投民主党的选票时，你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投票，因为民主党关心普通人和老百姓的利益。”这番话听起来非常像他1948年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的讲话。他赞扬史蒂文森。他唤起人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怀念，对共和党大加冷嘲热讽，顽强地拥护他自己的“公平施政”纲领。在最初阶段，他对共和党的候选人显示了出人意料的温和态度，他攻击的是塔夫脱。

杜鲁门在人群中看见艾森豪威尔的纽扣或标记时说，他也喜欢艾克。但是，他喜欢他作为一名军队中的将军。事实上艾克似乎并不知道他正在于什么。“我认为鲍勃·塔夫脱和共和党中所有的反动分子正在他的耳边进谗言，拖他的后腿。”杜鲁门对蒙大拿州怀特菲什城的民众说，“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地喜欢艾克，你们应与我一起投票送他返回军队去，他是属于那里的。”

事实上杜鲁门确实仍然喜欢艾克。甚至当艾森豪威尔拒绝杜鲁门发给的像他曾经发给史蒂文森一样的去白宫听取情况简要介绍的邀请之后，杜鲁门仍然私下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表达了他的友谊之情，这份友谊之情的程度几

乎和他对如今向这位将军进谗言的那些人的厌恶之心差不多：

我头脑中经常在考虑的一件事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必须保持对外政策的连续性。你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你曾经参与过该政策的制定。

党派政治应该在美国的范围内加以制止。我感到极为遗憾的是你竟允许一帮疯疯癫癫的人插在我们之间……

但愿上帝指引你，给你带来光明。

写自一个一直是你的朋友而且一直希望成为你的朋友的人！

在他火车上的谈话中，杜鲁门可以从他关于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危险的总统、“一个现代的克伦威尔”的预感转到对他公开表示同情。“你们知道，我仍为艾克感到难过。他真不应该陷到这种事情中去。”9月中旬，有人揭露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尼克松接受了加利福尼亚百万富翁们捐给他的一笔秘密经费的津贴，与杜鲁门同行的其他人无不为此消息感到振奋，他却只是评论说：“这将对我们有利益，但是我很遗憾看见这件事发生，因为它降低了公众对政治的看法。”

像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使人极度疲劳的竞选事务似乎使杜鲁门重新恢复了活力。人们会记得他夜间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列的餐车里摇晃着向前走，用他的手指捏着炸鸡吃，享受和他的工作人员讲故事或与他们“较量才智”的乐趣，其时火车外面漆黑的夜色中不时有一道孤寂的亮光闪过。人们会记得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浴室池子里洗他的袜子，以及在从俄亥俄州到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天内作了8次讲演后在凌晨1点半钟时坐在布法罗市的一家饭店里弹钢琴。

竞赛的步调和激烈程度在迅猛加速。

共和党人在“需要变革的时刻”的口号下参加竞选，他们不想再重蹈杜威温和地滑行到失败的覆辙。双方的大部分言论都变得使人很不愉快。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本人作为“北约组织”的参谋长和总司令，曾经帮助制定和执行了政府的对外政策。在艾森豪威尔加紧攻击而非难这一对外政策时，杜鲁门私下评论说：“听了这番话，我简直要背过气去了。”他现在指责说，艾森豪威尔已经变成“华尔街的一个傀儡”。他的“躯体和灵魂都被阔少爷们所拥有”。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涯，艾森豪威尔对现实生活缺乏了解，他不“知道真相，也不应该在使公众受损害的情况下去接受教育”。

至于艾森豪威尔，他哀叹华盛顿“从上到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及“骗子和老朋友”等问题；而尼克松则反复强调众所周知的“朝鲜问题，共产主义问题和腐败问题”。当尼克松谴责杜鲁门，史蒂文森和迪安·艾奇逊成了“国内许多民主党人所信仰的重大原则的叛徒”时，杜鲁门懂得这意味着尼克松已把他称为叛徒，而他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这一次没有查利·罗斯来帮他了，也没有了克拉克·克利福德。新闻秘书乔·肖特最近因被认为有轻微的心脏病而住进了医院。当杜鲁门听到乔·肖特去世的消息时，他感到特别内疚，敏锐地觉得他个人对此负有责任。“我觉得好像是我杀害了他们。”他说，也想起了罗斯。

史蒂文森“具有最了不起的掌握语言的能力，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使听众感到高兴。”接替肖特职位的罗杰·塔比这样记载着：

（史蒂文森的）幽默，他的讽刺挖苦的才能是不可抗拒的。

因此感谢上帝，我们的国家受到了如此的厚待。而已经有一段时间，也许自从林肯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然而有些观察家不知道史蒂文森是否能使人们“理解”他，并且把他的风格不适宜地与总统的风格相比较，后者的风格是使用简单的陈述句，率直和辛辣的抨击。与此同时艾克却办事疏忽大意，容易犯错误，常常思想极为混乱，语无伦次，但是死死咬住三两个简单洁题不放：清除腐败和驱除恶棍……

多数报纸都支持艾森豪威尔。共和党的人开支也比民主党人的更大，约高出一倍多。但是追随杜鲁门的群众有时像 1948 年时那样多和那样友好。在西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以及新英格兰的大片地区，追随杜鲁门的群众常常多于那些出来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

10 月初出现了杜鲁门在竞选运动中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刻，这时艾森豪威尔去了乔·麦卡锡家乡所在的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在他本人连任参议员的竞选中继续诽谤乔治·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的许多支持者和他自己的许多助手都相信他会最终抛弃麦卡锡而大声为马歇尔辩护。当他穿越伊利诺伊州、前往威斯康星州时，艾森豪威尔断定现在是时候了，“就在麦卡锡的后院”准备了一篇在密尔沃基市发表的他个人称颂马歇尔的讲话。但是那时他的政治顾问们坚决反对他这样干。麦卡锡本人飞去了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市，登上这位将军的专列同他一起横穿威斯康星州。据报道，当麦卡锡进行辩论反对对马歇尔有丝毫的提及时，艾森豪威尔的反应是“大发脾气”。在格林贝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艾森豪威尔还是对麦卡锡赶到伊利诺伊州同他会面向这位参议员表示感谢，并对他的听众们说，他与麦卡锡的分歧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目标上。然后在密尔沃基发表演讲时，他与麦卡锡同时登上讲台，他讲话时麦卡锡就坐在他身后。艾森豪威尔宣称，国家对共产主义的容忍“已经毒害了我们的国家生活整个 20 年”，从而造成了“一个由那些自己的脑袋被这一欺骗行为的麻醉剂弄糊涂的人所把持的政府”。他指控说，中国的陷落以及东欧“所有国家的投降”该归咎于华盛顿的赤色分子。他的讲话中没有提到马歇尔，称颂马歇尔的话被删去了。但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助手们曾经整天都在对记者们说他们将会听到对马歇尔的称颂，因此这些话的被删去比讲话的其余部分造成了更多的新闻。甚至连那些坚决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也感到吃惊。

《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个人竞选运动的总管谢尔曼·亚当斯说：“我是否需要告诉你我从心里厌恶这种做法吗？”

对于杜鲁门来说，由于他对乔治·马歇尔的忠诚，艾森豪威尔干的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出卖行为。杜鲁门力图强压下他心中的怒火。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说道：“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运动中对抗他自己的业绩，违背了他自己的本性和原则，这一景象是“十分悲哀可怜的。”

为了历史，为了将从教科书中读到有关他的情况的子孙后代，我但愿他没有玷污他自己作为一名指挥人的司令官的显赫名声。而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在向东行的途中，杜鲁门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也许他应该“把艾克搁在一边一段时间……必须十分小心谨慎，我们不要对他攻击得过分”。但是他内心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他对马歇尔想得越多，就对艾森豪威尔和麦卡锡想得越多；艾森豪威尔便对他的对外政策和对朝鲜战争的处理的攻击也越多。

杜鲁门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一次集会上对成群的听众说：“我读了将军的谈话，听了他的讲演，我感到他已不是我曾经认识的那位将军。我的朋友们，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印第安纳州曼西市说：“我认为他可能会成为一位好的总统，但这是一个错误。在这次竞选运动中，他已经背叛了我认为他过去主张的几乎所有事情。”

最后，在纽约州尤蒂卡市发表的一篇关于后方政纲的演讲中，杜鲁门具有充分说服力地进行了痛斥。他说，艾森豪威尔已经背叛了他的原则，抛弃了他的朋友们。

他过去知道，今天也知道，马歇尔将军的爱国主义是没有问题的……他知道，或者他应该知道，乔·麦卡锡是个多么极不诚实的人。他应该鄙视麦卡锡，就像我期望他做的那样，而且就像我做的那样。

现在为了企图获得选票，他赞成麦卡锡竞选连任参议员，而且低三下四地感谢麦卡锡乘上他的火车。

我对此不能理解。我从未想到现在是共和党候选人的这个人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而且他一直没有、一直没有真正原谅艾森豪威尔对造就了他的这个人的忘恩负义行为。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仍然怀有强烈的愤怒之情。他总是说：“噢，马歇尔将军对艾森豪威尔的整个生涯负有责任。由于马歇尔的推荐，罗斯福才使他连升几级从中校变为将军。马歇尔在不同的三次提拔过他，而作为回报……艾森豪威尔却出卖了他。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艾森豪威尔被杜鲁门攻击得不知所措，他极为愤怒。“且看你能变得如何卑鄙吧。”他发誓说，在总统就职那一天，他决不会与杜鲁门一起乘车开往宾夕法尼亚大街。

民意测验显示艾森豪威尔完全处于领先地位。民意测验也表明，在朝鲜的僵局是多数选民所担忧的事情。选举已变成对朝鲜问题的一场公民投票，因此艾森豪威尔加紧攻击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处理。10月24日在底特律市，他在全国电视转播节目中发表了一篇辱骂性的讲话，他称朝鲜是“2万名阵亡美国人的坟场”，并作出保证说要结束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演戏般地宣称，如果当选，“我将去朝鲜”。

杜鲁门发表一份声明强调说，开始时这位将军曾经是同意政府关于朝鲜的政策。在明尼苏达州威诺纳市杜鲁门告诫公众说：“没有哪个职业将军曾经成为一个好的总统。打仗的艺术与文官政府的艺术是大相径庭的。”

杜鲁门说，如果艾森豪威尔有办法结束朝鲜战争，他现在就应该告诉他。“让我们挽救许多人的生命而不要等待……如果他在当选后能够这样做，那

么我们现在就能这样做。”杜鲁门在写给史蒂文森的信中说，这种“关于这一悲剧性局势所进行的蛊惑民心的宣传几乎是令人不屑一顾的”。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根本没有权利利用朝鲜问题来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在五角大楼，艾森豪威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老朋友们也几乎与总统一样感到愤怒。奥马尔·布莱德雷回忆说：“艾克十分了解朝鲜战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停火谈判的棘手微妙。他非常清楚他去朝鲜肯定会一无所获。”

在竞选运动的最后日子里，杜鲁门仍然表现得很强硬。艾奥瓦州的一名当地记者注意到，总统“看起来从未像现在这样适合于或高兴地投入这场‘打得他们落花流水’的严峻较量中”。

但是由于他演戏般地作出保证说要去朝鲜，艾森豪威尔已经判决了选举的胜负，就像杜鲁门似乎早已知道的那样。他对他的新闻秘书说：“罗杰，我们可能要面临我们无法左右的局面了。”

艾森豪威尔的胜利具有压倒之势——在 48 个州的选举中，他赢得了 39 个州，其中包括史蒂文森的伊利诺伊州和杜鲁门的密苏里州。他获得民众选票的百分比大于自罗斯福在 1936 年以来的任何一次民主党所获得的——而最伤害人心的问题是朝鲜。但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满面春风的微笑以及他在人民心目中所占有的不相你的位置，也证明他是一个特殊的候选人。他的知名度使他几乎成为坚不可摧。而且人们可能普遍存在的感觉是，在民主党掌权这么久之后，在华盛顿应该有个变化，因此显然这是一次艾森豪威尔的而非共和党的胜利。在国会中共和党人勉强获得了控制权。他们在参议院当中的差数是一个席位。

如同杜鲁门私下评论的那样，也许没有人能够在 1952 年战胜艾森豪威尔。包括《堪萨斯城明星报》在内的一些观察家评论说，杜鲁门对史蒂文森害多于利，这使他的感情深深受到伤害。

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发去了他的祝贺，而且表示愿意让他使用“独立”号总统座机飞往朝鲜，但是加了一句话，“如果你仍然想去朝鲜的话”，这个最后的党派性猛击并非出人意外地激怒了艾森豪威尔，他拒绝了这一建议。

11 月末，在最严密的保卫之下，艾森豪威尔乘坐军用飞机飞往朝鲜。他在前线视察了 3 天，然后飞回国内，只是断定说局势不堪忍受。

杜鲁门在其 11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真诚地希望他原本无需进行这次旅行。这是一次可怕的冒险。万一他回下来，我不知道后果将会如何。但愿上帝保佑他。”

杜鲁门毫不迟疑也不带一点辛酸之意地立即邀请艾森豪威尔到白宫商讨权力交接事宜。像他写给这位将军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坚决保证“有条不紊地移交行政机构的事务”。这种姿态是没有先例的。对于杜鲁门周围的人来说，这是他有能力把自己的私人感情与更重大的工作职责区分开来的一个生动实例。他愿意竭尽全力帮助这位新总统。他只是希望也曾有人同样地对待过他。

11 月 18 日，星期二下午正好 2 点之前，艾森豪威尔到达白宫，他先与杜鲁门在总统办公室里会见，然后在内阁会议厅听取杜鲁门、他的内阁成员及工作人员持续的简要情况介绍。一切都进行得很有条理，没有出现任何差错，虽然艾森豪威尔一直没有微笑而且显得十分谨慎。艾奇逊认为他“沉默寡言到了乖戾阴郁的程度”。在杜鲁门看来，艾森豪威尔是个易被激怒的人，

而且他忘不了艾森豪威尔的“自始至终极端寡默的冷酷无情的性格”。

杜鲁门表示愿意把艾森豪威尔多年前送给他的地球仪送还给他，对杜鲁门来说地球仪象征着总统职责的重大影响。当时艾森豪威尔接受了它，虽然在杜鲁门看来“并不很有礼貌”。在内阁会议厅听取情况简介时，杜鲁门从艾森豪威尔的反应上也感觉出，这位将军并未真正理解他所面临任务的份量或复杂性。杜鲁门记载道：“我想对他讲的所有这些话都是从他的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出去了。”后来，杜鲁门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与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评论说：“他就坐在那儿，一会儿说这样干，一会儿说那样干，而最后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可怜的艾克——这可一点也不会像军队。他将发现一切都会落空的。”

## 6

在白宫楼上，人们已经开始了对于一个临终的人的看护工作。在杜鲁门书房对面的一间卧室里，90岁高龄的马奇·盖茨·华莱士躺在床上处于昏迷状态。

杜鲁门在11月24日早晨5点写的日记中说：“白宫安静得像一座教堂。我能听见机场上飞机准备起飞时的轰鸣声。如同总有的车辆往来的喧闹声那样，那声音听起来就像穿过木兰树的风雨声。”

“贝丝的母亲在门厅对面的屋子里正在逐渐咽气……”

老夫人从来不是一位容易相处的人。即使作为一位白宫的居住者，她也多少让有些仆人和工作人员知道她仍然认为哈里·杜鲁门与她女儿贝丝不够相配。但是甚至从推论上来说，也从未有人知道杜鲁门说过任何对她不满的话。杜鲁门只是感到十分悲痛。“自从9月份以来，岳母华莱士就一直病危……但是，我们一直请大夫和护士日夜护理她，维持她的生命。我们曾经希望而且仍然希望她能活到圣诞节。这是我们在当总统时的最后一次圣诞节。”12月5日她死后，杜鲁门写道，“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当我听到有关岳母的这些笑话时，我笑不出来。”

在一段时间内，整个气氛似乎就像是对他本人总统任期的临终看护。新的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仅有32%的人赞成总统处理工作的方式方法；43%的人认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个错误。但是民意测验现在对他的意义并不多于以往任何一次。他私下在一份给他自己的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不知道，如果摩西在埃及搞一场民意测验的话，他会得到了什么结果？如果耶稣基督在以色列搞一场民意测验，他在布道中会说了些什么？……重要的并不是民意测验或当时的公众舆论，重要的是正确与错误。”

在给埃塞尔·诺兰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没有人知道这项工作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除了凭经验之外——“它向一个农村男孩冲击过来”。人民的生活境况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过，然而他们想有个变化。他有“被抛弃”的感觉。他在回想介入朝鲜战争的头几周情况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人民是通情达理的，在危机时刻支持了总统，“但是在要为一长行的玉米剥去外皮时，他们想要找个轻松的出路。”

一份新的人口普查报告证实，自从杜鲁门担任总统以来，人民在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及住房方面的提高都是美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如1953年1月7日杜鲁门向国会作的他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所报告的那样，6200万美国

人已经有了工作，这表明在过去的7年中一共增加了1100万份工作。失业现象几乎已经消失。农场的收入、公司的收益以及红利均达到了最高记录。在将近9年的时间内，没有一家保险银行亏本。杜鲁门知道他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世界事务方面。然而他可以骄傲地正当地指出，人人都期待的战后经济崩溃的局面从未发生过；由于政府的资助（《美国士兵法案》），800万退伍军人受高等教育；社会保险救济金增加了一倍，最低工资也增加了。治理贫民窟的工作有了进展，千百万户人家通过政府筹措资金建起了住宅。物价上涨了，但是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得甚至更多。实际生活水准比7年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杜鲁门在公共住房和教育方面没有做到他想要做的那么多，也没有制定他知道是国家需要的医疗保险计划，但是他为这些计划努力奋斗过，为将来确定了目标。他在公民权利方面所实现的比他希望的要少。但是他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民权利委员会”，下令取消了武装部队和联邦文职人员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做了比自林肯以来任何一位总统都更多的工作来唤醒美国人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良知。在朝鲜战争突然开始之前，他也使预算保持了平衡，实际减少了国家的债务。

由于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他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结构，其办法甚至超过了罗斯福的一些大刀阔斧的措施。由于“原子能委员会”的创立，他使核能控制权掌握在老百姓的手中。

在他的工作人员、偶尔也和记者追忆往事时，他谈起了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成就，即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行了“第4点计划”（即使它算不上是一项大规模的计划，却也为将来确定了目标）；对柏林的空运行动；他称之为“超级试验”的朝鲜战争。国家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恢复，国家的威望大大提高了。

在这一年夏天的《展望》杂志上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在他的一篇惊人的文章中写道，杜鲁门政府通过所有正常的措施成了一个取得了几乎是不间断的、举世无双的成就的政府。这个观点不仅与当时的流行看法冲突，而且该杂志的编辑们也对此特别表示了他们自己的不同意见。

康马杰写道：“我们无法知道历史将对此（杜鲁门的政绩）作出什么裁决，但是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相当好的猜测。”

这可能是一项难以理解的似非而是的记录，它记录的是一个被人们指控为对共产主义“软弱”的人做了比西方世界中除了丘吉尔之外的任何其他领导人都多的事情来遏制共产主义；一个被指责为才能平庸的人制定了一整套有远见的重建世界的计划；一个被谴责为与私人企业为敌的人成了私人企业获得最大繁荣发展这个最伟大时期的政府领导人；一个被谴责为背叛了“新政”的人为了进步的立法，一次又一次地与国会展开了较量。

回顾这些政绩，如他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以及他在广播上的告别演说，人们对“杜鲁门精神”的看法得到了改善。在为妥善地结束一切而工作时他“极富幽默”、“精力充沛、精神饱满”，显然很愉快。他坚持亲自动笔写告别演说词，而且一天晚上，在内阁会议厅里，工作人员聚集在一张大桌子旁听他大声读这份演说词。他每读完一页都要停下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在详细叙

述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时，他描绘了在 1951 年 6 月的那个与命运有关的星期日，他是如何从独立城飞往华盛顿的。他读道：“在返回的途中，飞机飞越中西部的平坦大地，我有许多时间来考虑问题。”罗杰·塔比建议他把“平坦大地”改为“富饶的平坦大地”，这样听起来会更好一些。杜鲁门回答说：“我飞越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印第安纳州及俄亥俄州这些地区并不富饶，罗杰。”还是保留了朴实无华的“平坦大地”的说法。

他办公室墙上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办公桌上的小摆设、闹钟以及所有私人用品都清理干净了。包装好的箱盒成行地摆放在西侧楼的一些大厅里，因油漆工正在逐屋进行粉刷。杜鲁门早已计划好要建立他的总统图书馆。400 多个装着他私人 and 总统任职期间文稿的钢铁文件柜已被装船运往密苏里州。当他的老朋友参议员基尔戈走过附近来白宫作最后一次访问时，杜鲁门告诉他，如果早知道离开白宫会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他就会再次参加竞选了。

有人问他是否想住在华盛顿，杜鲁门说他不。问他有何将来的计划，他说他现在还没有。

在他举行的最后一次即第 324 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充满了活力”，结束时受到了大约 300 名记者热烈的鼓掌。他还写了许多告别信，在给迪安·艾奇逊的信中他说：“你是我的有益的得力助手。”

的确没有人比你更负责地使得自由世界的人们做到齐心协力，而且增强了他们要求强大和自由的愿望和决心。

我将会把你列入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那些最伟大的国务卿之中，杰斐逊和西沃德都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沉着的勇气和坚定的判断力。

杜鲁门主持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召开了最后一次他的工作人员的会议，并且安排了一系列的告别宴会。总统就职日越临近，杜鲁门显得越快活。白宫一个叫亚瑟·普雷蒂曼的仆人告诉《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说：“噢，你会想到总统就是以他现在表现出来的样子赢得了选举的。”

贝内特·克拉克、路易斯·约翰逊、克拉克·克利福德和当选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以及其他一些人前来道别。少数经过挑选的记者和作家获得机会与总统进行最后一次私人采访。杜鲁门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托尼·莱维埃罗，此时他很有一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法国回家时有过的感觉，即不知道他将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前途。

采访过杜鲁门好几次的评论家及作家约翰·麦森·布朗惊奇地发现杜鲁门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显老”，而是“处于最仁慈的辞别心情中”，既文雅又沉着。

在个性、谈话和举止方面与他过去在各地只作短暂停留的竞选旅行途中动辄发怒的或“加油干”的哈里毫无二致，甚至也不巧合……

每当我见到他时，杜鲁门总是那样平静而且体谅与他一起工作或者前去看他的各个层次的所有的人。他仍然担负着的讨厌的责任，依旧是他的每日怕人的日程安排。对他肆意滥加的辱骂、搬家的种种烦恼、告别的悲痛、他不久将会面临的发生剧变的生活、他



本人前途的变幻莫测以及历史的裁决——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扰乱他。

布朗写道，总统身体和精神上的“恢复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事实上，杜鲁门在68岁离开白宫时的健康状况比1945年他入主白宫时的还要好，也比自从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50岁离开白宫以来任何一位离开白宫时的总统都好。

丘吉尔来到西侧楼进行告别访问并在英国大使馆作主人为“哈里”举行宴会。丘吉尔这一次来访比上一次大大增添了更多轻快的气氛，他摆出一副“嘻戏欢闹的样子”，杜鲁门对他的陪伴感到非常的高兴。

现在从宾夕法尼亚大街向前望去，白宫几乎被为了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就职仪式而搭起来的木制观礼台所遮挡。

1953年1月15日星期四晚上华盛顿时间10点半，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杜鲁门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了她的告别演说。这是一篇没有浮夸的华丽辞藻或难忘的不朽警句的演说，但却是好极了，杜鲁门处于最好的状态。演说在预测冷战趋势时讲得比当时人们所可能理解的还更特别清楚。他讲得简明扼要，不时插入个人见解，他总的说来传达了当代重大历史的一种深刻意义、形成世界新格局的全景变化，以及自从他被召进白宫并被告知罗斯福去世那个凄凉的日子以来他必然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这不是一次怀旧的告别演说。在此之前，他曾私下说过，他不愿意想象他是在写一篇告别词。“我并没有结束，我才刚刚开始。”

杜鲁门以这样的话开始了演说：“下星期二，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宣誓就职为美国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不久，我就要乘火车返回家乡密苏里州的独立城。我就要再次成为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一名普通的千民。事情就应该是这样……”

4年前，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的重点是世界问题，即用民主的观点去观察周围的世界。现在在回顾他整个总统任期内的情况时，他仍然抓住了这个同样的主题。他提醒他的听众说，他当总统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和联合国一起向前进。他回忆了德国人的投降；他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在波茨坦举行的会谈，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里的爆炸；他决定使用原子弹来结束与日本的战争——如他说的，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4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他本可以说出下面的话，但他却没有说出来，即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临过这么多重大的问题，或者发现必须这么迅速地或者在如此几乎没有多少准备的情况下做出这么多重大的决定。他说的是一个总统职责中的最大部分就是作出决定。一个总统必须作出决策，“这是他的工作”。

杜鲁门推测说，然而他将会因此而被人记住的并不是在他任职的最初几个月里所作出的决定。

我料想，我的任期将被记录在历史上是由于那是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我们生活的年代。

在我的任期中几乎没有哪一天不受这种包括一切的斗争的支配……而且在其背景中总是有着原子弹。

但是当历史宣告冷战是从我的任期开始的时候，它也将说明在

这8年当中，我们已经确定了一条能够赢得这场斗争的路线……

他说，在他任期内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出兵朝鲜。朝鲜是冷战的转折点。有鉴于自由国家没有经受住以前的考验——没能阻止日本对满洲的侵略；纳粹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接管——“这一次我们经受住了考验”。然而我们没有允许过现代战争的极其可怕的潜力失去控制。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是核时代的世界和平问题。

一周前杜鲁门向国会送去了他的国情咨文而不是由他个人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的。他报告说，在太平洋的埃尼威托克岛上，美国最近进行了一次热核爆炸试验，“我们已进入震撼世界的原子能发展的又一阶段”，这被正确地理解为氢弹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位在1945年宣告原子弹诞生的总统在1953年一个新纪元开始时离任，这个新纪元的破坏能力使“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相形见绌”（如同他向国会报告的那样）。

他现在说，他介入朝鲜事务的本意是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发动一场原子战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他问道，冷战后来会怎样结束呢？怎样并且何时呢？

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预测，一个长期的预报，这本质上是一项表示信息的声明。杜鲁门的一生都是靠着信息而生活的。现在在他向全国发表讲话的这个最后一次机会中，他企图预言未来世界的历史，他再次相信一种下动摇的信念。对当时千百万的听众来说，这似乎是惊人地反映了美国最好的本性。许多年以后根据在冷战结束时所发生的情况再来阅读他的这篇讲话，它的先见之明似乎是完全奇特的。他好像甚至在那时就知道实际上将会发生的事情的本质，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

当自由世界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更能吸引铁幕两边的人们时，而且当苏联肆意扩张的企图受到遏制时，那时苏维埃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刻就必将到来。没人能确切说出这种变化将于何时或确切地如何发生，是由革命还是卫星国家内的麻烦引起，还是由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变动引起。

不管共产党的统治者是否会出于自愿地改变他们的政策，还是变化会以某种其他的方式出现——我都深信不疑，在这个世界上变化必将发生。

我对自由人的命运具有深刻的、持久不变的信念。有了耐心和勇气，我们总有一天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

他感到“高兴的是世界将有机会看到我们美国制度在移交总统的巨大权力时是多么的简单与平和……”他说回顾他在任的日子，他不感到一点后悔，并感谢人民对他的支持。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时，我觉得必定有一百万人比我更有资格担当总统的职务。但是这项工作还是要我来做，而我也不得不那样做了。而我曾力图竭尽全力致力于它……

晚安，上帝保佑你们大家。

这篇演说，实际上是杜鲁门对他离任的整个处理方式，受到了各界的赞扬。人们说，这个演说是他总统任职期间最精彩的一次；他收场得很坚强。多年来始终一贯持批评态度的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

在他离任的态度方面，杜鲁门先生完全是位总统，他意识到这项伟大的职务，而且无愧于它。

他的告别演说词显示他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可以公正他说他有许多对手却几乎没有什么与他为敌的人；希望他走运和喜欢他的人多于他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他爱经常自己发火，而别人对他发火也不难。但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批评他的人或对手都不可能总是对他发火。因为当他发脾气时，那正是他心情不好。他具有一个好人的善良性情，他与他的夫人和女儿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当他全家离开白宫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抱怨的回味。

就职典礼日像4年前一样阳光明媚，只是天气更加暖和，蔚蓝的天空下还像以往那样挤满了非常多的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成为第34届美国总统，他是20年来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共和党人，就职仪式进行得很顺利。

这天杜鲁门很早就起床，他在办公室里呆了一个小时左右，结束一些零碎的事情，然后与秘书处全体人员和保安人员话别。他无拘无束，兴致勃勃地在这间办公室里走走，在那间办公室里转转，不时他说：“这里看起来真是空空荡荡。”他身穿规定为就职仪式的服装，即一条正式的灰条纹裤子，带条纹的灰色外套。白宫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看他并与他道别。在杜鲁门等待当选总统到来时，10点半钟在红厅为内阁成员及其夫人们组织了一场小型招待会。

报界一直在大肆渲染一场“总统帽子”的危机。在未与杜鲁门商量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宣布他将戴一顶汉堡帽，而不是传统的大礼帽。所以杜鲁门将会戴什么帽子，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杜鲁门对他的工作人员说，他无意就一顶帽子的事引起他最后一场争吵。他将会戴一顶汉堡帽。

随之而来的进一步推测是关于这样的问题，即艾森豪威尔夫妇是否会按照习惯做法在就职典礼日之前去拜访总统和第一夫人。据说，杜鲁门的希望“依然是动人地、几乎像孩子一样地大”，即希望这一传统将会受到尊重，而当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邀请到白宫吃午餐时，杜鲁门感觉受到了侮辱。据说这位将军不希望在他成为总统之前进入白宫。当艾森豪威尔夫妇于11点半到达白宫北门厅开始驱车前往国会大厦时，他们拒绝进入白宫喝一杯咖啡，只是坐在轿车上等候，仅仅在杜鲁门夫妇出现时，他们才从车内走出来迎接他们。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正站在门厅附近，他回忆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刻。杜鲁门显得很通情达理，尽管他刚刚受到了怠慢。他的做法显示了他的卓越之处。”

从这两个人坐在那辆大型的敞篷林肯牌轿车中开车离去时所显示出来的样子，J·B·韦斯特回忆说：“我很高兴当时我不在那辆车上。”

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与艾克坐在1号车上，同行的有乔·马丁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贝丝和玛吉与艾克夫人同乘一辆车。我们只是一

般地谈谈话，对着人群、愉快的一天、有条不紊的移交，等等……”

关于后来谈了些什么的说法就不同了，但是，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回忆说他们就艾森豪威尔的独生子约翰·艾森豪威尔少校到场参加就职典礼一事交换了意见。艾森豪威尔问杜鲁门是谁命令约翰从朝鲜回来的，根据艾森豪威尔的说法，杜鲁门简单地回答说：“我下的命令。”但是根据杜鲁门的说法，他当时是这样讲的：“本总统认为让你的儿子回来亲眼看他父亲宣誓就职总统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不管怎么说，3天后艾森豪威尔有礼貌地给杜鲁门寄去一封信，感谢他“在执政的最后阶段向我和我的家人给予了这么多的礼仪……我尤其要感谢你的是，你考虑得很周到下达命令让我的儿子从朝鲜回来……更加特别要感谢你的是，你不让他或我知道是你这样做的。”

杜鲁门做了7年9个月共2841天的总统，到这天中午时他的任期就结束了。他后来写道，他试图集中精力听艾森豪威尔的就职演说，但他的思想总是转到其他的事情上。

不到半个小时后，杜鲁门坐进一辆封闭的轿车，从国会大厦驶向乔治敦，在第7街和D街的交叉路口，司机因红灯而停了车，这是自1945年以来杜鲁门乘坐的车第一次在交通信号灯下停车。

在他们上火车之前，艾奇逊在自己家里为杜鲁门夫妇安排了一次告别午餐会。这原本是一个小规模私人聚餐会，只邀请了内阁成员，白宫的助手们和不多的亲密朋友，但是当车拐入P街时，有好几百人聚集在这座红砖房前，发出一片欢呼声。杜鲁门感到很吃惊，他写道：“在迪安的住宅前的街道上挤满了人群，他们向我欢呼好像我是去上任而不是离任。”

他强行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他们说：“我感谢这个场面超过了我为总统、副总统和参议员时参加过的任何热情的聚会。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杜鲁门先生，一个平民。”

当艾森豪威尔就职典礼后举行游行的人挤满了宾夕法尼亚大街时，在这个城市的别处有一些其他人正在打电话给朋友们说，尽管城市交通堵塞停顿，也许他们还是应该设法赶到联邦火车站去，这样至少有人会在那儿为杜鲁门夫妇送行。

马格丽特把在艾奇逊家吃的这顿午餐描绘成“一件绝对了不起的事情，充满了笑话、笑声和一点眼泪”。到聚会结束时，P街上的人群多达整个街区的长度，连很远地方的交通都发生了严重阻塞。当杜鲁门夫妇准备去上火车时，成千的人在车站为他送行，向他挥手致意，向他欢呼并喊叫：“再见，哈里！”“祝你好运，哈里！”人们向前拥挤，伸出手去握他的手。

作为新总统提供的一种礼遇，“费迪南德·麦哲伦”号列车标志挂在了开往密苏里州的一列定期的普通直达列车上。警察在拥挤的人群中形成一个飞速机动的楔形，使杜鲁门夫妇得以通过。

众多的老朋友、民主党参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内阁成员、将军和驻美使节们挤上火车与杜鲁门再一次握手。当一名记者轻轻拍打艾奇逊的胳膊时，艾奇逊超过嘈杂声大声说：“他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个人。”

杜鲁门不断微笑着，挥动着手，贝丝看上去容光焕发。

杜鲁门站在月台的尾部说：“我无法用适当的语言表达我对你们所做一切的感激之情。我即使能活到100岁也决不会忘记这一点。”然后，他用人们熟悉的姿势两手在空中劈砍着，咧开嘴笑着说：“而这正是我想做的事！”

6点30分，人群中唱起了《美好的往日》，列车在歌声中徐徐开动，驶出车站，直到消失在灯光照亮的月台之外。从独立城到白宫，杜鲁门走过了漫长的路程。现在他要返回故乡去了。

杜鲁门记载道：“在哈珀渡口挤满了人群……整个晚上，每到一站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在穿过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 第六部 重返故里

## 十八、杜鲁门公民

正在阅读一本过去的总统们在历史上所成就的事业的书。或许能获得一些启发。

——杜鲁门致迪安·艾奇逊  
1953年4月

1

杜鲁门几乎从记事起，就崇尚充满神秘色彩的罗马英雄辛辛纳图的理想，辛辛纳图是位爱国农夫，国家受难之际他担任统帅，然后辞去领导之职解甲归田。“天晓得，也许我也会像辛辛纳图那样，某天被选为城堡之主。”这位来自格兰德维厄的农夫很早以前在写给贝丝·华莱士的信中说。国家的建立就是以这一理想为基础的。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就职仪式中穿过圆形的国会大厦时，从那幅约翰·特朗布尔创作的巨大的乔治·华盛顿画像前走过——华盛顿就是辛辛纳图，他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移交给国会，这位农夫加英雄于1783年放弃了权力。1953年，杜鲁门的职位远远高于一城之主，他却自愿放弃了当时历史能赋予某个人的大部分权力。他在日记中说，辛辛纳图不仅知道何时，也知道怎样放弃权力。

杜鲁门写道，美国的惯常信念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总统，然后时机一到，“复又成为百姓”。回忆在白宫的岁月时他说：“我对自己是谁，来自何方和将来返回的所在不敢丝毫忘却。”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星期六评论》的一幅漫画画了一个戴副眼镜，腋下夹本书的小男孩，这位颇似杜鲁门的男孩走在一个朋友的身旁，朋友说：“就算你长大当了总统，甚至连任，那也才不过8年时间。你剩下的半辈子做什么呢？”杜鲁门在漫画底下用钢笔大胆而草草地划了一笔：“天晓得！！！”

他从华盛顿返回家乡时没有特工人员护驾，没人照看他。回家后既无薪金也无退休金。除了每月112.56美元的部队养老金外，他从联邦政府不领取任何收入和资助。政府也未给他提供雇用秘书和设立办公地点的津贴，零花费用也没有。虽然在他第二任期时，他和贝丝从他10万美元的总统年薪中攒下一部分（主要买了政府债券），充其量数量也不大。据当时的估计为25万美元，但对这一数字没有以资证实的真凭实据。实际上，杜鲁门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周为了度过拮据的难关，在华盛顿的国家银行贷了笔款，数额从未透露过。

他和弟弟、妹妹继承了马莎·埃伦·杜鲁门在格兰德维厄的农田，同时位于北特拉华大街219号的老房子尚未得到正式处理之前，他和贝丝很快成了它的房主。显然，按当时的条件看，奢侈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其实他们只是在土地方面富有而已。马奇·华莱士（人们认为她很富裕）的地产总价值为33543.60美元，这不包括那幢房子，此笔钱在贝丝和她几个兄弟之间分成4份后，贝丝继承了8385.90美元的现金。的确，他们返回独立城又住进了那栋老房子的诸多原因中，经济上别无选择是理由之一。

此时城内传说四起，猜测着杜鲁门夫妇可能定居的地点，他们是否还会重返“华莱士的老房子”？许多人以为对一个已做过美国总统的人来说可能性不大。“传说他们要买一栋漂亮的房子，住在堪萨斯城。”休·金特里在

《考察家报》上说，“别的谣传说他们打算在杜鲁门先生拥有的格兰德维厄的农庄上造一幢房子，那里是杜家祖辈居住的一部分。”当地律师和杜家的老友鲁弗斯·巴勒斯在城内的新区觅到一幢颇有气派的住宅，觉得它很理想，非常适宜一位前总统。撇开经济上的考虑不说，这些传闻都不准确。杜鲁门夫妇哪儿也不想去，对找一处更暖和、更便宜或更豪华的居所不感兴趣。

美国另一位仍健在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家底殷实，豪华地住在纽约的沃尔多夫大厦。从世纪初开始便纷纷面临从总统职位上退下来前景的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伍德罗·威尔逊都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他们都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卡尔文·柯立芝除外，他因儿子去世悲伤忧郁健康受损，离职不满3年就撒手人寰。西奥多·罗斯福叱咤风云地前往非洲去狩猎；塔夫脱在耶鲁大学任法律教授，后成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尔逊同他富有的第二任妻子住在华盛顿S大街一幢有22个房间的日子里，生活奢华，深居简出地生活了若干年。而杜鲁门既无财富做后盾，眼下也看不到任何前景，未来的职业亦无着落。他说他唯一的想法是不做任何利用美国总统职位的名誉和尊严或使这一名誉和尊严“商业化”的事情，如在某机构或交易中接受任职或打出他的旗号。

几家未透露名称的机构已向他提供了若干职位，年薪10万或更多，而且不须占用他多少时间。他后来的卷宗中有一封来自迈阿密的一个不动产开发商的信，邀请他担任“主席、官员或股东，薪水不低于10万”。其他的邀请不太清楚，但显然邀请他的都不是特别有名的企业或机构。总之，他对他们一一谢绝，后来亦复如是。他决不出卖名字，也不依靠认可某种产品、游说、写信或打电话索取钱财。他不接受“咨询费”或不收受任何礼品，以免被人误解赞同某类产品。丰田驻美国公关公司提出送他一辆崭新的丰田轿车，以示美日的感情已有所改善，被他断然拒绝。他在答复中写道，他决不可能驾驶任何牌子的外国车，而只开美国产的轿车。

杜鲁门最喜欢说的话是他又成了一名普通的美国公民。这一点证实了他的民主哲学观。这样做让人民满意，他本人也高兴。但实际的困难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我仍不能感到是个彻底的普通公民，恐怕将来也难做到。”他对一名记者说，“虽然我尽了努力，但像别人那样生活几乎不可能。你做过风云人物后就无法按照你的心愿换个活法了。”

此外，他依旧迷恋他的辉煌时期。他留连当总统的节奏，没有了无时不在的压力而颇感怪异。他非常想念朋友们。他在答谢·迪安·艾维逊为他举办的告别宴会的信中说，他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人人都开心至极”。接着他又说：“但愿我们永远保持联系。”

杜鲁门夫妇返回家乡的晚上，前往独立城车站欢迎他们的人群大大超出意料之外。火车穿越密苏里州时，每到一站都有迎候的人群，致使火车晚点一小时。当9点零3分列车从拐弯处出现驶入车站时，约有1万人在严寒中守候。杜鲁门惊喜交集。贝丝对他说：“哈里，就冲这我们也没白干。”

当天晚上是1月21日星期三。第二天早上，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雷·谢勒问杜鲁门他打算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杜鲁门说他要“把旅行包拎到阁楼上去”，此话后来广为流传（谢勒同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陪杜鲁门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同行的还有罗杰·塔比）。然而一个小时后杜鲁门就出了门，坐进一辆州际高速警车朝堪萨斯城市中心驶去。他坐在前座，身边是过去D连的一个“弟兄”阿尔特·贝尔警官，州长指派他担任临时司机。杜鲁门是



去看他的新办公室的，它位于第 10 和格兰德大街交界处的联邦储备银行大楼 11 层的拐角处，共有 4 个房间。忠诚的罗斯·康韦已经上班，正在分捡几千封信，大体都是对杜鲁门的赞扬和谢意，杜鲁门觉得他每封都须答复。

堪萨斯城没有举办官方欢迎仪式，杜鲁门对此似乎毫不介意。当他和罗杰·塔比步行 5 个街区前往米勒已赫饭店与他弟弟维维安共进午餐时，几个行人注意到了他，杜鲁门便始终微笑着与他们交谈，仿佛一切都不错。

翌日天气骤变，气温突降——下降到华氏 20 度——北风彻骨，还下起了雨夹雪。杜鲁门不顾恶劣气候，前往格兰德维厄查看他计划建造的图书馆馆址。罗杰·塔比安排了几位当地记者一同前往，这组人给人留下了根深的印象：年迈的总统翻起衣领抵御着寒风，穿行在白雪覆盖的田野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的童年、他的这项投资 150 万美元的工程以及它对“将掌握我们国家命运”的青年学生的意义。他身旁的七八名记者、他印前白宫新闻秘书以及他穿着州警察制服的战友贝尔警官都尽力跟上他的步子，蹦跳着保持身体温暖。

图书馆是“眼下最大的兴趣焦点”。杜鲁门的所有文献都暂时存放在堪萨斯城的县府大楼里。自乔治·华盛顿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总统的文献属于其个人财产，他可任意处置。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建在纽约的海德公园，坐落在罗斯福在哈德森的庄园内；这是第一座所谓的“总统图书馆”，但罗斯福生前未参与那项工程。杜鲁门离职前曾派乔治·埃尔西从华盛顿前往农场，与他弟弟维维安和建筑师爱德华·尼尔查看馆址。维维安把他们领到一处他认为可以造图书馆的地方：一处靠近火车站、低洼湿软的边角所在。当埃尔西和尼尔指出一块俯瞰各个方向更具吸引力的高地时，维维安表示反对。那是片好地，维维安说，他觉得没有理由为建造“一座破图书馆”而浪费好地皮。

杜鲁门已画了几张草图。他想按他儿时记忆中他外祖父所罗门·扬那幢大房子的式样建造图书馆。他尽量凭借记忆勾勒出了那栋房子的草图。

“我们周围北风呼啸，”罗杰·塔比在日记中写道，“他谈论着图书馆。‘这个属于我们的美国……我们远眺大平原，想象着一座座城市和大学，瞧，它们就出现了！’”

《考察家报》撰文说，前总统似乎很喜欢那凛冽的天气。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天，天还蒙蒙亮时他就步出了家门，这还是他 7 年中首次身边没有任何保镖亦没有贝尔警官的护卫在城里散步。他走了 15 个街区，步行绕杰克逊广场一周，他后来写道，迄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像这次散步似的给他一种强烈的孤身一人的感觉。“此事标志着我生活的突变。”

在重建现代基督教协会礼堂举办的返乡欢迎宴会上，杜鲁门在发言中简洁而发自内心他说：“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比回家更好的感觉。”

他给贝丝买了辆新车，四门、轮胎侧壁有白圈的黑色克莱斯勒牌，并再度开始自己驾驶。由于几乎天天都有观光者和好奇的人到他们的房前观看，杜鲁门决定先不把铁栅栏拔掉。常常是一大群人——女童子军、游客——站在铁栅栏外朝里观望。“这是杜鲁门住的地方么？”一天早上 7 点钟一个坐在轿车里的人在马路边上冲他喊道。

他每早都散步，随时处理雪片般寄至堪萨斯城他办公室的信件——仅前两周就有 7.2 万封。他绝下怠情，他的名字用黑色大写字体贴在他办公室门

上，号码是 1107。每天 9 点前他准时抵达。

任何人只要乐意都可以走进他的办公室同他握手或参观。诚如他对一个朋友所云：“如今见我不必有预约。”然而他朋友汤姆·埃文斯回忆说，他内心的痛苦远不止孤独。“他简直陷入了困境。在白宫的岁月里，他的一切事情都有人替他包揽，在餐厅里点菜他都不会。他也不知何时该给小费，甚至不知怎么叫出租车和付车钱。”但埃文斯记得，杜鲁门从没发过一句牢骚。

在家时，房子显得“又大又安静”，只有贝丝和维那塔·加尔，后者用完晚餐就回自己的家。每晚，杜鲁门和贝丝都给在纽约的玛格丽特通一次电话。

在他们返乡不到一个月的 2 月初，经济上的忧虑似乎缓解了。杜鲁门在写给艾奇逊的信中说，他将签定一份著书合同，“报酬惊人”。2 月 12 日，新闻界透露他已将他回忆录的版权独家售给《生活》杂志，稿酬未提及。实际上，稿酬是 60 万美元——在 1953 年确实高得惊人——按照萨姆·罗森曼替他谈判签署的合同，将在 5 年之内以分期付款形式付清。

3 月底，杜鲁门、贝丝和玛格丽特开始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赴夏威夷的旅行，他们先作为艾夫里尔·哈里曼的客人乘他和私人包厢前往旧金山。抵达旧金山后，他们登上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从金门大桥下驶出海湾。船在接近瓦胡岛的当天清晨，杜鲁门写道：“‘钻石头’过后是映衬着巴里的火奴鲁鲁，彩虹、白云、晨曦和美丽的城市融为一体。”

那次旅行是最令他们着迷的生活经历之一。夏威夷是“天堂”，他们作为埃德·波利的嘉宾在他的庄园里逗留了一个月。埃德的庄园坐落在瓦胡岛向风的一面，位于卡内奥黑湾的小椰子岛上。杜鲁门一贯支持夏威夷成为一个州，因而船一到就受到夏威夷人的热烈欢迎。政界军界官员、记者以及六七个接待委员会的成员急不可待地跳到船上陪他上岸。“（他们）给我们挂满了花环，不停地问问题和拍照。”杜鲁门在夏威夷大学接受了一项荣誉学位，游览了瓦胡岛，还乘坐一架海军的 C—47 飞机穿越白雪封顶的冒纳开亚和冒纳罗亚火山之间的山谷，从空中欣赏了大夏威夷岛。飞回瓦胡岛时，他在靠近毛伊岛的水域里看到鲸鱼群，海军飞行员告诉他那是幸运的征兆。他游泳、闲逛、读书，觉得岛上“好客的居民”给他带来莫大的乐趣……一个月后，他再度返回北特拉华大街，那栋房子依旧又大又安静。

他又为自己买了一辆绿色道奇牌轿车，去办公室时开。他对汽车的痴迷一如既往，对于车子外观的讲究丝毫未减弱。

“今天早上 7 点钟我开始散步。”那年春天他的一则日记这样开的头。

我一两天前刚洗刷过道奇，它新得跟没用过似的。气象预报说有雨，于是我打算把洗刷过的车开进车库，开那辆已经脏了的黑车。由于车道上停着几辆车，所以我在换车时需费些周折。我弟媳见状说，你是不是想找一份停车场里的工作在练车呢。

杜鲁门晓得他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但对此前景又很惧怕。夏威夷之行使他变得“懒散怠惰”。他后悔下该同意写这本书。

还是那年春天的早上他散步时，停下脚步观看拓宽杜鲁门大街的施工现场。

一把铁铲（自动的）和一根索引绳索以及一些工人正以老式的方法干着活。工头或是承包商站在一旁观看，我问他需不需要一名得力的工头助手。他瞥了我一眼，又继续看施工，接着又打量了我一眼，咧嘴笑着说：“噢，没错！你失业了是不是。”

杜鲁门仍强烈感到须不断走动，于是冒着6月的酷热和贝丝驾驶新买的克莱斯勒开往华盛顿。他想“真正地试试这辆车”，他说。贝丝非常高兴，朋友和家人却劝他们放弃此行。杜鲁门和贝丝自从1944年参加完芝加哥大会返回后，9年里从未驾车走过远路。但他们还是早早地出发了，由杜鲁门掌握方向盘。他们又自己开车了，真是不亦乐乎，贝丝说。他们一直开到汉尼巴尔才停到路边一家餐厅前吃午餐，结果发现单独出门是多么不易。杜鲁门后来写信给他的老朋友维克·豪斯霍尔德说：“一直都很顺利，后来进来两位过去的县法官，看见了我。他们说：‘嘿，那不是杜鲁门法官么！’——于是女侍者和所有顾客都走过来同我握手并让签名留念。”

又跑了150英里后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杜鲁门在一座加油站前停下，过去几年他往返于华盛顿时常在这里加油。一个上了岁数的工作人员为他的车加油时不停地打量他，最后问他是不是杜鲁门参议员。

我承认是（杜鲁门继续给豪斯霍尔德写道）并问他能否指点一家城里较好的汽车旅馆。我们从没住过这类旅馆，想试试，看能否喜欢。他说了一家，但把这消息对城里所有人都说了。警察局长对我们颇不放心，便派了两名便衣和4名穿制服的警察照看我们。他们领我们吃晚饭，第2天又陪我们吃早饭，直到把我们护送出城才松了一口气。

贝丝坚持保持每小时50英里的车速。但杜鲁门说开得“如此之慢”意味着超过你的人可以趁机回头看你。“你好，哈里！”人们超车时便这样喊。“我们应该微装旅行。”杜鲁门对贝丝说。他们到西弗吉尼亚的惠灵后下榻在一家饭店里，大堂里挤满了记者和摄影师。

无疑，杜鲁门很热衷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焦点。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他在华盛顿记者团中窥见几张熟悉的面孔，正在一部轿车里等着护送他进城，他像见到久别重逢的兄弟似的同他们打招呼。“见到你们真高兴。”他嚷道。车子开到五月花饭店门口时，杜鲁门身着衬衫从车子里钻出来，一大群记者、摄影师和饭店职工一拥而上将他围住，争相与他握手。杜鲁门说他来这儿只是想痛快地玩一玩，黄昏的夕阳映照着他脸上满足的微笑。翌日的《华盛顿邮报》说他“快乐得像夏季中的一个学生”。针对向他提出的有关国会、总统和朝鲜战争问题时，杜鲁门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老朋友、他的内阁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络绎不绝地前来看他。“实在像场梦。”杜鲁门后来写道，“我们在五月花住的套房不啻白宫……一切似乎都同从前一样——我早上散步时出租车司机朝我打招呼；晚上同我共事多年的男女同事们共进晚餐；会议、紧张感、兴奋、事态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感觉……”

这“美好的时光”一直延续到下一周，因为他和贝丝继而驱车至纽约，

住进了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他们在 21 俱乐部与玛格丽特一起吃饭，还一起去冬花园观看了伦纳德·伯恩斯坦表演的《美妙城市》。他们步入剧场时，观众全体起立向他们鼓掌致意。

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不仅朝杜鲁门打招呼而已，他们索性把车子开到路边，跳出车来同他握手。令他欣慰的是，他还是他们心目中的他。“要是你明天还参加竞选，哈里，肯定能赢。”

杜鲁门“春风得意”地沿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返回密苏里的途中，被警察示意把车停在路边。据州警察曼利·斯坦普勒对记者云，“杜鲁门先生”两次插入要超他车的那些车辆之前。“他态度不错，保证下次格外小心。”但据从未违反过交通规则的杜鲁门自己称，那个年轻人只是想和他握一下手。

这是他和贝丝最后一次自己驾车出门远行。后来他们出游均乘坐火车、飞机或轮船。

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当政近30年后，患脑溢血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3岁。10天后，斯大林的继承人格奥尔基·M·马林科夫在一次演讲中称，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马林科夫的讲话发表两周后，北朝鲜突然同意交换受伤战俘，并称这是“和平地”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的开端。接着在7月的最后一周，当杜鲁门正冒着密苏里的酷暑着手他回忆录的写作时，在板门店签署了停火协议；朝鲜战争遂告结束。

这是一次自愿赔偿的停战，南北朝鲜的分界线划在北纬38度上。这样一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实际取得了杜鲁门没能取得的解决方案——即杜鲁门的共和党批评人士所称的“无赢家”协议。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指出，杜鲁门“要是接受了目前这个协议，非被华盛顿朝野骂个狗血喷头不可”。

斯大林之死无疑起到了效果；艾森豪威尔声称的在朝鲜使用新研制的战术核武器的威胁也发生了作用。

这场战争造成了可怕的流血和破坏——据一些人估计，约200万平民死亡，伤亡总人数为400万。美军战场死亡人数达33629，还有20617名美国人死于其他种种原因。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似乎毫无结果。但在杜鲁门和其他多数人看来，它是美国 and 联合国的一次主要胜利。军事侵略被遏制；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遭到制止；南韩（或许日本亦可包括在内）从无情的“红流”中被拯救出来。人们看到联合国的作用不仅限于一个世界辩论的场所。“至于美国，（《纽约时报》写道）朝鲜的军事行动使我们重新获得了民族的灵魂和良知。我们进行了一项艰难和代价昂贵的事情，因为我们认为值得一做。”

人们让艾森豪威尔就停火协议发表感想时，他只是简要地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儿子很快能回家。”关于功劳归谁的问题杜鲁门未加以评论。虽然他对他的后任成就了他未能取得的成果而且还未招惹政治上的攻击而理所当然和让人可以理解地感到气愤，他却保持了缄默。内心深处，他对战争的结束而感谢上帝。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朝鲜停战当然令我高兴，遏制了苏联的侵略功劳属谁无关紧要。射击停止的事实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10月，艾森豪威尔赴堪萨斯城对美国未来农民协会进行演讲，下榻在米勒巴赫饭店。杜鲁门打电话给饭店，说想去饭店向总统致意，不料总统助手说艾森豪威尔行程太忙，不可能安排会晤。杜鲁门深感痛心。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后来解释说，接电话的人肯定以为是某个异想天开的人挂来的电话。

杜鲁门一再推迟的回忆录终于动笔，图书馆的建造也开始上马，他发现自己比预想的要忙得多。“书写得还顺利，但我却成了它的奴隶。”他在秋季写信给迪安·艾奇逊说。

到当时为止，所有总统中只有赫伯特·胡佛生前亲笔写过自己的故事。（“没有几个总统亲口讲述过他们的经历，这对我们是一大损失。”杜鲁门在他回忆录的序中说）约翰·昆西·亚当斯和詹姆斯·K·波尔克在职时对他们各自的年代都写下了丰富的文字，但却是私人日记的形式。尤利塞斯·S·格兰特患癌症后在弥留之际曾坚强地撰写回忆录，为了给家人挣一笔收入，但他有意把自己在白宫那段充满阴影的生活略去了。即使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对历史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畅销的自传中也莫名其妙地对他当总统时的事件只触及了皮毛。赫伯特·胡佛的回忆录也远没有述及像杜鲁门经历过的震撼世界和划分历史的大事件。唯一可与杜鲁门想要写的进行比较的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具有权威性的二次大战史，此书也是由《生活》杂志首先发表，而且杜鲁门晓得，不管他的书写成什么样子，人们必拿它与丘吉尔的作品对比。

“我不是个作家！”同他一道撰写回忆录的人多次听他这样说。他并不同情他的合作者，只是对问题的关键进行陈述。为完成此书，共有六七个人曾卷入其中。

首先帮忙的是威廉·希尔曼和戴维·诺伊斯，两人都在白宫做过杜鲁门的演讲撰稿人，对杜鲁门的忠诚几近崇拜。希尔曼是一位五大三粗的资深报社记者，他已经出版了一本对杜鲁门大加赞赏的影集，名为《总统先生》，其中文字部分主要取自杜鲁门的言论和他的日记。诺伊斯在加州从事广告业，他矮小精悍，善于辞令，曾参加1948年的竞选班子。此人以发起最后把首席法官文森发配到莫斯科的那场争端而出名。他声称是杜鲁门的主要智囊之一，然而这是大大夸大的说法。

希尔曼和诺伊斯许诺杜鲁门不让他受到出版商的干扰，故而为他的回忆录写作制定出一套工作程序。他俩提供咨询，每个月都乘飞机进出一次堪萨斯城，同时在联邦储备银行大楼杜鲁门办公室下面一层的1002房间，成立了一个领取酬金的3人工作小组。他们的计划是让杜鲁门“讲述”此书。几个月中，他对着一部《生活》杂志提供的录音机——他很讨厌这部机器——按小时回答南加州大学新闻学教授罗伯特·E·G·哈里斯向他提出的问题。同时两名年轻的研究助理按照档案的材料对杜鲁门的陈述进行核对。晚秋时节，已写出了10万字，用打字机漂亮地打在活页笔记本上。但它离真正的手稿尚相去甚远，杜鲁门对所完成的亦不满意。“上帝，简直是一堆废纸！”他在书稿的上方涂鸦了一笔。

哈里斯被辞退，他的差事被另一个叫莫顿·罗伊斯的学者取代，此人办事杂乱无章，满口脏话，他继续着问话，但速度放得格外慢，一再迫使杜鲁门把回答说得全面和详尽，经常屡次返回到同一问题，尤其是关于原子弹的。结果杜鲁门对罗伊斯和整个程序腻烦至极。

1954年初，《生活》杂志的编辑埃德·汤普森从纽约飞来审读书稿。杜鲁门曾答应在1955年6月30日交付30万字。实际上35页手稿已经写就。

汤普森认为由杜鲁门自己的回忆构成的原始素材“生动”、“率真”，但还须做出更大的努力而且要快。

莫顿·罗伊斯离开后又换了两个新人：密苏里大学年轻的博士生候选人赫伯特·李·威廉斯和堪萨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弗朗西斯·H·赫勒。

威廉斯记得手头的官方和私人文献之多曾令他愕然：

从 1945 至 1952 年白宫各类通信的精华都井井有条地装在 50 只大型金属档案柜里，它们放在 11 层套间、杜鲁门的办公室（楼上）里，沿墙立着。它们包容了总统全部个人和官方的文件：2003 次演讲和 324 次记者招待会的发言稿；大量部门之间的备忘录和指令；无数次要员会议记录；13000 份口述信件复本，外加写给杜鲁门母亲和他妹妹玛丽的信……

我须把分给我的第一摞卷宗拿到 1002 号房间，将内容消化后写成回忆录的形式，它包括了整个租借法的始末，从杜鲁门将这一政策从罗斯福那里接手时开始……

威廉斯一天上午走进杜鲁门的办公室找一本参考书，惊讶地发现前总统正给自己斟烈酒（威廉斯极端反对饮酒，所以逐渐拒绝了杜鲁门请他吃饭的邀请。杜鲁门常说，他饭前总是先来点“掺烈性威士忌的 H<sub>2</sub>O”）。

随着手稿章节的形成，他们开始在杜鲁门的办公室里逐页逐页地进行长时间的审读。杜鲁门办公室很大，配有几把皮椅、一面国旗，挂着杰克逊和杰斐逊的头像，一面墙上摆放着书籍。窗子朝西，城市的万般景致和堪萨斯远处的山丘尽收眼底。某工作人员大声朗读稿子时，杜鲁门坐着仔细倾听着。“几乎每一段都要征得他的首肯和意见。总体构想是记录下当事人的记忆，使传记富于自传色彩。”威廉斯在一篇题为“我是杜鲁门的捉刀人”的文章中追忆说。文章标题有些浮夸和欠准确，其实他只是若干被雇用的人当中的小角色，介入写作的过程相对较短。

渐渐地，迪安·艾奇逊、约翰·斯奈德、布莱德雷将军和其他杜鲁门内阁成员以及他白宫的各色工作人员纷纷前往堪萨斯城参加审读会。

这位一生都早起赴办公室工作的人此时又恢复了往日的的生活模式。随着县府大楼的钟鸣声，北特拉华大街那栋房子的灯光通常在 5 点半天还未亮时就拉亮了。不久，一辆行驶的小车将他订的《堪萨斯城时报》掷入铁栅栏内，他拉开大门栓，身着衬衫走下回廊的台阶把报纸从地上拾起来。

7 点钟他再度从大门出来，身着西服，还戴顶帽子，手执一根拐杖。他走出栅栏门外后转身再将门锁上，确信锁牢后便开始其半个小时的步行。他所经过的大都是他记忆中的邻里和街道，均写入了他的回忆录。街对面依旧矗立着维多利亚风格的诺兰屋，主人还是他的诺兰表姐妹——埃塞尔和内利。绕过北特拉华大街的街角朝左是枫叶街，再往东是远离广场的非商业区，他在此处还能路过那座他第一次在主日学校见到贝丝的红砖长老会教堂（“她有一头金色卷发，她的眼睛至今还是最漂亮的。”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位于广场边上的克林顿杂货铺而今已是赫尔兹伯格珠宝店，但看上去与他当年勤恳地在那儿当小工的情景没太大差别（“……擦地板，打扫门口的人行道，在克林顿先生到来之前把一切都收拾的停停当当”）。

县府大楼，他的县府大楼（他那代人依旧称它“新”县府大楼）一如往

昔在广场上占据着最显要的位置，全城建筑物中唯有它的白色圆顶最早染上晨曦的光芒。观光者常问他的办公室在几层，哪个是他的窗户（“这些密苏里县政府的法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官，因为县政府是行政单位，而非司法机构……”）。

杜鲁门离开家乡赴华盛顿后的 20 年中，该城发生了巨大变迁，至今仍在发展变化。由新建筑物组成的新区仿佛一夜之间就钻了出来，交通愈来愈拥挤。人口已达 4 万，比杜鲁门年幼时增加了 5 倍。渐渐地，独立城演变成堪萨斯城的郊区。然而旧区、广场和他孩提时的街道邻里却旧貌依然，他对这一切都十分迷恋。

起得早的人们争相与他打招呼，在他快步沿人行道前行时上前自我介绍，与他握手。“我一贯尽力与人为善，”杜鲁门在日记中说，“他们当然不知道我起早的原因是为了缕清思绪，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碰上不认识的人，他总能说出此人的亲戚或他的祖辈，他为自己的记忆而颇感高兴。“我走上枫叶大街，朝左拐朝城中心走去，和几个人聊了几句，又朝南直奔普莱曾特大街。”某天的日记继续记叙着一天早上的活动。

过了列克星敦大街的红绿灯，我遇上了一个叫弗兰克·A·雷诺兹的小伙子，他自称是约翰·斯特罗瑟的女婿。我们聊了几分钟，使我想起斯特罗瑟家——那是县里最好的老户人家之一。

从我在华盛顿镇做监路工头起直到作为密苏里州的参议员赴华盛顿，约翰一直是蓝镇（属独立城）的民主党选区头目。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说不准他的年龄。他是我父辈时代的人，不过总愿意和年轻人呆在一起以保持心理年轻。约翰是个优秀的律师，而且很正直。

斯特罗瑟家还出了几个有出息的人：堪萨斯城民主党的台柱萨姆；第二代法官杜瓦尔等。我刚离开斯特罗瑟的女婿，一辆车在马路对面停下，从里面跳出个人，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你肯定认不出我了——你最后一次看到我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但我认出来了，我说出了他父亲和爷爷的名字！这对一个见过几百万人的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一项奇迹。

他是皮尤家的，他爷爷诺亚·E·皮尤是个大好人。他不是 1894 年就是 1895 年迁来密苏里，住在我外祖父拨给我妈妈的那块地产上，那块地共 160 英亩，位于外祖父农庄东南 3 英里的地方。皮尤先生有几个儿子和女儿，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康利·皮尤比我大几岁，很年轻时就要了一位格兰德维厄的漂亮姑娘。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截住我的这位就是康利的大儿子。他告诉我他有 4 个儿子。时间如梭，不管你乐意与否转眼就白发苍苍，不由不令人感慨万分。

杜鲁门的母亲从不回头看，永远瞻望未来，杜鲁门时常这样提醒自己。这是他部分力量的源泉。撰写回忆录和历经多年后重新徜徉于古老的邻里之中使杜鲁门比以往更加缅怀他的双亲。

他每天都变换不同的路线，但这无关紧要，不管他怎么走都同样返回到过去的时间隧道之中。位于河滨和沃尔多路之间他幼时住过的房子还在，火

车站附近南克莱斯勒大街的那栋老房子也没拆毁（“我们1890年12月搬进独立城时，我父亲在南克莱斯勒街买了一幢大房子，外带几英亩地……”）。

只有一个章节涉及他早期的生活，从他幼年始一直到他1919年从法国返回时为止。这段故事唯有他能讲述，因没有任何卷宗以资查阅，语言也是他自己的。

（“1892年秋天，格罗弗·克利夫兰击败本杰明·哈里森再次当选，1888年他就击败过哈里森。克利夫兰的胜利使我父亲喜出望外。他骑上一匹灰骏马参加了火炬游行，还用国旗和小旗帜装点房子顶端东北角的风标。风标的造型是一只漂亮的镀金公鸡。”）

一次在白宫时，一个杂志作者对杜鲁门说他父亲是个失败者。他答道，倘若他儿子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怎么可能是个败者呢。

他从家里出去的半个小时左右时间里，约7点1刻，维耶塔·加尔坐出租车来到杜家，从边门进去准备早餐。杜鲁门7点30分从正门返家，8点1刻再次出门，但这次是从后门廊出来，手里提一只铝制公文包，里面夹着他前一天晚上带回家的部分手稿。他走向车库，小心翼翼地把绿色道奇倒上车道，然后朝西向杜鲁门路驶去，堪萨斯城的轮廓在前方升起，逢到阳光灿烂的清晨，建筑物的线条犹如艺术家笔下的正处蓬勃上升时期美国的风景画。

他经常把车停在离办公室一个街区的一处开阔的停车场上。他先付一美元的停车费，然后步行去银行大楼。走进大厅后，他轻推一下帽子招呼开电梯的凯·沃克的名字向她致意。8点45分他已坐在办公桌旁。

“我一直在写我的回忆录的开篇章。”杜鲁门1954年1月28日在办公室里写信对迪安·艾奇逊说，试图想探究为何他觉得此项差使如此艰难。

我尽力使自己重新置身于1945年4月12日的那天。我阅读了写给我母亲、妹妹、弟弟和表姐妹的信。我读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以及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来往的电报。我读了从1944年6月至次年4月12日我历次前往白宫的备忘录。我读了艾克、李海、丘吉尔、格鲁和科德尔·赫尔的书；霍普金斯、史汀生、助理和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备忘录；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金、布莱德雷的报告；德黑兰、开罗、卡萨布兰卡、魁北克、雅尔塔公报及贝尔纳斯就此写的书。还有许许多多，而我居然没累死……

所以你看，过去的事一直让我感兴趣，可拿来为今日所用。而9年前我所做的和没有做的令我厌烦得要死。

但我尤对安德鲁·约翰逊、詹姆斯·麦迪逊，甚至老拉瑟福德·B·海斯感兴趣，犹如我着迷于法国的亨利四世、纳瓦尔的玛格丽特、西班牙的查尔斯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以及查理的姨妈玛格丽特一样。

真希望我所谓的退休时光没花在写我和我的错误上，而是集中写写路易十八、古斯塔夫·阿道夫和黎塞留……

圣帕特里克节那天，杜鲁门再次写信给艾奇逊，说他仍在思考历史与政府的关系。“我们的部落本能尚未被科学和发明消灭。我们作为个人无论在体力和道德方面都还落在原子时代的后边。我们能赶上么？”

也许他们的孙子辈会做得好些，他补充说。然而就他而言这只是一假



设（玛格丽特尚没有透露要出嫁的苗头）。

他体察到国人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因而深受鼓舞。“我收到的信完全都变了一副口气。数量还似雪片似的，但 200 封里也很难找到一封跟我过不去的……”

在他的家乡独立城，人们对他的兴趣和欣赏日益强烈。轿车和载着游客的大巴士此时几乎天天都慢慢地从北特拉华大街驶过。当贝丝将杜鲁门的几件衣服送到教堂作为捐赠品义卖时，传闻说其中的一件大衣是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时穿的——这一说法愚不可及，因为波茨坦会议是在仲夏时召开的。但大衣照样卖了个好价钱。火车站竖起一副招牌，上书：“独立城，美国第 33 届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家乡”。此招牌搅得杜鲁门心里不太舒服，因为他注重历史真实性，坚持说由于克利夫兰联任两届，他应为 32 届总统。

城里有些人还像从前似的对他没什么好感，尤其是共和党人，但他们毕竟只占极少数。全城人都一致强烈地认为杜鲁门夫妇回乡定居是件大好事。人们对他俩默默无闻地融进了城里的生活表示欣赏，尤其喜爱“杜鲁门先生”作为普通公民的言谈举止。他不摆架子，仍未失小城人的率直气质，人们对此像对他的一切那样颇为引为自豪。杜鲁门的老朋友、热情的共和党人亨利·邦休对东部的一位杂志作家说：“我过去老说杜鲁门住的地方与我隔一个拐角，现在我天天都对自己说，你住的地方与哈里·杜鲁门隔一个拐角，千万别忘了。”

最能表达全城人的友好和慷慨，同时也最让杜鲁门受到感激的举措是划出广场以北的一座花园为他修造图书馆。他为此而欣喜万分。在独立城造馆远比在格兰德维厄适宜得多，交通也方便。斯洛弗公园是个 13 英亩的圆丘，安详静谧，风景怡人，坐落在美国 24 号高速公路边上。若占有格兰德维厄农场一大片土地，不仅对杜鲁门是一大损失，维维安和玛丽·简也要做出牺牲，因为格兰德维厄的土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昂贵。此外，独立城的图书馆馆址距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只有一英里，对一个善于步行者根本不在话下。

“党派偏见和自私心理几个月前就烟消云散，将哈里·S·杜鲁门图书馆这样一座国家纪念性建筑建在这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的家乡，是再理想不过的。”《堪萨斯城时报》撰文说。

除却写回忆录，杜鲁门又将大部分心力投入为图书馆募集资金上。他出席宴会，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写了几千封信。在独立城国民警卫队军械库举办的造馆资金筹措拍卖会持续了 7 个小时。位于华盛顿的政府对图书馆不给予任何资助，所以一切资金都须杜鲁门自己筹集。这对他不啻又一场竞选活动，而且他要在一年半筹集到 100 多万。“他计划的速度令我震惊。”玛格丽特回忆说。

杜鲁门常说，一个人活过 70 岁，时间就是借来的。然而 1954 年春季他 70 岁时，他在工作和享受方面一点儿不减当年。5 月 28 日他在信中对艾奇逊说，他每天工作 17 个小时写书、处理信件和接待到他办公室的“顾客”。而他脑子里装的还不止这些：

我对世界局势颇感担忧。我们正失去一切朋友，白宫里聪明而乳臭未干的孩子们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搞得一团糟，削弱了我们的军事实力。他们却好像还要插手印度支那……

6月，当欧文·伯林主演的火爆音乐剧《唤我夫人》（题材是关于珀尔·梅斯塔的）来到堪萨斯城露天剧场演出时，杜鲁门欣然同意在最后一幕突然登场，扮演他自己的角色。6月18日晚上他在后台等待时突然肚子剧痛而病倒。贝丝立即把他送回家，当晚他们家的灯光一直没灭。6月20日，杜鲁门在科研医院做了紧急手术，离开白宫后返回堪萨斯城定居行医的华莱士·格雷厄姆为他摘除了胆囊和阑尾。随后发生感染，格雷厄姆忧心忡忡地说，由于前总统对新药物“不同寻常的过敏”，已陷入危险状态。几天里人们对他的病情极为关注。“简直像下了地狱。”杜鲁门后来写道，“他们用针扎入我的静脉，给我输了5到10加仑的抗菌素，但还是没把我杀死。”

危险期终于度过，杜鲁门康复得很快，还成了模范病号。他眼里似乎没有愁事。密苏里西部已变成大火炉，中午时，医院窗户外面的气温计高达华氏110至114度，而医院却没装空调。虽如此，杜鲁门则毫无怨言。院长坚持要在他的病房里装空调，被他拒绝。他不接受特殊待遇。只是在汤姆·伊万斯指出他若再拒绝，日夜陪他守床的贝丝就要中暑时，杜鲁门才把院长叫来，同意立即装上空调。

“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你得了坏疽性胆囊炎时，”艾奇逊在信中写道，“我立刻想告诉格雷厄姆医生你是怎么得的。原因是看报纸看的，看报纸的人都逃不掉患点毛病。我的痛风根源就在于此……”

杜鲁门养病期间，艾奇逊给他寄去一本塞西尔·伍德姆—史密斯著的《缘由》，内容描述的是轻骑兵旅那次具有灾难性的进攻。“当你对拉格兰、卡迪甘和卢肯三位勋爵熟悉后，你就会联想到我们都认识的某位将军。”艾奇逊说，他指的是麦克阿瑟。

艾奇逊写给贝丝的信中说：“开电梯的、我们的厨子、出租车司机、街上的陌生人，这么多人都不断地问我总统的情况，真让人感动。人们深深地爱他，甚至报界亦如此。”

10万张明信片 and 信件飞向杜鲁门，祝愿他早日恢复庭康，他收到的鲜花也不少，用他的话说，“可以给每一位（来医院）的顾客都送上一枝”。

7月6日，杜鲁门在医院他的病房里信誓旦旦地说他要“尽一切努力”使他的图书馆上马并尽快落成。他一迈出医院的大门就立即又投身于工作之中。

埃德·汤普森11月从纽约飞来，发现回忆录的“素材”已超出所需，而手稿离要求却还相差甚远。他婉转地向前总统建议，希望派《生活》杂志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欧内斯特·哈夫曼来帮着润色和加工，杜鲁门没答应。他写信对汤普森说：“目前对我最重要的不是风格和如何组织材料，而是事实……以便将我当总统的岁月描写得准确无误。在这一任务完成之前，我希望你暂不要派哈夫曼先生或其他人来……”

哈夫曼的出现是3至4周以后的事，杜鲁门终于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作家帮他工作了。弗朗西斯·赫勒记得他本人从哈夫曼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尽管哈夫曼并不亲手动笔写——而且人人都干得很卖力，一周工作6天乃至7天，如杜鲁门所说，“拼出了老命”。杜鲁门在信里对艾奇逊说：“这该死的玩艺儿经修改后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然而哈夫曼显然觉得前总统是个不好合作的人，其他工作人员更不易对付，于是一个月后他要求辞去了这一差使。

在道布尔戴的请求下，又雇用了—一个叫霍索恩·丹尼尔的作家。道布尔

戴是一家出版公司，打算在《生活》杂志连载回忆录时同时出书。后来，道布尔戴的总编肯·麦考密克也参加了减裁和润色，杜鲁门还央求迪安·艾奇逊和萨姆·罗森曼审阅全稿。艾奇逊的意见尤为可贵。

你在描写你自己的生活 and 表达你自己的观点时，材料就特别扣人心弦和有趣儿，而对谁造访了白宫及杜鲁门委员会的活动的叙述则显得干瘪无生气，反映不出你的性格（艾奇逊在一篇颇长的信中评述道）。

114 页第 3 行。你用了一句老掉牙的话“国务院里死教条的伙计们”。我希望你把这句话改成“国务院里的人”，因为你的原话不仅乏味，而且会让人对你给予政府工作人员的巨大帮助以及他们对你的无限感激之情产生误解。

艾奇逊对杜鲁门说，他发现手稿某些地方文字粗俗肤浅，有说教味儿，“与你的为人不符”。

写作班子对艾奇逊用不空行打字机打的好几页洋洋洒洒的评论仔细进行了研读，然后滔滔不绝地表达了他们对艾奇逊评论的看法。

肯·麦考密克发现贝丝·杜鲁门起着比人们预想的要大的作用，因为杜鲁门每晚回家与她探讨完稿子后，他仿佛对手稿作出的决定更加明智，判断力也明显提高。麦考密克多年后回忆当时回忆录的写作过程时说：“我想贝丝是杜鲁门真正的指路明灯。”

杜鲁门写作上的经济负担日益沉重，因为他尚未得到稿酬。按规定，他在 6 月 30 日交付完成的手稿时《生活》杂志才付给他 60 万美元的第一次款项。

1955 年初，手稿字数达到近 200 万，而合同上说只需 30 万字即可。经磋商，《生活》同意接受 58 万字，但写作速度还是拖期了。希尔曼和诺伊斯此时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在堪萨斯城进行剪裁修饰。

面对庞大的手稿，道布尔戴出版公司决定将回忆录分为两卷本，故而 1955 年的上半年便集中精力攻第一卷，这卷只述及了杜鲁门任总统的头一年零 4 个月，外加一章他童年的生活以及两章他在罗斯福去世前的政治生涯。

写作速度加快，亦发生了一些变化。艾奇逊为了帮着修改手稿，携妻子艾丽斯赶来，住进了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此事顿时成了城里的街谈巷议，因为过去还从没有前国务卿在独立城住过，而且就人们记忆所及，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也从没留过“住宿客人”。

5 月 8 日杜鲁门 72 岁生日那天，他与 2000 来人聚集在斯洛弗公园，在乐队的伴奏下，按家乡的古老仪式，为他图书馆的破土铲了第一锹土。接着破天荒的，他和贝丝在家里为 150 位嘉宾举行自助餐。玛格丽特写道她做梦也想不到会见到这样的场面。她母亲伫立在她的“庇护所”的门首，迎接着每一位客人。

6 月 24 日杜鲁门乘机飞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 10 周年纪念活动。飞到 14000 英尺的高度时，他俯瞰着怀俄明和落基山脉，此时他不禁想起了他的外祖父所罗门·扬。晚上榻在费厄蒙特饭店时，他把当时的感受写在了日记里。

我们早上7点钟离家，11点就飞越了落基山。外祖父约凌晨4点钟从现在的格兰德维厄出发，五六个小时后至多能走到离密苏里边界线以西10到12英里的地方。我们生活和置身于一个何等的年代！午餐吃的是山湖里的鲑鱼，眨眼的功夫飞机已扎进大盐湖城峡谷……

随着写作期限的压力日渐逼近，联邦储备银行大楼的办公室里延长了工作时间。6月末的几天里，一些写作班子成员夜里继续挑灯夜战。

1955年7月4日，杜鲁门在堪萨斯城向埃德·汤普森交付了50万字的手稿。交稿时他说：“过去从没有想过写本书有多么艰难。”

他的第一张支票是11万美元，同时还收到提取60万美元剩余款项的5张期票，其中最后一笔稿酬1960年1月前才付清。

《回忆录》连载的第一期题为“最重要的最初18天”，登在《生活》杂志9月25日一期上，封面上还配了一张前总统和第一夫人站在他们独立城家门口的照片。道布尔戴版的第一卷名为《决策之年》，5周后也正式出笼。当时是1955年11月2日，出版公司为此书的出版在米勒巴赫饭店的大舞厅里举办了一场作者签名聚会。

杜鲁门答允为所有来宾在书上签名，令出版商大喜。“估计我得用坏两枝在廉价商店买的1.75美元一枝的钢笔和五六枝我以前有的钢笔。不过我不想（为钢笔）做广告。”杜鲁门在写给道布尔戴广告经理塞缪尔·沃恩的信中说，“我可以参加你为道布尔戴举办的任何行动，但别让我为钢笔、蛋糕或别的东西做广告噱头，我拒绝那样做。”

沃恩提前几天抵达堪萨斯城为活动做安排，他听人们说“我们天天都见杜鲁门”，干吗非要参加这样一项活动呢？不免引起极大担忧。于是沃恩发动起D连的老兵、童子军和所有他能想到的人，以确保凑足人数。然而他的忧虑是多余的。聚会还没开始就有300多人排起长龙等着了。

第二天早上报纸的标题是《一直爆满》。

场面令人瞠目。“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杜鲁门看到人群不断膨胀，每小时都有新人涌进时说。他签名时手都快飞起来了，一分钟竟能签6至8本书。倘若寻找他过人的活力，这便是一例。他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签，一边签名还一边与人们寒暄。“瞧，这个名字签得漂亮极了。”他时不时得意地说，把签好名的书递出去。

休息时，他已签了1000本。最终仅仅在5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不可思议地签了4000次名字。在场的记者和出版商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此前，道布尔戴的肯·麦考密克曾建议杜鲁门使用机器签名，杜鲁门答道：“我将尽我的能力能签多少算多少。我使不惯机器，还是愿意用手签。”

评论家理所当然认为此书的出版是一大事件。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撰文说：“哈里·杜鲁门的《回忆录》（道布尔戴版）首卷对美国政治高潮期的内幕做了详尽的描述，建国以来尚没有哪位总统这样写过。”人们赞扬杜鲁门对历史做出的贡献，他对总统权力的理解，他思维的清晰以及办事细致的作风，诚如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在《纽约时报书评副刊》头版上写的，“他既谦逊又自信的迷人的气质”。人们认为书中自传的成分过少，多数文字读起来像好几个人合写的官方文件（在序言中，杜鲁门对协助他的人慷慨地致以谢忱）。理查德·罗维尔追踪报道过杜鲁门多年，他在书

中绝少看到杜鲁门用自己的话表述的反映其辛辣个性特点的言辞。书中收了18封杜鲁门致他母亲的信，罗维尔认为类似家书的内容还应更多些，它不仅可使人免去硬读文牍风格的乏味，还可“神奇地窥视”作为普通人的杜鲁门的心态。

正如评论家们所暗示的，回忆录的写作介入的人太多。杜鲁门的个性已被淹没，有时他甚至显得干巴无味。艾奇逊的忠告应更加引起他的重视。大部分章节都没能反映出杜鲁门本人的活力，他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和他信件语言的生动性。从很大程度上讲，这是杜鲁门的责任，因为他对此书的写作方式未提出异议。此外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他是在记录历史而不是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弗朗西斯·赫勒从未记得杜鲁门在撰书时管它叫“回忆录”，而只是称“我的历史”。

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他的书同丘吉尔的战争史做了比较，但不像预想的对他十分不利。从文学的角度评判，阿伦·内文斯说，杜鲁门的书够不上那一时代上乘的回忆录，但他强调此书却是一部“优秀的著作”。他的赞誉大于贬损，因而他的书评也和别的评论一样，不仅成为对书的臧否，也被视为对作者的盖棺论定。此书即使不是本世纪一本杰出的回忆录，也是由本世纪一位最卓越的人物所撰写的出色作品。

总之，它塑造了一位最诚心诚意、最充满活力和目光最锐利的总统(内文斯写道)……他洞察秋毫的敏锐尚未得以充分展示。……他对总统职务的高度责任感及他要身体力行的决心同样使我震动……他在处理一般事务中显得业绩平平，在琐事上还免不了出些莫名其妙的差错。但他在任职期间历练得愈发伟大，这在历届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支撑他的是他对美国史的渊博知识和对我们优秀传统的渗透。危机来临时，他所体现的是政治家的洞察力、活力和勇气。此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此……

第一卷和翌年春天出版的第二卷以及该书在《生活》杂志上的连载，重新唤起了对杜鲁门的兴趣，也促使人们重新评鹭他任总统时的功过。尽管他对诸多事件的描述引起了争端——对他发难和驳斥的主要干将有吉米·贝尔纳斯和亨利·华莱士——《回忆录》的出版是杜鲁门的名誉重新而稳固地树立起来的开端，也是他本人异常幸福时期的开端。可以这样说，此书的出版开创了他漫长生命中最快乐的一个篇章。

### 3

杜鲁门一直想有个儿子。他后来在信中对艾奇逊解释说，他之所以管成长中的玛格丽特叫“瘦猴”就是这个原因。“不过虽然我希望有俩儿子再多一个女儿，但给我一屋子男孩我也不会拿玛格丽特交换。”

1956年3月中旬，在纽约卡莱尔饭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玛格丽特宣布她已同小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订婚。小丹尼尔是《纽约时报》国外新闻助理编辑，42岁，比玛格丽特大10岁。这一消息来得突然，虽然杜鲁门夫妇几周前就已知道，玛格丽特却在不泄露自己的恋爱史方面做得颇为成功。

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已相识一年多。他略高于中等身材，长得清癯漂亮，衣着考究，说话略带英国口音，据说是因在英国驻了 10 年记者使然。他老练成熟，但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和玛格丽特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泽布隆那样的小地方，其父老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在那里有一片小杂货铺。

杜鲁门独自在他的办公桌旁用一杆 1.75 美元的自来水笔给艾奇逊写了一封 2 页纸的信。这两人表面看起来很不协调的性格结成的友谊在杜鲁门当总统时至为重要，而如今这一友谊、他们之间肝胆相照的信任和相互欣赏，以及对人世的沉浮交换意见时所获得的喜悦对杜鲁门来说意义更为重大。事实是密苏里州独立城的第一公民、衣锦还乡再度成为“普通的杜鲁门先生”的总统极为想念与阅历颇深如艾奇逊者在一起时所能享受到的激励。他俩之间的信件逐年增多，杜鲁门敞开心扉坦露心迹，他过去只对他关系亲密的女人这样做过。他甚至告诉艾奇逊，他有时写信完全是为了得到回信，这话他也曾对贝丝说过。“我收到你的信心情就好些”，杜鲁门写道，“但愿能和你坐在一处聊上一个或半个小时，哪怕 5 分钟也行。那样我的精神就将焕然一新。”

杜鲁门意外而喜悦地发觉，艾奇逊同他亲如手足，可以以诚相待，他的晚年生活因这位居住遥远却亲密无间的朋友的存在而变得充实和有意义。他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男性朋友，而他古稀之年日渐快活的生活终于在这位朋友身上找到了缘由。

此时他把笔锋触到他私人生活中一次最新的转折。“玛格丽特作弄我，与一个记者订婚了！”他的信一上来就这样写道，接下来话语滔滔不绝地倾泻在纸上，那遒劲的笔划与他 50 年前从格兰德维厄写给贝丝·华莱士的笔迹几乎相差无二。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只要玛格丽特要他我没意见。报界对他的评价似乎很高，尤其是《纽约时报》的同仁。

小姑娘在宣布此消息之前的一二周才告诉我们，还让我们发誓保密。其实她让我挂上电话而把详细情况对她妈妈说了一番。你女儿对你也这样么？她不让我把此事透露给她小姑和小叔。这对儿乳臭未干的恋人去北卡罗来纳见了他的父母（都是不错的人），而且竟然和乔纳森·丹尼尔一家所有的人吃了顿饭，还希望要保密！第二天他们给老爸挂了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这个老爸在没有事先通知朋友的情况下于翌日宣布了此消息。你女儿也是这样的么？

我们已收到至少 2000 封电报和信了，她收到的比我们的多一倍——真是自作自受。同所有有女儿的老头子的感觉一样，我很担忧，但愿一切顺利才好。你能否给我点安慰？

艾奇逊立即回了信：

我所能给你的也只有安慰而已。先说玛格丽特的选择。她的判断力一直很优秀，这次又显露了一回。我和艾丽斯在这儿和他们吃了顿饭，庆祝玛格丽特的生日——一年前我们是在独立城同你们一同为她庆贺的。克利夫顿·丹尼尔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他有魅力，知情达理而且能力很强。回家的路上我对艾丽斯说他俩肯定

恋上了而且我举双手赞同。艾丽斯嗔怪地埋怨我跟丹尼尔先生说个没完没了，以至她没找着机会问问玛格丽特对他的看法。她说我快成老媒人了。他俩订婚的消息传出时，我不禁有种料事如神的喜悦。我还是这个看法：玛格丽特选择的男人是一流的，跟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婚姻是最大的赌博，但性格是很重要的因素，我敢担保他们的冒险必然成功。

现在来说女儿们的行为和新娘父亲的地位。我发现女儿对于婚姻一般是自作主张，随心所欲。儿子也如此——或许别人家的女儿代他们做决定。我明确无误地告诉玛丽和戴维让他们等到战后再结婚，但话音未落他们就把事办了。总之，新娘的父亲是个可怜虫。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总是碍手碍脚的，像个笨拙的孩子，可以哄着玩，但不能介入重大决策。对于他唯一的安慰是一瓶好酒，你家里酒还多么？

婚礼于 1956 年 4 月 21 日在独立城自由街的小三一圣公会教堂举行，那是贝丝·华莱士和哈里·杜鲁门 1919 年结婚的地方。随后在新娘家举行小型婚筵，与 1919 年的婚筵也相差无几，只是地点在室内，避开了铁栅栏外数百名记者和摄影师和一辆接一辆车里的观光者。那天华氏 80 度，蔽荫的草坪修剪得很整洁，一片葱绿，走廊旁的绣线菊绽开着花朵。玛格丽特穿一件照 200 年之久的威尼斯精细网织品的样式做的拖至脚踝的米色婚礼长裙。新娘的父亲坐轿车携玛格丽特抵达教堂，其后举行的仪式期间他的确像个“可怜虫”，看去一脸的不愉快。后来在婚筵上他笑逐颜开——或许艾奇逊的劝告让他开了窍儿。

不出一个月，杜鲁门和贝丝开始了被称之为他们自己的蜜月旅程，那次横跨欧洲的豪华旅行可谓是他们生活中最开心的游历。

他们外出 7 周，坐火车游历了欧洲各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西德、布鲁塞尔、荷兰和英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雨中度过的——“雨，雨，雨，天天都下，偶尔太阳从云中窥探一下。”杜鲁门在日记中记载道——但杜鲁门的兴致却丝毫未受影响。

出发那天早上，杜鲁门从阁楼往下提手提箱时在楼梯上绊了一下，扭伤了踝骨，借他的话说肿得碗口那么粗。于是他拿了一根锃亮的黑拐杖并带在身边，在头几天里无论到哪里都要拄着走，只是速度比平日慢一些。他们 5 月 8 日清晨 7 点 1 刻从独立城火车站出发，当天是杜鲁门 72 岁寿辰，一群朋友和亲属前去送行。在站台切了一块大生日蛋糕，分给众人——“一次开心的聚会”——从那以后他们每到一地都将遇到欢迎的人群。

此行的目的是回应一个由来已久的邀请，杜鲁门将在牛津大学接受一项荣誉学位，而 6 月 20 日在牛津举行的仪式则是此次旅程的高潮。“我一直害怕我在牛津的表现会使你失望，但显然一切都很顺利。”他写信对艾奇逊说，后者同乔治·马歇尔已被牛津授予过学位。

前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在其世人瞩目的环球旅游期间，曾在欧洲逗留了数月，受到皇室般的款待；1910 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结束了在非洲的狩猎远征后，赴欧洲各地和牛津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演讲，被牛津授予荣誉学位。杜鲁门此行是第 3 次赴欧洲，但首次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他第一次手持护照）。他和贝丝一直梦想着一次去海外游历的机会。这是他俩一生

中难忘的一次旅行，而对贝丝却是第一次出国。他们是那年 50 万赴欧美国游客当中的两位。

杜鲁门的首席礼宾官斯坦利·伍德沃德和妻子萨拉陪同杜氏夫妇前往，他们一行从纽约坐“美国”号客轮启航，在勒阿弗尔登陆，尔后乘火车直抵巴黎。5 月 17 日中午，即杜鲁门到达巴黎的第二天，他来到歌剧院旁边的古老的“巴黎咖啡馆”，坐在室外的一张小桌子旁心旷神怡地呷着咖啡。没过多久，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咖啡馆里的人也扭过头来纷纷盯着他看。他解释说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光顾过这里。美国各家报纸都登出了一张通讯社发回的照片，前总统挥动着拐杖漫步在歌剧院前的广场上，酷似一位巴黎的公子哥儿。

他无论去哪儿身后都尾随着记者，他到圣拉扎尔市时，在车站等候他的记者多达几百名，继而一直追踪他的记者亦不少于十几名。《独立城考察家》报的读者从合众国际社发自巴黎的一则消息中得知，“杜鲁门先生在欧洲像在密苏里一样受欢迎”。大街上的人们向他欢呼表示欢迎。在罗马火车站，迎接他的场面激动人心，几百人同时高呼：“杜鲁门万岁！”甚至用英文喊：“你好，哈里！”杜鲁门一行住在位于西班牙台阶顶端的海斯勒饭店里。

游览罗马古迹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克莱尔·布思·卢斯因身体有病不能前往，遂由她丈夫亨利·卢斯代为做向导。哈里·杜鲁门和亨利·卢斯并排坐在古罗马圆形剧场思索衰落的罗马帝国的形象是让人们难以忘记的。

好几十个美国游客尾随着杜鲁门向他致意。在罗马议会大厦，站在巨大的马库斯·奥里利厄斯骑马雕像面前，杜鲁门开始介绍自己并与游人握手。

“你好吗？我是哈里·杜鲁门。”

“我是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保罗·舒尔特海斯。”惊奇的游客答道。

杜鲁门和贝丝某礼拜日难得地受到教皇皮乌斯七世的召见，那是自 1919 年伍德罗·威尔逊正式拜访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以后美国总统第一次在罗马教廷受到接待。贝丝的头上罩一层黑色带花边的黑纱，杜鲁门身着黑色燕尾服，条纹裤，还戴了顶高帽。“实在是一次最过瘾的拜访。”他说。

在意大利的两周时间里，他们游览了维苏威火山、庞培废墟和萨莱诺附近的佩斯塔姆古罗马神庙。他们漫游了翁布里亚青翠的山丘，圣弗朗西斯曾一度与他的鸟儿和动物住在那里；在佛罗伦萨，他们登上阿尔诺山前往有几百年历史的蓬特韦基奥购买皮货，还参观乌菲齐美术馆，专心致志地欣赏波堤切利的绘画。游览威尼斯期间，他和贝丝同其他游客一样在圣马克广场上徜徉，并乘狭长平底船游览在大运河上。

杜鲁门时不时对记者说，意大利的气候让他想到得克萨斯。他声称民主党在秋季总统竞选中获胜不存在不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必胜无疑。他还说二次大战中伤亡惨重的萨莱诺和安齐奥战役根本没必要，完全是“某个头脑发疯将军”的错误，这席话为他招惹了不少麻烦。

杜鲁门玩得非常开心，他得以在幼年时就喜爱的充满历史遗迹的地方游历令他感到醉心的愉悦，人们对他的崇拜也使他喜不自禁。在那不勒斯，人们将鲜花抛掷在他行走的路上。“这太神奇了！”他说，对内心的喜悦毫不掩饰。

如果说杜鲁门和亨利·卢斯在古罗马废墟中的照片全然不具度假观光的韵味，另一个场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在佛罗伦萨，杜鲁门、贝丝和伍德沃德夫妇被邀请到俯瞰全城的著名的伊塔蒂别墅，与别墅的主人伯纳德·贝



伦森共进午餐。那里珍藏着无与伦比的绘画、雕塑和 5.5 万册图书，这一启发人智力地盘的主宰就是被誉为一流鉴赏家、世界最后一位美学家且具有传奇色彩的贝伦森。贝伦森是立陶宛犹太人，毕业于哈佛，后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头号权威。一次世界大战前，杜鲁门还在农场干活的时候，贝伦森就把伊塔蒂变成了他的家——他的神殿兼学会。他矮小体弱，髯髯白须为他增添了圣人的风采，当时虽已近 91 岁高龄，依然健谈而充满朝气。他的客人源源不断，主要是文化艺术界名流，如 J·B·普里斯特利、罗伯特·洛厄尔、艾伯特·莫拉维亚、劳伦斯·奥利维尔、玛利·麦卡锡等。他们来此听他讲话——因为总是由他高谈阔论——而且以后还可告诉别人他们结识了这个伟人。

“我们在他面前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因为他实在是他那行的权威。”杜鲁门后来对默尔·米勒说。

在日记中，杜鲁门说他觉得贝伦森“头脑清晰，思维活跃，就像 35 或 40 岁的人”。

他被公认为是文艺复兴艺术的头号权威，以出口就是警句著称。他说了一句，给我的印象极深。我们探讨国际事务时，他说现代外交已堕落到“公开的侮辱公开达到”的地步。我们讨论了一次大战的起因、当时的奥地利总理、塞尔维亚的局势以及引发战争的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缘由。

在贝伦森家做客及和他交谈极大地激发了杜鲁门的兴致，他喜悦的程度就像他许多年前赴路易斯·布兰代斯家喝下午茶时同布兰代斯交谈时相仿。后来他给贝伦森写了封信，追忆了那次愉快的拜访，在附言中他说：“我希望各国当局能像你似的具有倾听、思索和嘲弄的本事。”

但更有意义的是贝伦森对这位前总统的印象，他当时记录在了他的日记里：

（哈里）杜鲁门和妻子昨天来吃中饭。一点钟到的，一直坐到 3 点。两人都自然朴实，没被高官显爵的地位宠坏，仿佛只做过密苏里独立城的参议员似的。和一个人立刻就能打得火热，这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还是头一遭。他和我谈话坦率轻松，毫无保留（依我的判断），好像认识我多年了。我们的话题无所不包，非常私人性的但却无所避讳。如果美国能造就出杜鲁门这样的人，我感到美国人便具有了坚实和理智的英国人的血脉。现在我对美国比以往更有信心。倘若杜鲁门式的奇迹还会出现，我们甚至对乔·麦卡锡参议员那类人也不用惧怕了。杜鲁门居然把 27 岁的威利·莫斯廷—欧文都迷住了。这个后生对美国人极不以为然，同当今所有英国人一样，听到说美国人的好话就充耳不闻，至多摆出副屈尊相待的姿态罢了。

在萨尔茨堡，萨尔茨堡大教堂的风琴师为了表示对杜鲁门的欢迎，在一台已使用了 250 年的风琴上弹奏了莫扎特的第 9 奏鸣曲。在莫扎特的故乡，杜鲁门用莫扎特的击弦古钢琴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奏鸣曲（“我觉得它和现

代钢琴有点儿区别，但奏出来的音乐很美……置身在莫扎特出身的城市实在给我带来莫大的喜悦……”）。

从萨尔茨堡又前往杜鲁门曾帮着建立的西德首都波恩。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很短，天气大雨滂沱，其间杜鲁门首次会见了康拉德·阿登纳。接着他们又返回法国，接着计划游览了杜鲁门不大喜欢的凡尔赛（他一直在想为了建造这座宫殿从人民身上“榨取”的钱财），及查特斯大教堂。参观后者时尽管大雨倾盆，杜鲁门对那座教堂却很喜爱。尔后他们来到坐落在卢瓦尔山谷的一座名为舍依素的16世纪漂亮的城堡，这座城堡与杜鲁门所热衷的一位历史人物、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有关联，因而他专程来此观看。（“当然，关于凯瑟琳时代发生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他在日记中写道，“但她却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和美第奇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的人都信奉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阐述的用叛离正道的手法进行统治的信条。凯瑟琳有10个孩子，3个成为法国国王，两个成为王后，这对一个心狠而热衷于搞阴谋的老女子来说实属不简单。”）

杜鲁门毫不疲惫，决心观看所有事物，而且极目所见几乎都使他着迷。贝丝顽强地追随着他的节奏，很少露笑脸，至少在摄影师面前是如此。比他年轻一半的人按着他们的行程走也得累得疲惫不堪。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法国游览的路线不包括重返孚日山脉、阿尔贡或凡尔登。显然，杜鲁门无意再见到那些地方。

杜鲁门抵达布鲁塞尔、海牙和阿姆斯特丹时在火车站都受到众多人群的欢迎。他和贝丝在荷兰国家博物馆观看了一次规模最大的伦勃朗的画展，还在皇家苏斯迪克宫与朱丽安娜女皇共进午餐。

6月17号，他们终于登上了杜鲁门最为期待的英国之行。“我们夜里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在日记中说，“阳光明媚时在英国一边登陆……”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杜鲁门漫长、充满失意和伟大成就的不平凡的一生中，很少有几次事件对他来说能像1956年6月20日星期三在牛津举行的仪式那样意义重大。身穿传统的深红色长袍，头戴揉皱的黑丝绒牛津帽，这位从未上过大学也不自诩知识渊博的人走在世界最古老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的牛津大学校园里，身旁是校方演说代表，身后是长长的队列。

他悄声地对记者说：“在我一生中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成为牛津的美国佬。”

仪式有个拉丁文名字，用拉丁语举行，地点设在牛津校园有着300年历史、由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谢尔登剧院里，出席的观众逾1000多人。当杜鲁门面对身穿红色长袍的牛津大学教授们伫立在舞台中央时，他听见演说代表用拉丁文宣称“授予哈里·杜鲁门法学名誉博士学位”。接着，身材高大衣饰华丽的哈利法克斯伯爵并大学校长（他还曾任英国驻美大使）获准哈里·杜鲁门成为历史悠久的牛津大学评议员，并用拉丁文赞扬他是

最真挚的盟友，演讲和写作中袒露出坦诚，而且是勇气的楷模……

接下去的掌声持续了足有3分钟。杜鲁门激动得流下眼泪，在学术长袍里摸索着手绢。

一位老教授对记者说他参加过许多这样的仪式，但从未听说过这么长的

掌声。“杜鲁门先生在这个国家非常受欢迎。”他说。杜鲁门恢复镇定后尽情地笑着。

当晚，他被邀请参加基督教堂学院校友联谊会，400名来宾只限男士，一律穿燕尾服。他在致辞中说：“出生在20世纪的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20世纪的福利。

……我们必须在一个新的大宪章和新的独立宣言中宣布，从现在起，经济福利与安全保障、健康与教育以及体面的生活水准将被列入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每一个男女都应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他补充时又触到了这一古老的话题。每一个儿童都应受到一流的教育。老年人在古稀之年不应有经济上的忧虑。

“让那些忧虑见鬼去吧，哈里！”他离开时牛津的学生从窗户里喊道。

次日晚上在伦敦的萨瓦伊举行了一次更令人眩惑的晚宴——“朝圣者”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只有男子参加的晚餐会。“朝圣者”是一个致力于维系英美两国关系的主要英美协会。杜鲁门再度大露光彩，在场的人都以为哈利法克斯伯爵对他的赞词完美得无以复加。“我想这个房间里所有人都觉得你是这样一种人，即我们人人都非常高兴能和你去打老虎。”

杜鲁门在他致辞的开头说，他在英国一直感觉不错，到目前为止还没使用过译员。

“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许多问题，”他接着说，“并非因为我们存在着差异，而是由于我们过分相似……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选举年时，我们的行为就像原始人在满月时的举止一样。”然而他的忠告的主旨是“伟大、宁静与和平的未来不仅可以被巨大的灾难毁灭，也可因疏忽、分歧和怠惰从我们手中溜掉。”他希望两国对“我们的力量和团结”永不掉以轻心。

而且——并非是最不重要的——让我们忘掉大众心理学家的这种现代观念吧，即我们的行动不应该受我们真诚地相信是明智和正确的东西的指导，而应该受别人对我们的某些想象中的反应的指导。我准备放弃这种复杂的宣传、及其大众心理学，而赞成马克·吐温的更为简明的告诫：

永远做正确的事情。它将使某些人高兴，使其余人惊讶。

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他“非常高兴”来访问伦敦。“从没到过这儿，它是一座美妙的城市。”

在内政事务日那天，他访问了下院，听反对党提出“有关从公路到妓院和流氓匪帮”的各类问题。在上院，他坐在那里听完了一个就像美国参院中的那种“让人有点厌烦”的冗长的演说。

英国繁荣、热情而有礼貌（他记录说）。从勋爵到出租汽车司机和警察，他们认得我这个前总统，向我招手、点头。一有机会，他们就用语言和行动来表示他们仍然喜欢我们，并高度评价我们的友谊。这使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6月24日，在伦敦以南40英里的丘吉尔的家园查特维尔，温斯顿爵士和丘吉尔夫人、女儿萨拉和玛丽、以及玛丽的丈夫克里斯托弗·索姆斯，还有比弗布鲁克勋爵，当前来赴午宴的杜鲁门夫妇乘坐的由司机阿姆斯特朗·西德利驾驶的汽车到达时，他们正等在公路上迎接。当杜鲁门和丘吉尔互致问候时，杜鲁门说：“这真像是过去的时代。”进屋后，一个男仆端上来一托盘饮料，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个半身铜像前，两人做了一个似乎是默默地祝酒的姿势。午宴结束后，两人都拄着拐杖，漫步于花园之中。

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它结束得太快了。”

这座房子面对着一座正在怒放的杜鹃花覆盖着的小山，房后是一座美丽的花园，房子下方山谷的远处有一个湖泊，真是一幅美丽的风景，温斯顿爵士称之为“肯特的旷野”。

他给我看了他在房间里的许多油画，并且告诉我，在房子下方山谷中他的画室里还有400多幅画。我们没有时间去访问那个画室。这是一次令人极其愉快的访问，是我的一次幸福的访问。

杜鲁门认为，丘吉尔的头脑像以前一样机敏。“但他的身体状况却显示出了他82岁的高龄。他的行动更迟缓了，听力也不好。”

他告诉我，他还能像往常那样做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过他宁愿不去做。他在周围散步，并且上下楼，对他这种年纪的人，不能指望做更多的努力了。他说，如果我再次成为美国总统，那对这个世界来说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告诉他，已没有这个机会了。

他们说再见，但不知道能否再次相见，结果他们未能再相见。

6月26日，据《独立城考察家报》报道，“杜鲁门夫妇出席了女王和爱丁堡公爵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午宴。6月28日，杜鲁门夫妇这次重要的出行结束了，他们从南安普敦乘船返回。

在访问查特维尔期间，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杜鲁门，在他的欧洲之行中，他已成为美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亲善大使。如今，这同样的说法被不断地听到。

当杜鲁门在伦敦乘上火车轮渡时，一位美国记者偶然听见一位英国观察者评论说：“他没有在这个国家中竞选什么职务，这太可惜了。他会赢得任何选举的。”伦敦《旗帜晚报》的大标题称这次访问是“杜鲁门的巨大成功”。

《每日电讯报》描写他是“所有人最喜爱的美国一切优秀东西的生动而令人兴奋的象征”。

他继承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简朴的传统，以他自身的表现倾倒了欧洲。“从未有过（合众社说）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像这位来自密苏里的逍遥自在的旅游者一样，被给予过这种来自高层的红地毯待遇以及得到过这种来自人民的热烈欢迎。”

回国后，杜鲁门也没有放松步伐。他一放下行装，就立即投入了选举年的政治中，进行着一种要让艾夫里尔·哈里曼、而不是艾德莱·史蒂文森赢得民主党提名的执著但却不成功的努力。8月份，他前往芝加哥参加大会，

支持两年前当选为纽约州长的哈里曼，正如杜鲁门所说，因为他认为国家需要一位想要从事这项工作的总统。在“黑石”饭店的一次挤满了人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指责说，史蒂文森“缺乏那种我们需要以之取胜的战斗精神”。（几个星期前，因出席杜鲁门图书馆的一个宴会在“黑石”饭店停留期间，杜鲁门曾与史蒂文森私下谈过一次，后者问他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杜鲁门走到窗前，指着楼下街道上的一个人说：“你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学会怎样去接近那个人。”）一时间，似乎杜鲁门会把形势扭转过来。

哈里·S·杜鲁门今天使民主党苦恼得要命，他爱好其他次要的事情（《纽约时报》的拉塞尔·贝克写道）。

当该党的其他受人崇拜的人物正在发愁、烦恼和猜测的时候，杜鲁门先生却像一个获得了自由进出马戏场的权利的小男孩一样欢蹦乱跳。

在悬而未决的局面处于最关键的时刻，他却轻率地离开了政治家的行列，到该市南端去领导了一次游行。那儿聚集着芝加哥大量的黑人居民，今天是巴德·比利肯节。巴德·比利肯是该市黑人孩子们的一个具有神秘英雄主义色彩的教父。在游行过程中，面对10万旁观者的热情欢呼，杜鲁门先生乘车行走了2.5英里。

但事实上，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史蒂文森轻易地获得了提名。而且在许多人看来，杜鲁门似乎只是在使自己成为一个爱反驳别人的、甚至是混淆了他的声望与真正的权力之间区别的可怜人物方面获得了成功。然而，杜鲁门既没有显示出痛苦，也没有显示出遗憾，而是立即支持这位被提名者——史蒂文森在11月份取胜的机会是“极其可观”的——并且发誓要给以“来自密苏里州的老人”的全力支持。

此外，正如他喜欢说的，他做了他自己应做的事情。

他写信给艾奇逊说：“当我到达芝加哥时，局面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什么东西都不具备。我决定唤醒他们……我打算尽我所能，帮助赢得这次选举。我多么希望我再年轻10岁啊！”

他积极地为本党提名名单的候选人竞选，到过密尔沃基、得克萨斯、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加里、印第安纳和匹兹堡，在匹兹堡，他和艾森豪威尔住在同一个饭店里，却没有见过面。

史蒂文森失败和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后的一个月，杜鲁门写信给参院多数派民主党领袖林登·约翰逊说：“我从不曾扮作一个预言家，如今也不打算这样做，但是我的确想让民主党保持为一个人民的党。除非如此，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赢。”

1957年是杜鲁门的一个里程碑。6月5日，玛格丽特在纽约生了一个儿子，就在第二天，杜鲁门夫妇便踏上了东去的列车。6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这对自豪的祖父母在医院通过窗户看望这个名叫克利夫顿·杜鲁门·丹尼尔的婴儿的照片。几天后，玛格丽特和这个婴儿回到丹尼尔在纽约的公寓家中，当她父亲问是否能抱抱这个婴儿时，她坚持要他先脱掉他的夹克衫并坐下来。“爸爸长时间坐在那儿，前后地轻轻摇着他。”

不到一个月后，杜鲁门搬出了联邦储备银行大楼，进入了新的杜鲁门图书馆中的一个全新的套间办公室。这座建筑的正式落成仪式是在7月6日举

行的。他所说的离开白宫后他最想要的两件东西——当祖父和看到他的图书馆建成——现在都得到了。

前总统胡佛、埃莉诺·罗斯福、众院的萨姆·雷伯恩议长、4名联邦参议员、9名州长（包括艾夫里尔·哈里曼）、迪安·艾奇逊、约翰·斯奈德、许多杜鲁门的白宫班子的成员、他家庭的成员、邻居，总共有5000人出席了落成仪式。几个幸运的人坐在树荫下，而绝大多数人则顶着密苏里夏季的烈日。在独立城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场合。（杜鲁门曾激动地写信给艾奇逊说：“我可能会在7月6日深陷在这些‘大人物’中，我想让你和艾丽斯到这儿来帮我脱离被休伊·朗称为极端的“大傻瓜”们的纠缠！一定要来。”）站在这座建筑物的台阶上向群众发表演说的主要演说者，是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现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他把这座图书馆称作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哈里·S·杜鲁门是一个“不知疲倦、毫无畏惧的、果敢的”注重行动的人，还说他本人已经听到过对这位前总统在1943年秋季的“精力充沛的战斗性格”的高度赞扬。

杜鲁门先生对我国历史有着持久的兴趣，他对这个图书馆中他的文件的保存作出了安排，这种方式将使他的任期成为历史上“最清晰的年代”之一。正是遵从他的这种热心公益事业的慷慨，我才能为这座保护、展览，并为使用它的有价值的资料提供便利的博物馆兼图书馆的建筑主持落成仪式。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广泛而明智的运用，可以获得对自身和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解，可以获得在未来的年代中选择正确道路的智慧。

这座建筑物狭长、低矮，形状如新月，是用印第安纳石灰石建成的，其建筑风格谁都无法说清属于哪一类——也许属于“现代派”。尽管它的大门及其方柱子显然又是古埃及式的。它是由当地的一位建筑师阿朗索·H·金特里在爱德华·尼尔德的协助下设计的，他们设计出来的方案与杜鲁门所期望的很不一样，不过他决定不拒绝该方案。尽管只有一层楼高，但这座建筑连同它的整个地基，面积总共有7万平方英尺。它在两年内完工，迄今已花费了180万美元。1954年在纽约和费城举行的两次杜鲁门图书馆宴会各筹集到4.5万美元。30多个不同的工会都慷慨捐助——西德尼·希尔曼的统一服装工人工会捐助2.5万美元；美国音乐家联合会捐1万美元；约翰·刘易斯1万美元；铜铁工人联合会25万美元。迪安·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埃德·波利、以及威廉·克莱顿都给予了很大数目的私人捐款。不过总的来看，捐款是来自全国各地大小约1.7万笔捐助，而不论数目大小，杜鲁门对每一笔捐助都表示感谢。

图书馆已有的350万份文件仅仅是收藏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将会增加，后来，杜鲁门政府中的其他人，诸如艾奇逊，也把他们的文件贡献出来。

对杜鲁门个人来说，从这时起，图书馆将成为他生活中的焦点。如果对回忆录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其结果令人失望的话，那么他的图书馆将是他的一个绝对的成功。

在使国会相信所有现存的总统文件都应编目并制成缩微胶卷方面他也获得了成功——经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做的工作。

正如他所说，这是几代人以前就应该做的事情。然而，直到他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没有任何人去费心进行这项努力——就因这一点，他就应得到远比他已得到的更多的称赞。

随着图书馆在独立城的建成和开放，杜鲁门在格兰德维厄的地产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卖给了堪萨斯市的一家开发商、B·F·温伯格联合有限公司。那座老的农场住宅、它的谷库和毗邻的几英亩地仍保留在这个家庭手中，但所罗门·扬很久以前立桩确定的、杜鲁门曾在上面耕作过多少个季节的主要地产中约 224 英亩土地，现在却让位于市郊的开发，成了一个购物中心。对杜鲁门来说，它意味着一笔世袭财产的终结，这曾使杜鲁门的心里感到极大的不舒服，部分原因是出于伤感，但也有他的性格和态度主要是来源于他的农村背景这个现实的原因。他特别乐意——显然很自豪——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退休的农民。“嘿，农夫！”萨姆·雷伯恩总是在电话中这样问候他，知道这会让他多么高兴。

“我肯定不愿看到这些老地方出手。”《堪萨斯城明星报》援引他的话说。

但他也说过，地产的出售对杜鲁门、对薇薇安和玛丽·简，都意味着最终财政上的安全。然而，由于这笔交易带来了许多的悲伤，它也证实了这个古老的信念：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土地都是可以指望的财富。毕竟，看着杜鲁门走完一生的，不是他在政治权力上的崛起或他的世界名声，不是他的著作、演讲或他夫人家中的遗产，而是格兰德维厄的这座老农场。

1958 年 1 月，这项出售正式公布。但最终的数字是多少，他的股份有多少，都不得而知。不过，一年半以后即 1959 年 8 月 14 日的一份他的全部银行收支的统计单保留了下来，并显示他总共有 208548.07 美元。而这并不包括他拥有的政府公债和市政公债，以及一些股票。

他的《回忆录》的最终财政收入在扣除了开支和税收后，比预期的要少了许多。甚至他从《生活》杂志得到的付款已延付了 5 年多，却仍然要交纳 67% 的联邦和州的所得税，这特别让他感到沮丧，因为 1949 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被国内税收部门允许将其《远征欧陆》的出售收入 63.5 万美元作为资本利得来对待，理由是他并非一名职业作家；结果，艾森豪威尔仅缴纳了 25% 的税。当时，艾森豪威尔的问题尚待裁决时，白宫曾进行了干预；而现在，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则拒绝卷入。杜鲁门在《回忆录》上的开支，包括给工作人员的报酬和支付办公室的费用，根据他写给约翰·麦科马克的一封信来看，总共达到 15.3 万美元。在 5 年的时间里，他的纯利润据他的计算，最终只有约 3.7 万美元。

“如果不是我能够出售我弟弟、妹妹和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一些财产的话，实际上我将成为救济对象，只是由于出售了这些财产，我才没有在财政上陷入窘境。”

他告诉麦科马克，他不是要求退休金。他想要的是公正。他认为，一位前总统应得到的政府津贴的最低数额应能够支付其必要办公费用及通常开支的约 70%，以满足他的偿付能力。

正如你所知道的，我们通过了一项法案，当所有的陆、海、空军五星上将退休时，都能得到 3 名秘书和他们在职时的全部薪金。

而一个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 18 年，并成功地为这些他曾指挥

过的人们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安排好了的人，为了告诉人们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的真相，却不得不破产，这似乎是很奇怪的。我觉得，为了公正起见，这笔巨大的开支的一部分似乎应该由公众来偿付。

在查利·墨菲的帮助下，他把他的论辩提交给了雷伯恩议长和参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结果在19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给所有的前总统提供2.5万美元的年退休金和工作班子、办公地点的费用，以及免费通信的特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甚至在杜鲁门离开白宫之前，迪安·艾奇逊就一直在热心地安排他去那鲁大学的事情。杜鲁门将被接受为耶鲁大学的查布研究员，由此，他也将当几天该大学的荣誉贵宾，要讲课并会见学生和教师。

这种前景使杜鲁门格外高兴。出于对艾奇逊的尊重——以及对他的政府中的其他耶鲁毕业生，如哈里曼、洛维特和罗杰·塔比这些人的尊重——他非常看重耶鲁大学，此外也因为耶鲁，如杜鲁门所说、是他曾希望能上的那种名牌大学。最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是艾奇逊想要他进耶鲁工作。

“从那鲁到堪萨斯市梅因大街1908号（这是彭德格斯特俱乐部的地址），和你一起到任何地方，我都感到很自豪。”杜鲁门在1952年曾这样写道，显然他欣赏他的这位优雅的国务卿在梅因大街1908号与“小伙子们”开怀共饮的情景——正如他所知道的，艾奇逊也会感到自豪。

艾奇逊是耶鲁社团的成员，他开始安排此事，在一封写给将成为杜鲁门的东道主的托马斯·G·伯根教授的信中，艾奇逊提供了一份对他的这位总统朋友的最美好、最富有洞察力的描述：

杜鲁门先生对青年人极感兴趣，和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他的观点新颖、热切而大胆。他艰难困苦地去学习，但却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相信自己的同胞，而且他相信，只要有愿望和勇气（加上一些才智），未来是可以掌握的。

这对大学生们非常有益。他根随和、不拘礼仪、也很泼辣。不应该要求他去做供公开发表的演说。这对他的压力太大，也不是他的专长。对年轻人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说的话，而在于他这个人，这样就可以达到相互交流……我想让杜鲁门先生在那鲁获得尊贵的、朴实的接待——不是作为一场表演，不是进行论战，不是作为一名我不相信已成为一个学科的“政治理论和科学”领域里的讲师——而是作为一个能够给予我们的大学生比我认识的任何人所能给的更多的有关他们生活价值的感觉的人（如何使他们生活得更更有价值），如果我们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激励他们的话。

实际上，杜鲁门直到1958年春季才去到那鲁。他在那儿停留了3天，并且立即在学生和教职员中间成了一个轰动一时的人物。甚至那个曾公开声明对杜鲁门不感兴趣、并在第一天当杜鲁门表示有兴趣看看富兰克林文件时拒绝接待“这个人”的重要共和党人、脾气执拗的那鲁图书馆管理员，最后也想让杜鲁门多呆几天，以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详谈；后来，他告诉别人，他实在搞不清这位总统的知识面有多宽、兴趣有多广。清晨散步穿过校园时，杜鲁门身后总跟着许多学生和当地记者。欢迎他的许多宴会和不断出现的热烈掌声，都使他非常高兴。他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从未有过比在这里更好



的时光。”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耶鲁仍在我耳边回响，我们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

现在，他有了固定要做的事情，每月都有二三百个演讲的邀请。在家里他看上去也容光焕发。一位朋友说：“他是那么要命的高兴，使得我在他身边也感到高兴。”

汤姆·埃文斯邀请他加入一个定期活动的组织，到堪萨斯市俱乐部去喝午时酒、吃午餐和打扑克，这是一个以其占据的套房命名、称作“822号俱乐部”的不公开的聚会。尽管杜鲁门自当选国会参议员以来就一直是堪萨斯市俱乐部的名誉会员，但他从未感到自己受到该俱乐部成员的特别欢迎，它成员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共和党人。堪萨斯市俱乐部也的确不是与他志趣相投的。作为一个民主党人和政治家，他曾被这些人看不起，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愿意与他深交。但现在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团体中最受欢迎的成员，成了822号俱乐部的骄傲，成了人们所说的“正在上升的有影响的人物”。埃文斯告诉《生活》杂志的记者约翰·奥斯本说：“这可真是了不起。他确实让他们大吃一惊。”奥斯本写了一篇题为“哈里的幸福日子”的文章。他对杜鲁门那“非凡的精力”和他与其他人用处时的那种快乐感到吃惊。他听到有人在822号俱乐部的牌桌上高喊：“，该死的，总统先生，我可要加赌注了。”

奥斯本写道：“他晚年的主要成就”是“他这种人中少有的，它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在74岁的高龄上，在他生命的灿烂的晚年中，哈里·杜鲁门是一个真正的幸福的人。”

在堪萨斯市交响乐团的一次义演中，身着燕尾服和白领结的杜鲁门指挥该乐团演奏了苏泽的《星条旗永不落》。此后不久，他和贝丝再次出发到欧洲去度夏，这次是一次更为秘密和安静的旅行，他在萨姆和多萝茵·罗森曼的陪同下走遍了法国南部。

那年秋天在1958年国会选举中，杜鲁门再一次回到了过去的轨迹上，在20个不同的州中发表了约25次演讲。第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他称自己是一具“老僵尸”，然而，在生命最忙碌的阶段上，很少有人像他那么活跃。

卡贝尔·菲利普斯报道说，杜鲁门正在获得比以往更大的精力。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所写的有关这位刚过75岁的前总统的文章中，菲利普斯引述了一位堪萨斯市的朋友的话说：“哈里感到自己对这个世界很满意，他为它尽了力，也得到了它的最好回报。现在他正享受着这些红利……”

菲利普斯写道：“我发现他面色红润而健康，还有我从早年就记得的那同样的充满活力的微笑和闪闪发光的眼睛，以及那同样有力的握手。”越来越多的作家、记者和怀有良好祝愿的人朝圣似地到杜鲁门图书馆去看望他，试图探测出他的魔力究竟何在。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的最显著的特质在于他的生命力。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充满了无可抑制的好奇心的人……在一部历史书中没有任何闷闷不乐的形象……（只有）生气、力量……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玛格丽特曾告诉她父亲，他说的话太多了。杜鲁门高兴地对一位来自外地的记者说：“她说我就像我那两岁的外孙儿。她说，他总是在跑，从来也不走；并且总是在说，却从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他会让来访者看“我的图书馆”的“布局”，轻快地走到各个大厅，边走边不停他讲述，并时常停下来去欢迎来访者的团体，特别是如果来访者是

学生时。图书馆的精华——实际收藏的总统文件——直到 1959 年 5 月才向研究者开放，不过现在却可以参观它的博物馆部分、有照片和送给总统的礼物的展览，包括从艾奥瓦的玉米穗到伊本·沙特送的镶嵌着珠宝的短剑的一切礼物；还有一个小礼堂和一个复制的椭圆形办公室，尽管它比原型的规模小一些，但其摆设却与他在白宫时一样。

“我想让它成为一个年轻人能来并能看到总统的办公室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让他们看到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办公室啊，不论谁、在什么时候碰巧坐进这个办公室都一样。”他并不“在意人们诅咒”突出他本人的做法。“他们说，在这个地方突出我只是为了说明一个特定的总统是怎样工作的，并说这很必要。”不过，集中体现他的生活和成就的做法显然确实使他非常满意。

他热爱他的办公室，这是一个摆放着书籍并装有通往一个私人小院和花园的滑动玻璃门的明亮而宽敞的房间。他的办公桌就是他在白宫楼上书房中用过的那同一个大红木办公桌。他几乎每天都到那儿去，包括星期天，除了他外出旅行时。正如人们常说的，杜鲁门图书馆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展览项目就是杜鲁门本人。

他总是很早就来上班。有时清晨，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他就来到了办公桌前，亲自接电话，告诉打电话的人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或是回答进一步的问题，并且说他知道问题的答案，因为这是他的图书馆。“我是那个老人本人。”

大约中午时分，如果不去 822 号俱乐部的话，他就回家吃午饭。贝丝私下说，如果她没有见到另一份沙丁鱼或花生黄油三明治，她就会非常高兴。

你知道，5 天一周很不适合我（他告诉艾奇逊说）。我想我是老式的人。我每天都工作，星期天也不例外，即使《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第 8、9、10 和 11 节以及《申命记》第五章的第 13 和 14 节说我不应该这样。我想，也许这些告诫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劳工法……不过，某些人不得不这样来安排事情以使其他人能够工作 5 天——写于喝咖啡休息时，就这些吧。

图书馆给了他生活的目标。一位曾在集资时起过重要作用并承担了这项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前白宫助手戴维·劳埃德说，创建图书馆的全部努力中最令人满意的就是它给杜鲁门提供了一个基地，“在这里他可以幸福地坐在他喜爱的图书中间，进行他的大量通信交往，说他想说的话，做他愿意做的事……能够从事他那老式美国人的他自己的职业。”

9 年来，他每周都在那儿呆上总共 6 天半的时间，比他在白宫的两个任期还要长。并且就像在白宫一样，他班子中的工作人员崇拜他。第一任图书馆馆长菲利普·C·布鲁克斯博士回忆说：“杜鲁门先生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最富思想的一个。”

（他）具有乐观主义的观点，和他交谈，总是让人感到精神鼓舞……人们在写有关杜鲁门的文章中，多次说他脾气大，并且说他讲话时“很鲁莽”。我们从未见过他发脾气，却见过他多次表现得直率……他很少有错……

戴维·劳埃德和美国国家档案保管员韦恩·格罗弗说服了杜鲁门应该在主要的大厅中安放一幅壁画，既能够活跃气氛·又能够使来访者进入这座建筑物时被一个合适的历史性主题所吸引。当劳埃德和格罗弗建议说，密苏里的画家托马斯·哈特·本顿（其同名的叔祖父曾是密苏里州首届两位国会参议员之一）是承担这项工作的最合适艺术家时，杜鲁门直率地拒绝了。他认为本顿曾在为1936年完工的杰斐逊城的州议会大厦所画的一幅壁画中，愚弄了汤姆·彭德格斯特。此外，他也不喜欢本顿的风格。杜鲁门看过本顿的一幅名叫《肯塔基人》的油画作品，他回忆说，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来自肯塔基，他们看起来都不像是“这种长颈怪物”。

然而，劳埃德和格罗弗却安排了一次会见，他们相信，如果让杜鲁门和本顿有机会发现他们之间有那么多共同之处，他们是会相互喜欢的。本顿生性粗暴、固执己见，对错误的东西直言不讳，经常骂人而且充满了生气。像杜鲁门一样，他也出生在密苏里的西南部，不过是1889年出生在小镇尼欧肖·而且他也是政治气氛很浓的氛围中长大的。他的父亲曾任过几届国会议员。1957年春，杜鲁门与劳埃德和格罗弗一起去堪萨斯市拜访在画室中的本顿。不出所料，两人很快就成了可靠的朋友。一项合同在1958年签订了，并且由于这幅正在制作的壁画，杜鲁门显然很愿意去本顿的公司，并对本顿的友谊感到很自豪；有一次，在本顿的怂恿下，他爬上脚手架去帮他画天空的一角。

第一次杜鲁门请本顿在他的办公室喝酒时，从他的办公桌里拿出了一瓶波旁酒说：“我听说你喜欢这个。”本顿则认为这是杜鲁门算计好了来激他、考验他的一种方式。

本顿回忆说：“一位美国总统所作出的这个表示令我为难·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表示人类好客的一个普通的行动，但在哈里·杜鲁门的身上仍有着一种权力的味道……”

后来，当这种“波旁仪式”变得更固定时，本顿曾要求喝第二杯，杜鲁门却拒绝了。“汤姆，你还要开车。你不能喝第二杯，因为你有些事要在这儿做，我不打算让你去冒任何险。”

本顿写道：“事实上，我现在成了他的人，而他打算保护我。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壁画的主题是在认真讨论后才确定的。起初，杜鲁门认为它应该是有关杰斐逊和路易斯安那的购买，并着重表现杰斐逊的远见。本顿说，他无法画出远见。“那么，你能画出什么该死的东西呢？”杜鲁门说。本顿建议这幅壁画应表现独立战争，而它的重点应在西部的开发，于是它被确定下来。

本顿后来告诉一位记者说：“开始时我认为，总统也要被画在这幅壁画中，但他断然地拒绝了这个主意。”

本顿得到的费用是6万美元，这项工作用了他两年的时间。壁画于1961年完成，取名为《独立和西部的开发》，它没有任何书本历史中特定的事件，也没有任何可以确定出身份的大人物。主题是通过象征性的人物、横穿画面的巨大人流——穿着简朴的印第安人、设陷阱的捕兽者、猎人、奋力划桨的法国航海者，让位于殖民者及其黑奴的潮流来表现的。它的风格粗扩、色彩鲜艳、构思浪漫，完全就像是一幅杂志的插图，下方还有两幅附加的组成部分，画的是密苏里河上的码头和1840年的独立广场，那时杜鲁门的祖父辈刚刚到达这里。杜鲁门认为这幅壁画妙极了。在向来访者介绍图书馆时，他很

少不站在这幅壁画的前面称赞它，并解释它所表现的历史内容。如今，他喜欢说，他的朋友汤姆·本顿是“美国最他妈棒的画家”。

每年到这座图书馆来的人已超过 15 万，这个数字使他非常兴奋。1960 年 5 月，玛格丽特有了第二个孩子，又是一个男孩，名叫威廉·华莱士·丹尼尔。与此同时，他完成了另一部名叫《公民先生》的著作，这是一部详细描述对生活 and 世界看法的论文集，最初是为杜鲁门的宿敌赫斯特所拥有的星期日增刊《美国周刊》撰写的。他特别喜欢由赫斯特来支付和出版这本书。他说，没有任何赞扬能比以前的敌人的赞扬更甜美。

正如艾奇逊所评论的，杜鲁门在一部历史书中绝没有沮丧的形象。他强烈地表示不喜欢用来描述他的“政界元老”这个词。他说：“当一名优秀的从事政治者死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家。我想继续长期地当一名从事政治者。”这已成了他的一句标准用语。他私下告诉艾奇逊说：“我更喜欢做一个炮筒子或一匹爱蹶子的马。”

为了在 5 月 8 日庆祝他的 75 岁生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庆祝活动，包括一场群星灿烂的电视转播，出场者包括艾德莱·史蒂文森、埃莉诺·罗斯福、杰克·本尼、伦纳德·伯恩斯坦、伊萨克·斯特恩、H·V·卡顿伯恩以及科蒂斯·蒂尔南阁下这样一些私人老友，他们在一系列的讲话和音乐的赞美声中相继出现在电视上，大部分转播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为杜鲁门举行的每位 100 美元一份正餐的宴会上进行的。几天前在华盛顿他曾说，他心目中还没有想要支持的 1960 年候选人，他只是想看到该党提出一个能获胜的人，而他将全力支持。”你们怎么想？你们打算让我呆在家里吗？”

1959 年 10 月，乔治·马歇尔去世，对杜鲁门来说，这是一系列个人打击中的另一个、也是最沉重的打击，亲密的朋友和从前他的官方僚属中的优秀成员们慢慢地、但却是不可改变地开始退出舞台。弗雷德·文森已在 1953 年去世，埃迪·雅各布森死于 1955 年，艾尔本·巴克利死于 1956 年，海军上将李海去世于 1959 年 7 月。得知马歇尔快要去世的消息后，杜鲁门打电话给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马歇尔夫人，说他将乘飞机去。但是她告诉他不要来，因为这位将军都认不出他了。杜鲁门写信给艾奇逊说：“她和我在电话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哭泣。”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你能想象出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曾有过两个像你这位将军一样的人和他共事吗？”

在弗吉尼亚梅尔堡的小教堂中为马歇尔举行的一个简朴的主教派葬礼上，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并肩坐在前面的同一排座位上，共同的悲伤部分地缓和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新一代的政治家正在竞相接管权力。由于艾森豪威尔的退休和理查德·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提名的可能选择，民主党获胜的机会似乎有了指望。在参加竞选的那些民主党人中，杜鲁门支持的是斯图尔特·赛明顿和林登·约翰逊，但他们两人都没有什么获胜的机会。杜鲁门拒绝考虑史蒂文森进行第三次尝试。他对约翰·F·肯尼迪也不热心，他认为肯尼迪太年轻、经验不足。他不要一个天主教徒——他不是反对天主教，而只是反对失败。他还记得发生在艾尔·史密斯身上的事情，因此他认为一个天主教徒不可能当选。他也认为肯尼迪曾过于赞同乔·麦卡锡了，而且他像以往一样，非常不喜欢肯尼迪的父亲。他告诉玛格丽特，乔·肯尼迪已花了 400 多万美元来为他儿子购买

提名。他对别人讥讽说：“我担心的不是那位‘教皇’，而是枪击。”（英语中，“枪击”一词与“教皇”发音相近——译注）

1960年1月，在杜鲁门对华盛顿的一次访问期间，约翰·肯尼迪曾经拜访住在五月花饭店的杜鲁门。根据肯尼迪本人对此次会面的记录，他曾敦促杜鲁门在他，肯尼迪，有机会到独立城并“告诉他我所了解的全部事实”之前，不要公开发表他对任何候选人的支持。在大会上，如果竞争形成僵局，肯尼迪建议这时杜鲁门再以维护党的团结的名义进行干预。但是在此之前，让预选进程自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肯尼迪说。杜鲁门对肯尼迪和另一位主要的竞争者休伯特·汉弗莱表示了热情的问候，并在会见结束时告诉肯尼迪：他不会做伤害他的事情。

贝丝·杜鲁门建议她丈夫置身于整个事情之外。玛格丽特回忆说：“她不愿因民主党而搞得那么激动，所以告诉爸爸说，如果他在76岁的年龄上去参加另一次代表大会，那他就是疯了。让下一代自己去一决雌雄——这就是她的态度。”然而，正像约翰·斯特罗瑟一样，杜鲁门记得此人在清晨散步时遇到自己的女婿——“这位自负的老人”竟不愿说出自己的年龄——杜鲁门也想“和年轻人在一起使自己变得年轻”。

有时他感到被遗忘了。在华盛顿国会山，一天深夜，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助手接到了电话。接线员说她这里有一个打给赛明顿参议员的长途私人电话。这位助手说参议员白天就走了，并且问道他能否知道是谁打的电话，此时，他突然在电话中听到一个熟悉而又简短的声音：“就告诉他说哈里·S·杜鲁门打的电话。前美国总统。”

4月份，艾奇逊写信告诉杜鲁门，如果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的初选中“摔跤”的话，那么，提名可能会落到史蒂文森头上。“我不愿这样说，我也想唯一可能的选择是斯图尔特，尽管我支持他，但我非常怀疑他会取得成功，他似乎抓不住这个机会。也许我们都应该给杰克一个竞选机会，即使是因为他的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乔的钱的缘故。”

5月份，由于肯尼迪在西弗吉尼亚州对休伯特·汉弗莱的一次让人心烦意乱的胜利后，已明显领先，杜鲁门公开表示了他对密苏里的亲信赛明顿的支持，称他“无疑”最有资格成为总统。在被问道他对肯尼迪有何异议时，杜鲁门说：“什么也没有。他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识他，也喜欢他。唯一的问题是，他住在马萨诸塞州。”

艾奇逊越来越担心如今杜鲁门会进一步攻击肯尼迪，说些不仅是对肯尼迪、而且会对民权问题造成长久伤害的话。因为近来杜鲁门一直在表达他那使许多人感到懊恼和失望的观点，特别是那些知道他是多么赞成法律面前平等的人们。杜鲁门极不赞同民权运动所使用的静坐抗议和进军的方法。他似乎感到民权运动的领袖们正在蔑视法律，诉诸暴民统治，他认为这不是获得进步的正确方式。他好像也非常严肃地接受了J·埃德加·胡佛的观点：大多数的民权运动受到了共产党人的鼓励。

6月27日，他最钦佩的人和最忠实的朋友艾奇逊写信以一种相当明确的措辞来纠正他的做法，并要求他同意几项在未来数周中的具体的“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一封非凡的信件，不仅证明了艾奇逊作为一名顾问的杰出能力和价值，而且证明了他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所具备的力量的信赖：

亲爱的老板：

随着大会的临近，可以说，我们的党员们可能越来越重视我们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我们能否就我们不应该讲的话达成一项协议？

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无疑也应该说我们的候选人——你的和我的——具备从伯里克利到丘吉尔的一切伟人身上的美德。圣彼得和菩提树会原谅这种天真无邪却并非确实存在的夸张的。然而，有些事情却没有人，也许极少的人会原谅。

这些事情虽然分为几类，但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伤害，这伤害来自允许强烈的个人观点去模糊对共同事业的正当的关心。在我看来，“不应做的事情”的清单如下：— 1. 对于其他的民主党候选人：

(a) 绝不应说他们中的任何人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

(b) 绝不应说他们中的任何人不能取胜。

(c) 绝不应暗示出他们中的任何人是某个组织或利益集团的工具，或不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比别人有（或花费了）更多的金钱。

理由：此时公开争论太迟了——协议也许能够达成。我无法肯定。但随便乱说话肯定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的候选人打算到各地去竞选——我怀疑这种做法——那不应该是为了公开攻击其他的候选人。因为这种攻击在正式选举运动中一旦被引用，它将造成巨大的伤害。

2. 对于黑人的静坐抗议运动：

(a) 不要说它们是由共产党鼓动的。证据根本不足，尽管 J·埃德加·胡佛是这样断言的，你应该像想把消音器装在一响尾蛇的响环上那样期望他。

(b) 不要说你不赞成他们。不论你怎么想，你没有义务去广播这些话。言论自由对政府是有限制的；不能成为一种对公民的煽动。

理由：你的观点，正如报道的那样，完全与你的公务记录不一致。这种议论不能使任何人相信任何事情。如果你想要讨论其中所包含的各种个人感兴趣的社会、道德和法律问题，那么，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3. 对于外交政策：

(a) 在未来的 4 个月中，不要说在外交政策上我们必须支持总统。

理由：这种陈词滥调已变成了一种威胁。它创造了一种错误的信念，使人误以为在最近的灾难中，总统一直在采取受到支持的政策或立场。

这绝不是真的。一个处于山穷水尽的窘境中的人也会喊“支持总统”。这不是一项政策。而是为了让他摆脱困境而呼吁对他的支持，并使其让那些根本不知道困境是什么的人看起来好像是一项政策。

因此，请你在只不过是 4 个月的时间里，让他的辩护士们去帮助他吧。

我们则必须去击败尼克松。我们也许不得不用肯尼迪来做这件事。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比它不得不呈现的状况更复杂呢。如今，我们完全应该认真地去思索。我已完全停止了公开讲话，这对我是如此之难。到8月时，他们将准备上演“我的《玫瑰经》”。

所以，我给你提出了这个关于“不能做的事情”的协议。你同意吗？

在复信中，杜鲁门写道：“你绝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你的电话和你的这封善意的信件。我会尽力从中获益……幸亏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和一个真正值得信赖的人。”

当肯尼迪已有把握获得提名这一点变得清楚起来时，杜鲁门却一直坚持认为那将是一次悬而未决的大会，并由此推断，他如果不能控制、也能够影响这次大会。他告诉记者说：“第三或第四轮投票后，潮流才能开始显现。”他急切盼望能出席大会。在给《华盛顿邮报》老板的夫人艾格尼丝·迈耶的信中，他写道：“我准备去洛杉矶，尽我所能进行最顽强的战斗。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一直要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事实上，正如杜鲁门的忠心耿耿的顾问希尔曼和诺伊斯从洛杉矶向他报告的那样，肯尼迪几乎已解决了一切问题。游戏结束了。“你来这儿被认为是例行公事，不可能造成任何重大的变化。这是那些甚至是偏袒你的人的判断。”不过，他们敦促他不要说任何关于此次大会受到“操纵”之类的话，“——否则你将会由于11月份的失败而受到指责——失败的前景几乎可以肯定。”

但是，杜鲁门——愤怒、痛苦——将说出他的心里话。7月2日，在杜鲁门图书馆举行的一次戏剧性的通过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以一种肯定会激怒大批的民主党人的方式猛烈攻击肯尼迪，不折不扣地做了艾奇逊曾敦促他绝不要做的事情。他不仅公开宣布他不会作为一名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因为肯尼迪的人已经“操纵”了它；而且面对着摄像机镜头，直接对肯尼迪说：“参议员，你能肯定你已为这个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或是这个国家已为你在1961年1月担任总统做好了准备吗？”杜鲁门说，他毫不怀疑肯尼迪注定会登上政治的顶峰。

但是我却格外担心和忧虑我们目前和在最近的将来所面临的世界局势。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这一次能有尽可能成熟和有经验的人出来的原因。我能敦促你再忍耐一下吗？

肯尼迪迅速而又心平气和地作了答复。他说，如果在重要的竞选职位上14年的经历仍然是经验不足的话，那么这就会排除几乎一大群总统，包括威尔逊、罗斯福和杜鲁门。

无人对杜鲁门所做的这件事表示欢迎。大会之后，艾奇逊写信给他说：

我听了你的记者招待会，并且对你非说不可的那些话感到遗憾，虽然你说的那些话比你原先告诉我打算说的那些话要好些。杰克获得提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你和林登说的所有的话你们将不得不收回——而你也确实收回了。

可怜的林登结果更糟，因为他现在正坐在一辆旧汽车里，行驶在去乡村集市的路上，并且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年轻和更饶舌——如果这可能的话——的艾尔本·巴克利。你为众议院中一名精明的经营者，也许是无法继续适用于这个更广阔的领域的一种特定牌号的精明……目前我听看到的是，杰克及其班子是洛杉矶会议上唯一“值得赞成的人”……

好了，我们在这场竞争中状态不佳……我希望上帝仍会真正地仁慈地照顾孩子们、醉汉们和美国……

杜鲁门再次像在 1956 年那样，准备加入队伍，尽他的一份力。8 月 2 日，当肯尼迪从海恩尼斯港来拜访他时，他立即说他准备帮忙。肯尼迪私下说：“他对我再友善不过了。”

杜鲁门把自己的沮丧和愤怒不得不放置一边。在一封他决定不发出的写给艾奇逊的信中，他说他对在洛杉矶所发生的事情“沮丧到了极点”。不论是肯尼迪或是尼克松当选，前景都很暗淡。“你和我都感到痛心，必须在两害中拿去那个最坏的，否则就两个都不选。因此——我打算选择那位不成熟的民主党人作为两人中最佳的选择。尼克松是不能选的。这样，我们可以达成协议了。”

肯尼迪在斯图尔特·赛明顿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图书馆，在年岁上足以成为肯尼迪的父亲杜鲁门在大门口迎接他。“进到这儿来吧，年轻人。我想和你谈谈。”

两天后，杜鲁门写信给萨姆·罗森曼说：“别沮丧。这孩子正在学——我希望。”

了解杜鲁门的人都不感到惊讶，杜鲁门又参与了竞选运动。他肯定知道，1960 年肯尼迪—尼克松的竞争将是他“最后的努力”了，为了证明他的价值，他全力投入。

艾奇逊写道：“既然你投入了竞选，千万别让一派胡言把你给耗尽了。”

杜鲁门乘坐飞机、火车、汽车旅行，走遍了 9 个州，发表了 13 场演讲。他乘汽车游行、举行记者招待会、握手、挥手、微笑、让人们和他一致投票，并且总是乐此不疲。他坚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午睡。他的助手戴维·斯托得到指示说：“午饭后的午睡是绝对必要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消。”

只有在人群拥挤的房间里，当人们开始推揉着来会见他时，他才确实显出了疲惫。

尽管他以同样友好的幽默和微笑穿行于其间（斯托在日记中写道），但这个问题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使他烦恼，因为它成了他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可以想象，这对那些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们是一个应该引起警觉的警告，在我们的计划中，要避免任何会使他在其中被粗鲁地推揉的大型集会。毕竟他已 76 岁了。

11 月 21 日，杜鲁门写信给艾奇逊说：“竞选运动结束了，我们有了一位天主教徒做总统。”

在我看来，一个人属于哪个教派无关紧要，只要他相信他所宣



读的支持和保卫宪法的誓言……

如果我们的新总统继续这样干，他就不会有麻烦。你知道，我多么希望我还年轻，以便回到白宫去叫艾利比·艾克戴一顶大礼帽！

1961年1月，肯尼迪就职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在8年中首次被欢迎返回白宫和椭圆形办公室，为此，正如他写给总统的信中所说，他非常感谢。当年11月，杜鲁门夫妇和玛格丽特以及克利夫顿·丹尼尔成为白宫为欢迎杜鲁门而举行的一次白领结宴会上的贵宾，并在白宫过了一夜。宴会上端上来的松鸡硬得几乎无法食用，可是，由于他以前内阁中的许多成员都出席了，由于总统和第一夫人所显示出来的殷勤，杜鲁门依然喜气洋洋。宴会后在东厅举行的招待会上，肯尼迪夫妇安排了由尤金·李斯特表演的杜鲁门最喜爱的曲目——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演奏会，李斯特曾在波茨坦为杜鲁门作过第一次表演。当李斯特在席间邀请这位前总统在那架大型的斯坦韦钢琴上弹奏一曲时，杜鲁门应允了，脸上显出一个人所能有的最喜悦的神色。

#### 4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政治伤痛开始淡漠。杜鲁门变了，相继与一个又一个的以前的敌手和批评者恢复了友谊——亨利·华莱士、乔·马丁、乔·艾尔索普、德鲁·皮尔逊，甚至包括保罗·休姆，这位《华盛顿邮报》的音乐评论家去堪萨斯市观看玛丽亚·卡拉斯的一场音乐会，他决定开车去访问杜鲁门图书馆。休姆后来回忆说，他对杜鲁门作了一次“美妙的拜访”，杜鲁门花了一个小时来和他谈话，并带他参观这座图书馆。休姆告别前杜鲁门说：“过去多年间我对你以及麦克阿瑟将军曾开过许多玩笑。我希望你不要介意。”

在当天晚上的音乐会上，休姆发现他的座位与杜鲁门夫妇的座位仅隔着一个通道。当他走过去打招呼的时候，杜鲁门转身对贝丝说：“看，我告诉你说保罗·休姆今天曾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吧。”

（演出后，杜鲁门到后台去会见玛丽亚·卡拉斯，然后他赶上正在朝街对面停车场中他们的汽车走去的朋友们，显得极其兴奋他说：“你们知道，她还记得我！”）

他很少或根本不与其交往的只剩了3个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和理查德·尼克松。他最恨的那个人、乔·麦卡锡于1957年48岁时死于剧烈的酒精中毒。

1961年11月，在得克萨斯州博约姆举行的萨姆·雷伯恩的葬礼上，2000人站在挤满了人的教堂外的寒风中，杜鲁门与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坐在一起，3人都坐在前面同一排座位上，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看起来——正如全国观众在电视上所看到的那样——的确就像是政界元老，他俩儿都坐在那位年轻的总统身边。对杜鲁门来说，由于他极其怀念雷伯恩，因此这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葬仪；不过，就像马歇尔的葬礼一样，它也是正在发展的与艾森豪威尔和解的一个缓慢而稳固的步履。

8年来，杜鲁门一直希望艾森豪威尔会在某个时候为征询意见而拜访他、或邀请他承担一项任务，就像杜鲁门邀请赫伯特·胡佛那样，然而这样的事却从未发生。如今，肯尼迪也没有做，这使杜鲁门感到极其失望。他写

信给现在仍在被肯尼迪为征询意见而邀访的艾奇逊说：“你正在做出贡献。我却沒有。我希望也能如此。”

清晨的散步仍继续着，尽管现在他是由一位保镖陪伴，这是一个身穿便服的高大、结实的独立城的警官，名叫迈克·弗斯特伍德。他的薪金由该城支付，他将一年四季守卫在杜鲁门身旁。

他的主要乐趣保持不变——他的书籍、他的图书馆、与艾奇逊的通信、他的家庭。克利夫顿·丹尼尔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岳父，“好极了”，从不干预，总是善解人意。丹尼尔回忆说：“‘狠揍他们的哈里’在家里却不揍任何人。”

勿庸置言，我一直既把他作为岳，也把他作为前总统而尊重他。在公开场合我称他为“总统先生”，而在私下，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称他为“爷爷”。如果可能，我宁愿什么也不叫。如果叫他“爸爸”，会让我们都感到不自在，对于他那一代和我这一代人来说，称他“哈里”是不可想象的。我尽可能地多使用“先生”的称呼。

1961年夏，杜鲁门开始投入后来成为有关总统制的一个电视系列片的制作工作，不过这部片子是以他在白宫的年代为主。正如他的《回忆录》和杜鲁门图书馆一样，这仍是一项意在教育全国、特别是年轻的美国人的努力。他常说：“我对孩子们最感兴趣。”这部电视片将由戴维·萨斯坎德和他的公司、天才联合公司出资制作。这项计划的作者和总的“组织者”是默尔·米勒，他是《扬基报》的前记者和一名小说家，选中他来执行这项计划不仅是为了增添一点“有创造力的火花”，而且是因为他被认为与这位前总统有许多共同之处。米勒也成长于中西部，也曾是一个戴着眼镜酷爱读书的孩子，并在早年怀有光荣的梦想。不过，比这部最终完成的电视片更重要、也更有影响的，是米勒在他的一部根据保存的录音编辑而成的题为《朴实的话》的著作中，对杜鲁门所作的生动描述——这部著作在12年以后才出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米勒由于其背景，并不期望能喜欢杜鲁门，想象着他与自己所认识的、成长于艾奥瓦马歇尔镇的人们可能极不相像。米勒回忆说：“我曾认为他没有我们想在一位总统身上要看到的那些东西。我想，我们在一位总统身上想要看到某种具有帝王尊严式的东西……”

然而，他回忆说，这里却是

一位极其睿智、见多识广的人。

如果我有一位聪明的父亲、如果我有一位读书的父亲，或是如果我有一位懂得如何与人民融洽相处的父亲……那么这人就是他……我怎么能不喜欢他！他是这样一个关心、真正地关心你的幸福的举止得体的人。“喂，你好啊？”“你住的旅馆怎么样？”“饭菜怎么样？”……他想让你感到无拘无束，而他也确使你感到了无拘无束。和他在一起，我从未感到过不舒服，直到最后都显然没有一点做作的成分。

和杜鲁门在一起，米勒觉得：“你总能感到某个人在那儿。有一个人在

那里！……他为了你而存在于那里。”

被指派担任这部电视系列片制片人的罗伯特·艾伦·奥瑟发现杜鲁门活泼而固执己见；在一次早晨拍摄时，奥瑟认为，杜鲁门喝的波旁酒可能超过了医生迄今所规定的量。

杜鲁门一直对他们说：“别想把我塑造成一个演员！”这天，拍摄安排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陆军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学院。杜鲁门要和一群选择来的军官坐在一起讨论朝鲜问题。每一个人都希望杜鲁门在这种场合能有最佳表现，免得重拍。然而，他的表现却“糟透了”，罗伯特·奥瑟回忆说。杜鲁门被告知说他的表现如何好，可他显然知道实际效果如何。“你们把我搞成了一个演员……它不会好的。”

米勒和奥瑟用一个录音机，花了很多小时——最终花了几天——来采访杜鲁门。他讲的故事，他那精辟的评论有如泉涌。听了他讲的这些事，默尔·米勒感到杜鲁门被那些协助他撰写《回忆录》的人搞糟了。“我认为那些人，其中尤其是诺伊斯和希尔曼，想要把他塑造成他根本就不是的那种特别呆板的样子。”

杜鲁门精彩地并带有一种感人的乐趣讲着他的故事。但他也有夸大、甚至虚构的倾向。这使米勒回想起了赫克·芬恩对马克·吐温的评价：“他讲的主要是真实的事情。也有被他夸大的事情，不过总的来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东西。”

杜鲁门描述了过去在隆杰克举行的民主党野餐会和旧时政治家们的演说风格，尤其是克里斯普上校曾说过的“该死的目击者，他总是把一个好故事给搅坏了”。他也讲到曾在堪萨斯市看见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坐在那里吃午餐，桌上是一个装满了生小萝卜的大碗和一盘子黄油。“他坐在那儿用小萝卜抹着黄油吃，把这一碗小萝卜全都吃光了。”

当米勒问道，在他成长过程中，他是否曾“认同”过赫克·芬恩或认同过汤姆·索耶，杜鲁门答称：“没有，我不是那种人，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是一种有女孩子气的男孩。”他说，“戴眼镜”使一个孩子变得孤独，因此他不得不为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而奋斗。天哪，你必须比其他人更聪明，或者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劳动……不过，你必须特别小心，别对那些你已经打败了的人称王称霸。”

他谈到了政治首领的问题。（“除非大多数人和他在一起，否则，首领就不成其为首领。”）他谈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有些地方像布赖恩。他能使人民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他讲述了1944年芝加哥大会的事情，回忆了当他在鲍勃·汉纳根的办公室中与罗斯福通完话后放下电话时的感觉，并讲述了办公室中其他人等着听他说些什么时的那种表情（“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约5分钟，你可以看到其他那些家伙们的脸！他们都担心到了极点”）。他描述了1944年竞选期间，他是如何威胁着要把乔·肯尼迪从波士顿莉兹——卡尔顿饭店的窗户中扔出去的情景，当时肯尼迪一直在中伤罗斯福。“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接着他就警告米勒不要使用这个故事，“因为他儿子现在是美国总统，而他是一个高尚的孩子。”

一个乐观主义者就是认为事情能够去做的人。悲观主义者从未给这个世界做任何事情。比利·格雷厄姆说世界的末日正在来临，可杜鲁门却不相信。谦恭有礼对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曾听到有关一位汽油站的服务员拒绝给汤姆·杜威的油箱加油的故事，杜鲁门对此极不赞成。后来他曾责备新闻界

把第一夫人称作“杰基”。

他说，罗马共和国的伟人都不是军人。哈德良是最伟大的；然而，他本人最喜欢的是马可·奥勒利乌斯，后者总是想着他的人民的福利。

这盘长长的磁带的后面部分听起来极其困难，因为它充满了静电干扰，充满了杜鲁门办公室中的其他杂音、如人们进出的声音。他本人的声音很大，比他在讲台上演讲的声音低一些，但也更有感染力。人们通常会忍俊不禁地大笑。气氛是一种很愉快、关系也很融洽的气氛，杜鲁门显然在这种气氛中非常喜悦。

不像那天在莱文沃思堡，有些拍摄的场次进行得极为顺利。罗伯特·奥瑟回忆起在纽约的一次特别成功的拍摄说，他的回答“恢复了细节上的丰富，又有了这个人曾有过的全部鲜明的权威。有二三次，是杜鲁门先生要求再试一次，说他能做得更好”。当时，有一次杜鲁门对总统是否戴的是前几次在独立城拍摄时的同样的领带表示了关注，他问道这是否确实很重要。“因为如果在我正谈论朝鲜问题时，人们却在相互谈论我的领带，在我看来，这样我们可就遇到了一大堆麻烦。”

在米勒和奥瑟看来，他似乎格外机敏和健康。米勒回忆说，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天哪，他一点儿都不老！”但事实上，杜鲁门已经开始体力下降，甚至健康状况有点儿不好。在那些曾与他一起在白宫工作过的人，以及那些在独立城和堪萨斯市早就认识他的人看来，他与他以前已明显不同了。他的行动上少了权威，他的听力也有点儿困难。在回答问题时，他经常愿意用一句快速的生硬的回答、一句老人的俏皮话来加强效果。在近几年中，他曾多次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因此他也就发展起了一套事先准备好了的答复，这听起来绝不比现成的答案更好。有时，他回答起问题来好像是在引述他自己的著作或过去的演讲。另外一些时候，并且在仅有男人的圈子里，他使用比过去更多的褻读的语言。在保持着那出了名的微笑，令人愉快、风度翩翩的举止的同时，他所表现出来的对某些人和当时的潮流的个人轻蔑也比以前更多了。他恨青年男子留长发的这种时髦，尤其不喜欢被人称作“老年公民”。在被问到他认为是否会进行一次月球探险的时候，他回答说，也许会，可他无法想象为什么要这样做。

私下里，他偶尔会回到随便说话的老习惯上去，似乎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有一次他评论说：“独立城的人一点儿都他妈的没变。”他告诉米勒说，他并不反对摩门教徒，他们都是些特别勤奋的人。但是，这个城市中的许多守旧的人却“像以往那么强烈地仇恨他们”，杜鲁门说，并且“由于这同样的原因，某些人恨与一个黑鬼坐在同一张桌旁吃饭”。他说，这是偏见。

他对不断增长的国债和“我们的这个可怜的破了产的政府”表示担忧。他强烈地反对由于电视而使他看到的发生在政治上的那些东西。“我不喜欢假冒品，而广播和电视却从这些政治家身上制造假冒品。”

他厌恶看到这座城市被大片的房屋、广告牌、汽车加油站和拥挤的车辆所吞噬。但可笑而又可悲的是，正是汽车和公路这两件他生活中的心爱之物导致了这些变化。如今，大多数早晨他都不不得不停下来捡抛进他前院的那些丢弃物——啤酒筒和糖纸。

他对麦克阿瑟将军那绵延不断的愤怒似乎太多了。默尔·米勒回忆说：“有好多次你都想对他说：‘喂，你知道，你已经有了定论。让这些话躺在

你的胜利中睡大觉吧。’ ”

对艾森豪威尔，他几乎无法不说不带脏字的话。

但另一方面，他认为肯尼迪似乎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被误导了。杜鲁门对猪湾的惨败感到特别震惊，艾奇逊也是如此。

艾奇逊写信给杜鲁门说，在肯尼迪的白宫中，有一种不幸的对“形象”的全神贯注。

这是一个可怕的弱点。它使得人们考虑自己而不是考虑问题。我怎么能照看着守住这个击向游击手的急速的平直球？这可是一个完全让人接不住球的好方法。我吃惊地回想起你与这种状况的距离有多么遥远。我不记得你曾有过任何一次停下来考虑一项对外政策上的决定对你命运——或就此而言对党的命运——究竟有何影响。

杜鲁门答复说：“继续写，它鼓起了我的士气——如果我还有什么士气的话。”

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艾奇逊：“你必须记住，我们国家的首脑还年轻，经验不足，但很有希望。让我们期待着有希望的作为吧！”

听到民主党在肯尼迪的建议下准备举办一个每位客人 1000 美元一份正餐的宴会的消息后，杜鲁门震惊了。“如果或者当此事发生时，我们就完全成了带有小写 d 字头的民主党人。”在这件事上，无人与他商量过。“让那些在领导地位上的百万富翁们见鬼去罢。”

对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他说：“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孩子，并且永远也不会喜欢。”1960 年 5 月，马特·康内利因偷漏所得税而开始进监狱服刑。杜鲁门相信康内利是无辜的，并且像其他人一样，相信康内利正成为共和党仇杀的牺牲品，因此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事情，包括帮助筹款以支持康内利的诉讼费用。1961 年 3 月，他写信给鲍比·肯尼迪，敦促赦免康内利，当时康内利已假释出狱。但肯尼迪只是答复说他正在研究这个问题。5 月份，杜鲁门再次写信，并提供了更详细的背景材料，而肯尼迪再次保证说他个人关注这个问题。可是此后便没有了下文，到 1962 年初，愤怒的杜鲁门用普通手写体亲笔给这位司法部长写了一封信：

正如我在原先的信中告诉你的那样，马特·康内利受到了污辱和虐待。我想让他得到赦免并恢复他的全部权利。此事我从未对你哥哥说过，我也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如果你认为我欣赏我最好的雇员之一被虐待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你就错了。所以，别想再讥笑我，除非你给马特·康内利以公正，这才是正确的东西——项完全的赦免。

1962 年 11 月，康内利被肯尼迪总统赦免，而杜鲁门也给总统发去了他的感谢信。

贝丝的膝部和手部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并且在乳房部位发现了一个肿块。尽管它被诊断为良性的，但它却侵袭到了淋巴结，华莱士·格雷厄姆为她做了一个乳房切除手术。

杜鲁门也一直受着痛苦的折磨，他于 1963 年 1 月被送进了医院，动了一

个肠疝手术——他称它为一次“小宰割”。事实上，对于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手术，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复元。

这个一直喜爱钟表的人——在白宫的不眠之夜里，他总是上钟表的发条；并且在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保持有八九个钟表；无论到哪里去，他总想要准时——现在视时间为敌人和追踪者。他写信给艾奇逊说：“那位‘公民’老妇一直在追赶我，我不得不慢下来点儿，特别是自从她在杜鲁门夫人那里有了一个伴儿之后。”贝丝的所有3个弟弟，弗兰克、乔治和弗雷德·华莱士，此时都已去世了。

“在79岁上，你一个接一个地去参加朋友们的葬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不到79岁——这样，你有时会感到奇怪，是否那个拿着长柄大镰刀的老头儿没有在追你。”杜鲁门在1963年5月，他生日过后不久的另一封信中写道。

那年秋天约翰·F·肯尼迪的遇刺使他在感情上遭受了重大打击。他在米勒巴赫饭店吃午饭时听到了肯尼迪遭枪击的消息，但直到后来，他在回家路上的卧车里才得知肯尼迪已经身亡。

玛格丽特写道：“由于他本人曾距此命运如此之近，爸爸被极度地震惊了。他生平第一次无法面对记者。”

当我正准备飞往华盛顿时（杜鲁门后来在答复作者威廉·曼彻斯特的询问时写道），我接到了约翰逊总统的一个电话，告诉我：为我派了一架飞机，这样就使我能在葬礼前一天赶到。我直接前往布莱尔大厦。在那儿呆了一会儿，我们坐车去白宫拜访肯尼迪夫人。我发现她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惊人地镇定和克制，不过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悲痛。她对我说，她的丈夫，总统，常常谈到我，并且对我们试图做的事情深表同情和理解；我发现自己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对于一个曾担任过总统、经历过它所带来的考验和重负的人来说，不承认这场降临在国家头上的悲剧的严重性，看不到他的家庭、特别是总统夫人所遭受的这场灾难性打击的严重性，这是很困难的。

贝丝一直生病，这次不能同行。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则从纽约赶来，和住在布莱尔大厦中的杜鲁门呆在一起。见到父亲后，玛格丽特越发担心了，他看起来情况糟透了。一位医生被派来照管他。杜鲁门顺从地上楼回到他的房间，在床上用餐。但是，第二天，他又步行出席了葬礼和墓边的禱别仪式，之后，他与艾森豪威尔同坐一辆车回到了布莱尔大厦。两人坐在布莱尔大厦的前会客厅中谈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艾森豪威尔返回了他在葛底斯堡的家中，杜鲁门则飞回了密苏里。

肯尼迪悲剧发生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特工处保护前总统，于是，一支特工处的小分队到达了独立城。但是，当一名特工人员拜访杜鲁门的家、以便作自我介绍、并告诉这位总统他不再需要有他自己的保镖麦克·韦斯特伍德时，杜鲁门对他说：“那么，我就不再需要你，所以，从这里滚出去。”

杜鲁门夫妇都不希望特工处再回到他们的生活中。玛格丽特描写说，她母亲的反应就像是他们刚告沂她，她要在白宫再住4年似的。贝丝也拒绝让

特工处来到这块地产上。但是，后来约翰逊总统在一天晚上亲自打来电话，让贝丝相信特工处的保卫应该被恢复，杜鲁门夫妇才同意了。此后，他们将处在特工处的保护之下，尽管麦克·韦斯特伍德仍像以前那样陪伴在总统身边。

1964年5月，杜鲁门80寿辰的庆祝活动在独立城、堪萨斯市和华盛顿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在独立城举行了一个巨大的庆祝午宴，在米勒巴赫饭店又举行了一个。5月8日在华盛顿，他以“典型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了庆祝，所到之处都获得了欢呼和赞扬。他应邀对参院发表演说，坐在前排的一个座位上，西服翻领上戴着一朵玫瑰花，并且聆听了27位参议员对他那热情洋溢的称颂，其中包括两名自他在参院任职起就一直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即共和党人乔治·艾肯和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参院首次运用一年前采纳的一项新规则：前总统可以获得“进入参院的特权”——杜鲁门对此感受极深，以至当他起身发言时，几乎都说不出话来。

非常感谢你们。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现在都不能很好地利用这条新规则。这是我毕生中遇到的最重大的事情之一。

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在你们和我以及这个门柱之间，由于这条新规则而使我获益，所以我认为这是一条有益的规则。

当参议员们拥在他身边与他握手时，他说：“你们可以祝福我有更多更快乐的生日，可我绝不会有比这更幸福的另一个生日了。”

5个月后，1964年10月13日，杜鲁门在北特拉华大街219号进入楼上的浴室时，绊在门槛上。他跌倒了，头碰在盥洗池上，眼镜撞碎了，碎片严重地划伤了他的右眼。接着他又继续倒向浴缸，折断了两根肋骨。尽管他神志仍然清醒，但却动弹不得。

警察被叫来了，他被一辆救护车送进了医院。两天后，华莱士·格雷厄姆报告说，他的患者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身体状况“非常令人满意”。尽管杜鲁门不久便重新回到家里，并最终恢复了某些过去的日常工作，但他再也没有从这次跌倒中完全恢复过来。他的体重开始减轻，脸庞也变得消瘦了，在厚厚的眼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不成比例地显得很大。他妹妹玛丽·简说：“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以前他一直是圆脸，并且精神很好。现在照的相却很悲惨。他是那么瘦。以前他照的相总是那么好。”

不过，他继续坚持在麦克·韦斯特伍德陪伴下的清晨的散步，偶尔也由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牧师托马斯·梅尔顿来陪伴，后者就住在杜鲁门街对面——梅尔顿回忆说，他的步子每年都比原来要慢一点儿，但杜鲁门却坚持尽最大的努力来散步。每当经过梅普尔大街上的一棵巨大的银杏树（它是该城最引人注目的那些银杏树中最大的一棵）时，杜鲁门还习惯性地冲它说些话。

几年后一位来访者问梅尔顿，总统对那棵树说了些什么。“他说：‘你正在做一件好事’。”

他和贝丝成了独立城公共图书馆的固定赞助人。麦克·韦斯特伍德开着另一辆新的浅绿色的“克莱斯勒”汽车带着他们，杜鲁门坐在前面，贝丝则坐在后面。到了图书馆，他就进去，出来时夹着一大堆图书。

与艾奇逊的通信仍然继续着；艾奇逊的信很详细，以便让杜鲁门了解约

约翰逊总统任内的情况，因为他知道杜鲁门想了解这些情况。而杜鲁门现在则是口授他的信件，并且口授的内容越来越少。

1965年夏，维维安·杜鲁门在79岁上去世。杜鲁门写信给艾奇逊说：“他的去世对我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损失。”几天后，特德·马克斯也去世了，杜鲁门出席了他们两人的葬礼。

1965年7月30日，当约翰逊总统来到独立城，在杜鲁门图书馆中当着杜鲁门的面签署新的医疗照顾法案时，一篇报道说，来自华盛顿的名人对杜鲁门那让人怜悯的虚弱样子表现出了“悲哀的惊讶”。不过，他的声音仍然很有力，他谈到了他为图书馆设计的几项规划。

他坐在约翰逊的身边，握着一根手杖，看着这项20年前他就提出的为老年人提供医疗照顾的法案签署成法律。

杜鲁门告诉总统说：“你使我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人。”

内利·诺兰去世了，吉姆·彭德格斯特也去世了。在杜鲁门晚年的私人遗憾中，与他的老朋友吉姆·彭德格斯特闹翻是其中之一。1958年，在对一位当地的民主党候选人的赞同问题上，两人之间有了一些误解，这使得两人都认为对方背弃了他们的友谊。这是一个可悲而不幸的僵局，不过，在吉姆·彭德格斯特经过与癌症的长期搏斗、于1966年春去世后，杜鲁门出席了他的葬礼，他知道自己生活中的另一篇章已经结束了，却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

出席葬礼成了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位长老会的牧师托马斯·梅尔顿后来记述了一次在独立城的一个冷酷的冬日里举行的难忘的墓边祷告别场景：

对于那些不是来自这个地区的人们，在他们去世的时候，我们通常也要承担起义务。这是在2月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天气很冷、也很糟，那一年雪很多。我们打算到市公墓去履行一项义务。于是我去到约定的地方……那儿除了殡仪人员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没有抬棺的人。我们想，我们得等到报纸上（公布的）那个约定时间，万一要有什么人来呢……那辆绿色的“克莱斯勒”开过来了，我立即就认出了这辆车。我知道这是杜鲁门先生的车。特工人员走出车门，站到了他们的位置上；杜鲁门先生朝棺木走来，我惊讶了，我为死者做了告别祈祷。雪仍在空中飞舞，天气依然很冷……我做完了祈福后，问他，我说：“总统先生，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天气很冷也很不好。你认识这位先生吗？”而他回答说：“牧师，我从不忘记一位朋友。”我一时无话可说。这就是美国的总统。

林登·约翰逊后来又来到独立城来过几次，希望谋求杜鲁门对越南战争的支持。然而，当总统时曾最先保证美国支持法国反对胡志明的杜鲁门，却没有对这场战争发表任何声明。私下里，他对约翰逊的领导越来越感到幻灭。

1967年，在84岁时，杜鲁门停止了按时去他的图书馆的做法。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他只是更经常地不在那里。

1969年初，当新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表达了想来看望杜鲁门的愿望时，他和贝丝同意了。3月22日，这位总统和第一夫人拜访了北特拉华大街219号。他们在那里和杜鲁门夫妇呆了半小时，然后坐车前往图书馆，在那里，



当尼克松在杜鲁门办公室外面的那架音乐会使用的大三脚钢琴上弹奏“密苏里华尔兹”时，已经不是在他最好状况下的杜鲁门却毫无表情地站在一边。在场的许多人人都知道杜鲁门极不喜欢这首曲子，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自在的时刻。但是，当尼克松演奏完毕后，杜鲁门却转向贝丝问道，他刚才弹的是什么曲子。

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丹尼尔此时已经又有了两个孩子——哈里森和托马斯——使得这个家庭有了4个儿子。1968年3月底和第二年的同一时间，杜鲁门两次与丹尼尔夫妇重游基韦斯特，在那儿，人们看到这位爷爷身穿运动衫、头戴棒球帽，和他的4个孙儿一起在逛这座老城的街道，并像过去的时代那样，享受那里的空气和阳光。对他们全家的人来说，都会记得这最幸福的几周。杜鲁门告诉记者说，他觉得这“对一个老人来说真他妈棒”。

但是，那年冬天他因流感被送进了医院，并且开始感到自己像是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艾德莱·史蒂文森、丘吉尔、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都已去世。在基韦斯特逗留期间，艾森豪威尔去世的消息传来。杜鲁门写了一篇通情达理的颂辞。

1969年6月28日，杜鲁门夫妇在家中庆祝了他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没有举行家宴。只有几位朋友到访。正如贝丝向记者们解释的那样，总统不适于长时间地站在那里握手。

1913年，他曾从格兰德维厄的农场写信告诉她：“如果我一周里不至少去一次特拉华大街219号，那么这一周好像就很空虚。”如今，他几乎天天都在那儿。他的书籍日益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杜鲁门大街上过往的汽车、晚上外出散步的邻居们，都能从窗户中看到他坐在那里，在台灯下读书。多年后玛格丽特被问道，她父亲理想中的天堂是什么样。她回答说：“噢，有一把舒适的好椅子，一盏好台灯，以及身边有一大堆他想要读的书。”有一次在纽约，当道布尔戴的肯·麦考密克清晨到他住的饭店去拜访他时，杜鲁门正坐在卧室的一把椅子上，身旁的桌上堆着几本新书。麦考密克问道，总统喜欢在夜里看着书入睡吗？杜鲁门说：“不，年轻人，我喜欢看书看得睡不着。”

托马斯·哈特·本顿来这所房子里为这位坐在椅子上读书的体弱年迈的老人画素描，本顿完成的素描很少有几个人能认出是哈里·杜鲁门。本顿认为，如今在这张脸上又增添了更多的性格。

1971年5月14日，杜鲁门在写给艾奇逊的信中说：“在我87岁生日时，你友善而慷慨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这封信来自你，因而对我有着更深刻的含意。”签名仍可以认出是他本人的，但也只是勉强地认得出。

埃塞尔·诺兰于那年夏天去世。然后，在10月12日、星期二，艾奇逊在马里兰州桑迪斯普林他的农场中，被发现倒在他书房里的一张书桌上，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78岁。当《纽约时报》来采访时，贝丝·杜鲁门说：“别来。”她说，杜鲁门先生不会马上有评论的，而且补充说：“我知道他会极度心烦意乱的。”

1972年夏，杜鲁门住进了医院——先是由于又一次跌倒，然后又因肠胃病而住了两个星期。

12月5日，星期二下午早些时候，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这是他最后一次被救护车载着离开北特拉华大街的这所房子。他的状况正如华莱士·格雷厄姆当天晚上在研究医院告诉记者们的那样，可以说“尚好”。他患的是肺

充血。

12月6日，他的身体状况被列为“危急”，病情公报一整天里都在不断发布。医生们试图用抗菌素和氧气清除他的肺部堵塞，但却因这位前总统同时正在患支气管炎而受阻，而且，由于动脉硬化而导致了出现周期性的心动过速。

玛格丽特正在华盛顿出席一个庆祝她的有关她父亲的新书《哈里·S·杜鲁门》的出版而举行的招待会，她立即乘坐尼克松总统提供的一架白宫喷气机飞往堪萨斯市。

在后来的几天里，杜鲁门明显地恢复了，并被从危急名单上勾掉。不过，由于他的搏斗仍在继续，华莱士·格雷厄姆只能说：他的状况“非常严重”。

贝丝和玛格丽特每天都陪他呆在6层楼上他的病房里。玛丽·简·杜鲁门偶尔来一下。她也是这所医院的一名患者，几个星期前在一次跌倒后弄伤了自己。报道说，杜鲁门醒过来了，并且还现出了微笑。在被问道他感觉如何时，他回答说：“好些了。”新闻记者被告知，在他的窗户上布置了圣诞节装饰物。杜鲁门夫人“精神面貌一直很好”。玛格丽特在12月10日告诉报界说：“他对着我们微笑，对我们的问题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作答。”12月11日晚间，当问他感觉如何时，据说杜鲁门答道：“我觉得都好了。”问他是否有什么地方疼，他说：“没有。”12月14日，报道说他已经不能够说话了。

这场挣扎持续了3个星期，其间玛格丽特返回了她在纽约的家中。现在，他患的是肺充血、心律不齐、肾功能障碍和消化系统失常。

自12月5日他入院以来，一直作为他的夜间护理的特护组的一名成员沃尔特·基利雷夫人后来描述他是“亲切、友善，对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特别感谢”的人。12月24日，星期日早晨，下了夜班后，她俯身告诉他今天晚上、圣诞前夕之夜不是她值班，并问他当她回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在这里。她后来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使我相信他的意识仍然有反应……”

圣诞前夕，他越来越虚弱。圣诞节早晨，据报告说，他已陷入深度昏迷，接近死亡。玛格丽特从纽约乘飞机赶来。下午2点的病情公报说他的状况“没有改善”，该院的院长沃伦·F·威廉称他存活的机会“非常非常小”。在被问到为什么杜鲁门先生被维持着活了这么长时间时，威廉医生答道：“这是一个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谁能决定呢？人们总是希望他能复元。”

一直通宵留在医院并与其丈夫度过了几乎每一天的贝丝，此时几乎完全筋疲力尽了。玛格丽特极其担心，她说服了母亲和她一起回到独立城的家中去过圣诞夜。“爸爸处于昏迷中，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

1972年12月26日，星期二，中部标准时间上午7点50分，杜鲁门在堪萨斯市研究医院和医疗中心去世。

几年前，一份详尽的持续5天的国葬计划便已准备完毕，有关的一切事宜均由得克萨斯州休斯敦萨姆堡的陆军第五军负责执行。这个被称作“O计划密苏里”的国葬计划有几百页，包括了详细周密的一切具体事宜。最初，杜鲁门的遗体将被用飞机运往华盛顿，安放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中供人瞻仰，然后再运回密苏里安葬。事实上，在他入院将要去世的三周中，陆军的那匹年老的“黑杰克”、在肯尼迪国葬期间已经成了国家悲剧的象征的那匹马，曾被数次运上飞机准备为他而飞往密苏里。

杜鲁门曾有一天在图书馆他的办公室中看过这全部的计划，并几乎完全

同意；但保留了根据他家人的意愿变更的权利。他说，他觉得这个葬礼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但遗憾的是他不能亲眼见到。他仅是反对把遗体放在华盛顿供人瞻仰。他曾转过椅子、看着院内说，他想葬在“外面那里”。“我想在外面那儿，以便在我愿意的时候能够起身走进我的办公室。”

但是，12月27日的葬礼根据贝丝的愿望，在规模上被大大削减了。她告诉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让它简朴些，让它简朴些。”即便如此，军人的出席也是规模很大的，数千人的部队到达独立城来参加这项仪式。

在卡森殡仪馆为这个家庭举行了私人祷告仪式后，遗体被运往杜鲁门图书馆安放在大厅中供人瞻仰，灵车缓缓地通过该市的街道——沿着列克星敦、里弗布尔瓦、梅普尔和北特拉华大街，两旁都排列着士兵的队伍。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站有一支仪仗队。6门榴弹炮排列在门前的草坪上。

尼克松总统和夫人来向遗体致敬，并在棺木上放置了一个红、白、蓝色石竹花组成的花圈。林登·约翰逊带着全家人来了。看上去显得极其憔悴而衰老的约翰逊仅仅3周后也去世了。

当天其余的时间里加上整个通宵，直到第二天清晨，成千上万的人——据估计有75万人——走过摆放在杜鲁门图书馆大厅中本顿壁画前那紧盖着的棺木旁。队伍延伸了有半英里长，直到公路的远处。一个人告诉记者说：“全城的人都是哈里的朋友。”

12月28日、星期四下午，根据他本人的遗愿，杜鲁门被葬在图书馆的院子里。由于举行仪式的图书馆礼堂空间有限，只邀请了250人出席。其中有艾弗里尔·哈里曼、克拉克·克利福德、查利·墨菲、罗斯·康韦、哈里·沃恩和萨姆·罗森曼。

贝丝·杜鲁门、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以及他们的4个孩子站在一幅绿色帘子的后面，被与其他人隔开。这是根据贝丝的愿望举行的一个主教派的葬仪，但做的是共济会的礼拜仪式，而且是由一位浸礼会的牧师读的祷词。没有读颂文、也没有唱赞美诗。

然后，人们来到外面的墓地，天气阴冷而潮湿；当21响礼炮轰鸣时，当军号声响起时，天气似乎骤然变得更冷了。后来，空中飘起了雪花，几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记得，他们站在窗户旁看着外面已经人去楼空的院落，对于那些正在寒冷的暮色中往坟墓中填土的人们感到无限的同情，他们相信，杜鲁门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 5

“他不是英雄、不是术士、不是棋手，也不是一个使人着迷的人。他是人类中的一名合格的成员，总起来看，他直率、易犯错误并且出人意料地明智。”第二天，在数百篇赞美文章中，玛丽·麦格罗里在《华盛顿明星晚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他并不要求被人喜爱。他不希望让人盲目追随。国会的反对派从未被他看作是颠覆分子，他也从不把他的批评者看作是叛徒。对此他从不发牢骚。

每天清晨他都在华盛顿行走——当时这是很安全的。他把经常会见记者作为一项方针，不把自己的错误归罪于他们。他不把办公

室当成一个俱乐部、一块盾牌或一个藏身之处。他在那里工作……他说，他依靠圣经和历史而活着。他抱有一种信念，并且亲身证明了：普通的美国人有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而一名美国总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在印刷品和电波中，在国会的各个会议厅中，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作为一个勇敢者和坚持原则的人，他将被人们怀念。甚至《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等在过去的年代中经常蔑视他的报刊，如今也称赞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伟大人物。

《纽约时报》的讣告占了7个版面。（这篇讣告的作者、《纽约时报》的奥尔登·惠特曼几年前便开始准备这篇文章，当他到独立城去采访杜鲁门本人时，感到很难把这项任务和盘托出，杜鲁门则以一笑来欢迎他，并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要尽全力帮助你。”）

在人们发表纪念性的赞扬的日子里，在他如此热爱的参院大厅中，他被称赞为面临过是否使用原子弹的重大决策的总统，赞扬了他的许多决策：联合国的创立、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柏林空运、承认以色列、北约的建立、将美国部队投入朝鲜以及坚持文职人员控制军事的原则——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说，这些决定是“使我们中的许多人为之逊色决策”。

人们记得他是提出医疗照顾计划的第一位总统，记得他冒着政治命运上的危险、坚持民权立场的那种勇气。乘火车沿途竞选运动如今被说成是美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有作为的时期。

他的缺乏魅力、他的“密友”和艳俗的佛罗里达衬衫、那些愤怒的信件以及“杜鲁门丑闻”的污点，似乎都已在记忆中淡漠了。那些曾经如此肮脏的丑闻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后来行政当局中的那些大量的腐败相比，几乎显得平淡无奇了。

经常被引用的萨姆·雷伯恩的观点，即杜鲁门在所有重大决策上都是正确的、错误的只是那些不重要的决策，很难说是精确的。他的忠诚计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个可悲的错误还有对路易斯·约翰逊的任命、对钢铁工业的高压占领——而恢复赫伯特·胡佛的公共服务并使他重新获得公众的尊敬，则不仅是一项正确的和慷慨的“不重要的”决策，而且是一项表现了杜鲁门的基本人品的决策。

至于后来某些批评者坚持认为他应对中央情报局的变节行为和专制以及越南战争负责的说法，是使人无法理解而且也是不公正的。他从未想让中央情报局变成这种样子。他对越南的决策也绝没有为后来的极不相同的总统们所采取的政策预先规定方向。

他所坚持的朝鲜战争应保持在界限内、不要变成一场核战争的恶梦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是他杰出的成就之一。很少有一位总统在身边会拥有如史汀生、贝尔纳斯、马歇尔、福雷斯特尔、李海、艾奇逊、洛维特、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克利福德、利连撒尔、哈里曼、波伦和凯南这样的有能力、值得钦佩的这么多人——时间也将证明这一点。这是有史以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最优秀的一群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正如他们支持他一样，他也支持他们。

出生在镀金时代、蒸汽机时代和华而不实的哥特式建筑时代的杜鲁门，

活着见到了一个许多东西不可避免地丧失和火箭登月旅行的时代。他生活的跨度包含了比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变化。作为一个以 19 世纪为背景的人，他不得不面对着许多与其想象极不相同的 20 世纪的最困难的决策。作为一个上一代刚从边疆移居美国内地、充满了老杰斐逊的农业民主思想的农村的孩子，他不得不承担起指挥在那个非常时期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的责任，当时，这个国家连同它在科学技术上的惊人进展，已成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一支力量。他所承担的责任是他以前的任何总统所没有经历过的，而他就不仅仅是经受考验了。

他本质上雄心勃勃，却从未被其雄心所累，他决不去充当他本来就不是的角色。他坚持普通人的观念和普通人的举止。他说普通人的话，他像林肯以来的一切总统一样，把普通美国人的语言和价值观带到了这个最高的职位上。他坚持旧时的准则：勤奋工作、尽力做好、讲求真理、不摆架子、信仰上帝、无所畏惧。然而，他又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的人。家乡的特征、密苏里人的机智、友情的热烈、哈里·杜鲁门的坦诚，尽管这些都很惹人喜爱，但它们却被那些使他成为世界级人物的更重要的品质所超越，在这两方面他都是一个伟大而优秀的人，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

在波茨坦，金海军上将曾向莫兰勋爵耳语道：“注意这位总统，这儿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事物，但他能够掌握它。他是比罗斯福更典型的美国人，他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由于他那“掌握它”的能力、他内在的坚强、他对民主进程的基本信念、他对美国人民的信任、以及他关于历史是行为的最终、最重要的裁判的信念，使得他真正地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人。他从未怀疑过自己是谁，而这也正是他力量的一部分、是他所传达的生活的乐趣之所在。

他是制宪元勋们心目中为国家设想的那种总统。他直接来自人民，他就是美国。在他的一生中，在他的经历中，从小镇到农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18 年前往遥远的法国；从战后的金融破产到大城市的核心小集团政治的世界，到华盛顿的新政革命年代，到另一次可怕的世界战争期间美国实力的崛起，在美国生活的这部伟大的编年史中，就像一部小说中总出现的一个角色那样，他都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全部经历几乎是寓言式的，题目可以叫《独立城的男子汉及其远征》。

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员艾德莱·E·史蒂文森第三曾说，杜鲁门生活的“经历”就是我们本身的一个经历，“一个关于受人拥戴的政府所具有的活力的客观经历；一个这个社会有能力从最不惊人的家庭出身中产生出最惊人的人材的例证。”

迪安·艾奇逊曾把他称为怀有一颗伟大的心灵的船长；乔治·马歇尔在 1948 年曾说，正是“这个人的正直”使当时能够一帆风顺，这甚至比他作出决策所需要的勇气更重要。埃里克·塞瓦赖德一直在潜心密切地观察研究当时的历史及其重要人物，大约 40 年后他谈到杜鲁门时说：“我不能肯定说他在原子弹问题或者甚至在朝鲜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应该记住他使人们想起了处在那个职位上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种品格，完全是一种品格。如今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就像是一块磐石。”

他活了 88 岁零大约 8 个月。贝丝·杜鲁门在北特拉华大街 219 号又住了 10 年。她于 1982 年 10 月 18 日在那里去世，遗体葬在杜鲁门图书馆院子里他的墓旁。

